

在二十世纪黑暗无比的深渊里起舞，在当今世界难以想象的大规模谋杀夹缝中求生，
鲜有人经历更少有人讲述的故事——在举世皆敌的第三帝国长大

Hans J. Massaquoi

[德] 汉斯·尤尔根·马萨夸依 著

洪萃晖 译

DESTINED TO WITNESS

Growing Up Black in Nazi Germany

命定的见证

一个黑人在纳粹德国的成长



文化发展出版社

Hans J. Massaquoi

[德] 汉斯·尤尔根·马萨夸依 著
洪萃晖 译

DESTINED TO WITNESS

Growing Up Black in Nazi Germany

命定的见证

一个黑人在纳粹德国的成长



文化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命定的见证：一个黑人在纳粹德国的成长 / (德) 汉斯 - 尤尔根 · 马萨夸依 (Hans J. Massaquoi) 著；洪萃晖译. — 北京：文化发展出版社有限公司，2019.9
ISBN 978-7-5142-2719-2

I. ①命… II. ①汉… ②洪… III. ①汉斯 - 尤尔根 · 马萨夸依 - 回忆录 IV. ① K835.16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89369 号

北京市版权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9-5889

DESTINED TO WITNESS: Growing Up Black in Nazi Germany by Hans J. Massaquoi
Copyright ©1999 by Hans J. Massaquoi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9 by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Co.,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ns J. Massaquoi c/o Sarah Lazin Book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達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命定的见证：一个黑人在纳粹德国的成长

著 者：(德) 汉斯 - 尤尔根 · 马萨夸依

译 者：洪萃晖

出 版 人：武 赫

责任编辑：尚 蕾

责任校对：岳智勇

责任印制：邓辉明

装帧设计：朗月行 赵 菲

出版发行：文化发展出版社（北京市翠微路2号 邮编：100036）

网 址：www.wenhua fazhan.com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久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382 千字

印 张：29.5

印 次：2020 年 1 月第 1 版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69.80 元

I S B N : 978-7-5142-2719-2

◆ 如发现任何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发行部电话：010-88275710

致谢

像养育一个孩子一样，“养育”一本书通常也需要一“村子”忠诚的亲戚、朋友还有专业人士。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一切只会是我脑海里的白日梦而已。

帮助我把脑海里的念头变成一本书，大部分功劳属于我的太太、我最好的朋友，凯瑟琳。在成稿的各个阶段，她忍受着一个“天才”工作时的各种荒诞行为，同时还承担起多种角色，诸如缪斯女神、参谋、美食大厨、司机，等等等等。许多时候，她真的是挽救我于困境，与我的电脑斗智斗勇，不管它在罢工还是不肯配合我，她都能让它乖乖听话。

同样要感谢的，还有我的两个儿子，史蒂夫·G·马萨夸依，医学博士、麻省理工助理教授，还有小汉斯·J·马萨夸依律师，底特律路易斯—芒迪律所合伙人。虽然本职工作繁忙，他们还是在这本书上投入许多时间，从阅读到评论，小汉斯还在与出版方和经纪人的合同以及版权方面给了我许多法律建议。

我还要感谢我太太的弟弟和妹妹，纽约白原市的努玛·卢瑟和加州圣荷塞的伊莱恩·汤普森，还有我的朋友埃德·莫里斯，芝加哥哥伦比亚大学的电视学教授。出于热爱，他们三个分别阅读并帮忙编辑了手稿，给我提供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尽管为时已晚，但我还是要大力感谢我已故的朋友艾利克斯·哈利。就在他1992年2月10日去世的前几个月，他把我尚未完成的手稿返还给我，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建议，还答应写一篇评论。

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我一生的挚友、著名的畅销书作家，德国科隆的拉尔夫·乔丹诺^①。可以说，这一切都是他在推动。许多年以来，他都鼓励我写本传记。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他跟德国的著名编辑们开过会，如果我能迅速给他一份手稿，他会确保让合适的人看到这份手稿。我把手稿寄过去不久后，德国出版方的热情就被点燃了，《命定的见证》应运而生。

在此，我还要感谢瑞士的莱蒙德·J·斯米克教授。他正在准备我的祖父莫莫鲁·马萨夸依（1870—1938）的传记。他给我提供了许多我祖父的信息。

还有一个值得感谢的是我的文稿代理人，纽约市萨拉·拉金出版社的萨拉·拉金。她在欧洲和美国都不遗余力地为我奔忙。我非常感激我的执行编辑克莱尔·瓦赫特尔，他让我的书得以出版。还有我的文字编辑格雷格·威利皮克，他用敏锐的视角和灵巧的笔触，为我的手稿做了润色。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必须在此提及我的两个好伙伴，堂吉诃德和桑乔，我们的两条威尔士猎犬，在许多孤独的夜里——任何一个开始写书冒险之旅的人都会经历的长夜——耐心地陪伴着我。

^① 拉尔夫·乔丹诺（Ralph Giordano，1923—2014），德国作家和时事评论家。《贝尔蒂尼家族》是他的半自传体小说。——编者注，下同。

序言

以一种不会招致软弱、虚荣和利己等指控的方式来书写一个人的自我，是一件只有少数人能完成的工作。我没有理由相信自己是那少数的幸运者。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①

一个世纪多前，一位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在其自传《我的奴隶生涯和我的自由》的序言中雄辩地阐述了以上观点，对此我毫无保留地认同。若我还能如道格拉斯先生一样，甘愿冒着被指控为软弱、虚荣与利己的风险，将自己的故事公之于众，主要是由于一些我认为能做出无可挑剔的文学批评的人，譬如说《根》的作者，我的老朋友亚历山大·哈利；《贝尔蒂尼家族》的作者，德国科隆的拉尔夫·乔丹诺；以及我的前雇主和导师，约翰·H·约翰逊。^②他们每一个人都令我确信，作为一个在纳粹德国生存与成长的年轻黑人，一个纳粹种族狂

①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 1818—1895），革命家、政治家、演说家、作家，废奴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第一位担任美国外交使节的黑人。

② 亚历山大·莫里·帕尔默·“亚历克斯”·哈利（Alexander Murray Palmer “Alex” Haley, 1921—1992），美国作家，最著名的作品是1976年出版的《根》。

约翰·H·约翰逊（John Harold Johnson, 1918—2005），美国出版家。

热与种族屠杀的目击者与长期受害者，一个在非洲生活多年的记者，我有责任分享对大屠杀截然不同的观点。亚历克斯认为，我既是德国纳粹时期的亲历者，同时也是一个屈指可数的局外人，因而我对第三帝国的一些重大灾难事件有着独到的见解。同时他还敦促我记录下自己探寻非洲故土的特殊经历。

较之犹太同胞在德国遭受的大屠杀和我的非裔美国兄弟姐妹们经历的种族迫害，还有四个根本的方面让我在纳粹分子统治下历经地狱般的苦难。

白人纳粹统治德国时，我作为一个黑人是极其显眼的，因此既不能跑也不能躲藏，用我的童年偶像乔·路易斯为例能够很好地解释这一点。

不同于非裔美国人，我没有继承无数祖先创造和完善，并由被压迫的人们代代相传的生存技能。恰恰相反，我在危机四伏的局势中，依赖自己的本能去盘算如何在种族傲慢和种族仇恨中求生，如何最大程度地保全身心，有时还不得不公开迫害所有“非雅利安人”。

不同于他们的同盟者美国白人，纳粹种族主义者从未悄然承认他们的暴行，而是好像披着白床单在黑夜里穿行。他们也不像当代一些美国政客那样，通过巧妙运用“不公平分配”、“反歧视”和“国家权利”的代名词来区分黑人与白人以推行种族歧视政策。纳粹德国的种族主义者在政府的充分庇护与支持下公然作奸犯科，宣称“劣等”的非雅利安血统会污染雅利安血统，是招致国家祸乱的原罪。

实际上，除了那给予我勇气与不断支持，并教会我相信个人潜力的德国母亲，我孤身面临着纳粹种族清洗政策的持续威胁。我在这种威胁下失去了人身处在群体中——哪怕是一个四面楚歌的群体——所获得的安全感与归属感。由于黑人女性的缺乏及政府对于种族混合的禁令，当我进入青春期时，我没有合法的社交渠道。不同于当今成千上万居住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非洲人以及黑人父亲和德国母亲生育

的孩子，即所谓的“棕色婴儿”，希特勒统治时期，黑人在德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发表言论，至少我没有找到过。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了解到一部分德国黑人的悲剧，这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法国和比利时殖民军队称为“莱茵兰杂种”的人，在希特勒集中营中全部死亡。

由于我们这一代德国人总被认为是皮肤白皙的雅利安后裔，我不得不在生活中花费大量口舌解释为什么一个棕皮肤、黑头发的人会操着一口标准德国话并声称德国是他的出生地。让我在此再次重申，我在1926年出生于德国第二大城市汉堡，因为祖父是当时的利比里亚总领事，携大家族迁居此处。他的大儿子，疯狂追求我的母亲，一位德国护士，之后成为了我的父亲。在希特勒上台前不久，祖父与父亲回到利比里亚，留下我和我的母亲在一个日益充满敌意的种族主义环境中自生自灭。

盖世太保刽子手和盟军炸弹令我们惶恐不安，这种苦难终结于1945年的春天，当时汉堡纳粹总督卡尔·考夫曼违抗希特勒捍卫汉堡到“只剩最后一个人”的命令，将这个几近毁灭的城市交给了英国军队。斯特兹·特克尔称他的二战口述史《正义之战》写尽了一切历史，但无疑这其中并不包括我与母亲在汉堡人间地狱的九死一生。我们历经了大约两百次英美空袭，他们屠杀了超过41000名平民，毁坏了一半以上房屋，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那栋。

1948年，战争结束后的第三年，我去利比里亚投靠我的父亲。在非洲，我不仅对非洲文化有所了解，还首次感受到了英法的殖民种族主义。1950年，我办了一年的学生签证入境美国。到达后不到九个月，朝鲜战争大概进行到三分之一时，我作为一名非公民，由于明显的文书错误被强制服兵役，并在第八十二空降师中服役两年。

在数不胜数的场合中，在军队的里里外外，我有机会见到美国的阴暗面，将美国的种族主义与纳粹的种族主义进行比较。我经历的个别事件，清楚地反映出种族主义不仅限于南方的种族歧视，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1966年，我在芝加哥只为白人开放的格奇公园中，参加

了由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开放住房游行”。当金先生带领我们的和平组织祈祷时，愤怒的白人群体向我们扔石头并用污言秽语对我们加以辱骂，一小队被指派来保护我们的警察几乎无法阻挡他们。

在另一次事件中，我穿着军装，乘坐一列由芝加哥前往北卡罗来那州费耶特维尔的火车返回布拉格堡邮局。当时我睡着了，没有在南行火车到达梅森—迪克逊线^①时转乘一列被隔离的有色人种火车，一名白人火车售票员便对我一阵辱骂。“把你的黑屁股蛋子从这里移开，滚去黑鬼待的地方！”这个萎靡不振的白人，从后面踢我并厉声叫嚷。要是由着自己的心，我真想痛打他一顿。但想到牢狱之灾，我还是抑制住满腔怒火，拿起自己的行李，照他的指令做了。

这种侮辱几乎是不可忍受的，但我在生命的早期即知道了人生如戏。我的忍耐获得的恩典是军人安置法案，这使我能够接受曾在纳粹德国被拒绝的大学教育。在学习期间，我追求了一位来自圣路易斯的年轻社会工作者并最终与她结婚。尽管十四年后我们分开了，这段婚姻依然恩赐给我们两个可爱的儿子，他们是我小有所成的巨大动力。

我拥有伊利诺伊大学的新闻传播学学位，在我加入约翰逊出版公司担任每周黑人新闻杂志《Jet》的副主编之前，我一直做着一些次要的编辑工作。一年之内，我转职到了Ebony公司的类似职位，它的王牌是月刊图像杂志。

一夜之间，我成为了本世纪最伟大的社会政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观察者和记录者，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为争取种族平等而奔走于美利坚合众国、非洲殖民地以及西印度群岛。在Enboy公司近四十年的职业生涯中，我晋升为执行编辑，成为该出版

① 梅森—迪克逊线以英国测量学家查尔斯·梅森和测量学、天文学家杰里迈亚·迪克逊的名字命名，本来是宾夕法尼亚州与马里兰州之间的分界线，美国内战期间成为自由州（北）与蓄奴州（南）的界线。

社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时代一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中有一席之地，并能与最知名的人物当面对谈，这其中包括三位美国总统（卡特、里根和布什）。而我的任务范围则分布于美国、非洲、欧洲、亚洲、加勒比等地区。这些任务涉及独家采访，采访对象有政治家譬如总统，有尼日利亚的纳姆迪·阿齐基韦、博茨瓦纳的塞雷茨·卡马、利比里亚的威廉·托尔伯特和纳米比亚的萨缪尔·努乔马，总理有牙买加的迈克尔·曼利和爱德华·西加；我还采访过民权活动家，如马丁·路德·金、牧师杰西·杰克逊和马尔科姆·X，以及大量“活传说”，如妮娜·霍恩、黛安娜·罗斯、秀兰·邓波儿、乔·路易斯、马克斯·施梅林和穆罕默德·阿里。^①

长期研究和报道黑人的成就，我有很多收获。于我而言，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件事让纳粹统治下遭受十二年非人虐待和侮辱之后的我，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停泊之所，这也解决了许多混血者对其种族身份认同的分歧。我虽无法成为在种族主义美国见证黑人持续为生存和平等而英勇斗争的人，但可以在一篇又一篇的文章中记录下黑人在难以置信的不利条件下取得的无数成就，令人非但不以黑肤色为耻反

① 纳姆迪·阿齐基韦（Nnamdi Azikiwe, 1904—1996），尼日利亚总统（1963—1966）。塞雷茨·卡马（Seretse Khama, 1921—1980），博茨瓦纳首任总统（1966—1980）。威廉·托尔伯特（William Richard Tolbert, 1913—1980），利比里亚第20任总统。萨缪尔·努乔马（Samuel Daniel Shafiiishuna Nujoma, 1929—），纳米比亚首任总统（1990—2005）。迈克尔·曼利（Michael Norman Manley, 1924—1997），牙买加第四任总理。爱德华·西加（Edward Seaga, 1930—2019），牙买加第五任总理。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美国牧师、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领袖，196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杰西·杰克逊（Jesse Louis Jackson, Sr., 1941—），著名非裔美国人民权领导者和浸信会牧师。马尔科姆·X（Malcolm X, 1925—1965），最有影响力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者之一。妮娜·霍恩（1917—2010），美国歌手、舞蹈家、演员和民权活动家。戴安娜·罗斯（Diana Ernestine Earle Ross, 1944—），美国歌手、女演员，1993年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评为历史上最成功的女歌手，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拥有两颗星形奖章。秀兰·简·邓波儿（Shirley Jane Temple, 1928—），美国传奇童星及外交官，全世界第一位获得奥斯卡奖的儿童演员。乔·路易斯（Joe Louis），外号称“褐色轰炸机”，历史上最伟大的重量级拳击手之一。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 1905—2005），德国世界重量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Haj, 1942—2016），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拳击手之一，20世纪最重要和最著名的体育人物之一。

而以己为荣。民权斗争最光辉的时刻，是在1963年3月的华盛顿，我站在林肯纪念馆前听到了金先生令人难以忘怀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这至今仍是我最骄傲与珍贵的回忆之一。

作为一名在普通德国劳动人民中长大的年轻人，我见证了人类最高压政府之一的崛起与它在令人痛苦的漫长十二年之后必然的毁灭性倒台。我亲眼目睹了纳粹毒药是如何被一个名叫约瑟夫·戈培尔的聪明技工制造并被希特勒炮制的，依我之见，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公共教育和宣传部长慢慢做着荼毒人的肮脏活，直到它将体面、热心、理智的男男女女都变成了疯狂的种族主义者。他们还毁灭了任何不遵从他们新世界规则——即如国歌字面上所言“德意志高于一切”——的人或事物。德意志民族非常愿意接受由一群嗜血好战的无良政治投机主义者下达的种族主义行军命令，这一点经常被认为是所有德国人都被洗脑且难辞其咎的佐证。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明白舆论很多，但可惜还不能造成决定性的差异，尽管纳粹领导层施加了压力，理智尚存者仍然保持着他们“不合时宜”的正派。但正是由于其中一些人抵制了时下盛行的种族狂热的煽诱，从来只把我视为一个有价值的同胞而非其他什么东西，我基本毫发无损地幸存了下来。我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非雅利安人，在希特勒的死亡集中营中幸免于死亡、绝育或医学实验，主要归功于两个幸运的巧合。其一是黑人不同于犹太人，数量少得以至于他们在纳粹屠杀队列的优先级被降低了。除此之外，盟军军事力量出人意料的快速发展使得纳粹一门心思进行自我保全，并且很多时候，盟军在盖世太保的刽子手完成种族清算前击溃了他们。因此，我在现代历史上最广泛、最系统的大规模谋杀计划告吹的夹缝中幸运地存活，并记录下我的这些生活片段。

回顾七十多年前的事件时，我靠的都是自己的记忆和个人记录。而对于在我出生或能够记事之前的事件，则依靠我母亲和其他在德国、美国和利比里亚的家庭成员的记忆。既然并非所有被叙述的事件都已遥远与终结，我更改了一些名字以免人们感到过度尴尬。

目录

致谢 //001

序言 //003

来自非洲

短暂的碰面 //002

莫莫鲁·马萨夸依 //004

赫曼·巴茨 //006

德国的首位非洲“大使” //009

阿尔斯特的好时光 //013

街道上新来的小孩 //017

开心时光 //023

哈根贝克动物园的“文化表演” //024

国王的落魄 //026

人之初 //027

去缇丽姨母家 //029

弗赫尔的维克奥夫 //032

上学第一天 //033

在万字旗下

我们的新邻居 //042

失去的乐园 //047

家庭争端 //049

星期天的电影时光 //051

犹太人 //053

希特勒对家庭的“突袭” //056

我的朋友克劳斯 //058

法缇玛姑姑 //061

萨尔察的快乐夏天 //065

维希德的到来 //068

卡诺萨的海因里希国王 //072

戈绍先生 //074

哈登先生 //076

拯救心灵的书 //080

智慧之言 //082

穆缇的核心圈子 //084

麦克斯叔叔 //086

罪与罚 //088

量入为出 //089

重游萨尔察 //090

镜子，墙上的镜子 //092

我曾经有个小伙伴 //095

寻求皈依 //098

莫雷尔一家 //104

杜克先生 //108

莱茵兰之耻 //111
乔和杰西，新的英雄 //113
兴登堡 //124

漫长的战争

一触即发的战争 //128
维希德的复仇 //129
史莱登大街11号 //132
新的爱好 //136
战火蔓延到汉堡 //141
生活还在继续 //145
学徒期 //149
汉斯·沃尔默 //155
摇摆男孩们 //158
赖格鲁伯 //163
格雷琴 //166
在大后方 //174
汉堡的最后探戈 //177
告别童贞 //181
禁果 //186
我的伙伴们远赴战场 //190
败局的端倪 //195
蛾摩拉行动 //199
被炸得面目全非 //205
柯恩斯坦的秘密 //211
回到汉堡 //214

双城生活 //217
全面开战 //226
弄错了的身份 //230
吉奥达诺一家 //234
无处藏身 //238
麦克斯·罗普克 //243

战后求生

总算解脱了！ //248
《剃刀边缘》 //259
家，甜蜜的家 //261
饥饿——新敌人 //264
新事业——我的第一次演出 //269
被抢 //273
弗里德·加斯 //274
橡胶“巨头” //277
喜迁新居 //280
阿尔卡扎 //281
美国佬沃纳 //285
阿岳洪楼三人组 //301
巴黎的夜晚 //304
演出之间 //305
美国兵乱 //308
沃纳去了美国 //318
被捕 //321

从非洲到美国

非洲的联系 //328

达喀尔 //333

蒙罗维亚的团聚 //340

与总统见面 //349

调整适应 //356

婚礼 //361

布鲁维尔 //364

逃离 //370

纳撒叔叔 //374

罗伯茨菲尔德 //377

萨米 //381

紧要关头的和解 //382

拉格斯 //387

回到蒙罗维亚 //393

警局督察员莫里斯 //396

当心，山德士上校！ //401

在“勇者之家” //402

重返德国 //422

思考 //428

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430

来自非洲^①

^① 该标题及在“万字旗下”、“漫长的战争”、“战后求生”、“从非洲到美国”为编者所加。

短暂的碰面

1934年夏天，一个美丽的清晨，我到了学校之后，听到我们三年级的老师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通知全班同学，校长维希德先生命令所有学生及教职人员都去操场集合。操场上，维希德先生穿着他在特殊场合常穿的棕色纳粹制服，向我们宣布，“（我们）年轻生命里最重大的时刻”即将来临，命运已经选中我们这些幸运儿，我们将有幸亲眼见到“我们敬爱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他向我们保证，这项殊荣，有朝一日一定会令我们尚未出生的孩子及孩子的孩子对我们羡慕不已。那时，我才八岁，还并不知晓，在操场上近六百个小男孩之中，维希德先生这番话的对象，唯独没有我。

听了校长的话，整个学校都沸腾了。不用上学的一天，是多么稀有，多么出人意料。我们早就被灌输了元首的丰功伟绩，他是如何走到权力巅峰，如何把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被奴役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又是如何让德国恢复了旧日荣光与卓越。我们早就感受到元首的无处不在。到处都有他的画像和照片——学校的每个角落，城市的公共大楼，海报和邮票上，新闻和杂志上。更为生动的是，他那熟悉的声音经常出现在广播里，他引人注目的身影也出现在电影院的每周新闻影片里。现在，我们将有机会亲眼见到这位传奇的救世主和祖

国的大恩人。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包括我自己在内，这种欣喜之情似乎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

我们被自己的热情振奋着，在老师们的护送下，我们列队前行近一个小时，来到了阿尔斯特科胡乔兹大街——福尔斯布特尔郊区通往汉堡机场的一条主要街道——的某一处。从机场到汉堡市中心庄严的市政厅，也就是元首的车队即将驶来的路线上，有成千上万个几近癫狂的人排队等候。严酷的冲锋队^①队员手牵着手，形成一道看不到尽头的人墙，防止人们挤到大街上去。我们这些小孩，坐在纳粹党卫军和冲锋队的骑兵后面，忍受着痛苦的等待，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就在我们的耐心快要耗尽的时候，人群开始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旁边的党卫队军乐团吹响了希特勒最爱的《巴登维勒进行曲》，说明元首已经正式抵达。所有人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在他的黑色梅赛德斯敞篷轿车里，元首站在司机旁边，右臂行熟悉的纳粹军礼，面无表情地直视前方。

维希德校长跟我们说的“我们生命中最重大的时刻”只持续了几秒钟，但对我来说，却似乎是一种永恒。我这样一个卷头发棕色皮肤的八岁小男孩，在那里，在一群金发碧眼的孩子当中，饱含着幼稚的爱国热情，被喜悦的无知所包围。跟身边的每个人一样，我为这个人欢呼，这个把所有时间都致力于毁灭像我这样“劣等非雅利安人”的人，这个几年后把自己的国家领向它漫长历史上最惨重的灾难、把世界推到毁灭边缘的人。

^① 冲锋队是希特勒于1923年创立的武装组织，成员穿黄褐色卡其布军装，因此也称褐衫军。

莫莫鲁·马萨夸依

我如何成为狂热欢呼人群中的一员，这事说来话长。它并不是从1926年1月19日我的生日那天开始，也不是从引人遐想的、我出生的城市汉堡开始。相反，它是从我出生五年之前，在西非利比里亚的首都蒙罗维亚开始的。它是总统为了摆脱潜在的政敌——我的祖父莫莫鲁·马萨夸依——而做出的精明决策。

查尔斯·邓巴·金，利比里亚第十四任总统，一度认为野心勃勃、威望与日俱增的马萨夸依已经成了他的威胁。受过美国教育的马萨夸依原本就是土著瓦伊部族的领袖。这个部族横跨了利比里亚和相邻的英属殖民地塞拉利昂。在父亲拉海国王和母亲珊迪曼尼王后去世后，马萨夸依继承了王位，当了十年的莫莫鲁四世，却在三十岁那年，因为一场部落争端而不得不退位，来到蒙罗维亚政坛寻求机会。他放弃了五个部落妻子，娶了一位年轻的美人瑞秋·约翰逊，这对他的事业大有裨益，因为这位美人碰巧是在政界和商界都广有人脉的希拉里·W·R·约翰逊——首位利比里亚本国出生的总统——的孙女。这段婚姻不仅印证了他对美貌的无限追求，也成全了他的野心，因为它给予了他想要在利比里亚政坛成功就必不可少的东西——这个国家的“美国利比里亚人”统治阶层的社会认可。（“美国利比里亚人”是美国黑奴的后代喜欢用的名称。1847年，他们成立了利比里亚共和国，之后建立了严格的种姓制度，旨在让土著在政治和经济上永远处在无能的状态。）

有了政治悟性、魅力和粗犷而英俊的外表的加持，马萨夸依很快就一路高升，担任了许多重要职位，包括内政部长在内。他承担了

许多职责，让部落首领们和利比里亚政府更加亲密，调查部落的抱怨不满，解决部落间的纷争。在美国利比里亚阶层和部落族人的广泛支持下，出身贵族的马萨夸依成了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他也成了政界高层议论的对象，他们说他将总统府邸的下一任主人。有些人还找到了金总统，金总统认为，是时候解决他了。问题是如何解决呢？很快，他就有了主意。

答案就在德国战后首届政府（总统弗希德里希·艾伯特）的代表来访之中。在总统府，德国外交官比辛博士和金总统讨论利比里亚和德国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同时在场的还有内政部长莫莫鲁·马萨夸依。

矮胖的外交官走进金总统的办公室时，总统和马萨夸依都起身迎接。这个德国人穿着皱巴巴的白色亚麻西装，手里拿着一顶太阳帽，不断用帽子扇风，徒劳地想要缓解热带令人窒息的炎热。

跟来访者不同，两位利比里亚人看上去就很舒适了。高挑、优雅、胡子浓密的金，和魁梧、整洁、五官鲜明的马萨夸依，都身着深灰色的伦敦式西装，戴着时髦的白色高领，纯白的颜色与他们黑色的脸庞形成鲜明的对比。

等三个人都点上雪茄坐下后，德国人表明了来意。他操着一口准确而流利却又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说艾伯特总统和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让他转达他们的感激之情，感谢金总统愿意聆听他们的建议。

他继续说道，他的政府认为，德国与利比里亚通过交换领事官员而建立外交关系的时机到了。比辛博士解释说，这样的交换，将会是互惠互利的，利比里亚将会获得其急需的诸如橡胶、可可和棕榈油的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而德国也将毫无障碍地获得这些重要物资，因为他们原有的渠道被协约国非洲殖民地的军队剥夺了。

对于这一提议，金总统表现出的不仅是感兴趣，而且是非常迫

切地想要尽快加以实施。外交官很谨慎，说这样一个计划想要成功的话，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选择一个合适的人。他指出，总统需要的是一个品质卓越的人。他必须拥有很高的智商、表达能力和良好的教育背景。他还必须非常了解整个非洲、利比里亚及其文化，最后，想要在阶层意识鲜明的德国获得认可，他还必须拥有出色的社交技巧。

“我想我有一个绝佳人选。”总统说。他确凿无疑地看着他的内政部长。“实际上，我知道我有一个绝佳人选。”

德国大使来访六个月之后，1922年6月12日，莫莫鲁·马萨夸依被任命为利比里亚驻德国总领事，搭乘德国沃曼船公司的维伯特号班轮抵达汉堡。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瑞秋，十七岁的儿子纳撒尼尔，一岁的儿子亚瑟，还有十岁的女儿法缇玛。之前几段婚姻留下的六个成年儿子中的五个，亚哈、曼纳、亚瓦、贝詹姆士和亚布拉罕，都被留在非洲。他的长子阿哈伊在他之前就来了欧洲，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上学。

赫曼·巴茨

那是1905年2月一个星期日的清晨，天气很冷。像往常一样，采石场师傅赫曼·巴茨穿过德国中部小镇乌夫通根附近风景胜地哈尔兹山脉的森林。他要去的是存放了大量炸药的粉料库，他去拿几根棍子，准备第二天早上的爆破工作。通常，从采石场到粉料库只是短短几步路，但现在，雪积了快一英尺深，巴茨师傅只能慢慢前行。他体格健壮，中等身高，像那个时代大多数典型德国男人一样，他也留着男子气概的象征——浓重的八字胡。

在这个特别的清晨，他有些忧虑不安，这当然是有原因的。上个月，他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第一次，在采石场里，他爬上一架绳梯，想要在一面陡峭的石壁上标记钻眼的点，突然，绳梯两条主要绳

索中的一条断了。幸运的是，他抓住一个足够长的横档，他的几个手下把他安全地拽了下来。几天后，他又差点被一个掉下来的大石块砸死，那个石头只差几厘米就会砸中他。他意识到，这些并不是意外。仔细检查了断掉的绳索还有被移动过的石块，他的怀疑得到了印证。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有人想让他死。

即便是在这两起“意外”发生之前，妻子玛莎就提醒过他，要他额外当心。自从他告诉她，他炒掉了六个意大利工人，用失业的德国工人替代他们之后，她就一直担心他的安全。他对外国工人没有敌意，他只是一个爱国的德国人而已。他的处世原则很简单，他坚定地认为，做好事应该从家门口开始。多年来，活计充足的时候，在采石场工作的意大利人很多。但是，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他们是最后一个被雇佣的，而且如果活计不足的话，他们是最先被炒掉的。这种不被需要，或者是被当成恶人一样被容忍，让意大利人多半憎恨德国人，但他们很明智地把这种憎恨藏了起来。他们住在镇子边沿最破烂的屋子里，最大程度地减少与镇上居民的接触，这样一来，他们跟当地人倒也相安无事。

巴茨师傅心里记着妻子的提醒，接近粉料库的时候更加小心。他一走进去，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就穿透了寂静的森林，地面都在颤抖，回声回荡在几十公里开外，每个人都听到了——每个人，除了巴茨师傅。

玛莎听到爆炸声时，立即知道丈夫出了事。尽管怀着八个月的身孕，她还是迅速地召集了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三个，两岁的贝莎、五岁的弗里达和七岁的卡尔。他们飞快地跑去镇上求助。不过，几个采石场工人，听到周日上午这样不同寻常的爆炸声之后，已经自发组成小组往采石场赶去。玛莎打算跟他们一起去，却被工人妻子们拦住了。男人们深夜回来的时候，脸上都是沉痛的表情。他们带回来的消息比玛莎害怕听到的还要糟糕。他们在粉料库看到的只是一个巨大的弹坑，棚屋的木料碎片，还有一条被锯断的铁链。到处都没有巴茨师

傅的踪迹，除了他背心上的一個珍珠貝母鈕扣，以及右脚大腳趾頭。

灾难发生的第二天，经过调查，人们得出初步结论，赫曼·巴茨是一起或多起暗杀事件的受害人。在这位采石场师傅踏进粉料库的那一刻，有人引爆了炸药，作案手段尚未查明。人们强烈怀疑这是那些被炒掉的意大利工人的报复之举，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能将任何人同这起犯罪联系起来。几个星期后，这起灾难带来的震惊慢慢消散，小镇乌夫通根又恢复了之前的平静。然而，对于玛莎和她的孩子们来说，1905年2月这个星期日早上的爆炸事件却粉碎了他们的整个世界。玛莎埋葬了丈夫那少得可怜的残骸，举办了葬礼，一天之后，她不得不把公司的宿舍棚屋让给新来的采石场师傅和他的家人。雪上加霜的是，她又生了一个小女孩，克拉拉。这个不合时宜的小女孩，让她本来就过多的儿女数量更多了，现在她有九个孩子。虽然有着各种看上去难以逾越的障碍，年仅四十的玛莎，还是埋头苦干，尽她所能地抚养她的孩子们。她辗转在各个镇子之间，只要能找到工作，只要能担负得起的落脚处。她帮人打扫房间、洗衣服，在各种洗礼、婚礼和葬礼上帮忙。最后，她和她的孩子们在诺德豪森安定下来。诺德豪森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小镇。在那里，凭借早年接受过的助产士训练，她为当地人接生，终于过上了舒适的生活。

到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年近五十的玛莎即将完成她为自己设立的目标，那就是把孩子们培养成正派的人，让他们自食其力。她的长女，三十一岁的安娜，嫁给一个富裕的屠夫，有了自己的孩子。二十八岁的赫曼，是一个大农场里的管事。二十五岁的女儿玛莎，是一名熟练的裁缝。二十四岁的海德维希，在一个富裕的家族当厨师。十八岁的保罗，刚刚结束了学徒阶段，成为一名糕点师傅，而十六岁的卡尔，还在努力地当裁缝学徒。现在还跟玛莎住在一起的是她最小的三个女儿，十四岁的弗里达，十一岁的贝莎（以后会成为我的母亲）和九岁的克拉拉。玛莎的孩子们，虽然性情各异，人

生观也大不相同，但跟他们的母亲一样的是，他们对意大利人充满了不可协调的不信任。多年来，她已经把这种偏见扩展到了针对所有的天主教徒。

随着战事迁延，巴茨家一个又一个男孩加入了凯撒·威廉二世的帝国军——赫曼加入了炮兵部队，保罗加入了步兵，卡尔加入了骑兵。三个人在法国战场上都非常勇猛，他们知道父亲会希望他们这样做。赫曼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却失去了右眼。德国军队投降，凯撒被流放荷兰之后，1918年，兄弟三人退伍的时候，德国的失业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前途一片黯淡。兄弟几个中最具冒险精神的赫曼萌生了去美国碰碰运气的念头。他听说，美国有着无穷无尽的工作机会，活计多得“求着人做”。他的计划是，只要他在新世界站稳脚跟，就会把家人全都接过去。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初，赫曼来到纽约，接着是芝加哥，在一家德国餐馆打杂工。三年里，他拼命攒钱，终于攒够了钱兑现承诺把保罗、玛莎、海德维希和克拉拉接来。接下来是卡尔和弗里达，但他们已经成了家，决定留在诺德豪森，留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的糖尿病日益严重，移民美国已经是不可能了。刚刚接受完培训、在当地医院当护士助理的贝莎，原本打算跟兄弟姐妹们一起去美国，却突然改变了主意。她听说汉堡新开了一家小私立医院。她一直被汉堡这个海港城市深深吸引，于是，她收拾好行囊，吻别母亲，告别小镇生活，跳上了开往汉堡的火车。以后，她就会发现，这次跳跃比她想象中的要大得多。

德国的首位非洲“大使”

一战后的魏玛共和国是一座不稳定的、随时喷发的火山。新上任的领事马萨夸依于1922年正式在这里登上了外交舞台。高失业率和

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街头暴乱是每天的家常便饭。极左和极右的党派之间不断发生暴力冲突。一战的战胜方要求德国签订的惩罚性条约《凡尔赛条约》激怒了民族主义者，他们把怨愤发泄在犹太人身上，认为他们是叛徒和卖国者。马萨夸依在汉堡上任还不到两个星期，德国的犹太外交部长瓦尔特·拉特瑙，因为在《凡尔赛条约》条款下支付赔款时出过力，被反犹右翼狂热分子枪杀在自己的敞篷汽车内，当时他正在去他柏林办公室的路上。翌年11月，啤酒馆暴动失败——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的默默无闻的奥地利人试图推翻巴伐利亚州政府和柏林中央政府。这种想要摧毁摇摇欲坠的魏玛共和国的行动还有很多。

尽管情形如此不妙，这位利比里亚大使还是在繁华的大都市开始了新的外交工作和生活，如鱼得水。一战后，德国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非洲殖民地以及1400多万的殖民人口。作为这之后的第一位非洲官方代表，莫莫鲁·马萨夸依成了欧洲大陆上最引人注目的非洲人。没几年，他就牢牢地确立了自己在这个海港城市的地位。他是领事圈里最出名最受人欢迎的人，也是汉堡的居民和访客里最杰出、最高贵、最吃香的东道主。流亡欧洲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们，例如乔莫·肯亚塔，就在马萨夸依位于阿尔斯特附近约翰萨利22号罗瑟鲍姆高档别墅区的别墅里找到了融洽的气氛，那是他们秘密会议的理想之地。来自美国的民权活动家、艺人、知识分子还有运动员都曾经接受过他的友好招待。这些人里，最著名的有歌手、演员兼活动家保罗·罗伯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联合创立者W.E.B.杜·博伊斯，诗人兰斯顿·休斯，爵士乐明星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前重量级拳击冠军杰克·约翰逊，音乐会歌唱家罗兰德·海耶斯和学者艾兰·洛克。有些人还是莫莫鲁在美国留学时的老相识。

除了履行作为领事的多项职责，在许多学院，包括著名的汉堡大学，莫莫鲁还千方百计挤出时间用非洲语言写作、教学和演讲，尤

其是瓦伊语，他还把《圣经》翻译成瓦伊语。事实证明，他是一位超时代的传播者——他编写并出版了一份图文精美的小册子《利比里亚共和国》，就德国而言，正式地把利比里亚放在了版图之上。小册子封面上用英语和德语清楚地写明了作者的目的，“明确利比里亚是什么，她所代表的理想是什么，她为全球市场提供了什么，以便使文明的进步和人类的进步永存。”除了为利比里亚赢得朋友，影响世人，这本书还显露了他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官的自信。它的首页是金总统的整幅照片，照片里，金总统衣冠楚楚神采焕发。而他自己的照片则印在第25页，很小一张，他只穿着普通的西装。

到这个时候，我能降生在这个世界之上的主要因素也逐步到位了。但命运还是时不时需要一次小小的助推，我“出生在德国”这种怪事才会发生。其中一个就是，我的祖父得了一场扁桃体炎。为了切除扁桃体，他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这位风度翩翩的贵宾，用魅力征服了医生和护士，迅速成为病房里最受欢迎、最被细心照顾的病人。出院后，他在自己的别墅里举办了一次豪华的派对，请来所有照顾过他的医生和护士，感谢他们的热情和体贴。

命运的又一助推出现了——莫莫鲁的长子，二十六岁的阿哈伊，正好从就读的都柏林大学圣三一学院回来休假。阿哈伊的母亲是一位来自帕尔玛斯角的“美国利比里亚”美女，在伦敦留过学。从小在父母的溺爱中长大，他毫无意外地长成了一个被宠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年轻人，习惯了以自己的方式行事。除了这些缺点和习性，他也遗传了父亲的智慧和魅力，尤其是在对待异性方面。派对当晚，他周旋于父亲的客人之间，目光锁定了一位漂亮的棕发女郎。她才十几岁，独自站在拥挤的接待室的角落里。“我是阿哈伊·马萨夸依。”他这样介绍自己。看到年轻女孩因为被陌生人搭讪而显露出来的不适，他觉得很有趣。“你会说英语吗？”

女孩摇了摇头，“Es tut mir leid. Ich verstehe nicht.”（对不起，我听

不懂。) 阿哈伊说：“你叫什么名字？”

“这样的话，我们就只能靠我会的这一点点德语了。”他用流利但口音浓重的德语说道，“你叫什么名字？”

“贝莎。”她一边回答，一边害羞地观察眼前这个优雅的非洲年轻人，他做工精良的萨维尔西装，英俊、天鹅绒般的黑色脸庞，剪得很短的黑发，精心修剪的胡子。她还特别注意到他那双修长却健壮的手和洁白无瑕的牙齿。贝莎想，跟她家乡诺德豪森那些举止言谈怪异、粗鲁的年轻人比起来，他是多么不同啊。跟她跳过舞的人，大多都只是农民工或小商贩。

“你用不着害怕我。”阿哈伊告诉她，“我不会咬人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跟你说我们非洲人的，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可不是吃人肉的。”

看到自己的沉默被误解为害怕，她有点难为情，赶紧跟他解释，她并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份难堪，在他邀请她转天一起兜风时——新车是一贯溺爱他的父亲送他的礼物——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次兜风，是阿哈伊旋风般求爱的开始。后来他们频频约会，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不谙世故的贝莎渐渐消除了自己那份青涩。只要学业允许，阿哈伊就往返于都柏林和汉堡之间。他带贝莎去遍了夜店，去看赛马、看电影、歌剧院和歌剧，甚至拳击比赛。有时，他们还会去别的城市，比方说柏林。虽然忙着这么多的活动，阿哈伊却一再推迟他承诺已久的婚礼。每当贝莎提起这个话题，他就说学校有许多考试，他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策划和准备一个能配得上利比亚总领事儿子的豪华婚礼。然而命运给出了最后一记助推。1926年1月19日，星期二，早产两个月的我在艾本多夫医院出生，这是我的首次亮相。母亲给我起名汉斯-尤尔根。当时流行这种带连字符的名字。像绝大多数德国孩子一样，我开始管她叫穆

缇^①。无巧不成书，短短六个月后，7月31日，莫莫鲁的妻子，瑞秋，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我有了一个小叔叔——他们给他起名弗里兹。

与此同时，我的外祖母，身患糖尿病而病入膏肓的玛莎·巴茨，去了美国，想要“最后一次”看望自己已经在芝加哥及其附近定居的孩子们。穆缇写信给外祖母，告诉她我的降生，可是，信还没有寄到，穆缇就收到了她一个姐姐的黑边信，说她们的母亲已经去世，并且被安葬在芝加哥。

阿尔斯特的好时光

莫莫鲁非常喜欢我的母亲，坚持要她和我搬去他们的别墅，与马萨夸依一家同住，而我的父亲则大部分时间都在爱尔兰继续学习法律，还有别的东西。很快，别墅里就出现了语言分化。每个人都跟母亲和我说德语，而他们之间则说英语。没过多久，这栋汉堡最高档社区里的庄严豪宅就充满了两个任性的学步儿的喊叫声。为了照顾我，母亲辞去了医院的工作。她努力地协调我和“叔叔”弗里兹之间没完没了的争端，不让我们去打扰莫莫鲁。法缇玛已经去郊区某所很好的寄宿学校上学，纳撒和亚瑟分别在上高中和幼儿园，相对来说，弗里兹和我占据了整个房子。直到两岁的时候，弗里兹又有了小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姑”法希雅。她成了莫莫鲁的另一颗掌上明珠。

在我蹒跚学步的时光里，在我与外部世界最初的接触中，如果说，我相信整个宇宙都是围绕着我运转，认为自己是非常稀有又极为

① Mutti，德语的母亲一词。——译者注

珍贵的，那也只是诚实地说出了我的想法。每一天，都有人伸长脖子看着我，不停地说，“难道他不可爱吗？”或者“太可爱了！”跟穆缇一起散步时，这种谄媚会变得非常具体，路人经常会给我糖果、水果甚至是钱。虽然我舍不得，但母亲还是让我拒绝。很快，我就知道了，跟我同龄的其他孩子并没有受到我这样的关注。我问穆缇这是为什么，她只说，那是因为每个人都喜欢我“美丽的棕色皮肤和黑色卷发”。以前，我从未注意到我与众不同的外表。突然，我就敏锐地感知到欧洲人和非洲人不同的种族特质。祖父是我的世界的主宰，他的肤色非常黑，而大多数白人对他俯首帖耳、毕恭毕敬。因此，我觉得黑色皮肤和卷发是高人一等的特征，接受了别人给我的名人待遇，我认为这是我应得的。

祖父莫莫鲁非常喜欢孩子。公事之余，他几乎都跟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事实上，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比与父亲还要多。为了在外贸行业积累实战经验，我父亲一边在都柏林上学，一边忙着在汉堡的一些公司里上班，其中就有韦尔曼轮船公司。莫莫鲁、弗里兹和我都是喜欢早起的人，每天早晨，我们三个都一起吃早餐——哈密瓜和一碗粥——在玻璃阳台上，可以俯瞰下面树木成荫的庭院。吃饭的时候，我会给这位老绅士说德国儿歌，讨他开心，包括吓人的《邋遢的皮特》。母亲经常给我念这首儿歌，我可以倒背如流。它讲的是“三个墨水男孩”，一开始还是白白的小孩，最后却变成了黑小孩。他们嘲笑一个偶然路过的缠着腰布的非洲小孩，圣诞老人惩罚了他们，把他们扔进一个巨大的墨水罐里，让他们变得比非洲小孩还要黑。每次，我背诵这首反应傲慢种族主义的德国经典儿歌，我的祖父就会哈哈大笑，笑声响亮得整个屋子都能听到。看到我这么努力，他也会给我讲述非洲古代伟大王国的故事。他甚至跟我说，他本人曾经也是一位国王。我怎么也不肯相信，直到他给我看了他的一张照片，年轻时候的他穿着国王的袍子，还带着王冠。他说他把王冠放在利比里亚了，还

保证说，总有一天，他会带我去那里，把它拿给我看。不管他跟我解释多少次，说他因为当烦了国王，已经把王位传给了他的一个堂弟，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神志清醒的人不愿意当国王。

每个星期天下午，莫莫鲁都会带亚瑟、弗里兹和我穿过阿尔斯特的一个公园去散步。我们几个人很威风，祖父带着小礼帽，穿毛皮领子的大衣和时髦的护脚，我们这些小男孩都穿成套的水手装和帽子，这在当时是非常时髦的。这样的散步通常会在我们来到一个精致的小咖啡馆或蛋糕店时达到高潮。空气里都是让人无法抵御的热巧克力、新鲜热咖啡和刚出炉的甜点的香味。背景音乐是小提琴和钢琴演奏的伤感煽情的维也纳华尔兹舞曲，营造出一种独特而舒适的气氛。我们一进去，一位谄媚的、身穿燕尾服的侍者就会迎上来，把我们这个小小的却很贵族的团队安排在最好的座位上。这些座位是专门给“尊贵的阁下”预留的。邻桌的客人总会小心翼翼地盯着我们看。我最开心的是，祖父会让我来点餐，让我炫耀我纯正的德语。充分了解到自己的重要性之后，我每次都得意洋洋地点餐。没有什么比其他客人脸上惊讶的表情更能让祖父开心的了。

甚至有时候，我已经睡了，莫莫鲁也会让母亲把我叫醒，因为他想让我在一些非洲和德国的客人面前展示我的德语。在这种场合，他会要求我唱一首德语儿歌，比如说《小汉斯独自散步》，而我会十分乐意地照做。知道我不仅会说纯正的德语，还会说准确无误的汉堡方言，客人们无不震惊，而我则会沉浸在他们的谄媚赞美之中。

对我来说，莫莫鲁就是一个老爷爷，一个无比善良、宽容的人。在我看来，他生命的主要目标就是，看到我所有的心愿和渴望都得到满足。只有到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并深深欣赏，他是一个多么重要多么杰出的政治家，作为整个非洲尤其是利比里亚的发言人，他扮演的是多么至关重要多么具有前瞻性的角色。

与此同时，涉及利比里亚的一桩丑闻，对我的祖父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最终也影响到了马萨夸依家所有人，包括我在内。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各种报道相继涌现，在全球都掀起巨大浪潮，威胁到了现代史上非洲大陆第一个黑人统治的共和国的存在。据称，金总统统治下的利比里亚政府不仅允许，还积极参与极度有利可图的人口贩卖，把利比里亚的原住民卖到尼日利亚海岸线旁边的西班牙殖民地费尔南多波岛（如今的比奥科）去做苦力。利比里亚，这个由被解放的奴隶建立的国家——以“为被压迫的人们打造一个天堂”为己任，以“对自由的热爱带领我们一路到此”为座右铭的国家，居然被指控实行奴隶制。

被这项指控刺痛的金总统，请求一个公正的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展开全面调查，为自己及国家正名。联盟接受了请求，经过一场详尽彻底的调查，得出结论，关于奴隶制的指控，正如联盟的反奴隶制公约所定义的，是不成立的。然而，委员会谴责利比里亚典当人口，尤其是来自部落的儿童，被家人送到富裕的美国利比里亚人家中，表面上是接受“教育”，其实是免费工作，除了最基本的食宿，没有任何报酬。虽然这种现象在整个西非都广为存在，包括广阔的大不列颠、法国、比利时和葡萄牙殖民地，却只有利比里亚，一个由黑人统治的小国家，被单独揪出来，被国际社会谴责。结果，压力如山倒，尤其是美国和大不列颠，要求金总统和副总统艾伦·杨希离职。

这个时候，金总统离职后的空位在蒙罗维亚引发了一场疯狂的争斗。大部分的幕后操作都发生在距蒙罗维亚3500英里的汉堡利比里亚领事馆，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在这里，一批又一批的利比里亚来访者——全是在野党人民党的领军人物——力图说服我的祖父，他才是领导利比里亚走出阴霾的正确人选。他们花了很大力气才说服他考虑参加总统竞选，尤其是那意味着改变他对执政党真辉格党的忠诚，与他多年的挚友及政治盟友国务卿埃德温·巴克莱分庭抗礼。不过，当金总统让莫莫鲁回利比里亚担任邮电部长时，他接受了，他认为这是

一个好兆头。1929年12月8日，莫莫鲁·马萨夸依下定决心，不管摆在面前的是什麼政治挑战，他都要去面对。他登上了汉堡—非洲轮船公司的S.S.利瓦迪亚号，朝着蒙罗维亚还有那祸福不明的政治前途驶去。

作为祖父的长子，我父亲被期待在祖父暗中谋求总统职位一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就意味着他也得结束在都柏林的求学之路，回到利比里亚。这一变故也被他当作借口，说现在还不是办婚礼的好时机。祖父邀请我们跟其他家人一起回利比里亚，我母亲拒绝了。虽然她一直期待我们可以有一天生活在非洲，但她迅速地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们的家庭医生严厉地警告她，我原本就体弱，这样巨大的气候变化会对我的健康更加不利。我先后一连串得了白喉、百日咳、猩红热和肺炎，好不容易才活了下来。医生劝说我母亲，把我带到非洲气候最不宜居住的国家之一，等于是让我去送死，因为那里疟疾和其他热带病成灾。母亲一听到这些，都没再询问别人意见，就对祖父说，至少是现在，她和我会留在德国。她的决定是不容商议的。为了不让我有生命危险，不管我们的经济状况或者她的婚事前景如何，她眼都不眨地放弃了梦想中的利比里亚生活。

街道上新来的小孩

祖父、父亲还有马萨夸依家其他人离开之后，我们在汉堡最高档住宅区的舒适生活就戛然而止。马萨夸依家只有一个人留在欧洲，那就是我的姑姑法缇玛，当时她正在瑞士伯尔尼一所寄宿学校里上学。

没有了家庭的庇护，穆缇只得自食其力。这意味着她要找一份工作，还有一套负担得起的寓所。幸运的是，汉堡市中心旁边的公立大医院圣乔治医院的耳鼻喉诊所还有一个护士助理的职位空缺。在医院

一位同事的帮助下，她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公寓，只有一个房间，没有热水，是一栋三层公寓楼的阁楼，要爬上两段极其陡峭的楼梯才能找到后门入口。我从未见过这么陡峭的楼梯。我们的新住址是巴姆贝克史都肯大街3号，这是汉堡东北部一片杂乱无序、以工薪阶层为主的住宅区。除了房租我们能负担得起之外，我母亲选择这个阁楼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楼下住着一位年长的寡妇，伊丽莎白·默勒女士。每周给她一笔钱，并且约定好我叫她默勒姨母，她同意在母亲上班的时候照看我，做饭给我吃。

作为新搬来的小孩，日子肯定不会好过。但对我的邻居们而言，我可不仅是新搬来的小孩，我还是个最与众不同的小孩。因此，邻居们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了我，而同样重要的是，我也适应了他们。在我已经离开的高级住宅区，在国际化的环境里，我祖父的身份地位让我们这样的黑人备受尊敬，我也学会了把我的种族特质看作是令人艳羡的资产。突然之间，看到人们对待我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转变，我不得不把它们看成是一种负债。人们不再友善地看着我，也不再奉承我，像我已经习惯的那样。相反，我走到哪里都会引起好奇，人们经常会带着敌意地盯着我，说一些侮辱性的话。最让我感到冒犯的有两个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它们。很快，我就发现，它们被人们专门用来形容我的长相。一个词是“杂种”。我逼着穆缇解释给我听，她说那是形容一个人，比方说我，出身于不同种族。另一个是“黑人”——据穆缇说，这个词用在我身上是不对的，因为她坚持认为我绝对不是一个黑人，她说黑人是指美国的黑人。然而，街上的淘气鬼们，最喜欢折磨我的小孩们，显然不会知道，或者说在意这其中的差异。只要一看到我，他们就会开始齐声喊，“黑人，黑人，扫烟囱的人！”他们会像施虐狂一样一直喊，直到我从他们眼前消失。幸运的是，一段时间后，这些恶狠狠的眼光和嘲笑就变得越来越少，因为我这异国风情的长相带来的新鲜感慢慢消失殆尽。很快，有些喊叫

得最大声的孩子成了我最亲密的伙伴。我如释重负，仿佛忽然之间，他们全都对我们之间的外表差异视而不见了。

偶尔，我还是会怀念以前备受呵护的生活——每天与祖父共进早餐，在阿尔斯特散步，还有当宇宙中心的感觉。然而，不管我还有什么怀旧之情，都跟我们现在大幅降低的生活水平毫无关系。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我看来，我们的新环境带来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更低的生活方式。现如今，我知道，母亲并不那样认为。

以前，我们有热水和冷水，现在，我们只有冷水。这意味着，以前我可以每天都沐浴或洗澡，现在我只能等到星期六晚上，我母亲用厨房的煤炉子烧一大壶热水，然后倒进一个镀锌大盆里。让我在里面泡一会儿之后，母亲会用一块涂了肥皂的海绵彻底把我“刷”一遍。最舒服的就是冲淋了。有时候母亲会突然兴起给我冲澡，往我身上倒几罐温水。除此之外，整个星期里面，我就只能在厨房的水池边用冷水洗那种“小鸟浴”。

我们的公寓里还缺少电话和冰箱。二战前绝大多数德国家庭都没有冰箱，人们只能每天都去购买食物。家用电话也只有富裕家庭才有。不过，有一样东西，让我们的公寓跟小区里包括我们整栋楼里的公寓不一样，那就是我们不是用电照明，而是用煤油灯。对此，我倒没有什么意见。相反，我还很喜欢每天晚上看着母亲点燃一根火柴，打开煤油灯，然后等着房间一点一点亮起来。

我们搬去的社区大多数都是老旧又脏兮兮的三四层的房屋，有些有阳台和非常小的后院，以及两层楼的联排式房屋。此时，距离二战后西德城市惯于把房屋粉刷成明艳的颜色以体现出“经济奇迹”的繁荣假象还有很久。在战前汉堡的工薪阶层社区，楼房表面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污垢。虽然外面很脏，但是巴姆贝克的家庭内部却是一尘不染的，因为主妇们基本上整天都在不停地擦拭、刷洗、打扫、掸灰、打蜡、清洁地毯、洗衣服。与罗瑟鲍姆安静的街道不同的是，巴姆贝

克的街道生动许多，人们做着各种各样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一切都极大地吸引着我这个五岁小孩。我对新环境的探索，大多都是跟在我的保姆默勒姨母身后。我们去她日常买东西的一系列店铺——牛奶铺、杂货铺、肉铺、蔬果铺以及每周一次的，鱼铺。大多数店铺都是夫妻店。在每个店里，她都会与店主们啰啰嗦嗦地聊个没完。他们什么都说，从天气到风湿病，从高物价到一战前的“好日子”。每个店铺都有吸引我的独到之处。友善的店主们还会给我一些小块的奶酪、糖果、香肠或水果。从默勒姨母那里听说，虽然我外表长这样，但我其实是个土生土长的汉堡人，而不是像大伙猜想的那样，是个“外地佬”——这个轻蔑的俚语是汉堡人用来说那些运气不好不是在汉堡出生的人的。

每当上午跟默勒姨母去购物时，我就会痴迷地看，看裁缝店里的裁缝在窗前的桌子上缝制西服，看烟熏火燎的铁匠铺里铁匠给大马钉马掌，看送冰人从酒馆前面的卡车上往下卸大冰块，看浑身是灰戴帽子的扫烟囱的人在屋顶上稳稳当当、有条不紊地把扫把伸进烟囱里清扫。有时候，号角和铃声响起，说明戴着安全帽的消防员们开着消防车过来了。跟史都肯大街交界的是一条主要街道，马克特大街，车流熙熙攘攘，上空还有高速列车呼啸而过。起初，母亲和我不习惯整晚的喧闹声，每次有列车经过时，我们就会醒来。不过几个星期后我们就适应了，对噪声完全不以为意。

我们家正对着的是“欧洲宫殿”的后门。它是社区里的电影院，每个星期日白天都有电影放映，很快就成为我周末最喜欢去的地方。往前半个街区是华夫饼厂，一栋老旧、丑陋的四层红砖大楼。虽然外表不讨人喜欢，但在小区的孩子们中间却有着极高的地位。我很快就知道，爬上一段楼梯，按响门铃之后，一个小窗户就会打开，我递进去五个芬尼，里面一个老太太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纸袋，里面装的是美味的华夫饼碎块。几年后，这个老华夫饼厂将会对社区和我有着截

然不同、很大程度上是饱含恶意的重要性。但如同那些神奇岁月里我遭遇的许多事情一样，它拥有着一种天真与魅力，在以后的时光里，我会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它。

由于每天都得去买食物，我不仅学会了适应汉堡出了名的阴冷、多雨、雾蒙蒙的天气，还喜欢上了它，因为它让汉堡人与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和动物不同。因为默勒姨母的厨房，我也迷上了汉堡的美食，比如熏鳗鱼、糖和肉桂盖饭、梨汤、猪鼻子和猪脚、培根煎比目鱼、油炸、生鲱鱼和熏鲱鱼，还有红果羹，一种红色的水果布丁。因为默勒姨母，我学会了像一个汉堡人一样去思考和体会。如果说她教会了我什么东西，那就是，土生土长的汉堡人拥有世界上最美丽、最令人兴奋和最值得拥有的家乡。

大概每月一次，默勒姨母会带我坐六号线有轨电车去市中心购物。在那里，我们会逛大商场，比方说卡施达特、托德特和新近从美国引进的伍尔沃斯，观看多姿多彩的橱窗和内部陈列。“旅行”的最后，我们总是会去少女堤上（相当于汉堡的纽约第五大道）优雅的阿尔斯特亭，或者是去卡施塔特的屋顶花园品尝各种甜品。有时，我们会不坐电车，改搭阿尔斯特渡船回家，这样的话我会跟母亲详细汇报我的所见所闻。不幸的是，这种市区之旅突然就停止了，因为默勒姨母年迈体虚，有一次下电车时，一个没抓牢摔倒了。这场事故造成了大轰动，人们站在我们身边围观我们，直到一个警察把她扶起来。尽管她伤得不太严重，但她再也不敢带我去“探险”，再也没有坐过电车。

一天，在离我们家不远的地方，默勒姨母和我看到三个黑皮肤、特征鲜明的女人走来。她们的黑发在空中飘动，长而艳丽的裙摆拖在地上。她们身后跟着几个孩子。他们嘲笑她们，像曾经嘲笑我那样。不过，他们没有拿曾经笑话我的“扫烟囱的人”来笑话她们，而是说什么“拉屎在裤子里的吉普赛男孩”。我问默勒姨母，这些奇怪的女

人是谁，她低声对我说，她们是吉普赛人。她说，她并不赞同这些孩子们的行为，但吉普赛人真的是自食其果。“吉普赛人，”她告诉我，“是非常危险的人。他们从不安心地待着或者工作，只要是会动的东西，他们都会偷走，尤其是小孩儿。”我惊恐地看着那三个女人，她们也用漆黑而晶亮的眼睛盯着我，我差点被吓死了。我也成了德国流行的传说“吉普赛人偷孩子”的坚信者。他们偷孩子，尤其是金发碧眼的小孩，然后把他们养大，给自己的“部落”增添“新鲜血液”，以避免近亲繁殖。虽然，我明白我的黑头发让我不是吉普赛人的首要目标，我还是不敢冒险，总是尽量跟他们保持距离。

终于，默勒姨母让我独自上街，跟孩子们一起玩，但她严厉地警告我，必须待在能听到她喊声的地方，大概是史都肯大街、马克特大街、哈佛坎普大街和朗根海姆大街之内两个街区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听到她从她家窗前召唤我，我能在几分钟之内回去，就会被认为在允许范围之内。但凡我去了听不到她喊声的地方，或者玩得太认真没回答她那响亮的叫声，“汉~~斯~~尤~~尔~~根~~！”她就会立即赶来把我抓回去。这样一来，逃不掉的惩罚就是，第二天不可以出去玩。这个审判结果是不容许上诉的。

默勒姨母还教我，千万不能被“拐小孩的人”盯上。汉堡专门有一种骗小孩跟着自己走的男人。那三个吉普赛女人的事情我还没忘，吓得毛骨悚然的我答应，绝对不跟陌生人走，更不跟那些“拐小孩的人”走。

如果说有一件事我是在匆忙之中学会的，那就是遵从默勒姨母的严肃教导。丈夫在一战著名的凡尔登战役中牺牲后，默勒姨母独自把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培养成人，成为了教养孩子的专家。她很快让我从长期以来“我是宇宙中心”的幻梦中醒悟过来，这都是为了我好。即便如此，她还是一个善良又心软的人，虽然举止上有几分粗暴，但在我越线时从未打过我或者有过任何体罚。她也没必要体罚我。在少

之又少的这种情形下，她有一个很方便却从未失手的手段。就好像德国谚语说的，“不听话的人就得感受一下”，她会从她的笈帚柜里拿出她那远近闻名的鞭子。那条鞭子是用一把细细的藤条扎成的。她说那是圣诞老人专门给不听话的小孩留着用的。她只要在我面前挥挥这条鞭子，我就会赶紧回到那条笔直而狭窄的“正道”上。

开心时光

虽然我非常喜欢默勒姨母，也不介意工作日的时候跟她待在一起，但我还是经常期盼晚上穆缇下班回家，尤其是星期天，她不用去医院上班，可以一整天都陪着我（在二战之前，德国人还是一周工作六天）。依照德国的旧风俗，母亲总是会给我穿上星期天该穿的衣服，然后带我出门。通常，我们会散步到城市边缘的城市公园。夏天的周末，那里会有很多活动，许多压抑的汉堡人渴望借此自由呼吸、放松。有些人会划小船或独木舟，有些会踢足球或打网球、放风筝、野餐、骑马或自行车，或者在巨大的室外泳池里游泳。但大多数人都只会跟我和母亲一样，简单地走一走，看别人尽情玩耍。

走累了，也饿了，我们就会坐在木头桌子前，享用母亲带来的美味的三明治。饭后甜点，她会让我从旁边的小摊贩那里买一个“巨大”的双球香草、草莓冰淇淋。

夏天的周末，我们还经常会去另一个地方，那就是白沙岛。那里有很长很长的沙滩，沿着易北河，还有许多精致的沙滩咖啡馆。从汉堡坐火车，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到。在白沙岛，我们会跟成千上万的人一起享受日光浴。我们会换上泳装，垒沙堡，看着易北河流域的潮水涨涨落落，或者只是躺在沙子上，凝视天空，看白云飘过。启程回家之前，我们会爬上几百级拐来拐去的台阶，来到白沙岛的高处，对

着古朴优雅的山边小屋们惊叹不已。

偶尔，我们会去一些特别的活动，比方说汉堡机场附近流行的空中表演。在那里，我们会跟许多人一起观看，一战传奇王牌飞行员恩斯特·伍德特冒着生命危险表演空中特技和跳伞。多年以后，伍德特成为浮夸的纳粹空军——希特勒借以征服世界的武器——的创立者之一。而我则会经常回想起在福尔斯布特尔万里无云的天空下度过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回想起看到童年最初的偶像时那种激动的心情。

母亲和我走到哪里，人们的目光就追到哪里，不过那丝毫没有影响到我。因为我确信，母亲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而穿着熨烫整齐的套装和锃亮鞋子的我也绝对是光彩夺目的。我从不作他想。只有当我察觉到，这些伸着脖子看我们的人的好奇里，包含着贬低、恶意或侵略性，当有人指着我笑话我或是用到我讨厌的那个词“黑鬼”时，我才会觉得被冒犯，才会愤怒。这种时候，我通常会朝那个人伸出舌头来还击，或是用食指戳着自己的额头，这在德国的手语里是“你疯了”的意思。母亲察觉到我的沮丧，但她从不责备我用这样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愤怒，虽然她经常对我说，对付无知者，最好的办法就是无视他们。我觉得要做到这样简直太难了。

哈根贝克动物园的“文化表演”

无论老少，汉堡人都最喜欢一个地方，那就是位于斯特林根郊区的国际化著名动物园，哈根贝克动物园。它以创立人卡尔·哈根贝克的名字命名，被誉为世界上首家可以观赏到野生动物在户外奔跑而不是关在笼子和栅栏后的动物园。我是哈根贝克的忠实粉丝。有一天，穆缇说我们再去那里玩一次的时候，我急忙答应。这一次，她还约了一个护士同事的女儿英格伯格一起去。英格伯格跟我差不多大，有些

被宠坏了，却还是挺可爱的。

我们坐了很久电车，一到动物园，英格伯格就要求去看印第安人（美国土著民）。母亲和我从未听说过动物园里会有人被陈列展览，但英格伯格坚持说她上次来时看到了真的活的“印第安人”。母亲问动物园的向导，这里是否有印第安人供观赏。他告诉她，他们这里的印第安人展览刚刚结束，但他们还有同样有趣的非洲人展览，就在几步开外的地方。向导解释说，他们的“原始人”展览是哈根贝克动物园著名的“文化表演”。

英格伯格和我很失望，因为我们本来盼着能看到印第安人戴着华丽的羽毛头饰，但我们还是同意妥协，去看非洲人展，虽然我们没有人知道即将看到的会是什么。我毫无心理准备。经过令人惊叹的猴子、长颈鹿、狮子、大象和其他非洲野生动物展览之后，我们来到了“非洲村庄”——大概六七间茅草屋顶的小泥土屋，还有人。有人告诉我们，那是“真正的非洲人”。跟动物展览一样，这个“村庄”被齐胸高的木篱笆围了起来，把观赏的人和被观赏的人隔开。人展和动物展的唯一区别就是少了那道把人和野兽隔开的深深的水沟。

除了肤色和头发，展出的非洲人跟我的亲人或者我在祖父家中看到的所有非洲人一点都不像。“村民”们都光着脚，衣着破烂。两个裹着脏兮兮破布的女人，有节奏地用一根很重的木棍在一个钵子里面捣着。向导解释说，她们是在碾玉米面，准备晚饭。男人们围坐成几个小圈，认真地盯着外面的人看，一边用那种很短的、粗糙的管子抽烟，一边用古怪的语言聊天。很难说，是谁对谁更感兴趣，是非洲人对欧洲人，还是欧洲人对非洲人。双方都带着强烈的好奇心，越过木篱笆，端详着彼此。

突然，从一看到这个展出我就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尽管为了不被看见，我已经很小心地藏在了后面，还是有一个非洲人发现了人群中的我。刹那间，整个村庄都注意到了我。那两个女人不捣玉米面

了，男人们也不再抽烟了。他们对我指指点点，仿佛看到失散已久的亲人。

我绝望地想要躲在一个参观者的后面，却没有成功。看到非洲人的指指点点，一个游客转过身，发现非洲人是因为什么兴奋之后，用短粗的食指对准我。“快看！”他喊他的女伴。“这儿有一个他们的小孩。”剩下的参观者骚动起来，每个人，非洲人和德国人，都盯着我看。

就在我觉得我要因为被错当成“他们”中的一员而难堪致死时，穆缇抓住我和英格伯格的手，不顾英格伯格的反抗，安静地离开了。

那天晚上，家里就我们两个人的时候，母亲告诉我，在动物园里我没必要感到难堪。我们看到的非洲人，她解释说，只是一些简单却善良的人，他们来自穷乡僻壤，值得被同情，而不是被嘲笑。她怀疑他们是被谁骗得离开自己的家乡，来这里被展出。穆缇让我明白，即便这些非洲人不是被强行带来德国的，动物园把人关在篱笆后面，在动物旁边展出，也是十分错误的做法。“我不理解他们的心态，做这件事的人，还有不觉得这事不对的人。”她说了一遍又一遍。

虽然我们俩都喜欢动物园，但那天晚上，我们一致决定，再也不踏足哈根贝克动物园。这个约定，我遵守了大约十五年，直到二战后，已经长成一个小伙子的我，答应一个年轻姑娘让我带她去哈根贝克的请求。动物园跟我儿时记忆里的差不多，只是，让我惊讶的是，“非洲人村庄”已经不见了。

国王的落魄

我频繁地追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穆缇经常无助地耸耸肩，然后照常回答，“我真的不知道。”她说的是实话。她没有告诉我，她

从法缇玛姑姑那里收到了利比里亚的坏消息。多年后，她才让我看那封信。那封从伯尔尼寄来的信，大概意思就是，我的祖父谋求总统之位失败了，被控盗用公款，我父亲和几个弟弟躲在利比里亚乡下的瓦伊部落里，纳撒叔叔被关在监狱里，罪名是谋杀新任总统巴克莱，颠覆政府。审判时，纳撒否认了谋杀，却承认，他帮助组织了一个青年团体，目的就是推翻美国利比里亚人的政治垄断，代之以土著民组成的政府。

法缇玛姑姑的信用很长的篇幅说，当时的形势让马萨夸依家跌到谷底。因为费尔南多波岛奴隶的指控，利比里亚可能要被剥夺独立性，被国际联盟接管，在此情形下，金总统和杨希副总统于1930年12月3日辞职。就在同一天，国务卿埃德温·巴克莱就宣誓接任总统，完成金总统还没到期的任期。巴克莱立即展开了针对马萨夸依的追杀，他的意图很明显，摧毁自己最厉害的政治对手和曾经亲密的朋友。他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甚至拘禁了我祖父和纳撒叔叔。

法缇玛最后说，这还不是所有的坏消息。事发前，莫莫鲁为了筹集资金把所有资产都抵押了，现在又失去了邮电部长的职位，他已经彻底破产了。失去工作，又失去了政治名望，他已经付不起账单了。

对法缇玛来说，这意味着，她突然要靠莫莫鲁在欧洲的朋友们接济过活了。对我母亲来说，这意味着最后一丝我父亲和祖父至少会给我一点经济支持的希望也破灭了。

人之初

凭着寡妇的养老金，默勒姨母过着舒适的生活，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仅有的一项爱好中——收集及散播八卦。为此，她成立了星期四编织俱乐部，并成了最受欢迎的成员，剩下的六七个都是跟她一

样靠养老金过活的老太太。每个星期四，她们会轮换着给其他人提供咖啡、蛋糕，在一起打毛衣、钩花，最重要的是，交换最新的“消息”。

我很喜欢老太太们每周的聚会，因为它让我的日常生活更加生动。有两个特别的原因，让我格外盼望它们。一个是，我总是能吃到好吃的蛋糕；另一个是，同样重要的，我有机会跟艾丽卡玩了。艾丽卡是个活泼的红头发小女孩，比我小一岁。她的外祖母海瑟利西女士，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平常都是她带艾丽卡的。碰巧的是，艾丽卡的父亲，沃尔特·施密德曼，是我母亲医院里的站点工作人员。站点工们干的都是些粗活，比方说从厨房用两轮推车给医院各个病房送饭。后来我才知道，沃尔特叔叔还是反希特勒社会民主政界的名人。

这个特别的星期四，轮到默勒姨母做东了。跟往常一样，吃完了盘子里的糕点后，老太太们让我们离她们聚会的房间远一点，自己去玩，不能弄出响声。听了她们的话，我们在隔壁的卧室里玩了一会儿小孩子的游戏。后来，我们没事可做了，无聊地待着。突然，最爱恶作剧的艾丽卡说她有一个好主意。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她已经脱下裤子，掀起了她的小裙子，转过身弯下腰，给我来了个女性下半身大特写。四岁的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玩的东西，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很快，看到我对她的即兴“脱衣表演”这么捧场，艾丽卡也跟着尖叫起来。就在这时候——我们笑得最开心的时候——房间门开了，海瑟利西女士走了进来。显然，我们疯狂的笑声惹得她们好奇，她进来查看。

“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最初的惊讶过后，老太太不知所措地问。被外祖母抓到裤子脱掉了，艾丽卡来了个大逆转，开始哭起来。她的眼泪不断从脸上掉下来，还用手指着我。

“是他让我这么做的！汉斯-尤尔根要我脱掉裤子！”她撕心裂肺地喊道。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和小伙伴的指责彻底惊呆了。目瞪口呆的我根本没法开口为自己辩解。

“来吧，看看你怎么说，你这个流氓！”海瑟利西女士气得脸都绿了。

慢慢地，我恢复了镇定。我停顿了一下，在由星期四编织俱乐部匆忙召集并且组成的“军事法庭”面前，用勉强能听到的声音讲述了我的版本，立刻之间，法庭就分裂成了两派。一个以海瑟利西为首，认为我是有罪的。另一个是默勒姨母领头的，认为艾丽卡是一个狡猾而老谋深算的女人，引诱可怜的汉斯-尤尔根堕落。有一会儿，似乎是反对汉斯-尤尔根的那一派占了上风，因为艾丽卡又哭了起来，使得她的证词更为可信。但最后还是默勒姨母胜利了。她让所有人，除了海瑟利西女士之外，都认为艾丽卡的证词是高度可疑的，因为以前她就被抓到说过谎。默勒姨母说服同伴们“撤销案件”。过了一会儿，俱乐部就散会了，等着下一个周四再相聚，只留下一个困惑的四岁小男孩。因为不只一个理由，他对待女性的看法，将再也不会跟以前一样了。

从这个给我留下创伤的小插曲中，我学到的有（1）男孩和女孩的生理构造是有差异的，（2）关于这种差异，因为某些高深的理由，大人会变得非常紧张，（3）女孩可以让小伙伴陷入大麻烦。吃过了亏，我决定尽可能独处，以后也像躲着瘟疫一样躲着女孩们。不过，人们都说男人和老鼠的最好的计划有时候都会出错，后来，我的也不例外。

去缇丽姨母家

唯一一个跟我们共用阁楼地板的人就是一个大个头、白头发的老处女，大伙都叫她缇丽姨母，却不清楚她的年纪。她还是我的小伙伴

艾丽卡的姑祖母。缇丽是当地万宝龙工厂的钢笔抛光员。缇丽的家族以前很富裕，工厂的这栋大楼就曾经是她家的产业。后来艰难的世道迫使她家不得不卖掉这栋楼，他们跟买家达成协议，让她永远免费租住这间小公寓。

因为我们的公寓没有洗手间，所以不得不跟缇丽姨母商量，我们保留一份她家的钥匙，去她家上厕所。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嘱咐我，无论什么时候我不得不“去缇丽姨母家”，我都得尽快并且尽量不显眼，不要打扰我们的邻居。通常，我都会在关厕所门时稍微大声一点，让她知道我走了。我这样做是有原因的。

每一次，我走的时候，她都会从一个棕色大纸袋里给我好吃的，都是她平常攒下来的糖果和饼干。在等她的时候，我会偷偷地看一看她那点着煤油灯的昏暗的房间。沿着墙，堆在每件家具上的，包括床上，是一堆又一堆叠好的棕色纸袋，按大小顺序整齐地摆放，还有一堆又一堆的报纸，有些甚至堆到了天花板。有一次我问她，要这么多纸干什么，她跟我说她还没想好，然后给我一个建议。

“没坏的东西千万别扔。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用得上了。”

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种理念，看起来似乎是古怪老妇人痴迷的怪癖，半个世纪后却会变成备受推崇、利于环保的回收理念的基础。

渐渐地，“去缇丽姨母家”成了我和母亲的暗号，只要我们想去厕所，不管是谁的厕所，哪里的厕所，我们就这么说。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缇丽姨母年纪不小了，有传言说她大约六十五岁，却从未被证实过，但她却热爱远足和游泳。每周，她都独自去她租来的河边小屋过周末，就在易北河北边。她的生活如苦行僧和隐士一般，一大早去工厂上班，黄昏才回来。一旦回到公寓，她就不再出门，直到第二天再去上班。傍晚回来时，她高而瘦削的身影藏在沉重的深绿色披肩和斗篷下，仿佛是一个僧侣。她的后面总是跟着

一群调皮的孩子。他们看准了这个古怪的老太太有一颗善良的心，找她要糖果时，他们从不会失望。她总是随身带着一个大大的棕色纸袋，藏在斗篷下面。虽然她喜欢孩子，但她对大人来说却没什么用处——当然他们对她来说也是——因此，她总是跟他们保持尽可能少的接触。

所有的大人，包括我母亲，都觉得缇丽姨母有点古怪，但在我看来，她却是正常的。不知为何，我觉得她是在以另一种节奏生活，而她的冒险和自由精神也非常吸引我。

除了冬天最冷的日子，每个周末，缇丽姨母都会去易北河里游泳，在她的河边小屋里休息。她会避开所有的公共交通，公寓与小屋之间单程二十多英里的路，她都选择步行。

她对水的热爱差点毁了她。一个星期六的夜晚，她在小屋里睡觉，被呼啸的风声、暴雨声和奇怪的汩汩声吵醒。她朝窗外看去，没有看到以往在水面起伏的船灯，只有漆黑的夜。她的小屋完全被水包围了，里面的水差一点就漫到了她睡的床上。水还在不停地涌进来，她从窗户爬出去，来到小屋的屋顶上。她决定了，绝对不能游到岸边去，因为在无边的黑暗中，她会很容易失去耐力，迷失方向。周围的水一寸一寸地涌上来，她还是整夜紧紧抓牢屋顶，衣服湿透了，她冻得瑟瑟发抖。直到天亮，才有一条渔船发现了她，把她救回岸上。

我记得那个星期日早晨。两个警察开着警车，把不肯去医院的缇丽姨母送到我们家门口。她浑身湿透了，不停地颤抖。把她擦干身子扶上床后，我母亲给她泡了热茶，还让她保证，她会卧床好好休息几天——不过没有用。星期一早，天还没亮，我们就听到她像往常一样离开公寓去上班了。

最后，万宝龙让缇丽姨母退休了，她从社区搬去了一个养老院。因为我们急需大一点的生活空间，穆缇急忙抓住这个机会，租下了她空置的公寓。同时，我们——尤其是我——舍不得这个和善的老太太

离开。她走的时候，把我叫到一边，给了我一点忠告：“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别管别人怎么说。”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但我知道，这是她的经验之谈。

我不知道她那成千上万张报纸和棕色纸袋最后怎么样了，但她把它们打好包离开的时候，她的卧室变成了我的卧室——感谢上帝——它就完全不一样了。

弗赫尔的维克奥夫

有一天，母亲突然问起，我是否有兴趣去儿童夏令营里待几个礼拜。起先，要跟她分离不止一天这件事似乎太吓人了，我接受不了，但当她解释说，那里会有好多跟我差不多大的小孩，而且去那里主要目的就是玩，我改变了主意。

就这样，还不到五岁的我坐火车搭轮船，和几百个小孩一起来到了小小的北海小岛弗赫尔，岛上的小镇维克奥夫还有一个很大的儿童之家。到了以后，我们就被按年纪分组，然后一个教练，一个活泼的红头发年轻女孩，她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把我们分到了各个宿舍。平生第一次，我被要求严格遵守作息时间表，每天早上七点起床，洗冷水澡，整理床铺，八点的时候必须赶到巨大的餐厅等候早餐，然后参加有组织的游戏，比方说，在海滩上建沙堡、捡贝壳、冲浪，踢足球。晚上，我们的教练会给我们读睡前故事，《埃米尔擒贼记》，读上半个小时，然后九点钟准时熄灯。

在儿童之家，最受欢迎的人就是营地队长，一个瘦高的佛里斯兰人（北德的一个族群），大伙儿都叫他塔姆叔叔。我喜欢塔姆叔叔，是因为每次他来找我都会专门给我带棒棒糖。有一天，在得到教练的允许把我“借走”几个小时之后，塔姆叔叔带我去镇上散步。这个小

镇大部分都是独特的稻草屋顶的农舍。后来，我们来到一个屋子前，他告诉我，他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在里面，他介绍我认识他那年迈的父母。他们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惊异，仿佛我是从火星降落的。在这之前，对于塔姆叔叔给我的特别优待，我还觉得极度自豪，因为我以为，在营地所有的孩子里面，他最喜欢我；而现在，挥之不去的疑虑告诉我，这个好叔叔是利用我，给他年迈的父母展示一次“异域风情”，也就是说，这跟当时哈根贝克的“文化表演”如出一辙。

上学第一天

1932年复活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那是德国的传统开学日，也是我上学的第一天。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对它期盼已久，也紧张已久。从“一个小屁孩”转变成一个“学生”，令我有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另一方面，我害怕冒险，害怕走出我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全新的，并且——在我看来——很大可能是包含敌意的世界。

据街区的大男孩们说，学校是一个没有乐趣、没有意义的地方，如果你惹着老师，不管父母还是上帝都帮不了你。听完许多详尽而生动的故事说老师们是多么凶残之后，我已经相信，老师是一种非人类的物种，是以打孩子为生命唯一乐趣的施虐狂。我还惊恐地想起，邻居铁匠家八岁的儿子尤根·布朗屁股上吓人的、红肿的鞭痕。尤根还邀请我们这些男孩聚到一起，给我们证明，不管他的老师出什么招，他都接得住。我当场就拒绝了这种野心。我一点也不想“认识”那种三英尺的竹鞭。尤根跟我们说，那基本上是每个老师的标配，跟黑板和粉笔一样。

和大多数初入学的孩子一样，我很怕老师，但这只是我的问题之

一。我最大的担忧，还是面对几百个陌生孩子，他们肯定会拿种族来嘲笑和讽刺我。但我很小心地把这个担忧埋在心里。为了让我没那么显眼，我母亲让理发师——虽然她心情很沉重——剃掉我茂密的非洲圆蓬式卷发——这种发型后来我保持了几十年，直到在美国的非洲裔美国人中也流行起来。我母亲也非常热爱我这个发型。母亲感觉到了我的焦虑，她努力安慰我，我没什么需要担心的，一旦掌握了窍门，我就会爱上学校。不过，她的话似乎失去了可信度，我察觉到，随着开学日的临近，她也变得焦虑起来。

终于，大日子来到了。由于穆缇没法请假，送我去上学的任务就落到了默勒姨母身上。我梳洗打扮好，穿上崭新的“校服”，背上皮书包，闷闷不乐地跟在默勒姨母身边，穿过马克特大街，来到胡弗勒大街，经过稻草屋顶的农舍——巴姆贝克曾是农村的唯一见证，步行两个街区从家里来到学校。我不想让别的孩子认为我是个妈宝，不肯牵住老太太的手，除非是过马路时她坚持让我牵住。

为了让我高兴些，她给我讲了老早老早之前她第一天上学的“美好时光”，却是徒劳无功。虽然我十分努力地尝试，我还是没办法把眼前这个白发苍苍、年老体迈的默勒阿姨跟她故事中那个刚上学的小女孩联系在一块。越是接近学校，我越难受。即便看到有些小伙伴跟我一样痛苦，我也没好受一些。跟当时所有德国第一天入学的学生一样，我拿着一个传统的复活节袋子，一个色彩鲜艳的跟我差不多高的纸筒，里面被好心的邻居和朋友们塞满了巧克力复活节兔子、杏仁糖蛋，还有别的糖果礼物。这是穆缇能找到的最大的复活节袋子，然而，即便是想到放学后我可以大吃特吃一顿，我的阴郁也没有减少半分。转过一个街角，我们就站在了凯特勒坎普学校的前面，这是我除了公寓之外的另一个家。跟当时汉堡所有公立学校一样，它是以它所在的大街命名的，由两栋相同的大楼组成，一栋是给男孩的，一栋是给女孩的。当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它那厚重的墙壁时，这座古老的、

堡垒一般的四层建筑呈现出一种特别险恶的气氛。我突然意识到，接下来的这几年，我大部分清醒的时间都将在这栋险恶、阴郁的大楼度过。顿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明显的恐惧。

至少还有一个新同学跟我有着类似的想法。他拼命地喊，他不要走进学校，不管他母亲还是别人说什么。我十分了解他的感受，但我决定不像他那样当众吵闹，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关注。趁着他转移了大伙儿的注意力，我把我的复活节袋子给了默勒姨母，快速踏上学校宽阔的台阶，头也不回地走进了洞穴一样的大楼。一走进去，我和新入学的伙伴们就被人领着，走过一条仿佛无穷无尽的走廊，来到一楼的一间教室。我本来以为会有一位严厉的、挥舞着竹鞭的男老师，谁料，欢迎我们的却是一位漂亮丰满的短发女士。跟我在大厅里看到的其他老师一样，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工作服。

“早上好，男孩子们！我是贝勒小姐，你们的老师。”她带着友善的微笑介绍自己说，“我想让你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些长凳上找个座位坐下来。”我在后排选了个座位，小心翼翼地偷瞅了一眼其他男孩，看他们是否表示出对我的特别兴趣。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看到了史都肯大街的几个小伙伴。有住在我家拐角处巷子里的卡尔·莫雷尔，还有住在街尾的卡尔-海恩兹·哈耶。至于其他男孩，他们似乎都太害怕新环境了，根本顾不上取笑我或者任何人。

“记住你们是8A班。”贝勒小姐继续说，“从现在开始，你们不能说话，不能站起来，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能离开座位或者教室。如果你有问题，或者需要去上厕所，厕所就在走廊尽头右拐，你就举手，等着我叫你。大家都懂了吗？”

“现在，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该来的人都来了。”她说，“听到我叫你的名字，你就举起右手，站起来，让我看见你，然后说‘到！’。”说着，她开始点名。点到我的时候，我说了“到”，然后站起来，有些孩子看着我，开始吃吃地笑。

“刚才笑的这些孩子非常无知。实际上，他们太无知了，不配在我的班上。”贝勒小姐批评道，“下次再有人嘲笑汉斯-尤尔根或者是任何人，他就得离开教室，站在走廊里等，直到下课。”接着，她转过身对着我说，“我希望你不会因为这些愚蠢的小孩而难过，你是一个好孩子，别因为任何人另作他想。”

她这样惩罚他们，我真想拥抱她，但当然，我没有这样做，只是用刚刚能听到的声音回答了“好”。

下课铃声响了，贝勒小姐让我们排成两队，安静地离开教室，走过大厅，来到操场上休息。一堂课下来，尽管有刚刚那个“小插曲”，但我开始觉得，我对学校的焦虑开始消散了。如果仅仅是这样，我想，那么学校跟我肯定能相处得很好。然而，我刚到操场上，一个大块头、沙性发质、粗鄙丑陋、几乎比我高一头的男孩，看了我一眼就大喊，“黑人，黑人，扫烟囱的人！”

很快，其他孩子也开始喊，短短几秒钟，我就成了整个学校的中心。一时之间，几百个男孩齐声大喊“黑人，黑人，扫烟囱的人！”，直到整个校园在我耳边回响着这一首震耳欲聋的儿歌。

绝望的我，开始四处找地方躲避，却找不到。在这样无望的处境里，我的第一反应居然只有哭泣。但我的绝望与羞耻之情，却很快转变成了对牵头的那个小丑孩的憎恨。他走上前来，把手放在我头上，嘲讽地扯着我的头发。“黑人们的头上为什么长羊毛，不长头发啊？”他问我，人群都被他逗乐了。在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反应之前，我的右脚已经向后拉了个大弧形，并且用我所能聚集的全部肌肉力量踢向欺负我的人的裸露小腿。我的硬皮靴子对他的冲击是听得到的，显然，他痛得很厉害。

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他倒了下去。我还是因为愤怒而颤抖，不过，脚下功夫给我壮了壮胆。我看着人群，看还有没有人敢跟他一样欺负我，随时准备再次战斗。不过，让我惊讶并且有点失望的是，没

有人再上前了。相反，几秒钟前还在嘲笑我的男孩们现在又把奚落和讥讽投向被我打败了的、还痛苦地在地上哀嚎的恶霸。

突然，笑声停住了，原来是贝勒小姐来了。她打量了一下当时的局面，转向欺负我的男孩。他还抱着他严重瘀伤和肿胀的胫骨。“你怎么了？”她问。

“他踢我。”他指着我大喊。

“你觉得他为什么要踢你？”贝勒小姐问。

“我不知道。”

“你叫什么名字？”

“格哈德·哈德梅尔。”

“你的老师是谁？”

“霍德瓦尔德小姐。”

然后她转向我。“汉斯-尤尔根，你真的踢了他吗？”

“是的。”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踢他吗？”

“因为他扯我的头发，嘲笑我，还骂我。”

“你扯了他的头发，骂了他吗？”贝勒小姐继续审问。

“是的，但我没有打他或者别的。”我的对手在压力不断增大的审问下终于承认。

“那你就是活该了。”贝勒小姐严厉地裁决说，“你没有权利骂别人，也没有权利嘲笑别人的长相。以后，你要是再来烦汉斯-尤尔根，我就会告诉你的老师霍德瓦尔德小姐，让她来惩罚你，另外，还要跟你的父母谈话。现在，赶紧跑开，再也别让我抓住你去惹别人了！”

我的对手身体上受到重创，精神上又挨了批评，只得一瘸一拐地走开了。贝勒小姐告诫我，再也不可以用自己的拳头——或脚——来为自己伸张正义，如果被同学欺负了，要向她或者离得最近的老师汇

报。我从未想过，也不愿意这样处理，但当时那股快速升腾而起、暴躁的脾气迫使我立即反击。除此之外，我发现，我出其不意的一脚，迅速为我占据了操场上的有利地位，让我在几乎注定的败局中取得了胜利。

贝勒老师环顾操场，发现一切都归于正常，她冲一个高大的英俊少年招手。他的个头和金色头发让他在其他男孩中非常显眼。“过来一下，沃夫冈。”贝勒老师说道。

男孩站到她面前后，她给我们做了介绍。“这是汉斯-尤尔根，他刚入学，这是沃夫冈·纽曼，七年前的今天他也是刚刚入学，也是在我的班上。我之所以叫你，沃夫冈，”她继续说，“是因为汉斯-尤尔根需要有人在这里照顾他。你愿意做他的保镖吗？”

沃夫冈说他非常乐意。

“好的，那么，我们就这样，”贝勒小姐解释说，“每次课间休息，你都留意一下汉斯-尤尔根，确保没人招惹他。如果有你处理不了的局面，你就跟值班的老师汇报，或者直接来找我。”

“您什么也不用担心，贝勒小姐。没人会来招惹他。我保证。”

“我就知道我能依靠你，沃夫冈。”贝勒小姐说，“还有你，汉斯-尤尔根。”她继续说道，“只要在课间遇到了麻烦，就像今天这种事，一定要让沃夫冈知道。对于今天发生的一切，我非常遗憾。世界上无知的人实在太多了——太多了。”她不停地重复着，更多的像是在自言自语。

跟我的新勇士和保镖沃夫冈握过手后，学校的铃声又响了，课间休息结束，我们该回教室了。我走进教室，同学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有那么一刹那，我担心他们还会骂我。令我惊讶和放松的是，全班同学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还夹杂着夸赞，因为我打败了欺负我的人。直到贝勒小姐走进教室，喧闹才停了下来。她没问原因，不过我觉得，她非常清楚刚刚发生了什么。

几天过去了，似乎大伙儿都忘了我入学那天的难堪场面——每个人，除了那个恶霸和我。偶尔，我还会在操场或走廊里看到他，他会羞怯地看着我，或者干脆把脸别过去。吃了苦头，学到了教训，他再也不敢靠近我的靴子所能及的范围。沃夫冈信守承诺，一直关照我，直到转年春天他毕业离开。在那之后，我多少得靠自己了。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变得很坚强，不再需要保镖了。

跟我之前的期望截然不同，我变得喜欢——不，热爱——学校，显然，学校也喜欢我。我跟同学们相处得很好，好几个都成了我的好朋友。我还喜欢我的老师们，尤其是贝勒小姐，她帮助我发现了学习中许许多多的乐趣。同时，我还很感激新获得的知识 and 技能带给我的尊重和地位。我发现，在学校表现出众和被尊重、接纳之间，是存在很强的关联的。并且，因为学习对我来说很简单，我坚信自己是有天赋的。贝勒小姐似乎也有着同样的看法，她给我的第一学年评语里是这样说的：

“汉斯-尤尔根是一个出色的学生，他很好地适应了学校生活。在阅读、写作、画画、音乐和体育方面，他都有不同寻常的天赋。在算术方面，他成绩一般，但他很努力地在手指头的帮助下找出正确答案。他是天生的领导者，总是愿意帮助进度落后的同学。因为入学初期遭遇的一些奚落，他需要保护自己，因此变得有一点点急躁。鉴于他第一学年的表现，我希望他能做得更好。汉斯-尤尔根会升入7A班（二年级），我很期待他能再次进入我的班。”

穆缇在她的朋友和熟人还有愿意听的每个人面前一遍一遍地读我的第一学年成绩报告，我已经可以背诵贝勒小姐的评语了。

在万字旗下

我们的新邻居

1933年1月30日，在我升入二年级的三个月之前，阿道夫·希特勒成了德国的元首。这一事件在曾经是共产党大本营的巴姆贝克没有激起一丝涟漪，虽然最后它将给整个世界带来致命的影响。

我早就多次听过希特勒、纳粹和NSDAP（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这些词，但起初它们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不过这一点很快就改变了。就在我们这些孩子根本不知道政党是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根据在家里、街道和学校里的所见所闻，像选喜欢的足球队一样，选择我们最喜欢的政党。在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的时候，那个留着卓别林式胡子的不讨人喜欢的人就不再是我们可以取笑的对象了。刚刚七岁的我，跟所有人一样，成了纳粹党的坚定支持者，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制服最好看，军乐队最好听，队列最整齐，因为这一切都符合我刚刚萌芽的男子汉气概。相比之下，共产党人，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在我看来，在示威时却经常是衣衫褴褛，毫无纪律性。他们选择呈现一种夸张的无产阶级形象，而不是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这样一来，当我拿到绣有纳粹万字标记的徽章时，我让默勒姨妈——她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把它缝到我的一件毛衣上，直到母亲发现了，不顾我的激烈反对，把它拆了下去。

公寓窗口飘扬的万字旗越来越多；在新的纳粹政府宣布其他所有党派不合法之后，共产党的锤子镰刀旗和社会民主党的三铁箭旗突然消失不见了，除此之外，史都肯大街上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标记能够说明，一个重大的变化已经发生了。

在学校里，受人尊崇的国父形象和权威的象征曾经一直是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这位年迈的将军在全盛时期，也就是一战期间，在坦能堡战役中粉碎了俄国军队。当他在1934年去世后，学校先是在正式问候的时候加入“希特勒万岁”，并且把大楼里所有兴登堡的画像换成希特勒的。从每间教室的墙上、走廊上到办公室里，希特勒那刺眼的蓝色眼睛似乎一直在盯着我们这些孩子，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就好像在对我们催眠一样。在我们意识到之前，元首的面孔对我们来说就熟悉到跟新学年继续教我们的贝勒小姐一样。比希特勒的画像更具入侵性的，是他那超级粗哑的声音——声域、持久度和灵活度都令人惊叹。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元首想对德国人民讲话，所有事情必须停下，这一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我们整所学校，如同德国的其他所有学校一样，都必须在礼堂集合，完整地聆听他在广播里的演讲。希特勒的大多数演讲都超过一个小时。虽然演讲这么冗长，内容又完全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能力，我们却从未对他的声音感到无聊或厌倦。这一分钟，他的嗓音还是低沉、有节制、令人安心的男中音，正如他在掌权期间平静地谈到他所经历的磨难一样。下一分钟，他的嗓音将爆发成一种高亢、愤怒的狂潮，尤其是当他猛烈抨击他认为是他的——因而是整个德国的——敌人的群体和个人时。犹太人、非雅利安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反动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是他最频繁的攻击对象。虽然我们这些孩子还太过年幼，无法理解这些话语，但我们还是感受到了演讲人散发出来的力量。我们为这位新兴的、全能的国父感到骄傲与自豪，因为他的形象是如此的勇敢，对德国的敌人毫不畏惧。

把汉堡庄严的市政厅广场改称为“阿道夫·希特勒广场”，是需要一些时间的。不过，几个月后，我们也做到了。很快，一边举起右手，一边大喊“希特勒万岁！”，比起曾经简单的问候“日安”，也不像最开始时那样奇怪了。而养成习惯无论坐站都挺直身体并拢脚后跟，也似乎是很正常的了。像士兵一样，我们穿带钉子的靴子，在鞋跟上钉上马蹄铁，让学校和街道回响着我们的脚步声。我们也习惯了每周一早晨上课前的仪式，虽然起初我们觉得它很奇怪。我们全神贯注地立正，高举右臂，希特勒青年团的“荣誉护卫”就会升起两面新国旗——魏玛共和国时期传统的黑白红旗和纳粹的万字旗。接着我们会唱德国的两首国歌，《德国高于一切》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后者以其曲作者命名。他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冲锋队队员，1930年在柏林的街头冲突中被共产党枪杀。我们被教导把他当作纳粹的头号明星殉道者来崇拜。而二号明星殉道者则是阿尔伯特·里奥·施拉杰特，一战后法国占领的鲁尔城一名志愿军军官，1923年被法国人以破坏罪和间谍罪处死。

为了弘扬汉堡的海军传统，激发我们对德国海军的兴趣，我们整个学校都被送到汉堡港，参观新建的学校大船戈尔希·福克号，一艘用于训练海军学员的三桅帆船。这艘船的名字是为了纪念著名的北德民族诗人和船员故事作家戈尔希·福克。一战期间，在斯卡格拉克海峡，他在对抗英国人的著名战役中丧生。参观之后，一位老师，退伍的海军老兵，给我们演讲了一个小时，说光明的未来正等着我们这些从小就立志当海军的德国男孩。我想知道，三十五岁就被杀的戈尔希·福克是否会同意这一观点，不过，我知道我不该说出自己的想法。

等到希特勒牢固地统治了整个国家，汉堡就再也没有无聊的时光。每个星期都有重大事件和刺激。没人比我们这些学生更兴奋了，尤其是在老师们把我们年轻的热情变成狂野的激动之后。而让我们狂

热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党卫军、冲锋队和希特勒青年团无穷无尽的游行队伍穿越整个城市，老普鲁士的传统尚武队伍，纳粹运动的新战列，戏剧性的夜间火炬游行，还有阿尔斯特上空的烟火表演。城市公园、摩尔维德大街和达姆图火车站前的大广场有许多群众集会，还有许多权贵办的演讲，争相阿谀奉承他们奉为神明的元首。

然而，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让我意识到任何特别的人身威胁——直到有一天，一场荒诞的闹剧差点席卷了我。那是1934年初，那时我上三年级。那天，八岁的我第一次知晓了纳粹政权可能带给我的危险。

命运的奇异转折就发生在当地新近成立的纳粹团体把他们每周集会的地点选在了赞罗雷缇酒馆和会议厅，直接挨着我们住的公寓楼。几个月来，我们的新邻居们和我都没有留意彼此的存在，因为纳粹都是在深夜定期集会，而那时候我早已入睡。接着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那是一个美好的春季周日夜晚，我们的社区里突然开始一场大型的准军事游行。两个多小时的时间里，一列又一列穿褐色衬衫的冲锋队和穿黑色制服的党卫军昂首阔步地穿过社区。这种场面，虽然对当时的我来说没什么特殊意义，但它其实是希特勒臭名昭著的虚假公投的一种，也就是说德国人表面上被允许可以选择接受或者拒绝纳粹的法案，在投票时可以投“赞成”或“不赞成”，实际上一切早都被暗地操控，只为纳粹服务，加强他们对德国的控制。

这样红黑相间的队伍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他们排队站在马克特大街和通常安静的史都肯大街交汇处。跟其他孩子一样，我也去看游行了，跟所有人一样，我也变得兴奋无比。看到沃夫冈，我曾经的保镖，站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队首时，我尤其激动。当他在人群中发现了，冲我挥手微笑时，我差点骄傲地喊出声。我一直看到游行队伍的最后一个方列走过，人群开始散去。

走回家的时候，我听到隔壁楼里传来的响亮歌声和喊声。我的好

奇心一下就起来了。我努力地从赞罗雷缇会议厅的大门望去，里面是一群褐衫队队员畅饮啤酒、抽烟、高声喊叫、大笑、唱歌，庆祝他们伪造而来的选举胜利。他们向来痴迷于种族的纯洁性，而我就是他们活生生厌恶的对象。我偷看的时候，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或者这只是我的想法。突然，我觉得自己被两只巨大的手掌从后面抓住，举到了半空中。出于本能，我迅速地挣扎，弯下身子，就像是被钓上钩的鱼。然后，我挣脱了那两只手，拼命地跑开，逃离了那个人。回头看的时候，我头一次瞥见攻击我的人，一个大块头冲锋队队员，浅金色的短平头，阴险的小眼睛深嵌在一张仿佛被啤酒浸泡的红脸上。要不是另外两个冲锋队队员被他的喊声提醒，拦住了我的去路，我是可以逃脱的。大块头像老鹰一样扑向我这个倒霉的猎物，这一次，无论我怎么踢、咬、扭动身子，都无法逃脱他的魔掌了。

他得意洋洋地拖着我穿过一群醉鬼，朝着会议室尽头的演讲台走去。恐惧、粗暴的男声和啤酒及烟草的恶臭让我恶心。我使尽了吃奶的力气，才抑制住自己恐慌大喊的冲动，不知为何我感觉到，这样做只会招来更多的虐待——当然不可能是帮助。幸运的是，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中间发生的这场闹剧，大部分是因为喧闹还有他们已经酩酊大醉。就在大块头刚要把我推上演讲台，显然是当做“种族污秽”的展出品时，他发现自己面前站着一位愤怒的女人，用满是憎恨的眼神盯着他。

穆缇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周日上午，远离医院的喧嚣，她终于放松了一会儿。不像我，她对社区里的选举活动从不留意，除了时不时从窗户看看下面人群中的我。褐衫队的游行持续了几个小时，她越来越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焦虑时，她开始找我。还没走到楼梯口，她就碰见了默勒姨母。默勒姨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她刚刚看到一个冲锋队队员把我拖进了隔壁的啤酒馆。不等她说完，穆缇就冲了下去，就像一头想要保护狮崽的雌狮一般。她穿越大街上

的人群，冲进啤酒馆。然后，就好像有一种无法阻止的力量推动着她，她在醉醺醺的人群中扒开一条路，来到演讲台和抓住我的大块头面前。大块头被眼前这个颤栗着却显然无所畏惧的女人吓了一跳，他松开了手。就在他、我还有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又被拽着穿过醉醺醺的人群，不过这一次是被我的母亲，她把我安全地带回了家。

虽然这次经历在我心头萦绕了好几个月，或许是好几年，但当时，我还是不情愿把这些声音刺耳、醉醺醺的冲锋队队员和越来越频繁在我们面前以德国救世主形象亮相的那个人联系在一起，那个人，可是我们老师口中的，会重新确立德国在世界主宰地位的人。对我来说，对我的所有同龄人来说，希特勒已经戴上了近乎神明的光环，让他免于被批评或责难。因此，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一个八岁男孩在一个纳粹恶霸手中经历的暴行只不过是残暴的种族主义政策的温和表达，而这政策的始作俑者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我被教导要去崇拜的人。

不过，从那个星期天开始，我对希特勒和纳粹毫无保留的倾慕变成了一种奇怪的感觉，混杂了恐惧与痴迷。我开始意识到，褐衫队、万字旗和军乐都是危险的征兆。即便如此，我还是花了许多年，在纳粹的种族主义下受尽了羞辱，才清楚地看到希特勒的邪恶，还有他犯下的滔天罪行。

失去的乐园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啤酒馆事件并不是某些喝多了的纳粹分子挑起的独立事件，而是我已经成了一个由政府主导的阴谋的对象。几个星期后，我在一个地方又体验到了这种感觉——离我家

几个街区远的一个小区操场。跟以前许多次一样，我放学后又去了那个操场，准备玩上一个下午。我最喜欢玩的就是跷跷板，大伙儿都一样，这就意味着总得排长队。耐心地等到轮到我时，我和一个男孩正准备坐上跷跷板。一个女人带着她的儿子突然挡住了我。“你想去哪儿呢？”她问，声音里全是挑衅。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问我这么明显的问题，只能无助地指着跷跷板，她的儿子已经坐上了本该属于我的位置。

“轮到我了。”我反抗说。

“你说‘轮到我了’是什么意思？”她尖叫着说。“你们这些人已经轮过了！现在该轮到我們了。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个操场上。你不认字吗？”她一边说，一边指着操场入口处那个我从不曾留意的喷漆标识。

几个母亲看到了这个女人的爆发，虽然她们看上去很同情我，却没有人为我说话。

我觉得很难堪很崩溃，只能走开。离开操场的时候，我强忍着眼里的泪水，研究了一下这个标识。那个标识说：

非雅利安人禁止入内

虽然我以前听过“非雅利安人”这个说法，但我从不觉得它跟我有任何关系。不过，如果那个女人是对的，那么“非雅利安人”指的就是我。我还是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跟我爆发，我也无法完全理解，为什么我被禁止去一个我曾经去过无数次、度过无数欢乐时光的地方，一个我认为像属于其他孩子一样也属于我的地方。

那天晚上，母亲下班回家后，我尖锐地问她，“我是个非雅利安人吗？”

穆缇被吓了一跳，她问我为什么要这么问。我告诉了她操场上发生的事，她承认非洲人属于纳粹政府划分的非雅利安人族群。

“因为你的父亲是非洲人，你是他的儿子，”她解释说，“所以你也划成了非雅利安人。”

“那你也是非雅利安人吗？”我追问。

“不，我不是。”

“为什么不是？”

“因为我不是非洲人，我是欧洲人。”

“那为什么我是非雅利安人，就因为我是父亲的儿子？为什么我不能是雅利安人，我也是你的儿子？”我试图跟她讲道理。“而且，为什么，”我接着问，“非雅利安人就不准在操场上玩？”

“我同意，那毫无道理，”穆缇承认说，“明天，我会跟公园守门人说的。我敢肯定，他会破例让你进去玩的。”

“我不想让你跟守门人说。”我对她说，“我再也不想去那个公园玩了。”

没有理会我的反对，母亲还是跟守门人说了，他跟她说，让我别管那个标识了。不过，不管穆缇怎么说，我都没有打破自己的誓言再次踏入那个公园。

家庭争端

虽然我努力不让公园里那件事毁掉我的生活，但我还是发现很难忘记发生的一切和它带给我的影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默勒姨母的两个已经成年的儿子，每次来看望她时，就要展开一场关于政治的激烈讨论。奥托虽然没有加入纳粹党，却是纳粹的支持者，而弟弟弗里茨，却是一名公开身份的共产党人。弗里茨说纳粹什么也不是，只是

一帮恶棍，很快就会遭报应的。“我曾经很尊敬你，因为我觉得你很聪明，”弗里茨说，“不过再也不会了。你怎么能这么愚蠢，让这些骗子蒙住你的眼睛？”

“我应该去举报你，让他们把你带走，你居然说这样不负责任的话。”奥托喊了回去。

以往这种时候，默勒姨母会让他们打住，尤其是在我面前，或者干脆走开，因为她已经厌倦了听这些关于纳粹啊共产党啊的事。出于对母亲的尊重，他们会住嘴，然后下次来的时候再吵一次。

让弗里茨气恼的是，他们的大哥威利，一战时期在美国居住时就产生了严重的反共偏见。由于对德国政党所知甚少，他越来越能接受奥托的观点了。而令奥托欣喜若狂的是，在汉堡—美国航线当乘务长的威利，宣布他已经加入了冲锋队海军分队——为海军陆战队成员量身定制的风暴骑兵队的一个分支。我很喜欢他，他甚至还让我陪他去买制服：一件褐色的衬衫，海军蓝的马裤，还有配套的有帽舌的帽子，一条褐色的皮带和肩章，还有一双褐色的马靴。

威利加入冲锋队海军分队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一次马拉松拉练。冲锋队、党卫军、纳粹党和希特勒青年团的不同分支都会进行负重拉练，证明各自的耐力。威利是个六英尺高的大块头，入伍前的那个早晨，他穿着新制服来到母亲家中时，看上去格外英俊。显然，他对自己的这一身装束十分满意。尽管平常也是衣冠楚楚，但此时更是昂首挺胸。我陪着这位装扮高贵的战士走到街角，他拦了一辆车去往市中心，当时我本可以非常骄傲的。我只希望我的小伙伴能看到我们，但事实是他们根本没在附近。威利离开时，告诉了我一个大概时间，说他所在的分队会经过马克特大街，这样我就有机会看到他和他的新纳粹同伴们。

几乎整个下午，我都在看一个又一个汗流浹背的方队走过。当第一个穿着海军军装的分队出现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找威利叔叔。但

不管我怎么找，都没有看到威利叔叔。后来，最后一个方队也走过去了，我只能放弃，准备回家告诉默勒姨妈说威利叔叔不见了。我正要上楼找我母亲，我的英雄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他不再是早上那个骄傲的战士，而是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每走一步都痛苦地呻吟。让他更难堪的是，这时候弗里茨也来了，看到了他这副完全不英勇的样子，正好质问他为什么要听信奥托的怂恿，把自己弄得跟个傻子似的。

威利说，游行开始后还不到半个小时，他的麻烦就来了。那双崭新的靴子，之前他一次都没穿过。他的两只脚就好像被铁爪抓住了似的，每走一步就夹得更紧。等到再也忍受不了的时候，他说，他只能走出方队，而他的战友们全都起哄大笑起来。他说这个比脚疼更让他难受。

弗里茨努力地帮大哥脱靴子，他想要用那种经过时间检验的老办法，跨坐在一只靴子上，让威利使劲往后挣，但靴子却纹丝不动。每动一下，威利就痛苦地抽搐。他疼得再也受不了，让弗里茨把他们母亲的大剪刀拿来，把靴子剪开。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舍得毁掉一双全新的靴子，直到我看到威利的脚，它们已经血肉模糊，全是水泡。

过了几周，威利终于又可以穿普通的鞋子，走起路来也不疼了。但是这痛苦的经历，还有被冲锋队的同伴们嘲笑痛苦，已经足以让他把纳粹排除在生活之外了。他再也没有去参加过冲锋队的集会，并且发誓永远远离政治。对此，奥托很懊恼，弗里茨却很高兴。

星期天的电影时光

星期天，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最喜欢的消遣之一就是去看下午一点的儿童剧场，就在转角处的艺术剧院“欧洲宫殿”。门票价格是

三十芬尼。用穆缇的话来说，钱不是从树上长出来的，她想让我改成一个月去一次。但她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因为她根本抵挡不了我的乞求，尤其是我说我所有朋友都会去为什么我不能去的时候。

有一位影星，是连穆缇都无法抵挡的。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秀兰·邓波儿的电影，我老早就知道自己能去看，因为穆缇不光同意我去，她自己也坚持要去。这位头发卷卷脸蛋鼓鼓的美国女星参演的电影，比其他任何影星（无论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的观众都要多，电影票也总是被抢购一空。事实上，所有德国人都为之疯狂，我也不例外。由于所有美国电影都会有德语配音，所以我根本不知道秀兰不是德国人。不管是在《亮眼睛》里饰演勇敢的小孤儿，唱红了《好船棒棒糖号》这首歌，还是在内战叙事片《小叛逆》里扮演比尔·罗宾森的踢踏舞舞伴，只要秀兰笑，我就笑，秀兰哭，我就跟着哭。那个时候，如果有人跟我说，有一天我不仅可以见到我童年时期的小偶像，跟她说话，还可以跟她跳舞，我会说这个人精神有问题。不过，这的确发生过。1975年，我被《Ebony》杂志派往加纳的阿克拉，去采访美国驻加纳大使。这位大使，正是秀兰·邓波·布莱克（她的夫姓）女士，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任命的人选。在访谈中，我童年时代的偶像对我讲述了，她还是个孩子时，在知晓跟她合拍电影的、她十分喜爱的黑人影星比尔·罗宾森因为严苛的吉姆·克劳法^①不能跟她住在同一家佛罗里达酒店时，她是多么震惊。那天晚上，在大使馆加纳风格的盛大宴会上，这位昔日的童星邀请我跳舞。我是多么希望，我在史都肯大街的那些小伙伴，那些跟我一起在欧洲宫殿排队看秀兰·邓波儿电影的人，可以看到那天晚上的我。

① 吉姆·克劳法泛指1876年至1965年间美国南部各州以及边境各州对有色人种（主要针对非洲裔美国人，但同时也包含其他族群）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的法律。

跟主角们同样引人入胜的还有每周的新闻纪录片。观众们会满怀期待地安静下来，聆听播音员缓慢的、福克斯公司标志性的开场白，“我们将用影像和声音，为您带来世界各地最有趣最新鲜的新闻。”正是通过这些纪录片，我对美国，这片传说中的“拥有无限可能的土地”有了最初的印象，即便这印象是有倾向性的。为了名副其实，这些片子通常都是以一些搞笑、荒谬乃至疯狂的事件为主题，例如给美国小姐加冕，或者杂技演员在没有安全网的保护下在两栋摩天大楼之间走高空绳索，不怕死的人从尼亚加拉瀑布上跳进一个铁桶里，或者是在一根旗杆上创下忍耐力纪录。这些关注奇闻壮举的美国纪录片让我对美国的最初印象就是，这个国家大部分人都是怪物，除了感官享受之外，什么都不追求。而偶尔见到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则只会加深这种印象。我觉得，罗斯福那突出的下巴、洋洋得意的烟嘴和影星般灿烂的笑容，更是“天塌下来当被盖”的美国精神的化身。只有间或一些严重事件的报道让我知道，美国不是只有玩乐。新闻里说到了国际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两岁的儿子在1932年被绑架并杀害的事情，同样耸人听闻的还有那场审判，四年后，凶手德国移民布鲁诺·霍普曼被行刑。

就算我在欧洲宫殿被灌输的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与真实世界截然不同，我还是非常珍惜那些星期日的午后时光。在那被施了魔法一般的两个小时内，我可以把史都肯大街和巴姆贝克大街扔在脑后，进入一个魔幻世界，那里有恶棍与英雄、黑帮与警察、牛仔与印第安人、骑士与恶霸，在那里，时间与空间像人类的想象力一样无边无界。

犹太人

希特勒当权后，“犹太人”这个词很快就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

耳边。据我所知，我以前从未见过犹太人，但有时候我会听到母亲语气严肃地说起犹太人。有一次，我听到她跟朋友在谈论，医院一个医生被解雇，因为他是个犹太人。“真可惜，”我母亲说，“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好医生。”因此，我有了“犹太人是好人，由于某些费解的原因，正遭受迫害，值得我同情”这样的念头。但这个观点很快就改变了，因为我那容易被影响的心灵开始越来越多地吸收意识形态的“毒药”，约瑟夫·戈培尔博士领导的公共教化和宣传部通过我们的老师把这些“毒药”灌输给我们。为了确保我们这些孩子能够收到正确的信息，纳粹分子们下令开除所有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教师，说他们不适合教课。这些老师里面，有的是有犹太背景，有的曾经积极活动于纳粹对立政党例如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还有一些公开拒绝加入纳粹党。第一批受害者中，就有我们善良的班主任贝勒小姐。在我二年级期末的时候，我们只被简单告知，她已经被调到别的学校，代替她的是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我没有机会知道她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她是否真的被允许继续教课。我非常想念她，因为她是第一个鼓励我尽力挖掘自己潜能的老师。

尽管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平白无故地不见了几名老师，我们也察觉到了周围的异样。留下来的老师们都争相证明自己对于希特勒的忠心，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没有一天，老师们不贬损犹太人。因为——据我所知——我们班上没有犹太同学，没有机会跟他们交上朋友，所以我们很容易就相信了这些粗鄙低级的宣传。“要不是因为犹太人，”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坚称，“德国肯定很轻易就能在一战中赢得胜利。”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是一个瘦高个，留波浪卷黑发，戴黑边眼镜，给我们解释了“背后捅刀子”这个说法，说广大德国人民都认为，这才是德国在一战中溃败的真正原因。在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讲述的版本中，犹太人在德国人民中散布谣言，说德国军队总是打败仗，让人们相信再打下去也是徒劳。这样

一来，没有了人民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眼看快要胜利的德国军队只能失败了——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而是被奸诈的犹太人在自己的地盘上“背后捅刀子”。

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喜欢给我们读《冲锋者》、《人民评论》和《进攻》这三家纳粹党报纸上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是以犹太人为诱饵的。典型的纳粹“新闻”通常说的是，过圣诞节的时候，吝啬鬼一样的犹太地主会把一家善良的德国人赶出门，因为这家的父亲生病拖欠了房租。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给我们读的这些报道，慢慢地让我们这些孩子从原本单纯的心灵深处就开始厌恶犹太人。然而，比这更糟糕的还在后面。有一天，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宣布，我们马上要看一场重要的电影。他向我们保证，这场电影会比他更能说明犹太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这个短片把犹太人描绘成惯于欺骗、狡诈、身心都肮脏的动物。

它是所谓的“纪录片”《永恒的犹太人》的温和版本——《永恒的犹太人》几年后才上映，被评为有史以来最邪恶的反犹太宣传片。镜头里的犹太人，挤在一个拥挤不堪的贫民窟里，为了各种不名誉的事情偷摸四处奔走。接下来，镜头转换到一群令人呕吐的老鼠，像犹太人一样，偷偷摸摸地乱窜。为了确保观众能领悟到它的意思，还专门有旁白解释说，犹太人，就像这些老鼠一样，是有害的寄生物，传播疾病，因此要被社会驱逐，如果社会想要获得健康的话，就要驱逐他们。

这两部电影都给我们这些孩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部电影播完的几个星期之后，只要想到要跟犹太人有肢体接触时，我们都会厌恶地颤抖。此时，犹太人在我们眼中，已经是肉体令人厌恶、道德败坏、懦弱、露骨的无耻、智力上平庸却极其狡猾，因而极其危险的动物。我们被教导着认为，犹太人的终极目标就是，彻底摧毁德国人的高贵人种和他们的高贵文化，他们会千方百计达成目标，不管是要

手段还是使用暴力，或者，如果这些都不管用的话，他们会制造混血儿，用自己低等的血玷污高贵的雅利安血统。

“为什么警察不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里？”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讲完后，我的一个同学问道。

“耐心点，我的孩子。”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安慰这个愤怒的小男孩说，“我敢肯定，时间到了，元首会有办法的。”

希特勒对家庭的“突袭”

通常，母亲下班回家后都很愉快，准备跟我度过美好的夜晚。但是有一天晚上，她没有用她一贯的笑容迎接我，而是强忍着眼泪。当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她脱口而出一个毁灭性的消息：她被开除了。

那时的我还不能完全理解她被开除对我们的经济状况会有什么影响，我只是不能想象她不再是医院一分子的样子。一直以来，医院不仅是母亲职业生活的中心，也是她，不，是我们的社交生活的中心。她所有好朋友都是医院的同事，他们的孩子也是我的玩伴和朋友，我们大多数活动都是跟他们一起。

为了照顾我的感受，母亲很小心地不让我知道，她被开除和我有关。她含糊不清地说是因为医院裁员。实际上，她丢掉工作，是因为纳粹的一条新政策。这条政策是把犹太人和其他“政治上不可靠分子”驱逐出政府系统。直到多年之后，穆缇才跟我说起她被开除的真实原因——她生的是非洲人的儿子——还有为了保住工作她经历的一些痛苦的事情。

在全国各地政府机构和系统进行的政治和种族方面的大清洗，使医院全体工作人员，从最低级别的体力劳动者到最高级别的医务专业

人员，发生了大规模的变动。任何无法提供“种族健康”证明的人都被强迫离开。母亲的直接上司，一个姓克莱梅耶的男护士长，多年来一直吹嘘自己的犹太血统。当医院管理层给他做种族背景调查时，他侥幸通过，打了个擦边球，多亏了他最后一位有记录在案的犹太祖先是在纳粹严格的截止日期之前出生的。在那之后，克莱梅耶先生再也没有提起过自己的犹太祖先。

多年后，穆缇对我讲述，在被开除之后，她立即向医院管理层一次又一次提出申请，恳求他们收回命令。每个人都跟她说同样的话，说命令是无法撤回的，他们什么也做不了。最后，母亲再次书面要求与医院高层面谈，她得到了允许。约定面谈的那天上午，她跟在一个接待人员身后走进管理人员宽敞的办公室，她彻底惊呆了。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的是一个矮胖的穿着纳粹制服的男人。她立即就认出，这个人前不久还在医院洗衣房工作，她还拒绝过他无数次讨厌的性骚扰。跟那个时期的许多纳粹分子一样，显然他是因为在医院的活动受到嘉奖，一举跃升为高层管理人员。

他跳了起来，热情地迎接我的母亲，仿佛他们一向是好朋友一般。

“进来，贝莎，请坐。真高兴又看到你。现在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从最初的震惊中回过神来后，她对他说，尽管她从未跟政治沾过边，却还是因为“政治原因”被开除了。她还说她已经找过了她认为能帮忙的人，却都没有用。

“你可算找对人了。你这情况也不是毫无希望。”他的反应令人深受鼓舞。“我想我能安排把你弄回来。”他的笑容也很激动人心。“不过，你得明白，我不可能为你这种——这么说好了——背景的人去冒险，除非你给我点诚意。毕竟我们得礼尚往来嘛。”

母亲感到不妙，她想知道他说的“诚意”到底是指什么，这个矮胖子突然撕掉了和善的面具。“我们别装纯洁了。”他怒喊道，“你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时我母亲已经明白了，准备离开办公室，但是，矮胖子像被激怒了公牛一样挡在母亲和门中间，母亲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脸上就被扇了好多个巴掌。“像你这种女人，还有德国男人想跟你扯上关系，你就应该感到庆幸。”他咆哮着，“现在，滚出去，再也别让我看到你。”

后来，母亲跟几个好朋友说起这件事，说她决定要把这件事诉诸法庭。他们强烈建议她不要采取法律措施，因为起诉纳粹官员等于起诉政府，在当前的局势下，这是一件荒谬的事情。他们提醒她，这样做只会给自己的处境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导致纳粹集中火力对付我们。“你赢不了的。”他们对她说，“如果你明白对你和你的孩子来说什么是好事的话，你就会忘掉这一切。”母亲接受了他们的建议，虽然她很不情愿，但这无疑是明智的。

我的朋友克劳斯

我母亲是被寡居的外祖母独自带大的，连同她那八个兄弟姐妹，她觉得，申请福利补助是不可思议的。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为了渡过经济难关，她愉快地从医院的前同事那里接下打扫屋子的活计——他们听说了她的遭遇，都想帮助我们。其中有一位犹太医生，在先前的纳粹大清洗中，他刚被开除。他被允许开个人诊所，但只能治疗非雅利安人。

他和妻子还有七岁的儿子克劳斯住在格林德艾尔大街一套宽敞而豪华的公寓。这条大街通往汉堡有名的犹太社区，里面大多都是中产阶层或富裕阶层。虽然我母亲只是他们的清洁工，每周去他家打扫一次，他们还是把她当成朋友，经常邀请她在业余时间和周末去他们家玩，还带上我。这样一来，克劳斯和我成了好朋友。

有一天，母亲和我正在去打扫的路上，我们注意到冲锋队和党卫军在市区的街道上列队。他们中的许多人手里举着写着“德国人，别跟犹太人买东西”的牌子。在这些牌子的鼓舞下，我跟母亲坦白，我也讨厌犹太人，因为我的老师们教我们，犹太人是令人厌恶的。母亲盯着我看了很长时间，眼睛里满是悲伤。后来，她问我是否喜欢克劳斯。我不明白，克劳斯跟我不喜欢犹太人有什么关系，但我告诉她，我非常喜欢克劳斯。她依旧悲伤地看着我说，“克劳斯就是犹太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

我惊呆了。我亲爱的朋友克劳斯和他那友善的父母怎么会是我在电影里看过的那种卑劣的人？突然之间，似乎一切对我都说不通了。

母亲看出了我的疑惑，她试着安慰我。“犹太人跟我们的唯一不同就是，他们去不同的教堂，也就是犹太教堂，”她解释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坏人。纳粹也不喜欢非洲人，他们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跟他们对待非洲人一样，是错误的。”

“可是，纳粹为什么不喜欢非洲人和犹太人？”我不停追问。

“因为纳粹认为自己比所有人都高级。”她解释说，“他们认为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尤其是犹太人，都是低级的。不幸的是，现在是他们当权，我们无能为力。”

“元首也是这样认为吗？”我想知道。

“我敢肯定是的。”母亲回答，对我们这次对话的走向，她流露出明显的不适。

我可以接受，虽然我持保留意见，政府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坏人，但是希特勒，我们被教导要当成德国的救世主来尊敬的人，会做出微不足道的恶举，这种可能性却超出了我的理解能力。

母亲看出了我内心的混乱，提醒我千万不要把刚才她跟我说的话告诉任何人，否则我们俩都会有大麻烦。我严肃地跟她握了握手，承诺自己会守口如瓶。从我记事起，我就被教导，德国男孩无论怎样绝

对不能违背自己的誓言。母亲又久久地严肃地看着我，说她知道她的秘密在我这里很安全。

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克劳斯的父亲给我们开了门。“你看到外面那些脏猪了吗，贝莎？”他问我母亲，显然，他指的是外面那些举着牌子的冲锋队队员。他和他的妻子还有我母亲在客厅低声聊天时，克劳斯和我去了他的房间。我们很快就玩起了我们最爱的游戏，用他的玩具士兵们排方阵，准备打仗。那天晚上，我如常与克劳斯道别，说好下个礼拜还来找他玩。但一周之后，母亲告诉我，我们再也不能去了，因为克劳斯的父亲接受了另一家医院的聘请，他们全家已经搬去了柏林。当时为了不吓到我，母亲隐瞒了事情的真相，克劳斯的父亲让她中断与他们的来往。他们说，跟所有德国犹太人一样，他们也在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之下。跟犹太人来往，她也会有很大的风险，让我们本就已经危险的处境变得更加糟糕。他们还告诉她，原本他们早就打算离开德国的，但拖了太久，现在已经没机会了。

我再也没有听说过克劳斯和他父母的消息，直到多年后，也就是1938年11月9日的水晶之夜之后。那个晚上，是纳粹首次针对德国犹太人发动的全国性袭击，几乎所有的犹太教堂都被摧毁，267间，如果算上那些小的、非官方的礼拜场所，这个数字将会超过1000；7000多家犹太商店被损毁；91名犹太人被杀害，大约30000多犹太人被关押。街道上到处都是被损毁的商店窗户玻璃碎片，“水晶之夜”由此而来。政府下令施行这次大屠杀，是为了报复德国驻巴黎大使冯·拉特被十七岁的犹太少年赫舍·格林斯潘枪杀一事。水晶之夜，也是纳粹1923年慕尼黑啤酒馆暴动（18名纳粹分子被杀）的十五周年纪念之夜。

这次袭击被大肆报道，转天，放学后，我跟几个同学在巴姆贝克的商区汉堡大街上闲逛，想要亲眼看看现场。那些报道并没有夸大事实。几公里长的主街道两边都是碎玻璃。有人告诉我们，所有被砸掉橱窗的商店，都是犹太人的。“昨天晚上你要是在这里，”一个男孩吹

嘘说，“你就能一分钱不花地买走你要的任何东西。”我很轻易就明白了他的意思，因为往常摆满了商品的橱窗现在基本都空荡荡的，商店里面的货架上也是如此。我的几个同学觉得很满意，在对德国人做了那么多邪恶的事情之后，犹太人最终受到了应得的惩罚。我想告诉他们，不是所有犹太人都是邪恶的，但想起对母亲的承诺，我什么也没有说。

到家之后，我发现母亲在哭。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向我坦白，之前她跟我说的，克劳斯和父母离开了汉堡，并不是真的。她刚刚听说，他们三个人被发现死在自己的公寓里，很明显是被医生注射了过量的药物。母亲花了好几个月才从悲伤中恢复过来。然而，对于我来说，死亡还是个模糊的概念，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克劳斯站在门口，我跟他说过下周我还会来的场景。

法缇玛姑姑

对当时的我来说，不可避免的会定期发生的一个尴尬场面就是，我的姑姑法缇玛，也就是父亲的妹妹，时不时会来看望我们。她已经从瑞士回来，在海伦·兰格中学完成高中学业。她是个娇小的女人，才二十岁出头，在所有人包括她自己看来，她是个天才，精通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还有她的母语瓦伊语。除此之外，她在数学、化学、生物方面都很厉害，虽然她的右手有严重的缺陷，但她的小提琴拉得非常好，足够开独奏会了。

法缇玛姑姑的到访变成我的痛处，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她，而是因为我们俩的处事作风截然相反。我一贯尽可能保持低调不显眼，避免招来任何不必要的关注或令人羞耻的嘲笑。法缇玛姑姑则完全相反，她最喜欢成为焦点，故意打扮并且举手投足都让人无法忽视她。

很久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黑人很美，她就顶着一头令斐济岛民都羡慕的圆篷型的卷发。生怕这巨大的圆篷卷发发挥不了作用以致别人注意不到她，她去哪儿都穿着她那件亮黄色的豹纹外套。在我们这个保守的乡野气息的社区，这件衣服太过与众不同。每次法缇玛姑姑过来，她都非要带我出去，在附近的蛋糕店吃个蛋糕和生奶油。不可避免地，我们总会惹来人们的注目、嗤笑和一些关于黑人的评论，让我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有一次在一个蛋糕店里，一个女服务员阴险地建议我们尝尝“黑人之吻”或“摩尔人的头”，两种流行的巧克力点心，我们俩都笑不出来。

我觉得烦透了，人们总猜测法缇玛是我的母亲。不止一次，我不得不跟同伴们争吵，他们看到我跟法缇玛在一起之后，都非要说她才是我真正的母亲，因为我们长得太像了，而那个我称作母亲的白种女人只是领养了我。这种说法尤其让我心烦。因为从我很小的时候，我也有这个怀疑，直到母亲说服了我，她指出了动物界的一些例子，白皮肤的雌性动物也可能产下棕色皮肤的幼崽，只要父亲是黑皮肤的。

偶尔，法缇玛姑姑会带我去汉堡郊区可以俯瞰易北河的金沙岛。在那里，她会去看望海多恩牧师。海多恩是汉堡具有历史意义的圣凯瑟琳教堂的牧师。海多恩牧师是我祖父莫莫鲁的老朋友，是德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也是早期反对纳粹党党派之一人性党的创始人。实际上，法缇玛是去看牧师那英俊的长子理查德的。在不谙世事的我的眼里，她对待这段关系相当认真。他俩手牵手走在海多恩庄园茂密的林子里时，我经常无聊地跟在后面，因为他们谈论的大多数事情都超过了我这七岁脑袋的理解能力。不过，他们也会说到他们在利比里亚的未来，理查德打算去那里当传教士。

那天深夜，我们回到汉堡后，我听到法缇玛告诉母亲，每当看到她 and 理查德出现在公共场合，那些愤愤不平的纳粹分子就会辱骂他们。当时，我以为这些辱骂是因为法缇玛那夸张怪异的外形，觉得只

要她把头发修剪好，别再穿那件可怕的豹纹外套，这些问题就会变少。多年后，我才理解到更宽泛的事实，认识到纳粹德国对不同种族间恋情的深刻仇恨。

在意识到这些之前，有一次，我给法缇玛造成的难堪，几乎跟她令我难堪的程度一样。圣诞节快要到了，她问我她要送我点什么当做礼物。当时，最流行的玩具就是那种大约三英寸半、印着棕色和黑色制服的冲锋队和党卫军的塑料玩偶。我已经有了一只排的士兵，每天都用它们排兵布阵，玩上好几个小时。我对法缇玛姑姑说，唯一能让我的人生完整的就是，一套配套的纳粹领袖玩偶，包括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市里的每个玩具商店都能买到。我说，它们不仅做得跟真人一模一样，右臂还能举起放下，行希特勒致意礼。

平安夜，正如我希望的，那三个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玩偶就站在我们的圣诞树下。直到几个星期之后，法缇玛姑姑才告诉我们，为了买到这份圣诞礼物她都忍受了些什么。她说她买好东西正要离开玩具商店的时候，售货员大声地说，让所有人都听见，“别像你们这种人在家偷摸干的那样，把面条塞进玩偶里面，因为如果元首、戈林或者戈培尔有什么事的话，我们就会找到你，让你负责。”

法缇玛说，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这袋东西扔回给售货员然后离开。只是想到她已经付过的钱，还有得不到礼物的话我会有多失望，她才改变了主意。

有一天，中学毕业后进入汉堡大学医学院的法缇玛，带着一封莫莫鲁的信来到我家。信里说，他已经洗脱了贪污的罪名，从监狱里放出来，虽然巴克莱总统的仇视让马萨夸依家的日子依旧很难熬，但比以前好歹轻松了一些。除了纳撒还在牢里，马萨夸依家的男丁都已经不再躲藏度日，而是生活在利比里亚的不同地方。我父亲之前被暂时驱逐到尼日利亚的拉各斯，他的母亲同第二任丈夫生活在那里，现在他已经回到了蒙罗维亚。

因为不能提供更多的经济援助，莫莫鲁向法缇玛道歉，并建议她继续利用她的语言天赋，贴补他寄给她的微薄生活费。他没有说太多细节，只是说他非常担心德国的“政治进展”，说他正在安排她尽快去美国，那里有黑人民权活动家W.E.B.杜·博伊斯这样的朋友支持，她可以继续学业。这里的“政治进展”，毫无疑问指的是希特勒无休止的武力炫耀和越来越大的战争可能性。如果读了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他就会更确切地意识到法缇玛在汉堡的处境有多危险。在因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失败被关押的时候，希特勒描绘的“第三帝国”蓝图里，这位未来的独裁者明确地写下了他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黑人的看法。“有时，”他写道，“一些图文并茂的报纸会引起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在有些地方，黑人首次成为了律师、教士甚至是牧师，还有英雄式的男高音，类似这种事情。就在愚蠢的资产阶级惊叹于这样的教育奇迹、充分尊重现代教育技术的成果时，犹太人却精明地从中得出一个新的证据，来证明他们关于人种平等的理论，他们还试图把这理论灌输进国人的脑袋里。在这个堕落的资产阶级世界里，人们并不知道这绝对是违背一切真理的罪恶；不断地雕琢一个生下来就是半人猿，直到人们认为把他打造成一个律师，而数百万的高等人种却停留在完全无知的状态，这是愚蠢的犯罪；如果数百万最有天赋的人被允许在当前的无产阶级泥沼中堕落，而霍屯都人和祖鲁卡菲尔人却被培养成聪明的专业人员，这是违背永恒造物主意愿的大罪。因为这种教育就好像是对狮子狗的训练，而不是科学的教育。在最有智慧的人种身上付出的努力和关怀，获得同样成就的速度将会快上千倍……”

直到1937年，莫莫鲁才得以兑现自己的诺言，把法缇玛弄出了德国，进了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她最后一次来看我们，同我们告别的时候，我知道她将会离开很长一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我会非常想念她，因为长期以来，她是我同莫莫鲁及我父亲——自从离开德国后，他从未给我母亲和我写过只言片语——之间

微弱的关联。现在已经十一岁的我，已经不再因为她奇怪的外表——她那硕大的圆蓬卷发、豹纹外套和其他——而难堪，送她去火车站，看着她即将登上漫长的旅途转道瑞士去往美国，我的心里充满了骄傲与悲伤。

萨尔察的快乐夏天

汉堡有一个历史悠久又颇受欢迎的政府出资的社会项目，那就是每年夏天的假期训练，它让成千上万的城里小孩有机会跟亲人在德国的各个乡村度过四周的暑假。从六岁开始，每年，我都盼望坐上六个小时的火车，去我母亲的哥哥我的卡尔舅舅家。卡尔舅舅和格里特舅妈还有比我大四岁的表姐特鲁德琴，住在哈尔兹山脉边上诺德豪森附近萨尔察的一个小村庄里。

报完名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到了出发那天，母亲会把我带到汉堡的中央车站。在那里，我会被分给一个辅导员，通常是女性社工，她会把我行李都安顿好，在我身上和行李上贴上各种各样重要的标签。她告诫我，整个旅程我都得把标签挂在脖子上，那上面写了我的姓名和地址，还有卡尔舅舅的姓名和地址。由于我家和舅舅家都没有电话，母亲只能提前给卡尔舅舅写信，告知我到达的确切时间。

几个小时往南的车程之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抵达了目的地，原本载满汉堡孩子的火车渐渐空了下来。在萨尔察的前一站，我的辅导员提醒我，下一站就是我了。火车开进萨尔察站之后，我立刻就看到了魁梧的卡尔舅舅、瘦得像麻杆一样的格里特舅妈还有胖乎乎的特鲁德琴表姐。辅导员把我和我的行李箱转交给他们，祝愿我有一个愉快的假期，还提醒卡尔舅舅说，整整四周之后她会回来接我。

跟熙熙攘攘、喧嚣无比的汉堡相比，萨尔察小村庄的生活是田园

诗般的、风平浪静的。汽车在这里是稀罕玩意儿，牛羊在鹅卵石铺就的主街道上随意走动。在萨尔察，几英里之外隔壁村来的人就算是外国人了。从汉堡这样遥远的地方来，又长成这副模样的我更是引起了大轰动。早在我第一次去那里之前，格里特舅妈就让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她这个汉堡来的外甥是非洲大人物的孙子和儿子，这让别人更加关注我。尽管我们各自的世界存在巨大差异，或者正是由于这些差异，我立刻就打动了村里的男孩，虽然我只是稍微夸大了一下大城市的生活，他们却深受震撼。当我跟他们说汉堡的大楼有十层那么高，高得人们需要乘电梯才能上去；班轮载着人们沿着一条巨大的河道穿行于城市；船只比大楼还要大；还有一个比萨尔察大好几倍的嘉年华游乐场，里面有旋转木马、魔术表演、热狗摊，还有世界上最高的男人和最胖的女人，还有从婆罗洲丛林抓来的从脖子到脚趾长满了长毛的“猿女”的表演秀；他们都惊叹不已。

如果说跟萨尔察简单的村民及其乡村生活比起来，生长于大城市让我感觉自己精致而成熟的话，那么，没有什么能比舅舅家三层公寓楼后院里的一个“装置”让我更加感受到我与他们的世界之间存在一条巨大的鸿沟。我花了好多天，做了很多心理建设，才可以克服自己的反感，顺利使用户外厕所。我只是没法忍受那个木椅子下圆圆的、头部大小的洞里涌上来的恶臭。从那个洞里，我能看到一个圆形的，快要装满的金属容器，上面落满了苍蝇，还有几只鸡，欢快地在周围啄食。跟这个设施配套的是，剪成整齐的小方块的报纸，用大钉子钉在墙上。闻到那股恶臭，用着粗糙的手纸——报纸，是最想念汉堡的时候。不过，萨尔察有太多好玩的东西，让我不那么想家。

卡尔舅舅、格里特舅妈还有特鲁德琴表姐待我像亲儿子和亲弟弟。卡尔舅舅是个厉害的大裁缝，他盘着腿坐在工作台前缝制男装时，喜欢有我陪在身边。在萨尔察，跟德国其他地方一样，货币是短缺的。卡尔舅舅和他的一些客人，也就是当地的农民或跟他一样的小

商人，想出了以物易物的办法，用他们自己的产品或者技能代替货币进行支付。每个星期三次，卡尔舅舅的理发师会来家里给他做一次专业的剃须，需要的时候，还会理发。作为回报，理发师每年会得到一套上好的新西装。

唯一能让我在萨尔察田园般的假期黯然失色的，就只有格里特舅妈的执念了。她认为我需要增肥。为了让我跟卡尔舅舅和特鲁德琴那样胖乎乎地看着健康，她决心要让我长胖一点。不管我如何抗议，我的胃负担不了她堆在我眼前如山一样的食物，她还是固执地坚持让我吃完。结果就是，每天晚饭，我都会在厨房的餐桌前多坐上好一会儿，跟巨大的三明治做斗争，因为不吃完盘子里的东西，我就不能去玩。

每个星期天，大部分是为了我，全家人都会去远足，或者坐火车去哈尔兹山脉风景最美丽的地方，包括山顶的旧城堡。每次周末远足回来，我都收获许多德国历史和古老传说，并因此深深感动，我活跃的想象力编织了一个迷人的王国，对古代的侠义骑士和他们的神奇壮举充满了向往。

四个星期的时间过去了，我终于过够了乡村生活，渴望回到大城市。离开的那天，格里特舅妈让我们早早地就在火车站等候，确认了一遍又一遍，我的鞋带是系好的，我的行李箱上贴上了正确的标签。正如之前约定好的，我的辅导员和假期专列火车准时到达，把我带回去。“再见”的话说了又说，格里特舅妈给了我大大的拥抱和亲吻——我希望火车上的孩子们都没看到，我终于登上火车，迅速加入其他孩子，争论着在假期中谁见识得更多，谁做了更多好玩的事。我确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去过的地方、看过的风景能超过我。

火车终于驶进灯火通明、巨大圆顶下的汉堡火车站时，天已经黑了。在人山人海中看到久违的母亲的脸，我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强烈的幸福感。虽然自从入学后我就对在公共场合表达感情和情绪变得极度敏感，但我还是破例允许母亲热情地拥抱亲吻我。而正是在这个

时候，我才真正发现“离别令人们的心靠得更近”这一古老真理。

维希德的到来

回想起来，我可以想到许多人，在我小时候令我感到悲伤与不幸，但没有一个人能像我们的新校长海因里希·维希德先生一样无情、歹毒、残忍地令我的生活痛苦不堪。跟他的前任——我一年级时的校长，低调得我根本想不起他的姓名和长相——不同的是，维希德可不是一个可以让人忽视或忘怀的人。他大概四十五六岁，六英尺高，红发碧眼，身材魁梧。他是作家戈尔希·福克的表亲，并自诩为诗人。除此之外，他是希特勒的狂热追随者，他特意留了方方正正的胡须，虽然是红色的，样式却跟希特勒是一样的。

维希德先生走进我的生活——我走进他的生活——是在我二年级的时候，在他成为我们新校长的那天。为了向我们介绍自己，他让全体教职人员和学生都在操场上集合，他非常耀眼地穿着纳粹中级公务员制的棕色高筒靴和马裤，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活像是一位将军在巡视自己的军队。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深刻领会他的意图——老师和学生都包括在内——凯特勒坎普学校有了新的当家人，所有事情都要按维希德的方式来办。当然，我们这些孩子当时并不知道他什么意思，但是从他的语气，我们很清楚，“维希德的方式”肯定不是我们喜欢的方式。

他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突然在男生的队列中发现了我，就好像一条蛇试图催眠它的猎物一样，用狠毒的眼光锁定了我。

“我想让这所学校知道的是，在这个纳粹党领导的国家里，当一个德国男孩是多么骄傲的事。”他的目光没有离开过我。

在校长的注视下，我觉得非常不舒服，可是就在我想移开目光的

时候，他继续发表他的演说。维希德讲完后，我们回到教室，那种陌生的、让我心神不定的感觉挥之不去——我刚刚有了一个私敌，一个巴不得我死的人。很快，我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

维希德第一次确切地让我知道他对我的看法，是在他给我们生病的体育老师代课的时候。校长宣布他要做一项勇气测试，把胆小鬼和勇敢的小男孩区别开。对此我没什么问题，实际上我很欢迎这样的机会，可以展示我的力量，因为我总是认为——并且不断证实——至少我跟我们班上的男生们一样勇敢。

维希德让我们排好队，来到体育馆后，命令我们用不同的设施摆成了超越障碍训练场——双杠、鞍马、平衡木等等，摆成一个大圈。各个设施之间需要留出很大的空隙，这样从一个设施到下一个设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其中有一个空隙非常宽，想要过去，唯一的办法就是跳起来，抓住天花板上垂下来的一根粗绳，然后像人猿泰山一样，悠荡到另外一边。为了给这个过程增加难度，维希德安排一个男孩站在一边，用一根长棍子不停地戳那根绳子，让绳子不断晃动。

观察了一遍之后，我觉得自己完全没有问题，信心满满地等着轮到我上场。在我上场之前，大部分孩子都成功地完成了，也有少数几个失了手，然后在维希德的命令下，被赶到“胆小鬼”的角落里。我非常轻松地完成了前面大部分环节，但是到了这个大空隙的时候，我看到维希德代替那个男孩，亲自举起了棍子。他不像那个男孩之前那样让绳子前后晃动，而是用棍子使劲别着绳子往后晃，让我根本抓不到绳子。就在我等着他把绳子放开，准备好等绳子向我这边晃过来立即跳起抓住的时候，他大喊，“胆小鬼！没胆量！滚开！”我不敢相信他居然可以这样不公正，我又等了一会儿，想看看他是否会让步，把绳子给我。但他越来越生气，冲我大喊，“滚开！给有胆量的人让道。滚去跟那些胆小鬼待在一起！”我不情愿地服从了，跟那几个人站在一起。我觉得被鞭子狠抽了一顿。事实上，被鞭子抽一顿给我的

伤害，也比不上像这样被不公平地贴上“胆小鬼”标签来得深重。

那个时候，虽然他这样针对我，我还是渴望得到他的认同。看到他对班上其他孩子那么友善和爱护，尤其是那些金发碧眼符合纳粹标准的孩子，我甚至感到很嫉妒。但是非常突然地，我那想让这个人喜欢我的执念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倔强——却又无用的——厌恶。

我没有跟母亲说起这件事，担心她会生气地去找维希德，然后让事情变得更糟。相反我决定，不让维希德的所作所为影响到我。但是，我很快就发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在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贝勒小姐“被调走”几个月之前，有一天，她宣布说，我们要开始准备一年一次的传统节目“家长之夜”，在这个晚上，每个年级的学生都会给家长表演滑稽剧、小话剧、诗歌和乐器。贝勒小姐选了一个用低地德语写的剧本，描述的是初雪之后一个小男孩的兴奋之情。她还举办了一次试镜，选出三个人扮演剧中的人物。我把每个人物的剧本都读了一遍，当上了主角。贝勒小姐说我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来背台词。我迫不及待地告诉了母亲。对此感到万分自豪的母亲立刻跟好朋友们和默勒姨母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大概有十几个人说他们很乐意去看我的演出，让我给他们订票，每张票的价格是三十芬尼。

保险起见，贝勒小姐给每个角色都指定了一个替补，要求我们排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能够倒背如流。在大日子的前一天，我们正在排练，维希德先生走进了教室。他示意贝勒小姐不要打断我们，而他本人则直接坐到我面前。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早已经不再怯场。但是看着维希德冷酷、没有一丝笑意的眼睛，一种奇怪的恐慌攫住了我。我对自己说没什么可怕的，因为我背好了台词，我很快恢复了镇定，没有一丝迟疑地继续排练。

离开教室的时候，维希德让贝勒小姐跟他一起出去一下。回来之后，她看上去心神不宁，却什么也没有说。不知为何，我却感觉到，

她的神态变化跟维希德的到访和我有关。我猜得分毫不差。下课后，她让我留下来。“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你说。”长长的沉默之后，她带着歉意地说，“维希德先生让我把主角给吉尔德（我的替补，金发碧眼）。他觉得吉尔德演这个角色更好。”

“他都没看过吉尔德排练，怎么会知道吉尔德演得更好？”我温顺地插嘴，试图用讲道理来推翻对我不公平的论断，却是徒劳无功。

“我并不赞同他，要不然也不会一开始就把这个角色给你了。”贝勒小姐说，“可是我无能为力。维希德先生是校长，我必须服从他的命令。”

我跟穆缇说了这件事，她非常生气，却提醒我不要受维希德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不要因为不喜欢维希德而不喜欢学校。“学校是个好地方，大多数老师都是正派人，就好像贝勒小姐，”她安慰我说。

“你记住我说的，”她说，“维希德迟早会受到惩罚的。”

接着，她联系了默勒姨母和其他准备去参加家长之夜的朋友，说要赔他们票钱，因为我的演出取消了。他们坚决不肯收下赔偿，尤其是听说了我是为什么被赶走之后。向来不会装腔作势的默勒姨母，更是直截了当地跟我母亲说，既然她的小汉斯-尤尔根被禁止演出，他们都会留着自己那三十芬尼，“贴到纳粹分子的后背上去。”

维希德第二次针对我，是在走廊，他把我拦下，当着我几个同学的面，用长长的食指戳着我的胸膛。“再也别在学校穿这件衬衫。”他对我咆哮，却不说明为什么。我这件卡其色的衬衫，是默勒姨母送我的生日礼物，跟希特勒青年团穿的那些很像。显然，校长是以为我穿的是纳粹的制服。

第二天，母亲去校长的办公室，想要谈一谈这件事。他立即发动了攻击。“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他对她大喊，“是我们骄傲的雅利安人年轻一代的标识。让你的儿子穿制服，是在嘲笑它所代表的一切。因此，我必须建议你确保他再也别穿这件衣服来学校。”

校长的慷慨陈词结束后，母亲从包里扯出那件刚洗完的衣服，平静地把它铺在他的桌上。从近处看，很轻易就看出，那不是制服，只是一件普通的卡其色衬衫。维希德不愿意为自己的错误道歉，为了掩饰自己的尴尬，坚持说即便不是正式的纳粹制服，我也不能穿，因为容易令人混淆。

这个时候，我母亲爆发了。“我对他说，”后来她回忆说，“除非有官方公布的法律，明文禁止你穿卡其色衬衫，你就可以一直在学校穿那件衬衫，想什么时候穿就什么时候穿，不管他喜不喜欢。”我了解穆缇，确信她肯定是这么跟维希德说的，或许她还说了更多。当时她只是跟我说，她会让我自己决定如何处理那件衬衫。我知道，穿那件衬衫肯定会让维希德恼火，所以我决定经常穿——经常，实际上，短短几个月之后，因为洗了太多次，卡其色都已经褪掉，也穿得破旧了，穆缇觉得该让它“退休”了。

卡诺萨的海因里希国王

作为顽固不化的纳粹分子，维希德时刻警惕着，清除任何与他深入骨髓的德国优越性相冲突的东西。有一次，他给教我们中世纪德国历史的老师代课。我们正学到德国国王海因里希四世的审判及其遭受的磨难。根据我们的教科书，因为授职权之争，海因里希四世被教皇格列高利七世驱逐。这次绝罚令许多诸侯不再支持海因里希。^①为了夺回他们的效忠，维护帝国权威，海因里希不得不亲自乞求教皇慈悲，收回绝罚。他以忏悔者的身份前往直意大利北部卡诺萨城堡的临时

① 绝罚是天主教会的一种制裁形式，即剥夺受罚者教会成员的权利。

教皇官邸。

维希德还没来之前，在我们原先历史老师的指示下，一位同学就挂起了一副插图，画的是一脸可怜相的海因里希，只穿着一件薄薄的朝圣者衬衣，光脚站在城堡旁边厚厚的雪里。而前面城堡里，身穿华丽长袍的教皇格列高利从阁楼上俯瞰国王。画家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描画是德国公立学校里典型的方式，但显然是被纳粹的教育部审查员忽视了的。

走进我们的教室后，维希德看到这副插图，立即暴怒。他一把把它扯下来，扔在地上，狂喊“撒谎，撒谎，全是撒谎！”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他谴责这整个历史事件是“一帮说谎的僧侣捏造的”。他咆哮说，德国没有国王会在意大利教皇面前这样羞辱自己。我们之所以会在历史课本上看到这些鬼话，唯一的原因就是，那时候文人很少，那些天主教的家伙是唯一会记录“历史”的人。因此，他对我们说，他们书写“历史”的时候，所写的并非历史的真相，而是他们希望发生的事情。

虽然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维希德，但他对历史的看法——因此他不肯承认任何与他德国优越感不符的历史数据——对当时的我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的国王并没有像个懦夫一样，这一点极大地安慰了我和我那正在萌芽的爱国感。

维希德持续的语言攻击，不但没有令我泄气消沉，反而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他越是针对我，我越是坚强，直到我觉得我可以接住他的所有攻击。幸运的是，我在汉堡公立学校待的八年，遇见的老师并不都是跟维希德一样。大多数老师都是专业的教育者，待我跟别的孩子一样。还有一些老师，像贝勒小姐，他们理解我所处的特殊困境，想方设法让我的日子好过一些。

后者之中就有施耐德先生。他留着山羊胡，身材笔直，浑身军人气度，教我们动物学、生物学、植物学，并且以一种迂回的方式，

教我们关于鸟类和蜜蜂的知识。虽然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真正的英雄，是西方战线上的著名步兵中尉，但是当他给我们这些孩子介绍地球上的动植物时，却是个非常温柔的人。他赢得我永远的喜爱，是在他跟我们介绍印度人的长相时，他说，“他们拥有美丽、光滑的棕色皮肤，就像你们的同学汉斯-尤尔根一样。”从那以后，对我而言，他做什么都是对的，即便是放学后把我们留下几个小时，只为了观察一对鸟儿给新生的小鸟喂食。

戈绍先生

还有一位老师，从不掩盖对我的喜爱，那就是戈邵先生，我们的合唱老师。他是个英俊、举止温和的小矮个，白色的头发和胡子都一丝不苟。他对纳粹政权唯一的妥协就是每节课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说一声“希特勒万岁”。没有经过维希德的批准，他就让我加入了合唱团，他坚持说我不仅有一把好嗓子，音乐才华也高于平均水平。除了音乐，戈绍先生还给我们上一门叫做“宗教”的课，其实却是一门讲《圣经》历史的课。

他从不涉及种族话题，但我本能地觉得他是站在我这边的。有件事很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在某个周末，学校组织去朗根霍恩郊区的青年公园郊游。期间，我们这些学生要在一个露天剧院为家长们表演节目。我们合唱队唱了几首歌之后，我在观众席里坐在母亲身边。维希德宣布，压轴的将是高年级学生表演的一个“幽默的歌舞节目”，执导的正是维希德先生本人。

节目开始了，一行八年级的学生有节奏地走向观众，嘴里含糊不清地唱着什么莫名其妙的曲子。突然，队伍断开了，从中间跑出一个小小个子男孩，浑身涂满了黑色的油彩，只穿着绿色的草裙。随着手鼓

的鼓点，这个假冒的非洲人疯狂地跳跃和旋转，而后面的合唱队则胡乱地哼唱着什么听上去像是非洲音乐的东西。

从这个“黑人”一出场，观众席中就有许多眼睛看向我和我母亲。一开始，母亲想带我离开，但她改变了主意，或许是意识到离开可能会引来更多的关注。所以我们就从头到尾地坐着看这个表演，对我们而言，它漫长得似乎无休无止。等到终于结束的时候，表演者和维希德先生都收到了热烈的掌声。

母亲和我无言地乘坐城际火车回家，我们都还沉浸在那侮辱人的表演带给我们的伤害之中，各自陷入沉思。这时候，目睹了整个表演的戈绍先生走到母亲身边。介绍自己是我的音乐老师之后，他说“你的儿子非常有音乐天赋”，只字未提刚才那场表演。

戈绍先生的话正是母亲需要听到的。“我很高兴听到专家那么说，”她说，“因为我也一直觉得汉斯-尤尔根是有音乐天赋的。”

在他们的谈话中，戈绍先生提出可以在他的业余时间给我上小提琴课，免费，只要母亲给我买一把小提琴。母亲没有跟我商量，就向戈绍先生保证，我一定会有一把小提琴，不出几个月我就能准备好上第一堂课了。

我讨厌学小提琴这个主意。在我同龄的小伙伴中，小提琴是女孩子的玩意儿。仅仅是想到被人看见在大街上背着个小提琴盒——我们这些小孩轻蔑地称之为“小孩棺材”——就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不过，这件事不是我能改变的。母亲决定了我要去学小提琴，我就只能去。

最难的事情是攒到足够的钱买一把小提琴，因为小提琴，即使是二手的，也不便宜。虽然穆缇在汉堡—纽约橡胶制品公司找到了一份长期工作，在硬橡胶厂当工人，但挣来的钱只够维持基本生活开销。她的工资是计件的，想要多挣钱，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迫自己用最快的速度干活。她把自己逼到极限，省吃俭用一段时间后，自豪地递

给我一把小提琴——相当漂亮的一件乐器，我不得不承认——绑着蝴蝶结还有一个琴盒。这是她从附近的二手商店里用预约购物的方式买下的。我不想伤她的心，也不忍心拒绝戈绍先生的好意，所以我带着“大义凛然的微笑”，用穆缇的话说，投身于这件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周一次，放学后我跟其他三个“幸运”的孩子一起，在戈绍老师的指导下，学两个小时的小提琴。虽然我是真的热爱音乐，却恨死了我拉出来的刺耳声音。最后，在一次特别伤脑筋的课上，我无比费劲地想让我那僵硬的手指像戈绍先生教的那样按在琴上，却怎么也做不到。戈绍先生把我叫到一边，他一点不耐烦也没有，只是说他放弃了。“你真的非常有音乐天分，”他安慰我说，“我希望你继续发展你的音乐之路，以别的形式，小提琴可能的确不适合你。”

阿门。我不能同意更多。尽管如此，我还是感觉糟糕，因为我令这位老先生尤其令我母亲失望了。毕竟，她曾经偷偷地梦想过自己的儿子能有一天成为小提琴家。那天晚上，我跟她说，我不能再去上小提琴课了。显然，她很悲伤，却没有责备我什么，只是接受了这个事实。“记得感谢戈绍先生，”她只说了这一句。

哈登先生

接着还有哈登先生，我的第一位英语老师。他是个“一视同仁”的暴君，在班上只能听他的。关于他的正面的事情，我只记得，他讨厌所有男孩，也讨厌我。哈登是个脖子粗短的胖子，厚厚的眼镜让他的眼睛看上去像是一系列的同心圆，跟“约翰牛”的漫画形象惊人地相似。哈登先生是“不打不成器”这一理念的狂热支持者。当时的制度，对于体罚，不说鼓励，至少也是容忍。“打”更是他教学方法的

重中之重。因此，他是凯特勒坎普学校最被人看不起最吓人的老师。他也是我八年初级学校生涯中第一位打我的老师。

事实上，撞上哈登老师的“枪口”，我赖不了别人，只能怪我自己。选修英语、法语还是西班牙语，完全是自愿的，也是德语修辞学高分学生的特权。如果我没有选英语课，我跟他就不会有交集，我就可以省掉许多痛苦。但只要选修了，就不可以放弃这门课。

很快，我就意识到自己犯的是灾难性的大错。哪怕是最轻微的“冒犯”，哈登先生也会大发雷霆，每一次爆发之后，我最初学习英语的热情很快就消失了，直到我希望这门语言根本不曾存在。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在课上读错了单词，哈登先生就会立刻暴躁地发作，扯着嗓子纠正我们，就好像全班同学的耳朵都聋了似的。他会用拇指指着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冲我们咆哮，“这是拇指！这是拇指！而不是，则似模指！”要是有个学生，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没做他布置的家庭作业，然后被抓住了，哈登先生就会毫无例外地把他叫到教室前面，命令他弯腰，双手碰脚趾，用一根吓人的三英尺长的藤条抽上三鞭子。鞭子发出的声音，还有受害者的惨叫，令我下定决心，绝不给哈登任何机会打我。但是，命运没有站在我这一边。

为了上英语课，我们不得不——因此悔恨不已——每两个星期就早起一个小时，因为为了不干扰正常教学，所有的外语课都排在日常课之前。冬天，我们到学校的时候，天还黑着，我们不得不等着哈登先生，才能进教学楼。通常，他都会在早晨七点上课前几分钟到达。他得从在郊区的家里骑上好长一段时间自行车才能到学校。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热切地盼望，有一天早晨，哈登先生会被车撞了，或者至少是睡过头。根据学校的规定，如果老师没有在上课后二十分钟之内出现，早课就会自动取消。有好几次，附近教堂的钟敲了七下，哈登先生还没有出现，我们都以为梦想成真了，但每次，我们都会失望，哈登先生那笨重的身子都会骑着自行车出现在街角。

然而，在一个宿命般的清晨，我们的机会来了。七点十五分，哈登还没有出现。因为我们都没有手表，天还太黑，看不清教堂的钟，我们只能依靠直觉判断已经又过了五分钟。最后，当我们所有人都认为五分钟已经过去，而他还没有出现，我们像老鼠逃离即将沉没的船一样四下散开了。

“造反”的欢乐是强烈却短暂的。两天后，哈登七点准时到了课堂，看到我们，他就狂怒不已，弄得我们都害怕他会气坏了脑子，怕我们自己会丢了性命。他脑门上青筋都暴了出来，咆哮着说他对我们的耐心已经到了尽头，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愚弄他，那就大错特错了。他坚持说那天早上他七点二十之前到校时我们已经离开了。因此，他命令我们二十多个人站到前面去，排成行，领受我们应得的“奖励”。

我敢肯定，即便是我们班最笨的孩子也立即明白哈登想要干什么。我越来越害怕，看着哈登挥舞他的鞭子——每个学生三鞭子——直到教室里的男孩们都摸着疼痛不堪的屁股鬼哭狼嚎。就像在大规模处决中被判死刑的人一样，我看着我的同志们一个接一个地倒在残酷的刽子手手中。最后，终于轮到我为自己在这“共谋”中扮演的角色付出代价了。我还没反应过来，行刑就已经结束了。一开始，我只感觉到三下尖锐的刺痛，我想，我可以承受。但几秒钟过后，疼痛越来越剧烈，最后我的整个屁股都像着了火一样。我终于明白身边的哭喊声都是为什么，不过，我还是决定要忍住不哭。

不幸的是，我对体罚的了解可不仅仅来自哈登。令我对德国教育这个野蛮的方面有了第二次体验的，是汉堡街头一种叫做隆隆的旧习俗，在这种习俗中，邻近社区男孩之间的战斗像瞬间燃烧的火一样。在交战的派别中，没有人知道，或者说在乎，这场“战斗”是因为什么，或者是谁挑起的，他们只是单纯地享受打架的乐趣。只要有人突然大喊几声“打啊！”，好戏就开始了。所有人都会冲上来，挥舞着一

切能造成伤口及伤痕的东西，木棍、扫把、球棒等等。我们这些年纪小点的孩子会接受大孩子的指令，通常被派去放哨，要是有人或者沙科（汉堡街头对警察的叫法）来了，就去报信。

在这种特别的情况下，我的两个同学和我被委派了一项非常危险的任务。我们每个人手里被塞进两个装满水的汽水瓶。他们让我们埋伏好，等敌方的“战士”进入“投掷”范围，我们就把水瓶扔到他们身上。

急于证明自己勇气的我们，精准地完成了任务，取得了非常好的战果。当我们的水瓶在地上炸开时，前方的敌人被玻璃渣“弹片”包围，匆忙之中被打败了。

第二天早晨，我还沉浸在壮举带给自己的新地位，却突然被叫到西格尔先生的教室。令我沮丧的是，在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战争审判”。几个目击证人，包括我们的“敌人”，都作证看到了我——没有别人——扔了装满水的汽水瓶，像扔手榴弹一样。西格尔先生严厉地批评了我，说我做的事情有多么严重，而我又是多么幸运，没有人因此失去眼睛或者受重伤。

回想起来，西格尔先生那番话对我的影响深远。除了我又被罚之外——还是三鞭子。他问我是否有什么需要辩解的，我不认为供出我的同伴是高尚的，或者能让我逃脱惩罚，但我质疑了西格尔在此事上的权限——他是因为放学后在校外发生的事情惩罚我。但西格尔先生没有理会我。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正派人，太过文明，不至于跟哈登先生一个层次，不过，当他把鞭子抽在我屁股上时，我痛苦地得出结论，那就是，我错了。

而像往常一样，我母亲都是对的。她经常提醒我不要卷进任何恶作剧，就算是别的男孩子也做了同样的事。“但到后来，”她说，“人们唯一记得的，只有你一个人。”

拯救心灵的书

如果说我们接触到的从不间断的纳粹宣传没能永远关闭我的心扉的话，那是因为我从小养成的一个习惯已经到了上瘾的程度。我一学会认字，母亲就开始培养我对书本的兴趣。等到我八岁的时候，我已经对读书上瘾了——任何书本。因为我生长在还没有电视的年代，书本就成了所有消遣、逃避和信息的源头。我把跑腿赚来的钱，还有好心的大人给我买糖吃的钱，都存下来买书。母亲也是个书迷，她给我办了一张图书馆借书卡，而且圣诞节、复活节和生日，我收到的大多数礼物都是书。

多亏了我那相当一般的文学品味，不管是好书，还是坏书，不管适不适合我的年龄，只要到了我手里，我阅读的热情都是一样高涨。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在纳粹严格、单向的极权主义之下，早在我的肉身能够逃离纳粹德国这个心灵监狱之前，我还是成长为广阔、多姿多彩的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说戈培尔博士的意图是让我们年轻的心灵变得以民族主义为导向，那么在我身上，他就错过了机会。知识精灵从无数本被翻得卷了边的书中跑出来，在我的脑海里幻化成奇妙的画面，令我渴望去德国狭小领土之外的世界冒险。

通过书本，我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现实与虚幻之间自由穿梭。在我还不到十四岁的时候，在核潜艇和太空飞船还是科学幻想的几十年之前，我就已经跟随儒勒·凡尔纳（法国科幻作家）去过了外太空，潜到过两万里格深的海底。多年前，我还没有真正见过印第安人的时候，詹姆斯·费尼莫尔·库伯（美国作家）就让我在印第安人的棚屋里抽过烟斗；在我还没有真正看过大竞技场还有其他残存

的罗马遗迹时，我就跟随亨利克·显克维支看过基督徒被投喂给饥饿的狮子，尼禄荒淫无度，罗马城被大火吞没；哈里特·比彻·斯托让我感受到遥远的美国南部奴隶的痛苦，唤起了我内心深处一种奇怪的同情，但是在当时，我并不愿意承认那是一种近亲之情。米盖尔·德·塞万提斯让我支持堂·吉珂德疯狂追求骑士荣誉。查尔斯·狄更斯让我如亲临般感受工业革命时期老英格兰对儿童的可怕虐待。阿瑟·柯南·道尔让我跟着夏洛克·福尔摩斯，在伙伴华生医生的陪伴下，走过19世纪雾都伦敦的鹅卵石街道，作为大侦探搜寻神秘罪案的线索。早在我亲眼看到北美最磅礴的河流之前，马克·吐温就让我跟着哈克贝利·芬和奴隶吉姆一起乘木筏沿密西西比河漂流而下。维克多·雨果让我在刽子手代表法国自由党行刑时战栗不已。早在我有机会乘坐豪华游轮游览热带岛屿天堂之前，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就让我与海盗恶棍和傲慢的英雄们一起航行在七大洋上，追寻隐藏的宝藏。

讽刺的是，在我性格形成初期，我最喜欢的书还是那些有关西格菲尔德的德国传说，这个最伟大的公平骑士，成就了民族主义者的大多数种族神话。古代骑士最令我着迷的是他们的铁衣荣誉守则，即使面对死亡，他们也会遵守它。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是——绝非巧合，日耳曼诸神中最有男子气概的——战神托尔，愤怒时挥舞着会发出光和电的魔法锤在天空中巡游。

幸亏有了这些书，我得以随意从日常生活的痛苦中抽离出来，毕竟书中的世界，虽然有危险，却很公平，好人会得到奖励，坏人会被惩罚。阅读，给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缓冲地带，帮我抵御维希德之流永不停息的种族攻击，帮我把他们对我的影响减到最低。

在我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的时候，阅读就已经成了我不可或缺的求生工具。

智慧之言

在众多可以定义我母亲的性格特征中，最显著的一个就是她那无可救药的乐观。最明显的表现她对我的高期望，虽然在纳粹的种族法规下，我的前途一片迷茫。什么东西也动摇不了她的信念：除了种族，我有着非凡的潜力，某一天——无论纳粹还存在与否——我都能有所成就。从法缇玛姑姑那里得知利比里亚缺少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后，她决定，我应该做一名工程师，有一天能帮助利比里亚人，建造他们急需的桥梁和道路。虽然我的数学分数在我的成绩单上是最低的，但她说服了我，工程师的职业生涯是我唾手可及的，只要我努力去学。为了鼓励我，她会说，“如果你想变成一个钩子，你就得尽早开始弯曲。”

她对宗教充满了厌恶——这种厌恶也早在我心中浮现——她深信，你可以天天去教堂祈祷，祈祷到脸色发青，能用五种语言把《圣经》倒背如流，你依旧有可能不是一个好人。她认为，要做一个好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善待你身边的人和动物。她不曾有规律地去教堂，直到中年时她嫁给了一个虔诚的塞尔维亚东正教教徒，然后才积极地参与到她丈夫的宗教仪式中去。她不在意宗教教条，却掌握着源源不断的谚语、歌谣和格言，她尽可能遵照它们。人生的每个场合都可能会需要一条——关于如何管理金钱，如何对待朋友，为什么要守时，等等。这是她母亲留下的遗产，她决心要传给我。我刚上一年级的時候，就已经知道“谎言是站不住脚的”，尤其是在被发现撒谎的时候。当她想要教导我过正直的生活都有什么益处时，她会说，“问心无愧，高枕无忧。”为了让我变得谦逊、礼貌，她会说：“脱帽致

敬，你可以环游整个世界。”为了不让我欺负同学，她会警告我，“搬起石头，会砸着自己的脚。”当我因为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值而不珍惜一份礼物时，她会提醒我，“不尊重一分钱的人，不配得到美元。”虽然它们不像《十诫》，没有什么宗教背景，但这些凝结了德国民间智慧的小格言却非常有效，在我长大后，我非常努力地传给我的两个儿子。今天，没有什么比听到他们引用他们奶奶或我的话表达观点更让我开心的了。

她拥有非常强大的幽默感，发自内心地喜欢有趣的事情，即便是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她很喜欢一遍又一遍地讲自己曾经秃噜嘴把纳斯（Nase）教授说成鼻子（Nose）教授的事。

穆缇热爱唱歌——从歌剧咏叹调到电影和轻歌剧的小曲，从民歌到她年轻时的流行歌曲。她最痛惜的事情之一便是自己没有一把好嗓子。这一自我认识或许是真的，却丝毫没有阻止她令我们的公寓飘荡着歌声，不管她是在打毛衣、钩花还是洗衣服。“有音乐的时候，安静下来，”她会说，“因为邪恶的人可是没有歌听的。”

她非常慷慨，不遗余力地帮助身在痛苦中的朋友。她不止一次把自己的床让出来，睡沙发，给婚姻有问题的朋友提供临时住处。任何向她求助的朋友都会得到她的帮助。另一方面，她又是个勇敢、固执、好斗的女人，不怕挑战任何人，只要是她觉得对她或者对我不好的人。不过，要是她曾经信任的人在大事上惹恼了她，她就会把那个人永远赶出她的生活，再也不可能和好。她的想法是“垃圾只配和垃圾桶在一起”。

韧性，令她得以度过漫长人生的起起伏伏。每当有人注意到她从逆境中恢复的强大能力时，她就会坚定地打趣道，“野草是扑不灭的。”

虽然她谁也不怕，但她很受别人喜欢，反过来，她也喜欢别人。周末，我们小小的阁楼里经常坐满了她的朋友，大多数是医院和工厂的同事。大家聚在一起，度过愉快的夜晚，聊天、唱歌、欢笑、吃东

西、喝咖啡，都是她喜欢的消遣。在寒冷的冬日夜晚，她会给朋友们做上一杯热热的甜红葡萄酒，或者一杯用热水、柠檬汁、糖和肉豆蔻做的热饮，每个人都很快唱起歌来。一切都变得生动而活泼。在我睡觉后不久，大家会感谢和她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然后各自回家。

穆缇的核心圈子

虽然穆缇对天主教有偏见，这还是在她小时候，她的母亲根植在她内心的，但她最好最亲密的朋友罗塞尔·简斯达，却是个高大丰满、红头发的坚定天主教徒。这让我觉得，她偶尔说到天主教徒是不可信任的，也就是随便说说，不能当真。罗塞尔说一口巴伐利亚旧式土话，我很难听懂。她从巴伐利亚乡下来到汉堡不久，就跟我母亲一同被巴姆贝克的硬橡胶工厂招进去当新手工入。

然后是利兹贝斯·施罗德。利兹贝斯只有一个人生目标，那就是找一个丈夫，多年的追求已经变成一种耗费心力的执念，经常令她丧失常识。黏人的利兹贝斯，虽然只是母亲以前当护士时的助手，绝对算不上好朋友，甚至连好玩伴也不是，但她却如此依恋母亲，以至于母亲发现根本无法摆脱她。利兹贝斯从来不接受拒绝，不断来我家，直到她也变成了母亲社交圈的一分子。

穆缇的好友圈里还有艾尔娜·施密德曼，“脱衣舞事件”主角小艾丽卡的母亲。我叫她“艾尔娜阿姨”，跟别人一样，劝说母亲不要因为被解雇而在医院树立不必要的敌人。她知道她在说什么。她的丈夫沃尔特，我母亲在医院时的同事，在希特勒掌权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人员。几个月前，他被新政权的秘密警察盖世太保抓捕，没有经过审判就被监禁了。每次母亲和艾尔娜阿姨说起沃尔特叔叔的命运，我都知道。艾尔娜阿姨会默默地抽泣，她们会压低声音，很明显

不想让我听到她们在说什么。而我的好奇心却更加重了。我假装对她们的谈话不感兴趣，然后这儿听一点，那儿听一点，零零碎碎拼凑在一起，就对沃尔特叔叔的事情很清楚了。我了解到，沃尔特叔叔是在半夜被两个便衣警察带走的，关进了福尔斯布特尔郊区的一所监狱，罪名是分发反纳粹的小册子。“我知道他们打了他，”我听到艾尔娜阿姨告诉我母亲，“因为上次他们允许我探视时，我看到他脸上的伤痕。”她还怀疑他们用铁链铐住沃尔特叔叔的手腕和脚踝，因为发放囚服后她带回他的个人衣物时，发现他的袖管和裤脚处都有铁锈印。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沃尔特叔叔会被惩罚，如果真的像艾尔娜阿姨多次坚称的那样，他没有做错任何事情。当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去问母亲时，她竭尽全力地解释，他被关进监狱，并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他不服从政府。

这个解释令我更加糊涂了，毕竟每个人都知道，政府——也就是希特勒——从来都是对的。困惑不解的我问，为什么沃尔特叔叔会不服从他？母亲向我保证，等我长大一点，会再跟我解释，那时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同时，她还要求我不要跟任何人谈论沃尔特叔叔，尤其是在学校里。

艾尔娜阿姨许多次跟我母亲说，她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能让她的丈夫重获自由。最后她想到一个主意，让艾丽卡加入德国女青年团，也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女子版，等到她在里面混到主管以上的职位后，可以为父亲说几句好话。虽然在当时看来，这个计划非常不切实际，但最终却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被监禁了四年之后，1938年，在艾丽卡——当时是女青年团的模范人物——不停给总理府写信请求释放她的父亲之后，沃尔特叔叔终于被放了出来。然而，未来的汉堡参议员沃尔特·施密德曼在二战开始后又被逮捕，被迫在一个集中营里度过了二战那几年。这一次，艾丽卡为父亲求情的信写到了党卫军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那里，却如石沉大海。

麦克斯叔叔

我的母亲，乌黑的头发，褐色的眼眸，蔷薇花一般的脸庞，是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她吸引了许多男人。只要我们一出门，就能看到他们围绕在她身边，就好像蜜蜂围着花朵一样，我早已经习惯了。当他们说“你那美丽的母亲”时，我还觉得很有面子。偶尔在星期天，会有个幸运的家伙被邀请来跟我们一起喝下午茶，不过，除非有我的批准，没有人会有第二次机会。

恩特·麦克斯·沃尔兹，是一个离异男人，是我母亲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他在医院的厨房工作。我快五岁的时候，她把“麦克斯”叔叔带回家，介绍给我认识，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温和的大个子。他的头发是棕色的，卷卷的，双手又大又灵巧，似乎什么活都会干。他走路来一瘸一拐，因为他的一条腿比另一条腿短。母亲说，这是天生的缺陷。我很快就接受了，觉得这很正常，我觉得他也接受了我的肤色。

多才多艺的麦克斯叔叔会弹班多钮琴，一种正方六角手风琴，还会弹琵琶和吉他。他还能像个专业的画家一样画肖像，最重要的是，他还会骑摩托车，在周末的时候带着母亲和我去远足。夜晚，他会让我们的家里飘荡着音乐声，会给我们读书，教我怎么画或者怎么制作一个飞机模型。

一天，麦克斯叔叔宣布，在他做木工的弟弟的帮助下，他要自己建造一艘三十英尺长的帆船。母亲和我们都习惯了麦克斯叔叔的无所不能，好多个周末，我们都亲眼看着麦克斯叔叔是如何一块木板一块木板地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大约一年过后，我们帮他给新船试水。

他给船起名叫“卡尔号”，用的是他弟弟的名字。然后我们看着麦克斯叔叔扬帆启航，他的技术娴熟得像是专家。在那之后，夏天的每一天，我们都去航海，每次回来，都会在麦克斯叔叔加入的阿尔斯特帆船俱乐部里跟朋友们度过一个小时的欢乐时光。

在我看来，麦克斯叔叔和我母亲是完美的一对，我盼望着有一天，我喜欢的这两个人能走到一起，麦克斯叔叔能当我的父亲。但这是不可能的。我随便想想也知道，我就是麦克斯叔叔不肯跟穆缇结婚的原因。

我一向都知道，麦克斯叔叔虽然不是纳粹党员，但他是希特勒的虔诚拥趸，赞同纳粹所做的一切。当时幼稚又无知的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被洗脑的。穆缇知道他对希特勒的迷恋，平常总是刻意避免与他谈论政治，除了在一次纳粹惯常的假选举之后，她告诉他，她没有给希特勒投票。

“你是想跟我说，你没有给他投票，他为德国付出的可比世界上所有人都多！”他不肯相信地大喊，激动的声音是我以前从未听过的。

这一番话只是结局的开端。渐渐地，随着希特勒的影响日益加深，麦克斯叔叔在我们的生活里出现得越来越少了，直到再也不带我们去航海，也不跟我们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最后，我母亲受够了。一天晚上，我上床睡觉后，被客厅里穆缇愤怒的声音吵醒。“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她喊道，“你的纳粹兄弟们有的时候，你怕我们给你丢脸。好吧，你再也不用感到丢脸了。我想让你滚出去，再也别来了！”

我再也没有见过麦克斯叔叔。失去我的英雄——教会我所有为父之道的人——留下的是痛苦的空虚，伴随而来的，还有深深的被背叛的感觉，这一切过了好多年才慢慢消散。比他的离开让我受伤更深的，是他离开的原因。不管母亲多么努力地劝说我，这事不怪我，在我内心深处，我还是知道，这个我当成父亲一样来敬爱的人，这个我以为把我当儿子一样疼爱的人，是因为再也不愿意承受被人看见与我

在一起的耻辱而离开的。

罪与罚

清清白白地长大，不是我的选择，而是母亲定下的不可更改的铁律。她在一个大家庭中长大，大家长也就是她的母亲，勤劳而严肃，所以她也不能容忍坏行为。她从不吝于对我说“不！”，当她觉得这对她给自己设定的主要目标——把我培养成一个正直的人——是必要的时候，她就会坚持己见。

有时候，她向我灌输价值观的方式新颖又有效，给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很快就意识到，她那正义的方向盘转动得是如此灵敏而冷酷。我还是个五岁小孩儿时发生的一件事令我记忆犹新。

当时我们去看望她的一个护士朋友，那家的儿子库尔特，跟我差不多大。母亲们聊天的时候，我们就在角落里安静地玩库尔特的玩具士兵。后来我们就回家了。走出去大概五分钟，母亲就发现我的口袋鼓出一个小包。“你口袋里的是什么？”她问我。

“没什么。”我心虚地回答。

“给我看看。”母亲坚持要知道，她伸手去掏我的口袋。

“你说这是没什么？”她举着一个小玩具士兵说。“那这个玩具是怎么到你口袋里去的？”

“我不知道。”我无力地说。

“你是个小偷，我会让你去小偷应该去的地方——监狱。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得回去找库尔特，偷了他的玩具，你得跟他道歉。”

偷东西和撒谎都被抓了现行，我觉得非常丢脸，只能跟着她回到了她朋友的家，把玩具士兵还给了库尔特，乖乖地道了歉。不过，最糟糕的还在后面。回家路上，母亲押着我径直走到附近的警察局，找

到了值班的警察。

“警官，你说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偷了朋友的玩具士兵的小孩呢？”

警察低下头，久久地盯着我，目光里的威胁意味让我后脊梁发冷。“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跟其他罪犯一起关起来。”最后他说。

这下我吓坏了，开始大哭，求警察和母亲饶了我。作为回报，我跟他们保证，我再也不会偷东西了。

“我跟你说吧，女士，”警察建议说，“我们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你再抓住他偷东西，只要给我打个电话，我就会立刻把他抓起来。”

警察冲我母亲眨了眨眼，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他告诉我，至少这一次，我可以走了。母亲这个富有创意的教育方式让我觉得，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后来，我再也没有给母亲机会把我带到那个警察面前。

量入为出

亲眼见证自己的母亲成功地带大九个孩子（另外两个还在婴儿时期就夭折了），我母亲从来就不认为我们的境况有什么特别的困难，或者认为我们是穷人。虽然薪水微薄，但靠着精打细算和高超的讨价还价技巧，她还是可以给我们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有质感的衣服，有营养的膳食，甚至是偶尔的奢侈，比方说去看一场电影。

跟她那一代的大多数德国女性一样，她尽力避免借债，确信“借债毁终生”。因此，她从不借钱买东西。但她却是分期付款的坚定支持者。我们家里所有大件家具都是这样买来的，包括带给她骄傲和欢乐的脚踏式缝纫机，不用的时候被我们当成小木桌。我们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花钱买来的，她感到既快乐又自豪。

比方说，我母亲教会我，要延迟满足自己的欲望。当时我最想

要的是一辆自行车。有一天，她给了我一个惊喜，告诉我她已经在市中心的自行车店付了首期款，预定了一辆自行车，虽然是二手的，车况却还很好，因为她看见过我在橱窗外面盯着它看。每周去交分期付款时，她都会带着我，让我有机会看看摸摸这辆有一天会属于我的自行车。我早就用小伙伴的自行车学会了骑车，为这件大事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每次去商店，都增加了我的耐心，却没有消减我的参与感。在付清最后一笔款的那一天，她带上了自己的自行车，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骑车回家，庆祝我的收获。我已经想象了无数次第一次骑上自己的车，但真的骑上去，我感受到的快乐还是远远地超过了想象。连着好几个礼拜，我都觉得骑着的不是两个轮胎，而是云朵，直到我渐渐习惯了这车是属于我的，这种满足感才慢慢消失。

拥有一辆自行车，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以前我总是被局限在家门口的社区，偶尔才会坐电车去趟市中心，突然之间，我有了交通工具，可以去城市及周边的任何地方。所以，每天写完作业后，我都会约上一个或几个有自行车的朋友，一起去探索这个城市。星期天，如果天气允许的话，母亲和我就会骑车去汉堡周边那些风景如画的森林村庄，在森林里挑一块干净而舒服的地方野餐，我们会吃三明治，读自己喜欢的书。对穆缇和我说，跟大自然母亲在一起的这几个小时的时光，是我们安静生活的缩影。我们骑车穿过小城镇，看着镇上漂亮的房子和整洁的花园、菜园，开始了我们最喜欢的消遣，那就是做白日梦，梦想有一天我们会住进自己的小房子。除了中上层阶级，我们没有听说过谁能实现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拥有自己的房子。

重游萨尔察

我还是会去萨尔察过暑假，但如同德国的一切，自从纳粹掌权

后，萨尔察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不再是我以前了解热爱的那个友善、田园诗一般的小村庄。曾经跟我一起玩耍的男孩们已经成了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跟我在汉堡的同龄人不一样的是，他们非常明显地排挤我。他们的农民父亲们，工作日时穿沾染了粪便的外套，周末却会换上褐色的冲锋队制服和锃亮的马靴，趾高气扬地转悠，显得自己很重要。很明显，希特勒的“务农是国家最光荣的职业”已经深入人心。除此之外，他们还被告知——他们也相信——因为他们纯正的雅利安血统，他们是高人一等的。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向希特勒和他的政策证明自己的愚忠。

萨尔察是个小镇，只有几百个居民，那就意味着，干预别人的政见成了他们每天的工作。这样一来，格里特舅妈收到了无数严肃的质问，为什么每年夏天她和她的家人都会收留一个小男孩，说是亲戚，却长得像非洲难民。有一次，我偷听到她跟卡尔舅舅说隔壁家的女人是多么的两面三刀。在纳粹掌权前，那个女人经常让我试吃她亲手做的蛋糕和其他点心。她的丈夫从卷烟厂低等工人一跃成为周末的纳粹大人物。她把格里特舅妈拉到一边，“绝密地”说，她有非常可靠的消息，确切地知道，让我在他们家过暑假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格里特舅妈跟她说，我是她丈夫的血亲，她绝不会拒绝丈夫的骨血，不管是谁看不惯。

在我回汉堡的前一天晚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奇怪的场面。几十个年轻小伙子戴着万字徽章，排队走在萨尔察主街上，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唱着德国传统告别民歌《我必须出城》。显然他们都喝多了，有些人踉踉跄跄地进出于酒馆，有些则挥拳打在商店的橱窗和门上。我问卡尔舅舅这是怎么回事，他说，这些年轻人刚刚通过了劳务局的审查，先强制性地干上一年建筑工，然后会去军队里服役。这可能是他们当平民百姓的最后一个晚上，卡尔舅舅解释说，警察通常不会管他们，让他们最后狂欢一次。

“为什么不得不离开家乡，去参军，他们还这么高兴？”我想知道。

“因为穿上国家的制服，是一种荣耀。”反纳粹却参加过一战的爱国老兵卡尔舅舅说，“有一天，等你长大了，你也会成为一名士兵。”

卡尔舅舅是对的，不过当时，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有想到，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宁愿穿上美国军队的橄榄色军装，而不是德国军队的灰色制服。

我已经决定，明年夏天不再来萨尔察，不过这个决定纯粹是无意义的，因为转年暑假，我母亲去给我登记暑假项目时，被告知只有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才有资格享受免费的度假火车。卡尔舅舅和格里特姨妈坚持让我去，他们来花钱，但我母亲不肯。就这样，我童年时期最欢乐的一个阶段结束了。多年后，我再次回到萨尔察，是在完全意外并且截然不同的情境之下。

镜子，墙上的镜子

要过很多年，我才能彻底理解，并允许自己相信，希特勒是个极度邪恶、道德败坏的精神病。在那个时候，我拼命地抓住政府打造的希特勒的形象——半人半神，德国人的救世主。每次我被他的爪牙伤害到心理崩溃后，我都会为他开脱，认为这只是元首的下属越过了他的权威，打着他的旗号做坏事。我做不到把种族政策归咎于元首。只有在多年之后，我成熟了，并且受尽了冷眼、羞辱和心理上的残忍对待之后，我才能够真正看清希特勒的真面目，才知道他才是我人生难题的始作俑者。要等到我十几岁之后，我才知道这可怕的事实。在那之前，我都没有把这些问题怪在种族主义者的头上，我只是责怪我自己。尤其是我的外表——尤其是我的非洲头发，我恨我的头发。虽然我发过誓，不让维希德看我的笑话，但他和其他老师针对我的心理战

又一次卷土重来。在充满憎恨的“黑鬼”和同样羞辱人的“杂种”这种词语的攻击之下，我的自尊被打压得低得可怕。

一个经常跟我玩的女孩告诉我，我戴帽子更好看。我飞奔回家，做了那件有段时间没做的事情，那就是，照镜子，长时间照镜子。要说我不喜欢镜子里那个我，还是轻的。用我粗暴而客观的眼光来看，镜子里那个看着我的男孩，简直是丑陋不堪。他的鼻子比“正常”男孩的短粗不少，他的皮肤，虽然比其他男孩的皮肤光滑，却黑上了好几个色号，晒都晒不成这么黑。最糟糕的是这一头奇形怪状的卷发。在我看来，每天都是糟糕的发型日。戴帽子戴了一段时间后，我认为，那个女孩说得对；把头发遮起来，最大限度地减弱了我的非洲相貌，因而改善了我的外表。

我坚信，只要头发是直的，我的一半问题都能解决。我偶然看到一些信息，貌似可以永远改变我的人生，我感到欣喜若狂。我在一本探险书里看到，非洲某个部落的人把头发浸泡在一种液体混合物里（某种物质会像糖一样融化在水里），就可以把头发弄直。所以有一天放学后，我开始了一个奇怪的秘密任务，想要用我的直发让母亲吓一大跳。第一步，我把母亲糖罐里的糖倒进一个装了水的小锅。接着，我用一个勺子搅拌均匀后，放到煤气炉上去煮。等到糖浆冷却后，我把它当做洗发水一样揉在头发上，再用毛巾擦掉多余的部分，然后耐心等待奇迹发生。等待的时候，我幻想着头发直了以后我的新生活会是怎样的。前不久我刚看过《大象男孩》，我觉得我以后肯定会很像萨布，那个漂亮的印第安小伙，他在丛林里的故事让他成了德国影迷心中的宠儿。我决定了，等我的头发变直，我肯定要把它留长，但绝不可能像萨布那么长。我一边做梦，一边用手指在头发里划来划去，想看看是不是有什么变化。的确，有变化。抹上去的东西越是变凉，我的头发就越黏越恶心，直到变成一团胶水一样黏糊糊的东西。我等了一个多小时，也没有等到想要的结果，只能断定这次实验

是一个惨淡的失败。

幸运的是，在热水下冲了好几次之后，我的头发终于恢复到本来的面貌。但是失望引起的情绪崩溃要恢复起来却难得多。起初，我不打算告诉母亲，但她回到家后，要求我对湿哒哒的头发和她空空如也的糖罐做出解释时，我改变主意，向她坦白了。

她没有因为我浪费了一罐糖而生气，而是告诉我，她是多么难过，因为我不喜欢我的头发。“不管你知不知道，你的头发非常漂亮。”她试着安慰我。

“你说得轻巧。”我指着她浓密的波浪一样的棕色头发说，“你跟所有人一样都是直头发。”

“要是可以的话，我可以把我的头发给你。我真希望我可以，如果这样能让你开心的话。”她说，“但我给不了。所以你只能学着喜欢你现在的头发。有一天，等你长大一点，你会懂的，也会同意我说的，你的头发很漂亮。”

在那个时候，母亲说什么，都没法让我对自己的头发还有长相感觉好一些。怎么可能呢？上一次我听到别人夸赞我的长相，好像是一辈子之前的事了，而最后一次我听到别人轻蔑的评论，却就在当天下午。

然而，我的外表有两个方面，让我不仅仅是喜欢，实际上更多的是引以为豪，虽然它们可能是种族特质。一是我的体型。虽然我只是中等身高，但却有着匀称的身材，肌肉结实的四肢。另一个就是我的牙齿，它令我备受夸赞，尤其是在学校每年的牙齿检查时。做检查的牙医会让全班同学包括老师，排好队，对我的嘴一探究竟，“见识一下真正完美的牙齿是什么样的。”对我来说，这场张着嘴巴的游行，是我一年一度的荣耀时刻。不过，没有什么是永久的。有一天，我的年度牙齿展览戛然而止，因为牙医发现我的一颗臼齿上有两个小洞，我那“真正完美的牙齿”神话终于结束，这让我失望之极。

我曾经有个小伙伴

我最不喜欢的同学里面，有一个叫埃贡·法伯的，是个信奉阶层主义的小丑，他的父亲是一个纳粹大官。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反纳粹的偏见，所以我不喜欢他，并不是因为他父亲。我很看不起他，因为他总是让我心烦。他从不停止炫耀，不放过任何一个博得关注或是笑声的机会。在惹人讨厌这个方面，他总是能别出心裁。有一次，他甚至把水从二楼教室窗户倒在操场上，为的是逗乐班上的同学。

按照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的做派，要不是他父亲的影响力，他肯定会遭体罚的。我们这些孩子都憎恨他能豁免于体罚。

大多数时候，我都躲着埃贡，像躲瘟疫一样。这种反感似乎是双向的，因为他也躲着我。直到有一天，他撞上了我，给我造成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影响。那时候，我们都只有九岁，上四年级。事情发生在操场上，课间休息快结束的时候。我们遵守学校规定，全神贯注地列队等候老师的指令回教室。站在我前面的埃贡，像往常一样嘻嘻哈哈的，去挠他前面男孩的胳肢窝。前面男孩突然转过身，吓得他赶紧往后躲，他那坚硬的、剃着平头的金色后脑勺撞到我的左眼。冲击力如此之大，我的眼睛立刻肿得睁不开了。我忍着剧痛闪开，准备给埃贡来个报复性的还击，却被一个赶来查看的老师脸上严厉的表情吓住。那一刻，我能做的只是发出威胁的嘘嘘声，“我会让你好看的”，我对似乎还不知道自己造成了多大伤害的埃贡说。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我的眼睛变得又青又紫，似乎每个人都被逗乐了，除了我，我对埃贡的怒气越来越重。我发誓第二天一定要在学校报复埃贡。但事实证明，这个誓言我非但不能遵守，后来我还会希望自己根本没有发过

这个誓。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教室，打算一见到埃贡就挥拳揍他。我到处找他，却没有找到。我猜他显然是拿我的警告当真了，故意躲在家里。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正要开始点名，门开了，一个高年级男生进来了。他和老师说了几句话，我们谁也没听着。突然，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明显是被男生说的话震惊了。恢复镇静之后，他对全班同学说，“孩子们，我有个悲伤的消息。我刚才听说我们的同学埃贡·法伯死了。昨天放学后他意外把自己打死了。”说完后，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就宣布放学了。

埃贡的死讯让全班都陷入了悲痛与沉默。老师的话击中了我。我确信，虽然我不是扣下扳机的那个，但我应该为埃贡的死负责，因为在前一天学校操场的事件中，我给他留下的是盲目的憎恨。我痛苦地想，我应该跟他说，别担心我的青紫眼圈了，我知道他不是故意撞我的，我原谅他了。但我意识到，我再也没有机会对他说这些了，接下来的人生，我都要想着，他从我这里听到的最后的话语居然是饱含怨恨的威胁。突然之间，我对埃贡长期以来的讨厌都消失了，仿佛从未存在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无法抵抗的情感，把他当成一个亲爱的朋友来悼念。

当埃贡去世的细节传遍大街小巷时，我们才知道，枪击发生在大约下午四点，在他家公寓大楼的入口处，离我家走路只需要五分钟。那天似乎是放学之后回到家，埃贡偶然在抽屉里找到了他父亲的配枪。他很小心地藏在身上，不让母亲发现，然后带着枪，下楼来到街上。他找来几个玩伴，说他要做一次特别的表演。那些孩子被他承诺的好玩所引诱，跟着他来到走廊。他挥舞着枪，摆了几个“举起来”的姿势，用枪指着一些孩子，甚至有几次还扣动了扳机。不过什么事都没发生，显然是因为枪的保险还开着。

那个时候，他母亲已经发现丈夫的枪不见了，怀疑是他拿了。她

冲下楼梯喊道，“埃贡，埃贡，把枪给我！”看见母亲出来，埃贡打算交出枪——但没有最后检查一下枪管，又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枪的保险关上了，子弹射了出来。子弹从他的右眼穿过去，几秒钟，埃贡就死在了母亲的怀里，他那些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情的玩伴们都惊恐地看着。这个千方百计博关注的孩子终于为炫耀付出了最后的代价。

复课后，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通知我们，埃贡的父母要求全班同学都参加他的葬礼，在葬礼上，我们要唱《好战士之歌》，德国传统军队葬礼歌曲。一连三天，每天好几个小时，我们都在排练这首歌，直到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满意为止。

在葬礼的当天——我第一次参加葬礼——我们被公共汽车拉到汉堡郊区的奥尔斯多夫公墓。这里被誉为欧洲最大的公墓。我们站在新挖掘好的坟墓旁，相比之下，棺材看上去非常小，我想，小到似乎装不下我们这位同学的遗体。在棺材的另一边，面冲着我们的，是埃贡那面无表情的父亲和止不住哭泣的母亲，还有他眼泪汪汪的姐姐。只要想到终结埃贡生命的那把手枪是他父亲的，我就不寒而栗。

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讲了几句话，接着是路德教会牧师主持的简短葬礼仪式，棺材被放进坟墓里，而我们这些学生则唱起了排练已久的告别歌曲。

葬礼后几天，我的眼圈依旧是青紫的。不过人们不再嘲笑我，而是肃然起敬，我骄傲地展示着，仿佛它是一枚荣耀的徽章。对我们所有孩子来说，埃贡的死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因为他是我们年幼的生命里经历的第一次死别。我眼睛上的青紫伤痕有了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埃贡曾经存在于我们中间的最后证明。我热切地希望，我们刚刚埋葬的男孩与我之间这种奇怪的联系永远不会消失，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不断变淡，直到有一天早上，我发现，它全都不见了。那一刻，我才悲痛难抑地意识到，埃贡·法伯，我曾经看不起的班级小

丑，永远离开了我的生活。

寻求皈依

希特勒掌权后不久，就让人们知道，那些拒绝接受纳粹意识形态的顽固分子属于即将被废除的旧秩序。无论家长的政治信念如何，他大言不惭地说，他都要拥有他们的儿子和女儿绝对而不朽的忠诚。“德国的年轻人，”他吹嘘说，“将属于我。”

为了实现他的愿望，整个德国的学校都被要求增加精心设计的流程，用来招募学生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活动。学校被他们施行了兵工厂式的可视化管理——图表、幻灯片、纪录片和故事片——由戈培尔的宣传部大量炮制，不遗余力地来争取年轻人。有一部叫做《希特勒青年奎科斯》的电影，在我们学校的民俗课上放映，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悲剧故事，讲的是一个名为奎科斯的金发碧眼的英俊少年，出身于著名的共产主义柏林贫民窟。他的父亲，一个酗酒的共产党支持者，平时要么就喝得醉醺醺，要么就虐待老婆，由当时德国著名演员及希特勒的公开崇拜者海因里希·乔治扮演。

奎科斯临时从身边丑恶的环境中逃离，悄悄参加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次远足，一次悠闲的童子军露营。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同志之情，跟朋友们一起围绕在篝火旁。回到他那毫无希望的社区之后，他就转变成了一名希特勒青年，积极为纳粹事业奔走。在散发纳粹传单时，奎科斯被他父亲的共产党同伙逼到墙角，他被指责为叛徒，然后被捅了一刀死去。奎科斯躺在他的新纳粹同志怀里时，希特勒青年团赞歌响了起来，“前进，前进，”——纳粹党领袖鲍尔杜·冯·席拉奇亲自作曲——他成为这场活动最年轻的殉道者。

这部电影给我这样一个年仅十岁、易受影响的非雅利安心灵留下

的印象，跟给我那些雅利安同伴留下的印象一样深刻。我知道是因为影片结束后，幕布升起时，观众席里一片擤鼻子和抽泣声。

多年后，我才发现，这部电影传递的信息，纳粹的美德和共产党的罪恶，都是对事实厚颜无耻的扭曲。真相就是，在争夺德国统治权的许多血腥冲突中，纳粹分子和共产党都随时准备使用暴力，粉碎他们各自的对手。

在支持纳粹的维希德的掌舵之下，凯特勒坎普学校激进地为少年队——希特勒青年团下属的组织，由十到十三岁大的孩子组成——推进教化和招募工作。少年队的成员被叫做“小鬼头”。没有一天我们不被我们的老师或维希德本人耳提面命，作为一个德国男孩，不参加运动的人生根本算不得人生。维希德一心一意地追求自己的目标，不断想出新的噱头和花样。有一天，他宣布了一个最新的想法，举办一次全校比赛，第一个百分百加入少年队的班级将被奖励一次放假。

这个消息一经宣布，我的新班主任舒尔曼先生就入了迷，疯狂想要让我们班赢得这个奖项，让他自己得一些好处。为了这个目标，他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推销员，把自己——还有我们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劝说、哄骗或者说引诱我们班加入纳粹阵营。他管理招募活动的核心文件是一张大表，他用白色粉笔仔细画在黑板上。那是一个大方格，被分成许多小方格，每个小方格代表一个孩子。每天早晨，舒尔曼先生就会问，谁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有人举手后，他就会清点人数，然后高兴地把新的加入者添加在他的表格里。渐渐地，标上了名字的方格越来越多，超过了那些空白的方格。

在那个时候，我对待这场比赛是持某种超然的态度，因为我的一些同班同学，包括我的好朋友们在内，都表明他们对希特勒青年团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兴趣，不会加入，不管维希德或者舒尔曼说什么。这对我来说很好，因为我也不想参加。但是，在舒尔曼无休止的压力之下，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屈服加入了。

一天早晨，空白的方格只剩下几个了，舒尔曼先生开始质问这些人，为什么他们对“元首和祖国缺乏热爱”。有些同学解释说，他们对元首和祖国没什么意见，只是对少年团的活动不怎么感兴趣，比方说露营、游行、吹号角和喇叭、打中世纪风格的鼓等等。有些人说他们没有得到父母的允许，于是，舒尔曼先生让他们把父母叫来开会。等到我以为轮到我解释的时候，我张嘴要说话，但被舒尔曼先生打断了。“没事，你不用参加比赛，因为你没资格参加少年队。”

老师的话像一道闪电一样击中了我。没有资格参加？他在说什么呢？我本来打算跟他说，我还没想好是不是要参加。现在他是在跟我说，即便我想参加，我也参加不了。看到我一脸困惑的表情，舒尔曼先生让我下了课之后立刻去见他。

直到下课铃声响起，我还是沉浸在震惊之中，根本不知道大伙都说了些什么。我觉得我被朋友们背叛和抛弃，我害怕成为班上唯一一个名字不能出现在那张表里的人。在十岁的年纪，我跟同龄人一样坚强，街头打闹时他们出什么招我都不怕。然而我不能忍受的是，那种我不属于集体——被驱逐，实际上就是在说，我不仅是与众不同的，还是低人一等的。

舒尔曼让我坐在他桌子旁边。“我一直以为你知道你不能加入少年队，因为你不是雅利安人。”他说，“你知道你父亲是个非洲人。根据纽伦堡法案，非雅利安人不允许参加希特勒青年团。”出于仁慈，或许是为了不伤害我的感情，他没有提到那些备受诽谤和鄙视的犹太人。

“可我是德国人。”我抽泣着，眼睛里都是泪水，“我母亲说我是德国人，跟所有人一样。”

“你是德国孩子，”舒尔曼先生难得地流露出同情，说：“但可惜的是，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太懂他的意思了，没有接着恳求。

“很遗憾，我的孩子，”舒尔曼先生要结束这次谈话，“我希望我

能帮你，但我什么也做不了。这是法律。”

那天晚上，看到母亲的时候，我没有告诉她学校里发生的事情。相反，我请她跟我一起去附近最近的少年队俱乐部，离我们家就一个街区远，这样我就能加入了。因为我从未表达过任何要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想法，所以她也不认为有必要给我增加思想负担，怕我会被拒绝。我这个突然的决定完全出乎她的意料。她试着说服我放弃，甚至暗示说他们可能不会要我。我抓狂了，告诉她我就是要加入，因为我不要做班上唯一一个没有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但她依旧觉得这不是一个好主意。“请带我去。”我乞求着，几乎是歇斯底里了，“或许他们可以破个例呢。求你了！”

母亲拿我没有办法，最后还是妥协了，答应尽她所能帮我入团。我们到俱乐部——一栋长长的一层石头房子时，那里正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到处都是准军事突击队队员。透过一间像教室一样的会议室的大门，我看到一群男孩，大多数都跟我差不多大，围在一个长条桌旁，显然是在听一个突击队队长讲话。他们穿着整洁的制服，黑色短裤，黑色束腰上衣，里面是卡其色衬衫，脖子上围着黑色的围巾，围巾是用皮制领结固定的。我羡慕地注意到，大多数人都佩戴了刻有希特勒青年团万字标记的小黑佩刀。自从在家附近的制服商店橱窗里看过它，我就悄悄渴望拥有一把这样颇具仪式感的武器。即便是刻在它锋利刀片上的“血与荣耀”搅乱了我的心，我完全没有注意到它的含义。我知道，一旦我被批准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就什么也阻止不了我拥有一把希特勒青年团的佩刀。我太想要它了，甚至可以感受到它就在我手里。

一个“小鬼头”看到了我，我立刻就成为了他们窃笑的对象，直到突击队队长被吵得心烦，喊道“安静！”然后关上了门。我母亲让我们身边经过的一个“小鬼头”告诉我们哪位是负责人，他立刻两脚并拢，指着一扇门，门上写着俱乐部部长。母亲敲门后，里面传来一

个很有穿透力的男声，“进来！”

“希特勒万岁！你们有什么事？”一个英俊的大概只有二十岁的男人问，他穿着希特勒青年团中级干部的制服，坐在桌子后面。他让我想起我曾经的“保镖”沃夫冈，高大、健硕、金发碧眼——简言之，他就是希特勒眼中完美的雅利安人。

母亲按强制的纳粹礼仪回敬了他，然后问，“请问是在这里申请入队吗？”

年轻人露出怀疑的表情。“给谁申请？给他？”他问，他的眼睛盯着我，仿佛在看一只丑恶的蠕虫。

“是的，给我儿子申请。”母亲毫不闪躲地回答。

这个纳粹分子拒绝了。“我必须要求你立即离开。”他命令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我必须告诉你，我们这里或者说在我们即将建设的德国，没有你儿子的位置。希特勒万岁！”说完这些，他站起身，生硬地打开门。

那一瞬间，我以为母亲会挥拳揍那个人。她气得发抖，盯着他，眼里的愤怒是我从未见过的。但她很快就恢复了冷静，牵起我的手，平静地说，“我们走。”回家的路上，她和我都一言不发。让她痛苦、受辱，我感到内疚，害怕她生我的气。等我们走到公寓门口时，她只是抱着我哭，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看到母亲这样，我受不了了。“别哭了，穆缇。”我求她，眼泪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们很少这样，通常我们都把难过藏在各自心里。毕竟，我们是德国人。

两天后，我最害怕的时刻终于到了。舒尔曼先生欣喜若狂地把最后两个名字加在了他的表格里，接着用湿海绵小心地把最后那个空方格擦掉。那个方格代表的就是我，也就是说，他又一次强调了我不算人的这个处境。“祝贺你们！我们刚刚达成了我们百分百加入少年队的目标。”他高兴地说，“我为你们感到非常骄傲，感谢你们为你们的

班级和我带来了荣耀。我认为，我们应该让校长知道这个好消息。”说完，他离开了教室，几分钟后，他跟维希德一起回来。

校长夸奖了我们班，说我们“把生命献给了阿道夫·希特勒还有他的第三帝国”。那天正好是星期六，只上半天学，他说，全班可以得到他承诺好的假期，下周一放一天假。他一说完，大伙儿都欢呼不已，直到维希德又恢复了严肃，提醒我们，我们可不是在那种没有规矩的犹太学校。因为没有人去过犹太学校，所以我们只能听校长的话。

那天早晨发生的一切，我都在场，却感觉越来越难堪，因为我痛苦地知道，舒尔曼和维希德给予这个班级的所有嘉奖都没有我的份。唯一能让我恢复点斗志的就只有星期二才回来上学这一点了。因此，中午放学时，我又跟往常一样，跟几个同学一起有说有笑地走过走廊，准备回家。快要出门的时候，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喊道，“你，过来！”

我一转身，就看到校长站在他办公室门前。我立刻就知道他叫的是我，因为他从不喊我的名字。

“进来一下，我要跟你谈一谈。”他说。

突然，我的心一沉。我不知道校长要跟我说什么，但我确信不会是我想听到的。事实证明，我的直觉太准了。

“我是个公正的人，”维希德开口说，“我希望你也是。你是吗？”

我说我很公正，的确是。

“那就好。”他继续说，“因为接着你就会同意，给你也放一天假是非常不公正的，因为你什么也没做，你不配放假。你不会这样想的，会吗——得到你不配的东西？”

这下我终于知道他在搞什么花样了。我明白了，维希德是怎么给我挖坑的。

“是吧，你会吗？”校长追问道。

“不，”最后我回答说，“可是——”

“那就好。”维希德打断我，“因为我已经跟杜克先生说过了，他说如果你去他班上待一天，他没问题。所以，周一一早，你就去杜克先生那里报到。你明白了吗？”

“明白。”我回答。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十岁了，但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维希德要对我这么刻薄。

“就这些了。希特勒万岁！”维希德打发了我。

“希特勒万岁！”我敬礼，然后走出他的办公室，回了家。

我从未对母亲说起这件事。我敢肯定，要是我跟她说了，她肯定会让我周一不去上学，以此来反抗维希德，不管这会对她自己会有什么后果。所以，为了不让她难过，也为了避免麻烦，我周一还是去上学了，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去杜克先生班上当了一天的特别“来宾”。他用讥笑“欢迎”了我。我不得不忍受一整天他那种族主义的冷嘲热讽。

莫雷尔一家

班上所有人都成了正式的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并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友谊。那些先前就跟我亲密的同学加入之后对我还是老样子。我们还是一起玩，去对方的家里，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因为我们都还太小太幼稚，看不到大局，我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们在一起玩时的场面有多讽刺——一个有着明显非洲基因的男孩，跟一群穿纳粹制服的金发碧眼的男孩们，像兄弟一样和谐相处。尽管我的同学们都是正式的“少年队小鬼头”，但几乎没有人的思想观念真的转变成了纳粹主义。有些人加入，仅仅是为了应付舒尔曼和维希德，其他的可能是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加入的，因为他们的父亲担心不让孩子加入会威胁到自己的工作。剩下的只是为了随大流，不想被排挤，这种感受我太理解

了。不管加入的原因是什么，大多数人在最初四处开会、远足等活动的新鲜劲过去，也不需要再证明什么的时候，就慢慢退出了，大约都在一两年之内。我很清楚，对大多数同学来说，这只不过是一时的狂热而已。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尤根·布朗，铁匠的儿子。他是我们街区第一批加入少年队并穿上制服的。他甚至还敲锣打鼓地演奏炫耀——有些人喜欢听，有些人嫌吵——把街坊四邻的窗户都震得嘎嘎作响。可是，几个月过后，我的羡慕之情还没有消退，尤根就退出了少年队，把制服束之高阁，找别的好玩的东西去了。

这种对希特勒青年团的快速幻灭——可能是我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吧，我发自内心地愿意看到这种局面——并不仅仅发生在我们班上，还有整个学校，我觉得，还有整个城市和更多的地方。我怀疑，虽然在纳粹的大肆宣传下，许多孩子加入了希特勒青年团，但积极又定期参与青年团活动的德国男孩和女孩的比例却很小。理论上来说，纳粹是打算把希特勒青年团当成一个工具，从十岁的时候就控制德国的年轻人，改造他们，直到他们成年，然后加入纳粹党。除了一些硬核青年团团员遵循了这个路径，这个计划变成了纳粹的乌托邦幻想。当时有人说，为了提升希特勒青年团那低得可怜的加入率，纳粹打算强迫那些不愿意加入的人加入。幸运的是，战争刚开始时，这项计划并没有被积极实施，也就是说，基本是被忽略了。

希特勒青年团运动还有一些方面没有流行起来。比方说，很少有女孩跟随纳粹党的时尚，把头发——最好是金色的——编成小辫，像蜗牛一样盘在耳朵上方，或者梳成一个髻。我们学校和街区的女孩死都不想打扮成纳粹海报上女孩的样子。相反，她们的发型五花八门，从内卷到时髦的烫发，什么样的都有。

我想，我们街区的绝大多数男人加入纳粹的原因，都跟意识形态没有什么关系。像大多数德国男人一样，他们都是厉害的工匠、技

师、裁缝、屠夫，而不是什么政治学生。德国的中学体制，为精英保留了中等和高等教育，却没有为他们准备政治和哲学思考的可能。在希特勒的统治之下，他们大多数人都获得了意料之外的好处；他们有了稳定的工作、家里有多个孩子的还可以减税，免费的医疗保险，还有许多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好处。他们认为，一个兑现承诺消灭了工薪阶层的灾难——失业的政党，值得他们拥戴支持。然而，他们巨大的、永远不会被抹去的罪恶感就是，在纳粹统治下他们享受的特权，让他们对不受纳粹欢迎的无数同胞遭受的苦难与灭亡视而不见。

为了吸引“街头男人”，纳粹有许多大肆宣扬的额外福利，其中就有德国劳工战线的“力量来自欢乐”项目，目的是靠给工人们提供一些能负担得起的娱乐活动来保持他们的健康，从看歌剧、电影到坐豪华邮轮去地中海游玩，各种各样的都有。有些人加入纳粹党，是因为喜欢看自己穿制服参加游行的样子，还有纳粹出名的壮观军事场面。除了给他们权威感还有许多新鲜的活动，纳粹党还给他们平淡无奇的无产阶级生活带来了兴奋刺激和一种男子汉气概，甚至是英雄气概。最重要的是，它给他们提供了一个组织，让他们跟男孩子们一起胡闹玩耍变成值得尊敬的事。

在我住的社区里，被纳粹给予了全新生活方式和身份的一个典型就是维尔海姆·莫雷尔，一个秃顶的蓝领工人。他是汉堡最大百货连锁店的技工，对他那相当肥胖的妻子来说，他是忠诚的丈夫，对我的小伙伴卡尔和两个弟弟汉斯和吉尔德来说，他是宠溺的父亲。莫雷尔家的男孩都遗传了父亲宽宽的、斯拉夫人的脸庞。莫雷尔一家住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在史都肯大街和哈弗坎普大街交汇处巷子尽头的一栋一层楼的小公寓里，巷子两边都是两层楼的房子。尤根·布朗的铁匠铺也在那里。

我亲眼目睹，莫雷尔先生经历了怎样的转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说明了纳粹党对普通德国男人有着什么样的奇怪吸引力。加

入纳粹党后短短几个月，莫雷尔先生就变了一个人。从一个乏味、安静、谦虚的工作狂——偶尔跟朋友去附近酒吧喝几杯啤酒就算消遣了，转变成一个穿华丽制服的三流职员，专心致志当起了棋子，在社区大摇大摆，不停地完成他的新任务。他的新职位是底层的街区看守，既是兼职，又没有薪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热情。他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党在我们街区的耳目，操心的事情非常多，从密切注意反纳粹言论，到安排给生了四个以上雅利安孩子的母亲颁发母亲勋章，到监视领福利的人，确保他们活得没有超过标准。除此之外，他还参加会议、游行，不管什么天气，都能在外面站上好几个小时，摇着一个金属罐，为各种各样的纳粹活动筹钱，包括口号是“没人该受饿，没人该挨冻”的冬季援助项目。他还走家串户地散发恶毒的反犹太纳粹文学。纳粹党同志莫雷尔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他的党的教义，犹太人是万恶之源，虽然我严重怀疑，在我们这里蓝领工人的生活环境中，他从未真正与犹太人谋面，更别说被犹太人伤害了。与此同时，只要是跟我有关的，他却好像成了色盲和精神分裂。由于某些莫名其妙的原因，他的固执并没有作用在我身上。相反，作为卡尔最亲密的朋友，莫雷尔家大多数活动都会带上我，他们几乎把我当成家人。老实说，我母亲非常憎恨纳粹，但令她沮丧的是，我却成了街区里最大纳粹分子家的编外成员——身在狼窝，可以这么说。但因为喜欢卡尔，不想干涉我们的友谊，她只能一边不情愿地看着这样的局面，一边默默祈祷。

作为纳粹党忠诚的守门人，我们没有在全国假期时悬挂纳粹万字旗这件事也没能逃过莫雷尔先生的法眼，因为挂旗已经成为不成文的规定了。由于这起严重的懈怠行为，他去问我母亲，母亲跟他说，她只是没钱买旗子，我知道，她只说了一半的事实。他让她别担心。第二天，他就带来了一面崭新的万字旗、旗杆，还有一大篇纳粹党如何如何好的赞美之词。莫雷尔先生甚至来到我们公寓，亲自在我们窗户

上装了一个底座。这样一来，母亲没有任何借口了，只能决定在每个节假日都挂上纳粹的旗子，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然而奇怪的是，与人们想象中不一样的，在街区最大的纳粹家庭里，只有一个孩子是少年队的积极成员。老大汉斯，是一个热切的“小鬼头”，会定期参加活动。而卡尔，在父亲的默许下，只是书面上加入了青年团，却从未参加过少年队的任何活动。吉尔德年纪还太小，参加不了。我问卡尔，为什么他父亲会允许他不参加活动，卡尔跟我说，一开始，他父亲是想让他去的，最后唠叨烦了就算了。

“只要我加入了，他就可以跟别人说我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这样就行了。”卡尔解释说。

通过多年来与莫雷尔一家的亲密接触，我清楚地知道街区里各个家庭的私事，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同志的家庭，还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家庭。莫雷尔爸爸虽然非常尽忠职守，但还是忍不住跟家人和朋友八卦他在各式各样调查下了解到的情况。我向来是闭上嘴，光用耳朵听。比方说，我知道，我们的一个邻居被判入狱，因为违反了德国刑法典第175条，也就是同性恋行为。莫雷尔先生似乎有本事辨别出社区里的每一个人，谁曾经背离过——或疑似背离过——狭窄的正义之路，包括他自己的纳粹同伴们。“他已经被警告过两次了。”有一次我听到他说，“如果我们发现他再犯一次，就会被驱逐出党。”虽然像老鼠一样偷听到的莫雷尔跟他的熟人们的聊天内容，对当时的我来说还太过高深，但我把它们记在心里，时不时两相对应，通常可以弄明白更多事情。

杜克先生

要在我两个最偏执的老师维希德先生和戴眼镜的杜克先生之间选

出谁是最歹毒的，我会非常为难。杜克先生曾经欢天喜像过年似地穿着纳粹制服给我们上民俗课，虽然这民俗课只不过是he用来发泄种族敌视的工具罢了。“快止住你那黑人的笑吧！”有一次他看到我跟班上同学一起笑的时候，他这样勒令我，“黑鬼们在纳粹德国没有什么好笑的。”为了阐明他的观点，他经常把那些最接近他和他的纳粹伙伴们心目中完美雅利安类型的学生叫到讲台前面去，指着他们的金色头发和蓝眼睛说，“高贵的头颅”，和其他“惹人喜爱的”身体特征。讽刺的是，在他背后，我的同学们提起这位热爱纳粹的杜克时，用到的词是我母亲教我绝不要用在贬义情境下的。他们叫他“犹太人”，部分是因为他那硕大的鹰钩鼻，部分是因为他那言过其实的企业家特质，这两者都是纳粹认定的确凿无疑的犹太特征。杜克还教音乐和物理。全校都知道他逮住一切机会搞一些可疑的生意贴补自己当老师的薪水。尽管他那些生意即便不是违法的也是不道德的，但他却一直没被惩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纳粹党。

杜克如此憎恨十岁的我，不仅是因为纳粹的原则，还因为有两次，我无意中坏了他的事，妨碍了他一贯地把教育事业同搜刮学生结合在一起。有一天，他打着音乐老师的旗号，说他要教我们吹口琴。我早已经自己学会吹口琴了。他说，为了教会你们，每个人都需要买一把口琴。于是他说，他有特殊关系，能让每个学生用真正优惠的价格买到浩勒口琴。

结果我所有的同学都信了，问过父母后，都找他买口琴。班上只有一个人没买，你肯定猜到是谁了——并不是因为我想阻挠杜克从中牟利的计划，而是因为我已经有了一把口琴，一把很好的口琴。一年前，我自己用一把很便宜的口琴学会了吹口琴，母亲奖励了我一把很贵的、彩色豪华的浩勒口琴。可是，杜克把我不找他买口琴看做是跟他过不去。他的报复就是，不准我把我的口琴带到班上来，也不准我同他们一起吹，虽然我的口琴跟他订的是一模一样的。

类似的事还发生在物理课上。杜克想教我们无线晶体收音机的工作原理。说过几次之后，上课时，他带来了一个耳机，他在耳机里面焊上了晶体探测器组的微型电路——我认为是非常巧妙的。然后，他向我们说明，他的发明就是把从耳机里拽出来的两根电线中的一根接在水龙头上，以便接地，同时把一根电线举到空中作为天线，然后就可以收听汉堡的国有及国营的北德意志广播电台。

接着，他跟我们说，只要几马克，我们也可以骄傲地拥有一个“便携式收音机”。在那个还没有电视，主要通讯还是靠收音机的年代，我们这些孩子都被杜克的新玩意儿震撼到了，它似乎预示了晶体收音机的出现。无论什么时候都可以听收音机，这件事太诱人了，我的许多同学都打算去跟父母要钱买这个好玩的东西。

对于这个不用电池，也不需要插电的“便携式收音机”，我也感到震撼，我直接冲回家，开始自己鼓捣。星期天一整天，我都在家里折腾，终于做出来一个 $3 \times 4 \times 2$ 英寸的小木盒子，我在里面装上了一套电路和晶体耳机。理论上来说，我这个小小的收音机盒跟杜克的无盒式耳机应该是一样的。

我把它带到学校，给同学们看，他们赞不绝口。但当我想从杜克先生那里得到类似的赞赏时，我被吓了一跳。虽然我是班上唯一一个受他启发，努力实现他授课成果的人，他却责备我拙劣地模仿了他的创意，让我不要再把我的垃圾带到班上来。

我崩溃了，有些同学来安慰我，他们说，杜克先生骂我，只是因为他没法把他的耳机卖给我。我知道，他们说的有几分是对的，但我也知道，杜克这样对待我，还有另外的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我的肤色。

我的猜想很快就得到了证实。有个学生在反驳杜克的论点——非“雅利安血统”的人在智力和体能上都是下等的——时，提到了我的学习和体育成绩，杜克叱责他居然敢顶嘴。接着，他跟全班同学说，

我只不过是个例外，还说不管我展现出什么“普通的特征”，都是遗传自我的雅利安家长。他丝毫不顾及我感受地说，就我而言，话还不能说得太早，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我身上的劣等血统会以一种或其他种形式表现出来。“种族劣等的表现形式有很多，”他争辩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的同学搞出来什么反社会的事儿，比方说犯罪或者酗酒，又或者说对很多疾病免疫了，我也一点都不会吃惊。”

在传达了这个信息之后，下课铃声响起时，他命令我留下来。

“我要跟你说的，花不了多长时间。”等所有人都离开教室后，他跟我说。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用那种毫不遮掩的厌恶眼光看着我，斥责我煽动全班同学跟他作对，说我总是对他“冷笑”，不尊重他。“我跟你说吧，年轻人。别这么得意，等我们了结了犹太人，你这种人就是下一个了。我就说这么多。希特勒万岁！”

虽然我不能完全理解，他说的“了结了犹太人”是什么意思，但我知道，犹太人是全国最憎恨的人种，因此是极度危险的。我纠结了很久，该不该告诉母亲杜克跟我说的话，但最后还是没说。有什么用呢？那只会让母亲卷入一场根本赢不了的斗争。所以我把一切都埋在心底，希望杜克和他的预言会慢慢消失在记忆里。

莱茵兰之耻

1936年3月初的一个清晨，我来到学校，整栋楼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先是老师们，然后迅速传到了我们学生。我们被告知，元首刚刚发动了一次突袭。他违背了一战后德国签署的《凡尔赛条约》，下令进军德法边境的莱茵兰。现在，全国都在担心西方力量的敌对回应。这回应却迟迟没有到来。

把全校师生都召集到礼堂后，维希德先生昂首挺胸骄傲地宣布，

多亏了我们敬爱的元首的勇敢，“德国历史上最耻辱的一个篇章终于结束了。”接着他又跟我们讲述了，当年德国被迫从莱茵兰永久撤军以降低军事侵略的可能性时，胜利的西方盟国让德国遭受了多么可怕的屈辱。“多亏了我们的元首，”维希德说，“你们这些德国男孩才可以把头高高昂起。”

就在我也想分享这份骄傲，把我的头也抬起点来的时候，维希德给我泼了一盆冷水。他说，一战后德国被迫撤兵，令德国人走上了“终极羞辱”之路——区区四万个“野蛮的法国黑鬼”就占领了富产煤矿的鲁尔地区。他露出极度嫌恶的表情说，这些野蛮人来自非洲丛林，在他们的法国军官的允许下，随意地跟德国人混在一起，造成的灾难性结果就是，莱茵兰被成千上万个身体和头脑都低等的杂种占领。今天，我们元首的义举，维希德接着说，将永远避免这种侮辱性的侵犯德国主权的行为再次发生。

校长没有提到的是，希特勒已经启动了一个扫荡行动，对“莱茵兰杂种”们实施强制绝育从而最终消灭。这个计划得到了他的农业部长理查德-沃尔特·达利的公开支持，早在1933年就写进了书里：

“消灭莱茵兰的黑色耻辱余孽是至关重要的。这些白黑混血儿要么是通过强奸生下来的，要么就有个白人妓女母亲。无论是哪种情况，对于这些低等种族的后代，我们没有任何道德义务。十四年过去了，这些存活下来的白黑混血儿现在到了青春期，意味着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进行漫长的讨论了。让法国和其他国家用它们想用的方式处理种族问题吧。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解决方案：消灭所有外族人，尤其是那些暴力的、无道德的、爱惹事的。因此，作为一个莱茵兰人，我要求，对莱茵兰的黑色耻辱，对所有白黑混血儿实施绝育。

“这一方案必须在接下来的两年内实行，否则就太晚了，几百年后，种族退化将会依然存在。用法律阻止异族通婚是无效的，因为在法律上不可能的事情通常是非法发生的。”

因为法国的种族政策，希特勒把法国当做“迄今为止最糟糕的敌人”。“这些（法国）人，”他在《我的奋斗》中写道，“基本上变得越来越黑化，它和犹太人统治世界的目标紧密相连，构成了欧洲白人存在的持久危险。欧洲中心莱茵河边黑人血统的污染，既符合了我们人民的世仇那扭曲而疯狂的复仇渴望，也符合了犹太人冷冰冰的算计，因此，他们开始在欧洲大陆的核心地区搞杂种，让白种人跟低等人杂交，夺走白种人的根基，获得主权。”“如今，在自身复仇渴望的驱使下，在犹太人有计划的领导下，法国在欧洲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白人生存的罪恶，总有一天，会刺激起这个种族的人的报复心，因为这个种族已经认识到，种族污染是人类的原罪……”

接着，希特勒还预言道：

“如果法国还照着这个势头继续发展上三百年，法兰西血统的残余最后将被淹没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欧非混血国家。从莱茵到刚果之间自给自足的巨大区域，将充满了因为不断杂交而不断降级的种族……”

希特勒在“解放了”的莱茵兰实施的消毒、继而谋杀混血儿的计划太过恶毒，令人难以心安。不过，幸运的是，我直到战后才得知这些不幸的人们的命运，因此免去了多年的痛苦，毕竟我的命运可能跟他们一样悲惨。

乔和杰西，新的英雄

1936年夏天，我那经常受伤害的自尊心受到了一次巨大的刺激，源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两个美国黑人运动员，一个是职业拳击手，一个是业余田径运动员。他们的名字是乔·路易斯和杰西·欧文斯。虽然在我成年很久之后我才见到他们，但他们对我的人生都有着显著而持久的影响，因为他们让我真正为我的非洲血统而自豪，毕竟

在那个年代，想要获得这种自豪感简直太难了。

1936年春天的时候，消息传到德国，说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要对战马克思·施姆林，纳粹版的“伟大的白人希望”。我们得知，乔·路易斯，二十二岁的拳击手，来自阿拉巴马州的棉花地，底特律的汽车工厂，他的连胜战绩为他赢得了“褐色轰炸机”的美名，成为当时世界重量级冠军、他的白人同胞詹姆士·J·布拉德多克的主要对手。

这个消息传到我们街区，所有人的眼光又集中到我身上。事实证明，“所有黑人都长得一个样”这一偏见并非局限于美国白人，我的大多数小伙伴也都说，“你长得跟乔·路易斯一模一样”。尽管我跟这个美国拳击手之间差着至少150磅的体重，但街区的每个人都认为，我比任何人都更可能成为“褐色轰炸机”。我几乎没有机会反驳。

我的伙伴们认为，我和那个被预言即将打败欧洲大陆最好拳击手的男人是真正的兄弟，不仅因为我们有着同样的肤色，同样的头发，同样洁白无瑕的牙齿，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同样神秘的、无所不能的非洲血液。德国人越是惊叹于褐色轰炸机的出色表现，我在同伴中的地位就越高。我从没透露过，跟地道的汉堡小男孩一样，我是力挺施姆林的，在我关注他的那些年里，我都认为他是我们本土的英雄。不过，既然伙伴们把我当成褐色轰炸机的继任者，我不得不放弃我的爱国热情，支持我来自美国的黑人兄弟。这让我内心十分纠结，因为我对施姆林的忠诚已经达到一个十岁男孩所能体会到的极限了。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很轻易地就做了决定。我在当地报纸上读到施姆林的一篇赛前访谈，这位我心目中的英雄承诺说，他要“把这个黑鬼拳击手从褐色轰炸机打成青紫轰炸机”。这段话（第三帝国倒台后，施姆林断然否认了这番话，还有他更多的种族歧视言论）极大地伤害了我。我觉得被这个我视作偶像的人背叛了，就在当时当刻，我决定了，我将把我的忠诚献给乔·路易斯，这

个人人都说长得像我的人。

受控于纳粹的媒体说路易斯是个难以对付的拳击手，还说他只是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并且预言施姆林会凭借高人一等的头脑和超级厉害的拳击技巧与经验取得最终胜利。

纳粹对拳击的普遍兴趣和对施姆林的特别兴趣，绝非偶然。怀抱着征服世界梦想的希特勒，早就宣布过，他希望德国的男孩们长成“像皮革一样坚韧，像灰狗一样敏捷，像钢铁一样坚硬”。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下令，德国青年尤其是男孩的身体素质应该成为纳粹教育的主要目标。马克思·施姆林，这个由戈培尔的宣传机器千挑万选出来的人，代表了德国的男子气概，身体机能、精准敏捷、忍耐力、运动精神、勇气和极度干净的生活方式，似乎是胜任这份工作的不二人选。但是另一方面，这位黑发、狗鼻子、眉毛粗重，长着“五点钟阴影（胡子）”^①的拳击手，却没有雅利安神话制造者们偏爱的白皮肤和蓝眼睛，并且，在三十一岁的时候，就被许多拳击迷们认为在走下坡路了。不过，乞丐是没资格挑剔的，前任重量级拳击冠军马克思·施姆林则是纳粹最容易掌控的德国超级运动员。

1930年，美国拳击手杰克·夏基对施姆林耍阴招犯规，被罚退赛，施姆林成了首个也是唯一赢得世界重量级冠军的德国人。两年后，他在一场比赛中输掉了这个称号。不过，多亏了戈培尔的大力宣传，他被打造成我们这一代的偶像，被推上了复出之路。

6月19日，比赛的当天，我们街区的男人和男孩谈论的都是即将到来的比赛。虽然大多数人都是支持施姆林的，但还是有许多人严重怀疑他们的偶像能够承受得住美国黑人的猛烈冲击。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参与讨论，街区的男孩们就会立即把我当作乔·路易斯这边

① 指胡子粗重，清晨刮脸傍晚已长出的短髭。

的。意识到自己居然如此重要，我迫切地跟他们描述细节，说乔会如何终结马克思的冠军野心。我把能找到的关于乔·路易斯的一切都读了一遍并记在心里，所以我可以喋喋不休地说着我的英雄的趣事，从他那令人惊叹的数据，到他单手单拳就可以打败对手的勇猛。当伙伴们心怀敬畏地倾听时，我享受着地位提升后的每一刻。看到那些往常自觉比黑人高级的人如此尊敬一个黑人，尤其是我还能沾点光时，我的感觉很好。自从六年前祖父离开德国后，我就再也没有享受过来自非洲血统的自豪感了。对我来说，那似乎是上辈子的事了。

我根本等不及天黑，比赛被安排在晚上九点（美国东部时间）在纽约市的扬基体育馆举行。因为那个时间差不多是德国凌晨三点，我让母亲给我设定了凌晨两点（保险起见）的闹钟，这样我就能起床用我自制的耳机收音机收听比赛转播。凌晨两点，刺耳的闹钟声响起，我立即起床。在一个小时漫长的等待中，德国解说员描述了扬基体育馆内近四万观众在场的紧张气氛，之后，我终于听到了第一个回合开始的信号。前三个回合，褐色轰炸机的出现表现令我精神振奋，他的勾拳和猛击已经封死了施姆林的左眼。接着，第四个回合，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不，是不可能的事——发生了。我的同胞连续两次向乔·路易斯的下巴发动猛攻，我的英雄被击倒在地，裁判数到了四。我声嘶力竭地喊着，让乔站起来，但能听到我的呐喊的，只有我母亲。她跑进我的卧室，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乔被打倒了！”我喊道，“乔有麻烦了！”

母亲没太搞懂我跟她说的这些有什么重要的，对于又一次被吵醒，她也不太高兴，她让我小点声。

“只不过是一场拳击赛嘛。”她试着安慰我，“你别太当真了。”

我没法跟她解释，在四千多英里之外战斗的黑人不仅是在为他自己而战，还在为我而战。他的胜利将会是我的胜利，他的失败——上帝保佑——也会是我的惨败。

直到此刻，我还从没想过乔·路易斯战败的可能性。现在看来，10比1不被看好的施姆林很可能转败为胜。如果真的这样，我要怎么跟那些相信了我说的乔会把马克思打出屎来的孩子们交代呢？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他们呢？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折磨我，而扬基体育馆传来的消息也是从糟糕到更糟糕再到无法忍受。很明显，在先前的回合里，路易斯被施姆林的右拳严重伤到了下巴，在后面的回合中，他被打了一拳又一拳，但还是站着，凭借着意志力。原本十五回合的比赛他们打到了二十回合，施姆林一记右拳打到路易斯的下颌，把他打倒在地，数到了十，我的噩梦终于变成现实。那个我认为不可战胜的人，那个曾经让我在同龄人中赢得声望和尊敬的人，已经被摧毁了。

虽然外面还是一片漆黑，我却怎么也睡不着。我睁着眼躺着，重温过去一个小时内每一个痛苦的时刻，直到最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

然而，最糟糕的事还在后面。第二天——星期天——我整天都待在家里，生怕碰见街区的任何一个男孩子。但我知道我不可能永远躲着。星期一，不管我愿不愿意，我都得去上学，去面对现实。一走进教室，我就听到有人嘲笑我，这个人正是几天前一脸崇拜看着我的人。

“你的褐色轰炸机出什么事了？”有人轻蔑地问。

“褐色轰炸机变成了奶瓶子。”另一个男孩插嘴说，用了街头表示“虚弱”的俗语。

“我记得你说路易斯很能打，”又有一个男孩嘲笑说，“那他怎么会让马克思把他当成沙包？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因为他是个黑鬼，是个懦夫！”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你要是不爱听，尽管冲我来。”

他比我大一岁，比我高一年级（他是五年级的留级生）。我顾不上跟他打架会有什么后果，照着他脸上左一记右一记地出拳，动作足以令我的偶像乔·路易斯感到骄傲。

我的同学们并没有丧失义气。他们围成一个圈，没有再继续嘲笑我，而是为我加油。

“打他，乔·路易斯！”

“把他打倒，乔！”

“右勾拳，乔！”

“左勾拳呢？”

我突然的猛击惊呆了我的对手。我太激动了，停不下来手，他一个踉跄，往后跌倒。从我的英雄被打败后我感受到的所有愤怒、沮丧和羞耻全都通过拳头倾泻而出。我还没来得及造成什么大的损伤，就被人从后面拎了起来，放开了我的对手。

“你以为你在干吗呢？”一个男人的声音想起。杜克先生，我最不喜欢的老师之一，走进了教室。谁也没注意到他。

“他说乔·路易斯输掉比赛是因为他是个黑鬼和懦夫。”我努力为自己辩解。

“不管什么原因，都不能打人。”杜克先生冲我嚷道，“你不能因为别人只是不同意你的观点就随便打人。马克思·施姆林已经用实力证明了，黑鬼的残暴之力跟拥有超级智慧的雅利安拳击手根本无法相提并论。他的胜利，不仅是德国人的伟大胜利，还是全世界雅利安人的伟大胜利。”

“现在，跟你的同学道歉。”杜克命令我。我坚决不肯，不管后果是什么。

“你听到了吗？我让你道歉！”杜克先生咆哮着。

我只是挑衅地盯着他，一个字也不说。不过，杜克先生还没来得及发作，我们的班主任舒尔曼先生，就走了进来。杜克先生着急地跟他说了大致情况。在杜克版本的故事里，我发疯了，打了一个男孩，因为人家坚持说施姆林是个比乔·路易斯更加出色的拳击手。

我为杜克的不诚实感到震惊，却还是一言不发。临走的时候，杜

克建议要严惩“这个野蛮的流氓”，也就是我，舒尔曼答应会“采取合适的行动”。

杜克先生一走，舒尔曼就听了我对这场争执的解释，我的同学也纷纷给我作证。舒尔曼先生严厉地警告我管住自己的脾气，却没有惩罚我。同时，他也同样严厉地警告我的对手——脸上已经有了许多瘀青——别再对我发表任何轻蔑的种族歧视评论，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接着，舒尔曼先生跟大伙说，他也听了那场比赛，虽然路易斯输了，但在至少五个回合的时间里，在任何人都认为不可能的情况下，他还是牢牢地站住了，他并没有失去荣誉。

在同学们的目光里，我觉得自己是有理的。虽然我时不时还得听人家说聪明的马克思·施姆林是如何打败愚蠢的乔·路易斯这种话，但我也听到了很多称赞，说这个美国人是如何用自己超人般的意志力站住了脚。我从未觉得，输掉这场比赛，乔·路易斯让我感到失望，但输在施姆林手上，对我来说的确是件苦涩的事。现在，知道许多人依旧把乔·路易斯看作是入围的最强势的拳击手来尊敬，我心里好受多了。因此，不管什么时候有人喊我乔·路易斯——经常如此——我都会昂首挺胸地像个冠军一样自豪。

在扬基体育馆这场难以忘怀的比赛之后，一部名为《马克思·施姆林的胜利——德国人的胜利》的大型纪录片在汉堡的各大影院上映。街区里的每个人都冲去看这部戈培尔创意下的宣传片——每个人，除了我。我只是不想让自己再体验一遍看着偶像被打败的痛苦。直到两年之后，我才克服自己的厌恶之情，看了这部电影，但那只是因为在那个时候，乔·路易斯在第一回合中就以惊人的比分扳回了一局。

就在德国运动迷们还在争论第一场路易斯—施姆林比赛的是是非非时，另一场运动盛宴，1938年在柏林举办的德国奥运会，正在拉开帷幕。在开幕的几个星期之前，媒体就报道了美国国家队里将会有许多黑人运动员。为了不冒犯到五十一个来访国中的任何一个，尤其

是那些队伍里有黑人运动员和非雅利安运动员的，戈培尔掌控下的媒体被严禁发表任何种族言论，对跟黑人运动员相关的新闻必须一视同仁。在运动会期间，就连原本贴满了各个参观点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犹太人不得入内”的标语也不见了，为的就是不惹恼外国人。这种修改既定种族主义做法背后的意图相当明显：为了显示是希特勒把奥运会带到了德国，把独裁者塑造成一个优雅和有尊严的国际东道主的形象，令政局更加复杂。

然而，这项临时修改的国家政策并没有阻止我的邻居们用非常傲慢及嘲弄的态度对待黑人运动员来柏林的消息，他们暴露的是普通德国人对美国的极度无知。“一群食人族”居然要来德国挑战德国田径队，许多人想到这里就想笑。我一个同学的父亲是个理发师，他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们，在来柏林路上的黑人们都是从“美洲丛林”里抓来的，在他们被迫参加奥林匹克苦役之前，他们就终日在丛林里游荡。他还言之凿凿地说，只有那些在野外被观察后认定跑得最快，动作最敏捷，跳得最高的人才会被抓来，被迫为奥林匹克进行特训，为的是磨练他们本就已经很厉害的体能。

受过良好教育的德国人，在认知方面也没比街头市井的人好到哪里去。杜克先生先入为主地认为，黑人运动员即便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获得胜利，也不能说明他们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运动员，因为他们“天生就是赛跑者和跳高者——像马和别的动物一样。”

“对一个德国赛跑运动员来说，输给这些半开化的美国人，”杜克先生向全班同学说，“比输给一匹马还丢人。每个人都知道，马在体能上比人强，但在智力上比人低。来自美国的野蛮人也是如此。”

在美国田径队入驻柏林的奥运村后，诸如低级的野蛮人、食人族和黑鬼这种令我一直处在无能为力的愤怒状态的说辞突然停止了。邻居中即便是最无知、最偏激的人也很快就意识到，身材健硕、穿着整洁的白色制服在报纸、杂志和新闻报道里冲我们微笑的年轻黑人绝不

是他们以为的原始野蛮人。这些黑人运动员都是大学生，这令我们崇尚教育的同胞刮目相看。但真正令他们信服的，是这些黑人在赛场内外展现的绅士和运动精神。

开幕式前几天，卡尔·莫雷尔给我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他的父亲要带他、他的哥哥汉斯还有街区的几个男孩去柏林玩一周，如果我母亲同意——给我坐火车的钱，还有一点零花钱——我也可以跟着去。起初，母亲死也不同意我去。但我绝食了两个小时，说如果不去柏林，我就活不下去，她终于同意仔细问问莫雷尔夫妇这次旅行的更多信息。她跟他们详细讨论了一番，中间他们还跟她保证，我会被照顾得好好的，说再没有比去首都看奥运会更好的让男孩子过暑假的方式了，我母亲终于妥协了。

在我们启程的那天早上，我们一共十多个孩子，有些穿着希特勒青年团的制服，每个人都背着重重的背包和水壶，经过高架公路，来到汉堡的中央车站。在登上前往柏林的火车之前，莫雷尔先生让我们排队立正，像冲锋队队员一样，给我们训话，交代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那个时候，他也背了一个书包，虽然没有穿制服，但他那锃亮的棕色马靴和马裤毫无疑问地表明了他的纳粹身份。

火车上挤满了人，大多都是像我们这样的学生，每个人都兴奋不已，车厢里到处都是喧闹的聊天声，时不时还会响起进行曲。听着嘈杂的声音，看着窗外掠过的风景，我还是难以相信，几个小时后，我就要漫步在首都柏林。我们这些孩子从小就被教育，要把柏林当作是宇宙的中心。

当我们在深夜时分抵达柏林著名的中央火车站时，我们都唱累了，累得要死。我们坐上公交车，在柏林夜间熙熙攘攘的车流之中，匆匆看过了著名的勃兰登堡门和无线电发射塔，也就是柏林版的巴黎埃菲尔铁塔，来到市郊的青年旅社，打算赶紧睡觉。但是在被允许睡在阁楼房间靠墙的床垫上之前，莫雷尔先生提醒我们，我们现在跟敬

爱的元首呼吸着同样的柏林空气，让我们向元首致敬。想到元首就在我附近，我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直到我沉沉睡去。

跟我最先对乔·路易斯和马克思·施姆林的感觉不一样的是，我从未在黑人奥林匹克运动员和祖国的运动员之间纠结。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黑人运动员的胜利就是我的胜利，他们的失败就是我的失败。我立刻有了一种自豪感，因为我跟这些美国人之间有一种特殊的血缘关系。很快，我对哈里森·迪拉德、戴夫·阿尔伯顿、阿奇·威廉姆斯、约翰·伍德鲁夫、科尼利厄斯·约翰逊和拉尔夫·迈特卡尔夫这些名字熟悉得就像对德国国家队的种子选手一样，比方说跳远运动员卢茨·朗。虽然所有的黑人运动员都受到了明星待遇，但没有谁像德国运动迷新发现的奥运会宠儿——我的最新偶像——杰西·欧文斯一样收获了雨点那么多的奖项。跟乔·路易斯一样，欧文斯也出生于阿拉巴马州，被誉为美国田径奥运金牌的种子选手。但他的实际表现超过了他新赢得的德国粉丝的最乐观估计。在四天精疲力尽的比赛中，他出场十四次，在100米和200米赛跑中分别跑了四次，跳高六次，以10.3秒和20.7秒的成绩分别拿下100米和200米冠军，引领了400米接力赛的胜利，还创下了奥运会跳远纪录，26英尺55/16英寸。虽然莫雷尔先生只让我们看了几场比赛，还坐在老远老远的座位上，根本看不清赛场上的动作，但这丝毫没有减弱我们对比赛的热情。

据称，希特勒对这位黑人金牌得主的怠慢，当时在美国被广泛报道，但是可想而知，纳粹控制下的德国媒体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这位独裁者一反亲自祝贺金牌得主的常态，是不是因为不想跟黑鬼握手，就不得而知了，因为在欧文斯之后，并没有其他金牌得主获此“殊荣”。然而，在跳高金牌得主黑人科尼利厄斯·约翰逊有望登上冠军领奖台时，这位独裁者的确离开了奥运会场馆，再也没有祝贺过获胜者。多年后，当我问到杰西·欧文斯如何看待那次臭名昭著的“怠慢”，他说，他不确定希特勒是想怠慢他，还是其他没有被他

收入麾下的黑人运动员。“他显然是个非常非常忙的人，比起跟运动员们握手，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杰西是这么解释这件事的。“不过，即便是他故意怠慢我们，”杰西说，“我也根本不在乎。”

我们回到汉堡之后的几个礼拜，我每天都在念叨奥运英雄们的壮举，念叨着我当时在场。由于杰西·欧文斯的公开露面，我的几个朋友都忍不住叫我杰西，就好像前一阵子叫我乔那样。这一次，我还是把它当做赞美。毫无疑问，当杰西变成柏林冉冉升起的新星时，我在同伴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跟施姆林获胜时一样，纳粹并没有放弃大肆宣扬另一运动强队（德国队获得了大部分金牌），准备了一部大型奥运会纪录片《奥林匹亚》。它分为两部，《人民的节日》和《美的节日》，由德国电影天才（传言中希特勒的情妇）莱妮·里芬斯塔尔执导，这部杰作至今令影迷们喜爱不已。

这一次，我迫切地去看了这部电影。我事先就知道它的种族态度，根本没指望能看到有杰西的镜头，但却很惊喜地发现，这部电影在杰西身上花的篇幅比其他奥运明星都多。

当看到镜头一次又一次地对准杰西，表明导演对他是多么重视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影片镜头从各个角度拍摄了杰西肌肉健硕、乌黑发亮的身体，每个动作都呈现出优雅和力量。除此之外，镜头还给他非常多的脸部特写，做预备动作时的专注，还有他每次获胜后坦率的大笑。影片还记录了柏林体育馆里喧嚣的场面，观众们齐声大喊“杰西！杰西！杰西！”，为美国黑人的胜利而欢呼。这部影片的本意明显是支持纳粹“雅利安至高无上”的理念，讽刺的是，最后却成了赞美一位非雅利安运动巨星的不朽之作。

电影结束时，影院里的灯光亮起，有些人发现了我，他们的脸上不再是往常那种无法掩饰的嘲笑、傲慢或者轻视，而是明显的喜爱与赞同。“杰西的小兄弟在那里。”我听到一个男人指着我对他的孩子

说。我感受到一种喷涌而来的自豪感，藏都藏不住。在我整个童年时期，只要有人提到杰西·欧文斯和乔·路易斯，这种自豪感就会油然而生，并长久地支撑着我。

多年后，在担任《Ebony》杂志总编辑期间，我亲眼见到了我的两位英雄——在拉斯维加斯见到了乔·路易斯，他在凯撒皇宫当接待员；在芝加哥见到了杰西·欧文斯，他在那里成立了自己的公关公司——我终于有机会感谢他们为我带来的一切。一开始，他们听得有点迷糊，但当我跟他们说，作为纳粹德国的一个十岁黑人小孩，因为他们，我得以变得自信一点，他们都非常谦虚地接受了我的感激之情。

兴登堡

纳粹的许多高优先级项目都是为了让德国及全世界认为，德国变得繁荣昌盛，即将重新成为令人瞩目的世界力量。其中就有建造和操作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艇——可驾驶的LZ-129兴登堡。就连本就已经是庞然大物的飞艇“齐柏林伯爵”号都相形见绌。

早在“兴登堡”开通首次跨大西洋客航服务的几个月之前，戈培尔博士麾下的媒体就大肆赞扬这是“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的伟大科技奇迹”，并把它当成德国在“20世纪最重要的科技发展”中占据世界领先地位的明证。在数不清的宣传片里和报纸上看过“兴登堡”之后，我们这些孩子很容易对所谓的“德国飞跃未来”感受深刻，我们无时不刻谈论它那令人怯步的本领。不过，虽然我已经很熟悉LZ-129的巨大尺寸，但在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眼见到这空中巨兽时，还是毫无心理准备。

“兴登堡”预定低空飞过汉堡的那一天，是个美好的晴天。大约一小时前，史都肯大街三号的居民们，除了说自己太老太害怕不敢参

加的默勒姨母外，全都爬上一个小楼梯，穿过一个狭窄的入口，爬到我们这栋三层公寓楼的屋顶上。我急切地在空中寻找熟悉的雪茄形状的巨物。爬上屋顶，我更加兴奋了，因为之前母亲从不允许我上去。附近的屋顶上都挤满了人，大伙儿都来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事件。在人群中，我认出了几个小伙伴，很快，我们就开始来回地挥手、大喊，消磨时间。

终于，有人指着南边大喊，“它来了！”我抬头，看见飞艇从很远的地方，朝着我们直接飞了过来。一开始，我很失望，因为它看上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大。但慢慢地，它变得越来越大，引擎的轰鸣声越来越响，直到它直直地逼近我们。那一瞬间，我觉得它庞大的身躯是如此具有压迫感，我几乎无法呼吸。我确信，如果这头巨兽再近一点，就会撞到我和屋顶上的每个人。我还没回过神来，它就飞到了我们的正上方，在我们的街道上投下了巨大的黑影。我可以很清楚地认出“兴登堡”这个词，分布在它的头部、铝合金船底、乘客座舱和四个外部柴油动力涡轮机。几秒钟后，就像来时一样，它又迅速地飞离了我们。很快，它就越来越小，直到尾翼上的黑白红纳粹标记也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

之后几天，我们谈论的都是它。我们觉得，这次特殊的经历仿佛让我们跟这架巨大的飞艇之间有了一种特别的关联，我们热切地关注它成功飞越大西洋的新闻。然而，不到一年，1937年5月7日（美国时间5月6日），我们科技奇迹的希望与梦想，被“兴登堡”号在新泽西州莱克赫斯特降落后不久就爆炸、三十六人遇难的消息击得粉碎。

德国举国震惊。一周后，我在新闻片中看到了这一画面，人们试图从爆炸的残骸中跳出来逃命。我很难将眼前这艘被大火烧毁的飞艇跟曾经骄傲地从我家屋顶飞过的那一艘联系起来。

虽然纳粹媒体沿用了美国对此次空难原因的官方解释——大气压下的静电火花引发的爆炸——大多数德国人，包括我在内，都认为这

里面有阴谋。到处都有人揣测，美国嫉妒德国在飞艇制造和操作方面的先进技术，禁止德国使用氦气，迫使德国改用更具浮力却也更具挥发性的氢气。因此，在美国的故意设计之下，德国不得不屈服，兴登堡是被一颗早就瞄准好的子弹点燃的。战后我听说，德国被禁止使用氦气，目的就是为了阻止兴登堡，因为它可以成为一种难以对付的武器，可以在战争中轰炸美国的城市。

虽然在对炸毁的飞艇的挽歌中有很多声音说，要重建一架比兴登堡还要大还要好的飞艇，但发生在莱克赫斯特的灾难还是终结了纳粹的野心——在“比空气还轻”的科技领域称霸，同时兼顾普通客航服务。它也完结了我童年的梦想，那就是，有一天能够乘坐兴登堡翱翔蓝天。

漫长的战争

一触即发的战争

很快，关于兴登堡事件的新闻报道就被纳粹预告的一系列大事件取代。“如今，”维希德校长骄傲地对我们说，“元首已经让我们永远地从《凡尔赛条约》的耻辱中解脱出来。”他指的是希特勒最新的演讲。在这次演讲中，希特勒说出了德国对生存空间的需求，还有他扩张的决心，和平扩张，如果可能的话，但如果必要的话，也会诉诸武力。显然，这是违背条约的。

接着，我们被告知，一个叫库尔特·冯·许士尼格的可恨的家伙，邻国奥地利的总理，正在找奥地利境内纳粹党的麻烦，而他们的唯一罪名就是坚持不懈地想要把奥地利和德国重新团结在一起。在柏林的压力之下，许士尼格下台，奥地利纳粹党头目阿图尔·塞斯·英夸特取代了他。新官上任后的第一把火就是请求德国出兵，表面上是镇压流血事件。1938年3月12日，黎明，德国军队挺进奥地利，在那里，据我们看到的新闻影片称，他们受到了奥地利人民的热情欢迎。同日，出生于奥地利的希特勒，来到了位于林茨市的老家，宣称他此次任务是“把我亲爱的家乡重新纳进德意志帝国”。

得知德国一夜之间增长了900万人口，国土面积增加了32375平方公里，还收获了巨大的工业、农业和自然资源，我们这些孩子都兴奋

不已。为了把问题讲清楚，我们的老师还在巨幅地图上让我们学习了新获得的领土。他们还教我们，自从被统一进德意志帝国之后，奥地利就被称为“东部领土”。那时候，体现了边境线变化的新地图也被发放到了我们学校，不过，我们还没来得及学习，另一事件就让它们过时了。10月1日，德国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宣布苏台德地区为德属苏台德。这场没有遭到异议的征服又给德意志帝国增加了10000平方公里的领土和350万（包括70万捷克人）人口。

我们的老师们都欣喜若狂地颂扬元首的美德，赞美他“没开一枪”就征服了广阔领土的天才。没费多少功夫，老师们就让我们相信了元首的万能权威，在我们心中种下了对其领袖能力不可动摇的信仰。无所不在的口号，“元首，指挥官，我们追随您”，对我们十多岁的小孩来说，不仅是一句口号，还是一个承诺，我们许多人都打算信守的承诺，即便是赌上我们的性命。

维希德的复仇

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期间，我们的学校也被一则意想不到的声明震惊，给我们带来的影响甚至更加深刻。我们被告知，凯特勒坎普学校，要立即腾空，变成一所特殊学校，专为那些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服务，也就是我们口中的“笨蛋学校”。这就意味着所有的班级都将被彻底拆散，学生和老师都将被分配到区里其他学校。“不想搬走的，”舒尔曼先生开玩笑说，“也欢迎你们留下。”接着，他宣读了分配计划。我被分到史莱登大街11号的一所学校，就在奥斯特贝克运河边上，离我家的距离是坎特勒坎普学校的两倍。幸运的是，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学，包括我的几个好朋友，都被分到这所学校。

一开始，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对于即将到

来的变化，我感到兴奋，终于可以摆脱维希德和杜克了；另一方面，想到要离开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面对不同的人和不同的问题，我又感到非常焦虑。然而后来，我的好奇心胜出，我开始热切地期盼，不管前面有什么挑战等着我。终于，焦急等待的一天到了。最后一天早晨，全校师生都在礼堂集合。我们百无聊赖地坐在座位上，许多老师轮流上台演讲，歌颂元首的丰功伟绩，辞藻华丽却内容空洞。接着，重头戏来了，校长维希德要给我们做告别演讲。像往常一样，他没有放过这个可以穿他钟爱的纳粹制服的机会。我们男孩群中发出吃吃的笑声，因为校长故意摆出一个跟墙上希特勒自画像里很相似的动作。而他故作地模仿希特勒，发出很多喉音的声音，更是让我们忍俊不禁。

维希德明显被我们惹怒，对我们说，玩闹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我们马上就不再是男孩，而是男人，要到德国经济和政治生活指定的地方去。他的声音突然脱离了轨道，失控地爬进了假声区。由此发出的吱吱声惹得学生们哄堂大笑。

校长开始讲话后，我不安地在座位上动了一下。等到这个好笑的场景出现时，虽然我也很想笑，但我早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想要跟同伴们一起笑的孩子气冲动。不止一次，维希德专门挑出我，让我为全班同学的“罪恶”负责。尽管今天是我在恺特勒坎普的最后一天，我还是想要安全地度过他管辖下的最后一分钟，不想给这位恶毒校长发难的机会。

他对他这些年轻的听众说，他们面对的是令人羡慕的未来，几年后，他们就会长大，可以自愿参军，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军队效力。他说，德国国防军，为那些按元首希望的方式长大的年轻人提供了数不清的机会。“要是你们被召唤，为了你们的元首和你们的祖国而战，我知道，我可以信任你们，你们会尽你们所能，让恺特勒坎普为你们而骄傲。”他又说。

接着他说，每堆苹果里都有几个烂的。他那令人难堪的目光盯着我的方向，继续说，有些孩子，因为某些原因，也会被认为不值得拥有穿上德国军装的荣耀。对于这些孩子，他说，他只有一个建议：滚出德国，在可以走的时候，因为未来的德国会是一个属于战士，而不是懦夫和懒蛋的德国。多亏了元首，他总结说，德国再也不会成为非雅利安人渣——犹太人、黑鬼和杂种——的避风港。希特勒不会允许他们玷污了高贵的德国血统，不会允许他们抢占德国人辛苦获得的胜利果实。

就在维希德提到“黑鬼”时，我试图藏在一个矮个同学的背后，却没有成功。仿佛听到命令一般，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我，每个人都想好好看一眼，这个被校长指认为德国人民敌人的男孩长什么样。我的心开始怦怦跳，它跳得那么厉害，我都担心会被整个礼堂听到。我的膝盖开始颤抖，身体也开始冒汗。我希望地上会出现一条裂缝，把我吞进去，好让我不用再忍受这样的羞辱。像过去许多次那样，我不停地默念那句老话，无论遇到什么事，“德国男孩不能哭。”它帮我抑制住了涌上眼眶的羞辱的眼泪。泪眼朦胧之间，我可以看到维希德在讲台上嘲笑我，带着一种沾沾自喜、恶毒的笑容，这表明他非常满意自己这一次攻击，因为他击中了他最喜欢的目标的要害，造成了最大的伤害。就像往常一样，他被别人嘲笑，而我成了替罪羊。

维希德的谩骂达到了高潮，他继续鼓吹军旅职业的美德，赞扬我们之中会被上帝拣选，值得为我们敬爱的元首和祖国的未来付出生命的人。说完这些，他跟全校做了告别。

孩子们并没有受到校长讲话的鼓舞，反而对暂时脱离学校权威的自由感到高兴，他们发出兴奋地嚎叫，冲下台阶，四散在大街上。跟几分钟前完全不同的是，现在没有人关注我了。在这种时候，谁有工夫去管别人的事呢？学校放假一个星期，而未来，多亏了阿道夫·希特勒，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要光明——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我也

慢慢跟着人群走到了大街上，

母亲下班回家后，发现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发呆。

“出什么事了？”她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没事。只是有点头疼。”我随口回答。

“学校怎么样？”母亲追问。

“还好，我想。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些演讲和别的。”

以前在我脸上看见过同样空洞的神情，母亲非常了解我的感受。

“我敢说肯定又是那个愚蠢的维希德。”她猜得分毫不差。“你跟我保证过，再也不会因为那个无知的人心烦。只要相信今天就是你不得不忍受他的最后一天，这样你就会好受多了。”

母亲说得对。只要我还活着，维希德就再也没有机会羞辱我，没有机会跟我玩那些虐待的把戏。从某种角度来说，维希德——我这小小年纪就遇见的死对头——已经死了。我觉得好像一副重担卸去。突然之间，我的人生看上去又有了光明，而学校至少放假一周令一切变得更更好了。

史莱登大街11号

一周之后，我和二十个在凯特勒坎普学校时的同学，一起来史莱登大街11号报到。我不再是六年前第一天去凯特勒坎普入学的小男孩了，而是一个有态度的即将步入青春期的男孩。跟当时的慌张不同的是，现在我几乎有点过于自信了，期盼着未来，不管前方等待我的是什么。一方面，我知道，学业上我不用担心什么，即便有可能会遇上有种族歧视的老师，我也下定了决心，尽可能不让他们影响到我。在维希德和杜克之流手下都存活的我，觉得自己可以抵挡纳粹教育界扔过来的任何巨石。

我们被分成两组，分去了两个不同的班。我这一组，非常幸运地包括我两个最好的朋友卡尔·莫雷尔和菲菲·皮特斯，分到了7B班。我们的新老师是亨利·赫伯斯特，一个黑头发的年轻男人，长着浓眉、五点钟阴影（胡子）、突出的下颌，五官轮廓鲜明。因为长相酷似夏洛克·福尔摩斯——战前德国最畅销的侦探小说的主角——他的学生私底下都叫他汤姆·夏克。这个昵称更多的是赞美，跟小说中的侦探一样，赫伯斯特先生有着极度公正、严肃能干的美名。

在对我们这些新来的学生表示了欢迎之后，他宣读了一张长长的清单，说的是在他的班里有哪些事是特别禁止的。“如果有人曾经跟你说，学习应该是好玩的，”他继续说，“赶紧忘掉！在我的班里，先生们，学习就是工作——辛苦的工作，实际上。新来的人里面，要是有人以为可以偷懒，那就大错特错了。”

铃声响起，第一节课结束的时候，赫伯斯特先生让我留下。我以为这又是什么维希德式的诡计。其他人都离开教室后，赫伯斯特先生让我坐下。

“这些话我只说一次，”他开口说道，“不过我想你应该知道，你的肤色对我来说毫不重要。在我的班上，你会受到跟其他人一样的待遇。我已经看过你的成绩单，知道你是个优秀的学生。在我的班上，如果你愿意努力学习，遵守规矩，我看不到任何我们相处不好的理由。你说呢？”

这真是一个惊喜。我向他保证，我也看不到相处不好的理由；他握了握我的手，就让我走了。在他当我老师的近两年时间里，他信守了承诺。他再也没提过我的种族问题，也没有给过我任何暗示那对他有什么影响。

在适应新同学方面，我也是如此顺利。同往常一样，我的外表令他们很好奇，尤其是在课间的操场上，但没有人想要挑衅我。开头的几个星期，我们这些从凯特勒坎普来的孩子只跟自己人玩。但很快，

我们就开始结交新朋友。渐渐地，新来的和原来的同学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直到最后，唯一一个还会说“新来的”就只剩下汤姆·夏克。很快，我就明白了他的偏见所在。不知道为什么，他跟我们这些“新来的”较劲，是拼命想要证明，他的老学生们远比我们优秀。事实证明，这真是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因为通常来说，我们跟他的老生们一样优秀，有时候甚至更好。幸运的是，汤姆·夏克非常正直，所以在判卷子时从不会为了让老生们名列前茅而作弊。尽管如此，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在极度偶然的情况下，某个“新来的”承认说我们没有学过老生们已经掌握的知识点，更让他心情愉悦的了。

只有一个男孩，对我表现出了憎恨。他就是阿恩·阿恩霍尔德特，学校的游泳冠军。不过他的敌意很短暂，很快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后来，我问起他为什么那么讨厌我，他坦白说，我刚来的时候，有传言说我游泳可以游过泰山。他担心我很快就会把他从游泳冠军的宝座上拽下来，所以非常嫉妒我。当他第一次看到我游泳，发现那些传言都是夸大其词，我的实力根本没法跟他比的时候，他的所有负面情绪都消失了。

虽然我在大部分学科上都游刃有余，但还是有两门让我头疼——英语和数学。数学，我至少努力——千方百计——地考了个及格，大部分是因为我让汤姆·夏克相信我真的努力了。而英语，却让我一个头两个大。自从我上了芬克女士——学校唯一一个有博士学位的老师——的英语课，我在英语方面的进步就彻底停顿了。我以前的英语老师纽曼先生（他代替了再之前的“恶犬”哈登先生），喜欢让我们用英语读写，让这门语言变得生动起来，而芬克女士则天天跟我们抠动词、时态等，弄得我们快要崩溃。她的课越是无聊，我越不感兴趣，直到我再也不在意我是否能说出一个英语单词。芬克博士也跟我一样沮丧，学期结束的时候，她没有给我打分，而是在成绩单上写了一句，“汉斯-尤尔根丝毫没有学习英语的天赋。”在我后来长达四十

年的英语编辑人生中，每当我绞尽脑汁地遣词造句时，我偶尔也会想到这句评语，或许，这位老师说得没错。

进了史莱登大街学校不久，我有了一个重大发现，或者说重新发现——女孩们。自从我上了学，就注意不到女孩子们了。她们只是碰巧出现在操场另一侧的同学，无论是我，还是我的伙伴们，都不怎么关注她们。突然，这一切都变了。没有被什么特殊的事情触发，跟我们同龄的女孩们仿佛一夜之间入侵了我们的思想、话题还有活动。虽然我们还是被一套性别隔离系统与她们划分开来，但我们这些七年级的男孩子突然之间就很知道要怎么去吸引另一侧教学楼的女同学了。从她们冲我们咯咯笑、眨眼睛的样子看来，这种感觉毫无疑问是双向的。

我们在课间互相交流这新近觉醒的对女孩的兴趣，从大声打闹，到充满了肢体打斗的炫耀，却不是那种两头雄狮争夺母狮的斗争。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的争斗并不是为了赢得任何人的喜爱，而纯粹是一种炫耀、博关注的行为。吸引异性关注的一个更加巧妙更加有效的方式就是传纸条，通过我这样的信使传来传去。拜维希德和杜克之流所赐，我十分清楚，如果我跟德国女孩有什么关系的话，对纳粹来说是多么大的禁忌。所以我肯定不会去玩这种游戏，但我充当各式各样情侣的中间人和知己，以此获得满足。像《风流剑侠》里演的那样，我会教朋友如何赢得女孩的芳心，却不会让她看上我。虽然这与我的同学们享受的一对一恋爱关系相差甚远，但却是当时那种局势下我与爱情所能有的最亲密接触了。我有了合情合理的借口，可以靠近我的暗恋对象，可以跟她交流，却没有被拒绝或者更糟的风险——被某个大人告知，或许是这个女孩的父母，我是在痴心妄想。

新的爱好

对我们这一代在汉堡长大的男孩来说，没有什么比足球，德国的国球，更重要更吸引人的了。我们班上所有男孩都为足球疯狂，即便踢得不好，也是疯狂的观众和球迷。不知道为什么，我两者都不是。我从不喜欢追、踢或者运球，也不喜欢坐在长椅上看别人做这些事。在一个呼吸、吃饭、睡觉都跟足球相关的城市，我对这项运动的漠然几乎跟我的肤色一样另类。我根本不关心HSV队（喜欢自吹自擂的汉堡业余足球队）的输赢，这冷漠程度几乎可以判为严重的叛国罪了。因此，一说到足球，我的同学们就会把我当成“饭桶”，然后努力避免跟我分到一队。要不是我在田径方面还有几分实力，他们就要把我当成十足的体育窝囊废来鄙视了。

被当成足球白痴固然很伤我的自尊，但比起想要成为一个令人尊敬的运动选手而付出的努力根本算不了什么。同时，我感到我非常需要加入某种运动，可以让我像那些痴迷足球的伙伴们一样痴迷的运动，一项可以让我获得我渴望已久的认可的运动。

很快，机会就来了。有一天——那时我大概十二岁——我和几个朋友走在从学校回家的路上。一个年轻的，看上去像是运动员的金发男子拦住了我们。他说自己叫鲁迪，是巴姆菲尔德郊区一个业余拳击俱乐部的教练。鲁迪问我们对拳击有没有兴趣，他的俱乐部有一个少年组。他建议我们先去看看，如果喜欢的话再加入。

我确定，教练的邀请里面不包括我，因为在那个时候我很清楚，德国所有有组织的体育活动都由纳粹体育部控制。上次试图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悲惨后果，终结了我被任何组织认可的希望。没有一个组

织会毫无保留地以平等的态度张开双臂欢迎我。我以为我会被告知俱乐部不接受非雅利安人。然而，我还没来得及走开，教练直接转向了我。

“如果你愿意加入，我会把你培养成一个非常好的拳击手。”他对我说。

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过这句话就足以让我下定决心加入了。

“直接来老枪俱乐部。”鲁迪说，“我们每周二周五晚上和周日上午都有训练。”

我们五个人都答应了他会去那里，当然要先征得父母的同意。

意料之中的，我母亲对我加入拳击俱乐部这个主意并没有多高兴。不过令人惊讶的是，她还是祝贺了我。“我知道，第一次被打疼的时候，你就会退出了。”她预言道。

穆缇了解我，但也并不是那么了解我。

那个健身房，位于一个废弃的枪支俱乐部改造成的啤酒馆，离我家骑自行车十五分钟。我们到那儿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三十多个男人和男孩了，有好几个跟我们差不多年纪。在跳绳的呜呜声中，我们还能听到拳击台上两个人交锋时皮手套的飕飕声。其他人则对着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沉重的拳击袋和球打。

几个月里，这个全男性、满是血腥味、咕噜声和汗臭味的地下世界变成了我的全部。一个星期三次，我会骑上我的自行车，穿上运动服，脖子上挂一副拳击手套，奔向巴姆菲尔德。很快，我就成了单人行，因为其他四个人都放弃了，一个接一个，在他们发现拳击其实是一条“双向街”的时候。你能收获一些东西，也得付出一些。

鲁迪以前是国家轻量级业余拳击冠军，职业是电工，但在教授我们这项运动的技巧，把我们的身体和心灵都往格斗方向培养时，却是一位非常严厉的师父。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位友善而体贴的朋友，有着无穷无尽的耐心，让我们深深爱上了拳击，并且明白了运动员精神的真正涵义。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攻击腰带以下

部位、肾部或者对一个已经倒下的人出击更卑鄙了。他从不允许我们没有先握手就开始对打，也不允许我们没像同志般拥抱就离场。

鲁迪确信我拥有成为拳击手的巨大潜力，因为他认为我的“天赋”——快腿、快手和快速反应能力，都值得好好挖掘。在当时的业余拳击规则下，我要年满十四周岁才能参加青少年联赛的正式比赛。鲁迪说，两年内，他会让我做好准备，打败我这个重量级内的所有人。“我会让你成为德国少年冠军。”鲁迪承诺说，“你只需要做你份内的，像现在这样努力训练，其他事情都交给我。”

我无比地愿意相信，我会成为一个冠军——尤其是我的英雄和偶像乔·路易斯在输给马克思·施姆林两年之后又重新证明了自己，成为了新任重量级世界冠军。用一场轰动的第一轮淘汰赛，他摧毁了纳粹的伟大白人希望，终结了雅利安高级论的谎言。虽然我是乔·路易斯的忠实粉丝，但我同意鲁迪和大多数德国人的看法，认为美国拳击界欺骗了施姆林，在他当年决定性地战胜了路易斯之后，没有给他机会与当时的世界冠军吉姆·布拉德多克进行冠军争夺赛。相反，他们把这个机会给了路易斯，而不出所料的是，路易斯战胜了布拉德多克。有一天我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像美国褐色轰炸机一样的冠军，这个想法真的令人难以置信，但是，如果我能相信鲁迪，它也不一定难以触及。

不过，就算没有这样长久的梦想激励着我，我在拳击俱乐部度过的时光也是非常收获有意义的。除了在多次受到轻视时我开始会表现出一些侵略性，我的体质也得到了增强，在同龄人中的地位也提高了许多。我的威望空前高涨。就连最年长、块头最大的男孩子们也开始把我当回事，非常尊敬我。在学校和街区都有人说，我已经成了男子汉气概的代表人物，所以与我作对是非常不明智的。

奇怪的巧合是，在我加入拳击俱乐部不久，希特勒就把拳击课规定为学校体育课程的必修课，因为他认为拳击可以塑造性格、激发自

信。我们学校派一个老师去外面学了几节速成课，回来给我们上第一节拳击课时，我早就是个小有成绩的业余拳击手了。俗话说，“在盲人国里，独眼龙也能称霸王”，我立即就被当成了拳击天才。因此老师经常让我去示范各种拳击技巧，从正确的脚部动作到出拳动作再到以一种绳子快到看不见的速度跳绳。他甚至还让我跟一连串对手打公开赛。由于他们都毫无经验，所以跟他们对战，让我有机会证明自己的专业，却又不用担心受伤。但是在享受了几个星期胜利的荣耀后，老师通知我说，他要停止公开赛，因为这不是课程必需环节。而我确信真正的原因是，他担心他的一些同事会认为我这样一个非雅利安人在拳击这种流行的运动中屡屡获胜会传递出错误的信息。不过，后果已经造成了。我作为全校最好拳击手的地位已经被牢牢确立，实际上在我剩余的学校时光里，这一地位一直得以保持。

同时，在俱乐部里，我不得不相当辛苦地赢得自己的地位——面对真正强劲的对手。鲁迪让我见识各种本领，经常让我与体重和技术都在我之上的男孩对战。用这种办法，他教会了我如何运用自己超级快的速度和反应，在对手拳头过来的一瞬间躲开。有时候，我反应不过来，代价就是鼻子被打得开花，嘴唇被打出血，眼睛被打肿，或者下巴脱臼，好几个星期吃东西都疼。有好多次，我都认真地考虑过，把我的拳击手套束之高阁，别再去挨打了。但每次，当我想到放弃后学校和社区里会有什么反应，我都改变了主意。除此之外，我还真的没有勇气看着鲁迪的眼睛对他说我再也受不了了。所以我没有放弃，反而选择了面对巨大压力时的另一条出路。我迎难而上。在鲁迪的不断鼓励之下，我越来越刻苦地训练，打造自己的拳击风格。在沙包袋、跑步和跳绳之上挥洒了无数个小时的汗水之后，我可以跟青年联赛里十几个孩子的每一个对战。渐渐地，真的是渐渐地，我把自己打成一个难以捉摸的对象，跟任何一个同龄人走进拳击场，我都不用担心被打。我可以预见到他们的出拳，在到达之前早早闪开，不会受

到任何伤害。

害怕被说成是“半途而废的人”，并不是我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巴姆菲尔德拳击俱乐部的时光很奇怪地与似乎无处不在的纳粹政治毫不相关。它是狂热希特勒主义海洋中一个与政治无关的孤岛。设施方面的缺乏，例如淋浴房和新款的设备，在团队精神方面得到了弥补。俱乐部成员们都是普通的工薪阶层，他们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并接纳彼此，包括我在内。偶尔说到我的种族问题，大家也都是用羡慕的口气。我的大多数同伴都跟鲁迪一样认为，我父亲的非洲基因是拳击场上的决定性财富。虽然他们的看法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刻板印象，我却不觉得被冒犯，因为我自己也认同。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身手敏捷，但我相信，我在拳击方面与众不同的优势都跟他有关。

鲁迪和我都没有怀疑过，我的刻苦训练终有一天会给我和俱乐部囊获一枚青少年业余拳击赛冠军奖牌。等我满了十四周岁，鲁迪觉得我已经准备好进入全国联赛了。因此，当他以我的名义向帝国体育协会提交申请却因为老套的“非雅利安人”被拒绝时，我们俩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个借口，我已经听过太多次，我知道没有希望了，但鲁迪可不是会轻易放弃的人。他毫不犹豫地给全国体育界最高权威写信。他说他认识一个有门路的人，能确保帝国体育部长亲自看到这封信。鲁迪把信念给我听。在信里，他说了我在运动精神和拳击技巧方面有多么优秀。如果给我机会去竞争，鲁迪恳求道，我不仅会赢得次轻量级德国青少年联赛的冠军，还会成为俱乐部乃至整个拳击界的中坚力量。在信的结尾，他请求部长发扬体育精神和公平竞争精神。

我感谢鲁迪这样为我仗义执言，但也很清楚，鲁迪说的那些理由不足以让纳粹种族主义者允许我参加比赛。我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虽然我不知道体育部长是否看到过鲁迪的信，但我知道，鲁迪从未收到过任何回复。因此，报名的日期越来越近，另一个男孩——我

曾经在训练时多次打得他满场跑——代替我报了名。

几个星期后，令我懊恼的是，代替我的那个男孩回到俱乐部时受到了英雄式的欢迎，他拿下了分赛区的冠军。虽然我知道，我被禁止参加比赛，并不是他的过错，但还是忍不住深深地怨恨他。在我看来，他拥有了本来应该属于我的东西。所以我迫不及待地要再会会这位“拳击大师”——只是在训练的时候——我想向他证明，他只是名义上的冠军。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躲着我，要么在训练时离我远远的，要么说自己不舒服。不过最后，他没躲过我，我也如愿以偿了。那一次，我拿出了从学习拳击以来从未有过的凶猛，发泄似的一连串出拳，冠军很快就被打得靠在绳子上，鼻血四溅。虽然鲁迪大喊着让我停下，我还是不停地打他，仿佛他是我的仇敌。最后，鲁迪不得不走进场来，使劲把我从跌跌撞撞的冠军身边拉开。“我真后悔帮你写那些体育精神。”鲁迪带着明显的厌恶冲我喊道。

“别跟我说什么体育精神！”我也冲他喊道，然后拽下手套，穿好衣服，走出了俱乐部。我下定决心再也不回来了。

战火蔓延到汉堡

1939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德国军队穿过波兰边境线进攻波兰，这一消息受到了我和我们八年级同学的热烈欢迎。我们的爱国思想尚且稚嫩，一直以来又被戈培尔险恶的宣传机器精心“灌输”了许多波兰人挑衅居住在波兰的德国人的新闻。我们觉得是时候让波兰人知道，不能随意对待德国人了。我们唯一懊恼的就是，年仅十三的我们，太过年幼，可能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都没有机会拿起武器。因此，当有一天，赫伯斯特先生说 he 不得不放弃教职参军入伍的时候，我们全都嫉妒得不得了。几个星期后，他结束了基本的入伍训练，来

看了我们一趟，炫耀他新剪的平头，还有崭新的军装。当他幽默地讲述他是如何适应军队生活时，谁也没有想到，赫伯斯特先生和我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有在战争中存活下来。

令我们大失所望的是，汉堡的生活似乎还跟以往一样平静。唯一能让我们想起身在战时的，就只有每天的新闻报道和影片了。后者是戈培尔最常用的宣传武器之一。生动的影像资料让我们看到了德国军队在十八天内就压倒性地打败了落伍的波兰军队。波兰人用长矛对抗先进的德国坦克，如此徒劳，已经成了大大的波兰笑话。我们这些孩子对德国的胜利自然是欣喜无比，但波兰和战争似乎离我们太远了——远到我们觉得无法改变我们的生活。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自我安慰，做我们力所能及的——挨家挨户地找主妇们要吃剩的骨头，带到学校堆成一堆，再被拖走加工成重要的战略物资润滑油。否则，除了穿着军装的人越来越多，以及为了防止敌机定位地面目标和节约电力而实施的严格管制外，汉堡的生活似乎仍然正常，而且——就我们这些年轻人而言——极其沉闷。然而，很快一切都将改变。

随着战事的扩大，英国和法国的加入，有好多活动是我们这些孩子也可以间接享受的。很快，我们的运动英雄被军中英雄替代，比方说潜艇指挥官冈特·普林，他的U-47潜入英国防御严密的“无法穿透”的斯卡帕海流海军港，击沉了英国战舰皇家橡树号和833名船员。他和他的部下毫发无损地回到了自己的基地。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把他当英雄一样接见。戈培尔还成功地塑造了两个战斗英雄，王牌飞行员维尔纳·莫尔德斯和阿道夫·加兰德，他们击落敌机的数量像足球比分一样每天在新闻上报道。

不过，并不是新闻上所有德国打胜仗的报道都让我高兴。它们有些令我非常难堪。1940年6月初，德军大败法军，戈培尔的摄影师们欣喜地拍下了成千名疲惫的法国非裔士兵，穿着破破烂烂的军装，被押往德国战俘营，影片里还配上了挖苦评论，“现在走来的是西方

文明的守护者。”这群不幸的囚犯，跟明显是雅利安人长相、自信满满走在队伍里的德国士兵放在同一个镜头里。“而这里，”旁白嘲讽道，“则是野蛮人。”

每次德国打了胜仗，电台里的特别报道都会伴随着欢天喜地的奏乐，末尾都是军乐团演奏的流行曲目《我们出征英格兰》——这首曲子的宗旨就是把这过程中的战争和死亡粉饰成欢乐。报道英国城市考文垂被德国炸弹摧毁时，戈培尔的媒体一片喜气洋洋。他们甚至还新创了一个词“coventrized”，意思是“彻底摧毁的”。帝国元帅戈林在他旗下的空军取得了几次胜利后，曾经公开夸口说，如果盟军有一颗炸弹能打进德国领空，“你可以叫我迈埃尔。”这种声明是典型的戈林式幽默，因为迈埃尔是德国最常见因此最不起眼的姓名。既然夸下了海口，这位德国空军总司令便力求完美地启动了一个大型公共防空洞的建设项目。很快，汉堡的地面上到处都是混凝土掩体，就连汉堡冬季游乐场——圣灵广场都有两个高高的堡垒式掩体。它们高耸着，像两个粗陋不堪的野兽，给汉堡优雅的天空增添了一丝凶险的意味。除了为数千名平民提供防空掩蔽所之外，它们还充当重型防空炮兵连的平台，令它们得以与低空飞行的敌机进行正面战斗。它们还配备了最先进的收听装置，也就是雷达的前身，看上去像是未来派画作里野兽巨大的黑色金属耳朵。直到战后，人们才得知，其中一个的隔音地下室里面还有盖世太保的刑讯室。到1945年4月6日，才有报道称，盖世太保曾用这一设施折磨反抗者，目的是让他们吐露共谋者的身份。

为了进一步拦截低空攻击，降低轰炸命中率，汉堡上空布满了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用能够穿透敌机机翼的坚固电缆固定在地面上。除此之外，由于实行了从早到晚的严格灯火管制，我们不得不用毯子盖住窗户，以防最微弱的光束漏到街道上。夜间，防空小组会用探照灯在空中搜索。为了迷惑敌机飞行员，也为保护把阿尔斯特流域划分成内外两部分的著名的伦巴兹桥，内阿尔斯特河完全被伪装网覆盖，而

一座伪造的伦巴兹桥却与真正的伦巴兹桥平行而立。

戈林承诺过有些事情绝不会发生，但政府还是做了充足准备，包括给平民的毒气面罩和防火演习。在这些演习中，我们被要求戴着毒气面罩穿过一个巨大的、充满气体的帐篷，用灭火器扑灭一小撮化学方法点燃的火焰。为了减少燃烧弹袭击后的火灾风险，汉堡居民被要求参加一个大型的“废物处理”项目。母亲和我，和成千上万名汉堡居民一样，被要求清理我们不想要的旧床垫、家具、玩具、书本等等，把它们扔在路边，等着政府用卡车搬走。

虽然我们做了这样大量的防空袭准备，许多人还是感染了戈林的乐观精神，认为他的空军部队能让我们毫发无损，把这些准备当成不必要的行动。很快他们就知道自己信错了人。1940年5月18日，英国皇家空军对汉堡发动的一次空袭炸死了34个市民，因为他们，戈林成了许多笑话里的帝国元帅“迈埃尔”。

有一段时间，汉堡的轰炸袭击还是相对罕见，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罕见到一栋楼房被击中，我和成百个好奇的人就会冲到现场，惊叹炸弹有着如此巨大的毁灭力。也就是在这暴风雨前的宁静中，我收到弗里茨叔叔的消息，说他的母亲，我敬爱的默勒姨母，从我很小的时候就照顾我的默勒姨母，在我们家对面他的家中，因病去世了，享年七十二岁。这个消息令我伤心至极，因为在我心里，我把默勒姨母当做祖母一样看待，也正是她让我长成了一个真正的汉堡人，让我从心底里热爱这个城市。我知道这种热爱会持续我的整个人生。

当弗里茨·默勒说他那从未去过防空洞的母亲，在睡梦中安然离世，因而不需忍受不断升级的空袭以及必将到来的苦日子，其实是一种幸运时，我也感到了些许安慰。弗里茨说得当然没错，但即便是他，也没有预料到接下来的事情会如此糟糕。

随着盘旋在上空的敌机及空袭增多，我们在夜里被呼啸的警笛声惊醒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我们像驴一样，把最值钱和最重要的行李带

在身边，随时准备撤离。母亲和我经常跟邻居们一起，去半个街区外的公共防空洞。跟地上的防空建筑不一样的是，“我们的”防空洞，可以容纳一百个人，是四层楼高旧华夫饼工厂的地下室，用钢筋做过特别加固，墙壁也重新粉刷过。这里曾经是美味的华夫饼碎屑的分发地，都早已经被关停。里面有木制的长椅，靠墙壁还有带床垫的双层铺。它有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里面都有巨大的气泵，通过这些气泵，只要手动操作扫帚把一样的杆子，污浊的空气就可以被排出去，新鲜的空气可以被吸进来。

随着防空洞越来越多，从安全角度来说，我们的防空洞不再是最有保障的了。实际上我们已经完全听天由命，认为只要一场袭击，我们就会被从地球表面抹去。不过，我们的防空洞地理位置是最方便的，并且我们被告知，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我们真正需要的保护”。我们并不相信，却又怀抱最好的希望，虽然我们也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生活还在继续

虽然我们感觉到越来越朝不保夕，但在这种情形下，汉堡的生活还是非常接近于往常地继续，包括某些宗教传统还保留了下来，比方说中学毕业时的坚信礼。作为受过洗的路德教徒，我们八年级所有男孩都要参加坚信礼。这绝不是因为我们社区有多虔诚，只能说明当地的老传统是多么持久。从灵性上来说，我们这些小孩是彻头彻尾的白痴，却尚不自知。有些纳粹老师主张回归日耳曼异教，崇拜日耳曼神灵的万神殿，让我们不得不把做礼拜和祈祷看做是娘们才干的事。因此我们大多数人在出生不久受完洗后就再也没进过教堂。不过虽然我们不把教堂当回事，但还是把坚信礼当做生命中最重要仪式。

为了有资格参加坚信礼，提前一年，我们附近的圣灵教堂就坚

持让预备接受坚信礼的人放学后去参加每周的坚信礼课程和星期日活动。我班上有七十五个男孩，另一边还有差不多数量的女孩。虽然讨厌这样占用我们的空闲时间，我们还是不情愿地参加这些课程，而我们的父母也没给我们别的选择。

南德和西德的主要宗教是天主教，遵守宗教礼仪在人们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北德的大多数新教徒则明显没那么虔诚了，至少是在参与宗教活动方面。汉堡尤其如此。大多数工薪阶层虽然正派守法，却很大程度上满足于与上帝和平共处的关系。“让亲爱的上帝做个好人”就是许多汉堡人对待创世者的冷漠表现。因此大多数汉堡人一生之中只有四次与教堂直接接触——洗礼、坚信礼、婚礼还有最后的葬礼。我母亲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汉堡人，却也不例外；星期天的上午，比起坐在教堂照料自己的灵魂，她更喜欢睡个懒觉。在工厂辛苦工作了一个星期之后，她觉得自己值得好好休息。虽然没有去教堂的热情，但她信任上帝，并且认为我应当完成坚信礼。

让我们这些害怕上帝的年轻人在短短十二个月内从无礼的半野蛮人变成“坚信者”，这副重担就落在了奥特默牧师宽阔的双肩上。这个胸肌壮硕如公牛的人，把自己对犹太人耶稣基督的专业信仰，与对最大的反犹分子希特勒的狂热忠诚毫不违和地调和在一起。他狂热地支持希特勒在波兰的军事冒险，称赞这是纠正波兰对德国旧恶的公义之举。他从未停止过向上帝祈祷德国打胜仗，并且保佑“我们敬爱的元首”。根据奥特默牧师的理论，耶稣作为“千真万确的雅利安人的上帝”的儿子，最多只有一半的犹太血统，显然没有遗传到母亲这边犹太人的不良品性。奥特默牧师指着教区教室墙上两大幅画，一幅把耶稣画成一个金发碧眼的成人，另一幅把他画成一个更加可爱更加白皙的小孩，作为他这番言论的证据。

因为坚信课没有作业，也不打分，我们就很不在意《圣经》学习，对奥特默牧师在课堂和圣坛上的布道更是毫不上心。在这一年

年尾的一个星期天，牧师布道时，我们这种态度达到了戏剧性的高潮——或者更恰当地说，到了最低点。

跟往常一样，我们中的有些人选择坐在教堂的楼座上，牧师不大看得到我们，因此我们可以有很多种不同的办法打发无聊的时间。有些男孩干脆睡着了，其他的则玩起了扑克或其他游戏。我则看上了侦探小说。那个特别的星期天没有什么好玩的，几个朋友忙着把我们当天进教堂时发到我们手上的节目单折成纸飞机。我们管这种纸飞机叫“燕子”。一个男孩一声令下，纸飞机就从楼座上飞了出去。看到一队从空气动力学上来说完全正确的纸飞机，以安静、优美的姿态降落在教堂地上，我们竭尽全力才忍住没有笑出声。虽然有些纸飞机险些砸中了奥特默牧师，但他没有停止布道，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般。当他像往常一样为“我们敬爱的元首”祈祷，结束布道时，他终于戳破了男孩们的恶作剧。“我知道你们是谁。”他冲着楼座内的“罪魁祸首”大喊，颤抖的声音里包含着非基督徒的愤怒，而从他厚厚的镜片后射出的目光像激光一样击中了我们。“下次坚信课我再收拾你们！”

我们都不知道奥特默牧师打算怎么对付这些肇事者，但他暴跳如雷的样子让我觉得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有容人的雅量。不过，因为我和这场即兴空中表演没什么关系，我就没想太多。当我们去上下节课时，奥特默牧师念了六七个名字，令我目瞪口呆愤怒恐惧的是，里面居然包括了我。我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的清白分辩，他就命令我们站到前面。接着他说他要对我们杀一儆百，禁止我们参加几个星期之后的坚信礼。等到我终于有机会开口跟他说，我只是一个无辜的旁观者，跟纸飞机事件绝对没有任何关系，他还是要我“像个男人一样”接受惩罚。即便好几个肇事者都一同为我作证，他还是不肯放过我。我记得母亲经常挂在嘴边的教导，远离麻烦精，“一起被抓到，一起被吊起。”事后诸葛亮的我，现在知道她是多么正确了。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件事，

我却跟那些吊儿郎当的人一起混在楼座上，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就算是奥特默牧师告诉我们他要切掉我们的大拇指，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受打击。我们要怎么跟父母说？他们为了坚信礼准备了快一年。我母亲已经为我买好了坚信礼的西装，这是我第一套搭配了长裤的西装，也是母亲用新开始使用的战时配给券买的第一套西装。我要怎么跟我们的朋友和邻居们说，母亲已经邀请他们来参加我的坚信礼。只说我在教堂里犯了错所以被禁止参加就可以了么？

就在我一边绝望地祈祷，一边绝望地想办法要把这坏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奥特默牧师又给我们做了一番严厉的训话，说我们要赶紧消除自己的幼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精神上成熟起来。“你们可能还意识不到，”他跟我们这些十三四岁的男孩说，“但你们的童年已经结束了。”我们沉浸在自己的内疚和害怕之中，一会儿过后，他终于让步了，把“驱逐出教堂”换成了每天放学后一个小时的苦力劳动，我们要保证教堂的草地是精心爬犁过，没有任何纸屑的。他还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不可以去教堂的楼座。“从现在开始，我要你们就待在我眼皮底下。”他咆哮着，“就这些。希特勒万岁！”

欣喜于能够幸免于难，我们兴高采烈地走出教区，仿佛被赋予了第二次生命。我从灾难边缘逃过一劫，跟自己保证，一定要听从奥特默牧师的建议，从现在开始要走正道。

几个礼拜后，在明媚的复活节清晨，在奥特默牧师冗长的坚信布道之后，我跟一群穿着崭新深色西装新理了发的男孩走成一队，从一边走上圣坛，而一群身穿深色坚信礼服的女孩从另一边走上去。一个男孩，一个女孩，这样交替着从奥特默牧师那里接受了祝福、握手和坚信证书。我知道母亲就在观众席里，但教堂里人太多，我不知道她在什么位置。等轮到我站上前，我注意到观众席里的人们，大多都是我们的亲戚和朋友，都伸长脖子想看清楚我。“祝福你。”奥特默牧师一边冷冰冰地说，一边机械地握了握我的手。我的直觉告诉我，

他一定是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基督徒慈悲情怀，才能把我像其他人一样对待。

学徒期

四年前，我四年级老师格里梅尔绍泽尔先生告诉我——虽然我成绩优异——我还是上不了实科中学或高级中学，因为我不是雅利安人。他实际上是在说，我想走专业化道路的大门被永远关上了。在纳粹的法律下，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虽是免费的，却严格只对那些不仅在初等教育中表现出极大天赋并且还是希特勒青年团成员的小学生开放。对于那些不管是因为学术还是别的原因没赶上这趟船的孩子，只有两条路可以走：当三年学徒工，学门手艺；或者终身只做低收入、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

看到我与高尚的、专业性的未来无缘，母亲比我更伤心。从我还是个小男孩，她发现我对修补和需要动手的事情无比热爱时，她就认为我未来肯定会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工程师。看到这条路被堵死后，她想到了帮我成为除了工程师之外的第二个选择——专业的机工，当了学徒就能实现。那个时候，德国的学徒是没有薪水的，每个星期象征性地发点零花钱。这意味着母亲还得再养我三年。我告诉她我不能让她这样做，她一个字也不想听。“你要去当学徒，就这样。”她坚持说，“不过，如果能让你好受点的话，”她又说，“等你有钱后你可以还给我。”

在年轻的乐观心态下，我告诉她，我们就这么办了。

我的许多同学可没我这么幸运了。虽然有些人的父母比我母亲宽裕得多，他们却不愿意为初中毕业之后的孩子再做任何经济上的牺牲。跟我母亲不同的是，他们坚持认为儿子应该立即去工作，帮助家

里挣钱，不管他们是不是一辈子都会当没有任何技能的劳工。

八年级毕业的几个月前，我们被送到市中心的劳动局做职业咨询。这是我们年轻生命中最重要时刻之一，因为没找到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就意味着毫无职业生涯，或者只能进一家血汗工厂。在这种情形下，想到马上就要跟指派给我的顾问维特先生见面，我就觉得非常焦虑。在他办公室外敲门时，我紧张得不得了。当一个声音命令我进去的时候，我的心仿佛漏跳了一拍。坐在桌子后面的是一个金发碧眼的中年男子，但那个时候我能看到的就只有他西装领子上佩戴的党卫军黑色徽章。这只能意味着手中捏着我未来的男人是纳粹这个狂热种族主义精英机构的成员。我立即以为会听到一番羞辱性的、维希德式的教训，说些要阻止犹太人和非雅利安人的渗透、颠覆贸易等等。令我惊掉下巴的是，维特先生友善地冲我眨了眨眼睛，然后让我坐下。他仔细地查看了学业记录，点头表示赞许，还问我是否按指示带来了自己制作的东西。我忧心忡忡地拿出一把小斧子，是我在尤根·布朗的铁匠铺里做的。“这把斧子全是你自己做的？”维特先生一脸震惊地问道。

“是的，先生。”我回答，我说我童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邻居家的铁匠铺里度过。

“有一天你会给德国做出大贡献的。”维特先生说。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或者是维特先生失去了最后一丝理智。在遭受了过去那么多打击之后，他说的我可以在纳粹德国有所成就似乎是可笑的。但维特先生看上去很严肃。他说有一天，在不久的将来，德国将在东部和非洲西南部重新定义自己的殖民地。到那时候，他说，就会需要大量受过技术训练的德国人去培养和发展非洲的劳动力，“你会是这个任务的理想人选。”

维特先生预言我会是一个“优秀的机工”，面谈结束时，他向我保证，会让我去一家一流的公司当学徒。我谢过了他，敬了强制的

“希特勒万岁”礼。就在我准备离开的时候，他把我叫住了。“你不打算跟我握个手吗？”这位党卫军成员问。我转过身，跟他握手。当我终于走出那个房间，我对面谈的结果感到非常高兴，却也很困惑于维特先生对我的奇怪态度。

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个人，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但他遵守了他的承诺。几天后，我就接到了著名卡车拖车制造商格特弗里德·林德勒公司汉堡公司的面试通知。

1940年4月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穿着崭新、笔挺的蓝色工作服，在林德勒公司开始了三年的学徒生涯。公司在布拉姆菲尔德大街，距离我家骑自行车只需要十分钟。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新学徒一起报到：好相处的海恩兹·谢尔，有着举重运动员一般的体格；好脾气、瘦骨嶙峋的英格尔夫·迪特尔，中级警官的儿子；还有丽莎·浩林，一个健美的邻家女孩，她要在管理部门学习管账。公司技术老板纽曼师傅在办公室里欢迎了我们，然后带我们去了车间。车间里各种大型机器发出震耳欲聋的噪音，弥漫着浓烟，还有许多电弧焊的光刺痛我的眼睛，这一切让我不习惯。“别看那些光，”纽曼师傅提醒我们，“要不然你们的眼睛要受伤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对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深深的后悔。我这是在干吗？我为什么要选这样一个危险又不利的环境，我后半辈子都要以此为生？为什么我没聪明点像我的伙伴菲菲·皮特斯一样，也是在今天，他去了汉堡市政厅的高级酒店，穿着完美的黑色燕尾服，开始了他的学徒期。但我知道后悔也晚了，我决定停止无用的抱怨，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处境。

纽曼师傅是个高个子的中年男子，留着平头，面色红润，一口地道的柏林话。他把我们带到一个铁丝笼面前，里边有一个大工作台。工作台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大海报，画的是一个金发碧眼、齐格弗里德式的工人，卷着袖子，露出结实的肌肉，右手举着一个大锤子。劳

动光荣！硕大的字后面是纳粹的万字旗。如果说这张海报的内容是想激励我们的话，那么它向我传达的信息就完全错了。我能看到我的将来就是无穷无尽的苦工，还有极少极少的光荣，如果有的话。

“这是你的工作站。”纽曼先生说。他解释说，这个笼子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我们只有在去洗手间、工间休息或想辞职时才能离开这里。“时不时地，”纽曼先生继续说，“你们会被指派为拖车生产不同工序的熟练工的帮手。无论什么时候，你们都要对熟练工恭恭敬敬，要称呼他们为先生或者‘您’，而不能直呼他们的名字或者是‘你’。不管他们要你们干什么，你们都要做到。懂了吗？”

我们都说懂了，但我可以从其他两个同伴脸上痛苦的表情看到他们的内心——跟我一样——并不这样认为。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真正认清这个现实，正如奥特默牧师之前说过的，在我十四岁的时候，童年已经结束了。我振作起来，承受了巨大的文化冲击，强迫自己进入一个粗粝、残忍的成人世界。几年前汉堡另一个加工工厂发生的一起事故常常盘桓在我心头。午间休息时，一个机工想要跟另一个正在睡觉的同事开个玩笑，把压力氧气罐的软管塞到他肛门附近，想要给他“打上点儿气”。然后他慢慢地打开氧气阀门，氧气漏了出来，劲道大到把这个毫无防备的工人的肠子全都冲烂，让他一命呜呼。我心里牢记着这个故事，下定了决心，绝对不在工厂打盹儿。

作为第一年的学徒工，我们成了典型的“打杂的”。我们被教育要把被虐待的熟练工们和毫无同情心的师傅奴役的状态，看成是宇宙自然界的规则。他们大多都是言行举止粗野的劳工，对冷嘲热讽和与性相关的“笑话”有着孩子气的热爱。在他们的监管下，如果要在这样一个不健康的环境中存活下去，我们这些学徒工别无选择，只能迅速成长。当熟练工对我们呼来喝去时，我们展现出了新近生出的“男子汉气概”，用更好的表现来超越他们。我们只有一个行为准则，从来不

曾逾越过，那就是，我们从不在父母面前暴露在工作中学到的坏行为。也就是说，对我母亲而言，我还是她天真无辜的儿子，连一只苍蝇都不会伤害。同理，我确信，即便是工厂里最惹人厌的熟练工，也是他们妻子尊重敬爱的丈夫，是他们子女正派得体的父亲，是别人眼中的好邻居，如同我在巴姆贝克认识的熟练工一样。

熟练工们似乎抓住一切机会——许许多多的机会——让我们这些学徒工觉得自己就是彻头彻尾的白痴，觉得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这简直成了他们神圣的职责。我的新处境中唯一积极的一点就是，熟练工对学徒工尤其是第一年学徒工的轻视，是一视同仁的，在被虐待方面，我从未因为我的种族被针对过。当前我只能忍受这种状态，因为我别无选择，我盼望着有一天，我的个子更高些，块头更大些，熟练工想欺负我时就会三思而行。想到三年后，没有人，即便是纽曼师傅，敢再欺负我，我心里才能好受一些。

因为我们学徒工只能埋头干活，却没有说话的权利，所以我们跟熟练工之间的沟通其实只是单方面的事情，而且大部分只是跟工作直接相关。尽管如此，就在我管好自己的嘴，却保持耳聪目明的时候，我很快就清楚了熟练工为什么这么刺头。虽然他们谨慎到从未公开说明，每次电台广播后他们嘲讽的言语都确凿无疑地表明，他们绝不是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崇拜者。就连他们的伙伴皮特·施密特，他们推举出来的车间代表，也是厂内纳粹党的正式代表，也经常跟他们一起嘲讽政府的花销。我了解到，施密特是厂里唯一一个被选中带着妻子乘邮轮去葡萄牙马德拉旅游的。这个被大肆宣扬的“力量来自欢乐”项目本应该适用于所有德国工人的。在发工资的日子，我经常听到人们抱怨，从1933年开始，工会和加薪一起消失了，工人要想涨工资，就只能干得更快，干的工时更多，产出更多。

随着熟练工越来越熟悉我，他们在我面前说话就越来越随意，因此，我听到了许多不该听到的话，比方说关于希特勒及其政府高层

的闲言碎语。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因为喜欢搞潜规则并且与各种各样的影星有染，被说成是巴贝尔斯堡的色鬼^①。也是从他们那里，我才知道冲锋队负责人、超级猛男恩斯特·罗姆，那个长得像奥利弗·哈迪^②的人，在被希特勒定为叛国分子并处死之前，其实跟自己的冲锋队队员有染。还有一个刺激的八卦是，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的母亲有个有钱的犹太情人，在戈林年少时曾资助过他。因为戈林总是把自己肥胖的身躯塞进挂满勋章的制服，他成了大多数政治笑话的主角。工人们还总是嘲笑他1935年的“时代婚礼”，他娶了一个名叫艾米·索内曼的没名气演员，还生了一个女儿，虽然有传言说，他在1923年失败的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受了伤，失去了生育能力或者是阳痿了，又或者两者皆有。这个女孩的名字，艾达，据讲这些笑话的人说，就是一个缩写，意思是“艾米谢谢副官”，暗示戈林只有在副官的帮助下才能当爹。他们常说的还有纳粹德国劳工阵线领导人罗伯特·莱伊，据说他其实是个犹太人，原来的名字里面是莱维，据说他是个真正的酒鬼。还有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人、大块头巴尔杜尔·冯纳·席拉赫，据我那些同事说，把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藏在体面的婚姻和父亲的身份后面；而空军元帅马歇尔·厄哈德·米尔希，其实也是犹太人，他让自己的母亲（犹太人）改掉了他的犹太籍，说他不是她的亲儿子，而是他那雅利安继父的私生子。对我这些同事而言，没什么是神圣的，这意味着即便是元首本人也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嘲笑。因此，我知道了跟官方版本完全不同的故事，说什么希特勒对女人没兴趣，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奉献给了德国人民，事实是，他

① 巴贝尔斯堡摄影棚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制片厂，下文提到的《犹太人苏斯》就是在那里制作的。

② 奥利弗·哈迪（Oliver Norvell Hardy，1892—1957），美国喜剧演员，与斯坦·劳雷尔搭档拍摄了一百多部影片。

曾和他十几岁的侄女吉莉·拉包尔有过一段炙热的、不伦的关系，丑闻败露后，吉莉自杀了。我还听说过许多传闻，说元首和影星蕾妮·瑞芬舒丹有一腿。

所有这些鲁莽的言论，如果被别的人听去，就会把说这些话的人送进集中营。但这些日常的对话，其实也说明了普通人对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支持受到了多大程度的侵蚀，也说明了他们对工人阶层有多么地不尊重。

汉斯·沃尔默

我本来是想永远告别拳击的，但很快我又改主意了。不知为何，拳击已经深入我的血液了。我需要这种体力消耗，需要这种“我的身体正在巅峰时刻”的感觉，我还享受友谊，场内场外的团队精神。鲁迪说服了我，即便没有冠军腰带，业余拳击也有其自身的好处。他劝我继续训练。但就在那之后不久，他和俱乐部的好几个成员都被国防军征兵征走了，巴姆菲尔德拳击俱乐部土崩瓦解。剩下的会员被汉堡警察局发起的大型机构拳击警察协会接管。奇怪的是，当我和许多老会员去市中心的警察营房训练时，居然没有人反对，要知道那里面可都是警察，他们的头头可是出了名的种族主义者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直到今日，我还在纳闷，为什么我会被允许自由出入汉堡警营？为什么我会有机会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因为只要有一个跟党卫军有关系的警察注意到我这个非雅利安人的存在，就可以彻底毁了我的命运。

我在警营和俱乐部在巴赫大街的分部规律训练期间，认识了一个年轻的中量级青少年冠军汉斯·沃尔默。他是一位非常有见识的拳击手，比我大三岁，比我高了快一头。虽然年轻，他却有一种非凡的能

力，右手一拳就能把对手打趴下。很快，他就成了我最好的朋友，激发了我被压抑的拳击野心。每次他为了比赛准备，我都能感受到跟他同样的紧张和兴奋；当他赢得比赛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自己赢了一样。

虽然我们都热爱拳击，但我们的友谊并不局限于拳击场，还延伸到了我们的空余时间。汉斯是第三年的硫化机学徒工，他学着加工橡胶。下班后，经常跟我一起去各种各样的夜店。因为汉斯住在巴姆贝克旁边的汉姆区，那里是出了名的缺乏年轻人玩的地方，所以我们要不就是约在我们街区的柯尼希餐厅，要不就是在圣保利的某个站点。

我们常去的地方都挤满精力充沛的年轻人，这就有了许多惹麻烦的机会。汉斯和我经常掉头走开，避开冲突，尤其是我们的拳击教练专门提醒过我们，在拳击场外，拳击手的拳头就是致命武器，我们必须要有极为谨慎。但是有一次，汉斯决定不顾教练的建议。一伙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站在一个夜总会门前，我们走过的时候，其中一个，肌肉发达、六英尺高，似乎不喜欢看到我，“这个黑鬼在这儿干吗？”他问，声音大到我们能听见。

汉斯像是被黄蜂蜇了一下，他转过身看着那个人。“你刚才说什么？”汉斯问。

“我问这个黑鬼在这儿做什么。”那个人重复了一遍，然后伸直了身子，挑衅地说，“你又在这儿干吗？”

这时候，其他人都开始围了上来。

我真希望那个侮辱我的人能够好好看看汉斯，看到他被打扁的鼻子、左边眉毛上方的伤疤，宽阔的肩膀还有结实的臀部，知道自己遇上的是个老练的拳击手，然后悬崖勒马。然而相反的是，他举起拳头，以某种笨拙的拳击姿势打向了汉斯。他还没来得及反应，汉斯如闪电般的右拳就落在了他的下巴上，发出一声令人恶心的咔嚓声，听上去像是骨头断了。就好像被子弹打中一样，这个六英尺高的男人双

膝一软，倒了下去，跌在了地上，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着，嘴角的血像小河一样流出来。

一见识到汉斯的拳头，其他三个人就一哄而散，生怕受到同样的待遇。无论汉斯怎么让他们回来比试，他们都只是远远地站着，显然是吓破了胆。作为“适可而止”这个词的坚定信奉者，我让汉斯别把事情闹大，赶紧离开这里。我尤为担心的是，如果汉斯把那人的下巴或者别的地方打坏了，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尤其如果那人是个纳粹分子的话。幸运的是，我们得以及时脱身，后来也没有再听说过此事的下文。

我去过汉斯在汉姆大街上的小公寓许多次，认识了他的父亲。他父亲也是个硫化工人，他的母亲是红十字会的护士。他的父母都为这个独生子在拳击方面取得的成就感到极度自豪。我与他们只接触过几次，我一直以为他们只是一对普通的工薪阶层家长，生命中最大的冒险只是看着自己唯一的孩子在拳击场上获得成功。但很快，我就知道了我是在以貌取人。有一天，汉斯和我去他家，我听到他母亲和几个男人在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外语聊天。我问汉斯，他告诉我，他母亲是俄国人，经常会见一些俄国工人，尽她所能地为他们解决问题。这些人都是俄国外来工人，是被德国在俄国的武装部队抓来的，被迫在德国的战时工业工作。

我简直难以相信，从相貌到说话都像土生土长汉堡主妇的沃尔默太太，甚至可以说一口地道汉堡土话的沃尔默太太，居然会是个俄国人。我问她是怎么到汉堡来的，她给我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就算是日瓦戈医生听了也会嫉妒的。一战的时候，她后来的丈夫还是个受伤的德国士兵，被俄国人抓住，送进了俄国内陆一家部队医院，她正好在那个医院当护士。她把那个德国士兵照料到恢复健康，他们相爱了，可是战争结束时，士兵被遣返回德国。离开的时候，他发誓说会尽快回到俄国，来找他心爱的护士。她说三年的时间过去了，爱

人却音信全无。但她没有放弃，她坚信他会信守承诺，会回来找她。然后，一个冬夜，她说，有人敲响了她的门。门外站着的正是快要冻僵的老汉斯·沃尔默。他来接她回他的家乡，他要娶她。

从听到这个故事的那一刻起，我看待汉斯及其父母的眼光不同了。我禁不住想，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走到世界的尽头跟自己的爱人团聚，而我的亲生父亲却不愿意多跨出一步跟我母亲和我团聚。

几天后，汉斯来找我，告诉我一个吓人的消息。他说他的家在前一天晚上的炸弹袭击中被彻底炸毁了。跟许多汉堡人一样，他和他的父母对空袭警报都有些懈怠了，不是每次警报响起都会立即躲进防空洞。但不知怎的，那一次，他们还是重视了这次警报。他们有些没有重视警报的邻居就变成了废墟里的尸体。

几个星期后，沃尔默一家被安置进了一个高档小区的一间公寓，比原先的公寓宽敞许多。他们还收到了丰厚的赔偿。这是政府对早期空袭受害者的慷慨措施，当然也被大肆宣扬过。当汉斯骄傲地带着我在新装修的、家具齐全的公寓里参观，说这里可比他们原来的房子要好得多，比方说有宽敞整洁的卫生间，还有现代化电器化的厨房，我在心底偷偷地希望，我的家接下来也会出现在英国皇家空军的轰炸清单上。最后，我的愿望会实现的，只不过不是以我希望的那种方式。

随着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城市发动的空袭越来越频繁，被炸毁的建筑变成了汉堡常见的景象。然而，纳粹们出现在空袭灾难现场的画面可并不常见。我听过人们很多抱怨，说希特勒从未出现在轰炸现场，而他但凡只要露一下面，便可能会提升一下日渐衰弱的士气。

摇摆男孩们

等到我开始学徒期的第二年时，我不再认为像成人一样努力而

长时间的工作是一件残忍的事情。它只是一个现实。不过，即便是在这样的局势下，我的生活也不是只有工作没有娱乐。每天下班后，我和汉堡成千名十几岁的男孩都会来一次大变身。一番擦洗、梳头打扮之后，我们会从浑身油脂、污垢的蓝领工人变成衣着整洁风度翩翩的男人——至少我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每次变身，我们都会短暂地把满是机器、沙砾和苦力活的世界抛在脑后，进入“摇摆男孩”的美好世界，一个无拘无束、毫无组织、毫无领导，却非常明显的兄弟会，参加标准比自吹自擂的希特勒青年团要低。“摇摆男孩运动”，如果可以这样称呼它的话，没有付费的会员，也没有推选出来的领头人，只有志愿者。虽然它基本上只是工薪阶层的活动，因为参加的蓝领工人比上流阶级要多得多，但摇摆男孩文化从经济和社会阶级上囊括了各个阶层的年轻人。与80年代的美国朋克不同的是，德国摇摆男孩们表现出反叛主流的急切需求，对我们来说就是反叛纳粹组织。与朋克相同的是，我们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政治活动。不过，我们不像脏兮兮的朋克，我们是极度整洁的，穿着打扮就好像纨绔子弟一样。我们未成文的宗旨就是展现我们反主流的意识，而不真正惹恼盖世太保；只要有可能就听爵士乐，它被我们视为最爱的音乐，因为它被纳粹说成是“黑鬼音乐”而遭到禁止；用我们的男子汉气概和成熟来吸引女孩；还有——但并不仅限于此——破处。由于我的特殊情况，最后一条对我来说更多的是空想，而不是实际的期望，因为我知道，找到一个自愿的搭档和必需的隐私空间来达成这个目标的可能性为零。

摇摆男孩们与纳粹青年越来越背道而驰。我们留长发，蓄络腮胡，而希特勒青年团领导下的年轻人们则一律短平头，不留胡子。不幸的是，因为我的非洲基因，我的头发不肯配合。只有在不断的“处理”之后，它才不情愿地变成摇摆男孩式的过肩发。说到蓄络腮胡，我就更不行了。不管我多么经常地刮我耳朵前面的部位，想要刺激毛发生长，那里都跟婴儿的屁股一样光滑无毛。然而，这个明显的缺点

却被我早熟的、令人羡慕的长胡子能力充分抵消了。我的胡子，虽然有点稀疏，但还是可以用肉眼看到。因此，我从未尝试过那个长胡子的终极“大招”。熟练工们跟我们强烈推荐说，晚上用狗屎抹在鼻子下面就能让胡子长得浓密。我的许多同伴都跟我一样怀疑这个方法是否管用，但我知道，有些人虽然在外面嘲笑这个办法，私下却在用它——万一管用呢。对他们来说，看上去像个真正的摇摆男孩，比忍受这么一点点不便要重要得多。

摇摆男孩为人们广为接受的特征就是花花公子一般的外表。它很好地掩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是把扳手和锤子使得像自己的拳头一样灵巧的粗人。为了彻底反对希特勒青年团倡导的“有益健康”的户外生活方式，我们选择了轻音乐影星约翰内斯·希斯特作为我们的主要榜样和偶像。他面容苍白，长长的黑发上仔细裹着头巾，是个不折不扣的“女性杀手”，典型的“户内”型。我们穿及膝的双排扣夹克，阔腿裤快把鞋子遮住，浆得笔挺的衬衫领子，修身的海军蓝大衣还有与之相配的洪堡帽，还有最后一丝优雅，白丝巾。我们这样长满青春痘肉嘟嘟的脸庞，看上去根本不像希斯特，反倒像希斯特的滑稽漫画，然而我们却根本不自知。

舞蹈乐队在摇摆男孩心里的地位是很高的，仅次于影星，我决定再尝试学一门乐器来提升自己的形象与自信。有一天，我在市中心一家乐器店里看到一把闪闪发亮的银制小号。几个小时后，我就从存钱罐里拿了钱，回到商店，买下了这把小号。我四处找小号老师，终于在一个音乐学院找到一个老师，每小时的学费是我能负担得起的。跟以前半推半就地学小提琴不一样，这次我投入了全副身心，想要学好小号。但是，不管我多努力，我都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置唇法。我的小号老师仔细检查了我的小号，发现它没什么问题，他只能判定问题出在我的嘴唇上。“我觉得你的嘴唇太厚了，不适合吹小号。”他猜测，然后显摆了一下他的雅利安式嘴唇，演奏的时候，他可以把嘴唇缩成

一道细缝。“或许你可以换一种管乐器，比方说单簧管，单簧管的置唇法与小号不同，嘴唇的大小没有关系。”他建议说。

我说世界著名的爵士小号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也不是典型的薄嘴唇，他反驳说书包嘴（阿姆斯特朗的别名）的号角里出来的也不全是音乐。就这样，我没有再去学院上小号课，我坚信，如果书包嘴的嘴唇都没有大到不能吹小号，我的也没有。

我没有放弃学吹小号的梦想，决定尽我所能地自学。邻居们不得不当我的听众，虽然令他们烦心，但我从没练烦过。我的努力虽然没能把我变成下一个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但我的演奏水平却提高了，街区里的朋友们甚至说我吹得很不错。

在我们街区，摇摆男孩的活动据点就是柯尼希餐厅。这家餐厅很大，有个小乐队，包括一个男高音萨克斯演奏者、一个钢琴演奏者、一个贝斯手，每个人都是摇摆男孩。虽然这里只供应不含酒精的“啤酒”，但这个乐队每周都会蹦上七个晚上。然而，“蹦”并不包括跳舞。根据政府最近一项规定，公开跳舞是被禁止的，为的是限制前线士兵独守空房的妻子们与游手好闲的市民及文职男军人之间乱搞的机会。德国军方高层认为这些私通会打击前方士兵的士气。根据我所观察到的一切，我有理由相信，禁止跳舞根本无法解决已婚妇女在外寻找浪漫慰藉。

在柯尼希餐厅混，对十五岁的男孩来说，是说得轻巧做起来很难的一件事。法律规定，未满十八岁者不得进入夜店，违反者如果被抓到的话，要受到严惩。不过，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根本等不了三年，只能顶风作案，成了那里的常客。每次我们去那里，都冒着风险，心情紧张。为了进门，我们不仅要经过一块写着“未满十八岁不得入内”的标牌，更重要的是，还要经过店主维尔海姆·柯尼希先生这一关。柯尼希先生是一个很有声望的纳粹党员，翻领上的纳粹徽章可以证明这一点。他身材矮小却壮硕，以前是个摔跤手，跟与他寸步不离的拳

狮犬长得惊人的相似。柯尼希先生既是迎宾员，又是保镖，取决于需要用到他哪方面的才能。自从见过一次他像坦克一样冲进十几个不守规矩的顾客中，一手打跑一个，我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好糊弄的人。不过，他经常在看过身份证后把无数个男孩女孩挡在门外，却从没有拦过我一次，也没有为难过我。乐队太忘形时会应观众的要求，把一些被禁止的爵士曲调加进正常的曲目里去，他还经常装作没听见。要是被错误的人或人们抓到乐队表演爵士乐的话，乐队成员可能会被拘留、罚款、禁演，或者——如果是惯犯的话——被送到俄国前线战场上去。

当摇摆男孩的另一个兴奋点来自于该地区希特勒青年团的骚扰。几乎每个星期都有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来我们的据点扫荡。巡逻队通常由十到二十个穿制服的年轻人组成。他们会悄悄堵住出口，然后分散开，系统地一桌一桌地检查——检查男顾客的头发长度。头发最长的摇摆男孩们就会被赶出去，在外面排成一队。好几个理发师站着等在那里，给他们剪头。因为留长发跟反纳粹之间隐含着某种相关性，而那些被强制剃发的人的光头则是勇气的象征。我们把他们当成是摇摆男孩运动的殉教者，是为信念付出终极代价的青年。

我也差点儿被强制剃发。那一次，巡逻队一个初级队员命令我出去。我终于要被剃发了，我感到很高兴，骄傲地挺起胸膛准备出去。但是我还没走到门口，巡逻队的头头过来了。“你的头发想留多长就留多长吧，朋友，”他用一种过分礼貌的语气说道，“我们真的不在乎你的头发。”当我在整个酒吧侮辱性的眼光下回到自己的桌子，我意识到，学生年代令我痛苦难堪的海因里希·维希德式精神依旧存在。

虽然汉堡的摇摆男孩风潮很大程度上是无害的，对纳粹德国的安全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威胁，顶多只是个讨厌的麻烦，但盖世太保却并不觉得他们有趣。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有报道称，汉堡大约有四百名摇摆男孩被捕，其中七十名左右被送到了集中营。

赖格鲁伯

在战时，跳槽是不可能的，因此当有一天，一名叫做赖格鲁伯的新熟练机工出现在我们的工厂，我们都感到非常吃惊。我们对这位五十多岁满头白发叼着牙签的熟练工的了解仅限于，他来自巴伐利亚，跟大多数巴伐利亚人一样，是个天主教徒。在新教占主导地位的汉堡，这两点令他成了备受非议的少数派，也就是所谓的“猪巴伐利亚人”，而巴伐利亚人则把所有非巴伐利亚人称为“猪普鲁士人”，来回敬这一“恭维”。

我压根就不在意赖格鲁伯的教派和籍贯，也从不跟别人一起在背后说他坏话。对我来说，赖格鲁伯是个好人，尤其是在他主动跟我交朋友之后。但是我的一个好朋友，熟练工汉内斯·莫尔，却不停地提醒我。“注意点，孩子，”他提醒我，“虽然我不知道是什么，但这个赖格鲁伯身上肯定有不对劲的地方。”

我没有理会莫尔的提醒，因为赖格鲁伯从来没有说过或做过什么令我觉得可疑的事情。因此当有一天，赖格鲁伯跟我说他和我被派到一起防空袭值班时，我也没觉得不高兴。在整个战争时期，所有的工厂员工都被要求定期防空袭值班。如果因为轰炸着火了，我们就要用灭火器扑火，挽救工厂。

那是1942年的秋天。汉堡的空袭相对来说还不常见，所以赖格鲁伯和我自然以为这会是个平静的夜晚。在帆布床上躺下休息之前，我们看书，听元首总部发来的前线报告来打发时间。战况依旧在希特勒计划之中。波兰、法国、比利时和荷兰都已经沦陷。德国军队已经深入苏联，正在斯大林格勒郊区。英国空军在北非对托布鲁克发动的袭

击中遭受重创，日本则在太平洋上把美国人打得屁滚尿流。

虽然有这么多“好消息”，赖格鲁伯却很悲观。说到那天报纸的头条说日本在海上取得又一次胜利时，赖格鲁伯说，日本现在势不可挡。

“别以为他们会满足于只做亚洲的统治者。”他教训我说，“等到战争一结束，日本就会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柏林刺杀希特勒。在那之后，他们会拿下整个世界。无论如何，不管是被盟军打败，还是被日本打败，纳粹很快就要完蛋了。”

虽然赖格鲁伯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对我来说有点牵强，但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来自巴伐利亚的成熟熟练工去争辩呢？不过，想起汉内斯·莫尔对赖格鲁伯的“有意思的感觉”，我决定什么也不说，故意隐瞒我对此事的所有看法。

这样一来，我们也没什么事情可说的了，于是关了灯睡觉。一个没有警报响起、平静的夜晚之后，第二天早上，我们起床然后开始工作。

要不是一个秘书把我叫到工厂经理的办公室，我已经彻底忘了赖格鲁伯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在那里，我的记忆遭受到了最不友好、最震惊的“帮助”。在场的有工厂经理哈比希特先生，纽曼师傅，还有令人费解的，我的防空袭值班伙伴，赖格鲁伯。三个人都一脸凝重地看着我，仿佛有什么坏消息。对我来说，整件事好像是一个大阴谋，不过我还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我想不通赖格鲁伯跟这一切有什么关系。

“赖格鲁伯先生告诉我们，”哈比希特先生直接了当地说，“你昨晚说了一些叛国的话。具体来说，你跟他说，德国输掉战争是早晚的事。你肯定知道这种言论的重要性，对吗？”

我惊呆了，说不出话来。那一瞬间，因为愤怒和恐惧，我的眼睛都模糊了——愤怒是对赖格鲁伯的，他正一脸神秘莫测地假笑着，

盯着我；恐惧是他如此赤裸裸的谎言让我陷入了危险的境地。我经常听说，发表“叛国言论”的人，跟叛国者一样，都会被处死。想到死刑，我的双膝开始发抖，我快要吐了。我意识到，我被陷害了。我居然可耻地被一个我以为喜欢我的人背叛了。可是，为什么？为什么赖格鲁伯这么恨我，想要毁掉我？我对他做了什么？这些问题在我脑海里翻腾，却没有答案。

“好吧，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哈比希特先生的声音把我拽回到了噩梦般的现实。

“不是我说的。”我结结巴巴地说，“这全都是谎言。是他说的，不是我。”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声音听上去有多么不可信，我无助地看向哈比希特先生、纽曼师傅，然后毫不掩饰轻蔑地看向了赖格鲁伯，而他还是那样假笑地看着我。

我觉得越来越有一种冲动，想要揍他的脸，一直揍一直揍，直到把他的脸揍成一团血糊。我得强迫自己不去看他那假笑的脸，因为我会想把他揍死。我控制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了。

“你可以回车间了，赖格鲁伯先生。”哈比希特先生似乎看透了我的想法，让他先走了。

赖格鲁伯关上门后，哈比希特先生又拾起了这个话题。不知为何，他的语气似乎没有之前那么不友好了。

“我不知道是谁在说谎。”他说，“显然这里有人没说实话。不用我说，你也知道，我的孩子，说这种话会给你惹上大麻烦。”

“我们一直很满意你作为学徒工的表现，”他接着说。因此，我们真的不愿看到你出什么事。所以，我们会压下这件事，不上报给官方做进一步调查。

我十分确切地知道他说的“官方”指的是什么。

“你肯定知道，如果德国输掉了战争，”他继续说，“我们所有人都会完蛋——你，我，所有人。你肯定知道这一点，不是吗？”

“是的。”我结巴地说，颤抖的声音并没有为我增添一丝可信性。

我不能说出口的事实是，我从未相信过戈培尔宣传的那一套，如果盟军赢得了胜利的话，所有德国人都会被清算、折磨、强奸、囚禁或奴役。

在哈比希特先生和纽曼先生的建议下，我像躲瘟疫一样躲着赖格鲁伯，但每次我们在路上碰见时我都忍不住憎恨地盯着他。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汉内斯·莫尔，他又说了一遍他最初对赖格鲁伯的判断。不过即便是他，也想不通为什么赖格鲁伯一开始假装是我的朋友，之后又设计陷害我。

这件事之后不到一年，在1943年的7月，空袭毁掉了城市的大部分，我们的工厂也被炸平了。我和其他在空袭中存活下来的工人搬去了别的城市，做了别的工作。虽然我十分想弄清楚赖格鲁伯背叛我的缘由，也很想在战后报复他，但却没有机会。不管我多么努力地找他，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格雷琴

虽然在童年早期，我与异性还有些接触，但随着我长大，我跟年轻女性的交往反倒越来越少。等到我十四岁的时候，我与女孩的接触基本就只能靠想象了。造成这种局面的事情发生在四年前。那时候，我的一个老师，杜克先生，对全班同学说，非雅利安人，“就像你们的同学汉斯-尤尔根”被纽伦堡种族法禁止娶德国女人，或跟德国女人谈恋爱。这项禁令的目的，杜克毫不掩饰地说，是为了阻止种族混淆。在纳粹的统治下，种族混淆可是最重的罪，高级的雅利安血液会被低等的非雅利安血液稀释。这样的稀释，他解释说，如果被纵容的

话，最终会导致德国人的毁灭。因此，种族混淆被认为是比谋杀还坏的罪。

那个时候，相比起不被允许娶德国女人，我更沮丧的是被当作“卑劣的非雅利安人”来举例。在十岁的年纪，结婚并不在我的优先度清单上。然而，等我到了青春期，女孩子在我脑子里越来越重要的时候，杜克的话语开始有了全新的、可怕的意义。

不过担心触犯法律只是我无法享受与女孩正常关系的部分原因。对于异性来说，我很长时间以来都认为自己是只丑小鸭。有些女孩看到我的长相表现出的“极度恶心”，并没有真正打击到我的自尊。就算没有法律禁止“种族混淆”，我想，哪个脑子正常的女孩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呢？我完全确信，没有女孩会对我感兴趣，除非是以柏拉图的方式，所以当我喜欢上一个女孩，我从不会表露出来，不管我多么渴望她。这样我希望可以给自己省掉那些必然的拒绝带来的羞耻。我的大多数伙伴们都开始跟街区里的女孩们恋爱了，我却没有女朋友，似乎以后也不会有。

当一个高挑、苗条又非常傲慢、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女孩出现时，一切都变了。她的名字是格雷琴·加恩。我第一眼看到她，是在她和她母亲和弟弟搬进街道上方一间公寓时，我瞬间被击中了。不过我想都不敢想再多了解她一些。

后来我从邻居的闲言碎语中得知，加恩一家原先住在汉堡的一个高级社区。不过随着加恩太太跟一位富有的警察离婚后，他们的生活水准就大不如前了。可是，这并没有让加恩太太不那么高傲。相反她把与邻居的接触减到最少，并且明显地让她的孩子们也这样做。在这一点上，她是非常成功的。不管是格雷琴，还是她的弟弟，都对街区里的小孩不屑一顾，而街区里的小孩们对他们一家也是以牙还牙。我的大多数伙伴只要看到格雷琴就很讨厌她，他们觉得她太高傲，太瘦，没有性感的魅力。我却觉得还好，因为追逐会让我已经很无助的

境况变得更甚。就她的相貌和举止而言，我觉得她是我见过的最优雅最有贵族气质的人。我觉得，在她身边，街区里的其他女孩都好像是肥胖的农民。不过跟往常一样，我只能把这种感受藏在心里。

巧的是，我们街道的男孩“社会活动中心”——一条宽宽的混凝土长凳，正好在加恩家位于二层的公寓楼下面。我们经常成群结对地聚在那里，从五个人到十五个人，甚至更多，令公寓楼的居民烦恼不已。我经常能从窗户那瞥见格雷琴，这种机会对我来说十分宝贵，却也让我比那些自由自在的同伴显得更加沉默寡言。

如果不是另一个巧合，我对格雷琴的暗恋可能还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正要路过蔬菜商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看到格雷琴买了一大兜土豆。显然，土豆太重，她无法轻易拿动。还没等我来得及下定决心是否要上前帮忙，她就问我是否可以帮帮她。我能吗？

我想要跟她介绍一下我自己，让她少点心理负担，她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你叫汉斯-尤尔根。”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我知道你很多事情。”她回答说，然后告诉我，她知道我上的是哪所学校，知道我父亲在非洲，我母亲和我住在史都肯大街3号的三楼，知道我是个业余拳击手，等等等等。显然她仔细调查过一番。

令她又吃惊又好笑的是，我迅速调转矛头，把我对她的了解都告诉了她。我知道她叫格雷琴，她的弟弟叫英格玛，她的父亲是警察局的大人物，在搬来巴姆贝克之前，他们住在乌尔恩霍斯特，她和她的弟弟曾经在那里上高中。

几分钟后，我们就走到了她家楼下。幸运的是，长凳那里空无一人，我们不用看见我那些挤眉弄眼的小伙伴。

“你能帮我把这些蠢到家的土豆搬上楼吗？”她问。我当然是巴不得了。到了她家门口，我正打算撤退时，她让我等等。“我想让你

见见我母亲。”

从我听说的加恩太太的种种事迹来看，我是不想这么快认识她的。但现在要逃跑已经太晚了，因为格雷琴已经敲了门，加恩太太把门打开了。

“谢谢，汉斯-尤尔根，谢谢你帮格雷琴搬土豆。”她没等女儿为我们介绍，就友善地微笑着说。很明显，她以前也听说过我。她是一个端庄的女人，风韵犹存，比我想象中要友善许多。

“没什么的，加恩太太。”我回答。她回到屋子里面，我准备离开，格雷琴又感谢了我一次，然后——让我大吃一惊的是——问我，晚上有什么计划。我真的没有什么计划，只得如实地告诉了她，她问我是否愿意在“七点钟左右”的时候跟她去散散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们说好了在我们这条街两个街区外的教堂前面见面。

我几乎早到了半个小时，等待的每一秒，我都越来越紧张。更确切地说，是“恐慌”。我要跟她聊什么呢？她为什么想要跟我在一起？我太清楚纳粹防止“种族混淆”的政策了，也知道，我们的交往，虽然很纯洁，却会遭到严厉地反对。万一人们看到我们，不喜欢我们在一起怎么办？我们给自己惹了什么样的麻烦？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生活会变得多么复杂，而我又丝毫没有准备好面对这一切。

虽然天色渐暗，我还是可以勉强看清格雷琴轻盈的身影。她走到我身边的那一刻，塔楼的钟声响起，先是四下，然后是七下。这似乎标志着我年轻生命的第一次约会开始。

不知为何，一看到她，我的恐慌就消失了。我们很快就愉快地聊起天来——最近德国对波兰的入侵，我们的兴趣，喜欢的东西和不喜欢的东西，我们的老师，还有周围的邻居。她对我说，她不在意我周围的男孩子们，因为他们举止粗鲁，没有文化。她坚持说，我却跟她们大不相同，所以她开始被我吸引。除了我明显的种族特征，我自己看不到我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我当然不认为自己是文化有修养的，

但没有跟她争辩。

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刻起，我们就很清楚，我们对彼此的兴趣完全是柏拉图式的，虽然格雷琴和我都没有提到任何浪漫的话题。我们不用说出来。我丝毫不知道她看中了我什么——按照当时最流行的标准，我就是个怪胎。但我算什么呢，有什么资格去跟她争辩她的品味？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都能感觉到那种化学反应。就我自己的情感而言，我觉得心里就好像有一个化学工厂要爆炸一样。与此同时，我们的感情里没有丝毫性欲的成分。我们是纯洁的——我们只是两个年轻人，毫无缘由地，互相吸引，互相信任，互相需要。

我跟她说了我担心别人看到我们，令我吃惊的是，她说她已经想过这一点了，她知道我们是在冒险，但她愿意冒这个险。“我们只需要小心一点。”她不很在意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我却还不放心。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让她陷入麻烦当中。“你母亲呢？”我问。“我们这样约会她会怎么想？”

“我母亲不在意。她喜欢你。她已经观察你一段时间了，认为你是个绅士。比起街区的其他男孩，她更希望看到我跟你在一起。”

她承认，她的父亲，那位警官，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不过她说他已经被调到其他城市，所以我们根本不用再担心他。我问她是否想念她的父亲，她直截了当地回答，“不想。”接着，她坦白地告诉我，她的父亲一直对她母亲和她进行家暴，她们因此与他断绝了联系。她说他强迫她加入德国女孩联盟，不过在父母离婚后，她就再也没有参加过联盟的活动了。作为警察和党卫军成员，为了提升他的地位，他甚至还让她参加“生命之泉”项目。她说，这个项目是党卫军头头海因里希·希姆莱的拿手项目，通过挑选“高等血统的女性”与党卫军里的男人配种，培育高等雅利安后代。

正是因为他这些逼迫性的行为，她开始质疑他的纳粹主义信念，进而真正地叛逆，变成了反纳粹。她说，当时她最沮丧的便是在学校

接受的教育，把女孩当做只能生孩子的奶牛和家庭主妇，而没有任何事业可言。她说，男孩子被鼓励发展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业，而女孩则只学一些家里的技能，例如烹饪、编织、带孩子，还有“种族卫生”、民俗学和体操。要不是格雷琴指出，我还意识不到这是对女孩的不公平，还以为是生活中的常事。我们的老师早就灌输给我们，在元首的纳粹帝国，男人是主导，女人只是帮手。

在黑漆漆的街道上，我们一边聊一边走，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直到我们又走过了教堂，钟声响了九下。整个晚上，我们没有碰触过彼此一次。在夜色的掩护下，我壮起胆子，轻轻地握住她的手，直到走到她家楼下。互道晚安时，我们彼此都没有说到下次约会的计划，但都知道很快我们就会再见的。

渐渐地，我们的秘密关系越来越好，暗夜之中的约会也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情。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要如何处理自己对格雷琴的非柏拉图的感情，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浪漫冲动，直到有一天晚上，她打破了僵局。那时，我们正在她家门前，正如往常一样，准备说再见。突然，毫无征兆地，她的手臂环住了我，紧紧地抱住了我，利落地吻在了我的嘴唇上。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关系就再不相同了。我们又约会了几次（大多数是在公园的长椅上），激情地热吻与拥抱。我们已经从羞涩和懵懂的新手，变成了最火热的秘密恋人。格雷琴甚至教我法式热吻，她坚持说是从书上读到的技巧。一开始，我觉得这样非常恶心。然而，经过与格雷琴几次激烈练习之后，我变成了这种奇怪却令人愉悦的社交方式的热情拥护者。不过，虽然我们激情万分，但格雷琴却立下了一个规矩，作为一个拳击手，我被要求尊重并遵守：下半身不能碰。这对我们俩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规矩，但格雷琴下定了决心要抵制诱惑，在合适的日子到来之前，都要保留处女之身。

迟早有一天，邻居们会发现格雷琴和我之间有些不对劲。但他们

无非就是嘲讽我们几句，说我跟一个“高傲的瘦干柴”乱搞，或者提醒她“总有一天会搞出一个五颜六色的孩子”，不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尽管如此，我们从不认为我们脱离了险境，只能继续让我们的约会更加隐秘。我们在街区里约会时，无论是去看电影，去联欢，还是在外边玩，我总是会带一个朋友给我打掩护。我认为，比起两个人，三人行看上去更加模棱两可，不那么可疑。为了让骗局见效，我总是会把自己放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让不知缘由的外人相信我，而不是那个打掩护的人，才是三人行中“多余的那一个”。

我很快就意识到，能跟格雷琴在一起，我的运气实在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她的样貌，我一直是喜欢的，但我们“在一起”后短短几个月内，她开始变得凹凸有致，出落成一个婀娜多姿的美女。突然之间，男孩们不光是注意到她，还都喜欢上了她。但我之前打下的基础有了回报。格雷琴还是把其他男孩看成“低级动物”，眼里只有我。即便是在跟我们同龄的女孩们都开始跟大孩子约会时，格雷琴却奇怪地只忠于我。她对我毫不掩饰的喜爱，极大地重振了我的自尊——这点自尊，在多年的种族嘲讽、奚落和敌意之下，一直是低落无比。然而，我这新得到的浪漫感情却很快就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那天晚上，在巴姆贝克黑暗的道路长时间散步之后，我把格雷琴送到了家。突然，我被手电筒的强光刺得睁不开眼。“安保服务！”手电筒后一个男人咆哮道。这句话令我脊梁骨一阵发凉，因为我太熟悉安保服务的名声了，他们是党卫军最残忍最可怕的情报部门。

“黑灯瞎火的你在大街上走来走去的干吗？”一个身穿黑色皮衣，头戴宽边帽的人，在我眼前挥了一下我看不懂的证件，然后问道。

“我只是在散步。”我虚弱地回答，“我住在这条街上，就在下一个路口。”

这个人显然不满意我的回答，命令我跟他一起去最近的警察局。

当时，我想过干脆逃跑，消失在夜色当中，但我只是想想。我能去哪儿呢？即便我逃掉了，如果他向警察局描述我的长相，我又能逃多久呢？

我们到了警察局后，他向值班的警官表明了身份，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向警官的桌子。“我抓到这个人在几个路口外的大街上游荡。”安保服务的人说道，“我觉得他是在四处寻找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或者找机会偷东西。”

警官还没来得及回应，这个人又问，“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他说他就住在这附近。”

警官久久地盯着我，然后摇了摇头。“没有，我没见过。”他回答说，“但我是最近才调来的。我问问比我来得早的同事吧。”就在这时，一个看着我长大的老警官刚好走过。值班的警官问他是否认识我，他说他不知道我的名字，但从我还是个小孩子时，他就见过我了。“他都做了些什么？”他问。

安保服务重复了一遍自己的指控，但这一次他不那么确信了。

“你抓错了人。”老警官确切地说，“这个年轻人是林德勒公司的学徒工，他在那里干活可卖力了，哪还有多余的精力大晚上地在街上惹事。我正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有同事的儿子跟他一起当学徒工。”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认为这件事到这就完了。”安保服务的人说。“不过，这种时候，再小心都不为过。”

他没有向我道歉，敬了希特勒礼就走了。

我真想紧紧地拥抱那个老警官，多亏他救了我，多亏他这么巧，正好认识我的学徒工同事，多亏他正好出现。

不过，这件事也说明了，格雷琴和我是在薄冰上行走。我确信，要是安保服务的人抓住了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们俩都没有好日子过了。当即我就决定，我们每天晚上的约会不得不停止了，不管这被迫

的分离对我们俩来说是多么痛苦。

转天，我把这一切告诉了格雷琴，向她解释，我们再也不能这样约会了，会招来麻烦的。她说她理解，但她不打算放弃我们的感情。“我们只需要耐心，等待一切发生改变。”她的声音里没有多少信心。

我们知道，要想境况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转变，德国就得输掉战争，纳粹政府要倒台，我们知道，要实现我们的希望和梦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大后方

随着战争继续，我们去防空洞的次数越来越多，废弃华夫饼工厂潮湿阴冷的地下室成了我们生活中越来越重要的地方。它简直成了我们的家外之家，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交中心，本来只是一面之交或者压根就不认识的邻居们在这里成了朋友，人们分享着对孩子、前线战斗的男人的担忧，交流其他跟战争有关的问题。我母亲和大多数大人把夜里去防空洞看成是可怕的折磨，而我则盼望着去那里，因为这是格雷琴和我唯一的机会，可以在防空洞的燃气室偷偷见上一面。

不跟格雷琴在一起的时候，我就会跟我新认识的伙伴、黑头发的卡尔-海恩兹·比洛聊天。他跟我同龄，几个月前才跟父母一起搬到我住的街上，离我家只隔着几栋房子。卡尔-海恩兹是邮政局电话接线员学徒工。他的父亲是欧洲宫殿电影院的放映员，是邻里第一批被征兵的人。他搬来后短短几个月，卡尔-海恩兹就赢得了街区最大好色之徒的“美名”。有很多传言说，他本来一直在“照顾”一位前线战士的妻子，直到她发现他在引诱她的密友，才把他甩了。他也很乐意跟我确认这些传言。虽然我还很“单纯”，却不禁震惊于卡尔-海恩

兹的早熟。这也是为什么他说我们应该找个时间一起玩的时候，我立刻同意了。很快我们就形影不离了。他追求女人和正常生活的大胆常常令我感到有趣极了。跟当时的许多少年一样，他坚定地反对纳粹，却狂热地喜欢军装。他坚持说是因为女人们无法抵挡军装的魅力。

要观察他说的这些是否正确，最好的地方是周末的防空洞。那时候跳舞还没有被禁止。除了我们这些平民，防空洞里还会有很多穿制服的国防军士兵和他们的女朋友。他们都是附近克拉森酒吧的老顾客。防空警报打断了他们跳舞。他们一进防空洞，酒吧里的组合和派对就会重新开始。有些情侣会跳狐步舞，其他的则会躲到防空洞最黑暗的角落。让老年人因无能为力而愤慨，让卡尔-海恩兹和我艳羡的是，他们会做出除性交之外最亲密的举动。看着年轻女人几乎是自己贴到穿军装的男人身上去，我们得出结论，参军的附加福利还是很值得的。

白天无休无止地上班，晚上总要躲在阴冷的防空洞过夜，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盼头，我们只能不断地想办法打发无聊时光。很快，卡尔-海恩兹就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把在他父亲的东西中找到的一大串钥匙拿给我看，说这些钥匙是欧洲宫殿电影院的，如果我有胆量，他会给我一次私人的观影体验。

一番疑虑之后，虽然我知道不妥，但还是不情愿地答应了，大部分是因为我不想向卡尔-海恩兹承认我没有胆量。按照他的计划，我们等到电影院最后一场电影放完，工作人员锁好门离开，大约在晚上十点钟左右。我们就偷偷从消防逃生口溜进去，在试了好多把钥匙之后，我们终于进了放映台。等我的耳机调试好，我舒舒服服地坐在一个可以看到对面屏幕的大方形窥视孔前面，他把一个卷轴插入几个大型投影机中的一个，然后拨动各种开关，胶卷开始滚动，熟练地好像干了一辈子这些事一样。电影放到一半，卡尔-海恩兹的专业性达到了顶峰，他把第二卷胶卷插入了另一台放映机。

我对此印象深刻，心里却太害怕，没有心思欣赏他的才能，更没有心思看电影，因为我心中不好的预感越来越重。这样一来，电影的名字和内容我什么都没记住。电影放完的时候，卡尔-海恩兹镇定地把一切放回到原来的位置，关掉灯锁上门，我们离开时，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直到我安全地躺在床上，回想我们这一次冒险，我才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究竟会有什么影响。无论我们的举动多么无辜无害，事实都是，我非法闯入了一个经营场所，占了人家的便宜。这在纳粹德国可是一项重罪。

别说我们这一举动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就连我母亲都会对我失望——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发誓，再也不会卷入到这种愚蠢的事情当中去。我的决心很快就会受到考验。

第二天晚上，下班后，卡尔-海恩兹问我是否有兴趣再去一次“私人观影”。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们才刚刚从最愚蠢的冒险中逃生，这才过了一天，我的伙伴居然还想要更多刺激。

“对不起，”我对他说，“但我已经有了别的计划。”

不过，对于我那个爱强人所难的朋友来说，我可没这么容易开溜。

“我知道你怎么回事；你是胆小鬼！”他喊道，气呼呼地走开了。

我知道他说得对，但我丝毫不想劝说他。因为我很快就会知道这么做是否明智。

当天晚上，我和母亲被对面街上的喧闹声吵醒。我们从窗户望去，看到几个警察打着手电筒从二十四小时前我刚刚钻过的消防逃生口钻进去。天色太黑，我们看不清细节，但我很清楚发生了什么：卡尔-海恩兹又干了他的老勾当，这次他被抓住了。

第二天，卡尔-海恩兹本人确认了我的怀疑。他说，在被我拒绝

之后，他就邀了另一个朋友一起去。警察把他们抓走关了一夜，他们觉得很吃惊。幸运的是，他说，电影院的主人是一个好心的老太太，早上被传唤来时，她认出了他是一名被征兵的老员工的儿子，为他说了几句好话。结果，他说，非法侵入的指控这才被撤销了。

我为卡尔-海恩兹感到幸运，但我却不确定，如果被抓的是我，我会不会也这样幸运，被从轻发落。我跟自己保证，以后一定要更加谨慎。

汉堡的最后探戈

因为跳舞是我们摇摆男孩喜欢的，政府就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跳摇摆舞。而除了被说成是“粗野、黑鬼般的、充满情色的”，德国大多数年轻人并不知道摇摆舞意味着什么，所以这项禁令基本上只是一纸空谈。但很快，一切都变了，所有的舞蹈都被禁止。然而有一种合法的方法可以绕开这个禁令。由于禁令并不包括舞蹈课程，许多摇滚男孩和女孩就报名学跳舞，不管他们原本会不会跳舞。初级课程只是简单的入门指导，上完之后，“优秀的学生们”就可以报名下一级课程，也就是没有老师授课，只是提供机会练习——换句话说，一个随心所欲跳舞的机会。

我知道法律的这个空子，也想像许多同伴一样，钻这个空子，但我不敢，因为我非常确定，我肯定会被拒绝的。如果我去报名，我都能想到会听到什么样的答复。“你想跟我们血统纯粹、金发碧眼的雅利安女人一起跳舞？你肯定是疯了吧！”

我确信，我肯定会受到我在别处受到过的嘲笑，决定还是别去自取其辱了——直到有一天，我的拳击伙伴汉斯·沃尔默提议我们一起去报名舞蹈课。我没跟他实说我的理由，只说我对跳舞不感兴趣，但

可以陪着他去那里看看。

我们去的是阿瑟·卢卡斯舞蹈教室，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当我们走进工作室的办公室时，已经有好多个摇摆男孩和女孩在等着报名了。我们得知，戴着无框眼镜、坐在桌子后面的光头男子就是卢卡斯先生，工作室的舞蹈老师和老板。轮到汉斯的时候，我正打算站到一边，可是卢卡斯先生让我们俩都坐到他面前，递给我们一人一份报名表。就是这个了，我一边想，一边仔细在表格上查找那些令人尴尬的问题，比方说“你是雅利安人吗？如果不是，明确人种。”但那上面的问题只是些姓名、年纪、地址、申请人是想上入门课还是进阶课等等。等我们填好表，交给卢卡斯先生，交了一些钱之后，他告诉我们，我们这就是阿瑟·卢卡斯舞蹈教室的学生了。卢卡斯先生对待我的态度，和对别人没有任何不同。

汉斯和我报的入门课，得上三个月，每个星期天下午和星期三晚上，每次两个小时。我们的课在一个大教室里上，一共有二十几个男孩和差不多数量的女孩，年纪都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我已经准备好被女孩们嘲笑了，但令我吃惊的是，没有一个女孩特别注意到我，这样一来，我就不用那么害怕了。如果是男孩对我粗野，我肯定会准备以牙还牙，但如果是女孩子开始嘲笑我，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开始上课前，卢卡斯先生让我们分成两组，男孩一组，女孩一组，面对面坐着，然后给我们讲解舞池礼仪。他的大部分建议都是绅士风度，我们班上基本都是蓝领工人，跟我们讲这些无异于把珍珠抛到猪面前，基本上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卢卡斯先生一转身，我们就忘了或者常常违背他的指示，比方说，别把手放在什么地方，跳舞的时候膝盖和腿不能做些什么。对我们来说，卢卡斯先生完全错过了跳舞的重点。他的另一个我们经常违反的规矩是，我们要走过舞池，而不是像一群大象涌过去，去邀请女孩子跳舞。我们的狂热后面是有缘

由的。我们这些绝望的大男子主义者没过多久就发现了一个重要的真理：到得最晚的就要接手剩下的；而剩下的肯定就是没什么魅力的女孩。因为班里的规矩要求女孩们接受男舞伴时要秉承先到者先得的原则，她们没有权利自由挑选，或者拒绝不喜欢的舞伴。

事实证明，卢卡斯先生是一个优秀的老师，我学得很快。在我自己还没意识到的时候，我就已经掌握了课程计划上的第一种舞，英国华尔兹，很快就精通了探戈、波尔卡，最后是狐步舞。我最喜欢的就是狐步舞。跻身于班上舞蹈佼佼者之后，无论何时，卢卡斯先生宣布“女孩们选择舞伴”时，我就很少会当“壁花”了。那时我还没有听说过“所有黑人都擅长韵律会跳舞”这种刻板印象。而我自己的经历似乎证实了这一刻板印象。没有半点非洲血统的汉斯·沃尔默，在学习跟着音乐拍子舞动双脚方面，比我可费劲得多。卢卡斯先生和汉斯都付出了近乎超人的努力，汉斯才能跟得上大多数基本步子。

有些摇摆男孩听说，吉特巴舞是美国最火的舞。我们迫不及待想要学会，但我们从没见过这种舞，因为在战时，政府禁止放映美国电影。因此我们只能运用想象力，跳一些狐步舞的动作，想要创作出我们认为的吉特巴舞。结果就是一个大杂烩，动作和步法都让人看不懂。直到多年后我看到真正的吉特巴舞，才知道吉特巴其实跟小步舞差不多。不过当时并没有人可以评说我们跳得好不好，我们只能背着卢卡斯先生随便乱跳。而在这个过程中，事实证明，无知才是真正的福祉。

一个星期天，卢卡斯先生正在给我们演示新的舞步，练舞厅的大门突然被打开，希特勒青年团巡逻队二十多个人一拥而入。他们的头头下令关掉录好的音乐，控制了全场，说他们要检查头发。他的人迅速检查了紧急出口和男洗手间，防止有人逃走，他和一个助手在我们之中走来走去。我并不是特别担心检查头发。我直觉，这一次远不止那么简单。

根据以前的经验，我担心他们会因我的存在而发难，说我一个非雅利安人居然敢跟雅利安女孩有肢体接触。我太了解我的敌人了。他一步一步向我这边走来，我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我注意到，当我进入到他的视线范围内时，他扫视了一眼，然后瞄准了我。“我们这里都有些什么啊？”他问，好像在动物王国里看到什么稀有品种似的。

“你他妈的在这里干什么？”

这时候，一贯温文尔雅的卢卡斯先生挺身而出，说无论巡逻队的头头想说什么，都应该去隔壁的办公室说。那个头头听了，跟我们一起来到办公室，屋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卢卡斯先生找出一些文件，递给了他。

卢卡斯先生说自己是纳粹党员，还是纳粹文化厅的人。他告诉巡逻队的这个头头，他是个一战老兵，做到了上尉，受了伤，被授予了一等和二等铁十字勋章。“你说这位年轻的绅士不应该在我的班上上课，我很讨厌你这样质疑我的能力。”他怒道。“你可能不知道，这位年轻人的父亲是莱托-冯贝克将军在东非的殖民军的官员，享有最高级别的荣誉。”

“我想告诉你的是，你会从别人那里再听到这件事的，我会跟他们说的，他们肯定会对你这种不负责任的入侵行为很感兴趣的。”

听到这一番话，那个头头被吓坏了，立马就跟卢卡斯先生和我道歉。“没别的意思。”他说了好多遍，然后脚跟并拢叩响，敬了礼，“希特勒万岁”。等我们回到练功房的时候，有些人已经锁定了好几个摇摆男孩，说他们的头发有问题。“让这些同志走吧。”那个头头撤回了助手，整理了队伍，然后匆忙撤退了。

经过这件事后，我看待卢卡斯先生的眼光也不一样了。他再也不是那个有点滑稽、戴着无框眼镜、脸盘胖嘟嘟跟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长得很像的人了，我看到的是一个敢于挺身而出反对种族歧视的人。巡逻队走后，我简短地感谢了他的帮助。除此之外，我们再也没

有提起过这件事。所以，我也无从得知，他说我父亲在莱托-冯贝克将军手下工作的事，是他自己瞎编的，还是从哪里听说的然后信以为真。我所知道的就只是，这个说法还有他说出来的方式，的确让那些讨厌的纳粹分子不再找我的麻烦。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汉斯·沃尔默和我继续享受进阶舞蹈课，再也没有看到希特勒青年团的巡逻队。

告别童贞

我们这些林德勒公司的学徒工，因为一起受苦，所以关系很好。当时，我跟每个学徒工关系都不错，但跟其中一个瘦高个、金发碧眼的第二年学徒工尤其要好。他的名字是沃尔特·鲍尔。沃尔特住在朗根霍恩郊区的一个小农场。他的家人在农场里养了很多鸡和猪。随着战时食物供给越来越少，他经常会给我带那种家庭自制的大汉堡，帮我缓解饥饿。作为回报，他手艺差遇到困难的任务时，我也会出手相助。他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但这一点似乎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友谊。

有一天，沃尔特来上班时，神情明显沮丧。我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先让我答应为他保密，然后跟我说他陷入了困境。他说，他和隔壁农场的—个朋友在乡下脱了裤子互相给对方手淫时，被一个警察当场捉住。警察把他们各自送回了家，跟他们难堪不已的父亲说，他本来可以按照德国的反同性恋法告发这两个男孩的，但他决定给他们—次机会。他教育这两位父亲说，从传统观点来看，他认为他们应该让这两个任性的男孩变成“真正的男孩”，这样才能阻止他们变成永久的同性恋。

沃尔特说，他的父亲把他臭骂了一顿，命令他再也不能靠近那个男孩。然后，遵照警察的建议，他的父亲给了他十马克，告诉他，

等下次他觉得有性欲时，就去妓院解决。沃尔特还说，按照他目前的性欲水平，他早就该去解决了，而他跟那个男孩的事，仅仅是因为他没有能配合他的女人，而不是因为他是同性恋。他从没找过妓女，也没跟任何女人做过，所以他想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去，给他打打气，或者也顺便解决解决我的性欲。

那一刻，我动摇了。虽然我非常期待变成“真正的男人”的时刻，但我还是犹豫是否要去，因为除了工厂里那些满嘴脏话的熟练工，我没有接受过任何性教育。我对格雷琴感到有些内疚，尽管她早就跟我说过，除非等到她二十一岁并且结婚后，否则想都不要想做爱这回事。不过我最大的顾虑其实是，我不确定，纳粹的法律不允许非雅利安人与雅利安人发生性关系，是不是包括妓女在内。一番左思右想之后，我索性豁了出去，答应跟他一起去，但只是看一看。

在当时汉堡三大著名的红灯区——卡尔克霍夫、赫伯特大街和温克尔大街——之中，沃尔特和我选择了最后一个。卡尔克霍夫，在市中心靠近优雅的处女堤，传闻说那里有最漂亮的妓女，但因为那里的顾客大多都是有钱的商务人士，所以是非常贵的。赫伯特大街，位于圣保利，大多是为船员服务的。虽然价钱便宜一点，但我们觉得路程太远了。在开始我们的冒险之前，沃尔特和我咨询了工厂里几个年轻一点的、可靠一些的熟练工。他们兴高采烈地给我们传授了许多经验，还有一些预算方面的问题。他们警告我们，不管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不想在正“忙乎”的时候被妓女的同伙顺走钱包的话，就千万不要把装着钱包的外衣放在别的房间。我们还知道了温克尔大街的价位，五马克可以来次快的，通常持续三到十五分钟，取决于客人多久能完事。我们还被告知，千万别透漏我们是处男，不然我们还得额外出一笔“破处费”。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带着这些宝贵的建议，沃尔特和我在温克尔大街两个入口中的一个碰面。那是一条狭窄的、L型的小巷子，两边

都是老房子。巷子的两端，也就是两个入口，都经过特别设计，令这条街不直接暴露于公众的视野。看到一个标牌说未满十八岁的青少年不允许进入时，我们害怕了。十六岁的沃尔特是在父亲的命令下去找妓女，所以他不怎么害怕违反法律。而还不到十五岁的我，因为没有母亲的命令，觉得很难让自己合理化。

“我们就直接进去看一下。”察觉到我快要改主意时，沃尔特说，“看一下会有什么问题？”

那时候，我还没听说过“同辈压力”这回事，但显然它对我很有效。我没再多想那块标牌，跟着沃尔特就走进了禁区。那个地方到处都是各个不同年龄段不同类型的男人，不过，大多都是中年、体面的居家型男人。就像市中心的橱窗购物者一样，他们沿着巷子慢慢地走着，欣赏着不同的“商品”。

每栋房子一楼的展示窗里，都坐着女人，有穿着整洁衬衫和裙子的邻家女孩型，有穿着紧身低胸晚礼服的妖艳型，有穿着小内衣的苗条型，有用浓妆艳抹和昏暗粉色灯光企图留住早已逝去的青春美貌的肥胖型，还有不断抽烟、头发染成金黄色的冷漠型。她们都在争夺走过的男人的注意力，大多数人都用钥匙或硬币敲击玻璃。

虽然我身上最少有十五个马克，比我两个星期的学徒工薪水还多，但我却还没想好是不是要去破处。一个年轻的女人非常热情地用钥匙敲着窗户，想把我们拉到她那里去，沃尔特误把她的热切当做是称赞，以为她在对我们说：“你们想不想进来，好好玩一玩？”

“多少钱？”我的伙伴问道，他的声音告诉我，他的性欲已经到达一个危险的水平。

“五马克。”她回答。

沃尔特让我等着，然后消失在她打开的门内。

大约十分钟后，他回来了，我问他是不是真的做了“那件事”，他点了点头。除了笑得合不拢嘴，他看上去没有什么不同。不知为

何，我总觉得，男人生命中如此重要的一个仪式，应该留下点更明显的印迹。

“你是怎么做的？”我想知道细节。他告诉我，“那件事”并没有人们说的那么难，一旦开始了，他很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事实上，他吹嘘说，他做得可好了，那个女孩邀请他下次赶紧再来。

我被深深震撼了，当即就决定，我也要去碰碰运气，沃尔特也极力鼓励我。先前觉得对格雷琴不忠的歉疚也很快就消失了，因为我对自己说，我跟格雷琴的关系——在她的坚持之下，跟性没有关系，而跟妓女的性，也跟爱情没有关系。

我害怕被人看见，尤其害怕被纳粹看见，加上我又很腼腆，我决定等到天黑以后再去。沃尔特和我说好了先逛一逛，消磨时间。得知附近有一家妓院是专门做外国工人生意的，里面都是外国妓女，不对德国人开放，我们决定去看一看，满足一下好奇心。有人告诉过我们，在外国妓女的额外“福利”里，有一条是她们不会像德国妓女那样坚持让男人使用避孕套。

我们没有被阻止德国人进入的标牌吓住，混在一群非德裔的欧洲人里面。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外国女人，跟她们的顾客一样，是纳粹占领区的缩影，在吸引顾客方面，受到的压制可比她们的德国“同事”要少得多。她们可不像德国女人一样坐在窗户后面，等着顾客来才动弹，外国妓女都极具进攻性地站在她们住的四层大楼的院子里招揽生意。有些妓女掀起裙子让客人看，有些则更大胆地抓住男人的裤裆，唤起他们的性欲。

一个活泼的法国小姐就这样抓住了沃尔特，开始吻他的耳朵，他立即就又有了冲动，准备把剩下的五马克也花掉。他还没来得及跟她谈价，两个便衣警察就挥舞着证件，命令日耳曼长相的沃尔特赶紧离开这里。虽然我确信他们也看到我了，但他们没理会我，显然以为我是外国人。

等我追上沃尔特后，我们又回到了德国妓院，相比之下，这里似乎卫生多了。天已经黑了，我感觉没那么压抑了，开始认真地寻找合适的对象，完成我从男孩到男人的转变。我看中的是一个漂亮的、穿短裙的黑发女人，她丰满的胸部和大腿似乎是我理想的选择。

注意到我有兴趣，她立刻敲了敲窗户。我告诉她，我只有五马克，她说要是都接我这样的客人，她早就破产了，不过她会为我破个例，“就这一次。”几秒钟后，我就跟着她爬上一段似乎是我这辈子爬过的最陡的楼梯。每爬一步，我都觉得自己像是罪人走向绞刑架。当我抬起头，看到我挑中的对象几乎是我在橱窗外看到的两倍那么肥大时，这种感觉就更加深刻了。以前我只接触过苗条的格雷琴，看到这么肥大的一个女人，我快吓死了。

终于，我们爬到了楼梯顶端。女主人打开一扇门，里面是一个小房间。虽然天气还得再冷上几个月，但那屋子里面却热得像个铁笼子。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恶心的味道，是廉价香水味和烧着的橡胶味混合在一起。一张塞满了东西的大床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

她没多说一句话，直接伸出了手。“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她说。

我想不起来我忘了什么，直到我想起妓女们的铁律。我的熟练师傅们告诉我，她们干活前要先把钱收了。我为自己的不懂事而感到尴尬，赶紧递给她五马克，她接过去就一把塞进她那已经“超负载”的胸罩里。

如果我能想出什么理由，可以让我优雅地离开这里，我肯定会这么做的，即便这意味着我辛苦赚来的钱打了水漂。可是，我想破了头也没想出来。

她让我脱掉外裤和短裤，好像一个女祭司，凭借专业知识执行神圣的仪式一般，把炉子上水壶里的水倒进一个搪瓷缸里，然后用一块布蘸上水，开始给我的下半身“洗澡”。她说，她不得不非常小心

她对待顾客，因为如果每两周一次的强制检查查出她得了性病的话，她就会丢掉“工作”的执照。接着，她检查了我的生殖器，用干毛巾擦干，然后掏出一个新的避孕套。我还没来得及说谢谢，她就给我套上了，然后就要开始。她二话没说就把自己扔到了床上，撇开肥实的大腿，带着抱怨的语气提醒我，时间就是金钱，五马克可没法让我过夜。

令我自己也想不到的，我并没有临阵脱逃，也没有像我原来担心的那样笨拙。相反，在我多年来的直觉引导下，在我那毫不浪漫、颇具商业头脑的“搭档”的配合下，一切都自然发生，我达到了高潮。

接着，妓女一把扯掉避孕套，扔进了炉子里，又用毛巾给我洗了一遍生殖器，动作一气呵成，显然是经过多年的实战变得非常专业。等我穿好衣服，她领着我下了楼梯，然后毫无感情地跟我说了再见。

我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按同伴们的标准，我已经完成了这个重要的仪式，加入了“真正的男人”这个行列。但是这次花钱买春的经历，不仅没有让我有情感上的满足感，反倒让我对自己和这个繁荣的行业充满了反感。沃尔特对情感体验并无兴趣，早就决定了以后要常来温克尔大街，而我却当即决定，再也不去妓院了。

禁果

在林德勒公司的学徒生涯中，我还是有很多愉快的回忆，其中就有吉尔达·施密特，公司办公室的秘书之一。吉尔达是一个娇小的黑发女子，大概三十多岁。她的笑容令人愉悦，身材凹凸有致，车间里所有人都喜欢她。每个星期五，下班前大约一个小时，吉尔达就会端着一个大纸箱来到车间，纸箱里面装着我们的工资信封。她会挨个工

作台地走一圈，给我们发工资。因此只要她一来，车间里就会爆发一阵欢呼声、口哨声，还有一些不雅的话。在当代女性看来，这些都算得上是公然的性骚扰了，但吉尔达只是甜甜地笑着，然后扭着屁股就走了。

这几年里，车间里一半人都追求过吉尔达，但都被拒绝了，最后就出现了许多传言。有人说吉尔达偷偷跟一个“重要的”已婚男约会，有人说她是个同性恋，还有人说她觉得跟蓝领工人上床是自贬身份。

这些传言我都听说过，但我依然对她有一种奇怪的迷恋。我根本等不及星期五，因为除了能拿到我那少得可怜的七马克，我还可以近距离地看一眼我的梦中女郎。她一走进车间，我灵敏的感官立马就能捕捉到混杂在车间刺鼻工业气味里她的香水味。讽刺的是，当我渴望的时刻终于来临，我渴望的对象站在我面前时，我却只能低头数钱，低不可闻地说上一句“谢谢”，还要把目光挪到别处，为的是不暴露我的真实情感。每次她离开后，我都恨不得踢自己几脚，每次我都发誓，下次要表现得好一点。

我觉得我肯定没戏。吉尔达这样一个性感、成熟的女人，她想要什么样的男人都能得到。想让她对我这种只在妓院里有过一次可怕经历的小毛头感兴趣，无异于是痴人说梦。如果我这么说错了的话——我敢肯定我没说错——那我就有大麻烦了，我肯定拒绝不了她。

我又想起了杜克先生的告诫。只有到了青春期，这个恶魔般的事实才击中了我：我，一个健康的男性，一直被责难，要求我压抑人的本能冲动，活在孤苦之中，不是我自己的选择，而是因为一条不可改变的法律。如果我有任何忽视法律的想法，我就会听到许多可怕的事情，比方说犹太人要是被抓到与德国女人“种族混淆”的话，就要被执行阉刑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说来也巧，我经常可以看到我家的报纸被叠成某种样子，放在家里，我总是会奇怪地不得不看到报道此

类事件的文章。这是母亲在警告我，因为她没法跟我探讨性方面的问题。然而，虽然我收到这么多的警示还有危险的信号，我还是得出结论，到了一定的时候，我总是要做我该做的事情。

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我在车间的茶水间里遇见了吉尔达。她正在往告示板上贴通知。我本想跟她打招呼，最后却只是嘟哝了一句。我打算就这样走过去，回车间。

“我问你点事。”她拦住了我。“你是怕我吗？”

“不，我不怕你。”我没有丝毫防备地说。

“那为什么每次见到我你都像是怕我呢？”她追问。

“是什么让你觉得我怕你？”我尴尬地反问道，虽然我心知肚明她在说什么。她不知道的是，我在她面前的不自信，跟“怕她”没有丝毫关系。我唯一害怕——不，恐惧——的是我可能会让自己出丑。

“好吧，如果你不怕我，那你为什么不靠近点？”我朝她走了几步，想要证明她说得不对，但她还是不肯相信。“靠近点，真的近那种。”她戏弄地说。

我又往前走了一步，这下我们的身体都快要碰着了。

“小心，你会弄脏我的。”她指着沾满油污的外套说道。然后，她抬起头，吻住了我的嘴唇。

“或许你一点也不怕我。”她发现了。“如果你愿意，我们今晚可以见面，看一场电影。”海关电影院正在放映《你好，简妮！》，是玛丽卡·洛克和乔安娜·希斯特斯主演的。

虽然这两位流行的歌舞影星是我最喜欢的，但这时我根本顾不上是谁演的，演了些什么。我根本没多想，就答应了八点钟跟她见面。那一刻，我完全没有了意志，她就算是要我晚上去月亮上见她，我也会答应的。

突然，我想起，她可能还不清楚跟我约会意味着什么呢。我决定如实地告诉她，即便要冒着把她吓跑的风险。

“你知道纳粹不会喜欢我们一起去看电影的。”我先试探一下。

“我当然知道，去他妈的纳粹吧。”这就是她叛逆的回答。

那个晚上，我为了接下来的“冒险”精心梳洗打扮了一番。不管我心里还有什么疑虑，它们都很快被我急切的期待之情甩到脑后了。出于一种宿命般的顺从，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德国谚语——虽然我认为它毫无逻辑——说A的人也会说B。我当然走了A这一步，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接着走B。如果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今天——1941年7月31日——将会以“我懂得了做爱的真正含义”而记入史册。很久之后，我才发现，那一天，帝国元帅赫曼·戈林颁布了第一条书面指令，屠杀纳粹统治下的所有犹太人。这一举动被他称为“最后解决”。

我到的时候，吉尔达已经站在电影院的入口等着了。看到我之后，她买了她的票，我买了我的。不知情的人看来，我们只是陌生人，跟其他陌生人一样，碰巧坐在两个连着的位置。很快，影院就熄了灯，开始播放每周新闻。从战争一开始，放电影之前的世界新闻就被前线战况展播取代，放的都是德国在陆地、海上和空中打胜仗的画面。

我看了又看，确认了坐我左边的那个男人看新闻看得入了迷，我则慢慢地，缓缓地把右手伸向了吉尔达的左腿。我鼓起勇气，开始用手摩挲她的大腿，缓缓加重力道。幸运的是，因为屏幕上喧闹的炮火声，我只能听到吉尔达粗重的呼吸声，偶尔还有几声呻吟。在新闻片和当晚的电影之间短暂的间隔中，她靠向我，低声说，“到外面见我。”

等我在外面追上她的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夜幕低垂。“刚才你想干什么——让我发狂？”她挑逗说。然后她建议我们去附近的维斯单姆散散步。那条街两边都是参天大树、灌木林，还有木头长椅，成了情侣们厮混的理想之地。我们发现那里空无一人，专门挑了掩藏在两棵大树之间的一条长椅。

我完全放飞了自己，把自己交到了吉尔达经验老道的双手里。听到渐近的脚步声，我们恐惧地屏住了呼吸。随着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越来越焦虑。我等着随时会响起的“安保服务！”但是，脚步声没有停下，他们继续往前走了。等到他们走远了，听不到了，我们继续做我们的事，直到彼此都得到了满足。除了担心被抓，我还担心表现不好。不过，或许是我青春的激情和活力弥补了我的生涩，因为吉尔达信誓旦旦地说，作为一个十五岁的男孩，我的表现实在太好了。

她非常坚定地拒绝了我要送她回家的建议。“我们别发展得太快了。”她说。这句话一下把我拽回了现实。对我来说，现实就是，我的雅利安朋友们可以随意地约会自己的心上人，我却要像小偷一样在夜里行动，冒着被盖世太保残杀的风险。

等我终于到家时，我还是能闻到吉尔达浓浓的香水味。母亲的鼻子非常灵敏，我确信，只要我一进屋，她就能发现这香水味。不过有意思的是，她没有挑明。相反，她问我喜不喜欢那部电影。一开始，我想跟她说，我还算喜欢，不过我说不出口。“我碰见了认识的女孩子，没看完电影就出去散步了。”我尽可能贴近事实地说。

“她是个好姑娘吗？”母亲问，跟所有爱管闲事的妈妈一样。

“是的，非常好。”我说。

“小心点，汉斯-尤尔根。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提醒我说，脸上的烦恼像大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

我的伙伴们远赴战场

一个接一个地，我孩童时期的伙伴都消失在街区了。大多数人都是被征兵走的，还有一些——不是因为热爱希特勒或祖国——是自愿参军的。公开反对纳粹的卡尔-海恩兹·比洛，也参加了海军，唯一

的目的就是增加与女孩们鬼混的机会。他指望着人们都知道的事实，女孩们痴迷于穿海军制服的男人。他给我写过一封信，当然是经过审查的，他说他在大西洋的一艘潜艇上已经有过大量经验了，跟港口的女孩子却还没有过。还有我的大多数朋友：尤根·布朗，汉斯·莫雷尔和卡尔·莫雷尔兄弟，还有以前当服务生学徒工的非菲·皮特斯。杰克·斯塔德斯基参军是为了逃避作为一个无技能劳工的乏味生活。他以坦克司机的身份出现在苏联著名的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我的红灯区“同伴”沃尔特·鲍尔已经成了著名的克拉德部队的摩托车手。只有我小时候的“保镖”、前希特勒青年团负责人沃夫冈·纽曼，凭着对希特勒不可动摇的信念，自愿加入了党卫军。他接到在比利时战场上的任务后，家乡的所有报纸上都出现了他的大名，然后，丝毫不令人意外的是，他的名字也第一个出现在报纸上不断变长的阵亡名单里。

虽然德国在前线的伤亡人数越来越多，我却非常盼望也出一份力，不是因为别的，只是想证明我跟别人一样出色。但我却不敢去报名，因为害怕被拒绝——我已经被拒绝过太多次，因为我不是雅利安人。所以，当有一天我收到一封看上去很正式的信——相当于山姆大叔的“欢迎信”——要求我去做体检，也就是“体格检查”，检查我的身体是否适合为期一年的劳工服务，我高兴坏了。所有十七岁的德国男孩都被要求先参加劳工服务，然后才能加入国民军。我满怀希望地推想，如果他们不想要我，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地让我去做体检呢？我越想越乐观，除了穿上令人尊敬的德国军装，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能让我抹去一直以来隔绝我和我的好友们的种族差异呢？我确定，只要一穿上军装，我就肯定能跟别人一样好。

体检的那天早晨，我和几百名1926年出生的年轻人——包括很多长头发的摇摆男孩在内——聚集在市中心一所公立学校的大礼堂里。因为许多年轻人都公开希望自己被拒，我想，我还是把入伍的梦想放

在心里吧。

礼堂里靠墙放着一排桌子，后面坐着国防军军官和工作人员，他们都身穿各自的制服。一个军官命令我们都闭嘴别发出声音。他说我们是急需整顿的可怜虫，命令我们先去照相，然后脱光，鞋子、袜子和所有衣物都脱掉，整齐地叠放在地上。接着，我们又被命令站成一排，走到桌子面前。军官们给我们做了全身检查，从头皮到脚趾，一边查还一边把结果记录到一堆表格上。走过不同的检查站时，我偷偷瞥见了我的记录，我应该是非常健康的，视力、听力和牙齿都是优良，但体重比标准体重低了几磅，可能是因为食物配给不够。

“很遗憾，我们不能录取你。”一个工作人员饱含同情地说。“你只需要在接下来一年的时间里，注意饮食，多呼吸新鲜空气，长点肉。”他这么说虽然是出于好意，但还是一下把我打回了纳粹现实，粉碎了我挣脱种族歧视的希望。我想，如果他们认为我连给劳工服务部挖洞修路都不够格的话，肯定也不配去军队里扛枪。我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在最后一张桌子前，一个军官递给我一本崭新的“军事通行证”，上面详细地记录了我的参军情况，每个男市民都必须在被要求出示的时候出示这本证件。在我的照片旁边，有人用钢笔写了几个小写字母，“n.z.v.”我问一个军官这是什么意思，他简洁地说，“Nicht zu verwenden（不可录用）”。

等我所有的朋友都入伍之后，我在家乡的日子变成了纯粹的苦工——只有工作，没有娱乐。即便是在车间里，所有的年轻人要么被征兵，要么自愿加入了某个部队的分支。不过无聊并不是我最大的问题。作为一小撮身体健康却没有穿上军装的年轻人之中的一个，我变得更加可疑——因而更加难为情——更多的是因为我的普通市民打扮，而不是我的种族。在铺天盖地的“穿军装的男儿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元首和祖国”宣传之下，我开始有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低级感和完全的隔绝感。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直到快要将我压倒。有一天，一个

负伤的党卫军军官拄着拐杖在大街上跟我搭话，大声地质问我，为什么我可以安全地走在路上，而“英勇的德国男人”却不得不搭上性命，在战争中断手断脚。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作为一个非雅利安人，境况是非常危险的。想起杜克先生的预言说，纳粹收拾完犹太人，就会来对付我了，我觉得自己像是坐在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炸弹上。我觉得，唯一能拯救我的就是去部队当兵，穿上军装，因为在德国，没有人比德国士兵更受人尊敬了。

虽然很有可能成为阵亡人士——在1942年中这种可能性太大了——虽然我越来越怀疑希特勒发动的战争是错误的，是走向灭亡的，我参军的决心却依旧强烈。我想，我宁愿去战场上碰碰运气，受伤或阵亡，也比落入党卫军的手里要好。实际上，我愿意登上一艘正在沉没的船，虽然我还在相对安全的岸边。现在回头再看，我当然知道这种想法是多么愚蠢，但在当时，那对我来说就是全部。

重要的是，我要如何让部队接收我。我突发奇想，或许走自愿参军的路子更适合我。这个主意至少值得一试。虽然我被登记为“不可录用”，但我指望着各支部队伤亡惨重或许会给我留下一丝机会。

我跟纽曼师傅说了我要去干什么后，他很痛快地允许我请一天假。自愿参军对国家来说是有着高优先度的事情。我坐上了开往哈斯德特的早班火车。汉堡军事指挥部就在哈斯德特。我到的时候，那里跟蜂箱一样嘈杂。各个部队的士兵来来往往，有的步行，有的开着迷彩车，车身上都有熟悉的德国国防军的十字标记。我经过的大多数士兵都忙得没注意到我，但是有些却来回打量我，显然看到一个健全的年轻人穿便服让他们吃惊，居然还是个黑人。我不确定，他们惊讶的是我的市民打扮，还是我“不同寻常的”相貌，又或者两者都有。但我不在乎，我觉得，只要我也穿上军装，他们就不会想要取笑我这个同志。

我正这么想着，一辆车停在我身边，打断了我的思绪。“你！你是谁，在这干什么？”坐在后座的军官冲我喊道，他的声音里满是轻

视和怀疑。

我求之不得地拿出我的“军事通行证”，递给他看。他翻看我的证件，仔细研究我的照片，还跟我本人核对。“那么你到底想要什么？”他继续审问。

“我想报名参军，将军先生。”我回答，指望我认出他的军衔的能力，能让他对我另眼相看。不过，没有这么幸运的事。

“你想干吗？”他问，简直比听到我说要娶他的女儿还难以相信。

“报名参军？你疯了吧。你不知道非雅利安人被禁止加入德国国防军吗？就连你的证件上也写了你不可录用。”

“是的。”我承认，“但我以为部队需要人手，或许可以破例。”

军官显然被激怒。“我告诉你，”他咆哮道，蓝色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德国并没有，也绝不会，困难到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能赢得战争。我建议你，赶紧回去干活，别再浪费宝贵的生产时间想这些蠢事。明白了吗？”没等到我回答，他就把证件扔回给我，然后命令他的司机接着往前开。

这个军官的这一番话完全把我搞懵了。它是如此出乎我的意料，我陷入了深深的沮丧之中。我做好了入伍申请被拒的心理准备，却完全没有准备接受这样一番羞辱。

我没再去招募办公室打听，直接回到车站，坐上了下一趟回汉堡的火车。坐在火车上时，我还是麻木的，军官的话不停地回响在我耳边：“德国并没有，也绝不会，困难到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能赢得战争。”我想起，在我十岁时，母亲给我报名参加希特勒青年团时，我也听到过类似的话。

就这样一边想着，我的麻木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当时我想，如果我不能加入他们，又不能与他们对抗，我会退而求其次，我会从心底里憎恨他们。在二战剩余的几年里，支撑我的是我对纳粹的憎恨。

败局的端倪

1942年冬天，德国军队在斯大林格勒大规模惨败之后，即便是最乐观的德国人也很清楚，这场战争并没有如他们所愿地顺利进行。德国军队面对的是苏联零下气温的严寒。政府紧急号召德国女人捐出自己的皮大衣、手套、帽子，让零售商们给快要冻死的前线士兵提供暖和的衣服。

为了维持前线和后方的士气，把盟军造成的损失减到最小，戈培尔博士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肆造假，把败仗说成胜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甚至还新创了一个词，“战略性远离”，用来形容德国的撤退。为了维持德国人的战斗精神，戈培尔的宣传大战有一个关键的工具，那就是电影。他们速度飞快地炮制出一系列电影，要么是美化战争，把犹太人描绘成万恶之源，要么就是纯粹地宣泄情感。毋庸置疑，战时纳粹制作的最反犹的电影当属导演维特·哈兰的《犹太人苏斯》，主演是当时最著名的德国演员斐迪南·玛丽安。玛丽安使尽浑身解数把这个角色塑造成一个卑劣的、每个观众都乐于憎恨的犹太人。在电影里面，战争结束后，这个犹太人自杀了，显然是因为羞耻和内疚。当时士气急速低沉，为了提升士气，有些电影专门讲述帅气军官的浪漫爱情，例如《伟大的爱情》，流行影星萨拉·林德给观众传达了一个积极向上的信息，“我知道一个奇迹马上就要发生。”很快，数百万焦虑的德国人开始传唱这首热曲，热切地希望奇迹真的会发生，会扭转他们的不幸，会结束战争。其他宣传片包括好莱坞式的歌舞片，为的是让人们忘记，虽然只有短短几个小时，忘记饥饿、轰炸、伤亡，还有其他跟战争有关的灾难。

戈培尔提升士气的决心，我们在车间也能感受到。有好几次，我们车间都来了“快乐的力量”表演小组，通常是两或三个人——大概一个半小时左右，努力地用幽默和手风琴表演让我们“快乐”。在战时生产的重压之下，片刻的欢乐我们也是很感激的，但我们知道，我们得到的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都在新闻片里看过，去大型国防工厂慰问的可是德国最著名的交响乐团，比方说，柏林爱乐乐团。

还有一个提升士气的方法，那就是用政府控制的德国广播电台故意在战争进程方面误导德国人。就连原本很容易受骗的市民也开始越来越怀疑它的扭曲和谎言了。为了防止一边倒的信息，我冒着极大的风险，偷听BBC的德语新闻。这一举动在纳粹看来可是叛国，会以叛国罪论处。违反这条法律的话，就会被送到集中营，关押甚至是处死。虽然我对集中营并没有具体的了解，但传言都说，集中营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讽刺的是，我收听盟军消息的工具，是我们小小的、装电池的收音机。这个东西很便宜，是政府制造并分发的，本意是为了让每个德国人都拥有收音机，都能收听消息。虽然母亲很担心我这一非法举动的危险性，我还是对BBC的新闻上了瘾，比起戈培尔宣传里明显的谎言，我更信任BBC的消息。为了不被抓，我会把收音机放在床上，躲在厚厚的毯子下偷听，母亲会听着门口的动静，确保外面没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老旧的吱吱呀呀的楼梯比警报系统还要管用。多亏了BBC，我非常清楚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将要走向什么样的惨败。而那些完全依赖于戈培尔的人却要很久之后才能察觉到这一点。

不幸的是，有了这么好的军事消息的来源，我就总忍不住跟消息闭塞的朋友们分享，想要反驳戈培尔媒体散布的消息。有一次，我差点出事。那是1941年5月10日，纳粹媒体播报了一个轰动消息，说鲁道夫·赫斯，希特勒的副手，已经飞去英国，协商和平停战。我迫切地想要知道更多细节，不停地收听BBC。几天后，伦敦的德语新闻终

于证实了德国的消息，说赫斯已经降落在苏格兰某处。在跟几个同事谈论此事时，我说了好几遍“苏格兰”这个词。有一个同事纠正我，坚持说赫斯去的是英格兰，之前所有的德国报道都说是英格兰。幸运的是，他不是那种疑心重的人，没有逼着我说出我是从哪里听说的苏格兰。要是我的同事刨根问底，想要害我，就肯定能坐实我收听并传播敌方宣传，参与“严重叛国活动”。

像鲁道夫·赫斯这样高级别纳粹分子的疑似“叛逃”，令纳粹政府陷入了极大的难堪之中，因此戈培尔的宣传机器不遗余力地粉饰这一事件。官方在广播和报纸上宣布赫斯患有严重的精神混乱，完全丧失了理智。很多关于“疯了的赫斯”的笑话应运而生。其中一个说的是一个倒霉的人去纳粹招聘办公室找工作。

“你想要什么样的工作？”纳粹工作人员问。

“我听说你们在招副元首。”这个人回答。

“你疯了吗？”气愤的工作人员咆哮道。

“我没疯。”找工作的人说，“一定要疯了才合格吗？”

为了比对BBC新闻和德国新闻，我也听威廉姆·乔伊斯的晚间报道。这是很合法的。乔伊斯生于美国，长于爱尔兰，在柏林用英语播送戈培尔的宣传资料。不幸的是，当时我的英语并没有好到能听懂他说的一切，但我却听懂了他的威胁，他说，英国人如果不投降的话，就要面对可怕的后果与毁灭性的灾难。那时希特勒本打算以不列颠之战建立德国的空中霸权，打响入侵不列颠群岛的前奏，不料德国空军在此战中惨败。即便在这样的情形下，乔伊斯还是说出了这样的威胁。结果英国不肯原谅乔伊斯对他们战斗精神的亵渎，战争结束后在伦敦以叛国罪直接吊死了他。

除了英国的新闻报道，我还发现一些更加切实的征兆，说明希特勒的战况有了大麻烦。从我刚开始当学徒工，纽曼师傅就用拖车生产领域的德国最高标准要求我的同事们和我。为了确保只有完美无瑕

的拖车才能进入前线，一组部队巡查员会定期来检查每条焊缝、每个铆钉和每个螺丝。稍微偏离标准就会被退货，干活的人就会被纽曼师傅臭骂一顿。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一切都变了。纽曼师傅说，厂里人手严重短缺，生产进度马上就要落后了，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最多的拖车。接着下来他说的一番话令我们震惊不已。我们以为绝不会从厂里最追求完美最痛恨敷衍了事的人嘴里听到这种话。“拖车不完美也别担心，”他说，“完美的拖车不能及时到达前线的话，对我们打胜仗也没什么用。”除了高标准，部队巡查员也不见了。我们被告知，他们被派去了前线，部队指挥官认为那里更需要他们。

像所有人一样，被战事席卷着，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三年的学徒生涯就要结束了，现在到了我要参加熟练工考试的时间。这个考试要考两天，实践操作和理论测试。虽然我很期待这一天，我终于能够往上走，加入熟练工的阵列，但当我真正被告知，我通过了考试，拿到了我的熟练工证书时，我却没有特别激动。在战时条例的严格约束下，我无法按照行业传统换工作。这就意味着，我只能继续干这份工作，虽然我拿到了证书，却不能得到我应得的尊重，以前的上级和熟练工们还是照样折磨我。除此之外，我也厌倦了做拖车，它的组装线生产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了任何挑战。即便是可以收到熟练工的全额工资，而不再是原先少得可怜的学徒工薪水，我也打不起精神来。

我希望能发生什么事情，可以结束我的苦工和无聊，某些可以带来改变的事，或许我单调的生活能有一丝活力。当时，没有人提醒我别随便许愿，因为愿望或许能够成真。我并不知道，一场巨大的灾难很快会发生，它带给我的改变和刺激足以存续我接下来的人生。

蛾摩拉^①行动

“想象一下，大都会波士顿超过百分之五十都被摧毁了，到处都是腐烂的尸体。把波士顿商业区内的每一栋建筑都炸成废墟，把所有能被火吞噬的东西都烧掉，杀死数万人。想象一下波士顿以这种方式被摧毁，变成废墟，灰烬和瘟疫的恶臭。把这一切都想象到最恶劣的程度——这就是那时候的汉堡。”军事航空作家马丁·凯丁在他1960年的书《汉堡死去的夜晚》里这样写道。在这本书里，他称作“蛾摩拉行动”的事件，是1943年夏天英国兰开斯特和哈利法克斯轰炸机对汉堡为期十天的轰炸。我实在是幸运，能够在“地狱般的大火”中毫发无伤地存活下来，凯丁写道，“汉堡的惨状，就连被原子弹攻击的广岛和长崎，也无法比拟。”

对我和母亲来说，“地狱”开始于1943年7月29日，那是一个闷热的星期四，晚上九点左右，熟悉的警报声又响了起来，暗示敌机又一次飞越了英吉利海峡，朝着汉堡的方向飞来。过去一百多次，每当有警报响起，我母亲和我都会各自提上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的是我们最值钱的东西，前往半个街区外的公共防空洞。对我们来说，跟这个城市剩下的人一样，夜间的防空洞之行已经变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这天晚上却不一样。在这之前的两个晚上，汉堡的大部分地方都被炸毁，数万人被敌机炸死，所以，现在的警报声有了一种更加不祥

① 蛾摩拉是《圣经》中记载的罪恶之城，城中居民不遵守上帝戒律，导致城市被上帝毁灭。

的重要性。

有些邻居听到这次警报后很害怕，尽可能多地带上拿得动的行李，离开城市去乡下的朋友或亲戚家。格雷琴、她的母亲和她弟弟就在其中。前一天晚上，格雷琴在防空洞里告诉我，他们已经打好行李，天亮就去萨克森联邦州的哥廷根，他们的亲戚在那里。我的母亲和我也考虑过离开城市这种可能性，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出汉堡的火车已经乱成一片，到处是惊慌出行的人。在一辆拥挤的火车上被炸弹袭击，跟在防空洞里被袭击，可能性一样大。我们决定还是在城里碰碰运气。

警报响起后的几个小时，一切都还平静。我走到换气室，一个小休息室，那里已经有十几个人聚在一起抽烟，从开口处望向繁星点点的天空。高兴的是，我在这些人之中看到了一个多年未见的老邻居杰克·斯培德斯。穿着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兵师的军装，杰克说他很高兴能从东线前线战场上休假回家。从他军装上别着的各种勋章和奖牌来看，他肯定是经历了出生入死。当我称赞他是一个战斗英雄的时候，他自嘲地说，“我受够了打仗，但我已经学会了在糟糕的境况下自处。”

杰克对我说，跟人们传统观念不一样的是，他的精英部队并非全都是热忱的志愿者，相当大一部分人都是跟他一样不情愿参军的。他说他的部队被称为德国最难对付的部队之一是实至名归的，部分是因为他们经常拒绝接收俘虏。杰克说，起初，下令射杀已经投降、没有武器的苏联士兵时，他觉得良心难安，但在看过自己许多同志被杀或残废后，杀戮变成了越来越容易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多想。“不是他们就是我们，”他理智地说，“所以你只能尽力确保，死的是他们。你只能做你该做的。”

杰克说，他的部队的“不求饶，不放过”的名声也有坏处。它不仅让敌人心生敬畏，却也让他们越战越勇，坚持的时间更长，以免必

死的结局。

我很难想象，我认识的那个和声细语、温和有礼，甚至说有点孤僻的杰克已经变成了一个坚硬的人，能够眼都不眨地处死手无寸铁的人类。不过，看着他的勋章，他坚毅的脸庞，还有他湛蓝眼睛里的精光，我才意识到，站在我眼前，语气轻松地跟我谈论他和部下可以随意奸淫俄罗斯女人的人，跟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杰克已经截然不同了。

他显然已经忘记了，是德国入侵了苏联，而不是苏联入侵了德国。他安慰我说，苏联人是罪有应得，因为他们不肯和平解决。他说起他的某些坦克部队是如何在战斗中被俄罗斯神风犬摧毁的。那些狗身上绑了炸药，还装了类似于天线的装置，接受过专门的训练，在坦克下面找食物。德国坦克一靠近，这些狗就冲到坦克下面找吃的。一旦天线碰到坦克，炸弹就会把狗、坦克和坦克上的士兵全都炸上天。几秒钟前还跟我说射杀已经投降的俄罗斯俘虏没什么错的杰克，这会儿却指责俄国人对待动物太过残忍。

我对听到的一切很反感，但觉得没有必要非让他意识到他这套逻辑中的不足之处，毕竟他要靠着这套逻辑来让自己和他的部队的罪行合理化。

我把注意力从杰克身上转到小房间里其他人的谈话中，听到了许多更加可怕的故事，不过都是家乡附近的故事。说到一周前汉堡发生的空袭时，一个人说，他一直在找他住在汉默布鲁克区的哥哥和嫂子，在看到整个区都被炸得乱七八糟时，他放弃了希望，认为再也看不到他们了。另一个人说起，好几百个人是如何被含磷的炸弹引发的大火慢慢烧死。接着他又描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场面，说那些不幸的人为了活命，跳进运河，但只要他们一离开水，磷火就会重新燃起，逼得他们不得不待在水里，直到变得虚弱难以支撑，或者失去意识后被淹死。

虽然对纳粹获胜稍微有一点点怀疑都会被认定为叛国罪，但人们

已经公开怀疑，在主要工业中心被炸毁之后，德国还能撑多久。有个人不顾当时有士兵在场，直接预言说纳粹只有“一个月了，顶多一个月”。没有人反驳。似乎是越多的德国“平民”认为帝国有了麻烦，他就越大胆地直抒心意。不幸的是，他预测的纳粹灭亡，还要等到两年之后。

另一个人说，汉堡可能不会再次被袭，因为英国可能会想尽尽可能完整地占领这座城市。那个时候，他和我都不会想到，几个月前，汉堡的命运早就已经被蛾摩拉行动的策划者们写好了。这次行动的目的就是彻底摧毁汉堡，德国的第二大工业城市和最大的海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

我回到防空洞里，跟母亲说，外面一切平静，至少今天晚上，我们会没事的。防空洞里面，人们——大部分都是女人、孩童和年迈的男人——都很安静，开始放松地如常交谈。突然，午夜过后不久，一切天翻地覆。在听起来像数千架重型轰炸机的嗡嗡声中，我们可以听到炸弹尖厉的鸣叫声。每次爆炸，整个防空洞就好像在大地震中颤抖一般。每次爆炸，紧跟的就是女人和孩子们恐惧的哭喊声。几分钟后，灯都灭了，广播也没声了，显然是被炸毁了，哭喊声越发响亮。炸弹响一声，人们先是安静一会儿，接着哭喊上一阵，又响一声，然后又安静一会儿，又哭一阵。渐渐的，安静的时刻越来越短，直到完全没有，人们开始不停地嚎叫哭喊。战后，盟军发布的伤亡报告说，在蛾摩拉行动中，这座城市被一千二百多个地雷、三万个重型高能炸弹、三百多万个燃烧弹、八万多磅磷弹、五百个磷罐、五百支燃烧棒袭击。

战后，英国人在盘点空袭汉堡的功劳时，证实了他们押在一项新科技上面的赌押对了：他们在城市上空投放了许多金属条。在空袭之前成吨投放的金属条严重破坏了德国防空雷达，使高射炮几乎不可能瞄准目标。在之前的空袭中，英军损失惨重，但这一次，这些金属条

令他们的轰炸机得以在汉堡高空来去自如。

轰炸开始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防空洞里的温度开始急剧上升。我们认定，是防空洞上面的工厂被燃烧弹击中着了火。没一会儿，我们的怀疑就得到了证实，浓烟开始从洞顶的缝隙中往下冒。这个时候，我们的邻居裁缝先生，变成了“防空洞巡查员”，他挥舞着手电筒给我们照亮。以前因为他总是假模假式像个管事的，没少被大伙儿取笑。但这一次，却没有人发笑，他说明了我们的处境有多危险，打开了用电池供电的紧急照明设施，又命令所有健全的男人，包括杰克我在内，去操作手动气泵，给防空洞泵气。

杰克和我都开始干起来，但很快，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努力只是起到了反作用。我们泵进来的并不是新鲜空气，而是外面浓重、刺鼻的空气，我们赶紧停下来。杰克告诉我，冻手冻脚地跟“伊万”们（苏联人）在战场上拼命不是好玩的事，但像只鸭子一样被活活烤死或者在这该死的地洞里被呛死更糟糕。

最后，轰炸停止了。外面喧闹的嘶嘶声，我们以为是消防水管灭火的声音，后来才得知，那是燃烧弹引发的大火的声音。这片火海让我们头顶上的街道变成了高达一千五百多华氏度^①的人间地狱。很快防空洞里就全是浓烟，人们开始咳嗽，喘粗气。电池的电量越来越弱，临时照明的灯光也越来越昏暗，透过这灯光，我们可以看到浓烟渐渐包围我们。现在，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是留在防空洞里窒息而死，要么是走出防空洞变成人体火把。然而突然之间，外面工厂的墙轰然倒塌，堵住了出口，那两个可怕的选择也只剩下一个。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性命还面临另一个威胁。有人碰了碰防空洞的屋顶，发现那里已经烧得滚烫，随时会从我们的头顶塌下来。

① 1500华氏度约等于815摄氏度。

这个消息传开来，本打算出去的人们安静下来，各家紧紧地靠在一起，似乎放弃了活着逃生的希望。除了咳嗽声，洞里一片寂静。就连孩子的哭声都止住了。

我坐在水泥地上，坐在母亲身边。她跟我一样，呼吸困难，眼睛被熏得睁不开。虽然我们早就被告知，我们的毒气面罩防护不了浓烟，但我们还是绝望地戴上了面罩，指望它们多少能派上一点用场。我们很快就发现，毒气面罩一点用也没有，反而让我们呼吸更加困难。但是在我们心里，我们不肯承认这一点，还是戴着，就好像它们是唯一拦在死亡和我们之间的东西。

虽然我完全了解眼下处境的严重性，我也无法理解，这就是我最后的结局了——无论我来这世上是为了什么使命，我都要丧命于“这个该死的地洞”里。即便过去这些天里，我在城里的其他地方看过了那么多的尸体，我都没能认定，我这辈子的运气很可能要到头了。我不觉得乐观或者悲观，也不觉得害怕，只是怀疑，就是这样了。戴着毒气面罩，我的呼吸越来越困难，我觉得周围的一切离我越来越远，却没有真正失去意识。我还是知道，母亲就在我身边，知道我们手握着手，只是她戴着面罩，对我来说，是那么不真实，就好像是从外星球来的陌生人。

我在这种半昏迷的状态下过了多久，我并不知道。接下来我记得的就只是，有个人拽着我的毒气面罩，冲我大喊，让我揭下面罩。起初，我以为是有人为了活命抢夺我的面罩，还拼尽全部力气护住我的面罩。等我看清他穿的是纳粹的制服时，我才松了手。耀眼的日光从防空洞的前入口倾泻而下，我一按照命令摘下毒气面罩，新鲜的空气就涌进我缺氧的肺部。我母亲也摘下了她的面罩，渐渐缓了过来。我看了眼手表，当时是早上九点。这场严酷考验整整持续了十二个小时。

被炸得面目全非

我们缓缓地走出防空洞，仿佛从噩梦中醒来一般，就好像是一群重获新生的人。在楼梯口上，几个穿军装的营救人员迎接了我们，正是他们救了我们。他们让我们用毯子和毛巾盖住头，免得被空气中的火星烧伤了。

营救人员提醒我们，不管看到什么，都要保持镇定。虽然有了他们的提醒，看到眼前这一切时，我们还是惊恐万分。等着我们的是我们这辈子看到的最悲伤最可怕的景象。史都肯大街，不，整个巴姆贝克，我们热爱的街区——彻底被炸毁了。目光所及之处，无不是残垣断壁。与昨晚震耳欲聋的喧闹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外面一片压抑的静默。时不时的，我们就会看到烧焦的木乃伊一样的尸体。他们显然是来不及走出家门寻找防空洞。大多数房子都被烧毁，有些房子正在熊熊燃烧，还有些烧得只剩下个空壳。其中一栋房子，现在只剩下一堆熏烧的木梁，是我从小到大住的家。我们走过的时候，提着四个行李箱，身上披着防火星的毯子，这就是我们的所有家当。我偷偷用眼角的余光看着母亲，不知道她看到这么多年来这么努力经营的一切都失去了会是什么感受。令我惊讶的是，她没有流泪，依旧镇定。

“只要我们还活着还平安就好。”她安慰我，也安慰她自己。“其他的东西，总有一天我们会挣回来的。”

直到战争结束，我们才知道汉堡在蛾摩拉行动中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创伤，能够侥幸逃生是多么值得感激。四万一千多汉堡人丧生，大多数受害者都是在两难之下死去的，究竟是在防空洞里窒息而亡，还是走进大街上的地狱。九十万人无家可归。几乎半个城市的建筑和

六百多家大工厂，包括汉堡四家最大的造船厂，都被炸毁。浓烟散去后，两百七十七所学校、二十四家医院和五十八间教堂化为乌有。

母亲和我本打算去铁轨旁边避火，还没走到那里，母亲拿下了盖在头上的毯子。突然，我听到她大喊，“我的头发！”我转过身，看到一张烧着的报纸落到她的头上，几秒钟就把她浓密的褐色头发燎坏了一大片。我赶紧用我自己的毯子扑灭了火，幸运的是，她的头皮只受了一点轻伤。

我们防空洞的幸存者陆陆续续都来到了铁轨旁，有些表情阴郁，有些兴高采烈，但每个人的脸上都印刻着昨晚的痕迹。聚在一起的时候，每个人的眼睛都湿润了，不由分说地拥抱起来——不管是亲密的邻居，泛泛之交，还是彻底的陌生人——因为失去一切而悲伤，又因为依旧活着而开心。

我在人群中看到我的朋友杰克，问他要怎么才能回到他的部队。“别跟任何人说，”他凑到我耳边说，“我不打算回去了。从昨晚发生的这一切来看，我肯定，这场仗顶多只能再打几个礼拜，或者几天。在那之前，我会跟其他家人一起撤离。”

他指着自已提着的行李箱，说只要一有机会，他就会换上便服，扔掉这身“该死的军装”。

尽管我也同意，这次轰炸肯定会加速德国的失败，我却并不像他那样乐观。“如果再过几个星期仗还没打完呢？”我问。

“别担心我。”他逞强地说，“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希望如此。”我说，我是真的希望他一切都好。握手后，他转身离开，我一直目送他，直到他强壮的身影消失在人群中。我莫名地有些悲伤，仿佛觉得再也见不到他了。

很快，几辆部队的卡车就来了，准备把我们送到摩尔维德，戴姆多火车站前的一个大操场，那里被改造成一个大难民营。我们跟无数个幸存者一起，排在似乎没有尽头的长队里，等着从红十字会工作人

员手里领三明治和牛奶。我忍不住惊叹应急工作人员展现出来的组织能力和效率，居然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带来大量美味的食物给这么多的人。

所有的难民都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德国境内任何地方，母亲和我决定去哈尔兹山脉脚下的萨尔察，投奔我们的亲戚。不过问题是，许多趟载满了难民的火车，都滞留车站，要等到阻塞被解决，所有车道被清理干净才能离开。这可能要好几天才能完成。我们决定先坐下一趟应急卡车出城，然后再坐火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他成千上万名难民也是这么想的。几个小时，无数次尝试之后，我们终于上了一辆送难民出城的卡车。

我们跟满满一卡车难民挤在一起，身边是少得可怜的行李，所有人没有洗澡、没刮胡子，汗津津，疲惫不堪。我终于了解，一场巨大的灾难是如何把我们大伙儿变得平等——同样的贫穷，同样的脏臭，同样的悲惨。我“与众不同的”外表，以前走到哪里都引人注目，突然之间，谁都不感兴趣了。人们都忙着关注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没有人再去关心别人的发色或肤色。

母亲和我旁边是一个年轻女人，坐在她破旧的行李箱上，友好地跟我们分享她仅剩的三根香烟。我们俩都不是烟民，只能感激地谢绝了。大灾难似乎激发出了人们最好的一面。我看到的都是人们急切地帮助同伴。不幸的是，这种对他人无私的关爱，在灾难过后就迅速地消失了，就跟它来临时一样匆忙。

几个小时后，我们的卡车终于到了卢恩堡，在那里，我们幸运地挤上一辆南下的火车。这辆火车上也挤满了汉堡的难民，在快要出站时我们才挤了上去。所有的车厢都满了，我们只能待在过道，坐在自己的行李箱上。

从卢恩堡到汉诺威的路上，我们的火车突然停了下来，周围是一片空地。有人大喊了几声“飞行警报”。母亲和我跟着其他难民赶紧

找最近的出口。跳到地上后，我们加入了逃离火车的大军。我抓住母亲的手，拉着她朝着远处的灌木丛跑去。还没跑到，就听一个男人大喊，“所有人都趴下！”接着我们就听到头顶传来飞机引擎的轰鸣声。趴在地上，我们抬头看到一架有“皇家空军”标记的飞机在蓝色的天空中绕着我们的火车飞了两圈，然后消失不见。

过了一会儿，火车的哨声响了，标志着危险已经过去，几分钟后，我们又如释重负地上了路。

停靠在汉诺威火车站时，一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应急工作人员从火车车窗给我们递发了三明治、牛奶。一个穿褐色军装的纳粹分子出现了，火车上一个女人开始大喊，“就是你们这些猪把我们害成这样的！”她还骂了些别的话，直到有人用毛巾塞住了她的嘴。

正常情况下最多五个小时的车程，这一次我们花了三十四个小时。长途跋涉之后，我们终于到达哈尔兹山下的小村庄萨尔察，三千年古城诺德豪森的前一站。我们在空荡荡的车站下车时，已经大半夜了。

这是逃离汉堡后，我们第一次感受到彻底的寂静。这种感受是如此“新奇”，我们的声音听上去都不像是自己的了，仿佛是陌生人的。母亲和我在战时承受的心理和生理打击，都比不上此刻，火车开走，我们被扔在灯光昏暗的站台，冷得发抖，疲乏无力，感觉完全被遗弃。

虽然我们累得不行，还是强撑着在萨尔察漆黑狭窄的主街上走了十五分钟，直到走到哈兹大街六号，我们亲戚的家。

我们什么都不用说。一看见我们，格里特舅妈就知道我们遭遇了什么。接着，她和母亲就抱在一起痛哭。灾难发生的四十八小时后，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母亲崩溃。

我上一次来萨尔察过暑假，还是六年前，那时我才十一岁。卡尔舅舅和格里特舅妈一点都没变，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特鲁德琴现在

是个二十一岁的胖姑娘，未婚夫是个陆军下士，上了苏联战场。他们一家人看到我们都非常高兴。

虽然费了点劲，但一段时间过后，母亲和我都尽可能适应了小镇生活。卡尔舅舅、格里特舅妈和特鲁德琴竭尽全力地让我们忘记遭受的痛苦，让我们像在家里一样放松舒适。要想做到这些，对我们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是简单的事。在汉堡，人们对纳粹的幻灭越来越明显，纳粹也开始越来越低调。而萨尔察则不同，跟中德和南德的大多数小镇一样，萨尔察依旧受到纳粹的严格管制。稍微夸张一点说，萨尔察是那种谁家有几条床单都众人皆知的小村庄。卡尔舅舅和格雷里舅妈早都学会了把自己的政治观点埋在心里，即便对我们也不吐露。不用他们说，我们知道我们也要这样做。

我们刚到的时候，村里到处都在传几天前的消息，说墨索里尼已经被推翻，并被由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将军率领的反德的意大利军队俘虏了。墨索里尼的倒台意味着意军的大惨败，意味着意大利反盟军势力的大崩溃。并没有真正尝过战争滋味的萨尔察村民们，把所谓的“柏林—罗马轴心国”战败的消息当作是个人的损失。许多人痛骂“懦弱的意大利人”来发泄自己的沮丧。

墨索里尼被俘几个月后，萨尔察村民的士气得到一次急需的提升。元首总部发出一则消息说，墨索里尼已经被释放。接着我们就在新闻片里看到，在一个名叫奥托·斯科尔泽尼的上校的带领下，一个党卫军突击队员开着滑翔机，在阿布鲁兹山上，从俘虏们的手中把墨索里尼接出来，并把他安全地送了回来。他全身发抖，但没有受伤。

跟许多一战老兵一样，卡尔舅舅又被部队征兵，因为年轻人兵源严重不足。表面上，他被派驻在埃尔福特，离家只有一站地。实际上，他在家过着跟以前没多大区别的日子。知道他是个好裁缝后，他的指挥官就安排他在家帮自己和高级军官朋友们做漂亮的军装。我舅舅只穿过几次自己的下士军装，还都是在去埃尔福特驻地送做好

的军装再领些新活回来做的时候。

有时候，为了做最后的修改，他会让我试穿那些灰色华达呢、金色或银色束腰的军装。想象一下什么什么将军、“管他叫什么名字”上校的军装被我这个他们为什么军装都不配穿的人穿过，我就有一种变态的满足感。卡尔舅舅从没有受过那样的轻视，因此不能理解我每次站在镜子前，穿着纳粹高级军官的军装时，脸上露出的好笑表情。“什么东西这么好笑？”他会问。“没什么。”我回答，懒得解释。

在汉堡的大火中，我几乎失去了一切，但其中最让我心痛的是我的冰球鞋，还有我心爱的小号。在“非必需品”短缺或彻底没货的情形下，我再也买不到新的了。我尤其想念的是，可以用音乐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因此当有一天，卡尔舅舅给我一支破旧的小号时，我高兴坏了，那是他从一个哥们儿那里弄来的。毫无疑问，它以前也有过好日子。“我知道它不是小号，看着也不怎么好了，”舅舅说，“但我只能弄到这个了。”我紧张万分、小心翼翼，满怀热爱与在意，很快就把这根破旧的棍子打磨成跟新的差不多。一开始，我连吹口都找反了，经过许多个钟头的练习，我居然能用这支古老的乐器演奏出现代的曲调。大伙儿都吃惊不已。不过在这战乱时期，我对音乐爱好的追求实在太奢侈了，没多久，也就不了了之了。

根据法律要求，母亲和我去当地的警察局备了案，这样一来，萨尔察这个原本只有几百个人的小村庄又多了两个人。为了有资格领取食物和布料的配给券，所有四肢健全的德国男性都要参与某种形式的战时生产。我在诺德豪森附近的一家大型钢铁制造工厂申请了一份机工的工作。跟它的规模相比，我原来在汉堡工作的那个工厂就好像是夫妻店。在它巨大的、震耳欲聋的车间里，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蚂蚁，钢制的庞然大物摇摇晃晃地从我的头上飞过，是一个起重机操作员在天花板下面一个可移动的小屋里精确地操纵着。虽然我是作为有证书的机工熟练工被招进来的，但显然，我被分到的都是些粗活——

磨掉切割后的毛刺，用叉车搬运货物就算是难一点的了。

柯恩斯坦的秘密

秋天到来的时候，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每天都有一队敞篷军车经过哈兹大街六号我的窗外。这些卡车装载的都是——一样奇怪的货物——头光秃秃、面容消瘦的男人，穿着条纹囚服，双颊凹陷，一双无表情的大眼睛，让他们的头看起来像骷髅头。他们像牲口一样站得满满的，几个戴钢头盔、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守卫坐在后挡板上，面冲着他们。十二辆这样的军车都是开往附近的柯恩斯坦山的。柯恩斯坦山顶上都是松树，在我还是个孩子时，卡尔舅舅和我去远足过许多次。对卡车上那些乘客来说，显然这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因为无论什么时候，这些卡车回来的时候都是空的。

舅舅跟我说，柯恩斯坦现在不对外开放了。它四周都被围了起来，有重兵把守。面冲着萨尔察的山体上有一个巨大的山洞，看上去仿佛是一条大隧道的入口。

我问卡尔舅舅，柯恩斯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把食指放到嘴边，小声说，无论发生了什么，都是政府的首要机密，跟我们没有关系。

“别到处打听柯恩斯坦的事。”他警告我，“那只会给你和我们所有人都惹上麻烦。最好就是跟这里的每个人一样——忘记你看到的一切，当柯恩斯坦根本不存在一样。”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忘不了。党卫军车队里“活死人”的景象总是缠绕着我，尤其是晚上卡车从我窗户外经过的时候。这些可怜的人究竟是谁？他们在大山里做什么？

直到战争结束，我——还有全世界——才知道柯恩斯坦黑暗又可

怕的秘密还有它的正式名字，多拉—米特尔鲍集中营。在一个只有恶魔才能想出来的恶魔计划中，这座山对纳粹主要有两个用处：一个是制造“神奇的武器”，V2火箭，它被认为可以带领德国从失败边缘走向胜利；另一个是歼灭成千上万的人，这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被认定是希特勒的敌人。

卡车上那些人毫无表情的脸上透露出绝望，而我用尽所有想象力也想不到他们一旦进入大山，是如何在受尽折磨、饥饿、噬骨的苦工之后——在几个月内——死于劳累、营养不良和疾病。

当时，我并不知道，在离我相对舒适的住处只有十五分钟步行距离的地方，无数的人被残忍地对待，干活干到死。我没想到，时不时从大山飘到萨尔察来的黑烟可能正是那个火葬场的。我也没想过从我门前开过的军车里，可能坐着某些重要人物，掌管着山里工厂的人的生死，包括党卫军的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军需司令阿尔伯特·斯皮尔和V型火箭的策划者沃纳·冯·布劳恩。讽刺而令人羞愧的是，多年后布劳恩作为美国太空项目的带头人声名大噪。

在好奇心和无聊的驱动下，一个星期天，我决定朝着柯恩斯坦方向散个步，看看追寻童年的足迹我能走到多远。回想起来，这不是什么好主意。萨尔察在哈兹大街上的最后一栋房子是村子的户外游泳池，现在已经关门了。我走过它，很快就碰到一面高高的铁丝网。铁丝网上有好几个标识，写着这个区域不对未授权者开放。从我站的地方，我能很清楚地看到一条大隧道的入口，除此之外，就看不到别的了。这里没有任何生命迹象，除了一个荷枪实弹的党卫军守卫，还有一只德国牧羊犬。他们正慢慢朝着我的方向走来。

我不想跟党卫军和他的狗面对面，更不想看他们，我直接转身，走回了萨尔察。过了几天，下班回家后，舅妈看到我，仿佛遇到了某种悬而未决的厄运。她一言不发地递给我一个来自萨尔察市长办公室的信封。信里要求我“去一趟，有急事，尽快。”我知道，那指的就

是明天。因此在第二天早上上班前，我去了市政厅，萨尔察“市中心”唯一的办公大楼。在排队等候的时候，好几个村民紧紧地盯着我，我确信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我是谁。一个秘书把我领进旁边的办公室，对我说，萨尔察的“市长”赫希会亲自见我。我压根儿就不认为，村里级别最高的纳粹分子亲自接待我是出于礼貌。我知道，那是因为“尊敬的市长先生”没有别的人可用，只能亲自出面。

坐在大办公桌后纳粹万字旗前的穿褐色军装的大块头，有点让我想起我以前的校长维希德先生。我把这看做是不好的预兆。市长对我的“希特勒万岁”礼不置可否，接着问我要我的证件。他仔细地检查了我的“战时通行证”，看到上面写的，我不被允许入伍，市长决定单刀直入。“我收到报告说，有人看见你在监视柯恩斯坦。对此，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起初，我什么也说不出来。监视秘密军事基地可是死罪。

“我从未监视过柯恩斯坦或者别的地方。”最后我还是跟市长说。

“那你他妈的究竟去那干什么？”赫希先生问。

我跟他说了我小时候跟舅舅去那里远足，我想去找找当年的感觉。我很明智地隐瞒了我对那些军车和“货物”的好奇心。

“一看到铁丝网，还有上面禁止进入的标识，”我向赫希先生保证说，“我就转身了。”

市长似乎对我的解释很满意，但警告我以后离那里远点，让我安分守己。

“我认识巴茨师傅和巴茨太太很多年了，”他对我说，“他们都是好人。所以我不想你给他们或是你自己惹麻烦。你明白吗？”

我跟市长说，我非常清楚。我们互相敬了“希特勒万岁”礼，他便让我走了。

卡尔舅舅和格里特舅妈知道了我去市长办公室是为什么事之后，

就没完没了地说我“蠢透了”。

“我告诉过你，忘了柯恩斯坦，别管那里有什么事。”卡尔舅舅严厉地斥责我，他骂得对。“我们很幸运，市长是我的老客人，我给他做了好多年的西装和军装。否则，我们现在都有大麻烦了。”

我跟卡尔舅舅保证，就像之前跟市长保证的那样，以后我会小心的。

回到汉堡

母亲和我逃离汉堡的时候，我们以为整座城市都被炸毁了，因为我们在逃亡的路上没有看到一栋完整的建筑。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碰到过几个汉堡来的难民，他们说，汉堡还有一些地方是幸免于难的。

知道了汉堡并没有像我们以前认为的那样完全变成废墟，我们开始想回去了。这种渴望越来越强烈，难以抑制。因为没过多久我们就发现了，我们并不适合小镇生活，不管它是多么的如诗如画。四周的大山，曾经被我们当成美景，现在却成了牢房，几乎要让我们窒息。我们都很想念汉堡周围平坦、畅通无阻的北德风光。无论卡尔舅舅和格里特舅妈多么努力地让我们觉得像是在自己家一样舒适，无论他们多么鼓励我们在这里扎根，我们还是越来越想家。最后，我们再也忍不了，决定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家去。

跟我们预料的一样，他们都激动得快跳了起来。卡尔舅舅说，我们太鲁莽太愚蠢了，在汉堡，我们随时可能会被炸弹炸死，而在萨尔察和诺德豪森，我们至少不会遭受敌人袭击。格里特舅妈则换了一个思路，说我们想走，是因为我们认为乡村生活配不上我们这些“城里人”。而特鲁德琴只能在每次我们说起这个话题时就哭哭啼啼的，想

让我们改变主意。不过在发现不管他们怎么说都改变不了我们的心意后，他们最后还是妥协了，预祝我们好运。几天后，在一个美丽的春日，他们抱了又抱、哭了又哭地送别了我们。分别时，他们还说，如果事情并不如我们所愿，或者汉堡又被空袭，就赶紧坐火车回来。还是那个小小的车站，但是比起快一年前半夜里我们疲惫不堪抵达时，这一次我们的心情好多了，看到熟悉的景物，听到熟悉的声音，我们的精神更加振奋。

火车交通基本恢复了正常，回汉堡只花了七个小时左右。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们才幸运地没有看到以前差点要了我们命的废墟。尽管炸弹已经把汉堡火车站的巨大天篷变成了一个无玻璃的钢骨架，但车站还是跟平常一样繁忙。看到这一切，我们觉得很欣慰。虽然没有明说，我们都明白彼此是多么深切地欢喜，回到世界上这座唯一能让我们有家的感觉的城市。

在一个专门为返程难民设立的信息台前，我们了解到，离我们以前住的地方最近的难民收容所在布鲁克勒大街上，以前是一所小学，我每天上学都会路过。坐了二十分钟到巴姆贝克的地铁，我们离收容所只有步行距离了。

一个友善的守门人检查了我们的证件，登记了我们的名字，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条干净的、有樟脑丸味儿的毯子，又简单介绍了这里的设施和规矩。食堂每天两顿热饭（午饭和晚饭），有厕所，地下室里有冷水可以“洗澡”。接着，他把我们领到了一间教室改造成的宿舍。屋子里放满了简易的木制上下铺。守门人眨了眨眼，解释说，这里没有储物柜，所以我们最好是别让贵重物品离开自己的视线。他还跟我母亲说，这里是男女共用的，女人要想洗澡时有点私人空间，就得一大早趁别人都没起床时洗。

考虑到私密性，母亲和我选了宿舍最里面角落的两个下铺，中间有一条窄窄的过道。每个铺位上都有一个硬垫子，材质不明的垫子表

面有很多洞，里面装的是刺人的稻草和刨花——跟我们以前睡的厚床垫，羽绒被和松软的枕头完全没法比。不过，即便是要在这种环境下度过一整个晚上，也抵消不了我们回到这座钟爱的城市的喜悦之情。

我们把行李箱放到床下，跟着新室友，也就是十几个老人，男女都有，一起在宿舍前面一张大桌子前吃完饭。晚饭是城里某个地方的应急厨房送来的，装在一个巨大的金属保温箱里。在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们以前都是巴姆贝克的住户，跟我们一样，在1943年7月的空袭中，除了自己这条命，失去了一切。同样，他们回来，也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在汉堡以外的地方生活。所有人都希望能够重新联系上家人和朋友，能够重建自己的生活。

收音机里播报晚间新闻时，所有人都沉默了。主持人播报了戈培尔博士一篇措辞严谨的报告，说德国军队在东线战场又一次“战略性撤退”。人们忍不住嘲讽地评论了几句。

“战略性撤退个鬼！”其中一个人冷笑着说，“我们的屁股要开花了，这就是事实。真希望他们别再骗人了——”他说了半截突然打住，因为守门人隔着大门指着鼻子提醒我们，再过半个小时，十点的时候，就要熄灯了。

“他看上去是个好人。”刚才说话的人在守门人关上门之后说，“不过谁也说不好这些纳粹。”

我什么也没说，虽然我完全同意他。

两天后，两个穿制服的纳粹工作人员来到收容所做常规检查。他们仔细地检查并记录了我们的证件，并指示我们，要么立即回到我们原来的工作岗位，要么，如果回不去的话，就向招募办公室报告，让他们重新给我们分派工作。每个人都提醒我们，要为德国赢得战争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们知道母亲原先工作的橡胶厂已经被炸毁了大半，现在只有一小组人在工作，不过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我们很幸运。工厂的人事经

理立即让我母亲在厨房干活，还给她在临时女工宿舍分了一个床位。因为工厂的生产已经停了，他说，机工的职位只有在哈尔堡的分厂才有。分厂没有被炸弹袭击，哈尔堡就在汉堡旁边，易北河的南边。他告诉我，如果我想好了去那里工作，我可以免费住在哈尔堡的男工宿舍。我没想太多，就立即同意了。第二天早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电车，找我的新老板报道，埃尔德曼师傅，哈尔堡厂加工车间的负责人。

双城生活

埃尔德曼先生和我，第一次见面时就互相看不顺眼。他皱皱巴巴的，一副愁容满面的样子，心里想什么都写在脸上了。他一边怀疑地看着我，一边简单地向我介绍了我以后的职责。他说大多都是些麻烦活儿。整个厂子大概有十几栋楼，数百台蒸汽机将硬橡胶压制成各种形状的产品。在战争之前，公司专业生产高品质的梳子、烟筒把和其他家具用品。不过，跟战时德国所有工厂一样，公司改为生产战时产品。我被告知，只有公司的高层人员，才知道每天流水线上高速生产的产品都是为了哪些军事目的服务的。

机工车间的主要职责之一是维护庞大的管道，这些管道是负责把蒸汽从锅炉运送到压力机上的。另外一个主要职责就是加工和替换已经磨损的机器配件。“你大部分时间都要在工厂的各个部门独立工作。”埃尔德曼师傅总结说，“不过我们得先说好了，不能磨洋工。”

我问他，为什么他会认为我跑这么老远来哈尔堡是来磨洋工的，他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你们这些汉堡人都觉得自己太他妈了不起，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他生气地说，“这么说吧，我的朋友：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我没兴趣听他再吹嘘他那灵敏的鼻子，也没反驳他，但我当时就

知道了，我们的关系肯定不会好到哪里去。

后来，几个从汉堡工厂调到哈尔堡厂的机工跟我说，埃尔德曼说什么都别往心里去。他们说，他跟哈尔堡这个小地方的很多人一样，对汉堡来的城里人有一种天生的怀疑和嫉妒。

虽然埃尔德曼这样对我，但我还是很喜欢这份新工作，尤其是它给予我的独立性和机动性。因为我是厂里少数几个有气焊（乙炔）和电焊（电弧）资质的机工之一，很快我就接到很多特殊的焊接任务。我迅速地赢得了机工同僚的尊重，就连埃尔德曼也很认可我。我跟同事们相处得很好，尤其是汉堡来的那些。我也和法国来的外国工人交上了朋友，因为我们同住一间宿舍。我跟其中一个巴黎小伙子尤其要好，他叫吉恩·海德格，二十出头。我打温莎领结的本领，还有我会说的四个字母的法语，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

有一天，厂院里一阵大骚动，一队军车卸下了货物——一百多个意大利战俘。他们都是在墨索里尼倒台、意军投降后被德国抓来的，被迫来德国的军工厂做苦工。这批新到的战俘全都一副惨象，面目狰狞，穿着破破烂、脏兮兮的军装，胡子拉碴，眼神空洞，面黄肌瘦。一有机会，他们就在垃圾桶里翻，指望能找到一点食物残渣，要么就跟我们伸出手，乞求我们施舍。我们还没问，他们就赶紧保证说，他们向来忠于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好；巴多格里奥，坏。”他们显然是在讨好他们的俘获者。大多数德国人对墨索里尼及其战力低下的意大利军队都不感冒，所以对他们这样的说辞并不在意。尽管如此，我们对这些新来的工人还是充满了同情，虽然算不上尊重。

几个星期后，意大利战俘们就发生了惊人的转变，吃得饱了，打扮整洁了，居然有了油光水亮的明星发型和花花公子的样子。最初奉承的态度也变成了趾高气昂，原先凌乱的胡子，要么就刮干净了，要么就被精心修剪成型。这一戏剧性的变化被厂里的女员工们看在眼里。我很快就观察到，厂里最漂亮的未婚女工们是怎么跟这些拉丁情

人们出双入对的。我对此十分羡慕。

除了意大利和法国工人，厂里还有苏联工人。苏联工人过着更加受限制的生活，住在隔离营里。因为他们被禁止与德国人或其他人有任何社交往来，所以我从不认识他们。

要不是我不得不住在哈尔堡，我的生活就还算可以忍受。那个时候的哈尔堡，还是一个丑陋的小镇，除了几个电影院和小区里的酒吧，没有什么娱乐设施。于是，我急切地盼望周六的到来。周六中午的哨声一响，意味着这一个月工作周结束了，我可以坐电车去汉堡看望我母亲。她的室友，一位好心的老太太，同意我每周末过去的时候可以住在她们宿舍里，周一一早再回哈尔堡。

一个星期六，工厂关门前五分钟，我正要冲出去赶去汉堡的车，埃尔德曼师傅把我叫到了他四面都是玻璃的小办公室里。透过这些玻璃，他可以看到整个车间的情况。他递给我一张工单，说一个蒸汽压力室的一根主蒸汽管有一道裂缝，需要维修。我小心翼翼地叠好那张纸，放进口袋里，跟他保证说，我下周一早上一回来就会处理这件事，然后准备离开他的办公室。

“还没完呢，我的朋友。”他拦住了我，然后说如果管道里有压缩蒸汽的话，那个裂缝就没法焊好，这个活必须要在蒸汽关了管道可以排空的时候做，也就是说这个星期天。“这个，”他坏笑着说，“就得那时候干。”

我问他，“为什么要我干？”我说我已经有别的安排了，改不了。他粗鲁地坚持说，大多数机工都有家庭，而我没有，所以这活儿自然应该我干，不管我愿不愿意。

我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怒气冲冲地走出了他的办公室。他在我身后咆哮着说，我要是不改变主意，就没好果子吃。我不可能错过周末看望母亲的机会，因为她跟我都同样盼望这种相聚，所以我不可能改变主意。除此之外，十八岁的我也不会让讨厌的埃尔德曼任意揉搓

我。我没有再多想，走出了工厂，踏上了回汉堡的路。

我没再想过埃尔德曼，直到星期一早上到车间的时候，我还在为自己没有被他吓住而感到骄傲。令我吃惊的是，他居然咧着嘴对我笑，而不是像平常那样阴着脸。我很快就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古怪了。

“我们一起走一走吧。”他邀请我，依旧是咧着嘴巴。几分钟后，我们走进一个车间，里面是一排一排的蒸汽管。通常这个车间里人们各忙各的，充斥着管道漏气的嘶嘶声，还有压力的砰砰声。现在这里却很安静，除了五十多个站在工作台前的男人和女人的聊天声。

“把你的手放在这里。”埃尔德曼指着附近的压力机说。我照做了，这才发现通常都是热得发烫的压力机表面现在像冰块一样冷。

“你有大麻烦了，我的朋友。”埃尔德曼坏笑着说，“这是你该受的惩罚。我警告过你，但你没听。你这叫从事破坏行动，不用我说，你也该知道他们会怎么处理破坏分子。”他欢快地跟我解释了一通，说我没在星期天修好蒸汽管，造成了大量宝贵工时的损失，这损失重大且不可挽回，延误了极度重要的战略物资的生产。

说完后，埃尔德曼告诉我，大老板想要跟我谈谈，然后把我领到了行政楼。他要求见工厂的总经理。想到要见平常根本见不到的、拥有至高权力的大老板，我刚才那些骄傲之情全都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彻头彻尾的恐惧。

我们走进总经理宽敞的镶木板的办公室时，总经理正坐在一张办公桌后。他头发全白，带着黑框眼镜。坐在他前面的是工厂的总工程师，埃尔德曼的上司。他们俩显然已经听埃尔德曼讲述了我的“怠工罪”，看见我时，表情都非常严肃。

“让你来干活，你不来，你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总经理先打破了沉默。“难道你不知道故意扰乱战时生产是故意破坏罪吗？”

我努力让自己听上去显得很诚恳，跟他说，我从没想过故意破坏，我违背埃尔德曼的唯一原因是，我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要

放弃我的星期天，我觉得这么做是对的，因为没有人提前告诉我星期天要干活。

等我说完，总经理激动地开始长篇大论，说在星期天工作几个小时，跟我们勇敢的战士们在前线每天所做的牺牲相比，是不值一提的。“你有什么权利质疑埃尔德曼师傅的命令？”他喊道。“你耽误了战士们急需的武器，把他们的生命置于危险之中。”

我在心里骂自己愚蠢，居然没有执行埃尔德曼的命令。现在，我完全同意他的预言：我有大麻烦了。就在恐惧攫住了我，让我真的想要呕吐的时候，总经理冷静了下来。“因为你母亲在我们这儿干了很久，表现很好，这一次，我决定不向盖世太保汇报这件事，免得让她伤心。”他对我说。“但是，”他接着说，嗓门又提高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遵守命令而不受到惩罚。所以接下来的五个礼拜，你每个星期天都要来上班——要不然！你明白了吗？”

我向他保证，我一定会遵守他的命令。他就让我走了。能够这样轻易逃脱，我真的松了一大口气。我从没怀疑过，要是我的“破坏行为”被汇报给盖世太保，我就彻底完蛋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于是默默地忍受了五个星期天的加班，还有埃尔德曼专门为我炮制的各种惩罚。一般来说，有证书的机工不用干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但埃尔德曼命令我做一项他所能找到的最卑贱的工作。“让我们看看你能把锅炉里面清理得多干净吧，我的朋友。”他冷笑着对我说，仿佛在笑我不敢拒绝。他指的是用来生成蒸汽的巨大钢罐。为了不让他得逞，我只能照做。从一根狭窄的管子里钻进去后，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用风铲在锅炉内壁上一层又一层厚厚的石灰岩上凿下一层又一层污垢，直到凿子的声音快把我耳朵震聋，厚厚的令人窒息的灰尘迫使我出去喘口气。没有任何面罩，也没有耳塞，就这样干了一天，我基本上是半聋的，咳了好几个小时。下一个周末，我还要再干同样的活。

尽管如此，我在锅炉内遭受的身体上的痛苦，根本比不上每次看到埃尔德曼那张狞笑的脸时我心里遭受的折磨。我要拼尽所有自制力，才能忍住不去跟他说，我是多么地鄙视他，甚至想把他打成一摊烂泥。我只能不断地提醒自己，埃尔德曼就是想惹我发狂，只要打一个电话，盖世太保就会来抓我，这样才能让我保持冷静。

一个星期六，又是快下班的时候，埃尔德曼又一次命令我焊接一条开裂的蒸汽管。这次他没跟我废话。可是，我正要开始修的时候，发现管道和天花板连接的地方有一层厚厚的胶状的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跟埃尔德曼汇报说，这东西可能会引起火灾。他打断了我。

“你就不能让你干吗你就干吗，闭上你的臭嘴？”他喊道。

为了不惹事，我闭上了我的“臭嘴”，转过身，开始干活。然而，当我焊枪上的一小点燃气火焰一碰着那根管道，噌的一下就着了火，很快就烧着了整个天花板。我确定这栋楼肯定会烧毁了，这一次真的会有盖世太保来审问我的“可疑行为”。幸运的是，有人拉响了消防警报，几分钟后，工厂的灭火队就赶过来。他们用高压水管简单地冲了几下，火就被熄灭了。

埃尔德曼一听说这件事，就立即用攻击来推卸责任。“这一次你真的做了！”他尖叫着说。“我让你焊管子，没让你把大楼点着。”幸好，刚才埃尔德曼让我闭上我的“臭嘴”时，正好有一个机工就站在几步远的地方。因此，当埃尔德曼跟我说，下个星期一我们又要去见“大老板”，让我因为第二次“破坏行为”而得到应有的惩罚时，我就做好了心理准备。“这样的话，”我冷静地说，“我会带着某个人一起去，他听见了我提醒你可能会有火灾风险时，你让我闭上我的嘴。”关于这件事，埃尔德曼再也没有说过什么。

但很快，我就发现我并没有走出困境。我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可能是因为青春期的漫不经心——也就是“愚蠢”——我养成了习惯，每天早晨，在男更衣室跟同事们打招呼时，我都会非常夸张欢快地敬

“希特勒万岁”礼。我傻乎乎地认为每个人都像我一样受够了纳粹，所以我故意让这个敬礼带点小聪明式的讽刺。不过，这就是我犯下大错的地方。一天，一个叫做卡尔·韦德迈尔的哈尔堡老机工把我叫到一边。传言说他以前是靠着牙齿的颜色才通过的雅利安测试。“有些人抱怨你。”他说，“有些哈尔堡人，看你们这些汉堡人怎么都不顺眼，对你每天早上敬礼的方式有意见。他们知道你并不认真，他们觉得这一点也不好笑。”

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玩过了头，并且感谢他提醒我。如果说从中我学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笑话跟他们有关的话，他们是没有幽默感的，如果你敢拿他们找乐，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痛下狠手。我不停地在心里祈祷，希望韦德迈尔的提醒没有来得太晚，我的愚蠢没有造成什么后果。我跟自己发誓，一定要管好我这张爱嚼瑟的大嘴巴。幸运的是，我的运气还可以。

接下来的两件意料之外的事，相当大程度地减轻了在哈尔堡生活和工作的痛苦。一是我母亲被调到哈尔堡工厂的厨房工作。另一件是她在汉堡找到了一个地方，我们终于又可以生活在同一屋檐下。那里以前是埃森大街上的一所公立小学，是汉堡埃尔贝区在1943年7月空袭中幸存的几栋楼之一。它已经被改造成一个收容所，专门给我们这样被炸的无家可归的人住。那里有一个管理经理，一个严厉寡言的女人。她给我母亲和我做了登记，把我们分配到学校另一端的一栋教学楼里，楼里的教室都改成了宿舍。她跟我们说，晚上九点前，丈夫们和妻子们——还有儿子和母亲——可以去各自的宿舍走动。虽然母亲和我每周有六天都要早上五点钟起床，坐至少一个小时的车去哈尔堡，而我通常要晚上七点才能回来，我们还是高兴得不得了。这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第一次这样开心。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们终于又团圆了。在那之前，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在我们分开的时候，对方在空袭中遇险。虽然现在看来很荒谬，但那个时候的我们，

只要能陪在对方身边就觉得很安全。

对母亲和我来说，生活依旧艰辛，但总归是有了一点正常的节奏。我们每天一大早就起床，走十分钟到登海德站坐车，在那里还能碰到同在橡胶厂工作的几个同事。因为母亲在厨房的工作，比我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要少几个小时，她会坐早一点的车回汉堡，然后在学校地下室的公共厨房里准备我们寒酸的晚餐。

战争期间，我们每天都忙着把所有精力放在活命之上，母亲和我都快忘了以前困扰我们的种族问题。不过，这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把我们打回了现实。那是在我们坐车去上班的路上。因为车上很难有空座，母亲和我习惯了如果我们幸运地有一个空座的话就轮流坐一会儿。

那个特别的早上，我半睡半醒地坐着，母亲站在我前面。一个衣着华丽、只有一条腿，拄着拐杖的士兵一把拽住我的衣领，把我拽倒在地。“起来，你这肮脏的外国猪，让给这个德国女人坐！”他一边指着母亲，一边撕心裂肺地喊道。“我们在前线奋战，可不是为了让你们这种人享福的。”

显然，这位好士兵完全误解了眼前的情形。他发现人们，尤其是德国工人，对战争造成的一切越来越不满，包括战争英雄。“你为什么不闭嘴，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的一个同事这样回敬他。我跟这个同事也只是认识而已。

这个士兵显然非常吃惊，挑衅我的同事要单挑。我同事的话残忍却真实，“你打得过谁？你可能还没意识到，但你打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士兵。现在，别再烦我们的朋友了，要不然我就把你扔下车去。”

士兵看着车上十几双充满敌意的眼睛，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惹错了人，他不得不放开我的衣领。他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挪到了车门处，下一站停车时，就安静地一瘸一拐地下了车。我看着他沮丧地

靠在拐杖上，电车开走了，我试着——但没有成功——为他应得的耻辱而高兴。

母亲和我对同事展现出来的团结精神感动不已。后来我感谢他为我解围，他让我别放在心上。“现在是时候让这些所谓的战争英雄知道，他们风光的日子已经过去，他们的奖章和掉的胳膊腿儿对别人来说再也不重要了。”

他这些话，说得大伙儿都能听见，让我意识到战局已经扭转到什么程度了。然而，几天后的一件事又给了我迎头一击，让我知道至少现在，罪恶的纳粹还是当道。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埃尔德曼派我去一栋厂房里维修一个坏掉的金属窗框。从一楼的窗户，我看到连接汉堡的大街。突然，我注意到一队女人，被戴着钢头盔、扛着来复枪的党卫军押着，朝我的方向走来。她们走近的时候，我看清楚了，她们大多都是年轻的女孩，有些可能才十几岁，依照纳粹法律，她们都戴着黄色六角星（犹太人标记）。守卫她们的人警觉地盯着她们和路上的行人，她们则拿着重重的扫帚和铲子清理街道。为了惩罚她们，大多数人只穿着薄薄的外套，有些人连手套和帽子都没戴，而那些守卫则穿得厚厚的暖暖的。虽然如此悲惨，却没有人反抗。相反，她们沉默地干着活，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就好像是活死人。

几分钟后，她们就消失在街角，我也回过神来干我的活。可是，那一整天，还有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都忘不掉这群女人，想着她们承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和恐惧，才会变成这样毫无表情的僵尸，她们的守卫又有多少坏心思等着她们，会不会有同样的命运在等着我。

过了几天，我偶然碰到以前在汉堡时的朋友和邻居，听到了可怕的消息。大轰炸那天晚上，与我同龄的女孩吉尔达·贝尔和她的父母跟我们一起待在防空洞。她现在住在易北河另一边的芬克维尔德。她告诉我，那天晚上过后，她和她的家人跟其他受害者在第二天早上都被转移出了城。杰克·斯培德斯，我们从苏联前线回来的朋友，换

上了便服，加入了难民的队伍。她回忆说，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小村庄里，有住的地方和食物，后来还有了工作。她说，杰克过着舒服的田园生活，平常做一点农活，大多数时间都是跟伊尔斯·科曼打得火热。伊尔斯是我们的老邻居，一头黑发，非常漂亮。可能是有人打了小报告，村里一个穿制服的纳粹准备审问杰克。杰克收到风声，赶紧逃跑了，连个地址也没留下。吉尔达说，很快，柏林的大德意志装甲兵小分队就带着猎犬来，开始在附近搜查。几个小时后，吉尔达说，他们就找到了杰克，把他拖走了。她说因为他之前把她家登记成他的亲戚，杰克被带走后没多久，他们就被通知，杰克·斯培德斯在被判擅离职守罪后被处死了。虽然杰克和我算不上最好的朋友，但他的死讯还是深深地击痛了我。

全面开战

我在埃森大街学校的宿舍房间里稀稀拉拉放了十几张钢制床铺和许多储物柜。屋子中央有一张桌子，围着桌子专心听收音机的是五个老人，典型的汉堡蓝领。因为年纪太大，他们逃过了征兵；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在周边做点苦力活。

一开始，他们观察了我一阵，很快就接受了我，把我当成他们的一员。他们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好玩最有意思的了。从早上起床到晚上十点熄灯，他们一直斗嘴斗个不停。尽管如此，在鄙视希特勒和纳粹帝国方面，他们倒是出奇地团结。他们不顾自己的安危，从不掩饰这种不屑。他们最爱讽刺的便是军事指挥部通过电台播报的战争进展。他们公然反对播报员所说的一切，愉快地预言说，希特勒及其帝国很快就要在盟军面前一败涂地。

这些话在我的耳朵里就好像音乐一样动听，但是，我还记得赖格

鲁伯——我学徒时期共事过的奸诈熟练工，给我的教训。我想自己还是别掺和到他们的讨论中去。我还时刻谨记，绝不在他们的讨论中偏帮谁。

1944年7月20日，我们宿舍里的收音机播报了战时最耸人听闻的消息——几个德国军官试图用炸弹在军事指挥部暗杀希特勒。奇迹般地，元首居然逃脱了，只受了轻伤。

我的室友们抑制不住自己的失望之情。他们骂骂咧咧的，有些人干脆一把倒在自己的铺位上，对“元首全身而退”表示不屑与绝望。随着越来越多的细节和主要策划者克劳斯·冯·斯塔芬伯格上校的身份被公布，这种情绪在整个汉堡地区的许多工人中得到了回响，尽管受到了相当多的限制。

我的室友们安慰自己说，希望马上就会有下次暗杀，希望下次暗杀会成功。我可没那么确定。在我看来，纳粹对策划者及其家人迅速而极其残忍的报复，是想要震慑所有人。

暗杀失败最快的影响就是，元首指挥部下了命令，国防军要行直臂希特勒万岁礼。以前只有党卫军才行这个礼。这个命令显然是对军队的警告，因为那些谋划者就是来自军队，这是在警告他们，谁才是真正的大佬。

虽然前线和后方的战斗英雄们都相继沉沦，但希特勒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头发稀薄、脑袋硕大、黑眼睛又大又锐利的约瑟夫·戈培尔博士，帝国的宣传部长，希特勒一贯的媒体顾问。暗杀失败的几个星期之后，戈培尔博士被赋予了动员全国全面开战的职责。我的室友们和我怀疑地听着收音机里，他动员德国人为了取得“最终胜利”而贡献自己最后一丝力量。现在，他又暗示，正在部署当中的秘密武器绝对可以扭转德国在战场上的局势。因为他不负责任的吹嘘，对事实的扭曲，还有对胜利的誓约，他的名字已经变成了骗子的代名词。讽刺的是，他是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讲述荒诞故事的人、传奇

男爵冯·闵希豪森^①的崇拜者，这似乎很合适，而且并没有逃过大众的追捧，以至于他订购了一部关于芒奇豪森的史诗电影，它仍然被视为电影杰作。大多数人把“全面开战”运动看成纳粹的垂死挣扎，为了把他们的寿命延长几个月，不惜危害与牺牲人民。然而，这些断定“全面开战”只是一句空泛宣传口号的人，很快就被证明大错特错。

戈培尔随后就强制推出了每周六十小时工作时长、取消所有节假日以及关停所有学校的措施。除此之外，所谓的“后方指挥所的猪”和“浑水摸鱼者”，也就是为了不上前线而选择在非战斗单位服役的士兵们，也都被派上了前线，不管身体状况如何。

作为“全面开战”的一部分，德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宣布成立“人民风暴”，完全由各种拒绝者组成的民兵——以前被认为是太老、太衰弱，或者像我一样，被认为是不适合参军的人。所有年纪在十六岁到六十五岁之间的男人都被命令去“人民风暴”报到，不管之前的参军状况如何。

为了遵守这条命令，在一个美好的秋日，星期天早晨，我来到附近“人民风暴”的征兵点。我很久之前就摒弃了参军梦想，想着征募者看我一眼就会打发我回家。不过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没有对我说非雅利安人太低级，配不上为德国人去死的荣耀。相反，一个下士递给我一支破旧的步枪，命令我加入一群穿着破烂便服、扛着同样老式步枪的老人。当值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都是衣冠楚楚、老练的战斗老兵。有些人还戴着黑眼罩或者吊着胳膊。负责的高级军官，戴着骑士勋章，用左手敬礼，因为没了右手。他先是欢迎我们来到“人民风暴”，接着说，为了迎接最后的胜利，我们有义务和荣耀

① 闵希豪森男爵是德国作家鲁道夫·埃里希·拉斯伯创造的一个虚构人物，是著名的“吹牛大王”。

去抗敌，如果必要的话，要献上自己的生命，因为我们的祖国，无论是在后方还是在前线，都迫切需要我们。然后他又说，现在只是入伍培训，接下来的星期天，我们将正式宣誓。

让我失望的是，没有一个军官注意到我的非洲长相，以前正是它让我参不了军。相反，我被命令跟所有人站在一起，听人介绍要如何保护我的祖国，对抗不请自来的、从四面八方逼近德国的侵略者。放眼望去，我这些颤颤巍巍的战友，要么气喘吁吁地咒骂，要么就嘲笑纳粹想把自己变成战士。我突然意识到一个讽刺的事实，虽然肤色如此，我却是所有人里面身体最适合当兵的。

大约一个小时的敷衍了事、不合拍的密集队形训练之后，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骨干都分到一个手持手榴弹发射器，我们被告知，它能够击毁谢尔曼或斯大林坦克。我们所要做的，一个指导员解释说，就只是等着，直到有坦克靠近，然后一碰引线，嗖——坦克和坦克上的人就全见鬼去了。

我想起两年前，我跟那个德国军官说我想参军时，他说的那些话。因为种族歧视，他曾经夸口说，“德国绝不会艰难到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能赢得战争。”如果我还需要什么更加确凿的证据才明白，德国已经节节败退，要输掉这场战争，我只需要照照镜子就好了。纳粹德国已经明显、无可争议地到了急需“我这样的人”的程度，不是为了赢得战争，而仅仅是为了在被盟军粉碎之前给自己多争取几天时间而已。我知道，那不过是早晚的事。

又听了一番训话以后，我们被解散了，说是下一个星期天早上再回来集训。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了所有我应该知道的，再来也只是浪费我宝贵的时间。因为没人登记过我的名字，也没记录我来过，我猜测如果下个礼拜我不来，也没人会特别想念我。有那么一瞬间，我担心过可能会被拖到军事法庭前接受审问，但年轻人特有的虚张声势很快就驱散了这点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对自己说。幸运的

是，我的运气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弄错了的身份

1944年秋天，哈尔堡还没有沦落到汉堡那样，但越来越多的哈尔堡人都害怕，哈尔堡的好日子也快到头了，厄运也即将到来。德国大多数工业城市都被毁，我每天都更难相信，哈尔堡能幸免于难。不久后发生的事情证实了我的怀疑。

一个明媚的下午，我正在替换一节泄漏的蒸汽管，空袭警报打断了我的工作。警报将我和工厂的其他人赶到了地下的防空洞。每天工作十个小时的工人们正好借机休息一会儿，在洞里放松地聊天，直到空袭对讲系统里一个声音宣布，一支美式重型轰炸机队正奔着哈尔堡—威廉堡的方向飞来。很快，工人们就不说话了，紧张的沉默蔓延在防空洞里。我心里想着，幸好母亲在汉堡是安全的，因为她跟厨房的员工在午饭过后打扫好厨房和餐厅就回汉堡了。

突然，几百架轰炸机的轰鸣声，第一批炸弹的哀鸣声变得清晰可辨。接下来是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炸，紧接着是剧烈的地震般的震颤。对我来说，这景象太熟悉了。不知为何，我出奇地镇静，好像确定我不会受伤似的。而对我的大多数同事来说，这次大规模日间空袭就是一次火的洗礼。

我轻蔑地看着工厂的高管们，他们吓得瑟瑟发抖，都想要隐藏自己心中的恐惧。我想，几年前，希特勒这些傲慢的“大人物们”到底经历过什么呢？埃尔德曼师傅，一贯是麻木冷淡、说话带刺的，这时候正可怜地缩在角落里，浑身抑制不住地颤抖。同样的，工厂的经理，傲慢的、满头白发的纳粹支持者，不久前还威胁我，如果我不乖乖听话，就要向盖世太保举报我，这会儿一听见炸弹响，就发出痛苦

的呻吟。

在吓得发抖的工厂大人物中，还有工厂的门卫，他的真名叫茨瓦特之类的，但所有人都在背后叫他“塞布鲁斯”，也就是神话中给冥王哈迪斯看门的三头犬。因为职位和文化程度的制约，茨瓦特很老实。但他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整洁的黑色西装上，领口永远别着一枚党徽。他从来笑笑，也不跟任何员工来往，但只要有员工哪怕迟到一秒，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有一次，我迟到了，他命令我走进他的小岗亭，教训了我一番，说我不按时上班，是玩忽职守，威胁说要去人事部告状，让我再也别迟到了。

看到这些折磨我的人因恐惧而颤抖，我的恐惧竟然得到了缓解。有那么一刻，我甚至变态地希望，一颗炸弹能击中上面的工厂，让它彻底瘫痪，加速战争的结束。

我没有失望。几分钟后，一声巨响还有一阵剧烈地震动，让防空洞的人们都从座位上弹了起来，跌坐在地。我知道，我的愿望成真了。爆炸切断了电源，防空洞彻底陷入了黑暗。轰炸停止后，震动也停了下来，有人设法打开了出口的门，人们虽然吓坏了却没有受伤，纷纷爬上通往工厂场院的楼梯。看到眼前的一切，我几乎抑制不住自己的欢喜。这栋大楼里面，以前都是讨厌的机器，现在变成了一个熊熊燃烧的大火山。我记得，在这个火山下面，有个储物柜，放着我的一双鞋、一件衬衫、一件夹克，还有一条裤子。然而失去这些东西，并没有影响到我对美国空军大轰炸的喜悦之情。

最重要的车间被炸毁了，大多数员工又都严重受惊，管理层宣布所有人都可以回家，第二天再来上班。对我来说，回家可就费劲了。车间炸毁了，旁边的电车轨道也炸毁了，这可是个大问题——我要怎么才能回汉堡？我立刻就决定碰碰运气，走路去哈尔堡火车站，看是否有去汉堡的火车。

空袭过后的哈尔堡满目疮痍，一片寂静。我被轰炸过后的浓烟

呛得直咳，耳朵也还是聋的。我跌跌撞撞地爬过灰烬，经过燃烧的建筑、被连根拔起的树木还有扭曲的列车轨道。地上到处都是炸弹炸下来的电线，弯弯曲曲的像是愤怒的蛇，随时等着释放它们的电压，我小心翼翼地避开它们。我拼命地不去看那些被炸得残缺不全、烧焦的尸体。就在短短几个小时前，他们还是跟我一样活生生的会呼吸的人。一声尖叫划破寂静，打断了我对逝去的生命的忧思。

“那儿有一个！”一个女人尖叫着。她一边指着我一直大喊。“那儿有一个凶手！”她接着说。“杀了那只美国猪！让他尝尝被活活烧死的滋味！”

在这个女人的尖叫下，人们从各个方向围过来一探究竟。才几分钟，我身边就全是人，他们愤怒地骂骂咧咧，对我不停地指指点点。

一开始，我完全懵了。后来，我低头看到挂在脖子上的焊接护目镜，还有沾满油污的蓝色外套，而且——关键的是——我棕色皮肤的双手，我突然明白了。他们错把我当成了美国黑人飞行员，被打下来后从飞机里跳下来的。

我很想笑，想跟他们说他们是多么混蛋。不过，我好受多了，因为我意识到，我现在的处境非常可笑，如果这是个笑话，也绝对是针对我的笑话。在这样一片废墟之中，人们没有心情听我解释，也没心思思考，看到我这副样子，就急忙忙得出结论。

那个女人不停地喊，嚷着要把我扔进这些燃烧的大楼中“干掉我”，人群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我察觉到，现在的局面已经到了，只要我稍微一反抗，他们就会一触即发地收拾我的程度。看着他们因憎恨而扭曲的脸，我心中更加无助。我明白，对他们来说，我就是个方便的替罪羊，可以让他们释放压抑已久、无力的愤怒。我之所以还没死在自己的同胞手里，只是因为根深蒂固的服从意识。至少在此时此刻，他们还是不情愿采取行动，因为没有接到有权威的领头人的命令。而这份不情愿还能持续多久，我不敢猜想。

就在我极度窘迫的时候，一个意料之外的人救了我。就在我四周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激动的时候，突然，一个警官拨开了人群。

“安静，所有人都站到街那边去！”他喊道。他右手一挥，吹响了他的大哨子。出于对制服的尊重，人们立即照做了。我松了一口气，心里琢磨着这个警官到底会站在哪一边。在仔细检查了我的身份证——一张德国人要随时携带的卡片——发现一切正常后，他放下了警官的架子，看着我的眼神居然像父亲一般慈祥。“那么，你怎么了？”他问。我跟他说了工厂里发生的一切，他很快就相信了，虽然我的肤色是黑的，但我纯正的汉堡口音说明我是土生土长的汉堡人。

“他们就是一帮歇斯底里的傻瓜。”警官冲街对面的人点了点头说。他对我没什么意见。

“现在，我们看看能不能让你回家。”警官拦下一辆已经挤满了人的去往汉堡的公交车。

“你有车费吗？”警官问。

我跟他说我那天带着的零钱都被锁在储物柜里，跟着工厂一起被炸掉了，警官从自己的兜里掏出了零钱给我。

“我想让你确保这位年轻人能够安全地回到汉堡。我要你负起这个责任。”警官对公交司机说。

“好嘞，警官先生！”公交司机回答，“上来吧，年轻的朋友。”

上车前，我谢过了我的救星，警官则希望我“脖子和腿都断了”——德国谚语，意思是“祝你好运”。公交开动后，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心里十分清楚，那些人充满憎恨的目光肯定会跟着我，直到看不见我。

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我才真正意识到，警官过来帮助我时，我处在怎样的危险当中。虽然盟军在战犯的审判中并没有提到，但有无数份确凿的报告表明，德国平民和德国军事人员，尤其是党卫军，对美国黑人士兵，包括被迫在德国或德国占领的领土上逃生的飞行

员，犯下了无数可怕的暴行。有些目击者努力想将罪犯绳之以法，却失败了，部分是因为辨认和定位罪犯几乎不可能，部分是因为官方的冷漠。

吉奥达诺一家

1945年1月初，一个晚上，在市中心看完一场电影后，我在弗里德希斯伯格站下了火车，往母亲和我住了一年多的学校走去。我走在横穿埃尔贝克托公园的小路上。这个公园又大又黑又荒凉。突然，我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虽然我无意卷入争端，但还是做好了心理准备。实际上，我很盼望有个机会能展示一下我的拳击技巧。我回过头，眯起眼，在朦胧的月光下，我看清那是一个男人的身影。

我放慢脚步，等着那个人追上来。他走到我身边时，我认出这是一个跟我差不多年纪的年轻人，身材壮实，戴着细框眼镜。我立即就发现，我在柯尼希餐厅的摇摆男孩中见过他许多次。他也认出了我。

“我认识你。”他说，“你以前也常去柯尼希餐厅。我叫埃贡·吉奥达诺。”

“我记得我也见过你。”我回答。握手的时候，我介绍了自己。

“想抽一根烟吗？”埃贡问。

“不了，谢谢，我不抽烟。”

埃贡点燃一根烟，我们又聊了起来，怀旧地说起1943年大轰炸之前我们在街区度过的好时光。不可避免地，我们又谈起了战争。

“用不了多久了，这些该死的纳粹猪马上就要完蛋了。”埃贡渴望地说。

我被他声音里的憎恨吓了一跳，却什么也没说。尽管我心里也有着同样的憎恨，但过往的经历早已教会我，在跟没有特别理由信赖的

人说话时，要把自己的思想和对前途的失望都放在心里。注意到我的沉默，埃贡笑了起来。

“你不用担心我。”他安慰我说，“我想你知道我是个犹太人。”

一听到“犹太人”这个词，我退缩了。虽然我对犹太人万分同情，但也觉得，以我自己目前的处境，被看见跟一个犹太人秘密私会，无异于自寻死路。

“不，我不知道你是犹太人。”我只能说，“为什么你觉得我知道？”

“我觉得柯尼希餐厅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说。

“那你为什么不戴六角星？”我怀疑地问。

“实际上，我只有一半的犹太血统，不用跟纯犹太血统一样戴六角星。”埃贡解释说，“我母亲是纯种犹太人，父亲是德国出生的意大利人。”

即便只有一半的犹太血统，我想，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好处。万一哪个盖世太保巡逻员拦住了我们呢？他们可不会相信我们只是偶然碰见的。我都能想到报纸上的新闻头条：犹太人和黑鬼深夜密会叛国被处死刑。

埃贡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不适，继续说了下去。“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不过我有可靠的来源说，我们所有非雅利安人，包括你在内，马上要被赶尽杀绝了。”他说，“纳粹知道他们很快就要完蛋了，输了战争，他们就完了。不过，他们不肯独自走向坟墓，要拉着我们陪葬。”

埃贡接着告诉我，全国上下，只要是还在德国军队控制下的地方，都有盖世太保的特别小分队不遗余力地搜捕遗漏的非雅利安人。他说，他的父母和两个哥哥都已经保持低调很长一段时间了，不过如果事态继续发展，他们就打算蛰伏起来，等待盟军到来。“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他提议，“我们有一些信得过的德国朋

友，可以把我们藏起来，给我们提供食物，直到事情过去。别天真地以为，到目前为止，盖世太保还没来找你，你就会没事的。想想吧！知道自己蹦哒不了多久了，纳粹会由着你和我享受生活和安宁，而自己要么去坐牢，要么上绞刑架吗？”

我目瞪口呆。埃贡说得有道理。太久没有跟其他非雅利安人接触，我居然生出了这种错误的安全感。埃贡让我明白了，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而这艘船随时都会沉。

虽然我对即将到来的危险有了警觉，但我突然感觉很好，几乎是欣喜。从记事起，我就一直独自面对纳粹的威胁。生活在一个公然要摧毁我和我的族类的国度，除了我母亲，我从没有真正的盟友可以分享我内心深处的恐惧。现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我有了一个真正的兄弟，一个亲身经历了被这个国家的最高权威当成敌人的恐惧的人，一个像我一样遭遇过被摧毁的风险的人。突然之间，我对埃贡有了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而几分钟之前他对我来说还几乎是个陌生人。

我们就快要走到公园的尽头，马上就要走到一片废墟前——一排又一排被烧毁的公寓楼，它们的空壳子在天空中留下了幽灵般的黑色廓影。我们走在街道中央的碎石堆之间，行人道上的碎石都被清理了。等我们走到学校——方圆几英里内唯一幸存的建筑物，我打算跟他告别回宿舍去。可是埃贡却还有别的计划。

“你得跟我走，见见我的家人。”他提议说，“我们住在自己修好的一个地下室里，离这里不远。如果你能去见见他们，他们会非常开心的。”

不知为何，我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拒绝这个新找到的同类，只能同意前往。

我们在废墟中又走了十分钟左右，路过巴姆贝克的火车站，来到一条小巷，旁边一条仅可一人通过的小路已经被清理干净。没走多远，埃贡就在一处废墟前停下，这处废墟跟别处看起来没什么不

同。我们站定了脚步，听了一会儿，确定没有人跟着我们，小心翼翼地敲了敲一扇地下室的窗户，显然是事先定好的暗号。慢慢地，里面的一张毯子被挪到一旁，一张脸露了出来。窗户旁边的门立即打开，埃贡把我领进一个黑漆漆、阴冷的房间，里面似乎都是人，虽然我看不清。门在我们身后被关上后，有人划着了一根火柴，点亮了一盏煤油灯。在它昏暗的光线下，我突然看清好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正盯着我。

“这是米奇。”埃贡介绍了我，用的是我在摇摆男孩时期给自己选的昵称。“我敢肯定你们都在巴姆贝克见过他，不止一次。”接着，他指着一个头发灰白的英俊中年男子和一个面黄肌瘦、顶着一双大黑眼圈的女人说，“这是我的父母，阿尔弗恩斯·吉奥达诺和莉莉·吉奥达诺，”他们一个是钢琴/手风琴演奏家，一个是钢琴老师。两个年轻男孩，一个大约十七岁，另一个二十二岁，他说那是他的兄弟罗克和拉尔夫。我认出拉尔夫也曾是柯尼希餐厅的常客，他对我说，他第一次看到我，还是在我们小时候，那时候我们在街上“打仗”。他回忆说，那时候每当我们对阵，就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让我们转身走开，而不是互相打斗。

一做完介绍，吉奥达诺一家全都靠了过来，拥抱我，跟我握手，好像我是他们失散已久的兄弟。我很清楚，他们肯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客人了。他们对我左右端详，不停地称赞我，夸得我脸都红了。他们直白地称赞我的头发、我的牙齿，还有我的肤色，都说非洲人才是真正的高级人种。他们用一连串的问题轰炸我，大多都是纳粹是如何对待我的，我有什么计划，如果有的话，能够让自己活下去，我母亲又是如何适应的，我对战争进程是怎么看的。这时候，他们邀请我到地下室后面的一个小房间收听最新消息。看到拉尔夫用一张厚厚的毯子蒙着头摆弄一个收音机，我立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消息。一阵吱吱呀呀的噪音过后，我听到了BBC德语播报员熟

悉的声音。在拉尔夫的邀请下，我也钻到毯子下面。听到播报员说苏联军队释放了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近两千名囚犯，我们抑制不住欣喜之情。有些苏军，据播报员说，离柏林就只有几英里了。听完节目后，拉尔夫和我跟大家分享了这个好消息，他们的心情却很复杂。

越是到了战争尾声，吉奥达诺推论说，纳粹就越疯狂，我们的处境就越危险。他说，他们家已经把跟外界的联系减到最少了，以免招来不必要的关注。“你最好是赶紧躲起来，趁现在还不太晚。”他提醒我。他又说，如果我和母亲加入他们的话，他们会很高兴的。我谢过了他，对他说我会考虑的。

等我最终决定，我是时候回家睡一会儿了，吉奥达诺让我保持联系，早日再回来看看他们。他们热情地送别我，我穿过漆黑的废墟，满脑子都是各种想法和情绪，我什么都注意不到，直到走回了家。

无处藏身

哈尔堡工厂在空袭中被炸毁一部分后，工厂就关停了。我被指示去劳工局报到，然后会立即被分到其他急需的地方工作。作为不怎么重要的工人，母亲被允许留在家里，直到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在现行的纳粹应急情况下，未经官方特别允许，工人禁止辞职或换工作。

劳工局要求我去哈尔堡市中心一家小汽车修理厂报到。因为汽油日益严重的短缺，政府的卡车和轿车都要转换成燃烧木材的碳氢化合物气体动力汽车。它需要把汽车的汽化器去掉，在汽车的尾部安装上庞大的木材燃烧器——六英尺高的大肚子燃炉，然后焊上从燃烧器到引擎的气管。结果就是，把木块扔进燃炉，汽车就有了动力。

这个修理厂的头头是一个干瘦的男人。他几乎从不离开他那个小小的办公室。他手下有八个人，大多数都是意大利的战俘，两个不

知道怎么逃过了国防军征兵的德国汽车机工学徒工。意大利人知道战争就快要结束了，他们马上就可以回到家乡，于是天天在车间里哼唱《我的太阳》，还有各种各样的咏叹调，不怎么正经干活了。我跟这些阳光意大利之子的关系很好。其中一个英俊的西西里小伙子，头发乌黑发亮，肤色比我还深，在老板的指派下，成了我的师傅。

尼诺不仅教我工作，一天下来，他拓展了我的俄语、波兰语和法语四个字母的词汇，还教了我许多意大利词汇。这里的工作对我来说并不特别难，比起原来那份工作，我更喜欢这份新工作。它意气相投、放松的气氛比纽曼师傅暴脾气的凌虐要好得多。

在新厂工作的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头顶似乎有飞机飞过。对空中任何动静都极度敏感的我们，赶紧抬头看，却没看到飞机。相反，我们看到一大团五彩纸屑一样的东西正在往地面降落。它越来越近，越来越大，原来是成千上万张宣传单飘向我们。显然，一架敌机已经深入到哈尔堡的高空，却完全没有触发平常的警报。

众所周知，德国市民阅读和传播敌方宣传单被认为是重罪。不过，这个时候，我们都把警觉抛之脑后，几个意大利人和我冲出车间，捡起一些落在街上的传单。传单正反两面都有字。我瞥了一眼，只看到粗体的标题是“战争失败了”。

我等不及想知道具体内容，可是我刚把传单塞进口袋，就听到了一个路口开外的男人大声警告我们别碰这些传单。我转过身，看到一个身穿褐色制服的人朝我们跑来。

恐惧突然攫住了我，我吓得要死。我知道，如果纳粹抓住我身上有传单，我就死定了。我简直是亲手递上了绳子，好让纳粹吊死我。为什么我总要让自己陷入这种有丧命危险的境地呢？不过，现在自责或者后悔都为时已晚。我知道我得赶紧采取行动，要不然就只有死路一条。我飞快地跑进车间，冲进洗手间，把自己锁在一个隔间内。来不及读那张传单，我把它撕成碎片，然后扔进马桶冲走。最后一片传

单消失时，我听见纳粹在车间愤怒地咆哮。他对着我们老板大喊，说他看见至少两个“吃意大利面的人”捡了传单，坚持要在厂里搜查。

在随后的骚乱中，我溜出洗手间，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地混在其他人的中间。在纳粹的命令下，我们的老板让我们站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上前掏空自己的口袋。我非常担心尼诺，我看见他捡了一张传单，或许还没来得及处理掉。纳粹命令他把口袋里的东西全都掏出来，尼诺故意拖延时间，用蹩脚的德语说“我听不懂”，这是战俘们不想合作时的标准回答。

“我会让你明白的！”狂怒的纳粹对他咆哮道。可是尼诺继续装傻，让纳粹本来就少的耐心都消耗殆尽。这时候，我们的老板出来了。他对尼诺说，不合作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最后，尼诺照做了。他把每个口袋都翻出来，里面都是空的，他脸上坏坏的笑容越来越大。尼诺说他还可以脱掉裤子，纳粹让他闭嘴，然后放过了他。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确信尼诺捡了一张传单，却不知道他是怎么骗过那个纳粹的。轮到搜查我的时候，纳粹狠狠地盯着我，坚持说他非常确定我就是其中一个他看到捡了传单的“意大利人”。我知道自己“没问题”，所以壮起了胆子，看到尼诺都那么勇敢了，我更是直视纳粹的眼睛，表明他在两个问题上都错了。“我不是意大利人，而是德国人。”我用最流利的德语说，“而且我根本没碰过什么传单。”说完，我就把自己的口袋全都拽出来，证明自己说的都是真的。

纳粹怀疑地看着我，却没有再追问。离开时，他带着明显的沮丧，告诉我们的老板，盯住我们这些“满嘴谎话、叛国的意大利人”。

那天傍晚，纳粹离开很久之后，我在洗手间里碰到了尼诺。“你看得懂德语吗？”他用蹩脚的德语问。

“我当然看得懂德语。”我回答。

“那你读给我听听。”说完，他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眼熟的纸。我

立即就认出那就是差点给我们惹了大麻烦的传单。

“刚才纳粹搜查你的时候，你把它藏在哪儿了？”我问。尼诺指着他的裤裆。

“就在这儿。”他笑了。

我听了不知道该笑他还是该骂他。“万一纳粹真的让你脱掉裤子呢，你要怎么办？”我问。

“可他并没有。”尼诺笑着回答。

再三确认周围没人，我给尼诺读了这张传单。事实上，它说的是，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盟军很快就会胜利。它告诉德国人，抵抗是无用的，只会延长自己的苦痛，还安慰他们说，占领德国的驻军没有什么可怕的。

我不确定尼诺是否懂得了这张传单的精妙之处，但他明显很高兴。“墨索里尼完了。”他开心地说，“很快希特勒和戈培尔也完了，很快尼诺就能回意大利的家了。”

我把传单撕成小碎片，扔进马桶冲进“海洋”，结束了我们这次秘密会议。

几天后，午间休息后不久，熟悉的警报声打断了我们在车间的工作。作为预防措施，老板指示一个学徒工把公司的卡车开出哈尔堡，他本人则开自己的轿车。我们工人可以坐卡车走，也可以去附近的公共防空洞。想起哈尔堡的上一次空袭，我们选择坐卡车走。

我们刚走到哈尔堡的郊区时就听见头顶刺耳的轰鸣声，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美军B-17轰炸机。几秒钟之后，炸弹就落在了我们身边。卡车一停下，我们就跳下车，趴在震动不已的地上。第一拨飞机飞过去之后，我才敢抬起头，四处张望。我看到人们急匆匆地走在街上。

“下一个公共防空洞在哪儿？”我大喊。

人们看着我们，懒得回答，继续赶路。跟着他们走了几个街区，我们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公共防空洞标记。赶到防空洞入口

时，我们听到第二拨飞机飞了过来。我们暗自庆幸时间刚刚好，总算到了相对安全的地方，拔腿就要往洞里跑，这时候，防空洞的守卫拦住了我们。“你们这是要去哪儿？”他惺惺作态地说，“里面没有地方给外国人。”他跟三个意大利人和我这样说的时候，把两个北欧人长相的德国学徒工放了过去。我十分确定，他说的这条“规矩”完全是他自己定的，不过没有人为我们说话。相反，在守卫身后，我看到其他德国人邪恶的嘴脸，显然他们是在赌我们敢不敢闯进去。人群中几个德国士兵。只要看看他们充满憎恨的脸还有他们的枪，我就知道，跟他们对抗是不明智的。

随着沉闷的吱呀声，守卫当着我的面把重重的金属门关上。仿佛听到信号一般，轰炸又开始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好趴下来，紧紧贴着防空洞的墙。在炸弹的轰炸下，地面开始剧烈震动，我们身边碎片纷飞，我能看到旁边的尼诺还不停地拨弄他的念珠，嘴里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圣母玛利亚！圣母玛利亚！”

跟第一次空袭一样，这次空袭也只持续了几分钟，但它停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漫长得像是过了许多年。我们缓了缓神，赶紧去找那辆卡车，看到它还毫发无伤地停在那里，我们松了一口气。我们在车上等那两个学徒工回来。路过许多废墟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车间，令我们吃惊的是——车间的大部分都被炸毁了。幸运的是，这一次，放着我衣物的储物柜还在。换完衣服，对尼诺和他的同胞们说完再见后，我坐了下一趟火车回汉堡，再也没有回去。

在回家的路上，想到三天之内我的两个工作地都被炸毁了，我突然有一种怪诞的感觉，我觉得自己仿佛拥有了点金术，只不过是碰到我的东西都变成了灰烬。虽然多思无益，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在我如此年轻的生命里，居然已经遭受了这么多次死里逃生。我应该责怪命运让我承受过多苦难，还是应该感激命运让我次次全身而退？多年来我都说不好到底是哪个，现在，有了后见之明，我更倾向于感激。

麦克斯·罗普克

第二天，我老老实实地去汉堡的劳工局报到，请求安排新工作。工作人员打开我的档案，研究了 my 资质之后，让我稍等一下。“我想我有个活正好适合你。”他说完离开了办公室。他回来的时候，后面跟着一个人，又高又大，面色红润，鼻子更红，红得我觉得他肯定是个酒鬼。他穿着一件贵重的驼绒大衣，普通德国人从战争开始后就买不到的那种大衣。

“我叫麦克斯·罗普克。”大块头冲我伸出巨大的手掌，自我介绍说，“我在霍鲁夫特有一家卡车公司，需要一个全能机工，什么活都会干的那种。”

我跟他说，我不太懂发动机，因为我不是机械师，不过机工该干的活我都能干。罗普克仔细查看了我的工作记录，冲那个工作人员说，“我觉得他能行。”然后转向我说，“好吧，那就这么定了。你赶紧开工吧。”

签了一些文件，跟工作人员握了手，小声说了一句“我会办好一切的”，罗普克就正式成了我的老板，即便我想离开也不能离开的人。我突然觉得自己成了某个交易的货物，跟美国的奴隶买卖没有什么差别。出来后，罗普克让我坐他的车时，这种感觉尤其强烈。那是一辆时髦的、金黄色宝马跑车。很明显，我的新老板是个相当有影响力的人。单看他还能弄到宝贵的汽油供私人汽车使用这一点，就知道他肯定是个大人物，毕竟现在汽油被严格限制为军用物资。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他的公司，篱笆围起的场院里有一栋两层楼的砖房，里面有一个小车间、一个车库，还有几个储藏室。除了一个身穿工装

裤、头戴橄榄色波兰式军帽的小伙子，这个地方没有人。

“这是斯坦尼斯劳斯，我的杂工。”罗普克说，“他会给你打下手，不管你什么时候需要。他会告诉你什么东西都在哪里，也会给你介绍细节。现在还没什么活要干，不过别担心，很快就会有更多了。”

说完，罗普克坐进他的跑车开走了。

斯坦尼斯劳斯安慰我说，我的新工作就是小菜一碟。他说的是一半德语，一半波兰语，“没问题啊”，还让我尽管放心，他会帮我熟悉情况的。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几乎没见着罗普克，也没什么活干，除了练习我的波兰语。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斯坦尼斯劳斯“给我介绍了许多细节”——毫无疑问，比罗普克打算让他说的要多得多。他用当了五年战俘学会的蹩脚德语，告诉我罗普克是个大黑市老板，勾结纳粹高层，在德军占领的荷兰和德国之间经营一种利润丰厚的生意。他说，罗普克吃得、喝得、穿得都比希特勒要好。他的卡车运回来的，他说，都是德国人早已经忘了还存在的东西。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斯坦尼斯劳斯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巧克力。连着包装纸和箔纸，他掰成了两半，把其中一半递给了我。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我差点忘了巧克力闻起来吃起来是什么味道。“你从哪儿弄来的？”我问。

我跟着他来到楼上，他让我盯着点外面，他打开一扇门。储藏室里面的东西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斯坦尼斯劳斯说得对。许多东西都被我和大多数德国人从意识里清除掉，因为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买不到了。现在，它们成堆成堆地放在那里，都快堆到天花板了。它们盯着我。像小山一样的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腌牛肉、火腿、咖啡、可可、雪茄、烟丝、上好的香皂、手霜、香水、口红和尼龙袜——只要你说得出来。

我还没来得及忘掉刚看见的一切，斯坦尼斯劳斯跟我说，现在有个大问题。接着他坦白说，这一段时间，他用一把自制的万能钥匙，自己打开门进去拿东西。今天早上，他说，他给“我们”拿了一条巧克力之后，想要锁上门，但他的钥匙断在锁里面了。如果罗普克发现门是开着的，他说，他就死定了。要阻止这一切，他求我用我的机工本领修好门锁。

我这才明白斯坦尼斯劳斯为什么突然要跟我分享。我的第一反应是对他说，“不！才不，”然后甩手不管。当入室盗窃案从犯的前景似乎并不诱人。不过我突然想到，如果被逼到绝境，斯坦尼斯劳斯可能会跟老板说，是我不是他，撬开了储藏室的门进去偷东西。罗普克根本不了解我，他会相信谁呢，斯坦尼斯劳斯还是我？我劝自己说，我可不想去证实。我只是在心里想，没敢说出来，生怕他本来没这想法。我答应他看看能不能修。现在时间才是最重要的，我的计划是，我把锁里断的钥匙弄出来，他一边再做一把万能钥匙。

一旦我们说好了要怎么做，我们就以“碟中谍”小组的效率开始工作。几分钟之后，我就把锁从门上卸了下来，拆下了关键部分，然后重新装上门锁。等我的活干完的时候，斯坦尼斯劳斯也做好了钥匙。我们还没来得及把它们放到一块，把门锁上，就听见罗普克的车停在了院子里。我们尽力不让自己看上去像是吞了金丝雀的猫，赶紧装作在擦地。罗普克走进来的时候，问我们，“一切都好吗？”

“是的，老板；没问题啊。”斯坦尼斯劳斯回答。我的心砰砰直跳，忙点头同意。罗普克向楼梯走去的时候，我差点犯了心脏病。

“你想让我拿昨天那个司机送来的坏挡板怎么办？”我绝望地想要拖住他。我的诡计奏效了。罗普克转过身来，去院里检查那个坏掉的后挡板，我赶紧跟了过去。

“你觉得你能修好它吗？”他问。

“我能修好它。它会跟新的一样。”我回答。

“好，你看看怎么修吧。”

罗普克看了一眼手表，回到他的宝马上，冲我挥了挥手，然后开走了。斯坦尼斯劳斯和我如释重负的叹息，或许在半个街区之外都能听见。罗普克一离开我们的视线，我们就赶紧冲到楼上去试那把钥匙。一番小小的改动之后，钥匙在锁里灵活地转动了，开关都很顺畅。

危机既然已经解除，我们镇定地来到楼上的聚宝盆房间里。我们承认里面这些非法违禁品不属于我们，但我们同样合理地认为它们也不属于罗普克，按照食物和物品配给来说，它们本该是属于所有德国人。罗普克一点要跟我们分享的意思也没有，所以我们拿一点也正当。我们决定以后时不时地去几趟。

那天晚上，在我骑车十五分钟回家的路程中，我的偏执令我把大多数同行人都看成是盖世太保的特务，觉得他们是来抓我的。随时随地，我都觉得会有穿着长皮衣的人拍我的肩膀，告诉我我被捕了，命令我打开夹在腋下的公文包看看里面都有些什么东西。可是，这种事没有发生。我回到学校后，母亲看到我献给她的“珍宝”——几条巧克力、几个沙丁鱼罐头和几块香皂，眼睛都亮了。我居然有种罗宾·汉劫富济贫时的感觉。

战后求生

总算解脱了！

希特勒死于1945年4月30日的消息直到转天才传到汉堡。跟这个欺骗、背叛、几乎摧毁了德国人乃至祸害全世界的人相称的是，官方宣布他的死讯时，说到他死时的情形也全都是谎言。“元首阿道夫·希特勒，”柏林的元首指挥部简洁地报道，“于今日下午在总理府坚持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最后一刻，作为战斗的德国士兵献出了生命。”丝毫没有提到，这位让无数德国人失去生命（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的人，其实是自杀了，让德国人民给他擦屁股。然而，即便是这样粉饰这个“英雄”的死亡，也无法重塑无数德国人心中昔日的元首形象。

在希特勒的全盛时期，许多次，我都设想过德国人会如何对待他们的领袖的死讯。我动用了我所有想象力，试着想象那种悲伤大爆发的感觉，我确定，听到他们曾经奉为上帝的人的死讯时，德国人肯定会悲痛至极。所以我对于我的国人的真实反应毫无心理准备。当这个消息在我们收容所的广播里被不停播报时，人们既不欢欣，也不悲痛，而是非常低迷的冷漠。除了偶尔一句“总算解脱了”，我们的室友们在日常斗嘴中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历史性事件。我检视了一下我自己的感受，惊奇地发现，我对希特勒死讯的反应，跟我经常想象

的完全不一样。我并没有那种手舞足蹈的喜悦和解脱感——比方说母亲和我在汉堡大空袭中幸存下来的第二天早上感受到的那种——而是一种冷漠的“那又怎么样？”我觉得是因为我在自己随时会死去的担忧中生活了太久，像希特勒这样的超级大坏蛋的死讯，不管死因是什么，都没法激起我强烈的情感。

比希特勒的死讯本身更轰动的是，不久后盟军的报道揭示，元首是和他的情妇一起自杀的，他用一把手枪爆了自己的头，而她则吞了毒药，他们是在自杀的前一天才结的婚。只有在这个时候，爱娃·布朗恩这个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德国人才知道这位比希特勒小二十岁、金发碧眼的女郎的存在。现在，我们不仅知道了希特勒有这样一个罗曼蒂克的情妇，还知道了他们的亲密关系持续了他掌权的十二年。他是怎么能够在公众的眼皮底下维持这样一段重要的恋情却无人知晓的？大多数人早已接受了官方的解释，说元首是为了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他的人民，才过着独居生活。没有人知道，这样一个过度曝光的人，似乎每分每秒都活在德国及国际媒体监督下的人，是如何把爱娃·布朗恩藏起来的。

在希特勒的死讯还没有公布前，汉堡的纳粹市长卡尔·考夫曼，公然违抗元首“保卫汉堡，直至最后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命令，决定投降。他说他这么做，是为了挽救汉堡剩下的部分，免除人民再遭流血牺牲与苦难。汉堡即将投降的消息，在深受战争折磨的人们的焦急等待之下，终于在《汉堡报》编外版上刊登了。这是汉堡三大日报社合办的一份报纸。消息这样写道：

汉堡人！

经过英勇抗争，在为德国胜利做出不懈努力之后，在无数的牺牲之下，我们的人民不得不屈服于数量上和武力上都优于我们的敌人。

他们正准备占领我们的国家，正站在我们的城门前。我们的国防军和冲锋队已经为我们的城市英勇奋战。无畏的汉堡人已经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你们坚强并毫不动摇地接受了战争对你们的要求。

现在，敌人正计划从空中和地面大规模袭击汉堡。为了这个城市还有它的人民。对无数的老弱妇孺来说，这意味着死亡和摧毁最后的生机。战局已经无法改变，继续抵抗将毫无意义，并且意味着彻底的毁灭。那些绝对遵守命令继续战斗的人将有机会在城外奋战。从我个人来说，我将听从内心和良心的指引，在充分认识现有的战局，完全明确我的责任的情形下，打算挽救汉堡，挽救它的老弱妇孺，免于没有意义及不负责任的毁灭。

我知道，这样做只是我自己的决定。我会把功过留给历史和你们去评说。

汉堡人！我所有的努力和担忧都是为了你们还有这座城市，以及我们的国家。我将一直如此，直到我生命的尽头。这场战争对我们来说是一场国难，对整个欧洲来说也是一场灾难。希望所有应为此负责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上帝拯救我们的人民和国家！

——卡尔·考夫曼

考夫曼打算投降的消息对我和母亲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相信，对大多数汉堡市民来说都是如此。我完全相信，现如今，德国最轻微的反抗都会招来盟军可以毁灭所有生机的报复。我突然觉得母亲和我已经越过了横亘在我们和自由之间的障碍，没有了这些问题，我们的生存似乎可以有保证了。许多同胞因为不确定会遭到盟军何种对待而担忧，我却不一样，我十分期待盟军接管的那一天，因为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多么讽刺啊，我觉得，虽然我对德国从没有一

丝恶意，更没有任何犯罪行为，却不得不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深怀恐惧地生活了这么多年。

1945年5月2日，在汉堡被英国接管的前一天，我去了市中心，最后看一眼这座依旧在纳粹统治下的城市。基本上，我是想看到德国溃败的更多迹象。我没有失望。到处都是一片混乱，无数的德国士兵涌进城来，坐卡车、汽车、摩托车，骑自行车，步行等等。有些士兵是逃亡的，而另一些则是因为德国军事指挥链的彻底解体而陷入混乱，与他们的部队分开。虽然前途未卜，但所有人都是一副解脱的神情。他们终于逃脱了他们同伴的命运，没有在一场已经知道失败的战争中成为最后的牺牲品。

奇怪的是，我注意到，在这些年里并没有党卫军，也没有身穿褐色制服的纳粹分子。纳粹都去哪儿了？这个问题将在未来的许多天、许多星期、许多月，乃至许多年里被越来越多地问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我听到英国炮兵部队的隆隆声，从窗户往外望去，我看见南边有闪电一般闪耀的灯光。几天前，许多德国人还坚持说这是德国军队的动静，而不是敌军的。到了这个时候，即便是最坚定地认为德国必胜的人——过去的几年间他们拒不相信德国会输——也不情愿地接受，德国已经输了。

而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我，不知为何，却也无法想象，明天英国人就会来到这里，纳粹会永远地消失。相比起来，让我想象太阳会不再闪耀还更简单一些。在纳粹统治下生活了十二年——到那时候为止几乎是我人生的三分之二——我似乎不敢相信，希特勒吹嘘说至少会维持一千年的第三帝国，就这样突然而不光彩地完蛋了。

虽然非常兴奋，但我肯定还是睡着了，因为接下来我记得的就是听见一个室友的声音。

“喂，快起来！你的朋友来了。”

听到这句话，我突然醒了，迷迷糊糊的脑袋马上就清醒了。外面

已经是大白天，我冲到窗前想看一眼，却被人提醒，“别让他们看见你。他们可能会以为你是个狙击手，然后朝你开枪。”

我小心翼翼地从窗户角往外看去。我看到的简直好到不像是真的。与数百部纳粹宣传片里描绘过的场景截然不同，一长队橄榄绿的坦克、装甲车和卡车排在我们的大街上，两边都有英国大兵。他们武装到牙齿，戴上他们特有的罩着伪装网的扁平钢盔。长长的车队一直排到学校门前十二英尺远的路障那里。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为了减缓不可避免的败局的到来，纳粹做了最后几项努力，他们在全市范围内仓促建立反坦克防御系统，这些路障正是其中一部分。它们是街道上挖来的大鹅卵石，用废墟里挖出来的重型钢梁加固而成。在纳粹的计划中，冲锋队的作战单元和市民会用莫洛托夫鸡尾酒^①和小型反坦克武器伏击坦克，包括所谓的反坦克榴弹发射器。多亏了考夫曼的决定，这种可怕的景象才没有出现。

英国大兵们怀疑地朝着学校望来——一片废墟之中唯一完整的建筑物。接着，一个十来个人的小分队爬过了路障，来到学校门口，他们的枪都上好了膛。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他们用英语大喊。我听上去像是有人在喊，“所有人都出来！”

“你为什么不去看看他们想干什么，”一个室友紧张地说，“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的。另外，你还会说英语。只要跟他们说，我们是你的朋友，我们准备投降，我们都没当过纳粹。”

我深深地后悔自己曾经吹嘘过会说英语这件事。就凭我那少得可怜的词汇量，充其量只能算一知半解，哪里够跟占领军谈投降的事情。不过，既然被指定为团队里的“发言人”，我也不能拒绝这个荣

① 指燃烧弹，名字来自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苏芬战争中，莫洛托夫宣称苏联飞机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面包。芬兰军民将苏联的炸弹称为“莫洛托夫的面包篮”，用酒瓶等玻璃瓶制作燃烧瓶进行回击，称为“回敬莫洛托夫的鸡尾酒”。

耀。所以我快速穿好衣服，来到大厅。看到全副武装的作战士兵和他们冷酷的、灰扑扑的脸，我的勇气全都烟消云散，我多么希望我没有接受这个角色。可是现在想这些也太晚了。

“你会说英语吗？”领头的士兵问。

“一点点。”我温顺地回答。

“好极了。”这个高个子，留着浓密的红海象胡子、红甲虫眉毛的领头士兵说。当时我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小分队里只有他没有用武器对着我。相反，他手里拿着一根马鞭，枪还安全地放在枪套里。那时候我还不不懂英国的军衔徽章，但看到他肩膀上三颗星，我猜他是个军官。

他说他是个什么什么上尉，证明我猜得没错。“你的国籍是？”

我尽可能地解释，我是一半利比里亚、一半德国人。

“这栋楼里住了多少人，都是些什么人？”“海象”一边递给我一支烟，一边问。那时我已经屈从于同龄人压力，学会了抽烟，不过现在，我觉得我不应该拒绝我的解放者的初次示好。所以我感激地接过来点燃，作为与盟军团结的象征。接着我用仅会的一点英语跟他解释说，这个学校是给遭受空袭的德国市民当应急住处的，这里住着的大概80%都是女人，剩下的20%大多是年长的男人。

“告诉他们，我想让他们立刻到学校操场集合，这样我才能跟他们讲话。因为我的德语远没有你的英语好，所以我想让你帮我翻译。”

我向军官保证，我会尽力。带着“新职位”给我带来的自豪感，我回到宿舍传达了队长的命令。我立刻注意到室友们在我面前的言谈举止里多了许多尊敬。

我挨个宿舍地传达队长的命令，人们都围上来，焦急地问各种问题，还要求我充当中间人。好笑的是，就连那些一贯与我保持距离的邻居们都急切地提醒我，说我们曾经是多么亲密。他们骤然大变的

态度，我一点也不吃惊，因为我知道，许多人都害怕英国人会严惩他们，包括党卫军式的极刑。许多女人都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把自己锁在卫生间里，以免被强奸。这都是戈培尔描绘过的德国战败的话会出现的场景。我力图劝说他们没什么可怕的，可只有少数几个人相信。

学校操场上一片愁云惨雾，有些女人抽泣不止，男人则尽力地表现出此种情形下最大的无畏精神。

“跟他们说，”上尉对我说，“要他们把学校前面的路障搬走，让我们的车可以开过去。半个小时内，我要所有健全的男人都在学校门前集合。女人可以回去了。”

在学校里学到的英语居然还能记住这么多，我很吃惊。虽然我没有听懂他说的每一个字，但还是可以领会到他的意思。等我翻译完，人们都明显地松了一口气。队长的手下在附近一家被炸毁的建筑公司弄来几辆吉普车，把上面的镐和铲子都分给集合在路障前的德国男人。队长还是通过我指示他们，尽快干活。他让他们下午四点之前务必干完。那意味着他们只有五个小时拆卸以前几个月盖起来的東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虽然队长给了这样的最后期限，人们也使劲干活，但是路障被拆到能够让最宽的车通过时，天都已经黑了。等到最后一辆卡车开过去之后，队长要我让他们都解散，还给他们发了几包烟。他感谢了我的帮助，递给我两个圆罐，每个里面都装着一百支香烟，然后爬上他的吉普，消失在夜色之中。虽然那时候我还不知道，但很快我就明白了，我刚刚收到了德国的最新货币。

直到过了半夜，我才回去。室友们没有一个说话的，我又清楚地知道了，他们对我的态度又变了。只不过这一次，这转变是不好的。我立即就明白了。在他们看来，我已经不是他们中的一员，不是昨天那样了。相反现在我已经是“另一边的人”了。我突然意识到，我已

经不再是自己一直以来认为的——德国人了。不过不知为何，这并没有困扰到我。从前欢乐的时候，德国人并没有真正接纳过我。现在我也不需要他们痛苦的当下。躺在自己的铺位上，想着白天的事情，我觉得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分水岭。我能感觉到，命运的钟摆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摇摆，还在问，为什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多年来头一次，我觉得我彻底从那种麻木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因为骄傲，我从不允许自己向任何人吐露这种恐惧，至少对我自己来说，它日日夜夜无休无止地纠缠着我。那不是普通的恐惧，比方说害怕死于空袭或纳粹的集中营，而是害怕被羞辱，被嘲笑，被贬低，被剥夺尊严，让我觉得自己不像一个人，更不像生活在当下的人。突然之间，这种直到现在我才真正明了的恐惧像一副重担从我肩头卸下。

白天的宵禁解除后不久，我去市中心看看都有什么变化。德国市民依旧不知自己会有什么下场，大多都时时留意着外面的动静。大街上都是英国大兵，他们开着橄榄绿的大卡车和他们称为吉普的小车穿梭在路上。到了夜间，写着“住宅区”和“市中心”的街牌被放在主要的路口，显然是为了帮英国司机们认路。我注意到，无论什么时候，德国人冲着经过的英国卡车挥手致意，英国人却从不回礼。相反，他们要么麻木地盯着前方，要么看向别的地方。我知道，许多汉堡人都受够了希特勒的战争，把英国人看成是自己的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因此我对这些明显的冷漠感到非常费解。要到两个月以后，我才能从海报中得到官方的解释。那些海报，本来是指示市民在此时要遵循那些新的规定，却包含了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子爵想要传达的信息。他说，他的同胞们都是本性善良的好人，不向德国人回礼，是因为他命令他们不许亲敌。考虑到刚刚结束的痛苦的战争，他觉得，让一切都过去还为时过早。他进一步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在德国的土地，而是在法国和比利时的土地上打的，而战败的德国军队完好无损地回来后，德国的领导人却编造了德国并未战败

的谎言。为了防止历史第三次重演，也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陆军元帅说，德国人应该吸取教训，应该明白一个国家需要什么样的领导人。直到那个时候，他说，拥抱亲吻重修旧好还为时过早。“我们的目的，”他最后说，“是为了消灭国家社会主义^①的罪恶。我们离这个目标还很远。”

不管怎么解释，不许亲敌的政策——出自以计谋胜过德国著名的“沙漠之狐”埃尔温·隆美尔的元帅——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它忽略了人性最重要的一点，性冲动。这一个礼拜还没结束，蒙哥马利还没来得及及改变主意，我就亲眼目睹了英国大兵和德国小姐们是如何像对爱情如饥似渴的傻子们一样，让元帅的政策变成了笑话。我承认元帅的军事才能的确出众，却毫不知晓爱情小鸟们的把戏。

我经常想知道吉奥达诺一家怎么样了，却一直不敢去看他们，怕会看到什么不想看到的事情。汉堡投降两个星期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去他们在迪斯特威格大街的地下室走一趟。令我如释重负的是，我看到这一家人过得还不错，毕竟他们刚刚从一场难以言述的苦难中幸存下来。他们在废墟里躲了好几个礼拜，食物和水刚够活下来。就连吉奥达诺太太也收起了愁容，显然因为家里人都活了下来而高兴。他们都对此欢喜不已。他们还是觉得难以相信，噩梦已经结束，他们真的从大屠杀中活了下来。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那样，他们都围了上来，拥抱我，拍着我的背，跟我握手，捏我的脸颊，因为“纳粹头子希特勒”的死，无数次地祝贺我和他们自己。不知怎的，这一幕让我想起了那个古老德国童话故事结局：七只小山羊和妈妈在刚淹死大灰狼的井边跳舞。

欢喜过后，埃贡、拉尔夫和我在外面走了走，看看我们的解放

① 指纳粹主义。

者，聊聊过去几周发生的事情。一路上，我们看到成排停着的重坦克、卡车和吉普，还有闲散的士兵，他们戴破旧的贝雷帽，大口嚼白面包，大口喝茶水。他们看上去精神状态都很好。我们很久没看到这么多吃得饱饱的人了。而被英国士兵押着的穿着各异的德国战俘就完全不一样了。许多战俘拄着拐杖，头上或胳膊上缠着脏绷带。很多人都严重营养不良，虽然不久前，他们还在一场战争中，逼得另一个欧洲国家臣服在自己脚下。想起戈培尔的宣传片里曾讽刺地称法国非裔战俘为“西方文明的救世主”，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谁才笑到了最后。

拉尔夫和埃贡对我说起他们未来的计划，我意识到，虽然我们有着那么多的共同点，我们的打算却截然不同。又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有规划，而我没有。我很满足于从纳粹的噩梦中活着醒来，而且没什么损伤，现在打算把这一切都抛之脑后，看看将来有什么机会。而他们却恰恰相反，不打算让一切过去。事实上，他们正要跟不共戴天的政敌纳粹和新纳粹分子开战。我说，希特勒死了，国防军也解体了，纳粹已经成了历史，他们说我太幼稚，消息落后。他们坚持说，纳粹和纳粹主义依旧还在，还活在德国人的心中；他们兄弟俩都发誓说，直到最后一头纳粹猪上了绞刑架，纳粹主义彻底从地球表面上消失，才会罢休。

我虽然也想看着纳粹的所有罪恶都受到审判，所有的纳粹痕迹都被毁去，但我却很乐于把一切都留给盟军。埃贡和拉尔夫则不然，他们成了痛击纳粹的记者。每天夜里，大部分时间他们都在一台破旧的打字机上打字，写了许多文章，希望有一天，市里的报纸会刊登出来。每一篇文章都要求英国占领军迅速彻底清除纳粹分子。

然而我们发现，英国的正义之轮，转动得却是惊人的缓慢。尽管如此，汉堡古玩屋里的一场战争审判判处了十四位党卫军男女死刑，在他们承认了在汉堡城外的集中营里犯下难以言述的罪恶之后，对他

们用了绞刑。曾经五万多平民死在了那个集中营。同时，大多数纳粹大人物都受到了轻微的处罚。比方说，汉堡的纳粹要员卡尔·文森特·克罗曼，从一开始就是纳粹的政治领导人，也是纳粹党的地区负责人，就受到了一万马克的处罚。他的上司，卡尔·考夫曼受到的待遇更好。虽然在他违抗希特勒保卫汉堡直到“仅剩最后一个人”的命令之前，他都是坚定的希特勒追随者，却因为心绞痛身体太虚弱而不能受审。

在吉奥达诺兄弟俩的计划中，同样重要的还有，在纳粹统治下受尽苦楚的非雅利安人应得到什么样的补偿。为了这一点，我们决定去市中心一探究竟。

我们来到英军政府总部询问，被带到了一位专门负责救济事宜的英国军官面前。这位和气的军官告诉拉尔夫和埃贡，作为混血犹太人，他们也在盟军制定的犹太救济措施的优先名单里头。他解释说，这些救济措施，包括了从房屋到额外的食物配给，还有军事政府的优先录用。让他们填了几张表后，他安慰我的朋友们，大量的援助马上就要到了。

轮到我的时候，我说，跟吉奥达诺兄弟一样，我也被纳粹处理为非雅利安人，在教育、经济、心理和生理上都备受歧视。因此，我说，我也想要得到某种救济。在礼貌地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他也认为，在纳粹的统治下，我的处境实在可悲，但却为我做不了什么。

“对不起，”他说，“对英国军事政府来说，你是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我们只被授权帮助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外国人、非德裔战俘，还有先前被关在集中营里的人。你也明白，你并不属于这其中任何一种。”

我想，真是听够了这些摇摆不定的话。虽然“我这边”已经赢了，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哪边都融不进。

《剃刀边缘》

对于这意料之外的拒绝，我很失望，却没有轻易认输。没有什么能让我相信，纳粹已经倒台，战争已经结束，我的未来还是不会好起来。这一次挫折只是提醒我，天上不会掉馅饼，虽然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我都有什么选择。我知道的是，如果我可以努力一把，我就再也不会去谁的车间里干活。我很感激母亲，她牺牲了许多才让我学了一技之长。但是四年里，我冒着失去生命和四肢的风险，手上长满了老茧，在刺鼻的气味和震耳欲聋的噪音中劳作，我早就做好了改变的准备。无论用什么手段，我都要变成白领；如何转变，我还没想好。但是我相信，战后的德国大部分被英国人和美国人控制，我急需把我那一知半解的英语练好。当即我就决定，要把学习英语当成我的首要目标。

我买了一本德英小字典，走到哪里都随身带着。起初，我像读书一样读这本词典，按照字母表背单词。后来才发现，这个办法不管用。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什么进展，直到偶然的，我知道了一种学习方法，居然有了奇效。一个跟我聊过一次天的英国大兵，送我一本很旧的毛姆的《剃刀边缘》平装本，还说只要我一开始看，就肯定放不下。几天之后，我第一次试着看这本书，刚看了第一页，就看不下去。我这才意识到，我的英语词汇是多么不足。我的第一反应是放下它，直到我的英语有进步了再看。但是相反，我用上了笨方法，把每个不认识的单词都查清楚了意思，直到每一页都能看懂。然后，我再翻到第二页，接着查下去。起初进展非常缓慢，并且令人沮丧。无数次，一个刚刚查过的单词再次出现时，我却已经忘了它的意思，只能

又查一遍。但是慢慢地，我却上了瘾，这本讲述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在印度白雪皑皑的山脉中寻求启蒙的书，越是读下去，就越能明白那些词语的含义。看了一个多月，看到一半的时候，我已经能不查字典就看懂许多页了。

除了阅读，我还抓住一切机会跟英国大兵聊天。在这个过程中，我吃惊地发现，以前无比憎恨的英语老师哈登先生曾经塞进我脑子里的东西，又迅速地回来了，我还以为我早忘了呢。不久，我就能说一口相当流利的英语了，也准备好了应对眼前的挑战。

英德关系不断变好，我大多都是在违反英国军事政府对德国人实施的从黄昏到黎明的宵禁时观察到的。在这项规定之下，日落之后外出的任何德国人都要被处以七至六十天的监禁。凭借着我的英语，还有我不那么德式的长相，夜里我也在汉堡游荡，仿佛宵禁根本不适用于我一样。不管什么时候，被英国宪兵拦下后，我跟他们说，他们处理的可是个利比里亚人，利比里亚也是盟军的一员，我现在正等着我的利比里亚护照办下来，随时等着安排好了被遣送回国。就这样，我经常侥幸逃脱。只有一次，他们把我带走，但等到我对他们的上级也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他就因为下属给我添的麻烦向我道歉，把我放了。

几个月后，严格的宵禁放松了，德国人可以在外面待到晚上10:15。对我来说，二十一天后，5月7日，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将军签署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文件，正式消除了两国之间的敌意，我才算真正地被解放了。5月28日，盟军军事政府废除了所有纳粹法律，包括旨在“保护德国血统”的所谓纽伦堡法。在一次彻底的行动中，盟军下令“从今以后，任何人都不能从他与纳粹党的关系中获益，也不能因为他的种族、国籍或信仰而受不利影响。”

家，甜蜜的家

因为跟英国大兵的接触越来越多，我经常能得到一些香烟和食物作为礼物。收容所里有些人便说一些酸言酸语，表达对我“通敌”的不满。他们都太懦弱，不敢直说，只能在我不在的时候跟我母亲说。得知这些时，我告诉母亲，我们已经不受欢迎了，是时候往前走了。她同意了，接着把我们这个“小家”的管理权正式交给了我，令我吃惊不已。“现在，该你来负责了。”她对我说，“英军来了之后，我看不懂形势了。所以，从现在开始，你来为我们两个做决定。”

我被深深地触动，觉得很光荣，想要尽我所能地划好我们这艘小船。问题是，我们能去哪儿呢？

拉尔夫和埃贡让我们别灰心，到了一定时候，自然会有人来帮助我们。我却不信。我觉得，我现在急需的是，跟利比里亚政府的代表取得联系，然而我得到的答复是，利比里亚驻德国大使馆的成立，还得好几年。

正当我要放弃找到一个合适住所的希望时，吉奥达诺一家把我介绍给了一个老寡妇。据说，她是一个纳粹大人物的亲戚，曾经是他们家的朋友，帮过他们。她立即同意让我和母亲租下她家的一个房间，就在吉奥达诺家的地下室旁边。“你和你母亲可以一直住到你们找到更合适的地方为止。”她对我说。我欣喜地接受了。在那之后，我们带着本就不多的行李，没有任何犹豫地离开了住了两年的学校。

我们的房间，在那位老太太家的二楼，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小沙发、一个梳妆台、一个衣柜，但对母亲和我说，它就像是天堂。这是三年前大空袭后，我们第一次享受到了奢侈的专属空间——

虽然很小——我们再也不用跟陌生人挤在一起。但我们的欢乐却是短暂的。

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的新房东太太最初看上去毫无私心的善举，其实只是精心设计的阴谋。我想，她跟大多数与纳粹有关系的德国人一样，一直害怕英国人注意到她的背景后会怎么对待她。她希望靠着帮助纳粹的受害者，比方说吉奥达诺一家和我，等到英国军事政府调查她的案子时，可以为她赢得一点同情分。一段时间后，她看清了英国人不会怎么处理纳粹分子，她完全忘掉了原本的恐惧，也没有了帮助我们的热情。骤然之间，她对母亲和我的态度便截然不同。没有了友好的问候，我们受到的是沉默的对待，还有充满敌意的白眼。当月的房租还没到期，她便对我说，她真的急需她的房间，让我们尽快搬出去。她是如此着急地摆脱我们，甚至提出只要我们肯搬走，她可以把当月的租金全部还给我们。

我们早就下定决心，再也不回学校去，因此在绝望之下，我们只能在附近被炸毁废弃的大楼下面寻找，看是否能找到没人住的地下室。幸好，我们找到了一间，跟我们几乎被赶出来的公寓只隔了几个街区。我们援引了一项不成文却广受人尊崇的非法占有者权利法，直接搬了进去，就算是占住了那个地方。

我们的新“公寓”，有几个好处，就算要收费，我们也会租下它。它有可以使用的冲水马桶，自来水，天花板上垂下的一个灯泡，大门上还有锁。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意气相投的邻居，一对中年夫妻，据说1943年大空袭后他们就住在隔壁了。

安顿好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后，母亲和我去“买”家具了，其实也就是去各个废弃的地下室，搜罗一些被人丢弃的、我们还能用上的东西。经过几个来回，不到两个小时，我们就以最折中的口味把我们的“公寓”装修一新，两张木床，四把不配套的椅子，一张三条半腿的小饭桌，一个梳妆台，一个大搪瓷碗，里面的搪瓷都掉得差不多

了，还有一个严重变形却还很好用的大水瓶。看着身边这些新宝贝，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我们在自己的家里吃了第一顿饭。母亲用一个热盘子装的饭，跟往常一样，没有一丁点肉，只有一些清水煮过的洋白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快乐。不过，别的事情却影响到了。

除了新住所带来的各种额外费用，还有一件我母亲和我没有想到的事：跳蚤。尽管我与这些吸血寄生虫的接触非常短暂，但它们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成为我最害怕的生物。

虽然我们搬进去前就已经彻底打扫了一遍，那时候，我们完全不知道跳蚤的存在。直到我们关了灯，躺在床上，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有麻烦了——一个大麻烦。就好像一支埋伏的部队发动了攻击，成百上千只跳蚤爬到我们的身上，又咬又吸，直到我们从头到脚都是伤口和小血点。因为盔甲一样的外壳，不管我们怎么抓挠拍打，它们还是不停地咬我们，吸我们的血。我们发现，唯一能让它们停止袭击的就是光线。只要我们开着灯，不盖毯子，它们就会消停一会儿。为了不让这些昆虫世界的吸血鬼对我们再次发动攻击，我们把灯开着，在寒冷的夜里冻着，不停地抓挠着痒处，皮肤都被挠得发烫了，直到天亮。

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母亲和我当即就决定，如果必须有一方要走，那么也得是这些虫子，而不是我们。所以商店一开门，我们就买了几大瓶来苏水，对这些六条腿的入侵者发动了全面大战。用了快一天的时间，我们用来苏水擦拭和冲洗地下室的每一个角落和缝隙，还有我们的绝大多数东西，直到房间里跟我们身上闻上去都是个化学工厂。这种气味，对跳蚤们来说是否像对我们一样难闻，还有待考证。夜幕降临后，我们关掉灯，开始测试。我们屏住呼吸，等待被跳蚤攻击。但什么也没发生。一只跳蚤都没有。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们身上都没有新的跳蚤伤痕，我们彼此祝贺，又赢得了一场胜利。

饥饿——新敌人

战争期间，纳粹做到了让德国人都能得到食物供给。他们让占领区的人民饿着肚子，把他们的食物运到了德国。因此我们总有食物——虽然不是我们喜欢的食物，至少可以让我们不饿肚子。随着德国战败后被占领，这一切都改变了。盟军迅速地切断了食物供给。没有了国外运进的食物，德国人不得不依靠自己的食品生产。这导致了汉堡及其他德国城市食物短缺，造成了大规模的饥饿。人生中第一次，我了解了“饥饿”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意识到我们正在遭受纳粹以往罪行的报应，母亲和我并没有好受一些。食物配给已经少到了不人道的地步，让我们想活着很难，想饿死又不容易，我们越来越瘦，越来越虚弱，越来越麻木冷漠。经常听说新的一拨肉、面包或是土豆已经送到商店，母亲和我就会去肉店、面包店或者杂货店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长队，还没排到柜台，就被告知食物已经卖光了。每次我们浪费时间和所剩无几的精力，感受到的失望、愤怒、恐慌、无助和绝望，简直难以言喻。有时候，母亲和我被饥饿和失望折磨到毫无力气和意愿，听到有食物送来，也懒得再去排队了。长期以来我们都认为，只要战争结束了，我们大多数麻烦也会随之结束。但在惨淡的事实面前，这种信念完全消散了。突然之间，从希特勒的大屠杀和盟军的炸弹下侥幸存活我们，很有可能要死于和平时期的饥饿了。我记得在汉堡大饥荒最严重的时期，超重的德国人跟纳粹一样罕见。比方说，我母亲，正常时经常是属于丰满的那一类，那个时候“缩水”成了九十九磅的瘦柴。

战后那段时间，没有什么比持续的饥饿对我们更有灾难性、毁灭

性的影响了。它让我们在夜里无法入睡，白天无法正常运转。即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我们也会经常梦见——还有什么别的？——食物。我总是梦见，我坐在桌子前，正准备享受一顿美味大餐，每当我刚开始吃的时候，就会突然醒来。许多个清晨，母亲和我醒来时，都会发现彼此的脸肿得厉害，扭曲成几乎认不出来的形状。这种短暂的症状被我母亲称为“饥饿水肿”——因为只吃水煮洋白菜，而极度缺乏蛋白质的水肿。有一次，饿得发慌的我挤在地铁上，快到站的时候，我差点晕了过去，以前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拼命不让自己倒下，不让自己出洋相，只能用背抵住车厢，在失去意识之前，使劲站稳脚跟。等我回过神来，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依旧站着，虽然已经错过了一站。

有一次，我走在街区的路上，一个卡车司机拦住了我，问我是否可以帮他卸货。他说，车上装的全是食用油，可以给我一瓶油作为报酬。我饿得虚弱，又怕毁掉我最好——也是唯一——的西装，我先是没有答应。想了一会儿，我改变了主意。食用油，和黄油和其他种类的脂肪一样，是最珍贵最难得的食品。母亲肯定能让它派上大用场。

闷热的夏日午后，我像个苦工一样，把一个又一个重箱子搬进仓库。我仿佛已经闻到了煎土豆的香味，打算给母亲一个惊喜。卖力地干了好几个小时后，我终于干完了，拿到了我那瓶油。我把这份礼物送给了母亲，母亲高兴得不得了，让我休息，她准备了满满一大盘土豆去煎。第一滴油滴在热锅上的时候，我们的快乐变成了巨大的失望。等着我们的并不是美味的煎土豆，而是飘满整个屋子的浓浓黄烟。我痛苦地意识到，我被耍了。我埋头苦干了那么久的“食用油”，其实只是工业油，根本不适合食用。我气得发疯，迫切想要讨回公道，急忙跑回仓库，想要找到那个司机。但是到了之后，仓库的门上了锁，司机和卡车都不见了。

在战后饥荒最严重的时期，有一天，母亲愉快地宣布，她和她

的四个女朋友，包括利兹贝斯，决定把各自少得可怜的食物凑在一起，做一顿大餐——一个真正的蛋糕。我们都期盼着接下来的星期六下午，大餐将会在其中一个太太家举行，她的家在轰炸中幸免于难。到了星期六下午，下班后，女人们聚在厨房里，称量、混合、搅拌她们能凑到的东西，因为材料短缺，还得把配方改了又改，绞尽脑汁想出能替代的材料。每个人都贡献了自己的食材，其中一个鸡蛋，是我们三个月来的所有配给。就在我们准备把闻起来香喷喷的、淡黄色的蛋糕面糊放进烤箱的时候，有人提议说，再放一点香草粉，就更完美了。所以母亲和我还有其余的“厨师”都去邻居家问问有没有香草粉，利兹贝斯自愿留下来收拾厨房。过了大概半个小时，我们回来了，被眼前的一切吓了一跳。

利兹贝斯坐在饭桌前，对着盘子和锅哭泣。

一开始，我们从她的哭嚎中听不出什么原委来，除了那句说了一遍又一遍的“我对不起你们”。后来慢慢地，看到那个珍贵的蛋糕面糊不仅不见了，盘子还干净得能照出人影，我们才明白了怎么回事。她断断续续、又是抽泣又是擤鼻子地对我们说，我们出门后，她开始收拾厨房。她说，她错就错在，尝了一茶匙面糊，一茶匙，又一茶匙，一茶匙又一茶匙，直到彻底失去了控制。“不管我怎么努力，”她说，“我就是停不下来。我就是这么饿。”

每个人都惊呆了，随即愤怒起来。“我想你还是走吧，利兹贝斯，”我母亲说，“因为我们都很饿，如果你留在这儿，谁也说不定我们会对你做什么。现在我们都气得想杀了你。”

利兹贝斯抓起她的东西就冲出门去。她一走，所有的女人都坐下来，用洪水般的泪水释放自己的失落与愤怒，骂她是个贱人。我没有哭，但我也很生气。我在心里憋了一些话，想骂她，却又不敢当着母亲的面说出口。

那个时候，没有人觉得那个星期六下午发生的事情有任何幽默之

处，但是多年后，在食物再次十分充足的时候，利兹贝斯的“自私自利”成了母亲最喜欢讲的笑话。

也正是在那个时期，有一天，我站在市中心一个街角等红绿灯。裹着我那破旧的薄外套，我想的是，要怎么让我空空如也、愤怒咆哮的胃安静下来。

“出什么事了，兄弟？”一个深沉的声音打断了我痛苦的沉思。

我惊讶地抬头，看见身边停着的一辆美国卡车上有一个疲惫的士兵。他是一个黑人，我二十年人生中亲眼见到的第一个美国“兄弟”。看到这个来自另一个大陆的人，我惊呆了。

“你在这儿跟这帮德国佬干什么？”美国大兵问我。我着急地想用上自己的英语，尽可能清楚地解释说，这些“德国佬”是我的同胞，汉堡是我的家乡。

“打仗的时候你在哪儿？”美国大兵想知道。

“就在这里。”我回答。

大兵吃了一惊，看了一眼我们周围的废墟，又看了看我身上破旧的德国服装。“现在怎么样？”他问，“还是很难熬吧，我猜。”

我同意他的说法。

他让我稍等片刻，爬上了他的卡车。回来的时候，他用头盔装了满满一头盔的巧克力、C口粮和香烟。“我想你能用得着这些。”无需我多说我饿得有多晕，他这样说道，“这些能让你撑上一阵子了。”

我说不出此刻的感受，只能把这些宝贝往口袋里塞。街上的行人都好奇地看着我。我想要跪下来，谢谢我的黑人兄弟，但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回到车上，挥了挥手，说了句“保重，兄弟”，然后开走了。

就是在那几分钟内，我第一次被一种强烈的冲动击中，我要离开德国，去美国了解“我的同胞”。毫无疑问，我空荡荡的胃做出了决定，我要离开这该死的德国。

跟食物短缺同样严重的还有煤炭和其他能源的短缺。为了补充自己少得可怜的煤炭，绝望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像蝗虫一样涌进运煤的火车，堆场还有其他存储或运输煤炭的地方，把自己的麻袋、篮子和桶装满。他们经常会碰到警察。警察想要制止他们，经常发起艰苦卓绝的斗争。虽然我们收到的煤炭供给远远不够用，母亲和我还是决定不去偷煤，因为有一次我们差点儿就卷入了一场警察和偷煤者的争斗，他们双方都伤亡惨重。我们想，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宁愿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取暖，也好过为了一点点热气而丢胳膊少腿。

食物和其他短缺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黑市的迅速蔓延，从食物到香烟到衣服，都可以用珠宝、相机、望远镜、手风琴和其他人们尽力在战争期间保住的贵重物品来换。英军到来之后短短几天，我就看到这种全新的、极不稳定的经济力量在城市的各个街角、公园和广场萌芽壮大。德国的烟草业已经停产，美国和英国烟草迅速填补了空白，成了黑市的非法新货币，汇率高到惊人，一支香烟能换五个德国马克。

虽然黑市是违法的，但是交易者中很少有人是小说或电影里那种犯罪分子。我看到的大多数去黑市的人，基本上都是遵纪守法的男人和女人。为了偶尔抽上一支烟，吃上几口牛肉罐头，或是喝上几杯咖啡，点亮一下暗淡无光的生活，或者吃几块巧克力，在艰苦的生活中尝一尝甜味，他们放弃珍贵的结婚纪念品或者相机。接下来是小打小闹的卖家——英国大兵，想要从德国搞一点便宜的战利品，拿出自己分得就不多的几包香烟。黑市真正的受益者，大卖家，是一些肮脏的德国人，他们的秘密仓库里放着卡车运来的香烟，来自同样肮脏的英国供给军官，用来供黑市销赃。他们通常穿长皮衣，戴大金表，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是冷酷的交易者和贩子，就好像几十年后的大毒枭，指挥街头“销售员”以最大利润为他们分销商品。

我既不是烟民，也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换取食物的贵重物品，所以

一开始，我对黑市没什么特别的兴趣。然而，当一系列意料之外的事情彻底改变我的人生方向时，这一点也随之改变了。

虽然我没有正式终止我与麦克斯·罗普克的雇佣关系，但我却从没想过再回去那里工作，因为盟军宣布纳粹的强制劳动法已经失效。我决定把我沾满油污的机工工服束之高阁，准备去做点更好的事。而“更好的事”是什么，我还不知道。但我很确信，在盟军占领的新时期，我的肤色不会再像以前那样是个障碍，我肯定可以找到一条路子，养活母亲和我自己。

新事业——我的第一次演出

我一直在寻找机会，直到偶然遇见吉奥达诺先生。他告诉我，他在英军福利服务中心当钢琴师。我说我以前也是个“音乐家”，我自学过小号。“那你肯定会感兴趣，英国人还在找其他乐师给他们的驻守部队表演。”他对我说，并催我去面试。我承认自己吹得不专业，他坚持说，我肯定不会比英国人现在找的那些“冒牌货”还差。我倒是不确定。不过我的口袋和胃都空得不能再空了，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所以第二天，我把闲置了许久的小号找出来擦干净，听从了吉奥达诺先生的建议，前往汉堡火车站对面的汉堡大剧院，跟一群“音乐家”一起等在遮篷下，希望可以得到一份下午的临时工。他们穿着各异，大多数都是以前的好衣服，虽然破了旧了，但也能称得上优雅。看着我自己破旧的西装和鞋子，我吃惊地发现一个讽刺的事实——至少这一次，没人会说我配不上了。

在人群中看到吉奥达诺先生时，他跟我简单介绍了面试流程。每天中午，他说，英国人都会从这些音乐家里找出十二种乐器。“只要他们喊到小号，你就举手。”他对我说，“如果你运气好，就会被挑

中。表演结束后，你能得到一些香烟，有时候，他们还会给你茶和三明治。目前为止，我只有两次好运气，因为钢琴师太多了。”

等了一个多小时，一辆盖着帆布的英军卡车开了过来，一个军官说了他需要的乐器。他从举手的人里面选出十二个，这些人就会被带上车，不用试演也不需要排练，就会被送到汉堡城内或周边的英军驻地，给士兵们表演上一下午。

令我吃惊的是，我居然在第二拨被选中。卡车开动的时候，看到吉奥达诺先生还在耐心等待，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希望他也能有好运气。不过这会儿，我有别的事情要担心。我要怎么骗过其他的音乐家，假装自己是个高手？我们的卡车越是接近目的地——汉堡机场旁边几百个人的英军驻地，我越是后悔听了吉奥达诺先生的话来干这个。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到达营地时，我们被带到一个大木屋，这就是我们的剧场了。里面有一架竖式钢琴，旁边是一个木制舞台。军官告诉我们，下午三点整，音乐会将准时举行。这意味着我们只有半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调整我们的乐器，更别提排练了。接着军官给我们发了几张英国和美国流行的曲子的乐谱，让我们自己选一个乐队指挥出来。我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最年长的先生，一个矮胖的、戴眼镜的萨克斯风演奏者。他大概六十多岁，留着稀薄的白发，一举一动很有权威。大家都尊敬地称他福勒指挥。我听说，福勒先生以前有过自己的管弦乐队。

士兵很快就涌进了“剧场”，军官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我们的乐队就开始演奏格伦·米勒的《好心情》——很快，这首曲子就要席卷德国，非常流行。考虑到当时那种情形，乐队的表现要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好得多。然而我很清楚，吉奥达诺先生对我的信心是错误的，我显然是乐队里面最差的一个。

我坐在第一排，在福勒指挥和一个刚刚表演过一段绝佳独奏的神气的高音萨克斯手之间，不过这丝毫没有提升我的自信心。《最

后》这首曲子进行到一半，我的小号因为太干而发出一声像猪一般的嚎叫，我不得不强忍着在别人赶我下台之前自己滚下去的冲动。不过福勒先生没有嘲笑我，也没有指责我，相反，他鼓励地冲我眨了眨眼睛。“别担心。”间歇时他跟我说，“你会没事的。”就连艾迪·伍尔夫，骄傲的萨克斯手，都给了我鼓励。多亏了这些新同事的支持，我才坚持完成了第一次表演。

表演结束后，我们被带到一个长条桌前。桌上放着许多白面包三明治和甜甜的奶油茶。军官说我们可以随便吃。以我们当时饥饿的程度，根本不用多说。没有人提到钱，我一点也不在乎，因为我觉得我的付出已经得到了回报，尤其当我得知，我还能打包三明治带回去给母亲。

第二天，我又去了剧院，想要再次被“聘请”。这一次，我们被告知，还要跟前一天演出的队伍在一起。事实上这意味着，我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用每天都等着幸运女神的降临。虽然报酬少得可笑，工作环境也不很理想，但我还是很高兴。我能得到食物，还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原本似乎不可能实现的从蓝领到白领的转变。我感觉这一次命运的钟摆终于倾向了我。

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回到剧院后，福勒先生给了我一个意料之外的提议。“你已经具备了成为一个出色音乐家的能力，”他对我说，“但你自己也知道，你还有许多东西要学。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教你吹小号 and 萨克斯。”他甚至提出可以给我一个E调中音萨克斯管，因为我只有一根B调小号。我问他，上课需要多少钱，他说，“不用。你只要答应我会尽力学就行。”

我不太清楚他从中能得到什么，但我觉得这是个大转折，立即就接受了，根本都没有问他为什么要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么好。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在新老师的严格指导下，我近乎执迷地投入到小号和萨克斯的学习当中。除了每天下午在英军驻地的练习，我还花大量时间在地下室“公寓”里苦练，曲目从著名的小号乐曲《轻

骑兵序曲》到E调萨克斯曲《好心情》——福勒先生给我布置的所有任务——直到我能完全掌握。一周两次，我会去福勒先生的公寓，每次上两小时课。课上他会检查我的进步，教我，给我布置新任务。

有一天，上完了课，我正准备离开，福勒先生看上去有点紧张。“有点事我要跟你商量，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不适感越来越明显。

他支支吾吾的，仿佛在想合适的措辞。他跟我说，在纳粹统治下，为了当一个有资质的指挥家，战前不久他加入了纳粹党。战争爆发后，他应征去空军当了中尉，指挥一个军乐团。他说，不管是在纳粹党，还是当空军军官时，他做的都只是音乐方面的工作，没有任何政治任务。

盟军宣布启动“去纳粹化”项目，他说，他需要我帮他一个大忙。我是否愿意签一份文件，证明他是我家的一个老朋友，运用了他的影响力，缓解了我“在纽伦堡种族法下承受的困境”？

一开始，我不肯。为了帮纳粹逃脱罪责而撒谎，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但是看着这个可怜的老人，虽然认识不久，对我却一直像父亲一般，我开始犹豫。军事政府所谓的去纳粹化项目在汉堡已经成了一个大笑话，以前的纳粹大人物丁点惩罚都没有承受就脱了罪。我猜测，福勒先生只不过是这个小喽罗，不是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考虑到他现在所做的一切，极大地改变了我的处境，给了我盟军“解放者”们从未给我的新生活，我不情愿地答应夸大一点事实，不管后果会如何。虽然这让我觉得，他对我这么好并不是因为完全的利他主义，我有点难过，但我还是觉得，他是真的开始喜欢我，我也开始喜欢他，他对我的好是真的。

不光是我的处境好转，母亲也是。她从医院的老朋友们那里听说，因为政治原因被纳粹开除的人可以申请重新入职。花了好几天时间填写医院的表格后被通知，她可以干回她的老本行。十三年后，她

终于回到了她热爱的耳鼻喉科，受到了同事们的热烈欢迎。她以前的一个同事和好友则没有回去。那就是沃尔特·施密德曼，小艾丽卡的父亲。他因为反纳粹被关在福尔斯布特尔集中营很久，在新民主西德举行的第一次政治大选中被选为汉堡的参议员。

被抢

就在母亲和我都认为，我们俩都至少有了满意的工作，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的时候，一个灾难性的打击，又让我们的士气回到了新的低点。那天晚上，天色尚早，我刚从驻地演出回来，离家几个街区远，就看见母亲朝我跑来，泪水从她眼眶涌出，她不停地抽泣。起先我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后来慢慢地，她冷静了一点，不停地说，“一切都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听懂，她是想要告诉我，我们又失去了一切。所有的衣服、鞋子、床单、毯子和碗，自从我们的家被炸毁后，三年间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又都不见了。只不过，这一次把我们洗劫一空的，不是敌人的炸弹，而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抽泣间，母亲跟我说，不到十五分钟前，她从医院下班回家后，发现我们地下室的锁被撬开了，整间屋子都被偷得干干净净。显然是有人，或许就是某个邻居，知道白天家里没有人，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去问隔壁那对夫妻，他们说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三年前，我们还能用行李箱装着我们的行李，可是现在，我们只有身上的衣服。幸运的是，我身上还有我的萨克斯和小号。

一开始，我们想去警察局，但随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们听说过许多类似的事情，临时收容所发生了好多起抢劫偷盗事件，而警察却无动于衷。我们肯定，这次抢劫我们的人迟早会再回来，所以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快搬走。我们还顾不上沉浸在绝望之中，埃

贡·吉奥达诺的到访让我们精神一振。埃贡告诉我们，英国军事政府给他们家分了一个大公寓，就在白沙岛的一个别墅里。所以他们不再需要原先那个地下室了。如果我们想要，他说，他们很欢迎我们过去住。

多亏了那些贼，搬新家——大概十五分钟步行距离——成了小菜一碟，因为我们根本就是“轻装上阵”。“新”公寓跟我们那个一样没什么设施，不过，至少它还有个前门，可以锁上。我们又有了友好的邻居，一个四口之家。吉奥达诺一家跟我们说，他们十分乐于助人，也很值得信任。

搬过来不久后，我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离我们地下室入口处一百码的地方，我看到几个男人从周围的废墟里收集砖块，刷上灰浆，垒成快一人高的墙。让我好奇心倍增的是，考虑到他们干的这种活，他们的穿着——西装和大衣——都非常不合时宜。有些还戴着领结。我走近了一看，认出其中一个是我以前的白人老板，哈尔堡橡胶工厂的总经理。上一次我们见面，他对我说，如果我不乖乖听话，改掉叛逆的毛病，他就会让盖世太保收拾我，现在风水轮流转了。

显然，他和他的同伴们在英国的第一轮“去纳粹化”中被抓了，跟许多投降的前纳粹分子一样，他们被命令做一些苦力活作为惩罚。虽然比起我在橡胶工厂令人窒息的锅炉里汗流浹背地干活，他现在干的活要简单得多，但我还是能感受到他的羞辱感。他一认出我，就立刻别过脸去。我没兴趣增加他的痛苦，也转身走开了，留下他和他的同伴们反省自己的过错。晚上我再经过那里的时候，他们还有那堆砖头都不见了踪影。

弗里德·加斯

一天早晨，我在新家附近——一片废墟还有一栋幸存的四层公

寓楼——“悠闲”地散步，我看见一个人，长相有点与众不同，像铅笔一样干瘦，黑发往后梳着，身影看着很眼熟。走近了一看，我认出他就是柯尼希餐厅的常客。只不过那时候他经常穿德国陆军下士的军装，胳膊总是用黑带子吊着。现在他穿着战前的好衣服，好看的格伦呢子运动夹克，褐色长裤，还有时髦的白厚橡胶底浅棕色休闲鞋。

“好长时间没见了，朋友。”他打开了话匣子，“我看你也活了下來。”我们回忆了一会儿柯尼希餐厅的旧日好时光。弗里德·加斯说我们在那里当摇摆男孩的时候，他刚被俄国人的炸弹炸伤了左手中指。“我的纪念品还在呢。”他举着只剩下四根手指的左手说。

我们一边聊一边走。弗里德跟他年迈的养父母一起住在一栋幸免于难的公寓楼里。战前，他说，他曾经是汉堡著名的滑铁卢影院的男侍者。这个影院举行过很多部影片的首映，著名的影星们也经常私下亮相。他说，那个时候作为侍者，他经常有机会跟汉堡的大人物们接触，票房的票卖光时，他可以倒一些票给他们。因此他有很多人脉，如果有什么他能帮我的，我随时可以找他。他轻蔑地看了一眼我身上过时破旧的衣服，说如果我想升级一下我的衣橱，他就是最好的人选。“我想，我可以花很少的钱给你弄来一套崭新的好西装。”他建议说。

我真的很感兴趣，因为我原来的两套西装都被抢了。看着弗里德的好衣裳，我想，如果说有人能弄到好衣裳的话，那就是弗里德了。我答应他第二天去找他细说这事。

第二天就这么来了，又在弗里德“联系不上做西装的人”的说辞中过去了。再转天和接下来的几天也是如此。虽然我很不情愿放弃穿好衣服的梦想，但也不得不跟自己承认，弗里德虽然风度翩翩，却跟四月的天气一样靠不住。

若是在寻常时期，有了这一次教训，我就会让他离我远点。但在一起混了几个礼拜后，他缠上了我，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我喜欢他在

我身边，虽然他有一些小毛病。不管他的出发点是什么，一旦知道了他不靠谱，我们相处得倒也愉快，因为我觉得他诙谐、机智、有创意又好玩。不过，他说，我也不是两手空空的。我很快意识到，他也喜欢我的陪伴，因为我这外国人的长相，走到哪里都有很高的回头率，他也有机会分一杯羹了。可以说，这种相互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要说弗里德吸引漂亮女人的能力，可是不可思议、千真万确的。就像战时计划部署一样，但凡涉及美女，弗里德从不打无准备之仗。比方说，下雨天他会打着一把伞，在快要下班时，等在办公楼的入口处，紧紧盯着那些没带伞狼狈不堪的女孩。一旦发现心仪的对象，他就会提出送她到公交站，或者她要去的地方。大多数接受他提议的女孩，听完他的屁话后，都会愿意再跟他约会。

弗里德常常安排过多的约会，分身乏术。这种时候他会大方地让给我，详细给我描述女孩们的长相，把约会的地址给我，我会先去看看，如果是我喜欢的类型，就会跟她说，弗里德来不了了，让我代替他。女孩们不会生气，反倒乐意接受我这个替代品。

虽然弗里德经常吹牛，但在人脉方面，他其实是相当谦虚的。不管走到哪里，他都会受到汉堡名人的欢迎，包括舞台明星、荧幕明星、电台红人和别的大人物，都是在他当侍者的时候就跟他熟识的。每次见面，他都会慷慨地跟我分享他的五星香烟，虽然我知道，他并没有可靠的来源。

跟弗里德一起混迹于方恩酒吧和豪斯家园酒吧——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两大著名酒吧——成了我演出之余的快乐消遣。我们经常在乐队旁边显眼的桌子前集合。总是有一些充满“异国风情”的人加入我们，比方说帕拉·图巴，皮肤黝黑却英俊非常的伊朗男孩，他的哥哥们都是做东方地毯进口生意的，还有库库，古巴男孩，听说他那奢侈的生活都归功于富裕的工薪家庭。他们俩的德语都非常有限，所以我们的交谈，如果称得上交谈的话，都没什么有意义的内容。大部分

时间，他们都说一些美国音乐和穿着的最新潮流，哪些是女孩们喜欢的。有时候，雨果·蔡司也会加入我们，他才是我们之中真正的有钱人。我是在战时认识他的，他是个衣着无可挑剔的高个子，在他父亲的船代公司里工作。因为他的父亲汤姆·蔡司是在英国出生的，我们认为雨果的做派就是英国人的做派和风格。雨果开的是奔驰，跟父母一起住在福尔斯布特尔的一栋豪宅里。简而言之，他的生活方式，正是弗里德和我梦寐以求的。

想到我们相当普通的生活环境——弗里德住在一套小小的工薪公寓，而我则住在地下室，每次下雨天花板都漏水——我们在酒吧里的形象，还有人们对我们的注目，我就觉得好笑。为了撑面子，弗里德什么招都想得出来。只要有四人约会，在离豪斯家园酒吧大概三个街区远的地方，弗里德就会拦下一辆好车，开车的人通常都很体面。递上三根五星香烟，弗里德会问那位绅士，能否好心地送我们到豪斯家园，因为“赶赴重要约会的我们快要迟到了”。

我以为弗里德疯了，但还没来得及问他，绅士就让我们上车。收下弗里德的香烟后，他把我们放在酒吧门前，跟我们约会的两个女孩都惊呆了。虽然我们一路上大部分时间坐的是公交，但弗里德跟女孩们说，“我们的一个朋友送我们来的。”这一整套操作，都是为了不让女孩们知道，我们跟别人一样只坐得起公共交通。

橡胶“巨头”

一天，我去了弗里德·加斯的家，看到我平日里衣冠楚楚的伙计坐在他母亲的小厨房里，穿着一条工装裤，还有一条围裙，用一把钳子从一只女鞋里拔出断掉的鞋跟。“你究竟在干什么啊？”看到这个场面我问。

“我在修鞋。”他说，声音自然得仿佛他这辈子都在干这件事。

我想这背后肯定有故事，于是追问下去。

“还记得我那双白色厚胶底的鞋码？”

“记得。怎么了？”我说。

“我记得那双鞋底已经彻底变形了，我正要扔了，因为战后的修鞋店根本没有胶底了。”他继续说。

“对，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不耐烦地反驳。

“关系大了。”他说，然后拿起那双旧鞋，鞋底已经换成了崭新的雪白橡胶鞋底。

他接着说，有一次他偶然路过一个垃圾场，那里在卖磨损的旧汽车轮胎。他注意到一个轮胎被切了一刀，里面露出一层白橡胶。他给了几马克，垃圾场的人就给他割了一块橡胶。他做成了两个鞋底。他举起两只长满水泡的手，作为干活的证据。

“不过，这还没完，”他就像一个炫耀新玩具的小孩一样兴奋地说，“我穿着换了新鞋底的鞋，走在外面，就不停有人拦住我问，哪里能找到橡胶修鞋底。”

弗里德说，即便他说修一双鞋底要一百马克，人们也愿意。他说他干这个已经赚了一千多马克了。看到我怀疑的神情，他打开一个柜子，里面好几十双男鞋和女鞋。

“照这样下去，”弗里德热情又大方地说，“用不了几个月，我就是个有钱人了。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跟我一起干。这些活足够我们俩干的了。”

虽然我很感谢弗里德的邀约，我还是拒绝了。好不容易逃脱了蓝领的命运，我可没兴趣放弃音乐家的生活，再被拴在工作台上埋头苦干，虽然这活很赚钱。虽然报酬高，活计也清白，但当修鞋匠可不符合我对自己的打算。

令我吃惊的是，衣冠楚楚的弗里德，虽然刚刚打造了酒吧的社交

形象，塑造了一种跟我们的现实完全不符的身份，但他却毫不犹豫地投身于这个新事业当中。他母亲把他从厨房里赶走，他就把这活挪到地下室去干，从早到晚，他都在敲敲打打、涂胶和切割橡胶。如果还有力气，他就会做回旧日里衣着华丽的弗里德，去方恩酒吧和豪斯家园酒吧，口袋里塞满了马克，足够他一天抽两包烟的。弗里德的新买卖，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每个克劳斯、卡尔和伊尔斯都会来我们这桌，不是打招呼，而是问弗里德他们的鞋子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

当生意多到弗里德干不过来的时候，他就请自己八十四岁的养父来帮忙。这样一来，两个修鞋匠，爸爸在厨房，弗里德在地下室，忙着把堆积如山的活干完，再接新的活儿。这显然成了汉堡的风潮。不可避免地，当弗里德买的旧轮胎越来越多时，垃圾场的人也起了疑心。一天，他二话不说就把旧轮胎的价格从二十马克涨到了二百马克。价格涨了这么多，弗里德却能轻松承受。

我也经常被人追问，怎么才能像我一样，拥有一双骄傲的新鞋底。起初，我会介绍他们到弗里德那里去，但当弗里德和他父亲再也干不过来的时候，我不能眼睁睁看着钱就这样被拒之门外。我决定投身于修鞋事业——不过是用汉斯·马萨夸依的方式。我没有成天修鞋，而是跟我的潜在客户说，我可以给他们弄来橡胶，但他们得自己去找修鞋匠，或者自己修。一攒够“订单”，我就会买一个旧轮胎，然后切成鞋底的大小，以五十马克一双的价格卖给我的客户们。虽然我比弗里德少赚一半的钱，但我不用干什么活，除了买轮胎、切轮胎。我试图说服弗里德，我的办法更聪明，劝他也改变模式，但却从未成功。他固执地用老法子维持生计。而在纳粹的血汗工厂里干够了的我，却再也不想离开我好不容易进入的白领阶层。除此之外，我觉得我这双没有水泡的手挺好的。

喜迁新居

作为纽伦堡种族法的受害者，我为母亲和我申请一套公寓，申请了许多次却一直没成功。就在我要放弃的时候，英国军事政府来了一封信，说给我们分了两个房间，就在易北河边汉堡的高级住宅区之一奥斯马什，还说这封信可以当作介绍信。

母亲和我来到奥斯马什，那栋被炸弹炸掉了一半的三层小楼，见到了我们的新房东，弗莱明先生和太太，还有他们已经成年的儿子们，大儿子最近刚从德国海军退役。不得不收留难民，他们并不高兴，不过还是拼命地克制，不敢表现得太明显。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在英国军事政府的住房清单，因为不是所有德国人都被要求收留房客，不过我一点也不在意。他们毫发无伤地躲过了轰炸，财物也没受什么损失，只是出租两个房间而已，我很难对他们感到歉疚。

这两个房间都很小，而且不在同一层楼，但它们至少是在地面上，屋顶也不漏水。对母亲和我这样像老鼠一样生活在臭烘烘、潮呼呼、阴冷不堪的地下室里的人来说，它们意味着回归文明世界。仅仅是可以光脚走在干净的木地板上，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走在硬邦邦、潮乎乎、冰冰凉的水泥地面上，对我们来说就是难得的奢侈了。

奥斯马什，跟汉堡的大多数郊区一样，几乎没有遭到盟军炸弹的袭击。这就意味着，我们又要重新适应一下，走在完整的街道和建筑物之中的感觉，而不是汉堡市区成堆的废墟之中。我也很庆幸自己摆脱了住在被炸毁建筑物废墟下满是老鼠的地下室的耻辱。有人问起我住在哪里的时候，我再也不用闪烁其词了。单单是“奥斯马什”这个词就能让别人高看我一眼。

我们的新家，离地铁站只有五分钟步行距离，去汉堡市中心只有几站地，出行十分方便。它离布兰肯大街也只有几站地铁，我去看望吉奥达诺一家的机会就更多了。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发现他们过得很好，跟往常一样，精神状态也很好。这次他们家有了喜事，添了一个小妹妹。一边哄着孩子，拉尔夫和埃贡给我讲了许多他们最近的记者活动。令我吃惊的是，我注意到拉尔夫的政治倾向有了巨大的转变。短短几个月前，他还对我们的英国和美国“解放者”们满怀热情，现在他却对他们非常愤怒，说他们剥削群众，与纳粹为虎作伥。“等你到了你喜欢的美国，”他对我说，“你很快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看过了美国城市和郊区穷人的悲惨境遇后，我有了很多机会看到资本主义不好的一面，但在当时，我对他的政治变化十分震惊和失望。拉尔夫告诉我，他已经成了德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是共产党党报《汉堡大众报》的记者。我心里确定，拉尔夫的巨大转变，是因为他憎恨盟军包庇从前的纳粹分子。我本人也是纳粹种族歧视的受害者，非常支持苏军的做法。众所周知，在他们的占领区，苏军采取铁血政策清除纳粹分子。不过我的观点太西化了，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和兴趣又太模糊，还无法分清良莠，抛弃我的美国梦。

虽然拉尔夫转投共产党阵营令我懊恼不已——共产党的口号和高压手段，在我看来，似乎跟纳粹没有什么分别，但我还是决定，不要让政治分歧影响了我们的友谊。我们携手同行是如此之久，绝不会让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类的小分歧横亘在我们中间。

阿尔卡扎

有一天，我碰见了男高音萨克斯手艾迪·伍尔夫。他邀请我跟

他一起去面试。一个年轻的指挥要组一个大乐团。艾迪说，这个指挥不喜欢比自己大的人，想要在一个月内就筹备好一切，然后去城里最大的剧院阿尔卡扎试演。我毫不犹豫地就带着我的萨克斯和小号去面试了。这个叫罗尔夫·维劳的指挥，看了我一眼就决定留下我。显然他看重我的“装饰功能”多于我的音乐才能，毕竟那时候他对我的水平还一无所知。我跟他说，我还演奏不了中音萨克斯，因为里面有许多独奏，但高音萨克斯我吹得很好。指挥把几张高音萨克斯乐谱放在我面前，让我跟着他的钢琴伴奏吹了几首美国人最喜欢的曲子。然后他说我得到了这份工作。艾迪也成了降B调高音萨克斯手。问题是，只有一个月后阿尔卡扎试演通过了，这份工作才算有效。为了确保通过，我们都同意每天练习好几个小时。

阿尔卡扎在圣保利中心，是一个洞穴式的舞厅，有一个巨大的舞台，可以升起来，表演各种节目。它有两层楼座，天花板很高，可以有许多空中表演和绳索表演。阿尔卡扎虽然不如战前辉煌，许多装饰已经褪色，但它作为汉堡炙手可热的夜间娱乐场所的地位却没有改变。

午间试演那天，我们——十五个人——几乎早到了一个小时，准备接受几个小时的考验。一个月来，我们几乎日夜无休地排练，认定易北河这一带再没有比我们更出色的乐队。因此当一个矮小精干的家伙，嘴里叼着一支烟，头上反扣着一顶帽子，说他就是阿尔卡扎的老板，想让我们演奏约翰·菲利普·索萨的《星条旗永不落》时，我们都毫无防备。“我知道你们都会识谱，也知道怎么演奏最新的美国曲子，”他咆哮着，“我一点也不在意。随便一个音乐家都能做到。我想知道的是，你们的即兴创作能力如何。我指的不是爵士那种即兴创作。如果你们想参与不同的节目，你们就应该好好想想，要随时解决意料之外的问题。有时候有些艺术家会缺席，你们就得顶上，去表演你们从未见过或听过的节目。这就意味着你们要知道如何即兴创作。”

我们面面相觑。原来，没人知道约翰·菲利普·索萨是谁，也不

知道《星条旗永不落》是什么曲子。阿尔卡扎的老板恼怒地拿下了嘴里的香烟，开始哼唱起来。我听着有点耳熟。慢慢地，我们都拿起乐器，演奏起来——一开始声音轻微，接着便越来越响，我们渐渐都能跟得上了。我们演奏到尾声时，鼓舞人心的旋律回荡在整个剧场，那个人热情地鼓掌，说我们被聘用了。“你们这些人还不错。”他夸奖说，“你们知道怎么即兴创作。”

在阿尔卡扎的大乐团里吹萨克斯，一个月挣610马克，是我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的薪水——按当时的标准来说是非常好的——足以让我做任何事了。

这份工作要求每天演奏两场，包括两个舞蹈片段，从四点到六点，八点到十点，中间有两个小时休息。这意味着，除了每周两次的晨间排练之外，我可以纵容自己睡懒觉，然后在别人都在工作的时候，悠闲地在街头溜达，像个富人一般。我这种新生活的另一个好处就是，我终于有机会跟最火的乐团一起出现在汉堡的舞台上。因为大多数女孩子都是外地来的，住在圣保利的廉价公寓里，让离家在外的她们心情愉快满意便成了乐团的首要责任。

我很高兴地发现，我的肤色，多年来被我视为我的主要麻烦，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我的资产。在我以前与德国女孩的秘密接触中，我很难摆脱被当成禁果的感觉——虽然我承认，我还挺乐意的。现在，我有了一种全新的、鼓舞人心的经历，那就是被公开、毫不掩饰地追求，因为对战后的年轻女孩们来说，黑人绝对是很受欢迎的。

多亏了我汉堡最流行的娱乐场所当萨克斯手，我又跟许多战前战时的老朋友联系上了。他们都是碰巧来看演出，才认出了我。然而所有的重逢，都不如一个星期日午场时发生的那场相聚那么难忘，那么令人心碎。工间休息时我路过酒吧，听到一个熟悉的女声在叫我的名字。我转过身，看到一个高个子红发美女，不是别人，正是格雷琴·加恩。上次看到她，还是快两年之前了，她的面容比我记忆中

更加美丽，但我也在她的嘴角和眼角处看到几丝冷酷。“你在这儿干嘛？”我问，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话题。

格雷琴说她是跟她母亲一起来的，把我带到了她们的桌前。加恩太太见到我似乎开心得不得了。“我的天，你长这么大了！”她这么说，提醒了我，自从1943年难忘的7月，汉堡大部分地方被炸毁后，她就再也没见过我。

我有许多问题想问格雷琴，有许多事情想对她说，却碍于加恩太太在场无法开口。格雷琴似乎也有同感。察觉到我们的不适，加恩太太说她要坐早一班的火车回她在郊区的家，这样格雷琴和我可以在演出结束后叙叙旧，说一说当年同住史都肯大街的好时光。

午场演出结束后，加恩太太匆忙告别，我们便去了酒吧，一叙别情。再次见到格雷琴，唤醒了我对这个初恋女孩的所有感情，毕竟她是第一个与我有过亲密感情的异性。我们无法把目光从对方身上挪开，聊了许多事情，比方说加恩太太眼中的小男孩是如何变成现在这个成熟的男人，又是什么让格雷琴的眼角嘴角平添几分冷酷。

“你知道吗？”格雷琴准备给我一个惊喜。她说，她现在也在演艺界工作，给一个魔术师当助手。在演出中，魔术师会把她锯成两半，然后把她明显断成两半的躯干合在一起。我没逼着她说出他俩的关系，不过似乎很明显，他对她来说不止是老板这么简单。

我记得我们分别时的情形，也记得她坚持要把贞操守到至少二十一岁。现在，格雷琴说她已经不是处女了。对于她的坦诚，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伤。一方面，我感到宽慰，因为一个大障碍已经被扫除。同时，我又感到深深的失望与受伤。她似乎读懂了我的思绪，突然说，“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或者未来将发生什么，你都会是我这辈子爱过的第一个男人。”

酒吧马上就要关门，我提议送她回家。她说她家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走到她家楼下后——她在这栋楼的二楼租了一个小房间——她

欢迎我上去坐坐，这可是我期待已久的。那天夜里，我们都很努力地想要重拾十四岁时初吻的那种激情，却徒劳无功。我们不得不悲伤地承认，无论我们怎么做，都无法挽回那种激情了，因为我们的天真，随着我们的成年，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告别的时候，格雷琴告诉我，她很快就要跟着她的魔术师老板一起走了。我们都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汉斯-尤尔根和格雷琴之间的伟大爱情故事终于结束了。

美国佬沃纳

一天晚上，我的乐队同事和我看到了奇特的情景。我们刚刚在演奏台上安顿好，一个侍者引着一个身形酷似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黑人朝着我们走来。他穿着卡其裤和美军野战夹克。他冲我挥手，咧嘴大笑，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三明治，里面的馅料十分丰富，我从未见过。他似乎对周围的人视而不见，在几百只贪婪的眼睛的注视下，继续把他那雪白的大牙齿挖进美味的食物里，几秒钟就吃完了。之后，他又从另一个兜里掏出一个三明治，在饥饿的德国人面前，重复了一遍刚才的动作。接着，他又从那百宝箱一样的口袋里掏出半条骆驼香烟，他抽出一包，然后从里面再抽出一根。

到这个时候，我的同事们再也忍不住了。“我敢打赌，如果你问他，他肯定会给你一包的。”其中一个说，显然是想跟着沾一点光。我心里早就动过这个念头。所以在休息时，我去了陌生人的桌前。

“我是米奇。”我介绍自己，“你是美国士兵吗？”

“不，”他回答，“我只是个商船船员，名叫斯米蒂。你怎么在德国佬的乐队里演出？”

我告诉他，我本人就是个德国佬，因为我母亲是德国人，我是在

德国土生土长的。

“我来自阿拉巴马的莫比尔。”他说。斯米蒂告诉我，他是随着阿普尔顿胜利号从纽约来的，要在港口停靠两三天。

他又点了一支烟，问我是否抽烟。我还以为他不会问呢。

“当然。”我用前几天刚学会的美国句子回答。他递给我一包几乎全满的香烟，让我留着抽。“战时在这里活着肯定很难。”他猜测说。

“现在也很难。”我对他说，“尤其是食物和香烟方面。香烟太珍贵了，你可以用香烟买到你想要的一切，”我又暗示性地说，“我指的是，一切。”

斯米蒂怀疑地看着我，接着狡猾地眨了眨眼，说，“一切？”

他又给我递了一包烟，让我帮他一个忙。“你认识合唱团那个高个子金发妞吗？”

“我认识合唱团里的所有女孩。”我吹牛说，“她叫吉尔达，是领舞。”

我很不喜欢这段对话的走向——或者说我认为的走向——因为我知道，吉尔达并不是那种女孩。

“问问她愿不愿意来这里跟我照张相。”

“那没问题。”我如释重负地向他保证，因为自己的多心而羞愧。我向吧台前的吉尔达走去。

“你想不想快速赚几根香烟？”我问她。“只要跟我的一个朋友照几张相。”

吉尔达不只是跟他照相，还跟他脸贴脸，两条胳膊环住他，他乐得合不拢嘴。这位四处走动的摄像女郎为子孙后代拍下了这一动人的画面，当然，也为阿拉巴马州斯米蒂的同乡男孩们拍下了这一幕。因为这一“麻烦”，吉尔达和我都收到了各自的纪念照，一人一包骆驼香烟，相当于我们一个礼拜的工资。

我突然有了一种慷慨的冲动，撕开一包烟给了我舞台上的同事

们。许多人都看着我做这件事，急切地等着我回去。在我回到他们中间开始工作之前，斯米蒂感谢我这么照顾他，说作为回报，他会“招待我”，如果我转天早上去他的船上找他的话。先坐摆渡船，找到阿普尔顿胜利号后，他对我说，“上船来，找斯米蒂，炊事兵。”

他说摆渡船是一艘小马达船，每小时一班，运送船员们在自己的船和港口间往返。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坐摆渡船，也不知道他说的“招待我”是什么意思，但我迫不及待地接受了他的邀请。登上一艘美国船，我觉得是仅次于踏上美国国土的好事。“明天早上见。”我答应，他说他会等我。

除了小时候上学时跟同学们出游过几次，我从来没去过汉堡港这个德国最大的港口。因此转天早晨，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路来到圣保利著名的登陆桥。那里有个大标识牌写着：

战船管理局摆渡

仅限于

美国商船人员

虽然我会的英语很有限，但也能明白像我这样的德国人是不受欢迎的。不过，我不想让原定被斯米蒂“招待”的计划泡汤，决定碰碰运气迎难而上。岸上已经有十几个人在等着摆渡船了。看一眼他们身上的美式新衣，我就知道他们是“老美”。德国人喜欢这么称呼美国人。为了不引起他们的怀疑，我小心又大胆地混进这群人中，仿佛我原本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却紧张地用眼角的余光盯着他们。他们的举止跟战前我看过的美国电影里的老美们一样。有些人在抽烟，有些则像牛一样嚼口香糖嚼个没完，有些人同时干这两样。除了一个穿海军外套和金边蓝色海军军官帽的人，其他人都穿着各式各样的便服，从厚垫肩的西装、大檐帽，还有五颜六色的领带到休闲的运动服和卡其

裤。对于只有一件旧西装的我来说，他们就好像是一个时装秀。我低头看了看自己丑陋的“运动鞋”，还有自己换的橡胶底，还有丑兮兮的说不出来的颜色的裤子和夹克衫。它们被洗得太久了，近看的话，能看到手肘和膝盖处磨得都快破了。不过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我或者我的衣着，抑或只有我这么认为。就在我稍微放松一点的时候，一个神气的小伙子，长着一张典型的美国脸，冲我走来。他穿着卡其衬衫和卡其裤、白袜子，和一双乐福鞋。他的金发梳得一丝不苟，前面的头发全往后梳，后面的又梳成了鸭尾的形状。我还没想明白他想干吗，小伙子就说，“嗨！”然后从一包新打开的烟里抽出一根给我，问我要去哪里。“阿普尔顿胜利号。”我回复，心里不停祈祷他去的跟我不是同一艘船。

我尽量少说话，不暴露自己其实是个德国人，却没能成功。

“你是哪儿人？”他问。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个穿海军军装的人就找他借火。美国脸小伙儿给军官点上火之后，他俩就聊上了，我暂时安全了。

“你是哪儿人？”军官问那个小伙子。

“纽偃。”美国脸小伙回答。

“纽偃？在什么地方？”

突然，美国脸小伙的神气不见了，瞬间变得非常无助，不停地重复他是来自“纽偃州的纽偃市”。

“你是说纽约吗？”军官纠正他。

“对啊，纽约，纽偃，管它到底是哪个呢。”

军官没有揪住这点不放，但我却对他们的对话越来越感兴趣。在我看来，一个连自己家乡的名称都说不对的人，肯定不是从那里来的。

这时候——确切地说中午了——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响了，一艘飘扬着星条旗的马达船靠岸了。雾号又响了几声，摆渡船还没有挨着

岸，一个年轻小伙举着一条粗绳子跳了下来，熟练地把船拴在大钢柱上。我故作熟练地跟在他们后面跳上了摆渡船。原本我还担心会查身份证之类的，还想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是斯米蒂邀请来的，他们会不会让我上船。幸运的是，似乎根本没人管。又等了一会儿，几分钟后，摆渡船调转船头朝着易北河中央开去，经过了布罗姆沃斯和德意志船厂。这两个著名的船厂，连同他们成千上万名工人，曾经把汉堡打造成欧洲大陆上最大的造船中心。现在它们却一片死寂，它们的吊车和钢结构都变成了生锈的废物。

美国脸小伙很快又找上了我，对现在的我来说，他快变成大害虫了。当他又递给我一支烟，我把他的危害等级又增加了一两级。“你不是商船船员？”他又开始了审问。

“对。”我承认说，“这是我第一次来港里。我去看望阿普尔顿胜利号上的一个朋友。”

“我也要去那艘船；我也有朋友在阿普尔顿胜利号上。”他承认。

聊了几分钟后，我了解到，他叫沃纳，跟他的德国母亲和弟弟住在圣保利，他的父亲是美国班轮上的事务长，但自从开始打仗，他就再也没有见过他的父亲。虽然沃纳是在柏林附近出生的，但在战争开始前，他跟母亲和弟弟在纽约市新泽西的卢瑟福生活过几年。他还说，因为他的美国血统，在海边人们都叫他美国佬沃纳。过去的几个月里，他说，他上过许多美国船，每次去都满载而归。

反复思量了他的坦诚之后，我也跟他说了我的身世。沃纳建议我别跟船上的人提起我的利比里亚背景，而要说我的父亲是个美国人。

“你只需要告诉他们，你和你母亲因为战争被困在德国，你就能搞定了。”他说。虽然我还不知道这句“搞定”的真正含义，我接受了沃纳的建议，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会对我的生活起到怎样决定性的作用。

沃纳告诉我，阿普尔顿胜利号是港里三大美国船之一，是摆渡船的第一站。“那艘就是了。”他指着远处一个黑点说。等摆渡船靠近那艘船时，它看上去越来越大，就好像一座山一样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围着这个庞然大物打转时，我看到它巨大的桨叶已经部分暴露在水面上了。这个，沃纳说，意味着这艘船快卸完货了。

我一直在想，我们要怎么才能上船。等我知道后，我吓坏了，开始在心里默默地骂斯米蒂，让我干这破事。要登上阿普尔顿胜利号，唯一的办法就是，拽着一根看上去一英里长、有木头脚蹬的绳梯往上爬。此刻绳梯正随着风前后摆动。更糟糕的是，摆渡船也在绳梯下方随海水上下漂浮。这就要求每个人要抓住绳梯和摆渡船相碰的那几秒钟机会往上爬。除了沃纳和我，还有三个船员也要上阿普尔顿胜利号。沃纳注意到我的神情，让我别担心。“抓紧了，别往下看。”他说。那一瞬间，我想跟摆渡船的船员说，我改变主意了，要留在船上。但我想起了我的纳粹校长维希德先生的话，“滚开！给有胆量的人让道。滚去跟那些胆小鬼待在一起！”突然，我的恐惧消失了，不自觉地跳了起来，抓住绳梯，一直爬一直爬，没往上看也没往下看。大概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我终于爬到顶，登上了甲板。沃纳和另外三个船员也紧跟着上来了。

“希望你想明白。一会儿见。”沃纳说完就消失在一道门后了。

“你想干什么？”一个穿着脏兮兮卡其衣服和配套金边帽的人问。

“我来找斯米蒂。”我对他说。

“斯米蒂！”那人大喊道，“有人找你！”

只过了几秒钟，斯米蒂就出现在刚才沃纳消失的门后。他穿着一身白衣，还有一条脏兮兮的围裙。“你真的来了。”斯米蒂伸出大手欢迎我，“你正好赶上吃大杂烩。”

他让我跟着他，沿着一条狭窄的过道走了几步，碰上几个船员，来到一个小房间。房间里面有一张长条桌和几把固定在钢地板上的椅

子。“这是船员餐厅。”斯米蒂说，“船员们就是在这里吃饭。”

接着他带我来到一个我看着像是厨房的地方。“主厨，我想让你见见米奇，他是我的朋友。”他对一个块头巨大的黑人说。跟他一比，斯米蒂就算是正常块头了。跟斯米蒂一样，他也穿一身白，不过他戴着一顶大厨师帽。“这位是主厨，我的老板。”斯米蒂说。

“你好，米奇。”汗流浹背的巨人一边用毛巾擦脸擦手，一边欢迎我。

“给这孩子来个全套怎么样，主厨？他已经好几年没吃过一顿饱饭了。”斯米蒂说，还跟我解释说，“全套”指的是一大盘食物，菜单上的菜都有。

“来吧。”主厨回答。

斯米蒂让我去船员餐厅坐着。过了一会儿，他端了一个大盘子放在我面前，上面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食物——土豆泥，猪排，肉丸，煎荷包蛋，还有许多不同种类的蔬菜，全都浸在肉汁里。我跟斯米蒂说，我得给母亲带点吃的，他让我别担心，厨房还有的是呢。“我可以给你打个包，你好带回去给你母亲。”斯米蒂说。唯一妨碍我享受大餐的障碍也被消除了，我开始埋头大吃。很快，别的黑人船员都围在桌前，笑嘻嘻地看着小山一样的食物是怎么在我面前消失的。

我帮斯米蒂收拾完船员餐厅，他请我去他的船舱，他跟一个高瘦、留着山羊胡的人同住，斯米蒂跟我介绍说，他叫斯利姆。斯利姆来自得克萨斯的加尔维斯敦。狭小的船舱里只有两个铺位，斯利姆坐在其中一个铺位上。透过舷窗，我能看到港口和汉堡的海岸线在午后的阳光中闪耀。“过得怎么样啊，我的朋友？”斯利姆问我。

我开始注意到，美国人——尤其是我遇见的美国黑人——说的语言，跟我的英语老师们哈登先生、纽曼先生和芬克小姐教的英语完全不同。在斯米蒂的催促下，我跟他们讲起在希特勒的统治下我过的是什么日子，斯利姆时不时打断我，说些“我喜欢”，“你敢相信吗？”，

“受够了”，还有“这也太过分了”之类我听不太懂的话。

接着就到了我发问的时候。从我还是个孩子，可以读《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时候，我就知道黑人在美国遭受的虐待。后来我又从报纸的文章上了解到许多关于种族暴动、私刑和黑人的事情。不过，我从没有机会得知最直接的事实。当我问起这个躲不掉的问题，“黑人们在美国过得怎么样？”两个人都异口同声地说，“像屎一样！”然后，他们跟我解释，在北方的城市，诸如纽约、芝加哥还有底特律，还“算一般般”，但到了南方——“不管是哪儿”——都是“婊子”。

“你们跟船上的白人相处得怎么样？”我问。

“我们不跟他们相处，”斯米蒂回答，“我们干我们的活，只跟自己人玩，他们干他们的活，跟他们的人玩。换句话说，”斯米蒂总结道，“我们不搞他们，他们也不搞我们。”

斯利姆告诉我，这艘船上好多“疯子”，都是南方来的歧视黑人的白人。他建议我躲着他们，像躲瘟疫一般。“这艘船的船长，是个狗娘养的，是得克萨斯州来的疯子，我的老乡。”斯利姆说，“他讨厌我们，却又拿我们没办法，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搞我们，工会就会搞他们。我们都是全国海员工会的。”

说完了种族话题，斯利姆开始古古怪怪的。虽然船舱里沉闷不已，他却还是关上了舷窗。然后他又确认了门也是反锁的。

“你抽大麻烟吗？”他突然问。

“我什么牌子都抽。”我说，虽然我以前从没听过大麻这种香烟。不过他没有递给我烟，而是从一个小铁罐里倒出一些奇怪的像是锯末一样的烟叶。接着，他拿起一小张纸，给自己卷了一根形状奇怪的香烟。

我不理解，为什么一个美国人，想买什么牌子的烟都能买到，骆驼、好彩、切斯特菲尔德和波迈，却要那么费事得自己卷烟。斯米蒂

注意到我的不解，他问我有没有抽过“大麻”或“草”。我十分诚恳地说，我从没抽过。“茶呢？”斯利姆问。我天真地告诉他，有些德国人想抽烟又抽不到，只能把茶叶放在烟斗里，但“大麻”和“草”我从没听过。

斯利姆说，大麻、草和茶都是“大麻”的俚语。这种植物的叶子，如果抽进去，会让你像喝酒那样兴奋。接着，他点燃了烟卷的一端，开始吸那种闻上去有种奇怪甜味的香烟，还发出痉挛一样的嘶嘶声。他屏住呼吸，然后发出奇怪的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吞这种烟雾。我觉得好像过了好几分钟，他的肺快要爆炸的时候，他呼出一口气，然后又赶紧吸了一口。过了一会儿，斯利姆把烟卷递给斯米蒂，斯米蒂也照样抽了起来。等到烟卷快燃尽的时候，他们俩拼命劝说我也尝一口。

“这是我好长时间以来抽过的最好的玩意儿了。”斯利姆向我保证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了。”斯米蒂也附和说。

我跟他们说，我相信他们的话。

即便当时我并不知道，在执行联邦政府任务的美国商船上吸食大麻是重罪，会让我们都进大牢，我也没有丝毫想要尝试的意愿。我只是觉得，这两个船员的古怪举止很好玩罢了。

斯利姆要午睡，斯米蒂和我准备回岸上了。那天是星期天，是我休息的日子。我跟斯米蒂保证，我会带他在城里转转。“城里”指的是圣保利，也就是港口区域。我们离开船舱的时候，斯米蒂“招待了我”，给我打包了一大盒吃的，让我带给母亲，还有一大包衣服，包括一套崭新的卡其装、一套白色内衣、几双白袜子，几条我见过的最花哨的领带，还有一整条切斯特菲尔德香烟。

我不知道要跟斯米蒂说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他。光是香烟，在黑市上就值一千德国马克了，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多，给我的

食物更是无价。我跟斯米蒂说，我报答不了他的好意，他让我别放在心上。但我会永远记得。

为了不错过晚上七点的摆渡船——据斯米蒂说，这是最后一班回岸的船了，我们急匆匆地来到甲板上，好几个船员，包括主厨在内，都已经等着我们了。我注意到，等待的有两拨人，一拨白人，一拨黑人。想起我们在斯米蒂的船舱里说到的种族关系，我意识到，他们这样分拨绝不是偶然的。

快七点的时候，我们听到几声雾号，看到摆渡船全速朝我们开来。幸运的是，这一次舷梯已经放下来了，我不用再爬一次绳梯。就在马达船开到我们的船边，我们往下走时，沃纳跟两个白人船员一起出现在甲板上。他也拿着打包盒，我想肯定跟我的一样，也是人家的“捐赠”。想到斯米蒂之前说过的，“我们跟我们的人玩，他们跟他们的人玩”，我便留意跟他们保持距离。可是一到摆渡船上，沃纳就走到我身边，指着我的打包盒，笑着小声说，“我看到你也收到了一些‘关爱’盒呢。我说过你能搞定的。”

我告诉他，我要带斯米蒂好好玩玩，却不知道带他去哪里玩。沃纳建议我带他去伯恩哈德诺奇大街的哈姆斯酒吧。“那里的节目多得他玩不过来。”沃纳说。他接着说，哈姆斯的女孩们都是妓女，不管长得怎么样，“速战速决”是一包香烟，加到五包的话就可以留下来过夜。“你们到那儿的时候，找汉娜诺尔。”他说，“她会打点好一切。假装你是美国船员。如果你说你是德国人，她们理都不会理你。”接着沃纳提醒我千万别去街角那家爱尔兰酒吧。“那里是只有美国人才会去的地方。”他说，“你去那儿只会挨打。”

“那你去哪里？”我问。

“我要带两个南方疯子去爱尔兰酒吧。”他说，“这可是公事。”他一边指着自已的打包盒一边说。

他看到我的一个袋子里放着一条切斯特菲尔德，建议我打开包

装，把整包的香烟分散地装在我的袖子里。“每个船员可以带一整包，还有一包打开的香烟。”沃纳说，“我们不得经过英国兵的盘查。英国佬不怎么抽烟，他们特别讨厌美国烟。你只要给他们一包，他们就不会再管你。”

我把这条珍贵的信息传达给了斯米蒂和其他船员，他们迅速地用这个法子藏起了各自的香烟。

到了岸边，我们得登记经过一位表情冷酷的英国宪兵，他戴着白手套，系着白腰带，还有白色的枪套，他的眼睛在红帽子下面盯着我们。我们每个人都递给他一包香烟后，他的脸上迅速笑开了花，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你们好啊，美国佬们”，然后就让我们过去了，不再多查什么。

我顺利地找到了哈姆斯酒吧，它离停船处很近。我们一进去，一位手风琴师就演奏了一首美国曲子，显然是想暖暖场子，毕竟里面除了六七个年轻女孩之外，几乎是空的。女孩们围坐在一张桌子前，显然是在等着好戏登场。她们看着我们和我的打包盒的眼神，说明我们就是她们想要的那种“好戏”。一个侍者把我们领到她们旁边的桌子后，她们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坐过来。斯米蒂本来打算把她们全请过来，不过我跟他说慢慢来。

这群女孩，有些还不到十八岁，在青涩的我看来，她们非常健康，一点不像妓女。她们似乎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没有人会德语，因为她们大声讨论我们身上吸引她们的地方。一个女人说，她从没跟肤色很黑很黑的老美上过床，因为她怕他们。“怕什么？”另一个问，还说她觉得黑人们也不是那么黑。

我把这些对话翻译给斯米蒂听，他笑得快抽筋了，笑声把角落里那桌的谈话声都给淹没了。“你是说这里的所有女人都是妓女？”他难以置信地问。

“每一个都是。”我回答说，就好像我对圣保利的夜生活了如指

掌似的，实际上我也是刚刚才有了一知半解的。

我没敢说德语，而是用英语跟侍者说，我们在找汉娜诺尔。“汉娜诺尔就在那里，红头发高个子那个。”他指着旁边桌上的女人说。

“你能叫她来一下我们桌吗？”我一边问，一边拿出一包打开的香烟。侍者很乐意地照做了。

汉娜诺尔是个三十多岁的红发美女，有着惊人的大长腿和轻微的对眼。我跟她说是美国佬沃纳让我们来找她的，她立刻变得热情，还坐了下来。“美国佬沃纳和我是老伙计了。”她用蹩脚的英语说，“你跟汉娜诺尔说你想要什么，汉娜诺尔会尽力帮你。”

我没再兜圈子，用带着美国口音的蹩脚德语跟她说，“斯米蒂和我是阿普尔顿胜利号的。斯米蒂在找一个真正友好的漂亮的姑娘，带他好好玩玩，再赶明天早上六点的摆渡船。”

“你呢？”汉娜诺尔问。

“我上次来已经有一个姑娘了。”我骗她说，我着急回家，用阿普尔顿胜利号上得来的宝贝们给母亲一个惊喜。

汉娜诺尔想知道斯米蒂喜欢什么样的女孩，他给出的描述——红头发，高个子，大长腿——越来越符合汉娜诺尔本人，她很快就抓住了这个暗示。“好吧，你看我怎么样？”她问。

斯米蒂笑得合不拢嘴。“你挺好的，宝贝——挺好的。”

汉娜诺尔没再废话，直接把椅子挪到斯米蒂旁边，跟其他女孩表明，至少现在，斯米蒂是她的男人。

渐渐地，酒吧里的女人和美国黑人船员越来越多，包括许多阿普尔顿胜利号上的。有些船员后来坐到了我们这一桌。斯米蒂瞥着身边的红发尤物对他们说，我把他照顾得非常好。他们非常吃惊，问我是否也可以为他们施展“魔法”。在汉娜诺尔的帮助下，这根本不是问题。因为男人和女人都不挑剔，只花了几分钟，斯米蒂的朋友们就有了配对的女人。

整个晚上，我看到白人船员走进酒吧后，看到眼前这种种族混杂的场面都非常吃惊。在寡不敌众的情形下，他们都非常聪明地不出声反对，但他们的表情都毫无疑问地暴露了他们的心思，白人女性——即便是妓女——也不应该跟黑人混在一起。

看到斯米蒂和他的同伴们都知道了大概的注意事项，并且都安顿好了，我很满意，又一次提醒汉娜诺尔，千万要让我的朋友赶上转天早上六点的摆渡船。然后我告诉斯米蒂，转天下午我再去船上找他。我拿起藏在椅子下面的“宝贝”，祝愿他们有一个愉快的晚上，然后回家了。

我决定翘了第二天在阿尔卡扎的班，去阿普尔顿胜利号。艰辛的生活早已经教会我抓住任何一个机会。

第二天，我穿着崭新的卡其衣裤来到码头边，想赶中午的摆渡船。美国佬沃纳，我的新朋友，已经在那里等着了。看到我的转变，沃纳热情地称赞我。“你现在看着像是真正的老美了。要不是认识你，我都要被你骗过去了。”

我们又登上了阿普尔顿胜利号。像上次那样，沃纳和我按肤色分别去找了我们各自的朋友。

斯米蒂那天晚上要值班，所以邀请我留在船上过夜。斯利姆说 he 可以去隔壁船舱里跟同事挤一晚，我可以睡他的铺位，我接受了他的邀请。睡觉前，我羡慕地听他们讲述他们在世界各地不同港口发生的趣事。

我已经脱了衣服，舒服地躺在斯利姆的铺位上，突然听到一阵响亮的敲门声。斯米蒂打开门，一个船员说，船长已经得到消息，船上有未经授权的人，他要求他们立即下船。我知道，这说的只可能是沃纳和我。

斯米蒂因为这突发事件向我道歉，却也催着我尽快穿衣服离开。在甲板上，我撞见了沃纳，显然他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实际上，船

长就是被他惹毛的。

好像是沃纳独自在甲板上闲逛，一个身穿脏卡其衣裤的男人问他在干吗。美国脸小伙沃纳，以为他是帮着卸货清理船舱的德国工人，于是自作聪明地回答，“关你什么事？”这下可把那个人惹怒了。他不停地大喊，“滚下我的船，你这个狗娘养的！”都到这时候了，沃纳才明白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原来这个脏兮兮的工人不是别人，正是阿普尔顿胜利号的船长。

斯米蒂说过“这老头是个混蛋”。现在看来，这么说还是太保守了。就在沃纳和我冻得瑟瑟发抖，在甲板上等当天最后一班摆渡船时（差不多半个小时才能来），一个年轻的船员通知我们，船长想要我们“立刻”下船。船员建议我们，如果不想被船长扔到海里去的话，最好是趴在绳梯上等摆渡船。我们不想考验船长犯谋杀罪的胆量，只能不情愿地爬上绳梯，冒着生命危险在夜间的寒风里摇摆，直到胳膊都麻木了，还吊在易北河的上空。最后，仿佛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摆渡船终于来了，我们的酷刑才算到头——或者说我们以为到头了。

我们刚登上小马达船，船长就告诉我们，他要把我们放在自由港，那里离我们的目的地有好几英里远。我们身上都没有香烟，没法让他改变主意，只能在汉堡的自由港下了船。自由港是一个转运及储存免税货物的半岛。上了岸我们才发现这个港口漆黑一片，荒凉又阴冷。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我们只能朝着市区的方向走去，虽然要走上一个晚上才能到家。走着走着，看到一辆车开了过来，我们赶紧跳进路旁的沟里躲起来，直到这辆载满英国大兵的吉普开过去。我们发现，这里到处都是英国大兵的巡逻队，我们不得不时不时跳进路沟躲起来。就这样躲躲藏藏，只穿着薄卡其衣裤、累得筋疲力尽的我们，看到前方有个小屋，走近了一看，才知道是个鸡舍。门没锁，我们推开门进去，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借着火柴的微光，我们看见十几只

鸡蜷缩在一起，冲我们咯咯地叫着，仿佛在表达对我们深夜打扰的不满。

总算不用在外面受冻，不用躲着英国大兵了，我们高兴地决定在这恶臭之中与这些鸡和平共处，等天亮后再踏上漫漫的回家路。分享了最后一支烟后，我们互相靠着取暖，然后艰难地迷糊一会儿。

透过木板一看到黎明的晨光，我们就起身了。我们看了对方一眼，发现从头到脚都是鸡屎后，我们都忍不住大笑起来。尽可能整理一番之后，我们告别了这些鸡然后上路，虽然它们的味道一直跟着我们。这下路上没有英国大兵巡逻队了。

一路走来，我们路过了仓库、吊车和箱式卡车，大约二十分钟后，我们来到自由港口的大门。看到大门边有一个小木屋，挂着“宪兵”的牌子时，我们的心迅速往下沉。正当我们想偷偷溜过去时，一个睡眼蒙眬的红帽子大兵伸出头来，打着哈欠跟我们说早安。“你们这些家伙肯定是美国人。”他猜。我们异口同声地回了句“是的”。他懒得看我们从兜里掏出的纸，冲我们挥了挥手，异常开心地来了句“再见”。如果他仔细看一眼我们的“证件”，他可能会挑起一边眉毛，或者两边，因为其中一张是沃纳从一个美国伙计那里借来的早就过期的通行证，另一张则是斯米蒂写的他在阿拉巴马州的地址。

沃纳再走一会儿就能到家，而在噩运真正结束前，我还要忍受另一种侮辱。挤在开往奥斯马什拥挤的城铁上，闻着久违的气息，我不得不忍受旁人嫌弃的眼神。他们都因为恶心捂着鼻子，甚至都懒得猜我究竟遇上了什么麻烦。

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我的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惊人的转变。沃纳令我相信，我们在美国船上能赚到许多钱——也就是香烟，而我的外国长相则让我有了与黑人船员做黑市交易的机会。我开始让自己看上去听上去还有思考问题时都像美国人。很快我就凑齐了一整套美国制造的衣服，包括一双平底便鞋、一条平角短裤、

一条大领带、宽肩窄腿西服，还有几顶宽边的斯泰森帽。为了配上这一身美式打扮，我把以前精心留长的摇摆男孩发型改成了前后两边都短的小平头。

在沃纳的指导下，我学着照美国人的习惯吃东西，只用右手拿叉子，而不是像欧洲人那样左手叉右手刀。沃纳还帮我扩大英语词汇量，把英式英语改成美式英语，比方petrol、leftenant、bloke和lorry，变成gas、lieutenant、guy和truck。而我们不了解美国风俗，说话习惯等，就只能从缪斯影院经常上映的美国电影里学。这个影院在市中心，是专门给盟军看电影的，沃纳和我经常溜进去。通过这些电影，我头一次了解了美国人最爱的消遣——棒球，还有一种粗野的比赛，主要是带球，令人费解的是，美国人非要把它称为足球。

为了多练习，也为了不露馅，沃纳和我养成了只用英语交流的习惯。我们发现被当作美国人有许多好处。其中一个就是，可以免费搭乘城铁去任何地方，坐专门为盟军保留的宽敞、舒适的车厢。另一个就是，我们从德国人那里获得了更多尊重，尤其是德国官员，比方说警察，对盟军没有管辖权。他们从不像对待德国人那样来烦我们。

不过，我们的伪装也有不好的一面。有时候，不管多饿，我们都不得不忍住饥饿，对德国的户外小摊视而不见，生怕毁掉我们精心伪造的美国身份。众所周知，盟军在他们自己的餐厅里吃得太饱了，如果我们屈尊降贵地吃水煮洋白菜，恐怕没人会相信我们是美国人。

我记得有一次，假装美国人让我大大地丢了脸。那时我正送一个姑娘回家，我们是刚刚在豪斯家园酒吧认识的。她不知道我的德语最起码跟她一样好，整个晚上，她都在用战后学的那一点英语费劲地跟我交流。虽然我们之间有这样小小的“语言障碍”，不过事情发展得很顺利，我有理由相信，一段美好的关系马上就要开始了。坐地铁的

时候，因为有她在场，所以我决定还坐拥挤的德国人车厢。我跟她聊我在美国的生活，正在我说得热火朝天、她听得入迷的时候，我突然看到对面有一个老熟人，还是战时我在工厂的同事。我也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那一刻，我想过挪到车厢的另一边，避免让他认出我。不过为时已晚，我还没来得及动弹，他就朝着我走过来，大声地——我敢说，声音大得整个车厢都能听见——用一口地道的汉堡话，问我，“汉斯-尤尔根，是你吗？你这胡子，我都认不出你了。”

为了保住面子，我用茫然的眼神看着我的老熟人，用英语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熟人又看了看我，不确定是不是认错了人，摇了摇头，然后走开了，嘴里还咕哝着抱歉。我希望我能跟他说，我就是巴姆贝克的汉斯-尤尔根，可那个时候，我是美国的米奇。我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下车的时候，我的约会对象冷冰冰、毫不宽恕地盯着我。“我不喜欢被骗。”她用德语说，“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再见，汉斯-尤尔根，或者是米奇，随便你叫什么。”

“请听我解释。”我恳求道。

但她什么也不愿意听，可这真的不怪她。

她不给我机会再多说一个字，转身就走出了我的生活。

阿岳洪楼三人组

在阿尔卡扎独奏演出的休息时间，一个名叫阿岳洪楼的亚洲长相的踢踏舞者，站在舞台前，问演出结束后是否可以跟我说句话。以往我们只是碰见了问个好的关系。我很好奇他想干什么，于是答应在酒吧见他。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那里了，穿着一件优雅的灰色燕尾服，用一个长长的银烟托抽烟。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接触

他。他有着健美的体型，大大的杏眼，高颧骨，还有黑色的波浪卷长发——让小孩也爱不释手的那种。

他说他的朋友们都叫他“岳”，然后开始说，“我有个提议，对我们俩都有好处。”虽然他长得像外国人，但听上去像是个地道的汉堡人。我也突然想到，我长得也不像是喝易北河水长大的人。

岳解释说，他是二十五年前在汉堡出生的。他的德国祖父曾经是个水手，有一次去上海时，结识了一个中国小伙子，于是便邀请他来德国做客。一天，令水手吃惊的是，那个中国人出现在他汉堡的家门口。后来中国小伙子认识并娶了水手的女儿，也就是岳的母亲。在岳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外祖父和父亲就去世了，但他母亲还活着。多亏了他的母亲，他才能学习踢踏舞、杂技，成为专业的表演者。他说他已经结婚了，自愿参加德国空军，虽然他是混血，空军却接受了他。

“我想扩大我的团队，还需要两个搭档。”岳接着说，“一个可以是女孩，另一个就是你。”

我说我对踢踏舞一窍不通，他跟我说，我不用跳舞。“女孩和我来跳舞，”他解释说，“你的工作是用萨克斯给我们伴奏。”他说他已经面试了许多个女孩，有一个还不错。“找个不错的女孩并不难，”他向我保证说，“可是要找一个你这样的——长得像美国人，又能吹萨克斯——在德国，可不好找。”

岳说，他要把他的团队，阿岳洪楼三人组，打造成“音乐界的微型联合国”，一个中国人、一个德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然后他让我想象自己在舞台中央，在头顶巨大的梦幻般的镜子下，熟练地演奏萨克斯，而他和那个女孩则在两面小镜子上跳舞。在夜色之下，肯定会有几分纽约风情。

作为一个已经被“确认”的“美国公民”，我喜欢岳的想法，除了他给组合起的名字之外。我觉得这个名字既没有什么性吸引力，又增加不了票房。战后的德国年轻人喜欢的是班尼·古德曼、路易

斯·阿姆斯特朗和哈利·詹姆斯^①。虽然我尽可能委婉地指出，他还是固执决绝，说用一个已经存在的名字更好预订演出。

当他告诉我，他会把我现在的月薪翻倍，每天晚上的工作时间不会超过十五分钟，而不是现在的两个小时，我对他邀约的最后疑虑也消除了。用原先工作时间的1/8，赚得两倍的薪水，对我刚刚萌芽的商业意识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那天晚上与岳分别前，我答应他，等这个月底我的合同到期后，我就加入阿岳洪楼三人组。

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忙着排练新节目，忙着争取演出机会。通过一个剧院经纪人，岳拿到了英国军事福利中心发起的巡演的机会，也就是在中德和西德区域的英国军队营地之间巡演，如果我们能在出发前一个星期准备好试演的话。面试了几位舞伴之后，岳锁定了一个很有天赋的学生，一个十七岁邻家女孩型的金发女郎，名叫伊尔斯。伊尔斯一直把踢踏舞当成兴趣爱好，从未专业跳过。她最大的障碍是要说服父母允许她参加巡演。

在岳的不断督促下，我们三个人每天都花好几个小时排练、确定演出服装，跟编曲对曲子，轮流催剧院用品公司按时给我们送舞台架子。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我们一天都没耽搁，阿岳洪楼三人组准时在英国军事福利中心的评委会前试演，然后签下了一个月的巡演合同。我们的节目是开场舞。

再回首，我亦惊讶于自己能如此迅速地适应新的生活方式，与随心所欲多姿多彩的演艺人员相处，毕竟之前我只是灰突突工厂里最不起眼的蓝领工人而已。巡演的这几个礼拜，简直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① 本杰明·大卫·“班尼”·古德曼（1909—1986），美国著名单簧管演奏家，被誉为“摇摆乐之王”。路易斯·阿姆斯特朗（1901—1971），美国爵士乐音乐家，被称为“爵士乐之父”。哈利·詹姆斯（1916—1983），美国音乐家，著名小号手。

巴黎的夜晚

三人组巡演途中，给我印象更为深刻的站点之一便是一个叫做黑尔姆施泰特的小镇，它是苏联占领区的一个著名检查站，类似于东西柏林之间的查理检查站。我们抵达的时候，天色已晚，酒店的床位不足，岳和我被分到一家小旅馆的一个房间，而伊尔斯则被分到附近的另一家旅馆。

坐卡车长途跋涉累得要死的我们，一进房间，就听到隔壁传来的美妙音乐声和两个女人的声音。仔细检查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房间和她们的房间之间只隔着一扇门和一个衣柜。为了显示“友邻之意”，我们贴着门做了自我介绍。令人开心的是，她们也跟我们聊了起来。最后，双方一致同意看一下门有没有上锁。发现门可以从我们这边拽开后，我们——再次经过双方认可——把衣柜推到一边，打开了门。门那边的一切美好得不像真的——两个漂亮的年轻姑娘，似乎跟我们一样正“玩得开心”。她们说，她们是从卢恩堡的乡下来的，要去苏联占领区的马格德堡走亲戚。我们也告诉他们，我们是给英军表演的人，可以想办法让她们来看我们的演出。虽然她们原本打算转天早上就走的，但她们也不是特别着急，很乐意再多待一天。

很快，我们就把灯光调暗，脸贴脸地跳起舞来。让我对这段经历记忆犹新的是，弥漫在整个房间里的浓浓香水味。显然它是从衣柜上一个铁蓝色瓶子里散发出来的，瓶子上写着“巴黎的夜晚”。那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名字和这种香味会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唱片来回播放了好多遍之后，姑娘们提醒我们，已经很晚了，毕竟，明天我们还可以见面。岳和我决定绅士一点，不要操之过急。她

们答应第二天早上我们排练完后来找我们，我们便跟她们说了晚安，关上门，然后把衣柜挪了回去。入睡前，我们彼此祝贺，一定是超级棒的运气才指引着我们来到这个特别的房间。

第二天早晨，去排练前，我们在房间里蹑手蹑脚，生怕吵醒我们的新朋友。我们想她们肯定需要很多睡眠，才有精力应付我们为她们准备的节目。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排练完回到房间，发现门前的衣柜被挪到了一边，但门却是关着的，跟我们走时一样。敲门没有回应之后，我们打开了门。令我们大吃一惊的是，隔壁房间空空如也——除了空气中“巴黎的夜晚”的香味。再次且更令我们吃惊的是，仔细检查我们的房间之后，我们发现，大多数随身物品都不见了，除了几乎已经掏空的行李箱，那两个贼还算好心，给我们留下了箱子。

当我们向旅馆门卫报告发生的一切时，她告诉我们，我们出去排练后不久，那两个女人就退房了，这时候她们可能已经深入苏联占领区了。而因为东西方关系日益紧张，追赶她们是不可能的了。幸运的是，我的萨克斯和小号是随身带着去排练的，而我们演出的行头提前放到了剧院里。如果这些东西也丢了的话，我们的演出就彻底泡汤了。

岳和我气得大喊大叫，却又不得不勉强承认，我们两个文雅又成熟的男人居然被两个老练的乡巴佬骗了。我们都说不好，让我们更痛苦的是受伤的自尊还是财物损失。但和以前许多次逆境一样，我们终于克服了不幸的困难，与“巴黎的夜晚女士们”经历了从未有过的冒险。

演出之间

经过一个月非常成功的巡演，阿岳洪楼三人组回到了汉堡。我们知道，一个月后，我们还要继续踏上征途。我们的搭档伊尔斯，因为

父母勉强同意她跟我们巡演，结束后只能回到原来邻家女孩的角色。赚钱成瘾的“老板”岳，回到黑市干起了老本行，在家当好丈夫。我则重拾以前的爱好，在汉堡港里寻找老美。

我联系了老伙计沃纳，他说我回来的正是好时候，有一笔大买卖，帮一个美国船员把二十条美国香烟带上岸，也就是走私。这个船员需要用香烟来支付一部崭新的价值四百美元的徕卡相机，卖家是个德国男人。沃纳说，船员提议给我们六条香烟，当作辛苦费。

我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份活。我从没觉得我是要做什么不道德或不光彩的事。毕竟，每个人，我说的是每个人，都有过黑市交易——老太太们会上好的银器换香烟；年轻的女人们会为了一包好彩香烟跟老美过夜；受人尊敬的商务人士们不要珍贵物品的兑换券，而要香烟；德国警察会勒索黑市的贩子们，给自己谋几盒香烟；还有，英国和美国船员、士兵会用香烟来换德国人的相机、金表、望远镜、订婚戒指和其他值钱的东西。

因此我早就没有什么道德观念，只想尽力在不被抓到的情况下顺利地完成任务。沃纳的计划，不只是走私，还要行贿。沃纳觉得，我们的任务要成功，就不能有任何突发状况。他想确保我们不会因为走私而惹上麻烦。为了实施这个计划，我们立刻去了一趟岸边的英国宪兵哨站，跟一个值班的下士愉快地聊了起来。这个红头发的苏格兰士兵羞涩地说他的朋友们都叫他金杰，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美国迷。我们问他，假如要把“几包”香烟从“我们的船”带上岸，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假如要这么做，最好的时机就是第二天的某个时间段，因为那时是他值班。我们给他一包烟，感谢他给我们这条宝贵的信息，说好了第二天再来找他。

二十四个小时后，大概在中午，我、沃纳和一个来自布鲁克林名叫杰夫的黑人船员下了摆渡船，来到登岸点，我们的袖子里藏了许多香烟，心脏都紧张地狂跳。除了藏在袖子里的烟，杰夫还拎着两个鼓

囊囊的帆布袋。

金杰的确在值班，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士兵，他没跟我们说过这个人。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我们被出卖了。但就在我们还没拿定主意，是跳回摆渡船还是去面对两个英国兵的时候，金杰冲我们招手，让我们去他的岗亭。他跟我们说，另一个大兵跟他一样“没关系的”，我们可以通过了。长长舒了一口气，沃纳递给金杰两条香烟，我们就愉快地上路了。这个任务最难的部分已经过去了一——抑或只是我们这样认为。

我们刚在高架桥下朝着罗丁斯市场的方向走了大概五分钟，便注意到三个穿黑大衣的男人远远跟着我们。其中一个大喊，“停下！警察！”“快跑！”沃纳喊道。他故意落在杰夫和我后面，为的是让我们几个人看上去不那么可疑。德国便衣警察作势要追他时，他从外套里掏出六条香烟塞给我们。就跟事先排练好似的，杰夫和我接过香烟就跑。我们最后瞥了一眼沃纳，看见他引着警察往相反的方向跑去。显然是追我们的人意识到德国警察对盟军没有管辖权，只能放弃杰夫和我。除了对沃纳感到遗憾，我们为他做不了什么。我们在市中心的街道上闲晃了许久，甩掉了可能跟着我们的警察，来到徕卡相机的主人所在的地址，完成了交易。他们双方都很满意。杰夫最划算，用二十六条香烟换来了一台四百美元的徕卡相机，而他在船上的小卖部或者食堂买这些香烟时，每条才花了七十五美分。

那天晚上，在确保杰夫和他的徕卡相机安全回到船上后，我带着六条稍微有点压变形的香烟回到了我在奥斯马什的家。我很难把其中三条香烟看做是我非法交易的“赃物”，我觉得那是对我危险工作还有纳粹曾经令我受的苦的补偿。然而我的确想过，我一个下午就赚到的这三条美国香烟，在街头价值三千德国马克，快赶上我在阿岳洪楼三人组三个月的工资。这种快钱似乎说明我正走在暴富的路上了，但事实远非如此。美国的香烟，跟它们的来源——港口的美国船——一样，很少，间隔又久，因此我这份工作是有时无的，我的生活从饥

荒到大餐，然后又回到饥荒。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这份额外的收入令母亲和我在战后的日子好过了许多。

沃纳被德国警察带走的第二天，我去了他家附近，想看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本来以为会看到他被关在局子里萎靡不振，谁料却看到他站在他家门前，咧着嘴笑，一点事情也没有的样子。他大说特说了一通，原来他被带去警局几个小时后，那两个警察的上级说没有香烟作为证据，他们立不了案，只能把他放了。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警告他要小心一点，因为下次可能就没这么幸运了。我告诉他，他那三条香烟在我家里很安全的，他说他要低调一段时间，我们暂时都要离美国船远一点，直到风头过去。

美国兵乱

我们这段时间远离美国船的决定，只是空谈，因为港里没有一艘美国船。这一点从岸边没有了妓女这一可疑事实也能轻易看出来。只要港里还有一艘美国船，圣保利的夜间（或者日间，取决于她们上哪个班次）女孩们都会成群地出没，汉堡和纽约之间的小道消息在她们之间传得飞快。

沃纳和我小心翼翼地避开码头，因为那里到处都是烦人的军事和城市警察，我们决定去常去的岸边碰碰运气。没有了美国船员，我们只能把眼光放低一点，跟朴素的英国兵，或者更加穷酸的希腊兵试一试。在我们这个非常特殊的行业里，我们很快就发现，乞丐是没有资格挑食的。不过，在跟英国兵试着搭过几次讪之后，我们放弃了，只能说我们的心走不到一块去，跟他们没什么缘分。

走进爱尔兰酒吧的地下室后，我们看到一个美国黑人大兵坐在几乎空无一人的酒吧里。作为这里仅有的两个黑人，美国大兵和我握

了握手，做了自我介绍，接着我把他介绍给沃纳。他的名字叫唐纳德·帕特森。他告诉我们，他来自芝加哥，接下来他要回驻地格拉芬沃尔，就在巴伐利亚州纽伦堡市旁边。

唐纳德很健壮，但个子很矮，大概只有五英尺六英寸，宽肩，窄腰。他的肤色是中等黑度，眼睛乌黑，鹰钩鼻，嘴唇又大又厚，上唇上方想留出胡子，却很稀少。

从一到十，沃纳和我想加入美国部队的愿望大概有十一那么强烈。因此我们几乎用羡慕和崇拜的眼光看着他橄榄色的军装——斜压在右眉上的软帽，锃亮的战靴，领子上亮闪闪的铜徽章，还有艾森豪威尔式的紧身夹克衫。我们想不出任何理由不愿成为他那样的人。当然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当美国兵意味着什么。在我们的幻想中，它意味着穿神气的军装，有许多好东西吃，有许多烟抽，有许多女孩可以睡，可以开大吉普，不用走路。

当唐纳德问起这个躲不过去的问题：我，一个黑人，在汉堡干吗？我简单跟他说了我的背景，当然是跟真相不一样的——我的父亲是美国人，而不是利比里亚人。我发现，这个“小小的善意的谎言”决定着我得到的，是兄弟式热情的接纳，还是不受欢迎的陌生人式的拒绝。没过多长时间我就发现，我在二战过后不久认识的大多数美国黑人都认为非洲人和非洲很落后，因此会令人难堪。因为他们上几代人都是非洲奴隶，所以他们宁愿别人不要提起他们的过去。经过理智思量，我决定不把我的非洲血统告诉这位来自风城（芝加哥）的黑人兄弟，因为我不想失去这个搭建互惠桥梁的机会。

唐纳德似乎对我的故事很满意，尤其是关于“我的亲戚们都在伊利诺伊州的巴林顿”这部分。

“兄弟，那里离芝加哥西北边只有四十或五十英里。”他说。我是听他说的才知道这一点，但我装得好像早就知道了一样。唐纳德说，他还有三天时间，不介意在汉堡多待一会儿，但他的香烟快要用

完了，过不了什么“开心的日子了”。

“你还剩多少烟？”我问。

唐纳德坦白说他还有两条香烟，沃纳和我跟他保证，有了我们，这两条香烟足够让我们三个人都能过上“开心的日子了”。

当唐纳德同意加入我们的时候，我很高兴。跟他一起混，我就有了绝好的机会，更多地了解我梦想的国度——它的风俗习惯、语言和种族态度，还有流行什么，不流行什么。我还发现，在公共场合跟穿军装的美国士兵在一起，能增加我“美国人”身份的可信度。

喝完东西后，沃纳和我把唐纳德带到城市热门的地方，从方恩酒吧到豪斯家园酒吧。因为占领汉堡的是英军，所以汉堡的美国兵很少，我们这样种族混合的组合更是走到哪里都成为焦点。无论何时，遇到熟人，我都跟他们介绍唐纳德，说他是我从芝加哥来的表哥。除此之外，我不能要求太多了。唐纳德似乎很骄傲在德国有个表弟，就好像我也很骄傲在美国有个表哥一样。

唐纳德不得不回格拉芬沃尔的那天，他邀请沃纳和我一起去。我们问他，没有车票，也没有任何授权文件或者护照，我们要怎么跟他一起去，他说，“让我来操心这些，我来跟他们说。”懵懵懂懂地，我们就登上了去纽伦堡的火车，坐的是专门给盟军保留的车厢。当一个军官找到我们，要求看我们的证件时，我们紧张极了。唐纳德说那是一个美军中尉。唐纳德跟他简单地说了几句，说他可怜的表弟和他的美国朋友是怎么在战时被困在德国的。军官显然被打动了，热情地欢迎我们上车，还让我们自己随意些。我们照做了。在全套美式待遇下——抽美国香烟，读美国杂志，听火车广播里美国大乐队的音乐，在餐厅里吃美味的美国食物——我们奔着纽伦堡去了。为了不露馅，为了不被赶下车（像从阿普尔顿胜利号上被赶下来一样），我小心翼翼地遵从沃纳的建议，只用叉子吃饭，而不像欧洲人习惯的刀叉并用。

就这样舒舒服服地，我们抵达了纽伦堡火车站。站里挤满了黑人和白人美国兵，还有少量的英国兵。走到大街上时，唐纳德让我们站在路边，他伸出右胳膊，冲着车流的方向竖起大拇指。“你能告诉我，你在干吗？”我问。

“我想搭个便车。”他还没来得及跟我们说当时美国人搭便车的习惯，一辆吉普车就停在了我们面前。

“你们是回营地的吗？”一个白人军官问。

“是的，先生。”唐纳德回答。

“上来吧！”军官说。

军官提醒我们坐好了，猛踩油门，汽车像蝙蝠一样嗖地飞了出去。很快我们就把纽伦堡甩在了后面。在一条双车道的鹅卵石乡村公路上开了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了格拉芬沃尔美军基地的大门口。一个戴白头盔的宪兵在一个玻璃哨岗里敬了个礼，没有找我们要身份证，就让我们过去了。军官回敬了礼，又往前开过一排又一排的小木屋，把我们放在一栋棚屋一样的建筑物前。门上有个标识牌，写着“营部办公室，连队A”。唐纳德跟值班的军官做完休假后报到，就把我们带到了他的宿舍，让我们看看他在家乡外的家，让我们见见他的朋友们。除了一个勤务兵，营房里空荡荡的。

沃纳和我都没有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突然之间，营房里涌进来许多大兵。可是他们穿的并不是帅气的艾森豪威尔式夹克，也没有戴船型帽——正是这两样东西让我们觉得美国兵非常神气——他们穿的都是单调的军装。他们汗流浹背的，从帽子到战靴都满是油污和尘土。显然他们一直在干一些苦力活。唐纳德解释说，他们都是信号兵，一直在挖土沟埋电缆。我们看着简陋的营房，还有穿得杂七杂八的士兵们，心里越来越清楚，在美国军队服役——我们最大的幻想——跟我们想象的要差太远太远。

虽说美国大兵们辛苦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却没

有另一个发现让我更烦心。我很快便发现，唐纳德身边的士兵都是黑人，而更令人烦心的是——我们看到的所有军官都是白人。唐纳德从未跟我们提过，在部队里黑人是如此受歧视。我想起阿普尔顿胜利号上勤务兵斯米蒂的话，说到船上的种族关系时，他说，“我们跟我们的人玩，他们跟他们的人玩；我们不搞他们，他们也不搞他们。”我没想到，也想不明白，在美国军队里，也有这样的种族歧视，毕竟他们是为了世界的民主和自由才打了这么一场仗。

我花了好一段时间才从心理上消化这一美国困境——美国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做到它“为全世界的自由与正义而战”的信条。我早就知道，美国的白人，尤其是南方的白人，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个信条，相反还对黑人犯下过许多残忍的罪行。但我却不知道，种族歧视不仅被美国政府默许，反而还公开实行。虽然我憎恨纳粹的种族歧视，但他们公然歧视和拒绝我入伍，对我来说，比起美国嘴上说着民主，背地里却迫切地把黑人招进军队，壮大队伍，然而把他们放在低级别的部队里，干着低等活，被白人奴役，纳粹至少更坦白诚实一些。我曾经幻想，美国在争取解放被压迫者的运动中获得了胜利，现在这一理想受到了严重的，也许是致命的打击。

可是，在二十岁的年纪，我是不会让这些哲学上的差异阻挡我尽可能活下去的决心。虽然跟白人士兵们相比，黑人大兵的处境非常可怜，我还是觉得，从物质待遇上来说，他们比战败的德国人却好了太多。我早就知道，我这副酷似美国黑人的长相，在被战争折磨的德国人中很有优势，所以我只能继续努力学习美国黑人的言谈举止。能够在他们的大本营里，近距离地学做黑人，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天意。

第二天早上，沃纳和我听见两个人走进营地，接着脚步声便来到木楼梯处。一个白人上尉和一个黑人军士手拿一块笔记板出现在我们面前。显然，两人是来巡查的。“你们是谁，在这儿干吗？”上尉问。

当我解释说，我的“表哥”，陆军一等兵唐纳德·帕特森，得到

一位军士的允许，让我和我的朋友在营房过夜。军官便一言不发地走了，黑人军士跟在他身后，也一阵风似地离开了。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来不及洗澡，只能匆忙地用一瓶矿泉水洗了把脸。沃纳和我都认为那个上尉的骤然离开是个坏兆头。我们猜得对。不到十分钟，唐纳德出现了。他穿着破旧的衣服，脸上表情窘迫。“对不起，你们得立刻离开。”他脱口而出，一半是担忧，一半是尴尬。“连队的队长唧唧歪歪的，说他不允许外人留在这里。”

我从未听说过“唧唧歪歪”这个词，但我知道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该怎么办？”我问。“从这走到大门都要二十分钟。我们要怎么去纽伦堡？”

“正好有个军官也要去纽伦堡。”唐纳德说，“他答应捎上你们俩。但你们得快点。”

虽然沃纳和我没想过能在格拉芬沃尔长待，但更没想到会这样匆匆离开。想起阿普尔顿胜利号上的遭遇，我们飞快地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跟唐纳德说了再见，然后跳上了那辆等着的武器装运车。它的司机，一个黑人中尉，正不耐烦地频频看表。他非常英俊，身穿军官的军装，是我见过的第一位黑人美军军官。他友善的笑容说明，他知道我们的麻烦。离开驻地时，看到守门的白人士兵向黑人军官敬礼，我心里充满了骄傲之情。

军官不断猛踩油门，比昨天那个开得还快得多。“不好意思，我有点赶时间。”军官把车停在纽伦堡火车站前，然后向我们道歉。“希望我没吓着你们。”

我们安慰军官说，这么快就到了，我们很高兴，然后就进了拥挤的车站。这样毫无准备地被驻地赶出来，我们都有点惴惴不安，也没有装成美国人的热情了。所以我们没有跟以前一样，凭着自己的长相混进给盟军专用的候车室等候，而是进了德国人候车室。这个大厅破旧不堪，没有任何设施，挤满了疲惫不堪的德国旅客，他们带着破旧

的手提箱和背包。许多人吃着自带的三明治，他们不得不从家里备好食物，因为外面根本没有卖吃的的地方。我们饿得厉害，宁愿把自尊也吞下去，想找个德国人问问，是否可以用几根香烟换几块三明治。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反而自己点上了烟，缓解腹中的饥饿。这样一来，我们立即成了人们嫉妒的对象，甚至是憎恨的对象。人们盯着我们，显然在想，有钱的美国人为什么在“他们的”候车室里。

这么想的不只他们。两个戴白色头盔系白色腰带的黑人士兵走进等候室，直接冲着我们来了。“你能看懂英语吗？”一个士兵讥讽地问我。我不知道他这么问是要干什么，他又问了一遍，“你能看懂英语吗？”

“我当然能看懂英语。”我回答，面对他的质问，我更多的是厌烦而不是害怕。毕竟，我又没做错什么——我只是换到了德国候车室而已。

“那就读一遍。”他指着墙上一个标识牌命令道。那个标识牌上写着，盟军不得入内。

我本来想随口回一句“那又怎么样”，但士兵和气地告诉我们，别让他和他的伙伴为难了，乖乖地去车站另一边的盟军候车室，那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他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会愿意待在这个“鬼地方”，跟这些德国佬混在一起。

沃纳和我也不知道这么做是为了什么。几分钟之后，我们就——违法地——在盟军候车室的USO餐厅享受“山姆大叔”的款待了。我们吃到友好的USO小姐们端来的美味而新鲜的煎饼，还有香喷喷的咖啡。这些小姐是专门为了让“我们这些男孩”感受到家一样温暖的，而这个候车室似乎是车站唯一不被士兵烦扰的地方。只是这一次，墙上的标识写的是USO——盟军专用。

我们吃饱喝足后，去卫生间解决了个人问题，决定去外面走一走，在回汉堡之前看看纽伦堡。

走在被炸弹炸毁的纽伦堡街道上时，我想起了这座城市在我人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消极的。纳粹1935年在纽伦堡召开大会，在讽刺的“自由党日”，奠定了屠杀犹太人和像我这样的非雅利安人的法律基础，也就是所谓的《纽伦堡法》。剥夺了犹太人和其他“非雅利安血统”的人的合法德国公民身份，禁止他们与雅利安人通婚或者发生性关系。

多亏了电影导演莱妮·里芬斯塔尔，她的纪录片记录下了这一事件。纽伦堡，纳粹党的官方城市，在我记忆中比德国其他城市，包括柏林在内都要深刻。作为典型的展示品，纳粹每年都会在纽伦堡举行一整周的盛大群众集会、支持希特勒的示威游行以及持续到深夜的无休止游行，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而在希特勒的“建筑师”和战时军需部长阿尔伯特·斯皮尔的创意下，纽伦堡的探照灯越发多了，成了所谓的“灯光之城”。

我在想，现在街道上经过我们的行人里面，有多少人曾经挤在人群中，对着他们敬爱的元首欢呼呐喊，确信他能征服整个世界。我紧紧盯着这些男人和女人的脸，想看看是否能看出任何一点旧日纳粹的自负，还有种族优越感。但是，无论从他们的脸上还是举止当中，都看不到任何旧日的影子。他们的表情里，只有顺从，对现状毫无质疑地接受。

我觉得，几个月前，盟军选择纽伦堡作为审判纳粹战犯的地点是非常明智的。十二名纳粹战犯被判处绞刑，包括希特勒的首席幕僚马丁·伯曼在内，尽管他缺席了审判。传言说他已经逃去了阿根廷，但数十年后，他的尸首在柏林被找到，证实了他于1945年自杀的猜测。戈林也逃过了绞刑，吞服了氰化物，传言说是他的妻子在与他吻别时喂给他的。跟希特勒死时一样，没有人公开表示悲痛——恐怕连私下的也没有。前纳粹分子还有纳粹的同情者们因为害怕祸及自身而把嘴巴闭得紧紧的，而“普通”德国人说，“感谢上帝”，想要一个痛痛快

快的解脱。

沃纳和我觉得看够了纽伦堡，决定回火车站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一路上，我们碰到三个黑人士兵，问我们为什么穿着便服。“我们是在巴伐利亚观光的商船船员。”沃纳解释说，似乎没有引起什么怀疑。

“欢迎你们今晚来我们营地跳舞。”一个士兵说。

我们没什么急事回汉堡，现在又有了探险的机会，我们赶紧接受了邀请。

士兵们驻扎在纽伦堡前党卫军营地，一套三层楼的大砖楼，不久前去的还是希特勒的精锐部队。除了消失的万字标记，营地似乎跟战前没有什么分别。

我们做好了思想准备，可能会有士兵或其他军官不欢迎我们，让我们离开。不过，每个人对待我们都像失散已久的兄弟。只有在我们快要进舞厅时，坐在门口桌子后的一个士兵拦住了沃纳问，“你确定你是黑人？”

金发碧眼的沃纳毫不犹豫、气愤地回答，“你觉得呢？”

士兵歉疚地耸了耸肩，让沃纳进去了。

巨大的舞厅里挤满了数百名美国黑人大兵和他们的德国女伴。我从未见过这么多黑人，肤色由浅到深，什么样的都有。

十几个黑人大兵组成的歌舞团还有萨克斯手走了进来，毫不费劲地吹响了美妙的旋律，我作为乐师的骄傲也被吹散了。虽然有些勉强，但我也不得不承认，我从没吹得那么好过，我得好好看看是谁。

显然，德国小姐和她们的黑人大兵舞伴们展现出来的精湛舞艺，说明他们已经练习过许多许多次了。看着年轻的德国姑娘流着汗随着被纳粹鄙视的“黑鬼音乐”起舞，我敢肯定地说，如果元首没有一枪把自己的脑袋打开花，单是看到他珍贵的“德意志女性”跟“大猩猩一样的动物”在一起，就会要了他的命。

乐队奏响了一段鼓舞人心、慷慨激昂的曲子，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曲子，还是1936年奥运会时在柏林。旋律一响起，所有的美国大兵都停了下来，沃纳和我也学着他们。一个士兵站到麦克风前，唱了起来，虽然那时候我还听不太懂歌词，但我还是带着深深的敬意听着，尤其是在最后的“……自由的土地，勇敢的家园。”想要当一个美国人的念头，从没有像那天那样强烈。

美国大兵和德国女伴们走出舞厅时，舞会结束了。我们累得筋疲力尽，当一个士兵朋友说，我们可以留下来过夜时，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我们跟他来到另一层楼，在一扇门前停下来。他告诉我们，他的两个伙伴在里面睡着了，但一个小时左右后就要起来值班。他让我们小点声，打开门，没有开灯，把我们带到两个空铺位前。“明天早上我会来找你们。”他保证说。沃纳和我累得连另外两个美国大兵响亮的鼾声也顾不得了，倒下便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那两个大兵已经不在。沃纳还在旁边铺位上睡得很香。

我懒洋洋、睡眼蒙眬地打量起屋里的一切来。这里有好几张整洁的床铺，一张小桌子，围着四把椅子，墙上有几个储物柜。看到这些柜子，我才恍然大悟。每个柜子顶上都有一个白色的头盔衬垫，每个衬垫上都有巨大的黑色标记，那是熟悉又吓人的字母MP。墙上的一排挂钩上，整齐地挂着白色腰带，还有空的白色枪套。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昨天晚上跟我们做朋友的是不当值的宪兵。

这一发现击中了我，我赶紧把沃纳叫醒，跟他说我们正睡在狮子的窝里。几秒钟，我们就完全穿戴好，在隔壁的洗手间里草草洗了把脸，匆忙地下楼，走下好几段楼梯，才出了没有了万字标记的大门。直到彻底看不到营地后，我们才敢跑起来。赶到纽伦堡的火车站时，我们本来想再去一趟盟军候车室的，但得知马上有一趟火车回汉堡后，只得作罢。

没有了唐纳德陪着，我们不得不乘坐简陋的德国车厢，而不是我

们早已习惯的盟军车厢。“需要那些宪兵的时候，他们都在哪儿？”我想着，指望会有一个宪兵来巡逻，再把我们送回盟军车厢里。可是没那么幸运。巡逻的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看上去脾气暴躁的德国售票员。他查了所有乘客的票，除了我们，显然认为我们是盟军的人，可以免费坐车。

火车上，沃纳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补觉，漫长而平静的旅程之后，我们终于回到了汉堡。

沃纳去了美国

纽伦堡之行不久，1947年的春天，沃纳给我带来了令我吃惊的消息。多年来，他一直向美国政府申请把他遣送回美国，终于收到了华盛顿的好消息。

“德国人不用再忍受美国佬沃纳了。”他咧嘴笑着说，递给我一张美国政府的文件，说经过审查他提交的文件，确凿证明了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已经由政府出资安排好了他从不来梅到纽约的行程。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信上说，不出三个月，他就要踏上回美国的路了。他还被告知，他很快就会收到汉堡的美国领事馆的通知，让他去领美国护照。

沃纳的好消息让我心情复杂。我很为他高兴，因为他就要实现他的——不，是我们的——梦想了，却又不忍看他离开，因为我们几乎形影不离。虽然我们相识的时间只有一年半，但对我来说，我们似乎已经做了一辈子的朋友。我常常幻想，有一天，我们能够一同踏上美国的旅程。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扮演着被困在德国的美国黑人，时间久了，连我自己都认为，我有权像沃纳一样被美国政府接回国。沃纳的好消息就是一个铁一般事实，一下把我打回了现实：我只

是在演戏而已，我不过是在骗别人，也骗了自己。跟我第一天认识沃纳他在我心里种下去美国发财的美梦时一样，我依旧不会得到美国政府的承认。

想到我自己的梦想——有一天我也会去美国——就只能是个梦，没有任何指望变成现实，我很难掩饰自己的失望。我明白，对沃纳来说，战后假扮美国人的日子突然就结束了。口袋里有了美国护照，他再也用不着假扮美国人了：他就是一个美国人。现在，他可以去任何一家盟军俱乐部或者电影院，乘坐任何盟军车厢，不用担心美国宪兵或英国宪兵。只要亮明自己的身份，现在，他就可以——随心所欲——以真正的老美范儿想坐哪儿就坐哪儿，而不用跟任何人道歉。

我当然不想让沃纳认为我嫉妒他的好运气，虽然我不得不承认，我想要美国政府把他的归期稍微往后推一点点。幸运的是，沃纳太过沉浸在快乐之中，没注意到我对这个好消息并不是很热心。

岳让我准备马上开始下一次为期两个月的英军福利中心在中德的巡演，我的心思很快就从沃纳身上转移了。沃纳马上就要去美国，我正好可以省略冗长的告别，也不用那么艰难地假装真心为他高兴。等我再回到汉堡时，沃纳已经离开了。他写给我的第一封信里说，他已经安全抵达纽约市，他用华丽的辞藻说，那里的一切都超乎了他的期望。

沃纳的离开对我来说是个警醒。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要走出德国，就得停止做梦，不能瞎玩，而是要开始行动。因为我跟沃纳不一样，没有合法的美国公民身份，我决定利用命运给我的一切。我绝对不会在这个毫无出路的德国再搭上我今后的人生。自从战争结束，我就试图跟在利比里亚的父亲取得联系。因为那个时候，德国和利比里亚的邮路还没有恢复，我把我的信——询问“西非利比里亚蒙罗维亚阿哈伊·马萨夸依先生”的地址——给英国士兵朋友们，托他们通过英国的邮政系统寄出去。我在信里说，母亲和我侥幸活了下来，我靠

当乐师为生，但我们依旧面临许多严重的问题，迫切需要离开德国。在近半年的焦急等待却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之后，我几乎放弃了联系上父亲的希望。

自从沃纳离开后，我去美国的梦想就成了泡影，决定再给我父亲写封信试试。我的朋友拉尔夫和埃贡·吉奥达诺，已经开始在年轻的记者中展露头角，他们让我用他们的手动打字机，我一下打印了十几封信给我父亲。这一次，我让红十字会、联合国救济会，还有驻汉堡的许多领事馆，包括美国领事馆，帮我转寄。

我又接着给我表姐玛莎（伊利诺伊州巴林顿市克拉拉姨妈的女儿）写信，还有伊尔斯表姐，在芝加哥的保罗舅舅的女儿。我跟她们都说了，母亲和我想去美国，请求她们的帮助。

毫不意外的是，我依旧没有父亲的消息，几个星期后，却收到玛莎和伊尔斯的回信。玛莎的信很鼓舞人心。她告诉我，她和她母亲一收到我的信，就去找律师问，要怎么做才能让我们去美国。不幸的是，律师跟她们解释说，德国还没有签正式的和约，只能遵守盟军军事法，因此德国没有美国移民指标。没有这样的指标，他告诉她们，从德国移民到美国是不可能的。玛莎的信结束时语气乐观，说她母亲不会放弃的，已经代表我们安排了跟国会议员的会面。

伊尔斯的信却十分不同。跟以往信里闲聊的语气不同的是，她只是礼貌地说了几句客套话，说很高兴再次收到我的信。在信纸的底部，保罗舅舅写了几句话，主要意思就是“亲爱的外甥，不管你做什么，不管在什么情形下，都别来芝加哥。”不是故意要让我失望，他解释说，而是我跟大多数德国人一样，以为美国是天堂，实际上美国人不得不拼命工作，才能换来想要的东西，而且许多东西，包括某些食物在内，依旧十分短缺。所以他总结说，我母亲和我最好还是留在德国，挺到局面好转。

母亲读了她哥哥的留言后，对这个从内心深处疼爱的手足颇感

愤怒与失望。“我们现在快要饿死了，经常吃了这顿不知道下顿在哪儿，”她生气地说，“而我这个亲爱的哥哥却好意思告诉我们，别去他那珍贵的美国，因为美国的人们不得不努力工作才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因为有些食物还是短缺。我不记得我给他写信说过我们指望不工作就能有吃的。”收到克拉拉的信后，她更生气了，因为信里说，保罗舅舅不想让我们去芝加哥的真实原因是，“他担心他的妹妹及其黑人儿子会令他在全白人的社区里难堪。”据克拉拉姨妈说，保罗在第一任德国妻子、他孩子们的母亲去世后，娶了一个南方女人，现在似乎受了她的种族观念的影响。

母亲听到这些就够了。“保罗，”她气愤地说，“已经忘掉了，二十五年前，他就是个从德国移民来的饿得半死、又脏又穷的小子。要不是我们的姐姐玛莎和哥哥赫曼，根本就在美国活不下来。现在，他倒是敢因为种族看不起别人了。不过，他用不着担心我们会令他难堪。从今天开始，我没有这个叫保罗的哥哥。对我来说，他已经死了。”

这个誓言，母亲守了一辈子。而保罗，克拉拉姨妈说得对，再也没有跟母亲和我联系。虽然母亲最后搬去了美国，二十五年间她住的地方跟保罗只隔着四十分钟车程，她却从没有去看望过他，也没给他打过电话。他去世的时候，她都不肯去参加他的葬礼。

被捕

没了沃纳在我身边给我跑腿、支持我，做起水边的生意来，一开始对我来说挺难的，但我还是克服了。然而有一天，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第一次遇上了严重的麻烦。

从美国船上下来后，我带着几个黑人船员到了酒吧，让他们找

乐子，喝酒，女人。大白天的，酒吧却挤满了人。我们到那儿还不到十五分钟，就听到尖锐的哨子声和嘈杂的喧闹声。往窗外望去，我看到路边停着许多吉普车。几秒钟后，一群穿蓝色制服、戴白帽子、佩枪的人涌了进来，他们都是英国港口管理处的人。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挑了许多美国人，黑人和白人，把他们赶出门，赶上在外等候的吉普车。不幸的是，我就是其中之一。车开了一小会儿就到了英国港口管理处，我们被告知在一个大房间里等着，然后被一个个叫到旁边的房间里单独审问。

轮到我的时候，几个军官坐成一排坐在长条桌前。其中一个命令我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放在桌上。当我把一整条切斯特菲尔德掏出来后，军官们开心地笑了，显然因为他们至少当场抓住了一个罪魁祸首。

“让我看看你的海岸通行证！”军官命令道。

“我没有海岸通行证。”我回答。

“所以你未经许可就下了船？”军官追问。

“不，我不是。”我固执地回答。

“如果你没有事务长出具的有效的海岸通行证，那你就是非法上岸，要被拘捕的。”军官教训我说。

意识到我真的没有触犯任何法律后，我开始享受跟这个傲慢的英国军官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你身上有没有什么身份证明？”军官不死心地问。

我指着我的蓝色、无照片的德国身份证，刚才我把它跟其他的东西，包括一个打火机和一包口香糖，一起放在了桌上。军官拿起我的身份证，仔细地研究起来。

“照这么说，你是个德国人，不是美国船员？”军官继续问。

“对。”我承认。

“那你是怎么搞到这一条香烟的？你是拿什么去买的？你打算用

它干什么？你知道黑市交易是重罪吗？”军官问道，以为把我逼进了死胡同。

“我没用什么去买这些香烟，”我回答，“它们是一个美国船员给我的礼物，我去他船上时他送我的。”

军官的话里开始满是讽刺，“你是说，我只要上一艘美国船，就会有人送我不要钱的香烟吗？”

“我对此深感怀疑。”我对军官说。

“那为什么你能收到，我收不到？”军官步步紧逼。

这一次我出了绝招。“因为你是白人，而我是黑人！给我这些香烟的船员是个黑人，听到我战争期间生活在纳粹德国，他很同情我。”

我的解释令接下来的审判变成了一阵难堪的沉默。另一个军官向我道歉，说他们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还说我可以带着我的东西走了，包括那些香烟。可是在我走出那栋楼之前，我身后都跟着另一个审问者，一个年轻的中尉。那一瞬间，我以为他们改变了主意，不肯放我走了，但那个年轻的军官安慰我说，不用担心。“我只是想知道是否可以跟你说几句话。”

我知道我其实并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跟着他来到一个小的空房间。他说，他的办公室收到报告，说四个“有颜色的”美国士兵逃离了在不来梅的哨岗，显然是在一些德国女人的帮助下，藏在汉堡的岸边。他说，根据这些报告，这些人犯下了一些偷窃和抢劫的罪行，十分危险。我想起，前些日子，我看见三个美国黑人大兵和三个德国女人在圣保利闲逛。碰面的时候，我们互相打了招呼，但他们没有兴趣了解我，所以我也没理会。美国士兵们，尤其是黑人大兵，在英军占领的汉堡是很少见的。所以我敢肯定，我见过的那三个大兵就是英军官方在找的。

中尉跟我说，他们怀疑那些逃兵在岸边晃荡，是想跟美国船上

的黑人船员搭上关系，然后逃走。“我知道你不认同强盗和窃贼，”军官想要拍我的马屁，“所以我觉得你可能会帮我们抓住这些人。作为回报，我们会给你出一张码头通行证，授权你不需要港口的允许就可以进出码头区域和船只。你要做的，就只是寻找那几个美国黑人大兵。”说完，他给我开了一张码头通行证，有效期一个月。他还给了我另一张纸，上面写着他的军衔、姓名和电话。“要是你看到或是听到任何消息，你可以打这个电话找我。白天或晚上都行。”他说，“只管打电话。你会帮我们吗？”

“我很乐意。”我骗他说。我一点也不愿意当犹太，背叛美国黑人大兵。他们可能只是被当做二等公民，受够了军旅生活，想返回家乡而已。我压根不相信那些“报告”说的抢劫和偷盗都是黑人士兵干的。不过，就算是他们干的，我也不想给英国人当诱饵。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把码头通行证用得得心应手，因为它让我可以自由进出码头，而不需要担心那些烦人的宪兵。所有的宪兵都在找黑人逃兵，我的肤色很快就从资产变成了严重的负债。不过，多亏了我的通行证，我可以顺利无阻地进出搜寻圈。

很快，我就收到小道消息，说四个逃兵中的一个已经被抓住了，并且被送回不来梅的分队受审，另外三个还活着，但藏在汉娜诺尔朋友们的家里。据说他们在等待时机行动。中尉有一件事情说对了。汉娜诺尔说，他们确是想搭美国船离开。她说，她的朋友们疯狂地爱上了这几个人，愿意做任何事情帮他们逃跑，但她说他们根本不是小偷。

几个礼拜后，我晚上在岸边转悠时，看到十几辆吉普车载着英国宪兵停在一栋公寓楼前。汉娜诺尔曾经指给我看过，那几个黑人大兵就藏在那栋楼里。下车后，宪兵们松开枪套，军官一个手势，宪兵们就冲进了楼里。短短几分钟，路过的人就聚在大楼入口对面的街道上。大伙儿都在议论，这是什么事情，有些人猜是来抓黑市交易的。

虽然我很清楚并非如此，却闭紧了嘴不发一言。我希望他们会扑个空，但却没那么幸运。他们进去几分钟后，就带出了三个被铐上的脸色阴沉的黑人大兵。他们一出来，就上了吉普车开走了。人群也散去，街道恢复了平静，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

我不知道等待他们的会是什么，但不管他们命运如何，我都很欣慰，我与他们的被捕并无关联。



从非洲到美国

非洲的联系

我几乎又一次放弃了收到父亲回信的希望，直到有一天，一封航空信突然寄来。因为它巨大的尺寸，还有异域风情的邮票，我想装作没看见它都难。这是我期待已久的父亲的回信。

准备打开信封时，许多矛盾的情绪像洪水一样涌向了我。这是快十八年来，母亲教我喊作父亲的人与我的第一次联系，尽管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我还只是一个小男孩，他对我来说基本上就是个陌生人。时间和距离都没能让我喜爱他。如果说我对他有什么情绪的话，那就是极度的好奇了。这个阿哈伊·马萨夸依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我这辈子听说了太多他的事，而我母亲又坚称，我各个方面都酷似他。他为什么要把我们扔在德国不闻不问，即便是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这封信是用英语打印的，开头非常简单，“亲爱的汉斯-尤尔根。”父亲说感谢我1948年1月8日的来信，得知我母亲和我都活了下来，他觉得十分欣慰，因为他很是担心了一段时间，害怕我们会死于战争。一收到我的信，他写道，他为我申请了一份利比里亚护照，准备把我接过去。为了加速进程，他让我尽快给他寄一套办护照用的照片。他说，我应该先去利比里亚，如果喜欢那个国家，他会再安排

把我母亲也接去。

接着，他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也正是我怀疑并担心已久的事情。“我很遗憾，但不得不告诉你，你的祖父，莫莫鲁，1938年就去世了。”我想起，在我还是个小男孩时，祖父是如何跟我保证说，有一天我去了利比里亚，他会给我看他当国王时的皇冠。那一瞬间，我仿佛听到他爽朗的笑声在我耳边回荡，仿佛看到我们又一次在阿尔斯特的街道上散步，用吃剩的甜瓜喂湖里的天鹅。得知他永远离开了我，我心里有一种无法修复的失去感。我接着往下读信。“因为当前的政局，”我父亲写道，“1930年和1943年间，我什么也做不了。但现在情况好多了，现任总统（威廉姆·V.S.塔布曼）对我非常友好。”

我父亲对自己的财富没有过多描述，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他现在过得挺好的，是一个企业家，主要跟丹麦做进出口贸易，比方说轮船代理公司，还有一些运输公司，包括几家柴油卡车和公交公司，还有一艘大型柴油电机客船。

他说他和法缇玛姑姑已经不来往了，因为自从她从美国留学回去后，“突然之间她认定了你祖父给她留下了几百万遗产。她没有好好跟我谈，而是跟我那卑鄙的弟弟（纳撒尼尔）一起，对我采用法律手段。直到现在，他们还在把本就少得可怜的钱花在律师身上，事情却没有任何进展。现在，她没脸再来找我了。或许等你过来了，她会跟你细说这件事。”

说完了这点“家丑”，我父亲又说，他已经联系了他的丹麦朋友和生意伙伴，哈罗德·尼森，也就是利比里亚驻哥本哈根大使馆大使。尼森很快就会联系我，安排我搭乘博恩霍尔姆号经由丹麦去利比里亚。

最后，父亲说他很快会再写信给我，他还怯生生地说，“为什么你母亲不亲自写信给我？是不是因为她已经不在乎我了？”

虽然我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去美国，但我很快就从心理上

调整并适应——至少是当时——我可以先去非洲。我母亲完全同意父亲让我先去利比里亚的计划，她早就做好了准备，终有一日，我会离开她。她一贯坚信，我应该走出德国，挖掘我的潜力，总是鼓励我追求梦想中更广阔的未来，即便那意味着我们要暂时分开一段时间。

虽然我迫切想要离开德国，但是要去非洲，我的感受还是挺复杂的。不过，跟好几个人讨论这件事后，我开始确信，去利比里亚比困在荒芜的德国要好，而且如果我不喜欢利比里亚，我还可以去美国。

收到父亲来信的几个星期后，汉堡的美国领事馆代表利比里亚领事通知我，我的利比里亚护照已经寄到了，我可以随时去取。它需要当着领事的面签署，因此不能邮寄。一份利比里亚护照将立即并彻底终结我的民族困境，在纳粹的统治下，我在这困境中生活了如此之久。最重要的是，我的护照将让我可以随时合法离开德国，这可是在战后盟军占领期间，德国人所没有的特权。

接着，如父亲所说，我收到尼森领事的一封信，通知我说我去利比里亚的行程已经安排好了。他说，博恩霍尔姆号刚刚离开利比里亚，会在汉堡港短暂停留，然后回到它的母港，丹麦的奥尔堡港。他建议我趁这个机会去见哈特曼船长，也就是这艘船的船长，讨论行程的细节。

混迹于汉堡岸边的日子里，我上过几十条美国船，登上博恩霍尔姆号时，我觉得十分自然。我发现，这是我第一次因为合法的事务走进汉堡港。

船长是个白发稀薄表情阴沉的大个子，被打断时先是不高兴，听我说了我是谁之后语气缓和下来。“这么说你是小马萨夸依啊——好吧，好吧，”他说。我不知道这里的“好吧，好吧”是什么意思，他也懒得解释。哈特曼让我准备好两个月内坐火车去奥尔堡，从那里坐博恩霍尔姆号去利比里亚。定下了离开日子，想到这么快就要离开德国，我心里居然五味杂陈，但我跟船长保证说，我会准时去奥尔

堡的。

我问船长是否认识我父亲，他在非洲过得怎么样，船长告诉我，他跟我父亲做了很多年生意，说到我以后的日子，我会过得好的。

“你父亲很有钱。”他坚持说。仿佛是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他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他让我把这个给你，让你能应付到抵达蒙罗维亚，如果你要买点东西上路的话。”

一从博恩霍尔姆号上下来，我就撕开信封数钱。里面一共有五百美元，都是十美元的票子——显然是在黑市倒换来的。我先是为父亲的慷慨而感动，后来我才提醒自己，这是他近二十年来给我花的第一笔钱。

从知道离开的日期的那一刻起，我就急切地数着日子。接着，一件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它几乎打乱了我的所有计划。

弗里德和我像往常一样在汉堡闲逛，有一天，我们在科林胡森地火车站的站台等着换车。向着对面站台望去时，我们看到两个女人，一个年轻，非常漂亮，金发齐肩，另一个已经中年，对我们来说，没什么吸引力。我们冲着年轻的女人微笑，让她知道我们很喜欢她。令我们惊讶的是，她不仅笑了，还诱人地冲我们招手。我的睾丸激素分泌开始加速，我狂热地思考着该怎么做才能不让这个天使溜走。也许用不了几秒，她要坐的车就来了，把她带到我不知道的站点，我就再也看不到她了。

突然，我有了一个主意。我指着站里的大钟，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下午四点，接着举起八根手指，又指指我自己和我们所在的站台。让我欣慰的是，金发美女也跟我打手势说她看懂了，她也会在晚上八点的时候回到这里。几秒钟后，她的车来了，接即她便消失不见。

四个小时后，我们揣测了无数遍，金发美女是否会遵守约定？弗里德和我回到站台。令我们吃惊的是，金发美女已经在那里了。这一次，她身边还有一个高个子的年轻红发女孩，身材很棒，脸却很普

通。走近了看，金发美女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漂亮。

虽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弗里德在说话，但她笑弯弯的蓝眼睛，毫不掩饰地好奇地注视着我，消除了我“她可能是对弗里德感兴趣而不是我”的担忧。幸运的是，弗里德很乐于去追求红头发汉娜。他邀请汉娜陪他去看电影，就把大好的机会留给我，让我更好地了解英格博格，金发美女。英格博格告诉我，她已经十八岁了——比我小四岁——跟母亲（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那一位）、残疾的父亲还有弟弟妹妹一起生活。

我只谈过一次恋爱，跟格雷琴，还不是一见钟情的那种。但这一次，丘比特之箭射中了我，像闪电击中了我，像龙卷风席卷了我。分别时，英格博格说，她对我也是同样的感觉。这令我对她的感觉更加强烈。我想不出理智的解释，为什么我会对一个只认识几个小时的人有如此强烈的感觉，但是在陷入感情泥潭的时候，理智并没有多大作用。

就在我想着跟身边这个天使共同建造人生的梦想城堡时，我突然意识到，再有不到一个月，我就要离开德国了。原本远行的愿望已经化为乌有。我怎么能跑去世界上某个我一无所知的地方，而把这个美丽的尤物扔在这里任由别人欣赏？那一瞬间，我甚至考虑推迟或取消去利比里亚的可能性，但我立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知道，我离开德国的机会失去了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我告诉英格博格，我在汉堡的日子屈指可数了，她开始哭泣。“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一切都太美好，好得不真实，肯定会有哪里出问题，这就是了。”她抽泣着说。

我跟她说，我们不一定要“就这样了”，将来要么等我在利比里亚安顿好后把她接过去，跟我母亲一样，要么我就回到德国。当时她听了很满意。我们决定剩下的日子里尽可能多地相处。那时候我已经没有演出合约，也早就不去岸边寻活计，我每天都没什么事干。

像一对苦命鸳鸯一般，我们在短短三个星期内似乎用尽了一辈子的情爱。英格博格把我介绍给她的家人，他们都热情欢迎了我，而我则把她介绍给我的母亲，母亲立即喜欢上了她。白天，我们在汉堡周边的森林里浪漫地散步；夜晚，我们则去亲密的酒吧或者豪斯家园。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立即受人注目，显然是因为我们不容忽视的外表差异。乐于见此的人们冲我们微笑，以示赞许，不喜欢的人也很识相地不流露出来。

不知不觉，我离开德国去非洲的日子到了。为了省去母亲和我之间痛苦而冗长的告别，我们说好了，我会从我们的公寓出发，弗里德和英格伯格会陪着我一起去汉堡火车站。我会从那里坐火车去丹麦的奥尔堡。突然，我无法忍受把母亲撇下，让她孤零零地独自生活。她注意到我的心理挣扎和犹豫，坚定地跟我说，她会没事的，我去非洲对我们俩都好。在她的安慰之下，我又一次拥抱了她，然后跟着英格伯格和弗里德出了门。我抬头望，最后一眼看见母亲在窗边冲我挥手。

我们到达车站的时候，要把我带去丹麦的火车已经在站台等候了。我立刻上车，把行李塞到铺位下面，然后回到站台跟英格和弗里德做最后的告别。几分钟后，火车开动了，我朝他们挥手，想着不知道还能否再见到他们。

达喀尔

从火车站到博恩霍尔姆号停靠码头短暂的出租车之旅中，我的脑子里想的全是，我抛之身后的还有等着我的都会是些什么，以至于没留意奥尔堡这个丹麦最大的海港，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我登上这艘七千吨的大船，总管事热情地接待了我，让一个约莫十五岁的男孩把我带到我的船舱，又告诉了我哪间是船长的私人船舱。他说，以后我

就在船长的私人船舱里吃饭，因为船上没有给客人用的餐厅。

我去船长的船舱里吃第一顿晚饭的时候，哈特曼船长把我介绍给一个名叫阿格·凯尔斯德特的丹麦小伙子。他说阿格是博恩霍尔姆号所有者的朋友和客人，也是除我之外的唯一一位客人。阿格和我一见如故。他告诉我，他刚刚上完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之前从没去过非洲，他很期待这次旅程。

直到博恩霍尔姆号驶进达喀尔的干船坞进行为期几天的维修，我们的旅程都是愉快而平静的。那些日子，白天，阿格和我会在船上闲逛，跟不当班的船员聊天，看书，或放松地躺在甲板上的躺椅里。晚上，我们会睡在各自的船舱里，虽然比我在汉堡时去过的美国船的船舱都要小一些。

平静的旅程中唯一的烦扰就是午饭时间。哈特曼船长非常注重守时，那个男孩告诉我们。所以为了让他高兴，我们至少提前十分钟就要在指定的地点坐好。

船长虽然长得像圣诞老人，但实际却是个毫无幽默感、阴沉的人。他似乎很不喜欢跟两个他毫无兴趣的小伙子一起吃饭，毕竟那是他难得的清静时间。因此，饭桌上的闲谈也变得黏黏糊糊，基本上只说些天气越来越热之类的话。船长注意到我越来越爱出汗时，乐呵呵地建议我，“你最好是赶快习惯，因为你要去的地方，比这还热。”

不知为何，我觉得，哈特曼船长并不是很喜欢我。我只能说，这种感觉绝对是相互的。

在海上漂了许多天后，我们看到的第一片陆地就是加那利群岛。一个船员跟阿格和我解释说，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去美洲探险时，还有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发动民族革命时，都是以加那利群岛为基地。“现在，我们离达喀尔，”军官鼓舞人心地说，“就不远了。”

博恩霍尔姆号停靠在达喀尔港的码头时，我第一次看到了期待已久的非洲。从博恩霍尔姆号的甲板往下看，旁边一艘船正在卸货，

我看到一行奇怪的、队伍长得似乎没有尽头的细长身影，头上扛着一大袋灰色粉末状物体，朝附近的卡车走去。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细长的身影是近乎全裸的工人，而从头到脚沾满全身的东西是水泥。

虽然热浪扑人，但他们还是响亮又和谐地吟唱着，他们的脚也跟着韵律在呛人的粉尘里挪动。他们似乎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悲惨处境，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有多可怜。时不时地，一个穿卡其布衣服的黑人监工会把水浇在他们身上，水泥冲走后，乌黑发亮的皮肤就露了出来。那些年轻人，有的还只是十几岁。

令我震惊的是，这些年轻人，本该在玩耍与上学的年纪，却在如此残忍的环境下工作，很可能只能赚到少得可怜的薪水。

“那么，现在你觉得非洲怎么样？”哈特曼船长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当我告诉他我对眼前这一切的感受时，他却提醒我不要轻易下判断。“你的父亲有一队劳工，有些年龄比他们还小。你很快就会知道，是它让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有钱的人。”

船长的话并没有让我对父亲的感觉好一些，但我决定保留我的判断，直到我有机会亲眼看见。不知为何，我怀疑船长跟我说这些的动机，虽然我想不出任何好的理由来质疑他的话。

那天下午，三个跟我要好的丹麦船员邀请我跟他们一起上岸。我愉快地接受了，因为我等不及要踏上非洲母亲的土地。因为我的非洲血脉，对于非洲的形象，我既不赞同欧洲中心国家的“黑色大陆”，也不赞同好莱坞的泰山式浪漫丛林。但我很认同非洲的异域风情与极度的冒险精神。说到后者，我永远不会失望。

1948年的达喀尔，是个熙熙攘攘又颇具世界性的城市，依旧带着法国殖民地的深深烙印。塞尔加尔的首都，每一栋政府大楼都飘扬着法国的三色旗，黑人士兵和白人法国军官，连同法国外籍志愿军的小分队，都是再常见不过的。市场上挤满了穿长袍、打手势交流的人们，时不时还有头骆驼或者驴拖着超大的货物走过。除了满目异域风

光令我确信我是真的走出了德国之外，空气中弥漫的热带植物的浓烈芳香更是让我知道，我已经远离家乡。

我们来到一个水果摊前，一堆漂亮的香蕉引起了我的注意。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德国热带水果严重短缺，至少八年的时间里，我见都没见过香蕉，更别说吃到香蕉了。我问摊主六只香蕉多少钱，他用手指比划了一个数字。就在我低头数钱的时候，另一个摊主把我拉到一边，打着手势说，他只要一半的价钱，就能给我同样数量的香蕉。丹麦朋友们建议我跟后来这个摊主买，不过，我还没来得及决定，第一个摊主就引发了一阵骚乱，引得市场里的人都围过来旁观。最后，一个黑人警察出现了。听取摊主的抱怨后，他用不容置疑的手势命令我们跟他去一趟警察局。大喊大叫的摊主跟在我们身后。我们在饱含敌意、怒目而视的人群中奋力拨开一条路。摊主说的都是法语，所以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到底在抱怨些什么。虽然我挺同情他被对手撬掉生意时的失望之情，但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理由认为自己有权利要求我必须跟他买东西。

在警察局里，我们被带到一个大房间，里面有几张桌子，坐在桌子前的都是非洲警察。在等待询问的时候，我们身后拘留单间里的一个白人用英语跟我们低声说起话来。他让我们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多生事端”，除非我们想跟他一样被关起来。他说他是个荷兰船员，一天夜里，他找两个警察问路，然后被索要钱财，他不肯给他们，他们就“扰乱治安”的罪名把他关了起来。“我已经在这儿待了一个多礼拜了，”他沮丧地说，“我的领事还是没办法把我弄出去。”

等我们终于站在当值的警察（穿卡其制服的法国人）面前时，他让摊主先说清事情的原委。摊主还跟之前在外面一样，大喊大叫了几分钟，还不停地指着我们。法国警察做了个手势，表示他听够了，我以为这下他就要听我们这边说了，没想到我大错特错。我一句话还没说完，警察就粗鲁地冲我喊道，“Ferme ta gueule”，我知道那是“闭

嘴”的意思。牢记荷兰船员的建议，我只能照做。

接着，法国警察用流利却带有浓重法国口音的英语命令我们，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放在桌上。数了一厚沓钱之后，警察把香蕉钱递给摊主，把剩下的放进了他的抽屉，然后指着门，冲我们大喊，“Allez!”我们立刻就明白了，那是“滚出去!”的意思。

我们气疯了，却又明智地把愤怒和对高卢司法体系的咒骂全都放在了心里，直到走出警察局到很远的地方。对于刚刚发生的一切，我们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摊主和警察局合伙对我们耍的诡计。

香蕉似乎成了一种被诅咒的食物，跟我无缘。当时，我真的毫不在意，因为这场闹剧，我完全没有了吃香蕉的胃口。过了好几个月，我看着香蕉的时候才能不生气，又过了好长时间，我才有想吃它们的念头。

当天晚上，船员们邀请我一起去镇上过夜，我打算再给达喀尔一个机会。夜里，这个城市似乎更加风情万种，比白天更加神秘。除了几个鬼鬼祟祟的声影，还有睡在路边的流浪汉，昏暗灯光下的街道空空荡荡。幸运的是，我们拦到了一辆出租车。在我们轮番用丹麦语、德语和英语问这个土著司机，能否送我们去有演出的地方时，他的眼睛瞬间亮了。“没错，大人。”他砸吧着嘴，亲吻右手并拢的指尖。“许多漂亮的女人。”他拉着我们，在达喀尔转悠个没完——当然是“观光路线”——然后停在了一家叫做红磨坊的酒吧门口。除了名声都不好之外，它与19世纪巴黎的红磨坊并没有什么相同之处。

我们的服务员，一位漂亮的欧非混血女郎，有着橄榄色的皮肤和非洲短发，用纯正的英语告诉我们，她和她的同事们“随时为我们服务”，提升我们的舒适程度。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都是白种男人和非洲女人，他们公开而亲密的举止，尺度之大令圣保利岸边的酒吧相形失色。我们点了香槟，聆听非洲钢琴家用天鹅绒般的嗓音吟唱诱人的法国曲子。

我们回到博恩霍尔姆号时已经很晚了。我不想在早餐时面对死气沉沉的旧面孔，用一张硬纸板写下“请勿打扰”，贴在舱门上，然后昏沉沉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我从舷窗往外望去，还是大白天。我瞥了一眼手表，发现快吃午饭了。显然，船舱男孩看到了我的信息，没再打扰我。虽然我还是有点宿醉的不适，但庆幸自己脑子转得够快，我才得以多睡上几个小时。等我走出船舱准备去船长的舱里吃午饭时，我注意到那块纸板已经不见了。

我到的时候，阿格已经在里面坐好了。“今天早上你没露面，船长大发脾气。”阿格告诉我，“他说你在门上贴一张‘请勿打扰’侮辱了他。”

虽然我决定不去吃早餐的确是因为想到哈特曼那令人不快的态度，但我根本没想到，他会对我的缺席反应那么大。我决定去跟他道歉，安抚一下他，如果要消除紧张气氛不得不这样做的话。但我没有这个机会。“船长不来了。”船长的管事通知我们，“你们可以吃了。”

当天晚饭和转天的早饭，他都没有露面。我这才明白，剩下的日子他都不打算让我享受他的“陪伴”了。我无所谓。反正我也受不了他，越少看见他，我感觉越好。

在一个火热的早上，维修后的博恩霍尔姆驶出了达喀尔，朝着广阔的大西洋驶去。过了几天，非洲海岸线又重新出现在眼前。不久之后，我们看到了丘陵地貌的蒙罗维亚，沐浴在西非的阳光之中。

从达喀尔启程之后，我只在桥上远远地看见过哈特曼船长一次，仅有的几次在甲板上碰见，他故意装作没看见我。我的丹麦朋友们让我别理会他。他们说，他就是嫌我没对他卑躬屈膝，没办法像欺负船员那样欺负我。

码头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蒙罗维亚港正在美军的修建下，还有几个月就要修好了。在那之前，他说，博恩霍尔姆都不得不停靠在岸边

几英里之外的地方。他说我父亲会坐小船来接我。“那就是他了。”他指着远方一艘小船说。船靠近的时候，我可以分辨出八个划桨能手和着舵手的指令，有节奏地唱着歌。他们破旧、污秽的衣着跟舵手旁边黑人男子穿的一尘不染的白色西装形成了鲜明对比。我看不清那个人的脸，因为他戴着白色的遮阳帽，但毫无疑问，遮阳帽下肯定是个很有权势的人。

父亲走到已经放下的舷梯边，哈特曼船长出来迎接他，仿佛他是到访的贵客，博恩霍尔姆的船组人员都在甲板上好奇地围观。我想，当时的场面，就只差礼炮齐鸣了。我发现，工作人员说父亲是一个极度严肃绝不含糊的人，并没有夸大其词。虽然我发现，他个子比我矮一点点，我却已经被他散发的权威气息吓到了。我脑补了无数次与他重逢的场面——我会简单地给他个拥抱，告诉他我很高兴见到他。但当我真的跟他面对面，看着他的眼睛，在近二十年的分离与不闻不问之后，他对我似乎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我呆站着。

“很高兴看到你安全抵达。”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说。

一瞬间，我找不到合适的话说，最后只能紧张地说了一句“你好吗，先生？”其实我根本不想说这个。无论如何，我都摆脱不了我们彼此都对第一次见面感到失望这种感觉。

但我的不适感还远远没有尽头。我还没想到要如何称呼这个给了我生命，却又直到几分钟前还是个陌生人的父亲。德语里的“瓦提”（爸爸），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叫他的，在现在这样一个讲英语的国家听来，是多么的奇怪与不合时宜。“父亲”似乎又太正式，而“爸爸”又不够正式。当时我决定先放下此事不叫他，直到我想出一个更好的法子。

我跟丹麦朋友们告别的时候，我父亲和哈特曼船长去船长的舱室打理生意。后来我听说，他们谈的交易，是博恩霍尔姆要通过我父亲的船代公司临时招聘二十多个非洲码头工人。

父亲从船长那回来的时候，脸上写满了烦躁。我看见他的手里拿着一张硬纸板。“你都做了些什么？”我父亲激动地问。“船长说，你对他非常粗鲁，提醒我以后你会给我惹大麻烦的。”

事情就是这样了。哈特曼船长，出于幼稚的复仇心理，跟父亲说了我的坏话，让我们本就艰难的重聚更加艰难了。他没有让我父亲亲自看到我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我们的关系还没开始之前就搞了破坏。

我张口想要解释，父亲打断了我。“我们以后再说。”他阴沉地说。

蒙罗维亚的团聚

小船送我们上岸的路上，父亲的怒气似乎消散了。他带着明显的骄傲，指着远处蒙罗维亚的白色政府大楼，包括美国大使馆所在的曼巴点。在岸上，我们碰见了一个穿卡其布衬衫和短裤、光脚的小伙子。父亲跟我介绍说，这是他的“家童”杰森。“这是我儿子，汉斯先生。”父亲对杰森说。

“很高兴认识你，汉斯先生。”杰森顺从地点头，然后抓起我的行李箱，走在前面带路。父亲说，我们的房子就在这条街上，再走几步就到了。

街道上很多人，有些穿着非洲服装，有些穿西式衣服。大多数建筑物都是煤块墙铁皮屋顶，看上去摇摇欲坠。最让我吃惊的是，这些人似乎都很快活，他们开心地笑着，互相拍背，鼓掌。街道两边，成排的妇女，穿着鲜艳的裙子，面前摆的是各式各样的陶罐，从手工织的土布到新烤出来的面包，应有尽有。她们大声用土语聊天，一开始我听着觉得像是在吵架，后来才知道，那只是寻常聊天。有些女人裹着鲜艳的拉帕，显露出身体的曲线，悠闲地走在路上，头上却顶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从箱子到篮子到缝纫机，嘴里还聊着天。我注意到，

有些女人的背上还背着熟睡的孩子。

“就是那一栋。”我父亲指着路边一栋宽大却又非常简朴的两层水泥楼房说。“一楼是我的办公室和车库，上面是生活区。”

接着他命令杰森带我去我的房间，然后洗个澡。“等你洗干净了休息一会儿，我们可以吃点东西。”父亲说。“你准备好了就告诉杰森。我会在办公室里。”

我的房间很大，光线很好。里面有一张大床，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一副大蚊帐把床罩了起来。屋顶有一个风扇，保持了空气流通，却不足以驱散炎热。

“你的洗澡水放好了，汉斯先生。”杰森说。

“谢谢你，杰森，你为我父亲工作多久了？”

“四年。”杰森回答。

很快我便发现，“家童”这个词实在囊括不了杰森以无比的沉着与高效完成的各项职能。除了是家务总管，他还是我父亲的司机，他的修车工、信使、洗衣工、贴身仆人、会议秘书。他还负责帮父亲找各种丢失或放错了位置的东西，帮他记各种重要的事情。了解杰森之后，我确信，他的才能可比他在教会学校的三年学的要多得多，他可以很轻松地经营我父亲的船代公司。

用温水洗了个澡后，我觉得精神好多了，穿上杰森给我准备好的白衬衫和长裤，在他的带领下，来到一个大客厅。长条餐桌上摆了两个人的餐具。过了一会儿，父亲也上来了，他说，为了欢迎我的到来，他提前下了班。

杰森在我面前放了一个盖着一块布的大餐盘。盘子里有几道看上去很美味的菜，包括炖鸡、羽衣甘蓝、车前草，还有堆成小山一样的米饭。几秒钟后，我经历了第一次直冲内心的文化冲击。我的胃口很好，在博恩霍尔姆号上又没吃早饭，所以吃了满满一口炖鸡肉。突然，我的嘴和喉咙变成了燃烧的地狱，让我咳个不停，大口喘气。

“我猜你是不习惯辣椒。”等我调整好呼吸和仪态后，父亲轻声笑着说。“我忘了我的儿子是个欧洲人，不是非洲人。不过别担心，我会给你再准备一点鸡肉，这次是没有辣椒的。”接着，他指示杰森去告诉厨子梅曼，赶紧做一点没有辣椒的鸡肉。“告诉她，我要见她的表哥，以前给美国人做饭的那个。”

父亲说，他打算请一个男厨师来给我做饭，他曾经给美国的传教士们做饭，所以知道怎么做不辣的菜。

等着上菜时，我看到父亲把注意力转移到杰森放在他面前的第二盘菜。那里全是不熟悉的非洲食物，有些闻上去很腥，让我一点胃口也没有。父亲指着一份长得像布丁，散发辛辣难闻气味的东西，说这是一种非洲美食，名叫“fufu”（木薯糍粑）。它是木薯粉发酵而成的，他说。接着他在上面浇了一层深绿色的秋葵酱，还舔干净了勺子上沾的酱。“我们把它叫做‘麻烦酱’，”他解释说，“因为一旦你不小心沾到衣服上，你就有‘大麻烦了’，你的女人会跟你吵架，因为这些污渍很难洗掉。”说完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突然想到，这是我第一次听见父亲笑。发现他有着不那么严肃的一面，我很高兴。

我抓住这个我认为的好机会，说起了跟船长的冲突。我说我并不是不尊重他，父亲让我忘掉这件事，还说他会会的。

他告诉我，转天早晨第一件事，我要去见他的私人医生，简·巴普提斯特·提图斯，利比里亚卫生部的负责人，做一个全身体检，学习如何避免热带病，尤其是疟疾。接着他提醒我，千万别在没有蚊帐的地方睡觉。“我多么希望二十年前我从欧洲回来时听从了这个建议啊，”他说，“那个时候我得的疟疾，现在还时不时犯病，让我难受上好几天。”

等我终于吃上没有辣椒的鸡肉时，一个细长、轮廓极其分明的黑人小伙走了进来。“你好吗，拉哈伊哥哥？”他问候了我的父亲，用

的是父亲名字的另一个版本，“我的小侄子呢？”他转过身来，咧着嘴笑，又促狭地来了一句，“天啊，你都长这么大啦！”

我反应过来，这肯定是弗里兹了，我父亲的小弟弟，虽然比我还小六个月，但却是我的叔叔，在汉堡刚刚过了学步的年龄就分别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弗里兹欢迎我来蒙罗维亚，说他的姐妹们法西雅和法缇玛、哥哥亚瑟都等不及要见我。“等你休息好后，明天我会来带你去见他们，然后带你蒙在蒙罗维亚转转。”弗里兹说。

弗里兹离开后，父亲跟我说了一些他跟他兄弟姊妹之间的“家庭麻烦”，尤其是妹妹法缇玛和弟弟纳撒。我父亲说，“老头”（总领事莫莫鲁·马萨夸依）竞选总统时，把全部财产都抵押了，充作竞选资金。1938年去世时，他留下的只有债务。而经过多年的辛苦打拼，父亲说他终于把债还清了。“现在法缇玛和纳撒觉得，他们理应分得一份赎回来的财产。”父亲抱怨道。“他们不愿相信，我们的父亲留给我们的只有债务。为了逼迫我跟他们分享属于我的一切，他们浪费了许多钱在律师身上。但每次我们去法院打官司，法官都会站在我这边。”

父亲跟我说，虽然他跟法缇玛早都不说话了，但他不反对我去看望她。“我不限制你跟谁来往。”他安慰我说，“只有一个例外。有个叫莫里斯的家伙。他跟所有人都说他是我的儿子。他在撒谎。他不是好人。他可能会接近你，说是你的兄弟。我不想你跟他扯上什么关系。如果你打算跟那个流氓同流合污，你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因为我不会再管你了。”

虽然他说得这么严厉，但我对此并无意见，跟他保证说，对我来说，压根就没有莫里斯这个人。但父亲的奇怪要求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除了对外宣称是你的儿子，不是个好人之外，这个叫莫里斯的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

显然，这个话题让他很不舒服，但父亲还是跟我讲了一个故事，让我对莫里斯另眼相看。“如果莫里斯不是那样一个混球，他现在会

是利比里亚最有权势的人之一。”我父亲说，“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比起理智来，他更有胆量。”接着他说，莫里斯几年前在蒙罗维亚港的建筑工地上当重型机械操作员。本地工人对微薄的薪水和恶劣的工作条件不满，在市长官邸罢工和游行。担心社会动乱和罢工会影响到海港建设的交期，塔布曼总统要求工人派一名代表陈述他们的不满。没有工人有胆子直面总统，我父亲说，除了莫里斯。“一个小个子站了出来，跟总统说，他和他的工友们绝不会回去工作，除非给他们加薪，并缩短工作时长。”我父亲回忆道。总统答应满足他们的要求后，莫里斯劝说工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从那以后，莫里斯就“得意洋洋”地坐上了配有司机、政府提供的吉普车，坐进了政府提供的港口办公室，当上了工人的官方代表。要是莫里斯去做生意，我父亲说，他也会有钱有势，就像他当了利比里亚工会的第一个组织者一样。相反，莫里斯“犯了傻”，脑子里没有别的，只有追女人。他不再关心工友的疾苦，想上班了就去上一会儿，要么就干脆不去。一天，他难得去了一趟办公室，一个工友代表团通知莫里斯，他被他们的发言人取代了。“据我所知，”我父亲总结道，“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工作了。”

我明白，父亲花了十五分钟讲莫里斯的事，是想让我针对他，可是却起到了反作用。我十分钦佩莫里斯的勇气，在二十六岁的年纪，就敢站出来直面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人。

第二天早上，跟父亲一边吃早餐一边聊了很长时间之后，我去见了提图斯医生，一位英俊的中年海地男子。他告诉我，我们很快就是亲戚了，他马上就要娶我的一个表姐，爱玛·香农，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尤金·香农之女。而尤金·香农，整个蒙罗维亚都知道，是莫莫鲁的私生子。给我做了全身体检后，提图斯还交代了在热带生活的注意事项，给我开了每天要服用的疟疾平。疟疾平比以前的奎宁丸要管用得多。

那天晚上，父亲带着我在蒙罗维亚兜风。我们去了几个夜店，他

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些男性朋友和女性朋友，我跟他说，我看到了一个大问题。

“什么问题？”他急切地问。

我不情愿地告诉他，我在利比里亚没看到一个喜欢的女人。“我要怎么生活在一个没有我喜欢的女人的国家？”

父亲听完后大笑起来。“如果让你烦恼的是这个，那你尽可以放心。”他说，“我刚到德国时也这样。”他说，他看到的女人，没有一个是好看的，不过如果我需要证据才能相信他已经克服了他的“审美偏见”的话，只需要照照镜子看看我自己就好了。“用不了几个星期，你的感觉，还有你的审美标准，就全都变了。”他安慰我说，“你只要耐心一点。”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至少在这方面，父亲是最了解的了。

这番男人之间的对话过后，我们决定今晚就玩到这里了。父亲坐进他那全新的十二缸林肯轿车后，有个人从驾驶室那一侧冲过来，一句话都没说，就伸手进车窗里，打我父亲的脸。我看够了，气愤地跳出汽车，直面袭击父亲的人。一连串即便是我在拳击时代也会引以为豪的重拳之后，我把袭击者打倒在地。“你惹错了人。”我听见自己在低吼，“下次你想惹我父亲，先来找我。”袭击者站起来后都不敢找我算账，飞快地跑了，然后在远处破口大骂。

虽然整件事只持续了几分钟，却吸引了一小撮人看热闹。“上车，我们走！”我父亲吼道。

路上，我对自己感到非常骄傲，有机会向父亲证明我的忠诚，证明我可以救他于危难，我也觉得很高兴。可是，他没有感谢——更别说称赞——我保护了他，反而斥责我，说我反应过激了，我的行为会让他赔上一大笔钱，如果那个人要告他的话。我很崩溃。

第二天，弗里兹如约来接我去见法缇玛姑姑和法西雅姑姑。她们俩还跟瑞秋，莫莫鲁的遗孀、马萨夸依家的女家长，住在一起。法缇玛姑姑在田纳西的菲斯克大学留学、执教多年后，最近回到利比里亚

的蒙罗维亚大学当全职教授，教科学。她跟我二战爆发前在德国最后一次见她时没什么变化。瑞秋奶奶也是，除了原本就不瘦的身材添了几磅重量，只有头上多了很多白发。

一同迎接我的还有亚瑟，我的叔叔和儿时的玩伴。毕业于科罗拉多矿业大学的亚瑟现在是利比里亚很有影响力也很有钱的矿产及自然资源的总管。他的外表变化令我最吃惊。他像气球一样吹到三百多磅。同样让我认不出来的还有我最小的姑姑法西雅，曾经穿纸尿裤的小宝宝长成了二十岁的漂亮女孩。我还见到了阿布拉罕叔叔，现在是农业部的高官，以后会是利比里亚海事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委员会管理着世界很大一部分油轮船队。

当所有的亲人轮番拥抱欢迎我时，法缇玛姑姑说她有个惊喜给我。她出去了一会儿，回来的时候牵着一个矮小精干的年轻人。看到那张跟我父亲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脸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你的哥哥莫里斯。”法缇玛说，“而这个，莫里斯，这是你的弟弟汉斯。”握手的时候，我仔细地看了看莫里斯。虽然父亲跟我说过那些话，但我心里没有任何怀疑地相信，这个言谈举止酷似父亲，又有着跟父亲一样面容的人，的确是他的儿子、我的哥哥。因此我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态度对待莫里斯。

“你知道因为你我差点进监狱了吗？”莫里斯问。他说，前一天晚上他被警察从睡梦中吵醒。他们命令他穿好衣服，把他带去警察局，在那里他看到一个满嘴是血的人。那个人声称是阿哈伊·马萨夸依的儿子把他的牙打掉了。“不是他。”那个人看了一眼莫里斯对警官说。“打我的那个比这个高，比这个白点；看上去、听上去像是个美国人。”

莫里斯说，他恍然大悟，明白了警察们在找的那个人肯定是他从德国来的弟弟。“我听说你到了蒙罗维亚。”莫里斯说，“但我没跟他们说我知道你是谁，你在哪儿。”

“对不起，”我跟莫里斯解释了那天晚上的事以及为什么我会动手，然后说，“我想我欠你一次人情。”虽然父亲跟我说的都是莫里斯的坏话，但我立即喜欢上了他。那天下午，他跟我讲了他的故事，我很高兴，我儿时想要一个大哥哥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莫里斯告诉我，他出生在蒙罗维亚郊区一个棚屋里。他的母亲是克鲁部落的一个土著女人，从没读过书，也没学过写字，他还是个孩子时，她就去世了。临死前，她告诉他，他的父亲是个有钱的瓦伊族人，名叫阿哈伊·马萨夸依，住在沃特大街的大房子里。“继承”了他的老太太拿他这个十岁的小男孩没什么用，把他“给”了一对姓威廉姆斯的美国利比里亚夫妻当“家童”。他们给他起名莫里斯·威廉姆斯，送他上教会学校，就差正式收养他了。十几岁的时候，他去了母亲说的沃特大街上的大房子，跟阿哈伊·马萨夸依先生说是他的儿子。“老头子不想要我，让我赶紧消失。”莫里斯说，他去找了马萨夸依家其他人，跟他们说阿哈伊是他的父亲。他说，他们只看了一眼他就说，“什么也不用说了。我们知道你父亲是谁。”他们接纳了他，告诉他，别因为他那“疯子老爹”烦心，总有一天他会回心转意的。莫里斯说，他每个星期都至少去一次父亲的家里，给他一个清晨的问候，“早上好，爸爸”或者“你想让我帮你做些什么吗，爸爸？”最后，他的坚持终于有了成效。有一天，令莫里斯吃惊的是，我们的父亲让他去跑了个腿。从那以后，他说，“老头子”把越来越多的事情交给他做，直到最后，他正式为他工作了。他们相处得很好，莫里斯说，当他丢掉威廉姆斯这个姓氏，改姓马萨夸依时，我们的父亲不仅没有反对，反倒开始称呼莫里斯为“儿子”。当我问他为什么他们的关系会变坏的时候，莫里斯嘟哝着什么“女人的问题”。我追问细节，他一开始不肯说，后来告诉了我，“管他呢，反正你也会知道的。”

据莫里斯说，我们的父亲给了他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那就是帮他去利比里亚中部一个村庄里接一个他打算追求的克鲁族女孩。要完

成这个任务，得花上大半天。为了给这个女孩留下深刻印象，父亲特意让莫里斯开他崭新的美国豪车去。

莫里斯说，他本来打算忠诚而迅速地完成任务，但当他看到那个漂亮的克鲁女孩，他沦陷了，下定决心要得到她。因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克鲁语，而父亲不能，他说，一切就很简单了。

一个星期后，我们的父亲发现，小个子莫里斯和克鲁女孩，还有脏兮兮、油箱空空的轿车停在他的门前。他让利比里亚内外都知道了，那个自称莫里斯·马萨夸依的“该死的克鲁杂种”不是他的儿子。莫里斯说他好几个月后才敢面对父亲，但当他终于鼓足勇气这样做时，“老头子对我一通臭骂，让我永远别去找他。那是大概四年前的事了，”莫里斯说，“我从那之后就再也没见过他。”

莫里斯带着顽皮的笑容讲完这个故事，丝毫没有悔意。“我猜老头子跟你说，别跟那个该死的杂种莫里斯扯上关系。”我哥哥模仿着父亲的英国口音说。

“你能怪他吗？”我反问他，“你做了这么坏的事。”

莫里斯同意我的说法，却还是没有悔意。“我认为，开着他的车，和他的女朋友玩上一个星期，也弥补不了这些年他对我母亲和我的忽视。”莫里斯说。想到我母亲和我在德国度过的艰辛岁月，我觉得，莫里斯说得太对了。

我们说好了要继续联系，但是要偷偷地，才不会让我处境尴尬。我非常确信，如果我跟莫里斯“有任何联系”的话，父亲肯定会对我毫不留情。我们让弗里兹当中间人，帮我们传话，安排见面。这样欺骗父亲，我心里很内疚，但是，要把唯一的哥哥拒之门外对我来说更加难以接受。

看望完亲戚回到家后，父亲说，警察来找过我。“别担心。”看出我的焦虑后，他说，“我处理好了。”接着，他说两个警察和那天晚上我打的那个人过来找我问话。“那个人说你把他的牙打掉了。我知道

他们想要什么，所以给了点钱，然后让他们忘掉这件事。”他接着说，“以后，别那么着急动手，要不然我就要变成穷光蛋了。”

“知道了。”我说。我从亲戚们那里听说，我这个哭穷的父亲，不仅是一家大船代公司的老板，还是丹麦图伯格啤酒的唯一进口商。这个牌子是全国卖得最好的啤酒之一。我没透露我已经从莫里斯那里听说了打掉牙这回事。相反，我向父亲道歉，说给他惹了这么大麻烦，但我心里并没有多内疚。我始终觉得，他应该更感激我出手维护他。下次如果他再遇到这样的事，我不会再管他了。我问他，为什么那个人要袭击他，他说那个人以前是他的员工，认为他欠自己一笔钱。“他搞错了。”父亲说，“不过，我还是给了他那笔钱，只是为了不让他缠着我。”

与总统见面

父亲看上去异常高兴，对我说，他的朋友塔布曼总统邀请我们去总统府做客，因为他想见我。能有如此荣耀，我一开始很开心，但随着周日的临近，我越来越紧张。“见到总统我要说什么？”我问父亲，“这辈子我还从没见过总统。”

“别担心。”他说，“总统不会咬你的。你只要记住，问你的时候，你才说，然后不能只说是的和不是，要说“是的，先生”“不是的，先生”。其他的，就做你自己就好。”

到了会面那天，牢记着父亲的教诲，顶着新剪的发型，穿着热带风情的白衣服，我陪着父亲来到总统府，心里的紧张变成了恐慌。我始终心怀侥幸，指望总统会捎个信来叫停会面。但是没有这么幸运。下午四点整，父亲通知总统府的警卫员说我们到了。几分钟后，戴眼镜的总统助理亚历山大·布鲁尔上校，就把我们带到了二楼宽敞的阳

台。总统正跟两个白人聊得热火朝天，看到我父亲时，他连忙站起身，抓住我父亲伸过去的右手，按利比里亚传统手指相扣行了个礼。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马斯。”总统说。接着，他转向我，同样热情地跟我握手，眼睛盯着我，目光似乎要穿透我的灵魂。“这肯定就是我们经常谈到的小伙子了。我能看出来，马斯，你在德国可没浪费时间。”总统大笑着说，冲我父亲眨了眨眼。

“我不能说我浪费了，总统先生。”我父亲附和道。

总统给我们介绍了那两位客人，一个是负责蒙罗维亚港建设的美国海军上尉，另一个是常春藤式的美国商人，名叫斯特蒂纽斯，然后请我们坐下。点上一根粗大的哈瓦那香烟后，他又恢复了谈话，话题都是离我十万八千里远的。一个管家给我一根雪茄，还有一杯总统最爱的威士忌，我明智地拒绝了。虽然我想表现得成熟而自信，但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从未喝过威士忌，也没有抽过雪茄，这里显然不是开始练习的好地方。然而看到那个叫斯特蒂纽斯的哥们，看上去年纪不会比我大，却聊着一些美国出资数百万美元重建蒙罗维亚港、金本位、苏联在战后的策略之类的话题，我还是很烦心，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些事情。此外我还嫉妒地注意到，那个年轻的商人可以熟练地抽着雪茄，从容地喝着威士忌。

我觉得自己像是马群里的骡子。我痛苦地发现，自己受的教育太少了，立即就下定决心，要尽量弥补这一缺陷。就在我认为这一下午都要这样尴尬而沉默地坐着时，塔布曼总统解救了我。“现在，我们来听听小马萨夸依的故事吧。他刚从德国来，整个战争期间他都在德国。”他打破了坚冰，“我知道你当时住在汉堡。你是怎么在空袭中活下来的？”

突然之间，我得到了一个机会，谈论一个只有我最懂的话题。短短几分钟，我就让总统和他的客人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我身上，因为我说起了英军和美军空袭时的经历。我的听众们时不时打断我，问

我细节。当塔布曼总统问到，德国人在什么时候意识到战争已经输掉时，我回答他，这要看我们说的是哪些德国人了。希特勒的死忠分子们直到盟军的军队已经进驻德国的大街小巷也不相信是盟军胜了，而反对希特勒的德国人则从战争一开始就预见到了德国战败。

“很有意思。”总统评论说，“你是个幸运的家伙，毫发无伤地挺了过来。”拜访结束的时候，总统感谢父亲带我过来。“马斯，你得答应我，下次再带你儿子过来，我们要听他讲战时有意思的经历。”

“我肯定会的，总统先生。我肯定会的。”父亲保证说，他满怀都是当父亲的骄傲。

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父亲祝贺了我，说我证明了自己，他为我感到骄傲。“对了，我们在总统府邸看见的那个年轻人是前美国国务卿爱德华德·斯特蒂纽斯的儿子，是一个百万富翁，是个企业家。”我跟父亲坦白说，我觉得自惭形秽，尤其是在小斯特蒂纽斯的才智面前。父亲答应帮我弥补我的教育不足，送我去上大学，或许是去美国。他的话就像是音乐一般悦耳，我打算尽我所能地赢得他的支持和信任。

见过总统后不久，我父亲又为我准备了另一件大事。“是时候让你去见见我们的人了。”他说，“所以，下个星期天，我会带你去瓦伊镇。”瓦伊镇，他解释说，是我们路过许多次的那一片茅草屋顶的棚屋。它就在蒙罗维亚外十分钟车程的大西洋海滩上。瓦伊族真正的故乡，父亲说，他的父亲曾当过国王的地方，横跨利比里亚和英国殖民地塞拉利昂。

我对见“我们的人”并不太上心，如果父亲说的“我们的人”指的是住在茅草屋里而不是有自来水的人的话。“我们的人”，在我的字典里，是像法缇玛姑姑、弗里兹和亚瑟，我的祖父莫莫鲁之类的人，而不是那些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的人。因为我在欧洲长大，大部分时间还是在纳粹的统治之下，我对“原始土著”极度缺乏尊重。

父亲和我开车到了镇上，人们敲鼓欢迎我们，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穿着鲜艳的长袍，还有咧着嘴笑的光头、大肚子孩童。显然，我们的到访是事先通知过他们的。我们缓缓走过人群的时候，人们都伸出手来跟我们握手。

到了镇子中央，我们受到了部落酋长的迎接。他头发斑白，穿一身纯白长袍，戴一顶金边黑帽。他邀请我们到他的大茅草屋里，让我们坐在两个垫得厚厚的木墩子上，他面前还坐了半圈老人。酋长用瓦伊语说了一大段话。后来我被告知，他那是在向我祖父和父亲致敬，欢迎我“回家”。我父亲简短地回应了，也是用瓦伊语。接着，有人给我们端来一种叫棕榈酒的牛奶饮料，还有大块的玉米面包。然后就是男人女人没完没了地来跟我们握手，祝我们长寿幸福。等最后一个人跟我们握完手，酋长和几位长者把我们送上车的时候，天都快黑了。直到我们开到看不见瓦伊镇的地方，我们身后的鼓声依旧能听见。虽然他们说的我一个字都听不懂，但我能感受到他们的诚恳。听着鼓声，想到瓦伊族谦卑的人们——我们的人——潮水般的热爱与拥护，我突然对我的瓦伊血统感到深深的感激与骄傲。

虽然父亲一向轻视“美国黑人”，认为他们看不起非洲人，但他还是接受了邀请，参加美国大使馆一个高官家的聚会。聚会成员大多都是美国黑人。从我们到达的那一刻开始，我就很清楚，我之前跟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仅限于美国商船船员和大兵，在这个新环境中毫无用处。如果说有，也是反作用。大使馆的黑人，跟我在汉堡的岸边认识并尽全力模仿的无拘无束、衣着随便的嬉皮士们完全不一样。

无一例外的，大使馆的黑人们都是举止文雅、口齿伶俐，衣着保守，受过大学教育。

要想在这个场合中应对得体，不变成一个大傻瓜，就需要我迅速地调整自己。想到上次跟塔布曼总统的见面，我决定当一个优秀的倾听者，只有在我觉得我很懂要说的话时才开口。很快我就跟客人们轻

松地聊了起来，从容地说些“你过得好吗”和“认识你很高兴”之类的客套话，仿佛我是什么好大学的荣誉毕业生一般。

因为之前我认识的美国黑人都是男人，我很高兴地发现了一种全新的物种——美国黑种女人。大部分都是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和大使们的太太。除了文雅、成熟、完美之外，我发现她们都非常漂亮。因此在父亲的一点点鼓励之下，我走到舞池，随着钢琴的曲调和舞伴们的喜悦，我重新表演了一些我战时在巴姆贝克卢卡斯先生舞蹈班上学到的最美妙的舞步。

被美妙的钢琴声吸引，我和许多客人聚集在钢琴演奏者身边，一同哼唱当时最流行的美国曲子。令我吃惊的是，这位乐师居然是个盲人。有人跟我解释说，他是利比亚的音乐教授，众所周知的海耶斯教授。我正唱得入神，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他要去做“一些紧急的公事”，并保证说他很快就回来。“你接着玩吧。”他催促我。对此，我没意见。

过了一会儿，他就回来了，带着我的萨克斯盒。“让我看看你吹得怎么样。”他催促说，“我知道海耶斯教授不会介意的。”

可能是几杯红酒下肚后，我的拘谨已经消散了，我愉快地听了父亲的话。几分钟后，我的萨克斯声与海耶斯教授的钢琴曲《直到时间尽头》完美地融合在一起。最初的讶异过后，盲人音乐家脸上大大的笑容让我知道，他完全认可了我的配合。曲子演奏完后，客人们都热烈鼓掌，喊着再来一个，海耶斯教授起身给了我一个热情的拥抱。

那天晚上，我认识了一个新朋友，来自纽约的副领事查尔斯·汉森。他戴眼镜，身高六英尺，有着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学位，还有对所有人真诚的欣赏。“下班后任何时间都可以来大使馆见我。”这位三十岁左右的单身汉对我说，“或许你可以帮我练习我的德语，我已经很生疏了。”

我跟他说，如果他能帮我练习我的英语，我就答应他。

我父亲一晚上都像只孔雀一样趾高气扬的，带着一种“那是我儿子”的态度。他安慰我说，我表现得很好，并又一次对我说，他为我感到骄傲。我最爱听的就是这个了。

在这个新环境，寻常日子里，我一般都是八点开始新的一天。父亲和我会一起吃一顿简单的早餐，包括吐司、水果和茶。父亲通常刚刚洗完澡，还穿着浴袍和拖鞋，一边喝着茶，一边抽着雪茄，在地上走来走去，谈论着外头的的事情。正是在每天早餐的聊天中，我们越来越亲近，培养出了父子感情。他会顽皮地笑着跟我说他和弟弟纳撒的官司进展。他说纳撒是家族反抗他的智囊团。“他们毫无进展。”他说，“现在，你来了，他们开始明白，他们再也拿不到我的钱了。”

他经常跟给我说起他在英国和爱尔兰留学的日子，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看一张旧报纸。报纸上刊登了他的照片，“阿哈伊王子，”坐在威尔士王子及未来国王爱德华德旁边，在白金汉宫共进晚餐。他还喜欢跟我说，是他第一个把汽车，一辆梅赛德斯奔驰轿车，带到利比里亚，那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利比里亚的路还没修好。

“你祖父没看到你现在的样子真是遗憾。”他会这样说，然后跟我说起祖父传奇的一生。跟其他瓦伊族的孩童不同，莫莫鲁很小就被要求学习瓦伊语，父亲说。八岁的时候，莫莫鲁就已经熟练掌握了瓦伊语复杂、自创的书写体系。与绝大多数非洲部落不同的是，它有一百多个字母。他的父母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教徒，他们把他交给一位穆斯林牧师，让他学习《古兰经》。两年后，也就是十岁的时候，他被送到开普蒙特的圣约翰主教学校学英语。在基督教老师们多年影响下，莫莫鲁信了基督，受洗并行了坚信礼。十六岁的时候，1888年，这个早慧的男孩被送到美国，成了纳什维尔田纳西中央学院的一名新生。1892年，他母亲突然离世，四年后父亲也去世，把他推向了瓦伊族领导人的位置，但他拒绝了，当了他母校圣约翰主教学校的校长。在这个岗位上干了六年，他终于接受了王位。在土著高官和英国殖民

高官出席的盛大仪式上，他被加冕为莫莫鲁国王四世，然后在瓦伊族的领土上成立了法院。瓦伊族的领土，大约三百英里长，两百英里宽，沿着大西洋海岸从塞拉利昂的加利纳斯延伸到他的祖国利比里亚的开普蒙特。英国殖民者们担心一个强大的、有魅力的、受过教育的土著领袖的崛起，阴谋破坏了他的统治，迫使他退位，取而代之的是他一个不那么有才的表亲。

作为回报，我也给父亲讲述母亲和我是如何在纳粹统治下及战时侥幸存活的。对这些故事，他是百听不厌的。

我们的日常聊天，更像是文科讲座，内容从人身保护令的司法概念到孟德尔的遗传法则。我学会了尊重他强大的才智和广博的知识。我还开始发现他讨人喜欢的一面，以前我从没注意到。与此同时，我也越来越了解他的诸多小缺点。说到他的宗教信仰，原来他还没有想好是叫自己基督徒、穆斯林或者什么别的。他会灵活地引用《圣经》或是《古兰经》，取决于哪个更能支持他的论点。然而在三个方面，他是非常固执的：对“美国黑人”的轻视（他的好朋友，前美国全权公使威廉姆·P·兰尼尔不在此列），不屑于在政府工作（毫无疑问是因为他父亲在利比里亚政府工作多年遭受的厄运）；还有对塔布曼总统的崇拜（一有机会，他就要提到塔布曼）。“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他会说，“塔布曼都是在世的最伟大的政治家，无人可比。”他会用塔布曼的两大政策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说，这两大政策把利比里亚从战前的状态一下拉进了20世纪：塔布曼的“打开国门”政策，打开国门，引进了外国投资；“统一”政策，让以前被执政的美国利比里亚人故意孤立、保持无知的部落人民，参与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当中。

父亲支持总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上一届政府总统埃德温·巴克莱的统治下，他和其他马萨夸依一直落魄潦倒。1944年塔布曼上台后，对马萨夸依家礼遇有加。他推翻了巴克莱对德国的中立政策，向纳粹国家宣战，让德国外交官和在利比里亚居住的德国人打包

滚蛋，然后让我父亲成为德国被迫放弃的大量资产的唯一执行人。作为执行人，我父亲的任务包括：清查所有的德国资产，容纳大使馆全体人员的办公大楼，家宅、游艇和存放货物的仓库，然后替政府出售，首选卖给富裕的外国和本地商人。父亲可以留百分之十的佣金，所得足够让父亲翻身，在莫莫鲁去世前还清他的抵押贷款，包括蒙罗维亚内外许多出租的房屋和相当数量的土地。“很快，”父亲保证说，“我会带你去看看，这一切以后都是你的。”

虽然父亲如此富裕，但他是个工作狂，从早上九点下去办公室，一直忙到深夜。他唯一的消遣就是每周去参加海边的星期六下午俱乐部聚会。塔布曼总统和他的全男性好友们会聚在那里，喝上好的白兰地、威士忌，抽上好的雪茄。

调整适应

我父亲经常说，他希望我来了蒙罗维亚之后，能让他有一天可以轻松一点，甚至度度假，改变下生活方式。他想去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看看他年迈的老母亲，他已经多年没有见过她了。早在我出生之前很久，祖母就跟莫莫鲁离婚，搬到英国殖民地，嫁给拉格斯一家船厂的工头索尼先生。“我已经答应你祖母，等你安顿好了，就带你过去看她。她已经等不及要见你了。”

一切对我来说都那么有趣和兴奋，不过这对我目前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帮助。每天早晨，我都担心父亲下楼去办公室后，剩下我自己想办法打发接下来的一天。

为了打发无聊，我通常在蒙罗维亚繁忙的岸边散步，要么就是跟弗里兹和他的伙伴们厮混。他们都是蒙罗维亚美国利比里亚精英的子女，包括塞维尔·布鲁尔，塔布曼总统军事高官的儿子；他的堂亲赫

伯特·布鲁尔，利比里亚驻巴黎大使的儿子；卡莉斯塔·丹尼斯，利比里亚国务卿加布里尔·丹尼斯的侄女；还有其他类似人等。他们都是西非学院的毕业生或在读生，都用利比里亚政府的奖学金在美国的学院或大学深造。他们拿到了学位，返回家乡，都在利比里亚政府占据高位。弗里兹不久之后也要去美国的爱荷华大学学习奶牛养殖。不知为何，我总想象不出挑剔的弗里兹跟奶牛站在一起的样子，更别说亲手挤牛奶了。

这群人常聊的毕业舞会和社交舞会，我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我很羡慕他们的事业。他们让我意识到，我自己的青春年华是如何浪费在挣扎求生之上。我还羡慕他们的事业和以后的婚姻都由他们的家人精心安排，而我却只能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我很清楚，没有正规的培训，我在注重地位的利比里亚将一事无成，可是无论什么时候，跟父亲说到这个话题，他都含糊其词，要我耐心一点。

我还经常在手动打字机前花费大量时间。我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加快我的打字速度，为参与父亲的生意做准备；其二是让母亲、英格，还有其他人，知道我的近况。我母亲写信说，我离开汉堡后不久，曾经广为流通的德意志帝国马克被宣告无效。一种新的货币，德国马克，开始流通，政府给每个人都发了四十德国马克。一夜之间，曾经空空荡荡的商店突然堆满了各种各样“珍贵的”商品，自从战争爆发后，她就没见过那些东西。她的信以乐观的语气结尾，她说她觉得，德国最糟糕的时代已经过去，她希望我喜欢利比里亚，这样我们很快就可以团聚了。

英格写信说，她和她母亲一向都好，空闲时间她们大都在一起，看电影，聊聊我（除了我还有谁？）。英格承诺说，她绝不可能看一眼别的男人，她想要知道利比里亚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利比里亚的女人们。我立即给她回了信，真诚地说，“别担心利比里亚的女人了。她们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着实过了一段时间，但正如父亲预料的，我的审美发生了缓慢而确切的变化。不知不觉间，有些利比里亚女孩开始变得赏心悦目了。

一段时间以来，莫里斯都嘲笑我太过古板。他说，为了我的社交生活考虑，我应该让他为我安排。他已经知道，好些年轻姑娘想要认识我。我越是说我还没准备好，他越是称赞他那些女性朋友的优点。他说，其中一个女孩，特别想要认识我。他说，她的男朋友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已婚利比里亚男子。那个人可能一个月来看她一次。

“不过你也能想到，”莫里斯说，“一个月一次算不得什么。”

我不断追问她的男朋友是谁，他终于告诉我，是总统先生。

“你是疯了还是什么，居然给我跟总统的女人牵线搭桥？”我回复说。“如果他发现了，会杀了我的。”

莫里斯让我放心，总统不会发现的，即便发现了，他也不会在乎。“他全国各地都有女人，根本顾不过来。”莫里斯分辨说。“你为什么干脆过来见见她呢？她住得离这里只有几个街区远。”

当我不顾自己的判断，让他劝说我见他的朋友时，莫里斯高兴坏了。“只是打个招呼。”我劝诫说。

我们来到那个姑娘的门前，看到一个胸部丰满、穿着浴衣的女人倚在二楼阳台的栏杆上。

“那就是她。”莫里斯小声说。

“这就是你的小弟弟吗，莫里斯？”那个女人问，声音有些孩子气，又很风骚。

“是的，这就是我从德国来的小弟。”莫里斯回答。

“你们为什么不上来，让我见见他？”她说。

到阳台后，我注意到，她的面容异常美丽，但是对我来说，她至少超重四十磅。“真可惜。”我想，因为要不是这多出来的四十磅，她肯定会有别样的人生。

另一个让我兴致全无的，是客厅里挂着的一张巨幅照片，那是表

情严肃的塔布曼总统。它犹如当头一棒，提醒我自己是昏了头，性命堪忧。

莫里斯分别介绍了爱娃和我。

“你没跟我说过，你弟弟比你高了快一头了。”这个女人责备莫里斯说。接着她去厨房给我们拿了一些冷饮。莫里斯嘟囔着说自己把钱包落在什么地方了，我还没来得及拦住他，他就转身冲下楼跑了出去。“哪儿也别去，我马上就回来。”他冲到大街上，然后消失在街角。我很确定他不会回来。

他这样把我撇下，我肯定要找他算账。那个女人跟我随便聊了会儿，我绞尽脑汁想个借口，想要跟着莫里斯逃走，不过我什么都没想出来。这个时候，热情的女主人一杯又一杯地给我倒酒。当我抱怨说我觉得太热了的时候，她建议我去冲个澡。又喝了一杯之后，我觉得这个建议很好，没再多想，很快就沉浸在盛满清水的浴缸之中。爱娃靠在浴缸旁边的门框上，用毛巾给我擦着脸上的汗。她的浴袍是前开式的，露出一大片光滑的褐色肌肤，至少在那一刻，我对胖女人的看法彻底变了。

几个小时后，我走到明亮的大街上，醉醺醺的却又精疲力尽，但我对莫里斯的愤怒却彻底消失了。

不过，即便莫里斯不停地想要丰富我的社交生活，也不能阻止我追求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有一天，我跟父亲抱怨，我快要无聊死了，让他给我点有意义的事情做，他变得激动起来。“这里是非洲，不是欧洲。”他教训我，“人们就是很悠闲。你才刚到这里，却想一夜暴富。我们这里可不是这样做事的。”

我从未说过什么想要一夜暴富的话，却没有反驳他。几天后，他带我到附近一个仓库，里面放的都是一些在我看来是垃圾的东西。有个角落里放着十几台商用秤。“这儿以前是个德国仓库。”父亲解释说，“这些秤是战时德国商人留在这里的。它们看着都不好用了，不过你

要是觉得你能修好它们，也算给自己找了份活儿。”

我大概看了看这些生锈的秤，我跟他说，我觉得我能把它们修好。

父亲说，要是修好了，每台秤能卖到五十美元左右。“我跟你做笔买卖。”他说，“我会给你找几个帮手。如果你能修好这些秤，我会替你卖掉，然后我们五五分成。”我飞快算出，我能挣到差不多三百美元，便赶紧答应了。

一天清早，我在父亲的车库里挑了几样工具，就跟我新招来的两个手下一起开工干活。好几个礼拜了，我从未感觉这么好过。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又有用了。我也讶异于这样几台生锈的秤居然能够如此提升我的成就感——自从到来这里，在无所事事中，我便彻底失去的成就感。所以我满怀巨大的热情，立即投入到这个任务当中。

我的两个帮手，都是光着脚，年纪跟我差不多。他们说他们都是巴萨部落的。他们灵敏的身手，以及想要取悦我的急切心情，都弥补了他们在机械方面的不足。我向他们详细地解释了每个人的任务，他们就哼着歌愉快地干了起来，丝毫不顾炎热的天气，还有干活时漫天的尘土。

每天中午，为了保持我从十四岁当学徒工时养成的习惯，我给他们一个小时时间午休，而我则去跟父亲一起吃午饭。干了一个多星期，父亲问我进展。“来看一看吧。”我邀请他，骄傲地想让他看到一些进展。我们走进仓库时，我的两个手下正坐在木板箱上吃他们寒酸的午餐，也就是木薯。

“这是怎么回事？”父亲指着帮手们问。一开始，他们和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直到他严厉地对他们说，“赶紧工作！”他们一丝不快都没有，就立即恢复了工作。我试着跟父亲解释，他们是在我的指示下休息，现在还是他们的午休时间。他把我领到仓库外面，对我长篇大论了一番，在非洲做事，跟在欧洲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些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午休时间。”他板着脸说，“你这是在用浮夸的外国

理念混淆他们的视听。我给他们这么多工资，是让他们来干活的——而不是来午休的。”

我觉得难以置信，“这些人”天天看着有钱的老板们午休，怎么会不知道什么是午休时间。有一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跟父亲说，或许他是担心在我的“混淆”之下，其他人也会坚持要求午休时间，他立刻就生气了。“你真是太不懂非洲了，也不知道在这里是怎么做事的，”他对我说，“所以，别再管闲事了。”我觉得我很懂了，但为了不吵架，只能闭嘴。后来我问我的帮手们，他们能拿到多少钱。他们说，他们每天的薪水是二十五分。那个时候，这点钱只够买一包香烟。三十年后，回想起这一幕，听说塞缪尔中士1980年发动了针对美国利比里亚统治者的血腥政变时，我毫不吃惊。

经过三个星期的勤奋工作，我的帮手们和我完成了这个任务。分开的时候，我告诉他们，差不多一个月之后，来找我一趟，等我拿到我那份酬劳的时候，我会给他们发一份特别奖金。或许他们不相信我，因为他们再也没来找过我，我也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俩。

当我把十二台修好的、重新喷漆的秤交给父亲时，他着实吃了一惊。用标准样块测试了秤的精度后，他说我是个机械天才，还说想要买这些秤的人已经排上队了。几天后，他递给我三十张十美元的钞票。这是我离开德国后赚到的第一笔钱。

婚礼

一个消息像飓风一样袭击了我的父亲。法缇玛宣布她与一位电气技师已经订婚，并且很快就要完婚。这位技师来自英国统治下的塞拉利昂。虽然马萨夸依家的其他人都不怎么高兴，觉得这是桩极不相配的婚事，但他们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继续过他们的日子。而我的父

亲，却认为这是他人人生中令他失望的几大憾事之一。虽然因为“遗产问题”，他跟法缇玛姑姑早就不说话了，但他对她的学术成就十分骄傲，经常在外吹嘘这个“聪明的妹妹”。作为莫莫鲁的长子和马萨夸依家族名义上的领头人，他觉得自己有权置喙妹妹的伴侣选择。如果她要嫁的是某个他认为能配得上她的人，他可能还会原谅她根本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她的反抗之举。在他看来，她选的这个男人，“是个该死的布希曼人，名字跟个奴隶似的，弗里曼。”说得好听了，是句玩笑话，说得难听点，是对他的侮辱。在他的精英主义理念里，法缇玛令整个家族蒙羞，让他们的父亲莫莫鲁丢了脸。

法缇玛非常清楚兄长的看法，却继续筹备自己的婚礼。婚礼的日子刚好是利比里亚的独立日，1948年7月26日，也正好是共和国第101个建国日。父亲没有出席婚礼，他的缺席很显眼，父亲跟别人说，他不能出席这种“可笑的场合”，尽管如此，他还是祝我“玩得开心”。作为让步，法缇玛把自己的婚后姓名翻译成瓦伊语，自称法缇玛·马萨夸依·法恩布里。就算这样，我父亲对这个妹妹的婚事的想法也没有任何改观。

教堂里的仪式结束后，弗里兹、莫里斯和我刚够时间赶到棕榈树掩映的布罗德大街上看独立日大游行。街道两边都是观众，莫里斯说，有些人是从很远的村庄过来，专门看这年度盛典。这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看纳粹游行的情景。

游行队伍由一支不合调的军乐队带领，后面是一群穿破旧卡其布制服的人。他们都背着过时的闪电式步枪，每个人似乎都在踩着别人的节拍而不是自己的拍子前行。只有每一排排头挥舞着军刀的军官才穿着鞋子和长裤，还有不合体的美式束腰外衣。莫里斯掩饰不住自豪之情，跟我说，我看到的正是威武的利比里亚国防军，整个国家的全部军事力量。我很想说这跟纳粹和盟军的军队游行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想了想还是算了。

游行的一大亮点是塔布曼总统及其内阁的出现。虽然天气炎热，他们都穿着正式的黑色燕尾服，灰裤子，戴着黑色高筒帽。除此之外，他们还披着五颜六色的肩带，上面装饰着闪闪发光的石头和金属片，总统身上的装饰最多。即便是在现在这样正式的场合，总统也不舍得放下他最爱的哈瓦那雪茄。他向欢呼的人们挥动右手致意，左手拿着雪茄，不断冒出烟圈儿。

紧跟在总统身后的是副总统克拉伦斯·辛普森和国务卿丹尼斯。弗里兹说，这两个人是“除总统之外利比里亚最有权势的两个人”。我记得父亲对我说过，这两个人都是他的好朋友，国务卿丹尼斯更是亲自为我安排办理了利比里亚护照，并寄到了汉堡。现在我终于明白，他跟我说的，在利比里亚这样的小池塘里当一只大青蛙的好处是什么意思了。反之亦然。有这样的好朋友，我父亲也得是一只相当大的青蛙。

回家之前，我问莫里斯是否可以帮我找份工作，因为我已经厌倦了整日游荡。莫里斯说他也“没有工作”，他也在找工作。“我听说，共和国钢铁集团的子公司，利比里亚矿产公司正在招人建造他们的布鲁维尔工厂，”他告诉我，“如果你感兴趣，我们可以明天去申请。”我当然感兴趣，答应第二天跟他一起去。

那天晚上，从法缇玛的晚宴回来后，我不得不给父亲详细汇报这场婚礼——谁去了，谁没去，人们都说了些什么。

“你怎么看待今天的游行？”接着他问。看过当年纳粹党卫军威风八面的正步走，我不得不强忍住恶评的冲动。但父亲发现了我的轻视。“你在得意什么？”他问。

“好吧，如果你真想知道的话，”我准备好接受愤怒的反驳，“我觉得，你们的国防军就是个大笑话。”

然而父亲并没有生气，而是赞同我的看法。“我知道那些国防军并不是真正的士兵。”他承认，“他们都是从民间直接征集来的，从没

接受过正经的军事训练。总统知道这一点，不光是知道，他还想要保持这种状态。”

我从小在一个把军事力量奉做国家价值与声望的主要衡量标准的国家长大，无法理解总统居然会如此缺乏军事野心，直到父亲解释给我听。他说，塔布曼见过太多拉美领导人被自己的将军、司令推翻，于是决定从这届政府开始，推行军事最弱化管理——“如此无能、无组织的人民，连自己的祖母都无法推翻。”

我觉得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开始用更加尊重的眼光来看待这位总统，直到我想到另一个问题。“如果利比里亚被外界袭击，总统会怎么做？”我问。

“这种风险，”我父亲解释说，“是总统愿意承受的，因为被利比里亚的三大邻国：英属塞拉利昂、法属科特迪瓦和几内亚袭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塔布曼知道，边境线有欧洲和美国守护，他信得过他们。”

布鲁维尔

第二天早晨，我父亲一下去办公室，我就去利比里亚矿产公司的招聘办公室门外找到了莫里斯。上交填好的申请表后，一个金发的荷兰人把我叫进了办公室。他对我的申请表很感兴趣，仔细研究过后，告诉我，基于我的德国熟练工资质，他可以给我一份上好的机工工作，每天十美元。我觉得仿佛中了大奖。有了这份工资，我可以轻松养活自己，还可以给德国的母亲寄钱。

答应下个星期一开始上班后，我正要离开他的办公室，他把我的申请表递给我，提醒我忘了填国籍。“我是利比里亚人。”我说。

突然，荷兰人尴尬地愣住了。他跟我道歉说他太心急了，他说他以为我是个美国人。“这其实是一套美国装备。我们跟利比里亚政府

之间有一份协议，我们给利比里亚人的工资是有限额的。因为你的德国背景，我可以破个例，给你每天最多五美元的工资。”

我惊呆了。因为利比里亚政府和外国公司签的愚蠢协议，我就要少拿我该拿的钱。不过我知道我没有资格讨价还价，只能接受这份工作。

跟莫里斯会合后，他高兴地告诉我，他找到了一份三美元一天的工作，当汽车技工。战前，他就曾经在美国军用车辆调配场当技工。听说了我的遭遇后，他事后诸葛亮地说，我应该在国籍问题上撒谎。他说，如果外国公司被允许付更高薪水的话，就没有利比里亚人愿意去利比里亚人和利比里亚政府开的工厂里面干活了，那里薪水太低。因此，费尔斯通这样的外国公司便可以用二十五美分一天的工资聘请数万名橡胶收割工，让他们背上伤痕累累地为美国的橡胶大亨们收割橡胶。

当我告诉父亲，我在布鲁维尔找了份工作，莫里斯会跟我一起去时，父亲气得发疯。他咆哮、斥责我的“背叛之举”，还提到博恩霍尔姆号船长的话。“现在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了。”他悔恨地说道，“我把你接来，领进我的家门，让你大吃特吃，仿佛我有个肉食加工厂一样，而你却跟我的敌人来往。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

我并不知道，哪怕之前的二十多年他没有在我身上花一分钱，现在跟他生活了仅仅三个月，我就欠他这么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拼命克制自己，为令他失望向他道歉。我努力说明理由，找一份工作是合情合理的——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买管牙刷或是看场电影都要找他要钱，也可以不再终日游荡。

我仿佛是在对墙说话，因为父亲根本听不进去，反而不停地指责我背叛了他。

莫里斯和我都没有交通工具，所以当查尔斯·汉森，我们在美国大使馆的朋友，提出要把我们捎去布鲁维尔时，我们愉快地接受了。清晨，查尔斯和莫里斯来接我，我想跟父亲说再见，却找不到他。杰

森说“先生”一大早就开车走了，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去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所以我给他留了一张简短的字条，说我觉得很抱歉，找一份工作让他这么生气，但我不能因为来了非洲就不做一个独立自主的人。末尾，我用一种和解的语气说，“我可能会错过我们的清晨闲聊了。照顾好自己。爱你，你的儿子汉斯。”

因为查尔斯决定走土路，而不是新修好的高速公路，所以他开了大使馆的一辆吉普车，而不是轿车。查尔斯一从父亲的房子开走，我就觉得像是离开了监狱一般。我知道，我一直怀念的是自由，惧怕的是把我当成私人财物一样来保管的父亲。当即我就决定，再也不会让自己陷入这种情境。

此时此刻，我决定充分发挥自己的冒险天性，在困境中也要做到最好。我想我在汉堡的朋友们，尤其是弗里德·加斯，应该看看我现在的样子。穿着卡其布衣服，带着太阳帽，我们三个“探险家”行进在颠簸的道路上，远离任何人类文明。

我问我们是否有可能碰上狮子或者其他本地野兽。莫里斯说我们遇见“野牛”——利比里亚最凶猛的水牛——的可能性更大。就在我想要表示怀疑的时候，我哥哥让查尔斯停车。“看吧。”莫里斯指着远处地面说。我看到的東西吓了我一大跳。“我们赶紧走吧。”我大喊道。地下巨大的脚印还有巨大的粪便都说明这是某种巨型牛科动物。

终于，我们来到一条广阔的河边。“就是这里了。”莫里斯说，“开车只能开到这里。过了这条河再走一会儿就是布鲁维尔了。”

“我们要怎么过河？”我问。

“别担心。”莫里斯安慰我。他大吼一声，周围五颜六色的小鸟吓得都飞上了天，猴子还有其他动物都钻进了树林。很快两个村民划着一条独木舟过来，停靠在岸边。我们把自己的东西递给那两个人，谢过查尔斯把我们送到这里，然后登上了独木舟。

“要小心野牛！”我对查尔斯喊道。他一直冲我们挥手，直到我

们在河道拐了个弯，再也看不到他为止。

除了划桨打在水面的声音，独木舟安静地前行着。时不时地，我们会经过小小的村庄。村里的人们都过着简单的日子，打扫、把玉米粒捣成粉、烘焙、做饭、洗涮、带孩子，他们像这样已经干了几个世纪了。路过的每个村子，都有小孩子向我们挥手。我们也向他们挥手致意。

靠近登陆点时，我看到前方水面上漂浮着巨大的漆黑物体。我问莫里斯，前面是不是沉毁的独木舟，他咧嘴笑了起来。“什么独木舟。”他嘲弄地说。

离近了一看，可怕的真相击中了我。在我们前方50英尺处，我以为是独木舟的，其实是一条巨大的鳄鱼。我的直觉告诉我，要赶紧避开这条眯着眼睛懒洋洋看着我们的大怪物。但是相反，我们的独木舟却停了下来。莫里斯小声让我保持安静别动。“别担心。”察觉到我的恐惧后莫里斯安慰我说，“只要我们不惹他，他就不会惹我们。”

莫里斯似乎很了解自己在说什么，因为“他”一直跟我们保持距离，又死死地盯了我们几分钟后，扑通一声就俯冲到深不见底的河水中，留下一条小船大小的尾流，使我们脆弱的独木舟剧烈地晃动起来。

坐完了船，上岸后靠自己的双腿行走，我放心多了。只走了几分钟，我们就来到了利比里亚矿产公司的办公室。我们被分配了宿舍，又被交代了第二天的工作安排。我们的“新家”是一栋木制宿舍里的一间，里面只有两张木床，两个金属储物盒，还有一个有自来水的洗手盆。我们被警告说这个水是不可以喝的。我们累得顾不上多想这糟糕的环境，立即睡着了，虽然屋里热得很，蚊子又总是嗡嗡地缠着我们。

第二天早上，我分到一份电弧焊的活，莫里斯被派去了车辆调配场。一开始，我有点紧张，因为我已经有三年多没有焊接过东西了。但试了几次之后，我的手开始稳定，很快就能焊出完美的焊缝。

不知不觉间，第一个工作日就这样结束了，莫里斯和我回到我

们荒凉的宿舍。正当我要为这糟糕的环境感到沮丧时，莫里斯提议，我们忘掉眼前这一切，去布鲁维尔唯一的酒馆里找找乐子。不用他多说，我一口就答应了。酒馆里人很多，大多都是利比里亚矿场公司像我们这样的工人还有当地的女人。我猜，她们跟汉堡岸边的女人们是一样的。有些“情侣”跟着过时的曲子起舞，麦克风里放的是《请对我诚实，姑娘》。我知道自己并不喜欢这音乐，也不喜欢这里的女人，当一个年轻的女人邀请我跳舞时，我礼貌地拒绝了。“我弟弟只是害羞。”莫里斯根本不懂我的疑虑，也完全不知道我是没有兴趣。当我站在一边小口喝着一罐啤酒时，莫里斯正抓住被我拒绝的女孩的手，在舞池里跳得欢，充分证明了缺乏舞蹈天分并不妨碍人们参加舞会。

第二个星期，酒馆成了我们下班后常去也是唯一的消遣之处。我们要么就是在宿舍里无聊到发疯，不断被蚊子骚扰，要么就是把悲惨淹没在过时的音乐、啤酒和容易上手的女人中。一天晚上，莫里斯和我躺下后，我有一种奇怪的晕眩感，以为是在炎热的车间里干了太长时间的焊接活，有可能吸多了有害的焊烟。可是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控制不住地颤抖，我知道我有大麻烦了。我告诉莫里斯我的感觉，他摸了摸我的前额和脉搏。“你得了疟疾，兄弟。”他颇具权威地说，“我得立刻把你送走。”说完他冲出门，我听见他朝着工厂的方向跑去。

几分钟后，他回来说他做了一番安排，我们可以搭公司的卡车，一个小时内就出发前往蒙罗维亚。他在我身上盖了好几条毯子，让我躺好，一切都交给他。他还安慰我说，这一次我们会走高速公路，不用再坐船面对鳄鱼了。

一路上大部分时间我都在睡，直到卡车停在我父亲的房子前，我都没彻底清醒。莫里斯去了办公室，回来的时候带着我父亲和杰森。我在想，现在我又回到父亲的屋檐下，靠着 he 生活，他会怎么对待我呢？不过，我病得太厉害，顾不上这些。我只想一个人躺着睡觉。我

记得莫里斯和杰森把我抬下卡车，又抬上楼，帮我换好睡衣后，又把我抬上床。“照顾好自己，兄弟。”我听见莫里斯说，“我很快就来找你。”

接下来我知道的事就是，提图斯医生在给我做检查。“你得了严重的疟疾，孩子，”提图斯医生确认说，“不过别担心。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接着，他转向父亲说，“让他务必多喝苏打水，按时服药。”

医生一走，父亲的指责就像一连串炮弹一样轰向我。“你知不知道，只要我想，我就能让你再也收不到你母亲的一个字？”他咆哮说。这是他心里对我最严厉的惩罚。幸运的是，我的头脑和理解能力都一片麻木。当我陷入一个深沉而甜美的梦乡时，父亲的声音渐渐消失了。

杰森不得不把照顾我这件事加到他本就已经繁忙的日程中。无论什么时候，我因为寒颤发作从睡梦中醒来时——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都坐在我床边，用一块冰水浸过的毛巾给我敷额头，用勺子喂我喝汤，照顾我喝苏打水还有像胆汁一样苦的药。

有一次，半夜，我被一阵挠门声吵醒。我让杰森去看看是什么动静。门缓缓地开了一条缝，我看见一只手，然后是一条胳膊。手上长长的手指冲我伸来，仿佛要抓我，却没有实质的人形。胳膊越来越长，手越来越近。我使劲往头顶墙上躲，想要躲开那些快要抓住我喉咙的手指。就在它们要碰到我的时候，我尖叫道，“杰森！”

“你还好吗，汉斯先生？”我听见杰森低沉而令人安心的声音，才知道是自己烧糊涂了。几秒种后，父亲从门外探进头来，听见杰森说是汉斯先生做了个噩梦后，又赶紧撤了回去。据我所知，这是这么多天里他第一次来看我，虽然我总能听到他跟杰森还有其他人在外面说话的声音，知道他一直在这里。突然之间，我被一个荒谬的念头击中了。那只在梦里缠着我，想要扼死我的手，我想可能就是父亲的手。

渐渐地，我的高烧退了，昏睡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但我还是虚弱得起不了床，只能挣扎几步去卫生间，但我肯定已经渡过了危险期。所以杰森不再24小时守在我床边，而是定期来查看我。

逃离

我依旧卧床不起。有天晚上，我听见父亲外出回来。这次跟以往不同。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女人，却不是他通常交往的瓦伊族女人。我能分辨出来是因为，他们上楼走进客厅的时候，他听上去特别的热情。“我能给你拿点什么喝的吗——要么来点威士忌？”他问。一个女人回答说，“威士忌和水都行。”

女人说一口纯正的英语，既不是利比里亚人，也不是美国人。她的声音好听又轻快，我却听不出是哪里的。当她告诉我父亲，她还是觉得有点想家，想念金斯敦，我终于有了线索。我猜她是牙买加人，因为最近有一群牙买加移民抵达蒙罗维亚。

一开始，偷听让我觉得难为情。我努力不去偷听他们的对话。但父亲丝毫没有放低声音的意思，我想不听都不行。我全神贯注地听着，父亲的话题转移到我身上，“我那个该死的杂种儿子从德国来了之后就只知道给我找麻烦。”接着他发表了一篇长篇大论，用非常难听的话说我，从我在博恩霍尔姆号上的“犯罪行为”开始。“更有甚者，”他总结说，“我儿子居然有胆子回来，得了一身的疟疾，需要吃的、住所和治病的时候，还来占我的便宜。”

这个时候，我已经听够了。这种日子已经变成地狱。我的第一反应是走进客厅告诉父亲，他可以不用担心我会成为他的负担了，我明天早上就走，再也不会回来。因为愤怒和无力，我浑身颤抖，决定再做一件事情。

大概一个小时之后，这两个人终于结束了“约会”，父亲准备送那个女人回家。一听见他的车开走，我就赶紧穿好衣服，把我的东西都装进行李箱里，然后冲下楼。经过杰森的时候，见我这样着急离开，他一脸懵懂，却又不敢问我。我告诉他别担心我，谢谢他给我的所有帮助。我打算去找法缇玛姑姑，她就住在几个街区开外。为了不遇见返回的父亲，虽然外面一片漆黑，我还是爬上父亲房后陡峭而泥泞的小山，而没有走大路。我的膝盖在发抖，我的心砰砰跳，我能感觉到每个毛孔都在冒汗。我差点晕倒，又生怕父亲会抓住我，把我扭送回来。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我无法反抗他。爬山的途中，我有一下没有抓稳行李箱，它滑下了山坡，我不得不下去捡起它又重新往上爬。这让我想起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国王在众神的责罚下，推一块巨石爬上一座陡峭的山，然后再让石头滚下去，然后再推上去，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种毫无意义的苦力活。我记得，西西弗斯本来是奥林匹斯山上的神，因为触怒了众神而受此责罚，我在想我究竟做了什么，居然会有相似的命运。

虽然只走了几个街区，但我觉得自己从未走过这么遥远的路，我终于来到法缇玛姑姑的家。夜已经深了，她还没睡，在照顾她刚出生的女儿。她给女儿起名“皮普琴”（小娃娃），纪念她在德国度过的时光。我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十分感激法缇玛姑姑的贴心，她看了一眼我被汗浸湿的衣服，烧得糊里糊涂的样子，还有我的行李箱，便让我直接去睡，明天早上再跟我细说。

尽管累得精疲力尽，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睡着。每次听见汽车的声音，我都以为是父亲在找我。我知道，我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的骄傲。蒙罗维亚是个小地方，我离开他的消息肯定会传得飞快，会让人们充满疑问。

第二天我醒来时，已经是下午了，好几个星期了，我的感觉从未那么好过。想起过去的24个小时，我感到精神一振，无论是身体上还

是心理上，仿佛被注入了一股新能量。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又自由了——从父亲的压制和统治之下。虽然这个父亲，在我小的时候从没支持过我，到了现在却又总是不明白，我已经是成年人了，有自己的主见，早已经习惯了独立，为自己负责。

几天后，我马上就要痊愈了，法缇玛姑姑在她的客厅里召开了马萨夸依家族会议，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法缇玛的丈夫，作为外人，被禁止参加会议，马萨夸依家所有的会议都是如此。纳撒叔叔，家族与父亲之间法律大战的智囊团，专程从巴德维的费尔斯通种植园赶过来，他是那里的地方法官。亚伯拉罕叔叔也来了，他是农业部的高官。还有我的哥哥，莫里斯。所有人都同意我离开父亲，他们纷纷说，他们都很吃惊，我居然可以忍受他这么久。

我告诉他们，一旦知道父亲和我已经反目，我母亲肯定会很担心的。亚伯拉罕叔叔给她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了我离开父亲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任何一个有独立头脑的人都无法跟阿哈伊相处”，让她不用担心我，因为马萨夸依家其他人都会照顾我。接着法缇玛姑姑提议，我给父亲写一封信，说明我为什么无法继续跟他生活。我很高兴能一吐为快，写了一封信，倾诉了我初到利比里亚时的希望与梦想，也说到了当我发现他并不是这些年来母亲在我记忆中塑造的伟大父亲时，我的失望之情。“如果你想把我养成那种绝对服从你的儿子，”我总结说，“你就应该从我还是个小孩时一直陪在我身边。现在，你已经晚了整整二十二年。”所有人都觉得这封信写得非常好。

从我住进法缇玛姑姑家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是暂时的，皮普琴的降生让她没有多余的空间。我生怕打扰得久了惹人嫌，便接受了莫里斯的提议，去他那里住。

我没想到等待我的会是这么大的意外。莫里斯随口一说的“我的住处没什么特别的”，简直是年度最保守的陈述了。他的家在坎普约翰森路附近的岸边，在一片铁片屋顶泥土墙的棚屋区里，只有一个房

间，还有一个充其量能称作门廊的地方，放着几个木板箱，我估计是当阳台家具来用的。屋子只有一个窗户，上面的木板，可以用一根木棍支起来。屋里没有水，没有自来水，连自来水管道也没有。让我有点想笑的是，我发现整间屋子里没有任何可读的东西。挂着草席的墙上，贴了几张报纸，走近了看，才知道是好多年前的旧报纸。屋里只有一张床垫，上面铺着床单和一块美国军用毛毯，床垫旁边的水泥地上放着一盏用电池的煤油灯。我问床单上、毯子上、地上黑色的小球球是什么，莫里斯非常简洁地回答，“老鼠屎。”

跟莫里斯的住处相比，我们在汉堡大轰炸时期住的地下室居然显得很好了。看到哥哥居住的地方，我难以掩饰住自己的惊愕，也不愿意把这里当做自己的家。但我决定不要这么消极。毕竟很早之前我就从母亲那里学会了“惹急了，魔鬼连苍蝇都吃”。

莫里斯说，这是他母亲的妹妹的房子，几年前她去世后，他就继承了它。他只是“偶尔”在这里住。他说这片区域的大多数人都是克鲁族。他还安慰我，这里晚上跟亚伯拉罕家一样安全。“我从不锁门，没人会抢劫我或者来烦我。就只有老鼠——在这里，我们都很了解并尊重对方。”

我可不想理会莫里斯的和平共处自由主义哲学理念，尤其是跟老鼠有关的时候。

莫里斯给我介绍了这里的一些设施，比方说旁边的一个厕所，还有一个手动的抽水泵。他说只要我需要，我可以随时过来。“你也可以带朋友一起来。”他顽皮地笑着说。

我不敢想象带女伴来这里会多丢面子，但还是谢谢莫里斯在我需要的时候这样帮助我。

在新“家”住的第一晚是一场冒险，我永生难忘。莫里斯告诉我，当天晚上他不打算回来住，所以我也故意回来很晚，想尽可能缩短待在屋子里的时间。我躺在“不那么干净的”床单上，吹熄了煤油

灯，突然之间墙上的草席断了。大概有几百只老鼠冲了出来，尖叫着在我身边跑来跑去。

觉肯定是睡不成了，我点亮了煤油灯。仿佛碰到了什么魔法，吵闹声一下就停止了。唯一能说明老鼠还在这儿的，就只有屋顶上时不时落下的粪便。为了让它们保持安静，我决定开着灯睡。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所以我只能在老鼠的陪伴下度过许多个夜晚，最后，我终于能做到对它们“视而不见”了，因为我采用了莫里斯的哲学，“只要你不惹它们，它们也不会惹你。”

纳撒叔叔

幸运的是，我不用在莫里斯那里住太久。就在我慢慢习惯了老鼠的时候，纳撒叔叔来到法缇玛姑姑家里，邀请莫里斯和我跟他去费尔斯通的橡胶园里住一段时间。纳撒叔叔答应，用他的影响力帮我们在利比里亚国际航空找份工作。那是一家美国公司，有一小队DC-3飞机，往返于罗伯茨菲尔德附近和橡胶园之间。

事实证明，跟我那一本正经的父亲不同，纳撒叔叔是个很好玩的室友。纳撒叔叔住在橡胶园政府大院内一栋宽敞的平房里。自打莫里斯和我住进去，他对我们更像是一个大哥哥，而不是叔叔。他的妻子茱莉亚怀着身孕，带着他们年幼的女儿玛利亚住在蒙罗维亚。而纳撒叔叔作为一个不虔诚的天主教徒，则跟附近村庄的一个年轻姑娘同居，打发自己短暂的“单身汉”时光。我发现婚外私通是利比里亚男人历史悠久的传统。纳撒跟莫里斯和我说，如果我们有女伴，他不会反对。我们顺水推舟地找了两个漂亮的女人，让我们在橡胶园的日子不那么无聊。

虽然纳撒叔叔表面上很快活，但他也有冷漠的一面。我是在一

天早上无意中发现他这一面的。那时，我们正一边吃早餐一边聊天。突然，一声尖叫打断了我们。我望向窗外，看到院子对面的小监房前面，一个穿制服的大块头警察，弯腰对着一个蜷缩在地上、带着镣铐的男人，残忍地用一根木棍不停地打他。纳撒叔叔看了一眼，又继续吃早饭，仿佛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警察打得越来越起劲，那个人嚎叫得越来越凄惨。我问他是否会阻止这种暴行，他说他一点也不想做，那个被判鞭刑的囚犯活该受这种惩罚，还应该承受更多。“有些土著，”纳撒叔叔看到我震惊于此事，跟我解释说，“什么都听不进去，只屈服于暴力，因为他们就是这样长大的。跟他们讲道理，要他们别再犯同样的错误，只是浪费时间。”

“把他们关进监狱，让他们坐牢呢？”我试着争辩。

“我们没有那么多资源，把这么多犯罪者长时间地关着。”纳撒叔叔说，“对付橡胶园这些犯罪分子，最好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顿好打，希望他们不会太快忘记。”

纳撒叔叔说利比里亚土著从小就是被粗鲁对待的，或许有他的道理。我记得我看过莫里斯的某个姨妈把一个大约六岁的小男孩绑起来，用一块蘸了辣椒水的破布洗他的眼睛、嘴巴和鼻子，然后毫不留情地用木棍打他。他的过错是不肯承认偷了一枚硬币。而在被罚时，这枚硬币被他吐了出来。

渐渐地，外面的嚎叫声停了下来，变为低低的呻吟，警察终于完成了自己可怕的任务。接下来，他一把抓起受害者，扔进一个地洞里，盖上一块木板，又压上一个重重的钢桶。

我还想争辩几句，为囚犯争取宽大处理，但莫里斯示意我闭嘴。

“明天，如果你愿意，你和莫里斯可以跟我一起去法庭看看是怎么回事。”纳撒叔叔说，“但我想要你记住，这是利比里亚，不是德国。我们这里的标准不同。”

我们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说到德国和利比里亚司法标准的不

同，我想起纳粹的暴行，我确信，跟盖世太保的刑讯室比起来，利比里亚的监狱算得上是豪华的SPA了。

我早就知道，作为利比里亚政府在费尔斯通橡胶园的最高代表，我叔叔被数千名橡胶园工人认为是最终权威，而这份敬畏并不仅限于黑人。费尔斯通的白种美国人也早已学会了尊敬这位被人称为“德国法官”的矮胖男子，因为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让人知道，他是在前纳粹时期的德国学的法律。他的前任们对待橡胶园里违反法规的白人都很宽松。纳撒与他们不同，他是第一位把犯罪的白人关进监狱的法官，树立了强硬、公正的口碑。大多数案子都涉及虐待非洲工人。一有这样的案子，纳撒就会有好几天不问世事，“去他乡下的农场”，防止费尔斯通的官员们付点钱就把嚣张跋扈的手下捞出来。这样的小伎俩得到塔布曼总统的全力支持，他经常用德国法官处理案件的方法来对待他星期六下午俱乐部的伙伴们。

纳撒叔叔、莫里斯和我走进大院里监房旁边的小法庭时，里面已经挤满了穿着土著服装的村民。纳撒叔叔披好白色法袍，坐在长条桌法官席上，莫里斯和我坐在旁边专门为我们安排的座位上，之后一个充当法警的警察命令人群“起立，安静”。

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一长串的原告提出了各自的控诉，从羊被偷了到通奸，什么事都有。每个案子，纳撒叔叔都会耐心听原告被告两边说完，问一些问题，接着思考一会儿，然后宣布一个裁定，大多都是基于常识，而不是什么书面的法律。大部分案件的判决结果都是折中的，令双方都满意。比方说，一桩通奸案被否决，丈夫的“传统赔偿金”诉求被驳回，因为有证据显示，实际上是他鼓励自己的妻子与橡胶园的工头“有染”，为的是收取赔偿金。“这是你第二次这么干了。”纳撒叔叔斥责原告。“下一次你再带同样的故事来这里，我会以拉皮条罪把你扔进监狱。”

为了让橡胶园的工资保持在众所周知的二十五美分一天，纳撒

叔叔判的罚金通常不会超过三美元。有些案子里，他命令被告用鸡或羊来支付罚金，或者帮原告盖一间新屋。现在我终于明白纳撒叔叔说的，“我们这里的标准不同。”

罗伯茨菲尔德

旁观乡村式庭审的第二天，纳撒带着莫里斯和我去罗伯茨菲尔德找利比里亚国际航空公司总裁麦特·亚当斯面试。很显然从一开始，这个来自纽约的健壮美国佬亚当斯就不稀罕莫里斯和我给他打工，而是想要给自己挣一点政治印象分。莫里斯和我还没来得及详细说明我们各自作为机工和汽车技工的资质，他就说，我们转天就可以来上班，工资每天十美元，并对纳撒叔叔给他一个效力的机会千恩万谢。

在跟黑人水手们混迹于汉堡岸边时，我就听说过“汤姆叔叔”这个词，说的是黑人对白人的谄媚。刚才的所见所闻清楚地向我证明了，论谄媚，可不是黑人的专利。我发现，权力而不是肤色，才是决定性的因素，当“汤姆叔叔”的通常都是白人。

罗伯茨菲尔德的日子比蚊虫丛生的布鲁维尔要好太多了。罗伯茨菲尔德一直是美国轰炸机的基地，他们从那里对隆美尔元帅在北非的部队发动空袭。它决不是对外吹嘘的世界航空旅行的中心，但它有着布鲁维尔缺少的便利设施，包括一个小餐馆和一个邮局。

莫里斯和我被分到机场车辆调配场的维修车间。车间的头头叫迈克·奥姆斯特德，四十岁左右，是个出生于加州的瑞典人，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调过来的。工作了一天，证明他很能干之后，他就被留下了。迈克，六英尺的瘦高个，留着络腮胡，长了一张“扑克脸”，负责整个公司的一小支卡车、吉普车和轿车车队运营。说到汽车，他可真是一个天才，再怎么被宣告报废的车辆到了他的手里都能重新焕发生

机。就连本人也是汽车技工的莫里斯，也对迈克的天分赞叹不已。

新的部件总是不能及时送到，迈克就只能从二战结束后美军留下的几百辆车上拆解类似的部件来救急。可是只要一遇到某种特定的金属件，迈克就束手无策了。这就是我该登场的时候了。迈克先画出个大概的轮廓，我就会使出自己德国机工的本事，通常都能做出他想要的部件。莫里斯也很快就让迈克见识到他对引擎的了解。迈克对我们很满意。这也向公司的总裁证明了，聘用我们不仅是出于政治考量，还出于很好的商业考量。

大多数时候，莫里斯和我都对我们在罗伯茨菲尔德的日子感到非常满意。周末我们通常会搭顺风车去蒙罗维亚，弥补我们社交生活的空白。多亏了我们现在是收入颇丰的单身汉，我们的社交生活又热闹起来。可是就在我们觉得一切都在好起来的时候，我们又被粗暴地提醒，生活是如此地无常。

这个提醒，是一次差点让我们终身残废的爆炸事件。跟之前许多次一样，莫里斯在汽化器下浇一杯汽油，试图修好一个无法启动的汽车引擎。短暂启动后，引擎又被装了上去，莫里斯让我端一杯汽油站在旁边，帮他浇在汽化器下，让引擎一直燃着。可是车没点着，汽化器着了大火，火苗一下子蹿到莫里斯的汽油杯上。莫里斯的第一反应是扔掉烧着的杯子，不幸的是，是冲我的方向，它又点燃了我手里的汽油杯。顷刻之间，我们的手就成了火炬。我们挥动手臂试图灭火，却让事情变得更糟，因为挥手带来的氧气让火焰烧得更旺。我们手上沾到的汽油烧光后，火焰突然就灭了，就好像它们突然烧起一样。但我们的惨剧才刚刚开始。最初的麻木过后，我们的手突然开始疼起来，疼得想声嘶力竭地喊叫。但我们只是偶尔呻吟几句，车辆调配场的司机迅速把我们送到费尔斯通的医院。我永远都不会知道，我是怎么在二十分钟车程越来越剧烈的疼痛下保持意识清醒的。

在一位利比里亚护士给我们清洗并包扎手的时候，一个年轻的美

国白人医生给我们开了止疼片，他说我们非常幸运：我们只是二度烧伤，他估计两周就能痊愈，如果没有任何并发症的话。紧急处理后，我们就赶紧离开了拥挤、种族隔离的病房，我实在分不清，是病人们的喧闹声，还是食物和消毒水的味道让我更难受。

到了吃饭时间，两个护士想给我们喂一些送到“本地人病房”的气味难闻的泔水。莫里斯和我都拒绝了。“告诉他们，我们不吃这种东西。”莫里斯对护士们说。她们还得把我们的碗送回厨房。我们的抗议没有得到回应，只得再想其他的法子。或许我们太心急了，我们猜测；或许，不好的食物也好过没有食物。最后一个白人总管告诉我们，他刚收到指示，把我们搬去私人病房。他连连为自己的“失误”道歉，说会亲自打点一切，让我们在医院待得舒服一些。后来纳撒叔叔过来看望我们，我们才明白总管说的“失误”是什么意思。我们刚来医院时，工作人员不知道我们是全能的德国法官的侄子，直到听说我们出了事，纳撒叔叔给医院打电话问我们的情况。医院才意识到，他们收治的两个紧急病号其实是利比里亚重要人物的亲戚。虽然在那个时候，即便是在黑人统治的利比里亚，把黑人病号放进白人病房是不可思议的，只能把黑人贵宾放进白人病区里的单间。这对我们来说很好，尤其是我们搬过去后立即送来的食物看上去、闻上去、尝起来都好得多。

恢复期间，莫里斯和我有了充足的时间反思我们的事故。这一分钟我们还得意地在云端飘着，下一分钟我们就在医院的病房待着，打了满满的吗啡，吊着胳膊。我十分感激医生跟我保证的，不会留下永久性的损伤，我决定让过去的就这样过去，不去责怪莫里斯了。

想要更好地消磨时间，我们跟病房里的几个护士培养了友谊。很快她们就会比工作要求的更加频繁地来看我们，陪我们聊天。有个漂亮的护士，尤其让莫里斯和我心动。在好几个场合，她都让我知道，她想要增进彼此的了解。我知道莫里斯心里在想什么，我决定把他打

得落花流水——我想，这是对他让我两只手都被烧伤的惩罚。

工作职责是每天晚上熄灯前来查看我们，给我们每人两片安眠药。每次我都会小声跟她说，等我拆掉绷带，我们就去约会。她听了，就会拍拍我的脸庞，似乎是答应了的樣子，然后跟我说晚安。

一天早晨，我醒来时，莫里斯靠坐在对面的病床上，咧着嘴冲我笑。突然，我想到——趁我睡觉的时候，他已经得手了。他愉快地坦白说，这事儿挺容易的。护士来发安眠药的时候，等我吞下了我那份，他便假装吞下了他的。后来的事，他说，就易如反掌了。他只要等到我睡着了再动手。

这个小插曲，莫里斯认为本该在我们出院后就结束的，却产生了我们意料之外的深远影响。我们出院几个月之后，莫里斯就被护士告知，他马上就要成为一个骄傲的父亲了。莫里斯给他的长子起名汉斯，用的是我的名字，作为对我的安慰，毕竟多亏了我这个叔叔那天晚上睡得那么熟。

我们回到罗伯茨费尔德工作了几天之后，莫里斯跟我说，他要辞掉这份工作。他准备去求塔布曼总统让他在政府部门里工作，并催我跟他一起去。“如果我们求他，他肯定会帮忙的。”他说。“不管怎样，我受够了这种脏兮兮的活儿。这一次我要给自己找份真正的工作。我知道怎么办。”他打包好行李，搭车去蒙罗维亚之前对我说。

我早已经习惯了有哥哥在身边，只能劝了又劝，希望他能改变心意，因为我不想找到更好的工作前扔掉现在这份，但没有成功。

莫里斯经常对我说，除非你加入共济会，否则在利比里亚永无出头之日。所以几个月后他来看我，告诉我他成了共济会会员时，我毫不吃惊。得益于他的人脉，他在共济会里平步青云。当我问他细节时，我这一贯健谈的哥哥却一反常态地嘴严。他告诉我，他偶然遇见了塔布曼总统——塔布曼总统之于利比里亚共济会，就好像教皇之于罗马天主教徒。莫里斯说，他跟总统握手时，用秘密信号表明了自己

的共济会身份，总统的眼睛瞬间亮了。抓住这个机会，莫里斯请求总统下周与他见上一面，打算请总统帮他安排一份政府部门的工作。

“你可以帮我也说一句。”我开玩笑地说，因为我最难以想象的事情就是整天坐在桌子前。那个时候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作为一名记者，我将会这样坐上很长时间。

萨米

虽然我赚不到多少钱，但我很满意这份工作，至少是当时，因为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和独立感。它甚至让我可以请一个家童，一个活泼的巴萨小伙子，名叫萨米。萨米说他觉得自己大约十五岁。一天，他敲响了我的门，问我是否需要人管理家宅。我跟他说我这里没有什么活要干，而且更重要的是，我挣的钱不够请帮手。萨米说他不在乎我给他多少工钱，只要我可以“教（他）书”，意思是教他读书写字。我答应给他每周五美元，按利比里亚的标准这可是天价，教他读书识字，他能学多少我就教多少。作为回报，他要给我打扫房间，清洗并熨烫我少得可怜的几件衣服，其余的时间他可以坐着跟他的同伴们闲聊吹牛。等我下班后，就变成老师，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给萨米启蒙。幸运的是，他学得很快，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他是从头学起，但不到一个月，他就可以读简单的句子了。

总体来说，我对萨米的工作表现十分满意。他没有手表，却像贝尼托·墨索里尼的火车一样守时。每天我去上班前，他就会过来干活。以他自己的方式，他是很诚实的，尽管他对“偷窃”一词的定义与我不同。不管我的衣服对他来说有多肥大，萨米都改不掉自己烦人的习惯，“借”我的衬衫、裤子和袜子出席他们村里的特殊场合，第二天再还回来——领子皱巴巴的，味道刺鼻。不管我跟他说了多少

次，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就叫做偷，即便是打算还回来。可萨米还是忍不住拿我的衣服。有一天，我又因为他“借”我的东西教训他，甚至威胁说要炒了他，他向我坦白说，在他的同伴中，像我那样的“白人的衣服”，尤其是长裤，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没有的话就会被人一直当成“小男孩”。

后来我再去蒙罗维亚的时候，我买了一条卡其裤和几件衬衫。“这些是你的了。”我对萨米说，“以后你别再碰我的衣服了。”

萨米换上新衣服，保证改正自己的行为时，像个灯塔一样闪闪发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他穿长裤，不得不承认，即便没有穿鞋（他讨厌穿鞋），长裤让他看上去更令人尊重。“我想从现在开始我得叫你‘萨米先生’了。”我打趣说，萨米点头表示赞同。从此以后，我便很小心，再也没有叫过他“萨米”了。

紧要关头的和解

因为父亲没有回复我那封抱怨的长信，我想父子关系的破裂对他来说是没法和解的了。证明了没有他我也可以在利比里亚活下去之后，我不再害怕他，也不怕他的雷霆之怒。相反，我还很同情他是个这么小心眼的人，活得这么孤独，没有好朋友，也没有亲密的家人，活在他自己的心灵监牢中。后来我意识到，或许我应该是那个伸出橄榄枝的人。莫里斯赞同我的想法，我们决定在马上到来的新年夜去看望我们的父亲。

我们来到他家，杰森让我们进去了。“你们的爸爸一个人在家。直接上楼吧。”自从七个月前那个难忘的夜晚我仓皇逃离后，我再也没有来过父亲的家。“看看这是谁？”看到我们后，我们的父亲轻声笑着说，“这不是我的两个杂种儿子嘛。”

我能看出来，见到我们他很高兴。我们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买了一瓶上好的威士忌作为橄榄枝。我告诉他，我们刚好在这附近，想着要来看看他，跟他说声新年快乐。“看看你们给我带来什么便宜的威士忌吧。”他开玩笑说，显然是想隐藏自己的感情。莫里斯和我都没有跟他计较。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没有提到以前的事，然后就说了再见。出门前，父亲从口袋的钱包里掏出两张一百美元的钞票，递给我们。“新年快乐，儿子们。用这钱去喝杯酒吧。顺便，”他笑着说，“我跟你们说过吗，你们两个让我想起帕特和帕塔雄？”^①我们俩的个头差异，让他想起二三十年代流行的欧洲喜剧演员。莫里斯和我把父亲愉快的态度当做是一个信号，他在变得柔和，或许我们还有希望消除我们之间的分歧。

然而，我们再也没有机会证实了。两个月后，半夜我被敲门声吵醒。那是我的工头迈克·奥姆斯特德。他从机场的接线员那里得知，我父亲在市中心出了严重的交通事故，被送到甘达的小治疗所急救，治疗所在广播里急寻氧气瓶。“赶紧穿衣服跟我走！”迈克咆哮道，“我车上已经有两个氧气瓶了。”

我们轮流开车，沉默地疾驰在夜间的土路上，穿过几个小小的土著居住区和摇晃的小桥。有些小桥只是用两根树干搭成的。“他可不能死。”我脑子里只有并不断翻腾这个念头。天亮之前，我们赶到了甘达，一个全是泥土屋的小村庄。有人给我们指了路。在治疗所的一个房间里，我父亲躺在一张大床上。他的脖子和胸膛都缠着被血浸透的绷带。我们一走进去，他就睁开了眼睛，看到我时，他脸上的表情显示他认出了我。他嚅动嘴唇，却发不出声音。我只能抓住他的手，一把握住，让我吃惊的是，他同样用力地握住我的手，似乎害怕我会

① 帕特和帕塔雄，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丹麦喜剧演员搭档，一高一矮。

离开。我低头看看他的右手，那只我在高烧中以为要扼死我的手，很难想象我居然曾经害怕过他。

走出房间后，治疗所的一个医师简单地跟我们说了父亲的状况。他的气管被切开，胸腔里也受了重伤。如果他能被送到蒙罗维亚做手术，医师说，很有可能痊愈。但不幸的是，路况太差，父亲很有可能受不了颠簸，死在被送去首都的途中。而通常用来运送人往返蒙罗维亚的小飞机又因为需要大修用不了。我们唯一的选择是，让这里的医师给他做紧急手术，先让他稳定下来，等状况好转再转移到蒙罗维亚。

我们得知，出事故时，父亲为了做生意正开着一辆装满米袋的货车，一辆卡车突然开了过去。卡车后面扬起红色的尘土，父亲没看见这时候又挤进来第二辆卡车，那辆车想超过第一辆卡车。第二辆卡车撞上了父亲的货车。父亲受了重伤，货车全毁了。卡车和司机基本上没事。奇迹般的，坐在货车后面的父亲的家童，居然也没受伤。

迈克说我们除了返回罗伯茨菲尔德之外什么也做不了。走之前，我们去了甘达村外几英里的事故现场。那个场面令我们心惊不已。现场还有许多干涸的血迹，肯定是我父亲留下的。他的货车，已经是一堆扭曲的金属板、框，引擎碎片，碎玻璃渣。显然，车轮已经被“打捞者”拿走了，就好像车厢里面丝毫看不出曾经装过大米的痕迹。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老话，“甲之蜜糖，乙之砒霜。”对于腹中空空的甘达穷人来说，我父亲的故事和数千磅大米肯定是从天而降的大礼。

焦急地等待了十天之后，莫里斯和我得知，我们的父亲已经去世。我们能做的，就只是把他的遗体从蒙罗维亚带回来哀悼。虽然我试图安慰自己说，他从未当个真正的父亲，尤其是最需要父亲的那些年里，我还是感到一种无法忍受的悲痛，还有无法弥补的痛苦。他或许不是我从小尤其是十几岁时渴望的那种父亲，但他毕竟是我唯一的父亲。

葬礼是纳撒叔叔安排的。数百个瓦伊族人还有利比里亚政府的官员，包括副总统辛普森在内（他是代表不在城里的塔布曼总统出席），都来参加葬礼。葬礼后，莫里斯和我才知道，我们亲爱的纳撒叔叔——在外扮演痛失至亲的弟弟——背着我们在忙另一件事。他运用自己的影响力和法律知识，把自己指定为父亲遗产的唯一管理人。我们的父亲死前并没有留下遗嘱，这一事实正好帮了他。

因为我们跟纳撒叔叔的关系一直很好，莫里斯和我没有反抗他这个夺权的举动，尽管我们都认为他的做法非常不恰当，毕竟莫里斯和我都已经成年，用不着监护人了。我们很快就发现，纳撒打算欺骗莫里斯和我，剥夺我们的合法继承权。我记得父亲曾跟我说过，纳撒是家族合谋骗他钱的带头人，便跟纳撒当面对质，要求他让我们知道跟遗产有关的所有信息，尤其是遗产的金额，还有他把父亲的房子租给黎巴嫩商人的进展。纳撒信誓旦旦地答应了，却继续拖延。等了够久之后，我们不断逼他告诉我们消息。最后纳撒告诉我们，令他震惊并沮丧的是，他发现我们的父亲根本不是什么百万富翁，其实只是个穷光蛋，名下根本没有什么财产。他说，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最好守口如瓶，不要让外人知道“这一令人尴尬的局面”。

我们断定他在撒谎，断定他篡改了账本，把我们父亲的财产转移到自己的账户。我们告诉他，我们绝不会闭嘴，或者不战而败。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极其狡诈又极具政治能量的对手，但我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想着这一点，我们给塔布曼总统写了一封短信，说明了我们的困境，请求他以我们已故父亲的名义，代表我们出手干预。不到一个礼拜，塔布曼总统就回复了，并安排我们和纳撒同他会面。

当总统请我们在他那豪华的办公室落座时，我们的叔叔显然很不自在。点燃了必不可少的哈瓦那雪茄后，总统先生要我先说明事情原委。我用颤抖的声音感谢他为了这样一件极其私人的事情跟我们见面，然后，在他父亲一般慈爱的笑容的鼓励下，我告诉他，莫里斯和

我不信任叔叔掌管我们父亲的遗产，尤其是在他告知遗产才那么一点的时候。

听我说完，总统解释说，法律上他没有权利干预这件事，现在他纯粹是以普通市民和马萨夸依家朋友的身份行事。“不过，”他转向纳撒说，“我要求你要本着公平的原则，务必做正确的事情，尤其是考虑到这位刚从德国来的年轻人，他可是完全依赖于他的父亲。”

我注意到，总统说话时纳撒非常局促不安，但他很快就恢复了。

“在您为这个孩子感到难过之前，总统先生，”他回答，“我想让你看看这个，你会更加了解我的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就像公诉人在法庭上出具确凿的证据一般，纳撒洋洋得意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了总统。“请读一下这封出言不逊、毫无尊重的信，总统先生，这是他在我哥哥去世前写给他的。”

我立即认出了那封信，就是离开父亲后在家人的鼓励下我写的那封。令我极为难堪的是，总统大声宣读了这封信。读完后，他称赞了我的英语，然后对纳撒说，“法官，我不觉得这封信有什么不逊或不尊重的，不过，即便有，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你有义务确保这个小伙子得到很好的照顾。他的父亲把他接来，他不能就这样离开。我敢肯定你会想出办法来的。就莫里斯而言，我不担心他。没有他父亲的遗产，他也可以活下去。”

“我会处理好一切的，总统先生。”离开时纳撒一直嘟囔着这一句。

走到大街上时，纳撒转过来，脸上一副掩盖不住的憎恨。“你们俩都会为此付出代价的。”他咆哮着，“别以为你们可以随随便便把我拉到总统面前来让我难堪。我可以跟你们保证——就好像我不得不等着你们的父亲死掉，才能得到我父亲的遗产一样，你们也得等到我死了，才能看到你们父亲的财产。”

我不为所动，在二十三岁的年纪，我根本没想过成为有钱人将意

意味着什么。所以，叔叔的威胁没让我难过。莫里斯就不一样了。他被激怒了，要不是我拉走他，他就要跟叔叔大吵起来。我提醒他，在总统府前袭击法官意味着把父亲的遗产拱手让给纳撒，再把我们自己送进监狱。

拉格斯

与纳撒和总统会面几个星期后，我收到用总统府信纸写的一封信，说总统有一件重要的私事，想要尽快见我一面。我立即去见塔布曼总统。

塔布曼总统一句都没提上次会面的事，直奔主题。“我收到你祖母玛丽·索尼夫人的来信，她住在尼日利亚的拉格斯。她听说你来了利比里亚，也听说了你父亲的死讯，现在，她想让我安排你去看她。”我祖母请求他先给我必要的路费，乘船从蒙罗维亚去拉格斯，她保证说回程的路费她会给我。说完，他从一个信封里抽出一沓二十美元的钞票递给我。“这些应该足够了。”他说，“请你转告我对索尼夫人的祝福。”我谢过总统，他握住我的手，祝我一路顺风。

我知道我要离开利比里亚一阵子了，便赶回罗伯茨费尔德，辞掉了工作。跟萨米和车辆调配场的朋友们告别后，我搭便车回到蒙罗维亚。我跟莫里斯说要去见我们的祖母，他非常热情地同意了，他在不同的场合见过祖母几次。不过说到我的行程，他告诉我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他让我别买昂贵的船票，他可以帮我找人，让我跟船组人员待在一起，只需要花几美元，这样就能省下大部分总统先生给我的钱。一开始我不肯。这个计划听上去不对劲。不过莫里斯说，在非洲有人脉的人都这么干，最后我同意了。

离开的那天，莫里斯陪我来到新建好的蒙罗维亚海港。我们登上

一艘开往拉格斯的英国船。莫里斯用克鲁语跟“甲板男孩们”的头头简单谈了会儿价，然后跟我说，一切都安排好了，我可以有个单独的船舱，可以跟船组人员一起吃饭。很快，我就要到一个新的国家，开始一段新的冒险了。

接下来的三天，这个英国船舱便是我的家，它与我在汉堡岸边了解并喜爱的极其干净整洁的美国船相距甚远。船上的一切都很脏，急需维修。我船舱里的铺位特别脏，爬满了蟑螂，还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味。我很后悔听了莫里斯的话，为了省钱住这种地方。但当到了吃饭时间，我的“主人们”邀请我吃一碗看上去脏兮兮的米饭，还有一份馊了的不知道是什么肉的菜，这时我的后悔变成了愤怒。第二天早晨，早饭是跟昨晚一样的菜和饭。然而这一次，饥饿让我不那么挑剔，我强忍着好歹吃了一点。那天下午，我们停靠在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的塔科拉迪。我下船简单地逛了逛。这是我第一次驻足英属殖民地。第二天，我们抵达了拉格斯，英国最大最受欢迎的非洲殖民地的首都。我很高兴地下了船，并发誓回蒙罗维亚时一定要好好安排一下。

拉格斯的车是靠左侧行驶的。我坐了一会儿车速快得惊人的出租车，经过熙熙攘攘的蒂努布广场，来到祖母的地址，伊格伯塞尔路157号。我走进一栋一层平房的院子里，一个苗条的老太太迎接了我，她浅棕色的脸庞十分美丽，满头白发卷卷的。她一边拥抱我，一边难以自抑地哭着，一遍一遍地念叨，“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我可怜的，可怜的孩子。”她说得一口纯正的英语。她似乎在说我已故的父亲，又似乎在说我。等她终于平静下来，她把我介绍给一位慈祥的老绅士。“这是索尼爷爷，你的继祖父。”她说。我们握手的时候他欢迎了我。我立即喜欢上了这位老人。

索尼爷爷问我旅途是否愉快，因为我坐的是他们公司的船，我坦白了莫里斯的省钱伎俩，说这趟旅程真的太糟糕了。我当即提出上交

省下的那部分钱，但索尼爷爷不肯。“你留着吧。”他说，“这是你应得的——每一分都是。不过，莫里斯应该知道你不该受这种罪。我常说那个孩子头脑不行。”

接着，索尼奶奶指着两个苗条的少女说，“这两个姑娘帮助我打理家事。这个是霍娃，那个活泼的是卡帕坎娅。”两个女孩都有着光滑的天鹅绒一般的棕色肌肤，洋娃娃一样、酒窝深深的圆脸，还有洁白无瑕的牙齿。

“你们把我孙子的行李放到他的房间后，再帮他准备洗澡水。”我祖母继续说道。

“是，夫人。”女孩们异口同声地回答，然后咯咯笑着去忙了。

这时候我才注意到，我的祖母似乎有半边身子是残废的。她的左臂当啷着，她走路的时候还拖着左腿，拄着拐杖也走得费劲。

“是的，我是个老废物。”她注意到我不自觉地盯着她看。“一年前我中风了，从那以后就什么也干不了了。”

那天晚上，我洗完澡，换上干净衣服后，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品尝非洲美食，跟祖母的朋友和邻居们没完没了地握手寒暄。他们听说我来了这里，纷纷来看我，问我在德国的生活，“那个无赖莫里斯”，还有我父亲的车祸。不可避免地，纳撒控制了我父亲的遗产这个问题又被提及。“让我来处理。”祖母安慰我说，“纳撒逃不掉的。我会办到。”

我不知道这体弱年迈的祖母有什么办法，但我很快就会知道了。几天后，索尼爷爷去船厂上班后不久，十几个高个男人来到祖母家，他们都穿着部落长袍。在祖母的要求下，他们在她宽敞的客厅落座，霍娃和卡帕坎娅给他们准备了新泡的茶。

“我知道你肯定会嘲笑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祖母要我坐在她身边，面冲着那些男人，然后低声对我说，“但这些人有能力让你叔叔偷不走你父亲的钱。你不必非得相信，也不用做任何事情，只要坐

在这里看着。”虽然我满心怀疑，但出于对祖母的顺从，我照她的吩咐做了。接下来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目睹了一场奇怪的仪式，又是唱又是把许多小物件传来传去的。那些东西，我看着像是普通的石头、念珠、棍子，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东西，但它们跟什么都没关系，更别提我父亲的钱了。仪式结束的时候，那些人轮流来碰我一下，然后装起了祖母递给他们的小费，静悄悄地离开了，跟来的时候一样。

那天晚上，索尼爷爷下班回来后，带着大大的笑容问我，“你喜欢早上那一通神神鬼鬼吗？”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我说得冠冕堂皇，尽量不伤害祖母的感受。

“你祖母很相信这一套垃圾。”他继续说，丝毫不在意她就站在他身边。“她在英国上的学都白上了，比乡下女人还迷信。”

“随便你笑吧，索尼，”祖母不为所动地说，“我相信我懂得这些。”

洗了一个舒服的澡后，索尼爷爷把长裤和衬衫换成了舒服的非洲睡袍，跟我们一起吃晚饭。“有时候我在想，哪个问题更糟糕，殖民主义还是迷信。”他说。这两个问题似乎是他的痛处。他解释说，几年前市政部门曾经在伊格伯塞尔路上装了许多电子路灯，但是“迷信的乡下人”害怕“黑夜变成白天时”，灵魂会被冒犯，不停地用石头和棍子破坏这些路灯，直到政府放弃维修，让街道就这么黑着。

然后他坐上最喜欢的椅子，开始一天最爱的时光，读他的《西非飞行员》。这是他仰慕的英雄，伊博族的纳穆迪·阿兹基维，尼日利亚众所周知的兹克，出版的一份激进的反殖民主义报纸。“兹克是英国唯一惧怕的尼日利亚人。”索尼爷爷说。通过许多猛烈抨击殖民政府的社论，兹克很得民心，英国人不敢随便招惹他，生怕引发大暴动。“如果他处理得好的话，他会是独立后的尼日利亚的第一任总

统。”索尼爷爷渴望地说。

不幸的是，索尼爷爷并没有活着看见他的预言成真。他不会知道，十四年后，作为《Ebony》杂志的记者，我在纳穆迪总统停靠在拉格斯海港的游艇上采访了他，当时我们离索尼爷爷的家很近很近。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祖母聊天。在她的讲述中，她年轻时候在英国是个“有一手好牌”的女孩，有许多好玩的故事。有一次，她同时被三个男人追求，死缠烂打那种，三个人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都不肯接受她的拒绝，她只能答应跟他们约会，同一个时间，在伦敦海德公园的同一条长椅。三个追求者知道自己被耍后脸上的表情，她现在想起都还会忍不住咯咯笑起来，她说他们再也没有来烦过她。

祖母跟我坦白说，我的祖父莫莫鲁，是她一生挚爱，但他的艳福令人难以忍受。“他的女人缘真是难以置信。”她回忆说，声音里满是惊奇与钦佩。她说，莫莫鲁承认的二十多个婚内婚外子女只不过是冰山一角。她与莫莫鲁分开多年后，我父亲上大学的时候，她在蒙罗维亚认识了索尼爷爷。那时他刚得到一份拉格斯当工头的工作。他求婚时，她抓住了这次机会，并从未后悔过自己的决定。“索尼爷爷是个好人，”她说，“但莫莫鲁是个国王。”

我偶尔会在拉格斯的街道散步，感受这个非洲大海港城市的繁忙节奏。40年代末的蒙罗维亚是个刚刚从百年沉睡中惊醒的小城，而拉格斯则不同，马路和街道上都是满满的车流和人流。

街道两边是政府大楼和企业，从一个妇女盯的花生摊，到庞大的百货商场。我通常会沿着拉格斯著名的码头走，这是一条棕榈树林荫大道，旁边是环礁湖，这个城市就是以这个湖命名，然后穿过熙攘喧闹的蒂努布广场，这是城市的商业中心。我注意到，在白人的监管下，非洲人的地位是很低的，通常是卑微的，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不是殖民对象，而是个自由的利比里亚人。

除了在法属达喀尔与官方打过交道，我从未与殖民主义有过任何

私人接触。很快，我就有了第一次。那时，我打算买一些邮票。来到拉格斯市中心的邮局时，已经有一长队顾客在排队了，都是非洲人。在中午的烈日下，这个队伍有半个街区那么长，都指着小窗口里面的一个小非洲职员办理业务。我决定接着排队，等待轮到我。但有个白种英国人就不是这样了。他穿着殖民者常穿的卡其夹克和短裤，还有膝袜，头戴太阳帽，直接走到窗口，要求办理业务。我听到人群中有些嘟嘟囔囔的抱怨声，却没有人敢公开反抗，除了汉斯·马萨夸依。

“你以为你是谁啊？”我听见自己在质问英国人，“你为什么不跟大伙一样排队？”

突然之间，人们都活跃起来，纷纷出声要求英国人排队。白人似乎难以相信，居然有人敢挑战他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以为他要对付的是一个神经病，因为他一看到我就赶紧转身，在人们的倒彩声中迅速地溜了。

那天晚上，我跟索尼爷爷和我祖母说了邮局的事，索尼爷爷严厉地教训了我很久。“你要庆幸，那个白人没有回来找你算账，捏造煽动暴乱的罪名，把你抓起来扔进监狱。”他说，“这里不是利比里亚，不是黑人当权的地方。这里是英国殖民地，白人已经非常紧张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的统治就快要结束了。现在他们就在故意找茬，把小事当成小火苗，引发大爆炸。他们会做任何事情——我是说任何事情——来延长他们的统治。所以，下一次你再看到英国人做什么你不喜欢的事情，千万别再多嘴，就算是为了你祖母和我好。”

索尼爷爷的劝诫是好意，但我听了更想尽快离开尼日利亚，回到利比里亚，因为我不想待在一个种族歧视的殖民地。在纳粹德国生活了十二年，我觉得我早已经受够了。

在拉格斯住了四个多月后，我回蒙罗维亚的决定令祖母大失所望。她原本暗自希望，我会喜欢拉格斯，留在她身边。索尼爷爷已经在他的公司给我找了一份机工的工作，“薪水很好”——当然，不是

白人薪水标准。我感谢了他，但还是拒绝。虽然我为祖母感到遗憾，她一直希望我能代替她已经失去的儿子，但我还是想追求我的梦想，有一天能去美国。

所以，那一天，我带着沉重的心情，告别了我非常喜爱的祖母和索尼爷爷。出租车来了之后，我给我那哭泣不止的祖母最后一个拥抱。她低声说，“我会很想你的，孩子。”我感觉，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回到蒙罗维亚

这一次，我订了一条美国船的客舱。这条船在穿越大西洋前往新奥尔良的途中会经停蒙罗维亚。铺位上铺着舒适雪白的床单，我把行李放进船舱，就来到甲板上，想要最后看一眼拉格斯。

我很快就在船上找到了家的感觉，因为这条船跟我在汉堡时去过的所有美国船一样，非常干净，味道清新。跟往常一样，船上的乘务员们，除了总管，都是黑人。大多数美国船的客舱都有限，除了我，只有另外两个乘客。我在乘客专用的小餐厅吃晚饭时认识了他们。一个是年轻的尼日利亚学生，菲利克斯·奥斯。他是一个约鲁巴酋长的儿子，是美国南部一所黑人大学的大一新生。另一个乘客叫维吉尼亚·兰斯顿，是个漂亮的金发美女，说话时有浓重的南方鼻音。她坚持让我们叫她吉尼，她说在尼日利亚当了两年卫理公会传教士后，现在要回在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的家乡。

就在我们准备吃饭的时候，总管告诉吉尼，船长已经下了指示，从现在开始，她要带着她的饭菜跟船员们一起吃。传教士显然很烦心，跟总管走之前，跟我们说，她很期盼跟我们一起吃饭，会怀念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想到这艘船要去的是南方城市新奥尔良，菲利克

斯和我确信，船长对传教士的特别邀请，是为了不让南方白种女人跟我们这两个黑人一起吃饭。我们还在谈论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侮辱，尤其是我们现在正在非洲的海面上，吉尼却回来了，脸上挂上大大的笑容告诉我们，她还是要跟我们一起吃饭。她说，当她坐在船长身边，黑人伙食管理员对她冷嘲热讽，不肯为她服务，说为乘客服务违反了工会的规定。这事显然是船长没有预料到的。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悠闲地在甲板上闲晃，而船上的白人船员们却要努力工作，保证船只的正常运营。他们脸上的敌意，表明他们并不喜欢两个人在一个白种女人的陪伴下放松休息，而他们却要工作。虽然他们只是擦擦洗洗，粉刷油漆，但菲利克斯却可以兴致勃勃目不转睛地看好几个小时。我问他看什么看得这么入神，他说，他活到二十二岁，从未看过任何一个白人干体力活。“在尼日利亚，”他解释说，“白人只监督黑人干活，或者干办公室的活。脏活体力活都是非洲人干。”

“美国就不一样了。”吉尼安慰。“你会发现，白人会做各种脏活体力活。奇怪的是，”她说，“英国也这样。只有在殖民地，白人认为体力活不该他们干。”

吉尼说，在她待过的许多个传教点，白人传教士们，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会做体力活。但菲利克斯这个穆斯林并不满足。他对她大发脾气，说非洲沦为欧洲殖民地主要应该怪基督徒传教士们。他指责说，要不是基督传教士们教“我们这些异教徒”甘受侮辱，让黑人战士们变得温顺，白人根本无法征服整片大陆。

“如果你想责怪我们这些基督教传教士让非洲沦为殖民地，你们穆斯林也得承担奴隶制的罪责。”吉尼反驳说。接着，她教训了菲利克斯好一会儿，说阿拉伯穆斯林是如何在非洲成群结队地劫掠，从贪婪的非洲首领那里俘获或购买大量奴隶，然后卖给饥渴的欧洲和美国奴隶贩子。

当我们抵达黄金海岸的塔科拉迪——去尼日利亚时我曾在这里短暂停留——十几个非洲人在热浪熏人的甲板上一边聊天，一边准备往船上装大量可可。

“看看他们，”一个穿卡其制服的高个金发船员用浓重的德国口音说，“他们就是一帮懒鬼！”

“你为什么说这些人是懒鬼？”

“因为他们不想干活。他们只想唱歌跳舞。装这点货，他们花的时间是美国工人的三倍。”

船员的话就是殖民地白人对黑人的主流态度。非洲人不仅要屈服于被剥削，而且要愉快地接受剥削，还要在没有一个白人能够容忍的条件下愉快地接受剥削。

我不想跟这个自鸣得意的船员争辩。如果他自己想不明白，我又怎么才能让他理解，被迫在一个只付给他们仅够饱腹的薪水的体系下苟活的人，没法跟那些拿五十倍工资还有工会各种福利保障的工人们一样干劲十足。这些非洲人买不起房子和汽车。如果干了一天活，挣到的钱只够买一包香烟或一瓶啤酒，他又能勤奋到哪里去呢？

船停靠在蒙罗维亚时，我告别了菲利克斯和吉尼。我羡慕他们很快就要到达我梦想的土地上。我告诉他们，我希望有一天能在美国再见到他们，不过得是在“北方”，因为我可不想涉足歧视黑人的南方。

在蒙罗维亚，我的首要任务就是去兑现对我祖母的承诺。我把塔布曼总统先前资助我的钱还给了他。这次我没见到总统，而是把钱给他的助理布鲁尔上校手里。

接着，我加紧了离开利比里亚移民美国的步伐。我觉得，我留在非洲没什么意义了。我与伊利诺伊州巴林顿的克拉拉姨妈恢复了联系，跟她说，我比以往更想去美国，请求她帮我准备申请美国签证的文件。她回信说，她已经在安排了，不过她最多只能给我办一份临时

的学生签证，而不是永久移民签证。因为美德关系还没有正常化，德国移民的名额依旧被冻结。

克拉拉姨妈说，为了拿到学生签证，她已经帮我注册了芝加哥民航学院，一所中等专业学院，希望我会同意。我高兴得快疯了，回信说只要能让我去美国，我什么都同意。

警局督察员莫里斯

再次见到莫里斯，我大吃了一惊。他穿着一身浆硬的卡其制服，上面有个利比里亚的警徽。我问他为什么穿这种制服，他说塔布曼总统，他的共济会兄弟，批准了他的请求，给了他一个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局督察员的职务。“你要是敢跟我说一句不敬的话，兄弟，”他开玩笑说，“你就等着坐牢吧。”

笑过之后，莫里斯说，他的职责是开着警车在路上巡逻，确保运货的车辆没有超载。这是为了避免利比里亚的道桥承压太大过早被损坏。“如果你愿意，”他说，“你可以跟我一起巡逻。我明天一早就出发。”

我接受了莫里斯的邀约，陪他一起巡逻，在满是尘土的路上开了几百公里，寻找超重的货车。一看到可疑的车辆，他就会命令司机跟着他开到下一个称重点。在那里，他会算好罚金，让司机卸下多余的米袋。通常这些米车的所有者都是蒙罗维亚的黎巴嫩或叙利亚商人。他们总是争辩说，政府的秤不准。看到莫里斯不理睬，他们就会用贿赂来解决这个“小小的误会”。莫里斯很熟悉塔布曼总统对受贿的宽松政策——他希望政府的官员们收一点小贿赂，只要他们记得适可而止。因此莫里斯只会从罚金里抽一点成，而他的道德感又让他坚定地拒绝贿赂。他安慰我说，这样就很符合塔布曼总统的“适可而止”

政策”。

一天晚上，我们停在一个村子。轮流开了一天车后，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而下一个政府工作点还在两个小时车程之外。莫里斯嚼一点可乐果就能不吃不睡地熬上很长时间，我却不行。我们把车开进村里的小广场时，一群孩子围了上来，伸着手找我们要“小费”。把我们所有的硬币都分干净后，莫里斯用土话跟孩子们说要见他们的首领。他们指向一群坐在火边吃晚饭的人。旁边还有一群女人，也在吃饭。

谁是首领是一目了然的。那位老人，坐在一把精心雕刻的椅子上，其他人都坐在地上。莫里斯说自己是个警官，我是他的兄弟。他对首领说，我们正在找吃的，还有个过夜的地方。首领立刻把我们当做尊贵的客人，请我们跟他一起吃。我注意到，他们中间放着两个大碗，一个装着米饭，另一个装着炖肉。莫里斯催促我入乡随俗。所以我学着他的样子，用手抓一把米饭，搓成球，然后浸入——连带着手——另一个装肉汤的碗里，再拿出来的饭团，闻上去吃上去都香极了。我很快就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但接着，我看到一个人擦了一把大汗淋漓的额头，然后把同一只手伸进碗里去。突然，食物全卡在了我的喉咙里。莫里斯低吼道，“你可不能把食物吐出来，会冒犯到他们的。”

“那可不一定。”我吼了回去，但还是勇敢地继续咀嚼，直到吞下最后一口。就在这时，有人注意到我对食物的勉强，莫里斯解释说，我刚从“遥远的白人的地方”来，还没有习惯非洲美味。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男孩把我们领到一间棚屋，说是首领让我们今晚在这里过夜。进去之后，我注意到地上和墙面都非常干净。我看见屋顶横梁上挂着几具剥了皮的长尾巴小动物，我问这是什么。“猴子，”男孩回答，“猴子肉很好吃。”

我又一次想吐。“谁会吃猴子啊？”我问。

“你会。”莫里斯乐不可支地回答，“你以为你今晚吃的是什么呢？很好吃，不是吗？”

我气恼却又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你父亲警告过我，说你不是个好人。”我开玩笑说，“现在我知道他什么意思了。”我们把猴子的事放到一边，铺好床就睡了。

很快我们就被喧闹的叫喊声吵醒，看到附近一间棚屋升起了大火。许多人用水桶从井里打水扑火，却没有用。几分钟之内，棚屋就被大火吞噬了，只剩下几面墙。

第二天早上，我们想去感谢首领的招待然后离开，但发现整个村子都在首领的棚屋前集合。昨天晚上给我们带路的小朋友说，这里有个“大问题”，昨天晚上的大火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的，三个嫌疑人已经被逮起来了。每个人都不肯承认，所以首领要求村里的巫师施展魔法，指认罪犯。

因为我们也没什么急事，莫里斯提议留下来看看。“你会觉得这很有趣的。”他跟我保证，“尤其是你们欧洲人认为只有耶稣才有魔法。”

我们挤到前排的位置。首领和几位长者入座后，人群安静下来。首领做了一个手势，人群散开，三名身穿卡其制服的“巡警”走了进来。每个人都用绳索牵着一个看上去抓狂的嫌犯。这些嫌犯的手都被反绑在身后，坐到人群中央的地上。

首领又做了一个手势，喃喃自语了一阵，人群再次散开，一个白须凌乱的虚弱老人走了进来。他就是众人口中的“智者”。他只穿着肥大的白裤子和皮凉鞋，裸着的胸膛和后背都画满了油彩。他的右手边是一把古时骑兵用的大刀，生锈的刀锋似乎还能伤人。智者在嫌疑犯身边走来走去，另外几个人在一旁堆起木块生起了火。火烧到最大时，智者把刀刃举在火上。几分钟后，他撤回刀细看。我能看到刀刃变成深红色，周遭的空气都因为高温而变形了。智者把通红的刀刃放

到自己的脸颊、胸膛和后背，没有任何反应。然后他走到人群中，问有没有人愿意试一试。几个村民立即上前，献出自己的脸颊、双手和腿，都是同样的结果——没有烧伤。智者在我面前停下，示意我去当志愿者。我犹豫了，但莫里斯上前替我接受了。“如果你没有放火，这刀就伤不了你。”他跟我保证说。

“为什么不会？”我问。

“因为魔法，非洲魔法。”他回答。

因为莫里斯我已经被烧伤过一次，我不想再给他机会。但是，好奇心战胜了我。刚才看到的一切也让我胆大了几分，于是我便让智者用刀碰我的脸颊。我觉得，刀刃在我脸上凉丝丝的，虽然看上去被烧得通红。

智者重新烧热了刀刃，首领又简单审问了一遍三个嫌疑犯。他们还是说自己是无辜的。首领示意智者继续，智者带着他的刀走向嫌疑犯们。他们都用恐怖的眼神看着这把大刀。智者迅速把刀刃放在第一个嫌疑犯的脸颊，然后又重复了一遍放在第二个嫌疑犯的脸上，每次都没有造成烧伤或痛苦。但他还没来得及放到最后一个嫌疑犯脸上，那个人突然跳起来，从栓着他的巡警身边拽开，疯狂地冲向人群，他的双手仍然绑在身后。

才几分钟，巡警们就抓住了这个嫌疑人，把他扭送到人群中央。然而这一次结果却大不相同。刀刃一碰到那个人的脸庞，他就发出一声惨叫。智者把刀刃收回去，那个人的脸上从耳朵到下巴留下一道血红的伤口。智者又在另一边的脸颊重复同样的动作，还是同样的结果。人群爆发一阵掌声，嫌疑犯承认了自己的罪行，被巡警们带走了。

“你看到的只是祖祖。”莫里斯解释说，“跟海地的伏都一样。”^①

① 祖祖，西非的一种原始信仰。伏都，流行于非洲、传播到美洲的一种原始信仰。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我说，“但肯定是有把戏。别告诉我是魔法，世上根本没有这种东西。”

表面上我坚持这个观点，但在心里我却不再确定。是不是非洲人真的发现了什么东西，可以对抗西方文明，只能解释为魔法。很快我就会知道，在利比里亚，几乎所有人，从总统到平民，都相信并畏惧祖祖的力量，尽管那些受过最多教育的人并不肯承认这一点。

莫里斯决定去萨尼奎利巡视一天，就在法属几内亚北部边境线上，并顺道探望我们的叔叔亚哈。亚哈叔叔是莫莫鲁众多儿子中的一个，是个省级专员。他代表利比里亚政府，沿着边境管理整个宁巴郡。我只在父亲的葬礼上见过亚哈叔叔一次，希望了解他更多。据莫里斯说，他是个正直的人，凭借着自己的勤勉与忠于职守，而不是政治资本，才有了今天的地位。但他在马萨夸依家族里地位却不高。一个原因是，亚哈虽有着马萨夸依的姓氏，却不像其他人一样去欧洲留过学。另一个是，他公开娶了好几位土著女人。这是利比里亚“文明人”所不喜的习俗。

我们来到专员的院子门前，看到院子里面有几栋办公楼，一栋私宅，还有军事防卫，一位荷枪实弹的利比里亚国防军士兵向莫里斯行了礼，让我们过去。一进去，另一个士兵把我们带到办公室。身材矮壮的亚哈叔叔，头顶几乎全秃了，脸颊上还有小酒窝，认出来我们后立即起身。“哈喽，大人物。”他显然是在说莫里斯的新职位。“你好吗，汉斯？”他一边跟我握手一边说。“不巧的是，”他说，“我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就要走了，去见几内亚边境的几个殖民官，一个礼拜以后才回来。但你们俩可以待在这里，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

接着，他把我介绍给他的一个妻子，一个不足他一半年纪的苗条美女，让她照顾我们，确保我们有足够的吃的。简单聊了几句，亚哈叔叔安慰我们说，他并不赞同纳撒掌管我们父亲的遗产。一个士兵汇

报说，专员的“汽车”已经备好了。从窗户望去，我们看到一辆吉普车和三个士兵，还有司机，都在外面等着。他说他会尽快回来，然后冲出门，上了吉普车，消失在一片尘土中。

当心，山德士上校^①

因为莫里斯要去警局汇报巡逻情况，我们回到了蒙罗维亚。我得知，约翰森先生和夫人最近也从欧洲来到蒙罗维亚了。我是在罗伯茨菲尔德认识他们的，约翰森先生是个利比里亚土著，妻子是德国人。他们在蒙罗维亚开了个小餐馆。他们俩热情地欢迎了莫里斯和我，骄傲地给我们展示了他们的成就。饭馆里宾客满座。约翰森先生说，这都是因为他太太的鸡汤太受欢迎。我们各自尝了一碗后，都认为他们会发大财的。

“希望承你吉言。”约翰森回答，“不过我眼前的问题是，我们的鸡汤太供不应求了。如果我能找到足够多的鸡，这里肯定是个大金矿。”

“你买一只鸡多少钱？”莫里斯问。

“看鸡的大小了，平均每只一美元。”约翰森先生说。

“那么，就让我们来操心鸡的事吧？”莫里斯指着自己和我问。

那一刻，我觉得莫里斯太轻率了。他要去哪里找鸡啊？但他示意我闭嘴。后来他才提醒我，目前我们去过的每个村子都有一小群鸡。据莫里斯说，我们去的路上可以跟每个村子说，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他们能找到的鸡全都买下，每只五十美分。然后我们可以到蒙罗维亚，把这些鸡每只加五十美分卖给约翰森先生。为了不引起不必要

^① 哈兰·山德士上校（1890—1980），肯德基的创始人。

的关注，让人们议论利比里亚国家警察局跟鸡贩子是同伙，他会安排我们深夜到蒙罗维亚，那时车流最少。

莫里斯的计划很顺利。再回到蒙罗维亚时，警车上装满了咯咯不休的活鸡。约翰森先生付给我们近一百美元时，我们高兴坏了。“再弄些鸡来。”他催促道。

我们决定把挣到的钱全都投进去，几天后就赚到了五百美元。在我们看来，这可是一笔大财。我们无时不刻谈论的都是鸡，梦想着把买卖做得更大。莫里斯还认真地考虑把警察局的工作辞了，买一辆货车，然后全职做鸡的生意。不过还没来得及，我们的梦想就像肥皂泡一样破灭了，我们的“供应商们”告诉我们，他们很快就供不上货了。我们买鸡的速度远超过他们把鸡养大的速度了。我们去过的每个村子，鸡的数量都急剧下降，直到我们被告知噩耗，“对不起，没有鸡可卖了。”我们鸡界大亨的梦想就这样破灭了。我还没来得及为此悲痛，就收到一个好消息，让我大大振作了精神。这种振奋，是多大的鸡买卖都给不了的。我的朋友，美国大使馆的汉森领事告诉我，他已经被授权，给我签发一年的美国学生签证。

我给克拉拉姨妈写信说，我的学生签证已经签下来了，她立即给我寄来一张六百美元的机票，催促我尽快安排行程，一到纽约就给她打电话。不用她催我也会尽快安排的，虽然我觉得奇怪，她为什么会让我飞过去，坐船的费用会便宜很多。最后，我想，既然她明知我没钱，也不能打工，还给我注册了大学，她可能很有钱。无论她是因为什么原因厚待我，我都没问题。

在“勇者之家”

1950年5月22日，带着我那破旧的行李箱——装着我最好（也是

唯一)一套西装和半打衬衫、领带,口袋里装着我从贩鸡生意中分得的大约一百美元,我在罗伯茨菲尔德准备登上泛美航空飞往纽约的航班,渴望加入我的朋友沃纳和其他疲惫、贫穷、拥挤的人群,渴望自由呼吸,谋一个前程。

唯一能减弱我梦想成真的喜悦的,就是要跟莫里斯分开了。在利比里亚待了两年,我们已经密不可分。虽然我们因为来自不同大陆,有着许多文化差异,并且直到成年才知道彼此的存在,但我们比起那些一同长大的兄弟还要亲密。

我们不想流露出离别的伤感,在小小的候机厅里,一边聊天,一边等着登机信号。

“照顾好自己,小弟。”莫里斯告诫说,如往常一样,不理睬四英寸的身高差异让他看上去才是小弟。“给我写信,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他承诺,等他再发了大财,一定会去美国看我。想着哥哥缺钱的处境,我悲伤地说了再见,我想肯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看不到他了。

飞机起飞的那一刻起,我就沉浸在初次飞行的新鲜感之中了,之前的忧伤与不舍很快被兴奋之情取代。在波多黎各的里斯本短暂停留后,我们又继续飞往美国。越是接近目的地,我越是不耐烦,越想知道我现实中的美国是否跟我理想中的一样。沃纳的信描绘了纽约市的美好生活画面,我在利比里亚的某些美国黑人朋友,包括查尔斯·汉森在内,都告诉过我,美国的种族关系很不好,还提醒过我,我可能永远也无法适应“美国生活方式”的这一面。

凌晨时分,晚点一个小时,我们降落在拉瓜迪亚国际机场,巨大的光幕映入眼帘时,我的消极念头都暂时消散了。我给沃纳写过信,告诉他我到达的时间,问他收到我的信后是否来得及去机场接我。但我一走到舷梯下,一个穿制服的航空公司职员就问我是不是叫汉斯·马萨夸依。我告诉他我就是汉斯·马萨夸依,他说,“谢天谢

地！有个叫沃纳的小伙子烦了我们好几个小时，一直在问你到了没有。”

我看到沃纳在等候亲人和朋友的人群中挥手。我过了移民和海关关卡后，我们终于有了机会拥抱，在近三年的分离之后，可以细细端详彼此。沃纳看上去气色很好。在汉堡时，他喜欢穿电光蓝的西装，打手绘了沐浴裸女的领带。现在，他居然穿着保守而干净的灰色西装，打了一条颜色协调的领带。

我们来到环河路210号，一个穿制服的看门人像迎接皇室一样迎接了我们，让我大吃一惊。我在想，就靠他当办公室职员的那点微薄的工资，怎么能住得起这样奢侈的公寓，直到电梯操作员把我们送到十一楼我看到他那鸽子窝一样整洁的公寓。这间公寓虽然小，却有着绝美的风景，可以俯视哈德逊河，还有环河路上永不停歇的车流。

“我宁愿住在高级社区的小公寓，也不愿意住在贫民窟的大房子里，尤其是价格都差不多的时候。”沃纳说。

接下来的几天，沃纳给我展示了“他的”纽约——百老汇、中央公园、帝国大厦，洛克菲勒中心，自由女神像，德国街、唐人街、鲍威尔街和中央车站。漫步于曼哈顿时，我立即有了家的感觉，似乎故地重游。在我看来，一切都很熟悉，毫无疑问是因为我看过的那么多好莱坞电影。纽约跟我想中的一模一样。

我独自前往纽约的黑人住宅区——我答应去那里跟他父亲问好——不免大吃一惊。我看到的，并不是美国电影里演的那种阴森骇人的贫民窟，而是跟我以前在汉堡时住的地方并没有多大差别，住的都是积极向上的工薪阶层。唯一的差别就是，每个人——从邮差到理发师到警察到垃圾收集员到坐凯迪拉克的大人物——都是黑人。走在繁忙的125号大街上，完全被身边的人忽视时，我突然有了一种全新的、真正的融入感。与此同时我意识到，我离真正的归属感还差着十万八千里。

在启程去芝加哥前，沃纳让我答应，如果在伊利诺伊混得不好，

就回到纽约来，跟他待在一起。我坐车来到芝加哥市中心时，看到了克拉拉姨妈、表姐玛莎和她的丈夫鲁道夫。我还在德国时，玛莎就给我寄过他们的照片。我立即就认出了他们。克拉拉姨妈比我母亲小三岁，但看上去比她老很多，长得也不像她。玛莎是个高挑的深色头发的美女，长着洋娃娃一般漂亮的脸蛋，而她的丈夫，则是个戴眼镜、书卷气的高个子。他们俩站在一起真是一对璧人。旁人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个黑人和白人的组合。他们不顾别人的目光，纷纷与我拥抱，似乎很高兴我终于到了。

为了让我尽快适应，住在芝加哥的鲁道夫和玛莎，说他们会陪我们一起去巴林顿。巴林顿是芝加哥的郊区，克拉拉和她的小儿子威利住在那里。在一个小时的火车途中，我坐在鲁道夫旁边。当我跟他说，我有多么盼望去巴林顿时，他偷偷瞥了一眼他的岳母，对我说，“我十分同情你。”

这句玩笑话惊呆了我。

“你什么意思？”我问。

“我不能跟你说，但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他说得对。到了巴林顿后，我们沿着铁轨走了大约半英里，穿过许多体面的房屋，来到一个场院，一眼望去以为是空的，但离近了细看，里面有一间低矮、草草而成的木头和纸糊的棚屋。

“就是这儿了，”鲁道夫低声说，“你的新家。欢迎来到巴林顿。”

我很吃惊。说不出话来的我只能跟在姨妈后面走进棚屋，发现里面没比外面好多少。突然，我为姨妈感到难过，也为自己难过。我问自己，姨妈显然过着穷日子，仅够养活自己，她又是如何帮我注册了大学呢？她为什么没跟我说实话？她是从哪里弄来六百美元给我买机票的？

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克拉拉姨妈让我随便些，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你可以住赫曼的房间。”她说，赫曼是她的大儿子，结

婚后就跟他姐姐一样，搬到芝加哥去了。那天晚上，玛莎和鲁道夫离开后，我的表弟威利来了。跟母亲和姐姐不一样的是，他对我一脸鄙弃。后来我才知道，这跟种族没有关系，而是因为钱。威利是个六英尺高的金发男子，是个树木养护专家。他毫不掩饰地认为我是个令人烦恼的负担，让他母亲本就清贫的家境雪上加霜。又多了一张嘴吃饭，就好像头上多了一个洞。他这么想我也不能怪他，虽然这个问题不是我造成的。我的唯一错误就是，以为姨妈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显然她并不知道。要是她稍微暗示过我她真实的经济状况，告诉我那六百美元机票钱是我母亲的大哥我的赫曼舅舅出的，或者说她靠着给巴林顿的有钱人家做家务维持生计，我都不会接受她这不切实际的慷慨好意。

后来我才明白，在她内心深处有一个违背常理的理念——即便现实与理想不符——一切也都会随她所愿。正是这个天真的理念让她帮我注册了我大学，虽然她并不知道怎么去筹学费。也因为这个天真的理念，她鼓励我去申请学生签证，即便她早被告知，外国留学生不允许打工。“等你来了，我们再打算。”她在信里快活地说。不幸的是，当事情并不像她预想的那样顺利时，她就需要一只替罪羊。而这件事里，我就是这只替罪羊了。

几个星期里，我一边适应住在富裕的全白人社区里小棚屋的生活，一边忍受她和她儿子越来越重的敌意，只能不断怀念很久以前跟莫里斯一起的日子。我们无忧无虑地驰骋于利比里亚乡村。就在我面对这困境绞尽脑汁时，海德维希姨妈和她的丈夫古斯特·加尔斯克来看我们。他们俩从附近的伊利诺伊州巴特雷特的小农场过来，开的是一辆福特轿车——放弃开车的赫曼舅舅送给他们的礼物——想要见我一面。我一看到酷似我母亲的海德维希姨妈，她一看到我，我们立即就喜欢上了彼此。我也立即喜欢上了古斯特姨夫。他面色红润，穿着罩衫，头发灰白，声音洪亮，每次开下流的玩笑时，他总是乱骂一

通，再哈哈大笑。海德维希姨妈很不喜欢他这一点。

古斯特逗得克拉拉姨妈乐不可支时，海德维希姨妈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我还没到美国时，她和古斯特姨夫就知道，我肯定会陷入这种局面的。“古斯特姨夫和我想让你来跟我们住一段时间。”她对我说，“我们那里很宽敞，也有很多吃的。你不用非得，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帮古斯特干干活。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看看接下来怎么办。”

我当时就想拥抱她了。“可是，我要怎么跟克拉拉姨妈说？”我问，“毕竟，是她把我弄来美国。”

“你别管，我来说。”海德维希姨妈安慰我，“我会跟她实话实说，那就是，我也是你的姨妈，有权让你跟我住些日子，就这么简单。如果我没错的话，现在她巴不得摆脱你呢。”

海德维希姨妈说得对。当海德维希姨妈跟克拉拉姨妈说，她想让我去她的农场住一段时间时，克拉拉姨妈没有流露出一丝不安。她帮我打包了行李。当我跟她告别时，我凭直觉感到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头了。

帮海德维希姨妈喂鸡，帮古斯特姨夫喂牛和驴，很快就让我忘记了在巴林顿看到的麻烦，让我想起小时候在萨尔察跟格里特舅妈和卡尔舅舅生活的日子。海德维希姨妈还是像我们初见时一样讨人喜欢，古斯特姨夫也是如此。我跟表哥约翰尼相处得也很好，他是一个安静的二战海军老兵，脸上永远有“五点钟阴影”，还有他黑头发的妻子。他们俩跟他们新出世的儿子小约翰也住在农场里。

说到自己的婚姻，海德维希姨妈向我坦言，她之前嫁给过一个酗酒的瑞士农民。他赌博把他们的农场输掉了，剩下她跟两个儿子洛萨和约翰相依为命。她只能出去工作，给单身汉古斯特和他眼盲的母亲当管家。老母亲去世前不久，请求海德维希留在农场，嫁给她的儿子。

“古斯特是个好人。”她总结说，“就是有点粗俗。”

“你什么意思？”古斯特大喊道，“粗俗？你们女人就是没有幽默感，没有一点幽默感。不对吗，小伙子？”没等我回答，他就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起来，还时不时喊着“上帝啊！”

然后，他把他的大块头塞进厨房的一把椅子上，用他那德国小香肠一样的手指卷了一支香烟，然后在工作服的金属扣上划着了一根硕大的农场火柴，点燃了香烟。“没有幽默感。”他一边吐着大烟圈，一边不断重复这句话。

“知道我什么意思了吧？”海德维希姨妈跟我说，确信古斯特姨夫已经证实了她的话。

一个周末，穆缇的大哥赫曼舅舅来看我们。我听说了太多他慷慨对待亲人的故事，我自己也在懵懂不知的情形下受过他的恩惠。他身材矮壮，穿吊带裤，留着短短的深色卷发。当我告诉他，只要一有钱，我就会把他资助我的六百美元还给他，他让我千万不要再想着这事。“你别担心。等你有钱的时候再说。”他带着浓重的德国口音。“我知道我能信任你，因为你是贝莎的儿子。”听他这么说，我好受多了。虽然他们三十多年没见面了，他依旧相信她把她的诚实遗传给了我。我立即下定决心，我要证明他对他妹妹还有我的信任没有错付，还要尽快偿还我欠他的钱。

虽然在农场的日子很惬意，我却忘不了再有四个月，我就要去民航学院报到了，否则就会失去入学资格。我想要是在这期间我能找份工作，虽然按法律来说我不能打工，我就能赚到钱，交一部分学费了。我请求约翰帮我在他工作的埃尔金钟表公司找份工作，他说，他们公司不招人，但他能带我去埃尔金的伍德鲁夫和爱德华压铸厂。他听说他们在招机床操作工。

第二天早上，约翰开着他闪亮的新车来到压铸厂，介绍说我是他的表弟。人事经理只是稍微有点吃惊，却没有说什么。面试了十分钟

之后，他把我带到压铸厂的加工车间，里面成排的机床发出轰鸣声。有意思的是，所有机床操作工都是白人，仅有的几个黑人都在推手推车，或者开叉车。

“下周一你就能来上班了。”人事经理握着我的手说。

星期一大早，天气明媚，我去报道。人事经理把我介绍给工头。工头说，他想让我做的是非常简单的活，把长长的金属管切成闪亮的特定尺寸的管子。虽然我自从在纳粹德国为林德勒公司工作后就再也没碰过机床，但只花了一小会儿，我就能熟练使用眼前的机器了。我母亲说得对，“学过就是学过。”

我还没来得及为当前的进展高兴，工头就告诉了我一个坏消息。“我很不好意思要跟你说话，”他开口说道，“但我们知道，大部分操作工都从岗位上走开了，因为我们聘用了你。我们从没有过黑人机床操作工。”

这时我才注意到，除了几个操作工，车间里没有人了。

“我不想让你难过，”工头继续说道，“你干得挺好的。你就继续工作，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与此同时，管理层也会采取非常坚定的立场，通知这些出走的操作工，如果午饭后不回来，他们就可以去找新工作了。”

这不是我在纳粹德国覆灭后第一次遭遇种族歧视，只不过这一次是美国的方式，而且是在所谓种族平等的北部。想起查尔斯·汉森和利比里亚其他美国黑人的劝诫，我不能说我毫无心理准备。

午饭时间，我沮丧地坐在我的机床旁边，无精打采地吃着海德维希姨妈给我做的三明治。许多工人，包括女人在内，都来找我聊天。他们想让我知道，他们非常反对那些人的行为，让我坚持住，因为厂里不是所有人都是偏执狂。

这个消息令我精神鼓舞，但更鼓舞人心的是，加工车间里出去的工人们慢慢都回到了自己的机床旁边。管理层的坚定立场赢得了胜利。至少再也没有人敢质疑我在车间工作的权利。虽然我确信，公司

的政策并没有让他们改变心意，但显然改变了他们的行为。

了解了美国的种族偏见后，每当古斯特姨夫和海德维希姨妈，或者约翰和雪莉，有客人来时，我就会尽可能地低调。通常我都会待在楼上的房间里，他们则在下面的客厅里接待客人。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古斯特姨夫注意到我总是缺席这些社交场合，然后才想明白了原因。“我跟你讲，小伙子，我只说这一次，”他低声说，“这里是你的家。我才不在乎谁会不喜欢你。下一次，我们有客人来时，你下楼来跟我们一起，跟别人一样。谁有意见谁就是匹兹堡的混蛋，可以直接去死。”他一边炫耀他的德语，一边立下这个规矩，然后跟往常一样，拍着大腿喊道“上帝呀！”

古斯特姨夫掷地有声的声明，让我觉得自己是被人需要的，觉得像在家里一样，也让我相信，人性真正的美德并不在于教育或信仰，而只在于心。

秋天终于来了，我要去民航学院报到了。学校的课程是想培养通过认证的飞机机工，一共分为两个部分，理论部分是在学校的主楼里上课，在芝加哥十八大街和皮埃尔大道交口处一栋老房子里；而实操部分则是在当下全球最繁忙的芝加哥中途机场上课。

我不想辞掉工厂的工作，换到了中班。这就意味着我不得不凌晨起床，坐第一班火车从巴特雷特赶到芝加哥的联合车站，再倒公交坐到十八大街，上课到中午，然后再坐公交回到联合车站，坐下一班火车回埃尔金，从下午两点工作到晚上十点，然后坐一下班火车回巴特雷特，再走上大约一英里回到农场。第二天再重复一遍这个行程。我很快就发现，如果长期以往，我肯定会筋疲力尽地死去。不过，我不知道要怎么走出这个困境。如果我辞掉工作，我就会没有学费，被学校赶出去。如果我休学，就会失去学生身份，被遣送回国。

就在我不知道何去何从的时候，海德维希姨妈递给我一封刚寄到的信。是“山姆大叔”寄来的。毫无诚意地“欢迎”了我之后，这封

信要求我去芝加哥市中心的征兵局做体检。它提醒我说，我在蒙罗维亚收到美国签证时，曾经签署了一份声明，让我一到美国就去征兵局注册。我的确签过。当时，我被告知，这种注册“只是走形式”，因为作为新来的学生，我并不是征兵对象。因此我把这则通知当做一个笔误。

可是，我没有像我期望的那样被送回家，他们给我检查了身体，发现所有条件我都符合，命令我于1951年2月19日前去报到，参加朝鲜战争。那天，虽然我既不是美国公民，也不是美国的永久居住者，当一个美国大兵的真诚愿望终究还是实现了。我本可以亮明我的学生身份，但还是决定去参军，因为去朝鲜面对子弹，似乎好过连轴转到累死。我还想着，在美国军队里服过役，总有一天会在我申请美国公民身份时给我的简历增光添彩。

到纽约短短九个月后，我就作为美国部队的新兵，登上了南下从芝加哥到肯塔基州的坎普（现在的福特）布雷肯里奇的火车。如果说我对美国士兵的迷人生活还有所幻想的话，在为期十四周的新兵基础训练中，这点幻想也全都烟消云散了。跑步跑到舌头吐出来喘不上气，长途行军走得屁股和大腿的皮都磨破了，蜷缩在战壕里，看头顶巨大的坦克碾过，在泥地里匍匐前进，0.5口径的机关枪子弹在我背上呼啸而过。

把我变成一名战士的努力暂时被打断。我的第一位中士把我叫到连队办公室，命令我立即去宪兵司令部报到。尽管我想不出我做错了什么事，但我还是有些担心，尤其是司令部的接待员指着两位穿便衣的男子，说他们一直在等我的时候。他们表明身份，说他们是移民局的官员，因为我没有遵照联邦法律去做年度外籍人士注册登记，他们不得不过来找我确认。他们告诉我，我的一年学生签证已经过期，前一段时间，他们认为我逃跑了，直到从我的亲戚那里得知我参了军。接着他们斥责我的“疏忽”，还提到了我被立即驱逐出境的可能性。

就这样吧。我的得一下起了火，告诉他们随便吧，驱逐我，因为我已经烦透了军队，受够了军队。然后我说参军并不是我的意思，我只是遵照某个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的命令。他们向我道了歉，然后跟我说，只要我的指挥官写封信，说我是名优秀的士兵，是部队的宝贵成员，移民局就能交差，只要我还在服役，就可以留在美国。我让指挥官写这样一封信，他爽快地答应了。

在基础训练的营地里，种族关系非常好。我们这些黑人新兵，跟白人军官们相处得很好，许多人之间都建立了友谊。但是训练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有件事让我心里一震，粉碎了我对美国的坚定信仰。一天晚上，我跟一个白人同伴正在值班，他开始抱怨，我们部队里的犹太人——大约六七个——都可以在基督教和犹太教假期放假，而非犹太士兵却只能在基督教假期放假。“我烦透了受够了这些该死的犹太人。”他抱怨说，“我希望我们可以做希特勒在德国做的那一套，弄死这些犹太人。”

我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以前我非常天真地认为，美国对希特勒宣战，就是为了阻止侵略，消灭极权主义和种族主义，重建民主，解放犹太人。而现在，一个美国人用同样充满憎恨和不能忍受的语言诋毁犹太人，我在纳粹德国已经听得太多太多了。我不情愿地承认，反犹太主义在美国是存在并盛行的。

我试着劝说同伴，就因为他们多休了几天假就要弄死数百万人，实在是太过分了，他对我说别这么幼稚地看待犹太人。“你只是不知道他们的行事风格。”他坚持说，“如果你知道了，你就会知道，只要给他们一点点机会，他们就会把你偷个精光。我知道。我父亲和我以前给犹太人打工，还从犹太人那里租房子。”

我对他说，我不想再听他这些偏执的无稽之谈。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知道，我不能再对美国怀抱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了。那一刻，我感到极度的失望与被欺骗，因为我曾经把这里当做“自由的土地，

勇敢者的家园”。

基础训练快结束时，我有了更多的理由怀疑美国。我们这些新兵马上要被分派到部队了，一个模式就这样显现了。巧之又巧的是，所有白人士兵都被分派到了和平的欧洲，而所有黑人士兵都被分配到炮火连天的朝鲜全州和江景，去这些地方，被装进裹尸袋里送回来的可能性非常大。有些黑人士兵向白人长官询问这种奇怪的巧合，他告诉我们，种族偏见跟分派毫无关系，命令“是华盛顿的人直接”下的，他们并不知道哪些士兵是白人，哪些是黑人。是啊！当然了！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还没太准备好为美国抛头颅洒热血，毕竟我还没有在这里生活多久，没有享受过美国公民的福利。我被告知，除了被送到境外战场之外，我还有另外两个选择：军官培训学校，还有班宁堡步兵学校的伞兵训练。因为没有公民身份，我没有资格申请军官学校，只能自愿参加伞兵训练。我知道，这只是一个临时措施，因为伞兵训练只有三个星期，而且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有什么安排。

从芝加哥到肯塔基州的基础训练中，一个名叫比尔·托勒的高个密西西比人成了我的好朋友。比尔也不愿意去朝鲜战场上送死，跟我一起报名伞兵训练。我们俩都不知道让自己卷入了什么情形。

到班宁堡后，我们被分配到一个编队里，一个肌肉发达的空中指导员穿着一件紧身的雪白T恤，笔挺的工作裤，锃亮伞兵靴，跟我鼻尖对鼻尖地站着。“你鼻子下面是什么？”他咆哮道。

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不管你们鼻子下面是什么东西，你们只有十分钟弄干净。”肌肉男大喊，他看了一眼腕表，说现在的时间是八点二十，他想让我们在八点三十之前刮好胡子赶紧站好队——“否则！”

就好像一群狂奔的水牛，我和其他长胡子的人——也就是所有黑人士兵，事实上，就是方队里一半的人——疯狂地跑到营地的洗手间，然后拿起剃须刀，把曾经带给我们骄傲与欢乐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

净。比尔和我刚够时间赶回方队。那些没准时赶回来的，就见识到了肌肉男的“否则！”，每晚一分钟就被罚做十个俯卧撑。

伞兵训练第一天，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跑步，跑到脸色发青。训练结束后，我们仔细地审视镜中的自己，都大吃了一惊。奇怪的是，镜子里陌生而平淡的样子，再也没有了往日的男子汉气概。我试着安慰比尔说，这只是暂时的，伞兵训练一结束，我们就可以随便留胡子了，他只是耸了耸肩。接着他跟我说，失去胡子对于一个黑人来说是一场大灾难，因为黑种女人喜欢男人留胡子。“对于黑种女人来说，亲吻一个没有胡子的男人，”他接着说，“就好像吃一个不加盐的鸡蛋。”我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后来等到部队允许我留胡子之后，我就一直留着了。

因为不能或不愿再承受伞兵训练不断增加的压力，几天后比尔告诉我，他决定退出。我不愿意他走，希望我们可以共同面对军旅生活，但他的决心已定。尽管如此，他自愿参加伞兵训练也有了回报，因为他被分配并送到一支在德国的部队里。

在乔治亚7月的烈日下暴晒了三个星期后，考虑到终有一日，我要在1200英尺的高空从飞机上跳下来，我也考虑退出。我们的长官安慰我们，如果降落伞坏了，回到地面上后我们就可以换个新的。这个笑话一点也没有提升我的士气。不过，在空降军官进行了几次鼓舞士气的谈话之后，我又继续努力了，比起在降落伞事故中丧命，我更害怕被称为“逃兵”。

在那些刻薄的教练的不懈努力下，我们这些受训者身心俱疲。我掌握了伞兵生涯的主旨，惩罚性俯卧撑；降落伞降落；以某种奇怪的原因被称为胡桃夹子套装的吊带练习；从34英尺和250英尺的高塔上模拟跳伞；还有最后，真正的考验——从空军C-46上做五次高质量的跳伞。

我从未试过蹦极跳伞，也不打算尝试，但我敢打赌，这种感觉并不那么刺激，如果你曾跳进飞机飞行时螺旋桨发出的轰鸣声中，后

者令你兴奋、肾上腺素飙升。虽然我们在地面上已经练习过几百次了，但到了跳伞点上又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教练大喊：“起立！……连接！设备检查！”接着命令第一个人“预备”，“站到门边！”最后说“跳！”当我第一次从出口冲入稀薄的空气中时，我的兴奋程度——有些人称之为明显的恐惧——达到了顶峰，以至于我完全忘记了在主伞打开前必须要数的“一千，两千，三千”。几秒钟后，我就释然地看到世上难得的美景。然后，当降落伞带着我缓缓飞向地面，我小心地避开树木和其他障碍物，我完成了一次完美的跳伞。没过多久，跳伞不再令人害怕，因为比起恐惧本身，我们很快更担心别人怀疑我们害怕。伞兵训练结束时，我们穿着崭新的制服、锃亮的伞兵靴毕了业，一位军官在我们挺起的胸膛上别上了银质伞兵翅膀的徽章。我猜，我的胸膛是挺得最骄傲的。

伞兵训练结束后，我和六个伙伴被分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第82号伞兵分队基地。二战对抗德国时，这支部队曾经在阿登战役和柏林战役等战役中证明了自己优秀的实力。我们的新部队是第80号空降防空炮兵营的B连，由杰斐逊·S·布恩上尉（“那个人”）率领的全黑人部队。这位长官是我穿上军装以来长相、行为最为刻薄的一位。他是个大腹便便的矮个子，总是一脸怒容，让我想起我的英语老师哈登先生，我童年时期难以忘怀的人物。布恩上尉没有欢迎我们，而是给我们这些新来的一个严厉的眼神，即便是在7月的热浪里，我的后背也冒出了冷汗。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一些他的小癖好。

“有两样东西，是我从心底里厌恶的，”他险恶地说，仿佛已经抓到我们两个都违反了，“一个是AWOL，一个是VD。”^①

① AWOL (absent from one's post but without intent to desert)，尸位素餐。VD (venereal disease)，性病。

作为一名真正的伞兵，我的第一个夜晚跟第一次与“那个人”见面时一样不幸。午夜过后，我被一阵吵闹声惊醒。有人把灯打开，我看到我的两个伙伴不知为了什么打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只是看，没有人插手，两个浑身是血的人不停对对方拳打脚踢。最后，其中一个叫奥斯卡·福特的把另一个叫罗伯特·斯通的拦腰抱起，扔下了一截陡峭的楼梯。斯通被摔在地上，动弹不得，断断续续发出几声呻吟。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找人帮忙，就在我要下楼时，室友告诉我，“别管了。”然后，有人关了灯，所有人，包括那个胜利者，都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回去睡觉了。

我睡不着，担心那个被打伤的士兵躺在楼梯下可能活不了。不过，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一早，起床号还没想起的时候，斯通就走了进来，他的眼睛通红，肿得睁不开。他手里拿着从床上拆下的一条钢棍。大伙还没明白过来他要干什么，他就走到他的敌人身边。福特正坐在床头柜上擦鞋。他从后面照着福特的脖子就打了下去。福特一声不吭倒下去，面朝地趴着，一动不动，就好像昨天晚上斯通那样。这一次，一个副排长出现了，几分钟过后，一辆救护车就把福特送去医院。而斯通则被宪兵押着关了禁闭，如果福特没活过来，他就要被控谋杀罪。不过，过了几天，福特就痊愈了，斯通也被放了出来。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俩都若无其事。这件事给我上了宝贵的一课——在我的新环境中，人们都是玩真的。

后来的一件事让这一课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几个月后，我们的分队开拔前往得克萨斯州，去参加当时美国最大的军事演习。一次“加油站停车”过后，我的一个伙伴，一个从纽约来的超级温和、名叫荷马·特拉维斯的家伙，在我们坐的卡车上跟另一个士兵因为座位起了争执。那个人趁着停车占了荷马的座，荷马不肯放弃，坚持让他让出来。愤怒的士兵跳下车，捡起椰子那么大的石头冲荷马扔了过去，打中了荷马的额头。医护人员还没赶到，荷马就死了。对于这起愚蠢的

杀戮，官方认定为“过失杀人”，那个人只被判了四个月。

在第80号A连，一个人的价值和在团队中的地位取决于他跳过多少次伞，又或者如他们所说的，多少次“落过地”。在这种衡量标准下，我和其他刚毕业的伞兵被认为是最底层的人，经常被人轻蔑地称为“只跳过五次的查理们”。我们成了那些恶霸凌虐的对象，他们想用“坏”来征服别人和他们自己。我被人盯上只是时间问题。那是一个跳伞次数非常多的人。他注意到我铺位的架子上放着一张我母亲的照片后，决定对我发难。“这个黑鬼留着一个白人女人的照片想干吗？”他的声音大得所有人都听得见。

“那个女人是我母亲。”我压低声音跟他说，意思是让他适可而止。

一听到“母亲”这个词，营房里的人都不再做声了。

“你这么个黑鬼怎么会有个白人妈妈？”那个人还是不依不饶。

这会儿营房里安静得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每个人都很好奇，我会如何处理这个关系到我私人生活的事。我知道，如果不立即强势回应，我就会被打上懦夫的标签，日后在第80号部队里抬不起头来。我决定给这位老兄点颜色看看，让他永生难忘。我相信自己的身体正处在最佳状态，冲那个士兵猛扑过去，出其不意地照着他的头打了几拳。他的双膝一软，跪在了地上。他不解的神情告诉我，至少现在，我的袭击已经瓦解了他的斗志。

“冷静点，兄弟！我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他嘟囔着，丝毫没有了先前的自负。“没必要这么激动。”

说来也奇怪，我竟然信了他，但想着斯通和他的钢棍，好几个月我都不敢背对着他。我的快速反应起到了预料中的作用；人们纷纷说，别去惹“那个德国来的黑鬼”，而在我接下来的美国军旅生涯中，真的没有人再敢惹我。

我跟第80号部队里的所有黑人都相处得很好，也很欣赏他们，

虽然他们随时准备去打爆别人的头。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有些是老实的乡村男孩，来自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有些是时髦的城里人，来自美国的黑人住宅区，有些是学识渊博的大学生，上黑人大学和白人大学的都有。他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优秀的士兵，靠得住的伙伴，勇敢无畏的伞兵。如果我不得不面对海外的敌人的话，我很乐意跟他们一起“落地”。

在种族隔离部队服役，对我来说，如同军旅生活本身，都是一次学习经历。我很快就明白了阿普尔顿号上斯米蒂的“我们不惹他们，他们也不惹我们”，不仅适用于我们黑人部队，也适用于整个82号伞兵中心。斯米蒂说的是他们船上的种族关系。我发现布拉格堡的生活也同样如此，就好像一只手不知道另一只手在做什么一样。

在起床号与撤退号之间，我们各司其职，几乎看不到白人战友们在这个杂乱无章的营地其他地方履行着同样的职责。除了我们的白人指挥官劳伦斯·林德尔中校和少量的白人军官，我们与白人没有任何接触。杜鲁门总统的军队人种混合的命令还没有下发到南方沉睡的布拉格堡。黑人几乎统治着所有的设施，包括理发店。直到有一天，82号伞兵中心的司令官需要理发。他注意到，理发店里，如果白人理发师们忙不过来的时候，黑人理发师会既给黑人士兵也给白人士兵理发。如果没有白人客人，即便黑人士兵已经排成长队了，四个白人理发师也闲着无所事事。司令官问，为什么白人理发师不能给黑人士兵理发，他们告诉他，他们不知道怎么剪。“这样的话，”司令官告诉他们，“你们有一晚上的时间可以学。到明天早上还学不会的话，就别来上班了。”四个白人理发师里，只有一个回来了。

我们的业余时间里，种族隔离更加严格。我们一到附近的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通常是坐同一辆公交，白人士兵们就去镇子主路边的低级酒馆，白种女人们都在等着他们。而我们黑人士兵得走很远的路，到“镇子的郊区”，一些破旧的谷仓改成的酒馆里，黑种女

人们在等着我们。如果业余时间我们惹了麻烦，我们的军官会警告我们，我们千万要自己解决，因为他们帮不了我们。差一点被盖世太保抓走的我，决定不要鲁莽行事，以免落得被关进红领警官的牢房里。我听过了太多——我敢肯定，很多都是真的——黑人士兵与白人警官有摩擦后，被“杀鸡儆猴”或者干脆直接消失。

大多数黑人士兵们似乎都接受这个状态，有些人甚至喜欢这样子。然而，对我来说，一个标榜民主的国家，一个鄙视纳粹种族态度的国家，把一支部队里本该对抗同样敌人的士兵按种族隔离开来，是十分荒唐的。虽然我有此疑虑，我还是学着苦中作乐。

一天，连队办公室的邮递员递给我一份电报，让我变成了82号伞兵中心两万名士兵里最幸福的人。在电报里，母亲告诉我，她已经安全抵达了纽约港，正在前往伊利诺伊州巴特雷特海德维希姨妈家的路上。言语不足以表达我的感受。自从我四年前离开汉堡就开始期待的时刻——我害怕永远不会到来的时刻——终于到了。我们都在美国，虽然我们不能立刻生活在一起，但知道彼此不再隔着边境线，不再隔着海洋，我们的心里都安慰许多。

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我被批准紧急休假。一个美丽的夏日午后，我在巴特雷特下了火车，肩上扛着一个重重的粗呢包，在乡间小路上跑了半英里。与此同时，知道我的到达时间后，母亲也在同一条路上向我飞奔而来。半路上，就好像电影《呼啸山庄》里的经典场景一样，我们张开双臂扑向对方。我们四年没见了，就好像隔了四个世纪。

回到营地后不久，我听到某个营房里传来熟悉的乐器声，那是中心炮兵连的乐队在演奏。中心炮兵连乐队是全白人的82号伞兵中心乐队的对手。乐队成员没花多少时间就说服我，在游行中吹萨克斯管比给40毫米高射炮挖炮坑要好。在他们的鼓励下，我请求改变我的军事职业专长，调到乐队。几个星期后，我通过了面试，实现了愿望，成

为炮兵连乐队的成员。我的新职责比起原来轻松太多，只需要把我的伞兵靴和乐器擦得亮亮的，参加排练，参加游行、阅兵，演奏乐曲，参加机场给华盛顿来的大人物们办的欢迎仪式，偶尔参加跳伞培训。

加入乐队后不久，我们就被命令收拾行李，搬到主营地旁边的另一个营房。美国空军整合的命令终于下来了，炮兵连乐队被并入了82号伞兵中心乐队。虽然我有些伙伴对此心存忧虑，许多人从未跟白人有过这么近的接触，但整合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不知不觉中，我们和白人伙伴们好得就像一个豆荚里的豆子。看着白人伙伴们热切地学习“有色人种”的发音，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会在“mother”这个词前面加上“f”这个音。我们黑人听着其实不太对劲，但很乐意接受他们吸收黑人“文化”的好意。更重要的是，合并排练了几次之后，我们的新乐队不仅看上去很和谐，演奏出的乐曲也比两个乐队单独演出时更丰富更好听了。

唯一能让我在新合并的82号伞兵中心乐队相对愉快的日子走向终结的，就是奔赴朝鲜战场的命令了。但那个命令从未到来。

作为应招入伍的士兵，在南方要塞专门留给黑人的贫民窟戍守了两年之后，我终于收到光荣退伍的指令，回到芝加哥过起了平民日子。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有许多次，我对美国的迷恋遭到严重的挑战，我开始怀疑，长期以来怀抱的在新世界一展拳脚的愿景，只不过是青春期的白日梦而已，甚至怀疑我来美国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不幸的是，即便我当了乐师，也没能逃脱当蓝领的命运。在一个诞生过数百名萨克斯大师——本·韦伯斯特、奇科·韦伯、欧内特·科尔曼、德克斯特·戈登、科尔曼·豪金斯、查理·帕克和约翰尼·霍金斯——的国度里，谁会容得下一个只在阿岳洪楼三人组演奏过的从德国来的小伙子呢？虽然我看不上蓝领工作，但还是很庆幸能找到很多这种工作，让我活下去，包括给酒水商店开货车——更丢脸的是，在工厂里给机工当助手。

就这样，我辛苦了很多年，又在两所大学里学习了新闻专业后，日子终于有了起色，走上了正轨。虽然非常缓慢，我仿佛开始看到长长的隧道尽头透过来的光。当我接到《Ebony》杂志给我的第一个重大任务，在伊利诺伊州利伯蒂维尔市，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的家中，采访新独立的几内亚的总统塞科·图尔时，我知道我不仅在美国站住了脚，还获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两位世界级的人物坐下来与我热烈交谈，我这个在纳粹德国长大的、穷途末路的“低等种族”，觉得来美国似乎也不是什么坏决定了。

重返德国

那是1966年，自从我离开被战争蹂躏的德国，先是去非洲，接着是美国，追求我的梦想，已经过去十八年了。我们正乘坐汉莎航空波音707，飞翔在芝加哥到法兰克福的三万英里途中。像往常长途飞行时一样，我打着盹儿。

“你还好吗？”空乘人员担心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正想到差不多二十年前，一群德国人错把我当成美国飞行员，差点儿杀死我的事情。

“我还好。”我一边擦去脸上的汗珠，一边跟那个年轻的女孩说。

“你想要个枕头吗？”空乘人员问。

“好的，请给我一个，如果不麻烦你的话。”我炫耀了一下纯正的德语，看到她吃惊的样子，我有点开心。我早就发现了，非洲裔美国人，从来都说不了纯正的德语。

我很快就要回到德国，我出生的地方，当年我义无反顾离开的地方。我还能听见孩子们齐声嘲笑我，“黑鬼，黑鬼，扫烟囱的人！”

在远离故土的近二十年里，我发生了很多事，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辛苦挣扎打拼了多年之后，我勉强跻身于所谓的中产阶级，娶了一位非洲裔美国职业女性，骄傲地养育了两个可爱的男孩，分别十岁和六岁。除了伊利诺伊大学新闻学位和《Ebony》杂志总编辑的高薪工作，我还在芝加哥一个高档社区买了一套房子，房贷让我永久打消了提前退休的念头。简而言之，我已经实现了我的美国梦。

伴随着低沉的轰鸣声，波音707终于落地。期盼已久的时刻到

了。在自我放逐的这些年里，我经常想，纳粹德国曾经的种族态度是否有所改变，所谓的非雅利安人是否最终得到公平对待。

我的脑子里缠绕着无数问题。现在，既然德国人又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了，他们对待黑人的态度又是如何呢？他们是因为杀害了600万犹太人、其他种族和少数民族而感到内疚，还是因为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加入北约而变得冷酷无情，又恢复了他们过去的种族自大呢？我有三个星期的时间来弄清楚。

从法兰克福现代机场往外瞥去，我对德国的第一印象非常戏剧化。挤在机场的人流中，我身边围绕着各种各样肤色和说各种各样语言的人。航站楼里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这是全世界所有国际中转点的典型场景。但作为一个游子，记忆中只有40年代末死气沉沉的德国，一个没有机场、没有飞机，也没有旅客的德国，现在的一切都是意料之外的，都是新鲜的。

七个小时舒适的火车旅程后，我来到了我出生的城市。“汉堡火车站！”一个穿蓝制服的工作人员在过道里大喊。一声尖锐的哨声后，车突然停了下来。

我记忆里的汉堡还是一片废墟，对眼前的景象毫无准备。我离开时，汉堡到处都是断壁残垣，建筑物只剩下空壳子，人们都受困于饥饿与挫败，靠着偷偷摸摸在黑市交易勉强维生。那是一个女人们会为了一双尼龙袜而出卖肉体的城市，是一个母亲们会用十几岁的女儿换取食物、丈夫们会用妻子换取一包香烟的城市。要是英国人能预见到如此长远的影响，他们在制定行动代号时可能会想一个比“蛾摩拉”更合适的名字。

我无法相信，有人可以让汉堡回到从前。本来我以为会看到稍微重建的汉堡，但相反，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美丽大都会，街道灯火通明，车流永无停息。几英里长的街道上挤满了衣冠楚楚的购物者，一排排的商店摆满了高质量的商品。

在时尚的处女堤，汉堡的“纽约第五大道”，乐在其中的人们在电影海报下面排起了大长队。海报上大字写着“性感小猫，有什么新鲜事吗？”，表明美国的影响已经无处不在。德国人广为吹嘘的“经济奇迹”，由山姆大叔的一根钉满美元的魔杖引发，由德国人辛勤劳作实现，并不是夸大其词。

然而，别处还有另一番景象。我去了城市左翼我以前住的地方，惊讶地看到，在二十三年前那个难忘的夜晚，被空袭摧毁的我家，现在变成了一个大停车场。“奇迹”似乎并没有到达这里。我在以前的防空洞那里待了一会儿，想起我是如何幸存，而邻居们是如何变成了幽灵。我还记得，因为来不及赶到防空洞而不幸遇难的人们，变成了一具具烧焦的尸体。现在，那里矗立着一栋崭新的公寓楼，下面是绿色的操场，孩子们在那里玩着我小时候玩的老游戏。不知为何，看着他们，我希望至少有一个人会再对我喊一次“黑鬼，黑鬼，扫烟囱的人”，看在过去的分上。不过，要么就是德国的孩子们变了，要么就是我不显眼了，没有人对我这样做。我就好像是当代的瑞普·凡·温克尔^①，漫无目的地走在昔日熟悉的街道。曾经，我认得每一根灯柱、每一棵树和每一张脸。现在，我看见的每一个人都不认得我，而我也不认得他们。曾经我也算是巴姆贝克的名人，每个人都认识我，即便不知道名字，一说“那个黑鬼”也都知道是我。现在这种感觉太陌生了。直到这一刻，我才懂了托马斯·乌尔夫那句著名的“你永远回不到家乡”的真正含义。

我去了奥尔斯多夫公墓，向那些没能在1943年7月空袭中幸存的41000名汉堡人表达哀思。看到数不清的墓碑上只刻着他们的残骸被

^① 瑞普·凡·温克尔是19世纪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所写同名短篇小说的主人公，这位美国村民山中一觉醒来发现已经过了二十年。

发现的地方时，我很震惊。走在长长的、宁静而优美的小路上，我不禁思考，为什么我幸存了下来，为什么他们这样悲惨地离去。

作为一个出生在德国的黑人，我觉得最有趣的一个群体是人数急剧增多的所谓的“褐色宝宝”，大多都是黑人大兵和德国女人的非婚生子。战后美国军队入驻，“古老的黑人魅力”让德国的女人们神魂颠倒，结果就是混血宝宝越来越多。西德的政府部门大部分都坚称他们并不保留种族记录，所有出生在德国的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美国政府两手一甩，推得干干净净，说这些孩子都是德国公民。

为了了解更多，我去了艾尔·豪瑟曼在慕尼黑的家里。有人告诉我，他对这个话题的了解比谁都多。这位来自爱荷华州滑铁卢的外籍前重量级选手是“有色人种及孤儿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和主席。1950年，他来德国，原本是想挽救他的拳击事业，但当他在电影《黑人天使》里扮演一个黑人宝宝的大兵父亲时，他被这些孩子的悲惨境遇深深触动，于是他挂起自己的手套，投身于这项事业。在这个过程中，在其他电影和舞台剧的影响下，他爱上了德国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留下来。到我去拜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是慕尼黑的名人，从市长到平民，每个人都认识他，尊敬他。

“进来吧。”一个声音说。我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留着胡子的大个子黑人，大概四十五六岁。“别四处看了。”他一边提醒我，一边把我领进一个凌乱的一居室。墙上贴满了照片，似乎概括了他的整个成年生活。有他参加比赛的照片，跟许多黑人宝宝的合影，还有跟许多名人的合影，从埃莉诺·罗斯福到小马丁·路德·金。

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的时候，他会时不时向一个想象中的敌人猛击。他先是回忆起他在拳击场上的一些自豪时刻，然后发泄过去对乔·路易斯的怨恨。他说褐色轰炸机在一场表演赛中把他打得落花流水，造成了永久性的眼睛损伤，从而结束了他的拳击生涯。然后他坐下来，细说他的社会工作。说到他的努力因为缺少资金而付之东流

时，他因为比赛而留了伤疤却依旧英俊的脸，动情地扭曲了。“如果我有点钱——启动资金一万美元，”他低声说，“我就能让他们看到我们能做什么。但我现在能筹到的一点点钱，还不足以请到专业的帮手，或者维持机构运转。”

“最大的问题是，”他继续说道，“大部分孩子的母亲或祖父母或养父母都是低收入阶层，因此，他们根本无法跟那些生在有钱人家的孩子竞争。德国是一个崇尚艺术、音乐和文学的国家。没条件接触这些的孩子已经很可怜了。他们的监护人从西德政府那里拿到的微薄补贴，根本不够让他们发掘任何潜能。”

“另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德国人的阶层意识。你出身于什么阶层，通常这辈子你就是什么阶层。因此黑人宝宝，除掉肤色的原因，自然而然就在相对底层的阶级。”

“简而言之，这是黑人宝宝的问题，但并不是种族问题，因为德国所有的穷孩子、非婚子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每个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我敢毫不犹豫地，相同背景下的黑人儿童，在美国享受的社会接纳程度，绝对跟这里没法比。就说我个人吧，我没赚什么钱，电影的角色也越来越少，但在这里，我内心很平静。听到‘嗨，宝贝’我再也不会有什么震动，在家里，我也摆脱了那种拘谨、老式的德国式握手的习惯。”

拜访了西德几个主要的人口聚居区之后，我意识到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以前的第三帝国，曾经种族纯净“圣徒”的圣殿，已经不再是“白人”的国度。除了黑人大兵们的孩子，联邦共和国大街上随处可见有色人种——美国人、非洲人、西印度群岛人——他们无处不在，仿佛跟香肠、啤酒和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一样，成了德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跟二战前的种族情况是完全不同的，那时候光是看见一个黑人就是值得注意的大事了。

德国的新生代们似乎很享受照搬“美国的生活方式”。最明显的

是，年轻人喜欢穿美国式样的衣服，跳舞、唱歌也喜欢美国那一套，尤其是灵魂乐和爵士乐。在纳粹时代，演奏或是听爵士乐肯定会被抓进监狱，现在，欣赏爵士乐已经完全不受约束了。每个唱片店的橱窗里，我都能看到黑人爵士和流行艺术家们的海报，大多数人在西德的流行程度绝不逊于在美国。

“听过了这些小野猫们是如何发声的，你还以为你是在黑人区呢。”从人满为患的慕尼黑迪斯科舞厅大门望去，一个黑人士兵跟我说道。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随着美国音乐迈动舞步，我不禁想到童年时期那些死板、僵硬的褐衫队，还有我因为肤色遭受的嘲笑与奚落，我又对这个国家充满了希望。

思考

不幸的是，这些是我在1966年观察到的，时代又变了。德国的种族关系的后续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仇恨犯罪率上升，令人担忧；二是各种新纳粹组织的扩散以及种族主义泛滥。我的乐观态度可悲地过时了。如果说从种族角度来说，德国又回到了正轨，那就太夸张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德国的种族主义远不是过去的事情。1977年，我见到了一百个在德国出生的年轻黑人——德国原生黑人协会的成员们——他们在教育、社会和经济背景方面都各不相同。他们让我确信，德国联邦政府、私人协会和普通公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才能确保德国主流社会与非裔德国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的绝对平等以及经济与社交的彻底融合。只有这样，德国才有希望不再重复恐怖的种族大屠杀。

我希望我的故事能传达出我从这段历史中汲取的不可避免的教训，我注定要从近到令人不安的距离见证这段历史：如果它发生过一次，它就可能再次发生；如果它能发生在德国——一个培育过诸如歌德和席勒的大智者，被贝多芬、巴赫和勃拉姆斯等数不清的音乐天才滋养过的国家——它也能发生在任何地方。

像纳粹德国打着种族、宗教或道德清洗的名义进行的恐怖主义和残忍的大屠杀，已经被西非的白人、科索沃的塞尔维亚人、卢旺达的图西族和北爱尔兰的新教徒（没有提到的还有很多）效仿过了。最初，种族主义的传播只需要公众的默许。在纳粹德国，一开始，德国和整个世界只是假装看不到纳粹对人权的公然侵犯，等到想要阻止种族主义疯子们实施他们的邪恶计划时已经无力回天了。人类历史上如

此可悲的一个篇章表明，无论何时、何地、以何种形式，极权与种族主义一露出丑恶的头，人们出手阻止就永远不会太早。每个人都应义不容辞地反抗并且零容忍哪怕是最轻微的种族思想与行为。

一个国家在邪恶统治者的控制下，走向了堕落。我们这些经历过的人，有责任让全人类都牢记这个血淋淋的教训。

他们现在都在哪里？

了解我人生故事的人，经常问起我，那些散落在德国、利比里亚和美国的，曾经在我的人生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的亲戚、朋友和对手，后来的境遇如何。因为二战期间，汉堡和德国其他城市大部分地区被摧毁，德国军队和人民都伤亡惨重，人口也有过大量迁徙，很多人的命运，我永远也无法得知了。很多时候，我只是因为时间、空间的距离跟他们失去了联系。然而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我跟一些亲人和朋友还能够保持密切的联系，甚至在中断了许多年后，又与他们重新建立了联系。

我母亲的两个姐姐，克拉拉和海德维希，还有她的大哥赫曼，50年代我从利比里亚到美国时帮我在美国站住脚的亲人们，都已经去世了。除了直到去世还是单身的赫曼舅舅，她们都跟我留下了数不清的二代、三代表亲。

因为《Ebony》杂志派给我的任务，我需要频繁地去德国出差。我曾经去东德看望我寡居的格里特舅妈，她跟她的孙女卡拉、卡拉的丈夫彼尔德还有他们两个十几岁的女儿一起住在诺德豪森。格里特舅妈从中年时起就每年都觉得自己快要不行了，却一直活到了快九十岁。她的女儿，我的表姐特鲁德琴，我童年时期在哈尔兹山脉过暑假时待我像亲姐姐，英年早逝，远在她母亲之前。

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万分惊讶地接到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玛哈的邀请，前去芝加哥喜来登酒店接待利比里亚的国防部副部长，尊贵的莫里斯·W·马萨夸依，还有他麾下的几名利比里亚将军。在经过了美国军方的几道安检关口后，我终于来到我哥哥的VIP

套房，等着我的是又一次震惊。我看到的不再是以前那个精力充沛的巡警，而是一个相当肥胖、衣着考究、对周围环境如鱼得水的绅士。我们俩都无法跨越巨大的飞跃带来的鸿沟——从极度贫困和老鼠泛滥的棚屋到如今生活舒适、地位崇高。

1971年，塔布曼总统去世时，我代表《Ebony》去蒙罗维亚参加葬礼。我坐的是政府的飞机，跟一群代表尼克松总统出席丧礼的美国官员一起。抵达罗伯茨费尔德国际机场时，我又见到了莫里斯。跟莫里斯一样，蒙罗维亚也繁荣起来。我记忆中沉睡的小城终于成了忙碌的大城市，航空和地面交通都有了飞快的发展。

瞻仰塔布曼总统的遗体时，莫里斯和我回忆起，当年我们发觉纳撒叔叔欺骗我们时，总统是如何聆听我们的困境的。莫里斯告诉我，自从纳撒叔叔因一系列严重的健康问题于1962年去世后，法缇玛姑姑就接过了他的担子，针锋相对地谋取我们已故父亲的遗产。我很庆幸我早就放弃继承权，尤其是看到莫里斯斗争了这么多年还没有任何进展之后。

在蒙罗维亚短暂停留期间，海岸警卫队的总管莫里斯给了我贵宾待遇，亲自陪我“巡视”他的一个海岸警卫快艇队。向我展示他的“领地”时，他告诉我，他私下一直跟史蒂芬·托尔伯特——新总统的弟弟及托尔伯特家族渔业生意的负责人——较量。莫里斯坚称，史蒂芬·托尔伯特在用海岸警卫队的码头停放自己的私人船队。“每次我抓到他的船停靠在我们的码头，”莫里斯吹牛说，“我就会扣住，把钱算到他头上。”

我跟他指出，他的恩人和靠山塔布曼总统已经去世，针对新总统的弟弟在政治上似乎是不明智的。莫里斯嘲笑说，“你不用担心，托尔伯特只会干满塔布曼剩余的任期。然后我们就会弹劾他。全都安排好了。”

前不久我刚独家采访过威廉姆斯·托尔伯特。在采访中，托尔伯

特说他准备沿用塔布曼总统的政策。因此，我对莫里斯的话并没有把握。“或许吧。”我说，“但我还是觉得，你不应该针对史蒂芬·托尔伯特。”

遗憾的是，我的好建议总是说得太晚。我一回到芝加哥，就得知托尔伯特总统开除了塔布曼总统的几个亲信，莫里斯首当其冲。

回想起来，莫里斯被开除其实是一件好事，令他免于九年后的灾难。塞缪尔·多伊清除了托尔伯特总统和利比里亚统治阶层的几位高官，这场血腥的屠杀震惊了世界。而莫里斯则作为商人，平静地生活着，偶尔来美国看望我，直到1965年他六十八岁的时候，疾病夺走了他的生命。他夺回我们父亲遗产的愿望依旧没能实现。

本着好人做到底的想法，看望法缇玛姑姑时，我绝口没提父亲的遗产。1971年，她已经是利比里亚大学的院长，也是全国最受人尊敬的学者之一。她骄傲地告诉我，她的女儿皮普琴在德国留学。从1978年去世的法缇玛姑姑那里，我得知我的祖母在丈夫去世后，从拉格斯回到了蒙罗维亚，然后在1958年去世。直到1991年，我才有了弗里兹和法西雅的消息。多伊政变后，他们搬到了田纳西州的诺克斯维尔，在那里，弗里兹成了一名艺术家和艺术品商人。他和法西雅与各自的孩子和孙子都住得很近，怕是不会再回利比里亚了。他们的母亲瑞秋奶奶和哥哥亚瑟，利比里亚前任自然资源和矿产总负责人，分别于1986年和1984年去世。

我在三个大陆的冒险旅程中，从未与我的老朋友“美国佬沃纳”失去联系。是他，在五十多年前领着我混迹于汉堡岸边，是他，让我最初对美国充满迷恋。从1950年5月我抵达美国的那一刻到现在，我们靠着电话、节日卡片和互相拜访，维系了我们的友谊。沃纳离婚又再婚，养大了一个女儿，在一家大型航空公司做了许多年乘务长，退休后跟他的妻子伯吉德快乐地生活在阳光明媚的加利福尼亚。

我的熟人里面最出名的就是我的朋友、非雅利安人拉尔夫·吉奥

达诺。当了十一年的记者和宣传员后，他对共产党的幻想终于破灭，先是成了非常受欢迎的电视纪录片主持人，1982年出版了小说《伯尔蒂斯》，写的就是他的家人在纳粹统治下存活的故事。这本主人公叫“米奇·马萨肯”的小说，在德国大卖，让吉奥达诺这个姓氏在德国声名大噪，让拉尔夫成了富翁。他丧偶后又再婚，现在跟他的妻子罗希住在科隆，以一年一本的速度出版新书。他的父母都已经去世。1982年他在文学上获得成功后，他的哥哥埃贡突发心脏病去世。他战后出生的妹妹加布里埃拉也去世了。只有他的弟弟洛克依旧住在汉堡。

1992年，在汉堡的报纸上看到一篇关于我的文章后，我儿时的玩伴艾丽卡联系上了我。在当了四年脱衣舞娘后，已故汉堡议员沃尔特·施密德曼的女儿艾丽卡，做了很长时间的家庭主妇、母亲和祖母。大部分时间她都跟她已经退休的丈夫哈拉尔德·史陶比在世界各地旅游——包括我在美国的住处，或是待在他们汉堡福尔斯布特尔的家中。

英格，我二十二岁离开德国前最后一个俘获我的心的女人，也活了下来。虽然承诺了会永远爱我，她还是嫁给了英国皇家空军的一个军官。她跟着他在各个英属殖民地过起了“游牧”却趣味十足的生活。最后，她离了婚，回到汉堡。这时候，在我离开德国二十多年之后，一个共同的朋友让我们又联系上了对方。在那之后，我被告知，她离开了汉堡，从此杳无音讯。

还有一个伙伴，听说他在一起交通事故中丧生的消息，我哀痛了好几年，最后居然还奇迹般地活着。60年代末，因为工作在汉堡短暂停留期间，我在当地的电话本上偶然看到弗里德·加斯的名字。虽然我还是认为弗里德，跟我在豪斯家园和其他汉堡著名夜店度过许多快乐时光的小伙伴，已经去世了，但我还是出于好奇拨通了那个电话。接电话的女人说她是吉斯拉·加斯太太，邮政工人弗里德·加斯的

妻子。

不到一个小时，我就拥抱着我的老朋友。他不仅是“起死回生”，还从瘦竹竿变成了水桶一样的老爷爷。弗里德和当时还是保险经纪人的吉斯拉，退休后住在汉堡一间舒适的公寓里。从那之后，每次去汉堡我都会去他们家。在1989年的秋天，我终于做到了不可能的事——成功地劝说弗里德克服对飞行的恐惧，跟吉斯拉一起来芝加哥跟我和我的家人，还有加利福尼亚跟美国佬沃纳及其妻子住上一段时间。他们俩玩得很开心，答应我们下次还会再来。

还有一个就是阿岳洪楼，我在阿岳洪楼三人组的搭档。乐队解散后，岳成了独立艺术家，继续跳踢踏舞，最后还在很多大电影里扮演了一些亚洲角色——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等等。他丧偶后又再婚，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岳现在跟妻子吉赛尔住在汉堡郊区的布兰肯尼斯。只要我在那附近，我就会去看望他们。

说到莫雷尔一家，只有我的朋友和老同学卡尔活了下来。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他退休后独自住在离我们长大的地方只有几个街区远的地方。他说，他被部队划为失踪人口，从苏联战俘营逃出来后，在一天晚上饿得半死衣衫褴褛地回到家里，发现他的父母和兄弟们正在家里大搞派对。“我一直以为他们会为我悲痛欲绝，”他回忆说，“谁知他们却活得好好的。”至少，卡尔并没有像许多德国战俘那样失去尊严：回到家乡后，发现自己的妻子早已用英国兵或美国兵代替了他们——应了那句老话，“成王败寇”。

卡尔说，回家看到如此令人失望的场景后，他就与家人永久地疏远了，尤其是他的父亲，他的纳粹主张经常令他恶心。卡尔从战俘营回来不久后，他的哥哥吉尔德，一个拥有自己乐队的天才鼓手，在一次演出中跌倒在鼓上，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在那之后，莫雷尔先生和莫雷尔太太也相继离世。莫雷尔家的长子汉斯，在苏联战争中活了下来，多年病痛后也去世了。

我的亲人、朋友和熟人中有许许多多没能幸存下来，包括我以前的同学菲菲·皮特斯。我最近才知道，他在一次行动中丧生，还有我们的老师亨利·赫伯斯特。我听过的命运最悲惨的人之一就是我的初恋格雷琴·加恩。1976年，当我作为嘉宾出席一个颇受欢迎的汉堡电视节目《表演者》后，很多人打电话给我，其中包括一个自称是格雷琴表妹的女人。从她那里，我知道了，格雷琴的母亲和哥哥移民去了美国，而格雷琴却不得不留在德国，因为她曾经得过肺结核，被美国移民局拒签了。孤苦伶仃的她只能在汉堡的夜店里当服务员。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1946年在圣保利。过了几年，她就穷困潦倒独自死去。

我从未听说过我人生中两大反派人物维希德校长和杜克老师的后续消息。从他们的岁数来看，我只能猜测他们已经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我希望这报应配得上他们折磨我时获得的变态快感。

我的母亲，1952年搬到美国来，在1986年八十三岁高龄去世前，终于过上了美满的婚姻生活时，我对比感到非常欣慰。在米列塔·尼科迪耶维奇——被盟军从德国战俘营里解救出来的塞尔维亚人——身上，她终于得到了她应得的钟爱与陪伴。他们在芝加哥郊区过着田园诗一般的生活，身边总是围绕着许多朋友。那是她还在德国时就一直梦想的家，有一个小菜园，虽然那时拥有一套房子对我们来说是那么的遥不可及。他们的幸福生活一直持续到他们的二十五周年结婚纪念日前夕，米列塔因心脏病去世。

对于母亲为我所付出的一切，我无以为报，除了“成就自己”，并培养好她的两个孙子，史蒂夫-戈登和小汉斯-尤尔根，让他们也有所成就。在史蒂夫从哈佛大学医学院毕业，汉斯考进密歇根大学法学院之后，最让她高兴的就是到处吹牛，“我的孙子是个医生，我的另一个孙子，很快就是律师了。”正如她常说的，“结局好，一切都好。”

DESTINED TO WITNESS
Growing Up Black in Nazi Germany

命定的见证
一个黑人在纳粹德国的成长

我们说汉斯·尤尔根拥有一切，并不只是说，在德国崇尚白皮肤和雅利安血统的年代，他却拥有黑皮肤，也不只是说，在只有金钱能从种族憎恨及贫困中挽救他和母亲时，他没有钱却活了下来。事实上，马萨夸依的确拥有一切：敏锐的观察力、强大的理解力还有超常的记忆力。这是一个鲜有人经历过，更少有人讲述过的故事。我们需要这本书，来更好地了解那一场大屠杀。那不仅是针对“犹太人”的。憎恨就是憎恨，不分肤色，无一幸免。

——玛雅·安吉罗(美国黑人女诗人)

一段横跨三大洲、历时半生的追寻自我之路

汉斯·尤尔根·马萨夸依似乎和同龄人没有什么不同：在学校读书，用恶作剧反抗老师和校长，渴望穿上军服，仰慕异性，用运动和打架发泄过剩的精力。然而等待他的是：成绩优秀但无法升学，军队绝不会“困难到你这样的人才能赢得战争”，只能为同伴和女孩牵线搭桥，拳击天赋出众却无法参加比赛，无论发生什么坏事情，倒霉被抓住的总是他。

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黑皮肤，因为他生活在纳粹德国和希特勒种族歧视、灭绝、屠杀的阴影下。父亲是利比里亚驻德国总领事的儿子，母亲是德国护士，对他来说盖世太保的敲门声比盟军的炸弹更可怕。

幸运的是他还有坚定而乐观的母亲、心地善良的老保姆、不顾别人眼光的乡下亲戚，在政治的夹缝中，他崇拜美国非裔运动员乔·刘易斯和杰西·欧文斯，学习“堕落”的爵士乐，在地下舞厅游荡，冒着被抓进集中营的危险约会，看小说学英语，和美国黑人大兵交朋友，利用战后的黑市顽强地活下来。这是一段充满勇气和智慧的奥德赛。

上架建议：纪实·回忆录

ISBN 978-7-5142-2719-2



定价：69.80 元